浙西南革命根据地

研究文集

中共丽水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研究文集 / 中共丽水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北京 : 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8
ISBN 978-7-5098-4670-4

Ⅰ. ①浙… Ⅱ. ①中… Ⅲ. ①革命根据地—浙江—文集 Ⅳ. ①K269.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19411 号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亚平 包晓峰（特邀）
复　　审：王　兵
终　　审：李青建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 6 号院 1 号楼
邮　　编：100080
网　　址：www.dscb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浙江遂昌印业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210mm×285mm　1/16
字　　数：450 千字
印　　张：24.5
印　　数：1–3000 册
版　　次：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98-4670-4
定　　价：52.00 元

目　录

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节录) ……刘　英(1)
浙南三年游击战争(节录) ……粟　裕(34)
历史的丰碑 ……中共丽水市委党史研究室(57)
论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王扬世(63)
论坚持三年游击战争中的刘英 ……刘宗鹤(69)
论粟裕在浙南斗争中的战略思想 ……《粟裕传》编写组(73)
论粟裕对毛泽东根据地思想的实践与发展(节录) ……刘宗鹤(79)
试论浙南三年游击战争的实践在粟裕军事生涯中的地位和作用 ……叶水清(83)
斋郎战斗始末 ……陈明赞　张　树(89)
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邓唐良(93)
对浙南三年游击战争几个问题的探讨 ……刘宗鹤(98)
浙西南革命根据地丧失的原因初探(节录) ……王人勤(106)
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创建的历史意义与受挫的经验教训(节录) ……李华忠(109)
刘英、粟裕坚持浙南三年游击战争的历史功绩 ……金　冶(114)
略论红军挺进师对浙江革命的影响 ……诸葛蓉(118)
论红军挺进师在浙江革命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黄梅英(122)
从挺进师入浙的成功看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的教训(节录) ……毛飞云(128)
浅析红军挺进师与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成败的原因(节录) ……孙　瑛(133)
论红军挺进师入浙的历史背景和意义(节录) ……江涌贵(136)
论红军挺进师取得浙南三年游击战争胜利的主要因素 ……刘宗鹤(139)
浅析红军挺进师能在浙南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原因 ……李金南(144)
红军挺进师在浙南实行两个战略转变初探 ……张志坚(146)
红军挺进师是怎样完成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战略转变的(节录) ……陈史英(152)
红军挺进师战略转变因果析 ……陈治赵　刘建国(156)
红军挺进师“敌进我进”军事方针的形成和意义(节录) ……周德春(161)

红军挺进师在浙西南的统战工作初探……杨　薇(164)
浅谈挺进师在浙江的统战工作……郑子雄(168)
评红军挺进师与“青帮”的大联合……刘关洲(171)
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苏维埃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徐承宾(174)
浅谈红军挺进师的革命文化活动及其历史作用……邱锡龄(177)
浅谈红军挺进师在浙南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历史启迪……史济渭(181)
从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探讨粟裕的领导指挥艺术……吴玉谦(184)
粟裕在浙西南游击战争中战略特点的研究……王人勤(188)
浙南三年游击战争和粟裕的领导指挥艺术……《粟裕传》编写组(192)
红军挺进师与浙江抗日救亡运动……周德春(199)
浙江“井冈山”的斗争……中共丽水市委党史研究室(203)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浙西南的斗争及其意义……诸葛蓉(209)
关于红军挺进师若干史实的考证……周德春(216)
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策略转变……徐承宾(226)
浙西南游击区的建立和历史作用……诸葛蓉(230)
浅析抗日先遣队和红军挺进师对长征的战略策应……周德春(234)
南方游击区应当增加“浙西南”……诸葛蓉(241)
奋战在艰苦而危险的环境中(节录)……毛明库(255)
红军挺进师的历史功绩……周德春(260)
浙西南革命根据地若干问题探析(节录)……周德春(265)
先遣队精神永放光芒(节录)……何建林(274)
试论红军挺进师和浙南游击根据地的重要历史地位……李　蓉(278)
试论红军挺进师创建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贡献……王　松(283)
粟裕的军事指挥思想与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开辟……董志铭(290)
在反封锁中成立的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钟健英(296)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若干问题再研究……吴明刚(301)
红军挺进师求实创新精神及其现实意义……赵前吉　宁　金　卢梅春(307)
新时期红军精神研究……梁晓宇(313)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组建及影响研究(节录)……张德义(318)
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在土地革命战争史上的历史地位……刘明辉(323)

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宣传标语初探 ……占卫东　贺清峰(329)
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及其作用(节录) ……陈晓楚(334)
浅析红军挺进师的精神特质(节录) ……杨良英(337)
红军挺进师精神及其丰富内涵(节录) ……吴利明(341)
项英为浙西南游击区的开辟和浙江革命基业的重建作出了贡献 ……诸葛蓉(345)
论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地位(节录) ……潘洪峰　蓝财兴(348)
浙西南革命根据地革命遗址保护利用研究(节录) ……毛明库(354)
试论红军挺进师精神与遵义会议精神的天然联结 ……吴旭丽(359)
浅析斋郎战斗的战略战术和历史地位(节录) ……何建林(365)
松阳人民对挺进师开辟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贡献(节录) ……王香花(369)
从“门阵谈判”看粟裕大将的政治才华(节录) ……钟春雷(373)

后记 ……(376)

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节录）

刘　英

一、当时所处的环境及中共中央的新政策

远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以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保持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的任务。

1934年中共五中全会更有进一步的重要指示：“帝国主义侵略的加紧与国民党的无耻投降，给了我们以良好的机会，去加强和扩大群众的反帝斗争，党必须坚决的为着创造反帝的下层统一战线而斗争；这个统一战线必须依据在明了通俗的民族革命战争的纲领之上，而且在一切反帝斗争的形势中实现起来，并在这统一战线之中，加强与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

1934年4月，中共中央给各省与市委一封信中，同样的这样正确指出：最近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整个华北的急进，美帝国主义对于川、康、新疆、班洪的侵略，以及其它帝国义积极的活动与国民党法西斯蒂最露骨的投降和出卖，表明中国民族已经到了新的严重的关头。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正以哀的美敦书的方式提出占领华北统治中国的条件，与卖国贼黄郛、汪精卫、蒋介石等谈判。这一谈判在南昌会议以后已经具体化，有吉在上海与黄郛的会面及其进京的任务，就是最后确定这谈判的内容。与这一谈判同时进行的，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疯狂的军事行动。现在华北已经充满了日本与满洲国的军队，及其他各种各色的武装力量，大规模的军事演习、示威，计划布置，正表明整个华北与全中国的劳苦群众都直接处在帝国主义炮弹刺刀威胁之下。最无耻的蒋介石，已经答应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要求，目前正以种种武断宣传来掩饰这一露骨的大出卖，一面否认华北形势的严重，要全国民众不要“大惊小怪”，同时拼命宣传中国无力抵抗帝国主义，来证明他出卖中国签订卖国条约是“合理”的。他以“复兴民族”的口号来麻醉群众，进行所谓“生产建设”文化统治“新生活运动”等等转移广大民众对于他卖国投降的愤怒，并以此为围剿苏区压榨工农劳苦群众的旗帜。不仅如此，他现在公开的颂扬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雄飞东西”的威风，积极实行他与日本帝国主义所订立的反苏的军事同盟的密约，恭请溥仪入关，将黄河以北地区作为朝见的观礼。在允许自治的名义下，把内蒙古送给日本帝国主义；借口“开发西北”“整理边疆”，派遣大批爪牙和武装深入陕、甘、新疆，镇压弱小民族，以执行日本军阀荒木的西进政策与英帝国主义反苏的阴谋，企图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先锋，干涉外蒙共和国，从那里侵入苏联的领土。另方面，在“复兴民族”的口号之下，拼命的

进行法西斯蒂化与白色恐怖，企图造成民众对国民党新的幻想，并将广大劳苦群众反帝反蒋介石的斗争沉没到血海中去。

中共中央鉴于当时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亡国灭种的条约接踵而来，它不仅及时的指出了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不战胜日寇，不驱逐日寇出中国，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民主共和国的建立是不可能的，而且在极端困难与残酷的五次围剿中，中共中央与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贯彻自己的主张，实行对日直接作战。故虽处在极端严重的情势中，特别是残酷的五次围剿中，本着为国忠诚、忍痛牺牲的精神，从前线主力红军中抽调红七军团为中国人民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①]，实行它北上抗日的任务。另方面，通电号召国内外男女同胞、各党派、各阶层、各友军、各地各级党政当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以挽救当前的民族危机和争取主权领土的完整。

高举鲜红旗帜而行动的北上抗日先遣队，红七军团全体将士，本着忠实于中华民族解放事业与党的事业，抱着英勇而又顽强的斗争精神，遂于 1934 年 7 月 7 日[由]红色首都瑞金出发，实行它郑重而又光荣的北上抗日任务。正因为红七军团在行动上、政治上表明了自己的先进与抗日先锋模范作用，它不仅冲破了南京政府首席顾问赛克特的堡垒政策，而且给了尾追与拦阻北上抗日先遣队去路的军队以严厉的打击，它得到全国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军队及各阶层的先进人士热烈的同情与拥护，同样的它得到世界先进人士的同情和赞许。它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者与组织者，它是中华民族不会亡的模范战士与对日作战直接的先锋队，它在中华民族解放史上，业已写下了光荣的一页，与永垂不朽的声誉。

这正如洛甫同志纪念中国共产党十七周年论文中所指出的：“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自它产生之日起，直到今天，始终为了民族的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民主共和国而英勇的奋斗着，不论国内外形势如何变动，以及它处在何种艰难困苦的条件之下，然而它总是向着这个总的目标前仆后继的进行与奋斗着。”

二、中共中央给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任务

1. 党中央与军委会派遣七军团到敌人的深远后方进行广大的游击活动，与在敌人最受威胁的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红七军团应在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遣队的旗帜下，经过福建而到达浙皖赣边行动，号召与组织一切抗日的友军，抗日的人民以及广大先进的人士，一致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2. 在七军团肩上放着郑重与光荣的军事的政治的任务（关于军事任务详作战命令），而且政治的任务是更加重大。因此，先遣队必须在党的彻底的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口号之下，宣传发动与组织广大民众进行各种各色的反日反帝的民族解

① 即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下同）。

放斗争。

3. 高举着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遣队的旗帜而行动的七军团应在自己的行动中，最明显的表明着自己是有组织的、英勇的、守纪律的、先进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先锋队；应该以自己的英勇行动，坚忍不拔的意志及加强部队中的政治工作，去告诉和指示最广大的劳苦工农群众，怎样才能够进行胜利的民族革命战争，而挽救当前的民族危机，争取主权领土的完整。

4. 如果把反对帝国主义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与土地革命分割或对立起来，将是极端的错误。七军团在自己的行动中，应该表明自己是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的倡导者和组织者。

5. 为着保证七军团肩上的伟大的政治与军事任务的完成，必须最高度的加强部队中的政治工作，提高战士的觉悟性与政治水平；提高与巩固部队的纪律，必须与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作严格斗争；应该不倦怠的进行吸收积极的革命分子加入自己的队伍；应该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及在胜利的作战之中，扩大自己的部队，并由中央代表及军政首长组织军团革命军委处理一切政治与军事的问题。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国内外形势如何变动与它处在何种艰难困苦环境中，它总是向着这个总的目标前仆后继的进行与奋斗着，而且它处在当时极端残酷的五次围剿中，始终为着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不屈不挠与艰难困苦的奋斗。

三、北上抗日的经过及几次主要战斗的检讨

中国人民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红七军团，忠诚的接受了中共[中央]与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所给予它的北上抗日任务之后，便于 1934 年 7 月 7 日由红色首都瑞金，在万民欢呼的护送中，开始了它北上抗日的行动。经长汀、清流，占领大田县，继向闽清前进，渡过闽江，占领古田县城[①]，胜利的到达闽东游击区域，即分驻于连江县属的桃源之线。经数日的休息、整理与动员后，则向福州城进发[②]。这一行动的主要意义，是为了进一步的号召全国友党友军及各阶层的先进人士，一致地响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以配合主力红军反抗敌人的五次围剿。但由于先遣队本身存在着某些的弱点与当时所处环境的关系，围攻福州的战斗经三昼夜之久，终于自动的退出战斗而回师闽东游击区域，整顿本身与加强闽东党及闽东独立师党政军的领导，特别是检讨了闽东过去的工作与给予今后工作的指示。

根据当时敌我力量的对比，与围绕在先遣队行动周围的情势，红七军团是可以攻克福州的，但当时为什么没有攻克呢？主要的原因如下：

（一）战斗的布置不够周密，侦察工作做得太差，致影响整个战斗和兵力上的使用。对于福州周围的地形地物不了解，以致对于部署的布置与兵力使用不适当。如当时将主力用于西南门，但西南门方面不仅有十九路军事变时所建筑的强固的堡垒，同时绕城的内河和湖泊是很

① 应为古田县的水口镇。

② 据考证：先遣队攻打福州未果，即转移至连江县的桃源、潘渡游击区。

多的；在东北方面，不但城墙业已拆去，且飞机场也建筑在该地，同时内河湖泊也极少，假如当时有可靠的同志或群众引路，则以少数的兵力，佯攻西南门，而以主力攻击东北门，是很可能攻克福州的。因为当时福州城仅有王敬九的两个团和一些毫无战斗经验的警察，就是王敬九部也是先遣队沿途击溃的败兵，且士气与战斗力亦不强，特别是部队中不愿意与先遣队作战的情绪相当的普遍。

（二）当时福州周围党的组织是异常薄弱的，特别是福州的工运薄弱，致未能取得当地党与福州市工人更多的帮助和适当的配合，以致先遣队围攻福州三昼夜之久，始终得不到各方的消息而影响到七军团的军事行动与围攻福州整个战斗任务的完成。因此可见，党与群众力量的伟大及其配合军事行动的重要性。

（三）几个主要干部不够团结，影响到意见的不一致。另方面，对军委给七军团围攻福州命令的了解亦是很不深刻。如认为军委会只要先遣队“相机占领福州，而不是肯定占领福州的任务”。同时叛徒曾洪易身为中央代表，不仅毫无意见提出，而处处表示没有决心战斗。此外寻淮洲和乐少华两同志之间，亦缺乏同志态度，以致不断的闹私人意见，特别是××同志那种“打也可以，不打也要得”的决心是极不利和不该的。

（四）攻打城市的经验还是很差，政治上的动员也做得不够。虽然红七军团有攻打沙县、尤溪等城市的经验，然而攻打尤沙城市与进攻福州的过程有着许多不同的情景（如时间不允许久战，准备工作不充分，友军的配合以及环境等）；另方面，战斗的政治动员亦缺乏深入和普遍。特别是政治工作的动员与军事行动的配合上做得很差。

围攻福州的战斗自动撤退后，经一礼拜的整理与训练，则攻占罗源县城与袭击宁德县，另方面分兵占领西洋镇与木洋[穆阳]镇，继行经梅溪、下庄，一举而攻克浙江省属之庆元县域。翌日与浙保三、四两团遭遇于竹口，由于先遣队全体将士英勇善战及指挥上的灵活，经数小时猛烈的攻击，卒将凭险抵抗的浙保两团打得溃不成军，使蒋志英（浙保副处长）不得不深夜逃窜龙泉城。是役缴获迫击炮2门、机关枪10余挺、长短枪400余支，活捉庆元县长×××[①]。当日进至小梅镇宿营。翌日本可乘胜进占龙泉县与在有利的条件之下，打击尾追先遣队之四十九师，但由于军团首长战斗意志的不够坚强，进至龙泉八都镇经党溪，经忠信街与四十九师接触。此时极大多数指战员作战情绪非常高涨，且有闽北苏区的依靠，但由于军团首长不愿作战，终于是日进驻闽北浦城县属之古楼休息与整理部队三天，另方面给了闽北党工作上的指示。

事后接到中央和军委的指示，责成中央代表与军团首长派遣得力的游击部队在闽浙边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号召与组织广大人民一致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改善人民生活，创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另方面应以极大的力量去破坏浙赣铁路，以使先遣队的任务顺利完成。除由先遣队留一个营在该地长期行动外，主力经江山县属之廿八都、仙霞岭、石门而进占清湖镇，并

① 活捉庆元县长张致远。

派出两个营分途的破坏浙赣铁路，继则集中主力攻克常山城，缴获颇多，并获得很多军用品。继经浙江边界之白沙关、童家坊、石人殿而进驻崇溪[①]。除检讨了先遣队由瑞金出发至闽浙赣苏区时的党政军及居民工作外，则以全力整顿补充与训练自己的部属，及解决七军团几个主要干部间某些无原则的纠纷，特别是关于叛徒曾洪易对先遣部队不负责，及毫无作战决心的机会主义动摇的倾向，加以彻底揭发，同样的指出了军团首长对于中央及军委命令的执行表现不重视之态度与失去自己战斗信心之表现，是极端错误的。越数日，中央及军委责成闽浙赣省委负责人、红十军团之领导者、中共的优秀干部、民族英雄方志敏同志组织更强有力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并具体布置捍卫闽浙赣苏区之工作。经闽浙赣省委几个负责者及先遣队几个主要干部会商后，除布置闽浙赣边党政军及群众工作外，当时对于各方面主要干部的配备是：闽浙赣省委主要负责者曾洪易、组织部长关英同志、青年兼宣传部长胡仰山、先遣队军团长刘畴西、政治委员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原七军团改为十九师，十军团改为廿及廿一师[②]，十九师师长寻淮洲，政治委员兼主任聂洪钧、参谋长王如痴；廿师师长、政治委员则由军团长、政治委员兼任；廿一师师长胡天桃。各级干部配备就绪，闽浙赣苏区反抗敌人五次围剿的计划布置完毕后，十九师仍为先遣队，军团政治部亦随十九师行动。经怀玉山及德兴县之东北，深夜兼程的袭击了常山县，但因敌情变动，经芳村而到达白马，当日所得的情报，蒋志英率浙保两团业已尾追，于是遂决意给其严厉的打击。由于十九师英勇善战，蒋志英败退回常山，我先头部队尾追至芳村，蒋志英手部受伤，是役缴获颇多。于是经上坊，渡过新安江向分水县前进，距分水县城约四十里之处，与补充王旅[③]遭遇，经先遣队猛烈的冲击后，将敌全部击溃。但因敌情与任务的关系进至河村，距徽州府仅十里处通过，该城当时只有驻兵一连，沿途群众纷纷请求先遣队打徽州，但因部队过于疲劳，且预计敌人增援部队可能赶上，于是经绩溪县附近一举而攻占旌德县，缴获军用品及西药颇多。翌日，经大坟与泾县宣城之间威胁芜湖，后得军委及军团首长的命令，要十九师（即红七军团）回师黄山附近与主力汇合。于是经青弋江、章家渡、茂林、铜岭、太平县附近，在新村[④]与主力汇合，并经中央批准以方志敏、乐少华、刘畴西、涂振农[⑤]、刘英5同志组织政治委员会，以方志敏同志为书记。该会职权是闽浙赣皖及先遣队行动区域中党政军最高的领导机关，另方面重新配备了团以上的干部。一切问题布置就绪后，经黄山到达古竹溪，翌日经汤口、黄山脚抵谭家桥宿营。是日所得的情报：南京政府为防范与拦阻北上抗日先遣队去路，以及所谓藉以“避免国际纠纷和听闻起见”，派遣了五个正式师、两个独立旅，另浙皖保安团四个团，采取“煮豆燃豆萁，自残同种”，以及所谓“[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匪”的政策，企图一举而扑灭“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者与组织者——

① 据考证：此处叙述的行军路线与史实有误。
② 据考证：红十军团创建之初无二十一师。
③ 据查证：王旅即补充第一旅王耀武部，下同。
④ 应为汤口。
⑤ 应为聂洪钧。

中国人民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当时对方的布置：两师另一旅和两个团沿京[宁]芜铁道向徽州前进；一个师及补充王旅则经南陵、泾县、太平，沿汽车路向黄山前进；另两师两团则经青阳、石埭向祁门、黟县前进。当时政委会讨论的结果，认为左右两翼之敌则以皖南独立师[①]及游击队迷路与牵制它，主力突破敌人中央纵队，同时左右两翼之敌靠得很拢，中央纵队之主力在八时内不能赶上前卫队补充王旅。且补充旅经我军于分水县附近击溃后，不仅士气很坏，部队的劳疲现象亦很普遍；另方面，在分水县附近作战时，只我十九师与之对抗，尚能击其溃不成军，以此我们以三师之众来攻疲倦溃败的独立旅，不但在兵力上占着绝对的优势，且地形、群众条件及士气亦利于我军作战，若中央纵队被我突破，则结集主力配合皖南地方武装及独立师打击与消灭敌人之右纵队。翌晨一时半出发，距谭家桥十里之处布置埋伏侧击战斗，当时我军部署的布置大略如下：

随军教导团附地雷挨丝炮[②]队，在正西沿马路两旁布置适当的地雷与挨丝炮，如未发现我主力埋伏于两旁，直待敌人进入火网内，才采取一致的动作给敌人极大的杀伤；否则需待主力打响后，才从正面动作。十九师埋伏于左侧翼的第一线，主要的任务是：正面或廿师或廿一师打响后，十九师应以全力截断敌人的归路；另方面如敌向太平县溃退时，十九师应以主力尾追该敌。廿师、廿一师则集结于十九师的右翼。他的任务是：如敌人向正面前进而未发现我主力时，直到我正面部队接触与沿马路之地雷挨丝炮爆发后，二十师、廿一师即同时出击消灭敌人于黄山脚附近。当我部队布置完毕后，约上午十时光景，敌之先头部队向两边用威力搜索前进，余则行进间停止休息。此时我高级指挥员已饬各部待敌行进时才开始动作，不料部队走火三枪，引起敌人注意，于是敌人立即集结部队并加派部队占领沿马路的阵地。此时我廿师及廿一师不听军团号令，加之出击动作不一致，结果十九师只用兵力一个连，廿师及廿一师由于野战经验太差，动作又不一致，而影响整个的战局，这一十分有把握消灭补充王旅的战斗，竟形成对峙的战局。特别是在此次战争中，极大部分的主要干部负伤与阵亡，如十九师师长寻淮洲同志（即前七军团军团长）负伤，但伤过重，经数日后光荣的牺牲了。政治部主任刘英同志亦负重伤，乐同志因愤主要干部负伤过多，竟带保卫队一排人向敌反攻而胸负伤。廿一师政委负伤、师长阵亡[③]，军团保卫局长周群同志亦于分水之役负伤截去右脚。正因为如此，到谭家桥战斗后，全军党政军的工作处于停顿的状态，以致作战的意志大为削弱，特别是刘畴西同志作战决心不果断，军事行动迟慢，致引起极大多数红色指战员的非常不满，甚至有痛哭军团长不愿作战的表现和议论。兹将此次战斗为何不能争取胜利及其主要原因特作如下的概括：

1. 轻敌的观念：当时在部队中是普遍的现象，认为补充王旅是不经一击的部队，不是我们的敌手，以致骄傲自满和轻敌，这是兵法上说的“骄兵必败”的教训。

---

① 应为皖赣独立师，下同。
② 挨丝炮即土地雷。
③ 即八七团团长黄英特。

2. 动作不一致，尤其是不服从军团号令致遭敌各个击破，这证明服从命令听指挥是革命军队战胜敌人的主要条件之一，否则不但不能战胜敌人，而且会吃亏以至于自我灭亡。

3. 当敌人业已占领主要阵地，且我主力已退出战斗，凭着几个干部一时的热情反突击，这不但不能解决战斗，同时使自身[遭受]损失是不应该的。当时先遣队几个主要干部的负伤与阵亡，大部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所遭受的损失。

4. 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这在红军政治工作条例里业已指出了它的重要性。但先遣队自谭家桥战斗后，虽然当时军团政治部有聂洪钧同志代理主任，涂振农同志为副主任，然而当时对部队中的政治文化教育几乎处于停顿的状态，特别是没有抓紧[总结]谭家桥战斗的经验与教训，在部队中进行充分的解释说服工作和动员工作，致使先遣队自谭家桥战斗后，士气一天天的低落，这将成为历史上的教训。

5. 当时对于廿师与廿一师战斗力的估计是有不够的地方，特别是红十军野战经验的差，经不起敌人的反冲锋和持久的战斗（因为红十军过去都在苏区内作战，对于使用地雷挨丝炮是有它独特的经验的，但野战经验却很差），但在谭家桥战斗中，军团首长认为廿师廿一师比十九师战斗力强的估计是不合乎事实的。十九师不仅在中央苏区有长期的野战的经验，而且它经过了北上抗日的长期锻炼，它那种英勇斗争的牺牲精神与刻苦耐劳的作风，不但值得学习而且应该发扬。

谭家桥战斗后，经陶村附近，翌日与敌人一团人遭遇，本可一举而消灭其全部，由于军团长刘畴西同志加油式的用兵（先用一营，打不过再用一营），结果，不但未能将敌人迅速的消灭，反而遭受到诸多不应有的损失，以致影响战士们的不满和士气的降低。此时引起了许多负伤的干部从担架上跳下来，要求率领战士们一同奋勇杀敌之举动。但由于主要负责者没有作战的决心，终于自动退出战斗。当晚商讨中央及军委的命令和指示。当时中央及军委给先遣队的命令和指示是：

A. 先遣队应立刻克服和纠正没有作战决心和斗志的倾向，特别是要从党的工作与政治教育上去着手，否则中央和军委给予先遣队的任务是无法完成的。

B. 先遣队应派一个得力师，酌量的派遣工作人员与适当的配备干部到达浙江长期行动，号召与组织广大的人民一致进入抗日阵线，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发动广大的民众，改善民生，巩固与扩大自己的部队，一直到创立革命的根据地，同时应与中央军委及政委会保持密切的联络。

C. 除充实皖南独立师外，应留两团以上兵力依靠皖南党与群众的力量，坚持该地的斗争与不断的号召和团结一切反日反帝的力量在自己的周围，作继续不断的坚持斗争。

D. 其余的部队回闽浙赣原来的基本地区整顿休息，提高部队中[的]战斗情绪与加强部队中党与政治工作，坚决而又顽强的保卫革命根据地。

E. 中央及军委责成政委会在部队中开展由上而下的[反对]不愿在白区行动与缺乏作战

意志的斗争，提高全体指战员胜利的信心与发扬应有的自我批评。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从党的工作与政治教育上着手，使先遣队迅速的克服和纠正今天存在着的不良现象与倾向，而特别[要在]政治上、组织上、行动上与战斗中来表明自己是先进的、有组织的、守纪律的抗日反帝与土地革命斗争的模范者、号召者与组织者。

当时接到中央与军委指示后，讨论时有两个争论：甲、大部分同志主张立即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分头出动，粟、刘到浙行动；方志敏同志等回闽浙赣基本地区；乐少华、刘畴西等同志率一师留皖南行动，其余部队随方同志回基本地区。乙、少数同志主张暂不分开，统回闽浙赣基本地区，将部队整理、训练与重新配备干部后，再行分开。由于军团首长坚持后一意见，结果抛弃了第一方案，同意了第二个意见，这是不该的。

翌日 2 时出发后，计划昼夜兼程的进至化、婺、德苏区（即开化、婺源、德兴之间的一块苏区）。但由于军团首长认为敌人追赶不上，应以两天行程到达目的地，结果未按照原来计划，而直到上午 10 时左右才开始出发。当日我先头部队已进至化、婺、德苏区（方志敏、乐少华、刘英、粟裕等主要干部随先头部队行动），但刘畴西、王如痴等同志竟迟至翌日午后才到。此时我先头部队除派人与之联络外，并由方志敏同志以政委会负责人的名义，通知刘畴西等同志本日必须通过乐、常封锁线（即乐平、常山），至午后三时我先头部队将要通过封锁线时，接刘畴西同志来信，略谓“部队疲倦，本日不能继续前进”。此时方同志接到刘畴西同志来信后，即召集了几个主要干部会商，认为敌人的主力很可能追上，如今晚不进至基本地区，对今后任务的完成当遭到不少的损失；另方面，认为刘畴西同志那种“屎出不找茅厕”的作风，非派一得力干部前往，协助主力通过乐、常封锁线，必然会发生诸多的困难。于是，首先决定粟裕同志回去随刘畴西同志一起行动（因乐少华、刘英二同志此时伤势尚重，不能随军行动）。后因志敏同志坚持自己随主力行动，要粟裕同志率领先头部队进入基本地区，同时明晚可以汇合；另方面，方同志指示前卫部队，明晚配合地方武装掩护主力通过乐、常线。于是粟、刘、乐三同志随前卫部队行动，志敏同志回去随主力行动。翌晨，我先头部队全部到达基本地区。除通知志敏同志我们业已安全的到达目的地外，并根据其指示布置掩护工作，不料主力到达封锁线后，闻敌堡垒枪声，复又折回，且来电告诉我们，明日另走一封锁线通过，谁知数日未闻主力消息，于是除派遣大批当地干部通过封锁线去迎接主力外，并派遣游击部队分头出动，骚扰敌人。后据逃回来的同志告诉我们，他们（指主力）曾经接连的通过七次封锁线，始终由于决心的犹豫，竟全部折回。结果，化、婺、德的苏区日益缩小，粮食根本无法再找，有的饿了三天未食粒米，有的吃草根树叶，但战士们始终规劝高级首长，应不顾一切牺牲的冲过封锁线。但由于军团首长决心的不够和认敌封锁线是铜墙铁壁，竟宣布有本事的各带多少自找方向出动。可是由于时间的延长，不仅敌人主力全部赶到，且将皖浙赣之保安团队亦集中封锁线之周围，以致敌人使用包围战术，逐渐缩小基地，且见人就杀，见房子就烧，特别对粮食的烧毁更尽其能事。这样一来，将近万人的部队，围困于荒山僻野间，且又各自为政的毫无中心主张，试问将何以能战胜当时艰难

困苦的恶劣环境呢？

四、北上抗日先遣队遭受惨痛的损失及其所得的经验与教训

当先遣队进至化、婺、德苏区时，敌以十师之众围攻半月之久，除某些干部（如李素宾、李素园、王天龙、钱××等同志）坚决的率领部属，突破敌人重围，回到皖南（有的回到闽浙赣）配合独立师（当时皖南[赣]独立师师长匡龙海）和地方武装坚强的继续行动外，极大部分遭到惨痛的损失。当敌将要解围时，方志敏同志在广大民众拥护和爱戴之下依然无恙。不料方同志特务班长叛变，竟向敌告密而遭被捕。方同志被捕后受尽了一切非人道的拷打、辱骂与各种各色卑污无耻的欺骗和利诱，然而方同志本着“头可断而志不可屈”的精神，始终不屈不挠地坚持自己的立场，与痛骂民族败类不已。他以共产党员大无畏的精神，严正的打击了帝国主义的走卒和民族的败类。他在任何严厉监视与非人道的污辱中，始终站在民族英雄的立场之上，指示与告诉广大的人民，唯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华民族才不致灭亡，中国人民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与出路。他处在极端困难的囹圄中，对党的事业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始终念念不忘。他在牢狱里不断的指示闽浙赣的党及全体将士和广大的人民应如何坚持斗争，和继续不断的号召与组织全中国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同胞、军队、党派，以及各阶层先进人士一致的进入抗日民族阵线，挽救民族危机，争取主权与领土的完整。方同志虽遭不幸的屠杀与光荣的牺牲了，然其伟人的人格与不屈不挠的精神是永垂不朽的！方同志的损失不仅是我党的一大损失，也是中华民族的巨大损失。

为了检讨过去勉励将来，将先遣队遭受惨痛损失的主要原因，及其得到的经验与教训略述于下：

（一）坚决的执行上级的指示和决议是完成党与上级所给予我们的任务，顺利的进展与完成的主要前提。先遣队当时遭受空前的损失，就是由于对中央及军委的命令与指示的执行表示不坚决。假如当时能够坚决的执行中央及军委新的指示与命令，不但先遣队不致于在化婺德遭受空前未有的损失，而且定能胜利的完成中央及军委所给予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任务。这虽然已成历史的教训，但在今天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应该警惕我党全体同志以及一切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人们。

（二）上下团结一致与高级指挥员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奋斗中不失自己的斗争勇气，和富于英勇果断与迅速的下达决心，这是革命的队伍尤其是指挥员和负责者必须具备的条件。没有这个条件的具备，要战略[胜]艰险与胜利的完成党所给予我们的任务，是不可能的。当时先遣队的几个主要负责者，就缺乏深刻的认识与了解这个重要性的意义。正因为如此，先遣队几个主要干部每日遇事相商或召开会议始终得不到好的结果。当先遣队自瑞金出发直到闽浙赣苏区为止，从未开过一次圆满的会议，不是你争我吵，便是你走我溜，甚至闹成打架。另方面，关于行动的决定，特别是作战任务的决定，往往一致的通过与决定了，转瞬间又来一个不同意，

甚至有好几次打响了，后又下命令撤退。这不仅表示意见各殊，失去了自己的战斗意志，而且对士气的消磨与战斗力的削弱亦是极端有害的。正因为如此，以致失去许多有利的时机，和造成同志间互不信任与不团结现象。

（三）部队中党的工作与政治工作是军队的生命线，假如忽视了这一点，不仅无法巩固部队，加强部队中的战斗力，克服部队中一切不良现象和消除官兵间、军民间的隔阂现象，而且要完成上级所给与我们的任务同样是不可能的。先遣队自谭家桥战斗后由于几个主要干部的阵亡与带花，以致影响到部队中党与政治工作的停顿，结果士气一天天的削弱，部队中失败情绪因此而骤增。如果当时在化婺德被困时，有坚强的党的领导与顽强的政治教育，在坚强果断的指挥员领导之下，是能够战胜当时的困难环境与挽救当时的危局[的]，最低限度，亦可集结坚强指战员，集中力量不顾一切牺牲的冲开一条血路。[已有的]斗争经验教训我们，只要领导者不要失掉了自己的斗争勇气，再加上全军团结一致与党的领导正确以及政治工作的顽强，是可以战胜任何困难而转到胜利的方面。

（四）广泛而又深入的开展反不良倾向的思想斗争是保证党内团结与思想上一致的主要前提。先遣队在执行中央及军委命令与指示中，一再的表示犹豫和失去了自己的战斗意志，虽屡次接中央与军委的电令，责成中央代表，在部队中开展由上而下的对上级命令与指示不坚决执行的斗争。然而由于叛徒曾洪易自己就是一个对中央与军委命令与指示不坚决执行的典型人物，不但没有及时的开展这一斗争，甚至胡说："中央离我们太远，不了解实际情况。"如果当时先遣队有较老练而又坚强的党的干部，坚决的开展与发扬我党斗争中极有历史意义的反陈独秀为首的机会主义的"八七"会议之斗争精神与四中全会击溃了立三路线的斗争精神，我们坚信不仅能够及时的克服自高级首长起至部队中的一切不良倾向，而且中央与军委给与先遣队的军事任务，特别重要的是政治任务是可以完成的。

（五）干部的配备适当与否给了我们极大的教训。这就是说：如果部队中党政军的干部配备不适当（地方干部也不例外），不仅会造成干部间互不信任和不团结的现象，而目对于任务的完成也是不可能的。这些教训虽已成历史的产物，但应该警惕与勉励我们将来。

总观上述，吾人认为先遣队虽不幸的遭到惨痛损失，致使北上抗日的神圣任务未能全部如愿实现。然而他不仅在行动上、组织上、工作上、战斗中表明了自己的先进及其模范的领导作用；同时，它在中华民族的解放史上，业已写下了最光荣的一页。它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者与组织者，它是中华民族不会亡的模范战士与先锋部队，它战胜了许多艰难困苦与极端严重的环境，它指示与告诉了全中国不愿意做亡国奴的男女同胞、军队、党派以及各阶层的先进人物，唯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华民族才不会灭亡，四万万五千万人民才能从水深火热的压迫中解放出来。它不仅得到了全国爱国志士，军队党派，以及各阶层先进人士的拥护与同情，同时它得到了国际友人及爱好和平的先进人士一致的同情和赞许。我们应以无限的热情与诚恳的态度来痛悼北上抗日先遣队死难的烈士！我们应以不屈不挠与英勇奋斗的精

神，在民族解放的斗争中，踏着先烈的血路，勇往直前的奋斗不息。我们要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向着投降妥协、分裂倒退的现象搏斗。我们要在民族解放战争中，驱逐日寇于国土之东。我们相信只要全国上下一致的坚持抗战建国的国策，中华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定是属于中国的。

五、挺进师的成立与胜利的到达闽浙边

北上抗日先遣队主力于化、婺、德遭到惨痛的损失之后，当时所处的环境异常险恶，不但敌人集中全力，企图一举而扑灭我闽浙赣边区基地，而且叛徒曾洪易亦乘机活动。他主张放弃原来的基本地区，逃往闽北〈秘密〉；他以苏区粮食困难迫使战士回家，遭受痛心的屠杀；他以“共产党[员]应以身作则”的口号，强迫党的干部回到反动的家乡去送死；他以自卫队、游击队不会作战，且暴露目标的荒谬怪论解散成千成万的红军后备军；他在党内外散播先遣队遭受惨痛损失的失败情绪和所谓闽浙赣基本地区无法保卫的荒唐言论；他对中央及中央东南分局[①]的指示与决议，一贯的怀疑与不坚决的执行。他是一个退却逃跑、对革命没有信心、对上级的决议与指示一贯的不坚决执行的典型人物。他对于错误的接受，一贯的是采取口是心非两面派的态度。当时中央东南分局认为叛徒曾洪易已形成他自己的退却逃跑路线，责成政治委员会及闽浙赣省委开展反曾洪易为首的机会主义斗争，并撤消他原来的一切职务，另方面要叛徒曾洪易向党申明和真正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待乐少华、刘英、涂振农、粟裕等同志进至闽浙赣基本地区时，闽浙赣省委在叛徒曾洪易的把持之下，不但没有撤消叛徒曾洪易的职务和开展斗争，反而以先遣队遭受损失为名，向党反攻。洪易路线的健将××、×××[②]等，亦极力赞助叛徒曾洪易。此时因乐、刘两同志伤势尚重，粟同志需要顾及部队，于是要涂××同志代表政委的意见去说服省委以及其他干部，坚决的执行中央分局的指示，开展反曾洪易为首的机会主义斗争。不料涂同志此行不但无效，反遭曾洪易、××[③]等责骂不已。翌日，乐、刘、涂、粟诸同志到达省委所在地，并派人找关英同志回来（因当时关英同志出外巡视工作去了）；另方面分别的说服了赵、胡等同志；于是接连的与叛徒曾洪易等作了三昼夜的思想斗争，并改组省委与重新配备干部。另方面要叛徒曾洪易在实际工作中去了解和认识自己错误的实质及其严重性，同时认真的克服和纠正自己的错误。接着得中央东南分局的指示电，要闽浙赣省委组织挺进师到达浙江长期行动。

兹将挺进师的成立及其胜利的到达闽浙边分述于下：

（一）挺进师出动时所处的环境及党的基本方针

挺进师的出动，是 1935 年 2 月 27 日在上饶县属之灵山附近。当时所处的环境，正是国民

① 应为中央分局，下同。
② ××、×××编者所改。
③ ××编者所改。

党及其国民政府和军队在蒋介石及其首席顾问赛克特堡垒政策之下，继续以堡垒线来更小分割东南各省苏区，建筑马路，便利运输，在封锁圈内扼要构筑据点，阻我转移，同时分兵以连营，其时以团为单位，进行分段的分进合击，施用奇击[袭]跟追，并组织反动的地主富农叛徒等为其“清剿”耳目。

当时党的基本方针是领导广大群众武装及独立营游击队，在自己活动的区域内，不断的进行顽强的斗争，来粉碎国民党国民政府的“清剿”计划及其堡垒政策，准备适时大举反攻，彻底地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

此时我主力部队已进到川黔边，转入反攻形势，准备建立川黔边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虽然我主力部队——野战军——沿途得到许多的伟大胜利，但国民党国民政府对东南各省苏区边区的进攻，不但没有放松，而且更加加紧的企图根本消灭东南各省的苏区和红军。以上是当时挺进师出动时所处的环境及党的基本方针。

（二）中央分局给挺进师出动的任务

中央分局根据中央政治局 1935 年 1 月 15 日的指示电，责成闽浙赣省委立即组织挺进师到达浙江长期行动。当时正是北上抗日先遣队在开化、婺源、德兴遭受到极大的损失，方志敏、王如痴、刘畴西诸同志已被捕，反曾洪易路线的斗争正在开展着。当时中央分局给挺进师的主要任务是，经过闽北到达浙江，长期行动，发动广泛的游击战争，扩大党与苏维埃的政治影响，发动群众斗争，直到分配土地，创立苏维埃新的根据地，以及建立党的组织，配合友军行动，调动和吸引起大批的敌人，保卫闽浙赣基本地区及邻近游击区域，并打通闽东、闽北的关系，取得工作上、行动上有力的配合，响应主力部队的行动，彻底粉碎敌人“清剿”计划与五次“围剿”。

（三）挺进师到浙江行动的实力及其干部的配备

闽浙赣省委接到分局指示电后，便组织了挺进师，以粟裕同志为师长，刘英同志为政治委员，黄富武同志为政治部主任，宗孟平同志为组织科长兼地方工作科长，王维信同志为宣传科长，姚阿宝同志为特派员，王永瑞为参谋长，刘达云为供给部长，谢文清为没收委员会主任。当时挺进师的人数五百三十八人，长枪四百四十五条，重机关枪四挺，轻机关枪八挺。这些部队的组成是七军团的一部分，十军团的一部分，独立师的一部分，但因组成时间太短，加之部队中当时党内外的动员工作做得不够，部队出动时，潜逃回独立师者近百名，于是将多余的枪支留落闽浙赣。到达闽北时与先遣队前留江浦一带行动之二个连汇合，该部人数一百五十名，长枪八十二条，轻机枪二挺。这样一来，此数略可抵潜逃数目。

当我们进到闽北时，原闽北军分区司令员李德胜叛变了，电台业已失去了，这样一来，与闽浙赣[省委]及分局今后的交通联络颇成问题。为了加强挺进师的领导，以作长期行动与便利指挥与工作起见，便组织了政治委员会，是挺进师行动区域内最高的党政军领导机关，以粟裕、富武、孟平、刘英、姚阿宝、王维信、洪家云、刘达云、方志富等九人组织之，以刘英同志为书记。部队组织也有如下的变动：

1. 将政治部工作人员、宣传员、保卫局工作人员、供给部人员、工作团等编为政治连，但各个组织的领导系统及组织的独立性，仍然保持着。为使得生活、领导之集中和减少杂务人员，增加自卫力量，养成政治工作人员军事化。

2. 将原有之部队，按其战斗力之强弱及各个作风的不同，编成三个支队，并进一步的配备干部，各个支队设立行动委员会。这样一来，在任何环境中均可分散集中，且行动轻便，作战便利，领导加强，工作效率增加。

（四）挺进师胜利的到达浙江

挺进师于闽浙赣基本地区出动时，正是敌人加紧封锁与积极进攻的时候，然而挺进师全体将士在党的正确领导之下，万众一心，团结一致，英勇果断，敏捷迅速地仅以八小时深夜兼程的通过了敌人六道封锁线，与胜利的渡过信江，翌日进至闽北苏区之基地。

挺进师进到闽北苏区后，除加紧部队中党政军的教育外，并配合闽北红军，给敌人“清剿”部队以数次严厉的打击。为了挺进师与闽北的党和红军取得工作上、行动上更有力的配合，当时与闽北几个主要干部（如曾绍[昭]铭等）会商了今后彼此间的联系与配合，以及提供了对保卫闽北苏区之意见。

挺进师全体指战员本着英勇牺牲、艰苦奋斗、团结一致的精神，遂于 1935 年 3 月 23 日从闽北基地出动，胜利的到达龙泉以西地带，并争取了第一次战斗的胜利，和得到了许多情报与敌人部署的布置[情况]。兹将敌我的计划，分别的简述如下：

甲、对方的计划

A. 军事方面：

（1）以浙保的两个团及龙泉的独立营，龙泉、遂昌、江山之保安大队配置于龙泉、浦城、遂昌之线，以防我军深入内地。

（2）如粟、刘部队进至龙泉、庆元、浦城之线，除原该地部队极力“堵剿”外，并配合松、政、建、浦之部队及浙保进攻闽东之部队两个团，协同合击而歼灭之。

（3）浙江素为太平丰裕之区，绝不许粟、刘部队深入内地“骚扰人心”“破坏秩序”影响整个“清剿”计划。

（4）派蒋志英驻守龙泉，为该区保安司令，若粟、刘部队进至浙边时，在该地区之部队，均归蒋率领“进剿”。

B. 政治方面：

（1）限三月底完成保甲计划，清查户口，特别要防止“匪犯”混入。

（2）利用豪绅地主、富农、流氓分子到处造谣，说红军已消灭干净，并将方志敏、刘畴西、王如痴等同志的像遍贴各地，以表示“剿匪”的胜利。

（3）利用叛徒李德胜大发宣言、传单、标语，说国军如何的“好”，如何的“优待”，当红军如何的“苦”，如何的没有“出路”。

(4)严令各区、乡、镇长、保甲长，对群众进行武断威胁的反宣传，不论任[何]人帮助红军带路者杀，报告给红军消息者杀，分了富户的东西者，除将原物交还外，应受严刑，藏“匪”住“匪”者杀，知“匪”不报以通“匪”论罪等。

乙、我们的对策和计划

我们在闽北出动时，业已与闽北的党开了一个联席会议，除会议中对闽北工作提出意见外，并商讨了今后通讯及工作配合地区之打通和建议闽北分区委应从[速]的组织游击队，挺到顺昌、将乐、光泽之线及松(溪)、政(和)、建(浦)等处，形成有依靠的闽东、闽北、浙西南三角形的发展形势。当挺进师进到浙边时，根据各方计划及闽东与中央失去联络，有将最近中央之各种决议，及策略路线的转变和指示等转给闽东之必要。另外方面则感觉闽东、闽北在数年斗争中，还未取得联络，于是决在庆元、政和、松溪、寿宁、屏石间活动一个时期，首先将闽东、闽北之联系来一个迅速打通和配合友军行动，使浙江当局的计划归于失败，同时相继与闽东的党商讨今后的配合与联系等。此外定出了如下的给各支队分散工作的任务。

A. 政治任务

(1)在短期内将自己行动区域内之反动势力及反动分子与地主武装、土匪民团、基干队等迅速解决与肃清。但须注意策略的运用与阶级路线及群众路线之执行。

(2)运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方式广泛的扩大党与苏维埃和红军的政治影响，不断的揭破一切反革命派别之各种各[样]的武断欺骗的宣传，尤其是要在自己的行动上、组织上表现自己是先进的军队。在一周内要做到自己区域内的群众不会逃跑，且处处表现同情我们，拥护我们，帮助我们。

(3)彻底的将豪绅地主及反动派的财产分发给广大的工农群众，并积极的领导灾民斗争。

(4)在斗争中物色先进的工农分子团聚于党的周围，普遍的建立各种革命的组织(如工会、农会、红军之友、交通网、侦察网、互济会、抗捐、抗税斗争委员会、灾民斗争委员会、粮食斗争委员会等等)，尤其是要迅速的恢复与建立各地党团的组织，但在整个工作的进行中，务须根据各该地的实际情形定出具体的实际计划。

(5)在党彻底分配土地的口号基础上，必须防止借口条件未熟的土地斗争中的尾巴主义；另方面，对整个形势估计不足的“左”的盲动行为亦是值得严格注意的。

(6)在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中，应注意分出和组织新的游击队与游击小组，配合与领导各该地区的斗争，创造新的游击区。

(7)扩大与巩固部队的工作，是我们目前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之一。因此除加强各支队党的领导、政治教育、文化娱乐工作、卫生清洁运动以及改善管理教育外，在两月内，每个支队应扩充到充实的营，但需讨论具体的执行方案及方式方法等。另方面造成广大群众自动参加红军的热情运动，尤其是要号召每个党员及战士们为巩固与扩大自己的部队而斗争。要达到这一目的，首先应进行充分的宣传解释与教育工作和定出竞赛的计划。

(8)瓦解敌军的工作，是我们工作中最薄弱的一环，除由上而下的建立真正的系统外，必须讨论与布置具体的执行方针和选择大批的人才，给以相当的教育，要将这一工作列入我们议事程序上的第一位，并造成广大群众的热烈运动。

(9)教育干部、培养干部、提拔和引进大批干部是一个很迫切很重要的任务，尤其是在目前这种艰苦斗争环境中，创造大批有独立能力、灵敏活泼、忠实于苏维埃事业的干部，更是迫切的需要，同时只有这样才能适应目前斗争之需要。

(10)关于部队的本身教育，必须无间断的进行，而且更需要抓紧部队中许多实际材料，利用事实对照与正确的批判来教育自己的部队。列宁同志告诉我们:“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这是如何深刻的警惕[示]我们。

(11)要保证红军中思想、行动的绝对一致和任务的顺利完成，必须与一切不良倾向、舆论、表现和行为作不调和的斗争……

B. 军事任务

(1)在一周内要将自己行动区域内之大小道路逐一调查清楚，并绘成路线图。

(2)在自己行动区域内及其周围和附近，尤其交通要道、市镇码头等处应建立普遍而又顺畅的交通网与谍报网。

(3)在敌人进攻友军及自己时，必须积极的毫不犹豫的转到敌人的侧翼后方，与敌感觉最痛痒的地区上去行动，绝不能困守一地，待敌进攻。

(4)彻底的破坏敌人的交通联络及其工具，但首先要有充分的准备与侦察。

(5)积极的袭击敌人的仓库、兵站、后方和市镇，并收集必要的辎重与器材，在无法搬运时，尽量分散给群众外，应彻底的加以破坏或烧毁。

(6)利用行军空隙，抓紧实际问题去教育自己的部队和教育地方武装，尤其是每一次战争和行动以后，必须来一个检讨，作为本身教育的良材，和加以实际的演习。

(五)当时所获的成绩、经验与教训

1. 挺进师在党的正确领导之下，坚决的执行了中央分局的指示，它在这短短一个半月行动中，开展了六七县的游击战争，粉碎了敌人预先布防备有计划的“堵剿”和分进合击的企图，尤其斋郎战斗，击溃了浙保主力第一团李秀部和闽保第二团马洪琛部，使闽浙边之敌，由进攻转到防守；另方面，发动了行动地区的广大工农群众，分发了豪绅地主之财产，建立了各种革命团体和某些地区党的基础，尤其是在组织上、行动上表现了自己是先进的军队和艰苦卓绝的为党的事业和为民族解放事业奋斗的战士。

2. 由于党的领导正确和全体指战员的团结一致，以及艰苦的工作精神，奠定了挺进师在浙长期行动与打通闽东、闽北联系的良好基础；扩大了党与苏维埃及红军的政治影响；不断的揭发了敌人各种各[样]的武断欺骗与造谣中伤，使广大的工农群众在为自己的利益斗争中，更加认识了与了解了谁是敌、友，和怎样争取真正的自由与解放的正确途径。

3. 在实际行动中、斗争中，以我们的胜利给机会主义者叛徒们以有力的打击和铁一般事实的回答，尤其是更加证实了中央及中央分局派遣部队深入敌人深远后方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从艰苦的持久战争中，创造新的游击区域与新的根据地的指示是十分正确的。

曾洪易为首的机会主义者以[受到了]严盛[重]的打击。在此更加证实了，在党正确领导之下，只要党内外团结一致，坚决果敢机断专行及时克服一切困难和阻碍，以及胆大心细艰苦卓绝的去行动，在任何地区，都能开展新的游击基地以及革命的根据地。任何犹豫动摇对白区行动全无胜利信心，或认为某地区没有工作基础，满脑子都是困难，以及悲观失望的情绪，都是丧失自己的坚强斗争意志，违背党的正确指示，等于自我死亡，或徘徊歧路之不应有的行动。

4. 正因为挺进师到达浙闽边后，采取积极勇敢的行动与具备了艰苦奋斗的精神，给了进攻闽东、闽北之敌极大的威胁与打击，结果敌人不得不从进攻闽北红军中抽调两团以上的兵力，另从进攻闽东苏区之敌全部（三个团）调来对付挺进师，这不仅对敌人“清剿”计划给以有力的粉碎，而且直接的保卫了邻近苏区和给广大群众以极大的兴奋。

5. 在当时极端艰苦与困难的斗争环境中，自动的成立了政治委员会，不仅对挺进师的领导加强了，而且对整个工作的进行和布置以及策略路线的运用等均得到不少的成绩和转变。正因为浙闽边的党有了这样的总的领导机关，所以不仅保证了挺进师在闽浙边长期的行动，而且基本上完成了中央东南分局所给予挺进师的任务。

6. 由于挺进师过惯了大兵团的生活，初到闽浙边分散工作和行动时，干部忙于找宿营地，调查路线和询问敌情，结果对本身教育未能很好的顾及，以至预定的本身教育计划未能完成。

7. 对居民工作的进行，因挺进师的同志大部分习惯于大兵团工作的方式方法，结果以连排分散行动时缺乏群众工作经验，另方面还没有发动全体指战员自动的参加群众工作。

8. 对保甲长、大刀会等策略的决定是正确的，但上下层在实际的运用与执行中，犯了一种仇视和把个别当成整个的一律看待的错误观点，而不知从政治上去瓦解与争取乡保甲长与大刀会等，结果收效很差。

9. 正因为挺进师已[以]往过惯了大兵团的生活，结果单独行动的经验与信心很差，如分出工作不到几天又跑回来，说这样没有经验，那样没有把握，极象小孩子离了母亲一样，但在各个干部耐烦细心的说服教育之下，很快的将此种弱点克服了。

10. 正确开展思想斗争是保证上级所给予我们的任务顺利完成的主要因素，是团结干部与保证全党同志思想和行动绝对一致的主要武器……

11. 当时针对着敌人“分进合击”之战略与战术，我们是采取“分散争取群众”“集中应付敌人”与“分途出动，深入敌人后方侧翼与交通要道和声东击西”对付之。结果，使敌无所捉摸，收效很大，尤其斋郎战斗，四面业已迫近敌人，且环境异常恶劣，当时决心的“集中一切力量，突破敌人一点，乘胜消灭敌人”，结果将尾追拦阻号称最顽强之敌浙保一团及反动大刀会千余全部击溃，缴获颇多。由于这次战斗的胜利，使整个敌人由攻势转到防御，政治影响与斗争局

面亦大大的扩大和转变了。因此我们深深感觉到：只要全体将士在党的正确领导之下，能够坚强的团结与进行充分的战斗动员，选择有利时机，胆大心细的灵活运用战略和战术，最后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12. 在实际斗争中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教训：在环境越紧张、越恶劣的时候，加强部队中党的领导，改善支部生活，以突击的精神去进行部队中的政治教育和文化娱乐工作，以及动员各级干部深入下层，面向支部是非常重要的。

六、挺进师在浙行动第二阶段中的情形及其所得经验与教训（1935 年 5 月 10 日起至 9 月 2 日止）

（一）当时所处的环境及我们的布置

斋郎战斗胜利后，龙泉河以南之敌大部由攻势转到守势，群众斗争亦大大的发动起来了，瓯江流域及浙赣铁路以南之敌，还是异常薄弱。为了开拓宽广的游击区域、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创造新的革命根据地，当时政治委员会决定将主力北进，二纵队回龙、浦、江、遂数县，恢复原来基地，当时给各纵队的任务如下：

1. 为了迅速的打通闽北闽东之联系和迅速的恢复二纵队活动地区之工作，派二纵队回江、浦、龙、衢、常等县间行动。为了加强该纵队的领导起见，派宗孟平同志为政委会随军代表，兼行动委员会书记。

2. 一纵队及政治部全体工作人员，散布于龙、云、松、遂等县间进行艰苦的群众工作，发动居民斗争，建立党和各种革命组织，以黄富武、刘达云、王永瑞三同志组织政委分会，并以黄富武同志为书记。

3. 其余各部由刘英率领进至汤溪、龙游、金华、武义、宣平、处州之线进行辗转不停的游击战争，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扩大党和苏维埃的政治影响，迫近杭[浙]平[赣]铁路，威胁杭州、金华、处州等中心城市，吸引敌人主力北调，使我一、二两纵队顺利的恢复开展与进行浙西南各地区之工作。

（二）敌人进攻的兵力和企图

当我们计划就绪、干部配备完毕时，浙保六个团，另十一个保安大队，南京税警团一团则企图包围我军于龙泉、遂昌间大龙山之遥[姚]岭，并将所有各大小道路破坏和堵塞及架设了电话线，在群众中大造谣言说：粟、刘已被包围得水泄不通，不日当可全部消灭，并设立了浙南“剿匪”指挥部，宣铁吾为总指挥，俞济时副之。

（三）当时我们的决定与部署的布置如下：

1. 以第一支队为南路军，由黄富武、刘达云、王永瑞诸同志率领，由原地（遥岭）出发往十三坞向西北行动，转到龙泉、遂昌、江山、衢州一带行动，主要任务详政委会决议。

2. 三、四支队和直属队为北路军，由粟、刘亲自率领，经城会徒涉拟向裹方、五峰前进，到

达裘方附近，发觉敌军，乃撤回到苞萝山，经苞萝寮、五峒、大风潭、梭溪、桥松下到达广[塘]岭头宿营，这样一来我北路军与敌背对背行进，沿途捉获敌税警团之伙夫及工作人员数十名，行李军用品甚多；另方面对敌人整个布置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翌日乘敌后方空虚之际，则深夜兼程的袭击了汤溪县城。

3. 由于我们行动的秘密和迅速，当我们袭击汤溪县城时，敌人还在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围攻大龙山，并且打得异常激烈。据云，双方死伤百余名（敌人自己鬼打鬼）。我北路军则在北线积极行动约十天光景，由于北线威胁太大，敌人则将全部力量调来北线，西南各县只留一个连。此时我一、二支队及工作团，在一个月工作中，即将浙西南十几县的群众发动起来了，并建立了许多革命的组织，在某些地区建立了党团的组织。一个月行动计划完成后，各部汇合于龙泉北部之小吉[①]，召集了政治委员会。会议的主要内容是结束一个月的行动和计划今后的工作；另方面，因部队扩大了，重新编制部队和配备干部，兹将详情分陈于下：

A. 四支队扩充为四纵队，率十支队及十一支队渡龙泉河南下，到达庆元、龙泉以南，云和、寿宁、政和、泰顺之东北[地区]行动，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建立各种革命组织及党团组织；另方面，与闽东的党取得密切的联系，必要时可举行联席会议，商讨今后工作的配合和部队的行动，以及工作地区之划分等。此外坚决的根据政治委员会所给予四纵队的任务，持久而又在艰苦的根据各该地的实际情形布置具体工作，并与友军（闽东闽北之部队）取得密切的联系和配合。这样一来，使工作上、行动上形成了三角形的、有依靠的猛烈发展和一致，为了加强四纵队的领导起见，政委会派黄富武同志为随军代表兼政委会书记。

B. 二纵队仍在江山、常山、衢州、浦城、龙泉、遂昌之线行动，仍以孟平同志为随军代表兼行动委员会书记。

C. 一纵队则随浙东之交通到达永康、缙云、青田、处州、仙居、东阳及永嘉北部一带行动，配合浙东游击队，并取得行动上、工作上绝对的一致，在可能条件下则与浙东的党召开联席会议，讨论整个工作的布置，并以许信焜、王永瑞、范连辉、王屠[②]、刘达云五人组织行动委员会，以刘为书记，许副之，若条件成熟，一纵队则在该地长期行动，但须保持与政委会及军分区之密切联系。

D. 为了领导便利和迅速布置各地区工作，政治委员会及军分区留云和、龙泉以北，处州、宣平、松阳、遂昌、衢州以南[地区]行动。

E. 为了加强地方居民工作及党的工作与统一指挥起见，决即成立浙西南特委，以宗孟平、欧阳道、杨干凡、方志富、李金良、连明永、李宗州、王平、陈庚棠等组织之，并以孟平同志为书记。

（四）“八一”动员和收获

① 小吉属松阳县境。
② 王屠系王屏之误。

1. 军事方面的计划：一纵队袭击处州，并根据浙东的实际情形，相继袭击其他城市；二纵队袭击衢州，迫近浙赣铁路及江浦公路，破坏各该要道及其电话和交通工具；三纵队则袭击遂昌、汤溪，并接近铁道附近，形成与四纵队东西相呼应[态势]；四纵队袭击云和、景宁县城；五纵队袭击龙泉、松阳，并破坏龙、云公路及电话线。

2. 政治方面：除进行党内外及群众中广泛而又深入的宣传鼓动和解释工作外，各级党必须根据各该地区的实际情形与政治部“八一”动员计划作出详细周密的计划，并责成政治部印发五万份标语、传单散发到各地区去。此外，派遣政治部之工作人员协同特委工作人员分别到各个地区去进行突击工作与扩红运动。

各地区各部队上面计划执行的情形是：一纵队袭击了仙居之秦章；二纵队占领了八都镇、王村口，并袭击了遂昌、汤溪，迫近了浙赣铁路；四纵队袭击了龙泉、八都镇，占领住溪及王村口；五纵队占领龙泉县，并破坏了龙泉公路。总结起来，在“八一”示威的前后，缴获长短枪百余支，轻机枪二挺，地方工作发展到纵横将近二百里，扩大新战士四百余名；龙（泉）、浦、松、遂、龙（游）、宣等公路及电话线均已破坏，筹得现款数万元；在基本地区建立了赤色游击队，繁殖了游击部队及游击小组，同时群众自动的组织了不少的自己武装，公开的进行了分粮分青苗的斗争。各种革命的组织业已普遍的建立，住溪、王村口、官塘、枫坪、谷陈一带已建立了临时的革命委员会和进行了查田运动，以便分配青苗。

正因为“八一”前后的行动积极与工作获得了不少成绩，特别群众斗争业已发动了数百里之宽，每天群众结队的分粮斗争像潮水般蓬勃起来，使进攻挺进师之敌异常动摇，因而由攻势转到守势。在得悉对方调十八军及新三师、五十二师等部队进攻浙西南的游击基地和红军时，此时我们的计划如下：

A. 一、三、四纵队仍回原地活动，并且要互相取得行动上工作上的配合，尤其在敌人进攻中，要依靠各该地的党和群众的力量及游击基地进行持久而又艰苦的游击战争。运用灵活的游击战术，辗转不停的在敌人后方翼侧及交通要道上积极的行动起来，牵制敌人，吸引敌人，创造新的游击区域，配合原来基地的群众武装力量，粉碎敌人的进攻，并需与各邻近的党和友军取得密切的联系。

B. 二纵队及广浦独立营则派一个支队，由李重才同志率领挺到衢州及江山一带行动，在敌人后方翼侧和交通要道上，积极的行动起来，彻底破坏敌人进攻要道及交通工具和积极的牵制敌人。六支队则配备于龙泉、庆元、浦城间积极行动，还须在敌新三师后方翼侧与交通要道上，辗转不停的开展游击战争，以资吸引敌人、调动敌人、疲惫敌人，配合邻近友军行动。广浦独立营则由洪家云同志负责指挥，在王村口、大龙山、官塘一带行动。

C. 挺进师直属部队和五纵队则在龙泉、遂昌间行动一个时间，配合广浦独立营及地方武装的行动，以便巡视和布置各地区的工作。

D. 为了领导与指挥便利起见，组成东西军，军分区则率十五支队，配合各县、区、乡之游

击部队在东线行动，统归司令员粟裕同志指挥；西方军则率六支队、独立营、警卫连和配合各县、区、乡之游击部队在西线上行动，则以李重才同志为司令员，洪家云同志为政委。

（五）在第二阶段中挺进师所得的成绩及其经验教训于下

1. 挺进师在第二个阶段行动中，在军事上运用了新的战略，同时创造了许多新的战术，如“打回马枪”“8字形”“6字形”“电光形”“长蛇形”“分进合宿”“奇袭夜袭”等。所以在三个半月的行动中，占领了浙江中部和东南部不下五十个市镇，特别在“八一”示威的前后，袭击了十九个县城，占领了龙泉、衢州等城市，巩固的占据了碧湖、住溪、王村口等中心市镇。正因为挺进师在第二阶段上能够适时的灵活的运用新的战术和战略，所以不仅开展了19[个]县的游击战争，而且给了进攻挺进师之敌以极大的打击，争取了许多的胜利，使浙保二团的团长贺越芳氏在给我们的信中，不得不承认“你们以四、五百之众，有赤化全浙之概，此种勇往前进的精神是值得我们称[钦]佩的”；《东南日报》论文中更是大声疾呼地这样尖锐的警惕统治阶级：“浙江素称平安之区，自粟、刘窜浙后，‘匪化’已波及全浙，以目下形势来论，浙江‘共匪’不亚于四川、江西之‘匪’，若当局未能迅速肃清，前途实堪可虑。”泰顺县政府秘书长暂代县长刘德闻氏给其留日同学信中，亦这样写着：“以数万之众，剿千百之匪，数月于兹，未奏肤功，好逸畏战之心，成为通病，所可告慰于阁下者，当局已采紧急处置耳。”由此可见当时的统治阶级是如何的恐慌与动摇。

2. 正因为挺进师艰苦积极的活跃于浙西南，所以广大群众的斗争如潮水般的汹涌。正因为如此，不但震动了浙江的反动统治阶级，而且引起了整个东南各省以至全国反动统治的仇注[视]，使蒋介石、黄绍竑不得不成立浙南“剿匪”指挥部，并将闽浙赣皖四省“剿匪”总部移驻江山，以及大量的增兵到浙，调遣了四十八军①罗卓英全部，另五十二师、南京税警团两个团、福建新三师及五十六师，浙保六个团、三个独立营、十五个保安大队，合计在九个师以上的兵力。在敌此种绝对优势兵力进攻中，虽然浙西南的党本身尚存在某些弱点，以至未能争取全部的胜利，同时在某些地区还遭到部分的损失，可是对邻近苏区的保卫与巩固是具有重大的意义的。

3. 在三个半月的斗争中，对扩红工作得到不少的成绩（比原来的数目增加了两倍），同时对新战士管理教育，在政治动员竞赛下，收效也属不少（利用老战士教新战士，运用政治力量去巩固新战士等）。

4. 发动了全体指战员参加群众工作（每人每天写五条标语，找十个群众谈话，相[继]的召集群众大会，以及进行革命的各种组织等）。

5.（略）

6. 对策略路线的运用，在执行上犯了某些不可忽视的错误。如将秘密工作转为公开，秘密的赤色农会公开的打土豪，对保甲长在某些地区认为都是反革命，而没有从持久的坚[艰]苦

① 四十八军系十八军之误。

工作中去瓦解与分化其内部，并积极地去争取其中的先进分子。

7. 对当地干部的创造与提拔，胆子是很大的，但尚缺乏有组织有计划的进行教育，甚至某些地区对新干部不信任，结果使军队中派出的干部，不能同地方上的干部打成一片，以致影响到工作的顺利进展与任务的完成。

8. 当时数百里[地区]的群众，业已发动，而且普遍的组织了游击队，可是对这些群众武装组织的教育，做得异常不够，结果在敌人进攻中，虽然表现了他们的英勇和顽强，但由于党在这些组织中领导的薄弱，所以缺乏坚持到底的信心。

9. 各级干部单独行动与独当一面的工作精神和斗争精神，还表现很差，如当敌人布置尚未就绪时，我们已将部队分散于各个基地，并给了他们具体的任务，可是部分的干部看见当时形势紧张，则又跑回基本地区，以致给敌人无阻碍的在短期内逼近了我们基本地区的周围。

七、挺进师在浙行动第三个阶段中的情形及其所得的经验与教训（自九月三号起至十月革命纪念日止，即自敌人第一次大举进攻浙西南游击基地和军区主力南下到达闽东苏区为止）[①]

（一）当时所处的环境与布置

在半月以前，我们就从报端上和关系方面得知敌人对浙西南游击基地和红军要举行大规模的残酷进攻，于是在龙泉县属之上田乡召集了政委会议，会议的中心内容是：

（A）结束一个月来党政军的工作。（B）根据当时形势，决定对付敌人进攻的对策。（C）重新配备干部与编制部队。（D）确定各个地区和部队的新任务。

当会议结束与布置完毕后，乘敌人尚未布置就绪之先，我们业已将部队分散于各个基地，配备了各地区的中心领导。兹将该会的决议简录如下：

由于挺进师及其干部和全体战士在党的正确领导之下，数月来不论在军事上、政治上、群众工作上，以及巩固部队、发动群众斗争等，获得了不少的成绩。因此，我们的敌人深恐我们立地生根，赤化其所谓“乐土肥原”，故调集了二十六个团以上的兵力，向我游击基地及红军作大规模残酷的进攻。为了保卫已得的、而且正在巩固与发展的游击基地，开展更广泛的游击战争，大量的撒播革命的种子于宽广的地区之上，依靠党与群众的力量，灵活的运用党的策略路线，击破敌人的进攻计划，争取战争的最后胜利，是浙西南党与红军当前的头等任务。为了争取斗争的胜利与彻底粉碎敌人的进攻计划，政委会便有如下的决定：

1. 政委会认为敌人此次进攻的特点，除采取以往“围剿”与逐段进攻，以及用堡垒线来缩小我游击基地外，在指挥上与领导上有了统一的领导和全盘的计划。这对于“我进彼退”的现象比较能够克服，另方面，[敌]此次进攻计划虽然预计是 4 个月，但很有可能继续的延长下

① 原文如此。

去。其次便是十八军的战斗力及其作战经验与其他各部不同，同时对于欺骗群众的手段也比较丰富，因此，照旧的应付敌人是不能粉碎敌人整个进攻计划[的]。

2. 根据当前的形势与敌我力量的对比，把主力固守浙西南基本地区、企图把敌人整个进攻计划粉碎，不但不可能，而且必然要遭到极大的不应有的损失；因此除将二纵队、五纵队及广浦独立营留浙西南配合地方武装，在浙西南特委和军分区领导之下进行顽强的自卫战争外，在敌人压力过于强大、基地万一不能支持时，广浦独立营应挺到浦城、松溪、政和东北及庆元西北地区，并与四纵队及闽北部队取得密切联系；二纵队则应挺到衢州、江山、常山及汤溪、龙游西南行动，尽可能的与化、婺、德友军取得联系；一、三、四纵队及师直属部队统随师部南下，直至浙闽边庆元、景宁、泰顺、寿宁之线。到达该地的除将四纵队留下外，主力则向东北前进，掩护一纵队渡过瓯江北进，辗转于永康、缙云、义乌、仙居、新昌大盘山一带，依靠原来基地作广泛的游击战争，进行党与群众的组织，配合主力牵制敌人，其余各部则威胁温州、平阳、瑞安等城市，使敌人主力向东南调动，藉以保卫浙西南游击基地与粉碎敌人进攻计划。

3. 如果敌人主力南下或东进时，二、五两纵队及广浦独立营应以自己英勇的行动配合当地武装，积极的粉碎敌人“清剿”计划，求得浙西南、浙南及浙东三角形的军事上与政治上有力的互相配合。

4. 为了使闽东、闽北、浙西南的党和部队取得行动上更有力的配合，政委会应尽一切的可能与闽北、闽东的党召开联席会议，建立党内外总的领导机关。尤其在闽东党一再的要求我们派人前往领导的情形下，刘、粟两同志应尽可能的协助闽东党检讨以往斗争，与切实的布置今后工作，尤其对闽东独立师，应以最大的力量派遣得力的军政干部，在短期内把它健全与巩固起来，使之成为一支强有力的部队。

5. 浙西南特委应迅速的根据当前的形势及敌人进攻的全盘计划，切实地布置工作，加紧党内外[的]战争动员，进行广泛而又深入的反抗敌人“清剿”计划的宣传解释与鼓动工作，使全党同志以及广大群众团结一致的捍卫浙西南游击基地与粉碎敌人[的]“清剿”计划。

6. 伤病员必须选择最巩固而群众基础最好的地区去安置；另方面需酌派相当的武装加以保护。在敌人将要威胁到这些地区时，必须迅速的转移后方和将伤病员分散到最可靠的群众家里去。但须给以充分的休养费和招待费，特别重要的是应对伤病员及群众进行广泛而又深入的说服解释与教育工作。

7. 在敌人进攻时，应绝对的避免正面的战斗和对峙局面，必须采取灵活的游击战术，给敌奇袭、夜袭、埋伏与侧击；另方面应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突然的袭击敌人后方，发动广大的群众，彻底的破坏敌人进攻路线或必须转移地区的交通要道，尤为重要的是应发动广大群众实行“坚壁清野”与储蓄自己必需的粮食。

8. 兵运工作做得异常薄弱，政委会必须发动浙西南全党的同志以及广大的群众和全体指战员，热烈地进行这一工作，特别是要使这一工作成为广大群众的运动，必须进行普遍的宣传教育工

作。对于俘虏必须从政治上争取他与教育他，经过相当训练时期，则遣散回家或派遣回部[队]工作。

9. 必须迅速的普遍的实行赤色清乡与检举政治上有问题的分子，对于那些坏分子，必须采取多方的监视与必要的处置。

10. 责成各级党各部队，必须与特委和政委会保持密切的联系，并迅速的建立交通机关与交通网，求得交通谍报工作的顺畅建立。

11. 各纵队任务另详。

（二）主力南下及其经过情形：

会议结束后，除布置浙西南整个工作外，主力于 9 月 28 日通过龙泉、云和的封锁线，翌晨袭击安仁镇之敌，缴获枪支数条。29 日抵庆元属之林园，当即给九支队于庆元、景宁、云和以南，泰顺、寿宁以西北[地区]活动之任务，并责成该支队应与四纵队取得密切的联系，在必要时集中行动，统一指挥，其余部队则掩护一纵队北进。上项[述]任务完成后，主力应积极的向东行动，以资吸引敌人东调（当时已吸引敌人一个师两个团），并约定四纵队及九支队会合的地点。当主力任务完成后，九支队及四纵队均已向西北前进，接连尾追数天，均未找着。于是为了调动进攻九支队及四纵队之敌，主力则向东南行动。此时北线之敌已接近我们，西南线则有五十六师全部担任封锁线，同时有刀匪数千，在这样的情形下，则决意通过闽浙边五十六师的封锁线，以便与九支队及四纵队取得密切的联系；另方面决与闽东特委汇合，经过三昼夜的行军，于 10 月 5 日与闽东特委汇合，当即召集联席会议，会议的主要精神是：

1. 在目前复杂的斗争中，对闽浙边整个工作的布置以及行动的配合，急需要总的领导机关，才能取得行动上工作上更有力的配合，与适时的粉碎敌人对闽浙边整个“清剿”计划。尤感敌人历次进攻均有总的领导机关与统一的指挥，可是在我们本身方面，自从与中央分局及闽浙赣省委联系失去后，不论在工作上行动上往往表示不能一致。为了克服这一点与迅速的加强总的领导和集中指挥起见，决成立闽浙边临时省委，这对于加强闽浙边党的领导，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彻底粉碎敌人对闽浙边的“清剿”计划，是具有极重大的意义。因此决以粟裕、刘英、叶飞、阮英平、范极民[①]、龙跃、谢文清、许信焜等十三位同志[②]组织闽浙边临时省委，并以刘英同志为书记，粟裕同志为组织部长，叶飞同志为宣传部长兼团省委书记。

2. 根据闽东特委及浙西南政委会的报告，迅速的重新布置闽浙边各地工作。

3. 重新配备干部，调浙西南政委会秘书许信焜同志任闽东独立师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调四纵队司令员王裔三同志为该师师长[③]，以王武礼同志为参谋长，以郑家太同志为该师政治部组织干事，以杨发旺同志为该师第三纵队的参谋长，其余干部则由闽东特委自行配备。

4. 决由挺进师拨重机关枪一挺，轻机关枪二挺，现款一万三千元给闽东特委，并责成闽东

① 范极民即为范式人。

② 经核实，闽浙边临时省委委员为刘英、粟裕、叶飞、黄富武、刘达云、阮英平、范式人、许信焜、洪家云、方志富、许旺等 11 人。

③ 许信焜调任闽东独立师师长，王裔三未赴闽东。

特委迅速的整理各地组织及独立师，尤其加强对各地党及独立师的领导和政治、教育、文化、娱乐工作及卫生、医务等工作。临委将各地工作布置就绪后，则致信给闽北分区委，兹将该信的主要内容摘录于下：

黄道、先喜、镜×、立贵诸同志并转分区委：

一、关于我们最近的工作（略）[①]

二、关于浙西南斗争的检讨（略）[②]

三、关于闽东工作的检讨情形（略）[③]

四、关于浙赣边整个工作我们有如下的意见和提议：

1. 关于闽北闽东浙西南的斗争，我们深深的感觉缺乏中心的主要的总的领导机关，以致领导上工作上行动上往往不能求得更有力的配合，如果长久下去，则对闽浙边的整个工作实属不利，尤其在目前这样艰苦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加之各地党业已与中央分局及闽浙赣省委失去联系，若不迅速的建立总的领导机关，则对今后整个斗争实属不利。如此，闽东特委与浙西南政委会在此次联席会议上决定成立临时省委，以粟裕、刘英、叶飞、阮英平、刘达云、许信焜、洪家云、范极民、李凡林、许旺等十一人组织之，并以刘英同志为书记。我们感觉临时省委十分不够健全，因此，我们的意见应成立闽浙赣边临时省委，包括闽北、闽东与浙西南，并建议以[与]黄道同志面商后再来决定，我们十分的希望闽北分区委采纳我们这一提议。

2. 闽东工作的布置，除竭力恢复与巩固原来基地外，则向西北发展，以资与浙西南和松政建屏之游击区域打成一片，和取得行动上一致的配合（泰顺、庆元、景宁、云和及瑞安西部均已建立部分的党的组织，游击战争也有相当的开展，群众关系极好）。但我们认为闽北的工作也应积极的与浙西南及闽东打通，求得各方面更有力的配合。

3. 浙西南斗争极为重要，我们当以最大的努力加以恢复与开展。尤其是挺进师到达浙江行动以来，不仅牵制了进攻闽北、闽东之敌，而且对于闽浙赣皖四省边区斗争的开展也有极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决与镜×、立贵、文×等同志汇合后，再集结四纵队、九支队、十三支队、特务队迅速的转回浙西南，布置新的工作。

外附新条件与新策略一份，这由[是]浙东临委从上海方面转来的。

（三）在三期斗争中，当时检讨的结论及其所得的经验与教训……

八、挺进师在闽浙边行动第四时期的情形及其所得的经验教训（从临时省委成立即 1935 年 10 月革命纪念日起至 1936 年 7 月为止）

（一）当时所处环境及经过情形

① 原文如此。
② 原文如此。
③ 原文如此。

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后，除将闽浙边整个干部重新配备、部队重新整理、工作重新布置外，当时决定省委暂时随挺进师行动一个时期，待浙西南工作布置完毕后，省委的位置应放在闽浙边泰顺、平阳、福鼎、瑞安之间，以便指导闽浙边整个工作。此时，进攻浙西南之敌已集结于龙泉、遂昌、松阳、丽水之线，在那里大开其所谓“剿匪”胜利之祝捷大会，我们以一晚两天的急行军，通过了闽浙边一师以上兵力的封锁线，而一举占领了瑞安属之杉[珊]溪镇。当时所得的情况是：(1)浙西南基本地区稍受损失。(2)黄富武同志被捕，但部队的实力大部分仍然存在。(3)洪家云同志等尚在龙泉、遂昌等边境行动。(4)群众斗争的情绪仍然很好。(5)浙东部队依然活跃于大盆[盘]山一带。……[临时省委]则决定挺进师应从速集结自己的部队，打击进攻闽浙边薄弱之敌，并迅速的回到浙西南行动，临时省委则暂随挺进师行动。会议结束后，则在泰顺、庆元、寿宁、松溪间行动了二个月光景，发动了数县的群众，恢复了不少的组织，并缴获长短枪百余支。此时十八军有向两广开拔的消息(两广事变快要到来的时期)，于是决定挺进师全部回到浙西南行动，省委位置于泰顺、福鼎、平阳。兹将此时的情形，分别的摘述于下：

1. 挺进师之部队由粟裕、谢文清、许信焜、张友昆、赵春和、张文碧等同志率领，迅速的回到浙西南，集结部队与恢复该地工作(此时原在浙西南行动之主力依然存在)，并以文×、信焜、春和、文碧等同志组织政委会，以信焜同志为书记，粟裕同志为随军省委代表，将该地工作整理完毕，部队集结好了以后，粟同志应率特务连经宣平、丽水、永康之线(这些地区原已有了工作)进到浙东(如仙居、永康、缙云、武义之间)，检讨与重新布置浙东特委的工作，然后南下回到省委所在地。于 1936 年 3 月间，挺进师胜利的占领了龙泉属之住溪镇及遂昌属之王村口。当时群众的斗争仍然如昔，二、四纵队及广浦独立营依然存在(此时十八军正开始调动)，浙西南基本地区的群众坚决的要求挺进师再不要走了……

2. 临时省委与挺进师分别后，只带了一个特务班，有短枪六支、长枪二支。当时的敌情，福鼎有第九师的一个团及闽保第四团，在平阳方面有浙保第四团，在泰顺方面有保安十一大队等。此时省委的中心任务，是以全力整理与建立福鼎、泰顺、鼎平及瑞、平、泰的工作。约一个半月的光景，各地组织均已普遍建立，广大群众业已发动，但进攻我们的敌人，随时以连排甚至以班为单位分散行动，专门压迫群众屠杀工农，抢粮迫债，无所不为。省委工作人员和特务班只不过二十几人，大部都是赤手空拳，然而广大群众在敌人不断压迫下，真是忍无可忍了，于是不断地要求我们配合他们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群众有梭镖、土枪之类，斗争精神很好)。经我们多方的考虑，认为配合群众力量，采取埋伏侧击的战术，选择有利的条件，是可以给进攻之敌以打击，并决定首先就要打击第九师(因为第九师的牛皮最大，说他一连人可以消灭全福鼎的游击队及共产党)，因此第一仗就击溃了第九师的二个排，缴获轻机关枪一挺，步枪数条，解决战斗最多不过三十分钟，我方只一特务班政治委员周兆坤同志牺牲。此时群众的斗争情绪较前更加高涨，并到处传播，说七军团到了很多的便衣队；此时部队中得到了一挺轻机关枪，真是如鱼得水般的高兴和快活。接着又一次战斗，除将敌人便衣队一排全部击溃外，接着

击溃了浙保四个连。此时这个小小的特务班，已扩充成特务队了（群众名之为七军团的驳壳队），于是进攻我们之敌固守堡垒，进攻转到防御。临[时省]委根据当时的环境，除组织直属工作突击组，分到各地区去切实的帮助与指导各地工作外，并决定普遍的巡视各县工作，由瑞、平、泰转到福鼎、鼎平各县，同时在战斗中已将特务队扩充到教导第一团和第二团（时间约三个月光景）。此时，鉴于整个形势的转变，两广事变已发生，闽东、浙西南特委及挺进师亦毫无音讯，于是除写信给闽东、浙西南及粟裕同志等约其到闽东开会外，并将分开后省委工作的现状告诉他们。此时省委布置了浙南浙东南及闽浙边整个工作后，则率领教导第一团，由鼎平，到瑞、平、泰与霞浦、福安一带巡视与布置各该县的工作，并求得早日与闽东与浙西南诸同志召开临时省委会议……

当挺进师陆续回省委后，前后争取了十几次的胜利，缴[获]长短枪四百余支，轻机枪五支，俘虏近二百余。闽浙边临时省委第十次扩大会议就在1936年“八一”革命纪念日的前后举行了。

（二）在第四期行动中所得的经验教训总结是：

A. 在游击战争方面，不但战术的运用有很大的转变，而且游击区域的开展更加宽广了，差不多温、台、处、衢各县及杭州以南以至蒋介石家乡奉化附近也有了红军的足迹，这不仅震动了整个的浙江的敌人，而且震动了整个的统治阶级。尤其是在政治上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B. 由于红军的活跃和实际行动中表现着英勇奋斗、艰苦卓绝的先进行动，不但揭破了国民党军阀说红军已经完全消灭了等武断欺骗宣传，同时在龙泉、丽水、青田、温州以南，宣平、武义、永康、缙云、金华、义乌、东阳、仙居及浙东数县，共计不下三十县的广大群众，除了一小部分以外，无不对红军爱好，特别是浙南、浙西南及闽浙边数十县的民众，对红军的热望与拥护，确实表现得非常明显，在某些地区甚至同老苏区一样，群众自动的替红军担任运输、向导及治疗伤病员等，并自动的组织游击队，进行分粮和肃反等工作。

C、D、E、F、G、H、I（略）

在敌人绝望的进攻中，证明了浙西南、浙东、浙南的党和干部以及广大的红色战士斗争的积极和顽强，它不仅保存了自己[的]有生力量，而且进一步的巩固了各该地的党与战胜了一切困难，而表明了自己是坚强英勇的战士，同时起了不少的先锋作用……

闽浙临时省委的成立，……迅速恢复了游击基地，开辟了浙东南的工作，恢复了浙西南的工作，从三百余人的部队发展到一千八百余人……

九、挺进师在闽浙边行动第五时期的情形及其所得的成绩、经验与教训（自1936年8月—1937年1月）

（一）当时所处的环境及经过情形：

……

在这一时期，正是两广事件爆发的前后，敌人的正规军均已他调，除浙江六个保安团、十

一个保安大队和六个独立营与地方武装部队外，尚有闽保第四、第六两个团；但由于党的领导正确，挺进师行动的积极，以及各级干部的团结一致，这时期是挺进师到闽浙边行动以来最好的环境，工作与斗争最顺利的时期，不仅扩大与巩固了浙南、浙西南，而且开展了浙南各县的工作，并打通了浙东原来的基地，除正规部队已扩大到将近二千外，在浙南特委领导下的地区随时随地都可号召成千成万的群众配合我军作战，同时县区乡村均有普遍的自卫队及以分区为单位的独立营、连等组织。当时敌人进攻我们的机会是很小的，于是除消灭了各地许多地主武装外，并攻开了游击基本地区内不少的反动堡垒及据点。各个游击基地的互相联系也从此打通了，浙南某些地区的土地业已分配，浙西南某些地区则实行分青苗，至于红军及游击队经过之处，富户的粮食极大部分均已分配给广大群众。

接着是双十二西安事变爆发了，此时客观形势更利于革命的发展。不久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当时我们认为“和平统一，共赴国难”将从此实现，且中央红军和国民党军队双方等已停止军事动作，然而对东南各省的苏区和红军，仍然采取绝望的进攻，企图一举而消灭东南各省的苏区和红军，并从报端上得悉将从湖南调遣刘建绪的部队来闽浙赣皖四省“剿共”。

（二）挺进师在闽浙边行动第五个时期所得的收获及其经验与教训分别的简报如下：

A. 十八军调动后，浙江敌人除保安团队外，可说比较空虚。当时在军事上，我们是采取分散集中的办法，分布于浙南、浙东南、浙西南及闽浙边区行动，每一地区均配备了党政军的干部，隶属于各特委的领导之下，采取“分散争取群众，集中应付敌人”的原则。另方面各特委配备了二百至五百的正式部队。同时尚有地方武装部队的配合，集中起来，随时可以应付敌人两营至一团的兵力，结果不但在发动群众斗争方面收效颇大，而且打击了敌人不少的小部队及民团等。

B. 开辟了浙东南各县工作，打通了三个游击基地的联系，开展了三十几县以上的游击战争，发动了数百万广大的群众，建立了各种革命团体和党的组织，扩大了党和苏维埃及红军的政治影响，尤其根据中央新的指示（民主共和国的决议及策略），转变了策略路线和工作的方式方法等。

C、D、E、F、G、H（略）

十、挺进师在闽浙边行动第六个时期的情形及其所得的经验与教训（自 1937 年 2 月至 1937 年 12 月）

（一）当时所处的环境和布置

当敌人大举进攻将要布置就绪时，正值闽浙边临时省委第二届第六次扩大会议开幕之际，大会除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与确定了闽浙边党与挺进师当时的紧急任务外，尚有如下的决议：

1. 大会一致地认为当时整个的政治形势是起了很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总的趋势是，日趋于激烈地走向革命与战争的大道，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我党将以大公无私的态度，

进一步地提出策略路线的灵活转变，从此“和平统一”“团结御侮”之方针是能迅速的实现；但由于国民党之进步与转变十分不够，东南形势一般的说来，仍然处于复杂严重斗争环境之中。最明显的事实，莫过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与国民党三中全会闭幕之后，当局对于东南各省苏区和红军的进攻，不但没有丝毫的减轻和放松，相反的依然采取绝望的进攻，企图一举而消灭东南各省的苏区和红军。刘建绪从湘调浙，组织闽浙赣皖四省“清剿”总部，就是最明显不过的事实。

2. 为了彻底地粉碎敌人的绝望进攻，与适合当前斗争的需要，红军纵队仍回浙西南，一纵队回浙东，三纵队进至浙东南，师直属部队在浙南，特务队随省委行动，给进攻之敌当头一个严厉的打击，除一、二纵队迅速回到自己工作地区依靠党与群众力量坚持各该地斗争，其余各部队及闽浙边区之独立营连队则编为十九师（三个团），采取分散集中的策略（随时能够集中打击敌人，随时又可分散行动，同时能够独立行动的各级干部，亦预先分配好了）。

3. 党政军的任务详另决议和指示信。

4. 为了便利指挥，加强各地党领导起见，决定闽浙边区成立省委办事处，以粟裕同志为省委办事处主任，直接领导指挥浙闽及边区党政军的工作，省委直属机关由瑞、平、泰出发，经泰顺、平阳、鼎平巡视与布置各该县工作后，通过飞云江进到浙东南，选择适当地区以便领导浙东南、浙西南，并与浙东及闽浙边区取得密切的联系。

5. 首先要集中全力乘敌人各路进攻尚未靠拢时，对敌第十九师李觉部及第九师一团一个有力的打击，因为这些部队是敌人进攻的主力（可是事实上战斗力并不强，且不断的发生小的兵变，以连排班为单位的好几次拖枪过来的），因此必须在各方面占着优势，才能进行必要与有力的战斗。一、二纵队在必要时应集中力量打击卢兴邦的土匪部队（该部纪律最坏，逃亡最多，战斗力最差，不断的拖枪到浙东南尤其是浙西南的部队里去）。

6. 各特委、各部队必须保持与省委和军区的联络，并迅速的建立顺畅的交通站。

（二）敌人的布置和企图

敌人此次围攻的特点，在战略上是采取由北而南，由西而东的包围，各路都有纵深配备，并以五十二师及闽保第二、四团及第九师，首先散布于闽浙边构成了一道将近七百里的封锁线，并构筑了相当巩固的工事和数千个乌龟壳（即堡垒），第一步计划限三个月消灭我们。他的兵力的布置，刘建绪自己兵力首先布置于江山、衢州、汤溪、龙游、武义、永康、宣平、缙云、丽水、永嘉之线，则企图由北而南的把我们压迫到闽浙边，并协同由西向东进攻之敌和围守闽浙边封锁之敌来消灭我们；西线布置首先以新五师、五十二师及江西保安团和福建保安团布置于江浦公路（即江山到浦城的公路）及松溪、庆元、政和之线，由西向东压迫我们，以独立第二旅及九旅、浙江保安团、保安大队及独立营等首先封锁瓯江及飞云江所有的民船，并将所有的民船于午后三时集中于指定地点的北岸，来往人员亦检查甚严，并构筑了数千个堡垒，另方面则压迫群众组织联甲及“剿共义勇壮丁队”，有了五家或十家以上的村庄，特别是重要口子及

[交通]要道上，均限期构筑堡垒和派人守口子，动员了几十万的壮丁队（根据当时报纸上的消息）协助军队“进剿”，五十步一哨，三百步一班，每个壮丁带了三个月的粮食和费用，欺骗群众说红军有几千万的银子，吃的用的不知有多少，打到红军住的地方去，一概都分配给老百姓。

在政治方面，利用反动的乡保长、地主富农，压迫群众组织联甲及义勇壮丁队，并实行了移民政策、烧杀政策（一乡的人民均集中于乡公所驻在地附近），山头山尾的房子与茅篷一概烧掉（在此次进攻中，起码烧了万座以上的房子），一切食物均集中于一地，集中时先算过每人每日只准领多少油盐柴米。到处大造谣言，说朱毛红军已投降了，为了要打日本，首先要“剿灭”共党和红军（?）；颁布了通红军者、报告红军消息者、送红军粮食者等十条杀头状压迫群众执行。此外还有赏格布告散发到各地去，捉到红军首领的赏多少，杀到红军首领的头赏多少，并说只要拿他们的头来，和蒋介石说共产党员和红军均会消灭干净。可是后来得悉此种消息不正确，给刘建绪谎报军情戴罪立功的责备与处分。

（三）我们当时的对策

在军事方面是，一纵队由浙南出发，经浙东南以电光形的进行回到浙东活动；三纵队回到浙西南；其余各部集结于平、鼎交界处，首先给了进攻之敌浙保及闽保以严厉打击，并与十九师李觉打下二仗（按李觉是何键的马后弁，因何的女儿爱上李觉后为何的女婿，同时又是蒋的干儿子），敌人死伤颇重，我军无甚损失。此时敌人主力均已达到平阳、福鼎、泰顺之线，闽浙[边临时]省委根据当地的情况及敌我力量的对比，认为部队集中一起行动，在当时那样的环境中实属不利，于是除将各地方武装分布于各部游击基本地区进行持久的顽强的斗争外，其余各部均于 1937 年 3 月间先后挺进到浙东南及敌人后方侧翼去了。于是敌人企图消灭我军于闽浙边之计划，完全归于失败。

正当敌人大举进攻时，省委及军区发出了快邮代电，中心内容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号召，不到一个月的光景，当局派遣了代表到温，并在各报披露，愿与我们进行和平谈判。经省委讨论的结果，认为当时的谈判，当局所提条件，一定是很苛刻，而且没有诚意，但我们很可利用十五天的停战机会，布置我们新的工作与扩大我们党的影响。于是双方谈判。可是谈判的焦点至我方代表坚持我党组织与部队独立性和划分一定地区时，当局企图扣留我方代表，此时我们很机动的要求对方到温州谈判，并邀请各界先进人士参加，不数日蒋介石给刘建绪“停抚进剿”之手令，于是谈判遂告破裂，我们代表也安全地绕道回来了。此时我们的主力由整化零组织了大批的赤色武装工作团，除配备军政干部外，并配以各当地党的干部一起行动约半月的光景，各部挺进到敌人后方及侧翼去了，并发出《为团结御侮共赴国难以及和平谈判破裂告各界人士书》。5 月间继续发出和平谈判通电，6 月中续发《呼吁各界人士要求当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宣言》。当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第三天，当局派四省“剿共”总指挥党政处主任邓讱先生来温与我方进行谈判。此时我们的谈判对方是处于被动地位，且环境也非常有利于我们，于是我们即坚持以主力红军谈判的条件作为我们谈判的准则。此时对方一一允许，并再三要求停

止军事动作(因为进攻我们的部队均要调动,且各地游击队异常活跃)。于是7月13号[①]双方在温签订了和平谈判的协定,并由当局每月供给我们一万五千元的开支。当和平谈判协定签订之后,省委由青田、永嘉、瑞安边境一昼夜的行程赶回平阳北港,集中部队与布置新的工作,约半月光景即将散布于瑞、平、泰、青、丽、温等县的部队全部集中完毕,工作人员及红色战士共集中约三百人左右。当部队集中完毕和浙南及边区工作布置就绪后,即分别的派人往浙东南、浙西南及金、衢属方面找粟裕、谢文清、张文碧、范联辉[②]、赵春和等同志,约一个月的时间,始将各地另外的部队找回,最大的力量是用在创办党的训练班,恢复各地工作,加紧部队教育,创办救亡学校,组织救亡团体及训练群众的抗日自卫队等。

(四)闽浙[边]临时省委对八个月斗争的总结简摘如下:(略)

十一、关于党与群众工作

(一)党的方面

甲、浙闽边党的建立及其发展的情况

当挺进师于1935年到达闽浙边时,浙江党的组织除浙东有极少数的零星组织外,其他各地均没有党的组织[③]。在浙南地区,有中共浙南委员会及其所属党的组织和浙南红军游击队。在闽浙边的福鼎、泰顺等地,有中共闽东特委建立的鼎平县委以及前岐、上东区委、区苏维埃和鼎平独立团等组织。政委会根据中共[央]东南分局的指示及各地的具体情形,首先建立了松溪、政和、庆元、泰顺等县某些地区党的组织,并迅速地打通了闽东闽北的联系,至1935年10月间即建立了景宁、云和、龙泉、遂昌、松阳、宣平、江山、浦城、汤溪、龙游、武义等县普遍党的组织;有些县份如武阳等县则部分的建立了组织,并正式成立了浙西南特委,同时派遣了一纵队配备党政干部挺进到浙东,将该地零星的党的组织经过数月整理后,亦成立了永、缙、仙、处等县某些地区的党的组织;是年10月南下开辟与整理了泰顺、福鼎、平阳、瑞安等县的工作,并于1935年12月正式成立了浙闽边区特委;1936年3月间正式成立了浙东南特委;1937年3月至1937年8月开展了永嘉、青田、瑞安等县工作,在和平谈判成就前后,成立了台属工作委员会。当时党员的数量是四千余人,最多达到五千余党员。一般说来,在挺进师胜利的影响之下和各级干部的努力,对于党的发展得到极大的成绩……

乙、党的教育(略)

丙、党的影响(略)

---

① 回忆时间有误。根据吴毓、龙跃1937年10月1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闽浙边区历次与国民党四省边区主任刘建绪谈判的经过》,和谈协定签订时间应为1937年8月24日,地点在温州申江旅馆。谈判代表中共方面为吴毓、黄耕夫、黄先河,国民党方面首席代表为刘建绪派的政训处处长邓讱。

② 范联辉即范连辉。

③ 经核实,1935年3月挺进师到达浙江时,浙江的党组织有中共东阳中心县委,下辖有东阳、缙云、永康、汤溪4个县工委,1935年10月遭破坏。

丁、党的领导

在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中，挺进师和浙西南的党，表明着自己的先进和能够随机应变以及独当一面的艰苦奋斗精神。它不但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战争，发动了数十县的民众，扩大了党与苏维埃的政治影响，保存了自己的有生力量，在某些地区分配了土地，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而且创立了成为今天抗战的主要支点之一。这正是东南局总结挺进师及浙西南党三年斗争总结中所指出的：挺进师和浙西南的党基本上坚决地执行了中央的政治路线，而且在战斗中工作中获得了不少的胜利和成绩。正因为如此，所以浙闽边数百万群众对我党的拥护、同情与爱戴，表现出普遍而又深入的现象。

（二）群众工作

甲、动员工作的简述

⑴当挺进师进到闽浙边的时候，政委会作了很大的努力，号召与教育全体党员和每个红色指战员成为“党与苏维埃的宣传者和组织者”。正因为这一教育做得比较深入与普遍，又由于全体党员与战士们的自觉，因此挺进师和浙西南的党在坚持闽浙边的三年斗争中起了应有的努力和积极的作用。它响亮地回答了政委会和政治部，每人每日写十条标语、找十个民众谈话，并以班排为单位随时随地举行群众大会、军民联欢大会与组织群众，以及建立党组织的号召。它在行动上坚决的执行了革命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能与群众打成一片，并获得了广大群众对我们的同情和拥护，特别是全体同志和每个红色指战员那种不分昼夜、不分行军疲倦之工作精神，更是值得学习和表扬的。

⑵能够适时的转变工作方式与方法，以及灵活的运用党的策略路线，如大标语小传单的发挥，利用分发谷物的机会进行充分的宣传教育与解释工作，早去晚归的工作精神，分散争取群众、集合讨论问题的作风，化装演讲挨户宣传，利用当地耆老和有威望的人士深入民间工作，利用姓名与宗族的乡民心理与群众结成骨肉相联，实际的救济灾民、难民、饥民与贫民，普遍布置和有计划的召开户长及乡里绅耆会议，集体慰问白军家属以及优待红军将士家属；另方面在短期内争取与教育了数万“青帮”与大批的大刀会及绿林兄弟，争取了不少的乡保甲长及绅耆，同时迅速的由没收政策转变到征发政策，由罚款转到募捐，由对立做到争取与互解，由恐惧知识分子的心理转到积极争取和教育的政策，由敌对转到和平团结一致抗日，由秘密转到公开合法，由穷乡僻壤的狭隘工作地区转到普遍的宽广地区及重要的市镇，由非法转到合法。正因为如此，所以闽浙边的斗争，能够克服严重的赤白对立现象，以及在宣传组织教育与武装民众的工作上收到极大的效果。

乙、群众工作中所给予我们的经验与教训

⑴有了党的正确领导与具体计划，还须有充分的动员工作，否则收效势必减少，甚至有时会行不通。

⑵计划不应过于庞大而应根据上级的决议与指示适合当时当地的需要，定出预料能够

完成的计划与任务，否则不但有名无实、不能兑现，而且很容易失去党的威信与削弱下层干部和同志的信心。

(3)动员口号不是一成不变的，而应根据各个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环境定出简短有力的、适合群众斗争需要的动员斗争的口号。

(4)计划决议确定后，必须派得力的干部深入下层进行不疲倦的督促、指导与帮助工作，特别是下级和同志遇到困难时，必须耐烦而又细心地为之解决与切实地去帮助他。

(5)奖励和指责、教育和劝导，必须灵活的运用，那种不分轻重、毫无朝气的领导方式与工作方法是无济于事的，且反而变为有害的东西。

(6)要大胆与适时的创造大批当地干部，特别是有威望的干部，另方面要大胆信任这些干部去干，包办主义、事务主义、信而不用、打小算盘和狭隘经验等等都是有害无益的东西。

(7)不管你的能力如何的强、办法如何的多，如果你在领导上不能取得干部与群众的信赖，那末你要建立党与群众中强固的高度威望是不可能的。

(8)群众工作要有埋头苦干与克服一切困难的精神，另方面要具备胜利不骄傲、失败不灰心的顽强斗争之常态，任何高慢轻举与昏头灰心的倾向和行为都是极端有害的，且足以障碍事业的进展和胜利地完成党所给予我们的任务。

十二、坚持闽浙边三年斗争中所得的成绩及所给予我们的经验教训

(一)成绩

1. 挺进师和闽浙边区以及浙西南的党，在中央[东南]分局与闽浙临时省委的正确领导之下，进行了长期的的坚决奋斗，基本上执行了党的路线与胜利的完成了党所给予的任务，开辟了浙西南、闽浙边宽广地区的工作局面，保存了许多优秀的干部，创造了成为目前抗战中最可靠的战略支点，以及抗日武装的保持。

2. 挺进师与闽浙边区及浙西南的党，在当地和中央[东南局]的联系断绝后，能够在长期的艰苦斗争中灵活的运用党的策略路线，顽强的坚持了三年斗争，这表明挺进师全体指战员与浙闽边区和浙西南的党在组织上的坚强信念与顽强的斗争精神，尤其在行动中工作中表明了自己的先进，团聚了成千成万成百万的群众，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揭破了敌人一切无耻的造谣与中伤，使闽浙边的广大群众对党、对革命表现出空前未有的拥护与同情。

3. 指明与教训了全党的同志以及社会上先进的人士，特别是广大群众，只要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论国内外形势如何的严重以及自己所处的环境如何的恶劣，如能坚持到底、团结一致与万众一心，最后胜利必然属于我们。

(二)经验与教训

1. 有了党的正确的主张与正确的策略路线，还须要有坚强的有胆识、有远见、能说能为、能负责的干部作指导，这在十年斗争中尤其在坚持闽浙边三年斗争中给了我们铁一般的事实

教训。假如没有这种干部，挺进师及浙西南的党在当时那样紧张复杂而又残酷的斗争中，要独当一面的坚持闽浙边三年斗争与克服困难和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

2. 没有党的坚强领导与上下一致的团结，要完成党所给予我们的任务与顽强的坚持斗争也是不可能的……

3. 共产党员及其干部，特别是领导者，如果没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去观察全局、照顾全面与过细的分析和估计各种不同的环境与事件，而盲目的决定自己的斗争方向，或者马虎了事的去处理任何事件，都是极端有害和违背了共产党员的作风的。因此我们应该具备远大的政治眼光与掌握住各个不同的环境、抓住事物的中心环节，精密而又具体的去观察时局和布置自己的工作，并以全力去为自己[的]计划与决定的实现作持久与不屈不挠的斗争。

4. 不论在任何的斗争环境中，我们的干部尤其是负责者，必须具备大胆细心保持常态的精神，所谓布尔什维克的常态，就是胜利不骄傲、失败不昏头；所谓事事要过细，那就是要有冷静的头脑，根据事物的发展与变化加以过细的思索和适当的处置，违背了这种原则，要达到事业的成功是不可能的。

5. 在环境越发严重、斗争越发紧张的时候，加强党的领导与进行广泛而又深入的党内外政治动员，以及耐烦而又细心的去进行说服劝导与解释工作，是特别来得重要和具有特殊的意义的……

6. 在干部决定一切的原则下，必须善于团结干部、爱护干部、使用干部与不断的创造大批新干部，否则要坚持与适应长期的斗争需要，以及胜利的完成党所给予我们的任务都是不可能的。

7. 决心是一切问题的成功之母，没有果断的决心，便是犹豫不决，任何事情都不能成就。但决心不是随便下达的，必须事先加以周密的计划与分析，然后根据各方面所具备的条件才能下达自己的决心……

8. ……不论任何的游击部队，党的基础一经建立，或群众条件成熟时，必须根据当时当地的需要放下得力干部，专门致力于领导党的工作，但须在工作中斗争中不断加以督促指导与帮助……

9. 斗争时机的选择是非常必要的，如果条件尚未成熟、环境又不许可时，轻易的举动与冒险都是不利的，而且很可能会遭到失败，所以必须根据列宁同志所指示我们的斗争时机[原则]选择的正确指示，灵活的运用到实际斗争中去。

10. 要完成党的任务、要坚持某地斗争，必须坚决的执行上级的指示和决议，同时适时的正确的展开反两条战线的斗争，以及发挥我党独有的自我批评精神，同时只有这样，才能及时克服一切不良倾向与错误的行为，保证党内政治上、组织上以及思想上与行动上的一致，胜利的完成党所给予我们的任务。

1940 年夏于皖南

（原件存浙江省档案馆，作者系红军挺进师政治委员、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书记）

浙南三年游击战争（节录）

粟　裕

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是我国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浙南游击区，包括浙西南、浙南（含浙东南）、浙东几块游击根据地，其中心区，先是在浙西南地区，以后移到浙南地区，而游击区域则遍及浙赣铁路义乌至江山段和天台山以南的浙江省南半部和闽东北边沿。这场游击战争，从1935年初开始，直到1937年9月中旬我们与国民党浙江军政当局签署和平协议，才告一段落。但是，浙南人民的革命武装斗争并未就此偃旗息鼓，那里的革命军民，继续投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一直坚持到1949年全国胜利。

浙南游击区，是由一支红军主力部队，在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军阀之间的战争已经基本停止，在革命低潮时节进入国民党政治统治腹心地区开辟和发展起来的，这就形成了浙南游击战争的若干特色。

在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期间，我绝大部分时间是率领挺进师发展游击战争，开辟、建设和保卫游击根据地，因此我将以武装斗争为主线来记述这一时期的经历。

一、挺进浙西南

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是紧接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失败开始的。那时，党中央已率领主力红军离开了中央根据地，正在长征途中，留下苏区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统一领导原来中央根据地和各游击区的工作，领导人是项英同志和陈毅同志。1935年1月底2月初，当我们率领抗日先遣队的怀玉山突围部队到达闽浙赣根据地不久，中共闽浙赣省委向我们传达苏区中央分局转来的中央指示，要我们以先遣队的突围部队为基础，迅速组建挺进师，由我任师长，刘英同志任政治委员，立即率部进入浙江境内，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苏维埃根据地；以积极的作战行动，打击、吸引和牵制敌人，保卫闽浙赣基本地区和邻近的根据地；并从战略上配合主力红军的行动。

我们得到上述指示的时间是在党中央召开遵义会议以后，但在这个指示中没有传达遵义会议的精神，那时我们也不知道有遵义会议的召开。受领任务后，我们立即进行研究。我们对于浙江并不生疏，上一年，北上抗日先遣队曾在浙江地区度过了艰难的阶段。浙江是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蒋介石的老巢，反动势力强大，大部分地区党的组织被破坏，更没有红色根据地或游击区域作为我们的依托。但是浙江的工农劳苦大众是有革命传统的，浙江有些地域的

地形条件对我也很有利。从全局来看，其时中央苏区虽已丧失，但是国民党的主力正被我主力红军吸引于北上途中，那里是主要的战场，相对地说来，浙江的敌人比较空虚，而且我们可以同坚持在南方的几个老苏区互相配合，互相支援。先遣队北上时未能在浙江省立脚生根，主要是由于当时没有分散打游击的认识和决心，如果我们接受这个教训，自觉地把正规军变成游击队，不打正规战而打游击战，来一个决定性的转变，我们相信是可以在浙江立脚生根，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的。

我们认真地分析了浙江的地理位置与地形，选定以仙霞岭为中心的浙西南地区，作为我们创建游击根据地的第一个目标。这个选择的主要理由是：第一，那个地区是在闽、浙、赣三省交界处，可以同闽东、闽北、闽浙赣几块游击根据地互为犄角，互相支援，而三省敌人之间的矛盾，又可以为我利用；第二，那里的群众基础比较好。该地区在 1930 年曾受到过党所领导的红十三军革命暴动的影响，革命的火种还在一些基本群众的心底埋藏着，那里有一个“青帮”组织，其领导人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反抗已久，有打富济贫的要求，同我们有一点联系，可以成为我们初步的依托；第三，那里虽然交通发达，有杭（州）江（山）铁路（即浙赣铁路东段）和三条公路干线，但大部地区山岭连绵，森林茂密，道路曲折，便于我隐蔽和机动。

在中共闽浙赣省委和省军区的帮助下，我们立即进行挺进师的组建。

先遣队突围的部队主要是一个迫击炮连、一个机关枪连（已经没有炮弹和枪弹）和二十一师的第五连，再就是一些康复了的轻伤病员，以及政治部、供给部、保卫局的机关工作人员，共四百多人。此外省委又将闽浙赣独立师第一团一百多人编入挺进师。为了适应游击战争的需要，下面不设团、营、连，而是编成三个支队和一个师直属队。支队实际上相当连，但大都由团级干部担任领导。任命了王蕴瑞同志为参谋长，黄富武同志为师政治部主任。师部机关有司、政、供、卫各部，但极其精干。后来还把机关人员编成一个政治连。

当时确定的行动路线是：由闽浙赣根据地南下，先到闽北根据地，和那里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后，再去浙江。经过了个把月的整训，二月底，指战员们抱着继承先烈革命遗志、开创新的游击根据地的坚强信念，誓师出征了。

挺进师南下，首先要通过敌人在信江以北布置的几道封锁线，由于我们的准备工作比较充分，行动隐蔽而且敏捷，以一夜一百四十里的急行军翻过灵山，通过了封锁线，渡过了信江，胜利到达闽赣边境。可是，当我们刚刚到达福建边境时，突然遭到敌人保安团的伏击。这次伏击给我们带来的最大损失，是把我们仅有的一部电台打掉了，从此就同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我们从闽浙赣根据地出发前，曾向闽北党组织通报，请他们派人接应。但当我们打垮敌人的伏击进入闽北根据地时，却到处碰到敌人，找了好几天也没有找到闽北的同志。后来发现在一些村口和凉亭柱上贴着敌人的布告和反动宣传品，其中有署名李德胜的“劝降书”。这时，我们才搞清楚原闽北军分区司令员李德胜叛变了。这个叛徒正带着敌人来闽北“清剿”。还把我

们挺进师要到浙江去的行动计划出卖给了敌人，使我们遭到伏击。这样，我们只得放弃先同黄道同志取得联系的想法，决定以自己的作战行动，为进入浙西南打开通道。

这时，我们同抗日先遣队北上时留下的两个连队会合了。他们有一百五十余人，几十支步枪和几挺机枪，由营政委洪家云同志率领，归建于挺进师。而原来编入挺进师的闽浙赣独立师第一团在部队离开闽浙赣根据地后，大都掉队跑回去了。这样，挺进师仍是五百多人。为加强挺进师活动区域党政军工作的领导，决定成立政治委员会，由刘英、粟裕、黄富武、宗孟平、王维信、姚阿宝、刘达云、洪家云、方志富等九人组成，以刘英同志为书记。

浙西南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地区，敌人在那里驻有较强的保安团队。我们必须先在外围活动，把那些保安团队吸引出来，给以各个打击，才好进入该地区。为此，我们于三四月间在浙闽边境进进出出，往返作战，一度打到江山，又到武夷山、洞宫山区兜了几个圈子，后来又辗转游击于龙泉河以南之庆元、景宁、松溪、政和、寿宁、泰顺一带，先后打了大小几十仗。比较重要的有溪头、小梅、沙湾、上标、潭边街、百丈口等战斗，歼灭了一批保安团队和地主武装。敌人自感“风鹤频惊”，十分惶恐。此时，敌人以为我们必将在龙泉河以南的浙闽边境立脚，遂将龙泉河以北的浙江保安团队纷纷南调，并令福建的新十师和第五十六师北进，妄想南北夹击，消灭我军。

4 月下旬，我们正活动于庆元县的斋郎地区时，敌人令浙江保安第一团团长李秀率部一千二百余人，福建保安第二团团长马洪琛率部一千余人，并在近千人的地主武装（主要是“大刀会”）的配合下，从东北、正东和东南三个方向对我实行分进合击。当时我军只有五六百人，虽然敌我兵力对比悬殊，但我军战斗力强。我们决心利用斋郎的有利地形，精心组织一次战斗。敌人知道我军兵力有限，弹药不多，更无后方补给，拟以地主武装打头阵，先予我军以扰乱和消耗，然后出主力，一举将我歼灭。这却给了我军以各个歼灭敌人的良机。28 日上午，战斗开始，手持刀枪的地主武装漫山遍野呼啸而来。近一个月来，我们已经有了对付大刀会的经验，我军以军事政治攻势齐下，半天不到便将他们完全瓦解。接着，浙保第一团李秀部骄纵轻进，一下深入到我军预设阵地前沿，我集中火力，突然给以打击，杀伤其三百余人，俘虏约两百，敌团长李秀也被打断了手，率残部仓皇向斋郎东北四十里的英川逃窜，我军追击了十五里才返回。这时刚由东南方向烂泥村赶来之敌马洪琛感到孤立无援，连忙带着他的闽保第二团狼狈遁走，战斗胜利结束。

斋郎战斗，是我军挺进浙闽边后的关键一仗。斋郎战斗的胜利，迫使敌保安团队在以后一段时间内转为退守，龙泉河北面的敌人已比较空虚，一些反动地主也纷纷离开了浙西南，我们就获得了开辟以仙霞岭为中心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有利时机。胜利完成了进军以来的第一个作战任务——打开进入浙西南开辟游击根据地的通道。

二、创建浙西南游击根据地

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我们对浙西南地区的具体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从实际情

况出发，我们选择了龙（泉）浦（城）江（山）遂（昌）和龙（泉）云（和）松（阳）遂（昌）东西两片地区，作为建立第一块游击根据地的基本区域。因为洪家云同志率领的两个连归建之前，在龙浦江遂地区活动过，有一些工作基础，同时和我们有联系的“青帮”组织在这一带也有较大的势力，便于我开展工作。

当部队于5月上旬进入到龙、遂、松三县边界地区时，就受到当地“青帮”的热烈欢迎。这个“青帮”组织的主要领导人是松阳县安岱后村的陈凤生和斗潭村的卢子敬。陈凤生早年在外地经商时加入“青帮”，但也接触过进步思想，受到过1928年崇安、浦城暴动的影响，向往革命。1930年回乡后，领导了攻打国民党枫坪警察所的武装斗争。卢子敬早年留学日本，受进步思想影响，中途归国，回乡办学校，积极学习与传播革命知识。陈、卢等一些“青帮”首领，实际上是当地很有威望的群众领袖。在他们的领导下，这个“青帮”会众，绝大多数都是当地贫苦的青、壮年农民，有强烈而朴素的革命要求。我们一到，他们就积极靠拢我们，主动表示希望得到共产党的领导。这样我们有了初步的依托，对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开辟，起了很好的作用。后来，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参加了红军游击队和根据地建设工作，一些先进分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挺进师进入浙西南地区后的第一批地方党员和干部。

这时部队已改编为四个纵队和两个独立支队。除将第四纵队留在龙泉河以南的浙闽边境继续活动以牵制敌人外，我们确定由第一、第二纵队担负开辟基本地区、建立根据地的任务，其余各部队则由师部率领北进，辗转游击于浙赣路以南的汤溪（现并入金华）、龙游、金华、武义、宣平（现已撤销，分别划入永康[①]、武义等县）、丽水之线，造成声势，迫使敌人北调，以掩护和保障第一、第二纵队开展工作。

挺进师在第一个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作战。北渡龙泉河进入浙西南地区后，我们的任务是要把武装斗争与根据地建设结合起来。我们运用了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方法，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打击敌人，要求每个干部、战士都学会两套本领：打游击，做群众工作。

我们这支部队的前身，本是赣东北的子弟兵——红十军，是长于打游击的，后来奉命调往中央苏区，先后整编为第十一军和第七军团，在几次反“围剿”的斗争中，千里转战，已锻炼成为一支长于野战的红军正规兵团。现在要分散打游击，反而要从头学起，最大的困难是不少干部不愿意分开活动。怎么办？只能在实际斗争中来培养和锻炼。当我们于三四月间进入浙江并活动于浙闽边境时，就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开始，我们派一个团级干部带一支小部队出去，也很困难。要他们在外面活动半个月，然后在预定的地点跟我们会合。可是，过了三天，他就带着部队回来了。别看才出去三天，人也瘦了，眼睛凹下去了，胡子也长了，无论如何要跟我们一起走，不肯单独行动。以后我们就改变办法：开始不叫他出去半个月，只出去三天，三天后，在什么地方和我们会合，会合后再出去，增加到五天，五天后再到规定地点集合。这样，他们的单

① 有误，永康应为丽水（今莲都）。

独行动的办法多起来了，信心也慢慢增强，以后就提出活动的时间逐次增加到七天、十天、半个月，这样才学会了单独活动。以后甚至一个班长也能够带一支小部队单独活动了。

游击队要能自如地活动，根本的一条是要依靠群众，会做群众工作。所以我们一进入浙江，就向部队提出了这项要求。因为是新区，群众对我们不了解，加之语言不通，又受到敌人反动宣传的欺骗，群众难免有些害怕。他们听说红军来了，就躲起来，有的则被国民党反动派胁迫着离开了村庄。有时，我们连一个向导也不容易找到，筹措粮食给养更是困难。为了向群众进行宣传工作，有时只好叫自己的侦察员化装成逃跑的群众，口里喊着："红军来了！红军来了！"群众也跟着跑出来了，侦察员再把群众拦下来，向他们说明情况，请他们带路，讲定每带十里路给一块银洋。当时我们的银洋还比较多。利用群众带路的机会，我们就做宣传。这样，得到了利益，又听我们讲了道理，知道我们是工人、农民的子弟兵，反对国民党抽丁拉夫和摊派苛捐杂税，纪律又好，确是爱护群众的。一传十、十传百，就不再相信国民党那一套骗人的鬼话了。在前一阶段的这些活动中，我们了解群众的疾苦，熟悉他们的风俗习惯，学习一些浙南方言，积累了一些开展群众工作的新经验。这对于我们开辟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是很有作用的。

浙西南山区在反动统治阶级残酷剥削和敲诈勒索下，农民生活极其困苦，农村经济濒临破产，加之头年大旱，作物歉收，这一年春天又发大水，春花荡然，到处是灾民、饥民挣扎在死亡线上。面对这个现实，我们公开提出"打土豪，开仓济贫，帮助群众战胜夏荒"，深入发动群众斗争。

此时浙江保安团队被我主力部队吸引和牵制在外，国民党兵力空虚，不得不集中那有限的兵力守城而放松农村。我们也不集中部队攻城，而在广大农村辗转游击。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首先将国民党的区、乡武装消灭，区、乡、保长和土豪劣绅四处逃散；逃散不及而被我们捕获的，则按实际情况区别对待。罪恶多，民愤大的，召开群众大会公审，坚决镇压，没收他们的财产，分配给贫苦群众。如 5 月 17 日我们袭占了松阳重镇古市，公开处决了反动镇长和巡官；5 月 21 日袭击龙游溪口，又镇压了罪大恶极的第三公安分局长。这样就给了阶级敌人以沉重打击，使广大被压迫、被剥削的群众，从反动统治阶级的千年压榨下挺立起来，砸碎身上的枷锁，投入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这是浙南人民空前规模的革命壮举，也是全国革命低潮中一个局部的高潮，来势迅猛。我军所到之处，都有大批大批的群众跟着，簇拥着，复仇的呐喊声，胜利的欢呼声，山鸣谷应，日夜不绝。反动区、乡政权瓦解了，接着就建起农民、青年、妇女、赤卫队等各种革命群众组织。他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宣布所采取的革命行政措施。就这样，一个崭新的红色游击根据地的雏形便在浙西南地区出现了。

革命形势迅速发展，使得浙江统治集团十分惊恐。4 月 6 日《东南日报》报道，"浙省无匪迹……治安绝无问题"。可是转眼之间，来自仙霞岭的革命霞光，已照映得浙西南一片火红。于是惊呼："松遂龙各县大半赤化。"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与省保安处副处长宣铁吾等赶忙集议，决定"进剿"，妄图将我挺进师消灭于立足未稳之际。

敌人这次“进剿”，是以浙江保安团为主体，纠合地主反动武装进行的。国民党在浙江原有七个保安团，3 月间，省保安处长俞济时带着三个团到宜昌去了，留有四个团，全部用上；又调集了全省 15 个保安大队中的 11 个，以及刚从南京调来不久的税警团一个团，合计约八九个团的兵力，由蒋志英、陈式正统一指挥，分四路向我进攻。我军参照前一段时间对付保安团的经验，决定将主力分为南、北两路，趁敌人尚在运动中，先一着跳出去，转入敌后，打击敌人，以便把敌人调出中心区，使中心区的工作能继续坚持和开展。

当我南路部队向西南方向出动的时候，师部则率主力北上。开始，我们日夜兼程地指向汤溪县城，在敌人拼命加固城防的时候，我们又迅速折向遂昌的门阵一带，在那里发动群众，斗争土豪劣绅，书写标语，扩大宣传。然后留下 20 多人就地开展游击活动，以掩护群众的革命斗争，主力则由当地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带路，直奔上阳村。接着又由上阳村的数十名农民积极分子配合，进袭南坑。我们每到一处，发动群众，惩处恶霸，吸收青年积极分子加入红军，搞得热火朝天。就这样，我们在汤溪、龙游、金华、宣平、遂昌之间辗转游击了十多天，把革命烈火引到了浙赣铁路线。浙赣线受到我们的威胁，各地告急的文电接连发到了杭州，敌人的“进剿”计划眼看要破产，黄绍竑坐卧不安，打着“推行新运（即蒋介石搞的“新生活运动”）、抚慰灾民”的旗号，带着一个士官教育团前来助威。这一期士官教育团集中训练的是浙江各县的基干队长和常备队长，他们是浙江保安队的反共骨干。士官教育团装备比较精良，黄绍竑等视为“怀中利剑”，于 6 月 12 日亲自带到金华，以振奋浙西南地区的反动势力。我军侦知消息后，预为布置，以逸待劳，给敌仕官团以突然打击。先于 14 日在宣平北乡之吴宅歼其一个整连，接着又奔袭小溪口，再歼其一个连，这两个连队的装备，全部为我缴获。黄绍竑受此打击后，于 20 日匆匆跑回杭州。敌人的第一次“进剿”遂告失败。

在武装斗争的保卫下，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建设工作得到迅速发展。松遂之间的安岱后、大泮坑、大横坑、苏马坪，龙遂之间的玉岩、枫坪、小吉、上田、东畲，遂西南的王村口、独口，龙西的碧龙、住溪，福建浦城的毛洋，甚至丽水的雅溪、曳岭、丽云，龙南的上田、季山头、黄桶……几乎是一片火红。在这些基本地区内建立了红色游击队，发展了群众武装，各种革命群众组织普遍建立，住溪、王村口、官塘、枫坪、谷陈等地建立了临时的苏维埃政府。8 月，群众开始了紧张的查田运动，量地插标，准备分配青苗和土地。

这时，挺进师已发展到近千人，扩编为五个纵队和两个独立支队，连地方工作人员一起，不下两千人。地方武装也有千余人。我们的师部和领导中心放在王村口，还建立了后方基地。王村口的后山就有军需物资供应站、军械修理所和伤病员休养所。

从 1935 年 5 月到 9 月中旬，前后四个半月，我们在浙江建立的第一块游击根据地，已在江山、浦城、龙泉、遂昌、松阳五县之间建立起来，纵横百余公里。而游击区域则发展到北抵浙赣路，南到浙闽边界西段，西及赣、闽边境，东到丽水、宣平的广大地区。武装斗争为建设根据地打开了道路并提供了保障，根据地建设支持了武装斗争。我们初步实现了党中央交付的任

务，在浙江站住了脚跟。

三、第一次反“围剿”

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建立，等于在蒋介石的后院修起了革命的堡垒，枪口相对，这必然是他无法容忍而要加以“平毁”的。革命斗争的实践已经证明，只要实行革命的武装割据，“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是不会平息的。浙江当然不能例外。1935 年 8 月，敌人开始策划对我浙西南游击根据地进行“围剿”。

后来查明，蒋介石鉴于保安团对付不了我们，决定调动他的主力部队来“围剿”。国民党军委会在七八月间，先后任命卫立煌和罗卓英为“闽赣浙皖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的正、副总指挥。其总指挥部在赵观涛任总指挥时，设在江西上饶，着重对付我抗日先遣队，以后一度移驻福建南平，重点对付闽赣边境。7 月下旬移驻浦城，9 月中旬移驻浙江江山。该总指挥部制定的《第一期清剿计划》（国民党认为我坚持南方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只是红军的“残余”，故名“清剿”而不叫“围剿”），确定这次“清剿”要“以各边区大部对粟、刘”，并委第十八军军长罗卓英统一指挥。当时，福建、江西、浙江、安徽四省边区受该总指挥部节制的部队共有 63 个正规团，罗卓英计划以其中的一大半来对付我年轻的浙南游击区。

由罗卓英任军长的第十八军，是陈诚起家的老本，装备精良，人员充实，训练有素，战斗力较强，以后被称为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其师、团长中如黄维、霍揆彰、李树森、宋瑞珂、胡琏、阙汉骞、高魁元等，后来都是国民党军中的著名人物，由此可见蒋介石对此次“围剿”之用心。

罗卓英的部队于 8 月间即由江西向浙江开进。其“围剿”的部署是：以第十四师三个团在北面，第九十四师三个团在东北，第六十七师三个团在东南，浙江四个保安团在南面，第三师两个旅五个团在西南，郜子举“剿共军”第二纵队两个支队四个团在西北。各部构筑碉堡工事，对我浙西南根据地形成包围；又从北面的溪圩经东需（书）到南面的龙泉，构筑一条碉堡线，将整个包围圈剖为东西两半，以其第十一师三个团由龙泉向北机动。十八军军部率其特务团驻丽水。此外，还调第五十六师所属的两个旅六个团，由际下向东南经花桥、举水、荷地直抵泰顺，构成第二道封锁线，以求切断我转向闽北、闽东的退路。敌人集中了三十二个整团共约六七万人的兵力，连同地主武装号称四十个团，妄图围歼我游击队，彻底摧毁我浙西南游击根据地。

敌人发动新的“围剿”，我们虽早有觉察，但开始判断是刚提升为浙江省保安处长宣铁吾所指挥。当时宣铁吾在遂昌设有“浙南剿匪指挥部”，指挥有四个保安团和十余个保安大队，构筑封锁线，扬言要用“回环压迫法”，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直捣松遂龙间我根据地。我们对国民党浙江省防军的战斗力是心中有数的，而且我们为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发展和第一次反“进剿”的胜利所鼓舞，所以在 7 月底、8 月初发起了“八一”大示威，以期打破宣铁吾的“围剿”。直到 9 月中旬，我们才逐渐查明这次“围剿”是蒋介石直接部署、由罗卓英指挥，并以敌正规军为主体。“八一”大示威虽然给了敌人保安团队和反动地主武装以相当的打击，但却过早

地暴露和消耗了我们的力量。形势比我们估计的要严重得多。

对付敌人如此大规模的“围剿”，应取何种方针，关系重大。回顾中央苏区在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下的第一、二、三次反“围剿”和在周恩来、朱德同志领导下的第四次反“围剿”，都是以运动战歼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特别是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一路敌人被歼灭了，一次“围剿”也就基本上被粉碎了。就是在井冈山时期，自朱、毛两军会合形成红军主力后，也是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而现在我们只是一支游击队，我们一次最多只能消灭敌人一个营，或一个保安团。我们必须以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来粉碎敌人的“围剿”。游击战很难谈得上防御，也不能大量歼灭敌人；只能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实行敌进我进的方针。我们决定留下第二纵队和第五纵队就地坚持，其余主力部队迅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以积极的作战行动吸引敌人，调动敌人，并开辟和建立新的游击根据地。

9 月下旬，我们由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中心区南下，在龙泉道太以东敌军第六十七师和第十一师的接合部——蛤湖偷涉龙泉河，突破了敌人的云、龙封锁线，进入浙闽边境。

罗卓英是一只狡猾的老狐狸。当他查明我游击队主力已突围进入浙闽边境后，知道以数万大军追捕我分散活动的不足千人的游击队，无异“以拳头打跳蚤”，不能奏效。因此，除派一个师约五个团的兵力追堵我军外，仍将几十个团的大部队死死地箍住我纵横一百公里的浙西南中心区，企图彻底摧毁我游击根据地。

后来的实践表明，我们将两个纵队的兵力留在浙西南是留得多了。如果我们当时对敌情有足够的估计的话，主力部队还可以少留一些，留下的部队应该化整为零，采取武工队和秘密工作相结合的活动方式坚持斗争。

9 月 19 日，罗卓英开始血洗浙西南，前后延续八个多月，直到 1936 年 6 月“两广事变”爆发才结束。

我浙西南广大革命群众和挺进师第二、第五纵队，在黄富武同志为首的浙西南特委和军分区的领导下，在敌我对比众寡悬殊的极端残酷的形势下，浴血奋战，以生命和鲜血誓死保卫红色游击根据地，写下了悲壮的篇章。他们在扼守玉岩、住溪、王村口等地的时候，日夜同敌军以营为单位编成的“搜剿队”作战，英勇机智，往往使敌人付出了重大的代价。苏维埃政府干部为了争取时间安置伤员，发动群众砍倒树木，横断交通，并在山崖上造石楼（即滚木檑石）、扎口子，凭险打击敌人。他们在王村口的馒头岭就是这样阻击敌人达三昼夜之久，打得敌人无计可施，后来不得不绕到石练方向，爬上大乌尖从侧翼进攻，我军才放弃馒头岭，转移到第二个隘口御敌。敌人羞怒已极，焚烧了大小山路两旁的林木，漫天浓烟烈火，日夜不灭，并严密封锁，调整部署，紧缩包围圈。在反动地主武装的配合下，以梳篦方式漫山遍野来回“清剿”。10 月 30 日，黄富武等同志被捕后，形势更为严重。但同志们在人民群众的掩护下，掩埋好战友的遗体，包扎好自身的伤口，整理好战斗的组织，继续战斗。支队整编为大队，大队缩编为小队，主要领导干部伤亡了，基层干部接替指挥。最后剩下几个人，他们自动集合起来，选出指挥员，

重新与敌人周旋。秋去冬来，天寒地冻，他们穴居饮雪，挖田鼠窝找粮食充饥，夜以继日、出生入死地坚持，与前来搜捕的敌人战斗。其中如张麒麟、余龙贵、宣恩金、曾友昔、曹景垣、杨干凡、刘亨云等同志，克服了千难万险，直到几个月后，才同我们由浙南出击的主力部队胜利会师。

坚持根据地斗争的第五纵队，是以浙西南根据地革命干部、共产党员和青年积极分子为主体的第一支浙西南人民子弟兵。尽管这支部队组建得晚，训练较少，但指战员们的觉悟高，甘愿为保卫家乡、保卫红色政权、保卫土地革命而英勇献身。他们人熟地熟，给予敌人的打击分外沉重；可是也由于他们是本地人，社会关系多，面目公开，易于暴露，牺牲很大。他们不愧是浙西南革命史上光荣的代表。

一些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坚持斗争到最后一息。如龙浦县委书记方志富同志（化名张云龙），战斗到剩他一个人时，不幸左手负伤，他就凭着右手，轮换使用两支枪向敌人射击，最后在龙泉茶园坑壮烈牺牲。又如安岱后的陈凤生同志不幸被捕后，敌人把他押到龙泉，软硬兼施，要他招供，他坚不吐实，敌人又残酷地把他钉在墙上，他还是不屈服。末了，敌人绝望地把他枪杀“示众”。其他如卢子敬、陈丹山等同志，都为革命洒尽了最后一滴血。

敌人的烧杀惨无人道，对我们的同志不仅是枪击和砍头，甚至把烈士遗体当众“开膛”，割下心肝去下酒。被捕杀和活埋的基层干部群众不计其数。但是，敌人越残暴，革命军民的反抗越坚决。我浙西南革命军民在这场斗争中用生命和鲜血写下的壮丽篇章，将永留青史！

挺进师主力撤出浙西南中心区南渡龙泉河以后，敌人的追堵部队虽然只有五个团，不及其“围剿”兵力的六分之一，但是仍十倍于我，加上地方反动保安队和地主武装的配合，我军的处境还是十分艰难的。我们和追踪的敌人往返兜圈子，周旋于浙闽边区的景宁、庆元、松溪、政和、建阳、寿宁、福安等地，战斗频繁激烈。

10 月 5 日，我们在寿宁县境与闽东特委主要负责人叶飞同志等胜利会师。这是头一年我们抗日先遣队北上途经闽东与他们会师之后的又一次会师，群情振奋，十分欢快。随即，我们进到浙江泰顺县境，双方在交谈中，一致认为，敌人组建了一个“闽赣浙皖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统一指挥四省边区的反革命力量来对付我们，而我各红色游击区却互不联系，各自为战，这是很不利的。如果我浙江与闽东、闽北三个地区能取得密切联系，即使一时尚难统一行动，但只要能在战略上互相协调、互相策应，定可更有力地打击敌人。基于这一认识，双方领导人很快取得了成立“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的一致意见。经协商，临时省委由刘英、粟裕、叶飞、黄富武、刘达云、阮英平、范式人、许信焜、洪家云、方志富、许旺等 11 人组成，以刘英同志为书记，我任组织部长，叶飞同志为宣传部长兼少共临时省委书记；并相应成立闽浙边临时省军区，由我任司令员，刘英同志兼政委。

临时省委成立后，面对敌人不受调动、集中力量摧残我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反革命策略，我们立即着手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除令北渡瓯江的第一纵队加紧向浙东地区（即括苍山南北地区）发展外，重点放在开辟浙南地区的游击根据地。

浙南地区，主要是瓯江下游以南的广大地区，东濒东海，南接闽东，山岭连绵，地形险要。它比浙西南地区有两个更为有利的条件：一是从 1924 年起，这里就有党的活动，1929 年冬天以后的两年间，党在这里领导过武装暴动，红十三军的旗帜曾插到瓯江两岸的许多乡镇，在群众中留有很深的影响。此时在平阳、福鼎之间，已有闽东党的工作，可以互为依靠。二是这里离浙赣线较远，国民党统治势力比较薄弱。于是，我们由浙闽边向东北行动，攻下了瑞安珊溪镇，立足于瑞安、平阳、泰顺三县之间，以此为枢纽向东南和东北发展，一直打到瓯江南部直抵东海之滨。接着我们又出动主力，兜了两个大圈子，攻克了瑞平泰外围敌人许多重要市镇和据点，如景宁之东坑、梅岐、沙湾、渤海、大顺、小顺，文成[①]之南田、西坑、黄坦，瑞安的大岙（现为文成县）、玉壶、岙口、营前、高楼、湖岭、马屿、陶山、平阳坑，泰顺的百丈口、左溪、泗溪、仕阳，平阳的水头街、山门、腾蛟、营溪，福鼎的南溪等地。局面打开后，确定由刘英同志带少数短枪和省委机关在瑞平泰地区开展游击根据地的建设工作，由我率领武装部队，在浙闽边进进出出，从浙江打到福建，又从福建打到浙江，以此吸引和打击敌人，掩护和保护省委开展工作，支援浙西南地区的斗争。

从一九三五年九月到一九三六年六月，是浙南游击区经受严峻考验的重要时期。此时，我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暂时丧失了，但我们在浙南地区又开辟了大块的游击根据地；游击战则在浙西南、浙闽边、浙东、浙南更广泛的区域展开了。从总体上看，罗卓英三四十个团的“围剿”并没有打败我们，我们获得了新的胜利。

四、浙南党内的一些分歧（略）

五、第二个发展时期

从 1936 年 6 月“两广事变”爆发到同年 12 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浙南游击战争的第二个发展时期。从客观上说，“中央军”调走了，敌情逐渐缓和，从主观上说，是因为我们依据实际情况，适时地调整了政策，发挥了政策的威力。

我们把公开的武装斗争同隐蔽的群众工作更加有机地结合起来。前一阶段，我和刘英同志就常分开活动，我带大部队公开打游击，他带少数便衣武装人员做群众工作，双方紧密配合，工作比较顺当。逐步地我们把这种活动方法提到斗争策略的高度来对待，并使组织形式与之相适应。我们分别组成了“突击队”与“牵制队”。所谓“突击队”，也就是武装工作队。它的主要任务不是打仗，而是带领便衣队、短枪队坚持于基本地区，做发动群众的工作，进行游击根据地的建设。所谓“牵制队”，就是游击队的主力部队。它的主要任务是在广大范围内进行公开的武装斗争，牵制、吸引、打击敌人，以掩护和保卫基本地区，并发展新的游击区。刘英同志带

① 有误，1946 年析瑞安、青田、泰顺三县边区置文成县。

“突击队”与省委机关坚持浙南地区，我则带“牵制队”在广泛的地域公开打游击。

在我率领“牵制队”单独活动的过程中，考虑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了长期坚持敌后，形成比较巩固的游击区，并为主力部队提供更多的“落脚点”和“跳板”，我们不仅要有相对稳定的较大块游击根据地，而且在较大块的游击根据地的周围，还必须建立一些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和若干的游击基点；这些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基点，有公开的，有秘密的；在你来我往，敌人势力比较强大的地区，还应有“白皮红心”式的两面政权，使我们的整个游击区形成几种类型的结合。“突击队”的工作主要在中心区，我便决定把建立游击基点作为“牵制队”的重要任务之一，一面打仗，一面建设。我们在一些重要地区，选择条件比较好的村庄开始工作。几个或十几个有工作基础的村庄连成一片，就是一个游击基点，离开二三十里又建立一个游击基点，这样逐步向外发展。基点密集的，联系起来便成了一个小小的游击根据地。它的外围，还有分散的游击基点。这些游击基点和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开始还是临时性的，要经过斗争的考验和不断加强工作才能得到巩固和发展。

在游击区内，这种小的游击根据地和分散的游击基点之所以能够存在，除了有力的武装活动外，主要靠政策的威力。这个时期民族矛盾日益加深，我们吸取浙西南斗争的经验和教训，针对浙江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地主兼工商业者多的特点，对政策作了若干调整，以抗日、反蒋为前提，扩大团结对象，缩小打击目标。我们改变了打土豪的政策，把“没收委员会”改为“征发委员会”，征收“抗日捐”。比方说，到一个地主家里，如果他家里的人跑了，我们就根据部队的需要和他家负担能力的大小，给他写个条子，说明我们北上抗日，有了困难，需要他捐助多少担米，多少衣服和多少钱。假定我们希望他捐助两百元，便说明这次住在他的家里，吃了几担米，杀了几条猪，合计该扣除 50 元钱，便要他再送 150 元钱到什么地方去。地主回来，看到红军没有乱搞他的家产，是讲道理的，全家商量商量，设法把那 150 元钱送到指定的地点。这样，矛盾不激化。但也有的不送，我们就写信警告他，规定在某天某时把钱送来，并且规定了接头的办法。如再不送，不仅罚款，后果由他负责。当然也有顽固的，以为我们奈何他不得，就是不肯送来，那我们就需要采取比较强硬的办法对待。

如汤溪周村有个地主乡长，我们通知他要送 500 元抗日捐来。根据调查，他是完全可以负担的。但他不干。我们就警告他说：你拒不缴纳抗日捐，现在要另罚 500 元，合计 1000 元，如限期不交，定要惩处。他听了笑笑说：“想惩办我，谅他们没有这样本事！”其实我们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他的行踪，我们了如指掌。这一天，他出了门，我们的侦察员马上在半路上把他抓来了。他吓得要死。我们还是向他交代政策，要他交款。这一下见效了，他一回去，很快便把捐款和罚款共 1000 元全数送来了。以后他还到处宣传：“红军真厉害呀！……”这样，周围的一些地主在收到我们的条子后，大都及时认捐交款，不必动武。这就解决了部队的经费开支。

我们很重视群众的经济利益，注意发展山区经济。部队活动的地区大多是林木茂密的山区。我们的政策是支持竹木和山货出口，欢迎平原城镇的殷实客商进山做买卖，使商品流通，

山区经济得到发展。这样做虽然还不能满足基本群众的长远利益，但对他们近期生活的改善是有利的，因而得到群众的拥护，自觉帮助我们防奸防特，通风报信。这样做，也争取了一批资本家和工商业者。我们的一部分军需用品，就是由他们供应的。

我们还很重视团结争取知识分子的工作，向青年进行革命、抗日宣传，把进步青年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通过他们收集一些报纸和进步书刊。这些书报，是我们了解情况的一个重要来源。

在这小块的游击根据地里，政权是我们掌握的，但形式是秘密的。当然时间长了，也就成为公开的秘密了。

在敌我争夺频繁的边缘地区，我们建立“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这大体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争取原来的保、甲长为我们做事；另一种是把我们的秘密党员派进去当保、甲长。国民党和群众对立，不是那么了解情况，“白皮红心”可以存在得住。我们有广大群众的支持，谁个好，谁个坏，我们是有数的。对那些经常作恶的保、甲长，我们就给以惩办，惩办了几个，大批保、甲长就保持中立，真正坏的就孤立起来了。

我们所建立的小块游击根据地，可以举宣（平）遂（昌）汤（溪）边区为例子。

早在 1935 年 5 月至 9 月，当我们游击于浙赣线中段以南地区的时候，便已进入宣遂汤地区，并在门阵、银坑一带回旋。这一带地形甚好，以门阵为中心，坐南向北，背靠大岭，面对金（华）汤（溪）平原，群峰守望，竹木葱茏，位置重要。它不仅处于三县交界处，而且可以扼制三条交通线：其东有宣平至金华的公路，其西有丽水经遂昌至龙游的公路，北面有金华至衢州的铁路和公路，且有小溪由南向北通向金华，是竹木放筏必经之道。我们在这里打土豪，发动群众，开展工作，并在芝肚坑、龙葱、周坞、黄塘井、小洋坑、紫坑、溪口等十多个村庄，发展党员 20 余人，建立了党的支部和遂汤区委。罗卓英“围剿”时，我军主力向浙南转移了，由于该地区处在敌人包围圈外，工作又隐蔽，未受到严重摧残，门阵的群众，还掩护了我们一个伤员养伤达数月之久。1936 年秋冬，我们已经有了建立小块游击根据地的想法，就派人按新的精神去恢复工作。1936 年底和 1937 年初，先后有两支部队进入该地区。春节前后，在紫坑成立了党的宣遂汤工委，统一领导这一小块游击根据地的建设。由于执行了新的政策，经济上有一定的发展。如被群众称为“小上海”的中心点门阵，商业繁荣，平原上的客商带来大批布匹、医药等货物，用来交换山区的特产，使金华也在实际上成了我们的“军需补给基地”。那一带不少保、甲长是替我们办事的，区长、乡长往往保持中立。他们明明也知道我们一些情况，但他们权衡利弊，不向国民党当局报案，因为报了案，反而会受到其上司的责难和“进剿”军队的敲诈勒索，而且要受到我们的惩处，两头不讨好。从敌人方面来说，由于先前进山骚扰的部队遭到我们几次打击以后，也学“乖”了，小股的不敢再来，怕被我们消灭；大股的又上不来，因为道路艰险，给养困难，施展不开。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小小的但又确实比较稳定的后方。这个后方，在刘建绪的“围剿”时期，发挥了顽强的战斗力量，成为我们在浙赣线以南和浙西南地区坚持斗争

的重要基地之一。

这个时期，我们进行游击战的范围相当广泛，如从鼎平地区出发，经瑞安、青田、缙云、丽水到达浙西南。而在浙西南，又可以在龙泉、遂昌、汤溪、金华、宣平、松阳等浙赣线以南的一大片地区活动，东进可到永康、武义、东阳、仙居、天台，南下可到云和、景宁、庆元、寿宁、松溪、政和等浙闽边地区。总之，战场比较辽阔。我们常常把活动的重点放在对敌人威胁最大、对外界影响最大的浙赣线南侧，有时甚至打到武义汤恩伯的家乡，打到青田高市村陈诚的老家，而且逼近了蒋介石的老家奉化溪口。当然，到达这些地方是不容易的，特别是天台山以东，敌情就更加严重一些。有一次，我们准备去打溪口，敌人发觉了，派了三个团来堵截，我们不得不暂时向天台山以南转移，打了一个下午，赶了七八十里夜路，才甩开敌人。第二天，我们才又回头，继续和敌人兜圈子。

由于我们有了若干公开的、半公开的、秘密的游击基点为依托，部队打了仗，疲劳了，一个晚上的急行军便转到了游击基点。群众是我们的，封锁了消息，可以安安稳稳住下来，休整三五天，侦察好敌情，计划好行动部署，再跳出去打击敌人，开展工作。浙南基本区，是我们的大后方。有时我们也跳到那里去，在那里打击进犯的敌人，或者作较长时间的休整。这样，如鱼得水，我们的活动比前一阶段自如多了。

此时，浙南根据地的建设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前面已经提到开辟浙南游击根据地是从 1935 年秋挺进师主力跳出包围圈，进入浙闽边，同闽东的同志会师后开始的。首先开辟了瑞平泰地区，接着闽东同志为了相互支持，利于机动，将原属闽东特委的鼎平中心县委（在福鼎、平阳、泰顺边界）划归浙南，使浙南游击根据地的范围扩大到浙闽边境东段。“两广事变”发生后，我们利用敌情缓和之机，在牵制队的掩护和策应下，首先集中力量打通了根据地内各县、区之间的联系，使各基本地区连成一片，然后又调集一批力量，发展新区，扩大根据地范围，打通了温州沿海的交通口岸。1936 年 8 月，我们又与活动于平阳北港地区的一支革命力量会合，这支革命力量是由老共产党员叶廷鹏同志为首组织起来的。原来他在与党失去了联系之后，仍然在那里联络群众，坚持斗争。当挺进师进入浙江，革命形势有了发展时，他又进一步团结了何畏、吴毓、陈铁军、杨进、黄耕夫等一批革命青年，并与北港凤翱乡的群众领袖郑海啸同志一起，在平阳北港和瑞平边创建了一块纵横三十多里的秘密工作地区。他们主动要求闽浙临时省委领导，这样就使浙南游击根据地的范围，由平阳南港扩大到平阳北港一带。1936 年 11 月，我根据地的幅员由浙闽边境东段向北扩展，一直扩大到飞云江中游的南北两岸，包括瑞安、平阳、泰顺、福鼎，以及青田、景宁、丽水、寿宁、霞浦、庆元、永嘉等县的部分地区，纵横五百余里。为加强党政领导，全区成立了浙南和浙东南两个特委，并先后成立了福鼎、平阳、泰顺、桐霞、霞鼎太、鼎太、瑞青泰、永瑞青、庆景寿、丽云边十个县委和一个瑞平泰中心县委，成立了浙南人民革命委员会。

在根据地内，普遍建立了党、团基层组织和贫民团、工会、妇女会、少先队等群众组织，建

立和发展了地方武装和群众武装。一批地方干部在斗争中迅速成长，如郑丹甫、周钦民、林辉山等同志，后来各担负起了一个县的领导职务。这时的浙南游击根据地，又如头年夏秋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那样了，“党、政、军、民、学、工、青、农、妇、儿”搞得十分红火。

浙南游击根据地建设的基本政策，仍是继续贯彻土地革命的纲领，打土豪、分田地，开始是领导群众开展抗租、抗债、抗捐、抗税的“四抗”运动，进而发展到在一些中心区实行包括青苗在内的土地分配。此后，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逐渐高涨，适当地调整了对敌斗争的政策和口号。如对国民党的乡、镇、保长由镇压改为争取；地方士绅和中等商人，中立的允许自由来去；把“穷人不打穷人”的口号改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把“欢迎白军士兵杀死官长拖枪当红军”改为“欢迎白军官兵枪口对外和红军共同抗日”，等等。同时还开展了争取城市知识分子的工作。

活跃于浙东地区的游击队，出没于瓯江北岸的仙居、温岭、三门、天台、东阳、永康、缙云、丽水之间的广大地区，并以永缙边的金竹绛、黄弄坑为活动中心，建立了党的浙东特委，在特委的领导下，建立了几个县委，各县委都有自己的武装。其活动区域，主要是仙居、天台、东阳、永康、缙云五县交界的大盘山一带。由于敌人感到威胁很大，视为“心腹大患”，特地成立了一个“大盘山绥靖专员公署”来对付我们。可是他们消灭我军的企图始终未能得逞。开始，刘达云、张文碧、范连辉带着部队在这里坚持，以后，张文碧同志到了第二纵队，刘建绪“围剿”时，刘达云叛变了，浙东特委的工作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但范连辉同志顽强机智，把散失的部队集中起来，继续坚持斗争。

一度丧失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这时又得到了恢复，重新组织了浙西南特委，重建了龙浦、龙遂、江浦三个县委及其下属的王村口、住龙等若干区委，在挺进师主力的掩护下恢复工作。他们接受了头年遭受挫折的教训，考虑到浙西南为敌人三省通道，势所必争，决定以秘密工作为主。这样，表面上看起来不如过去轰轰烈烈，但工作更扎实了，干部和群众更坚强了，对付敌人的“围剿”也更有办法了。

1936 年底，挺进师再次由几百人发展到一千五六百人，地方游击队和群众武装达数千人。我们的活动范围扩大到了温州、台州、处州、金华、衢州、绍兴地区所属的三十几个县境。我们有了象浙南这样的比较巩固的大块游击根据地，还有了如宣遂汤边区及青瑞边的梅山、李山，飞云江边的五云山等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和大量的分散的游击基点，做到了公开的秘密的互相支持，互相掩护。部队打游击的经验也丰富起来了，可以分散发动群众，也可集中打击敌人，我们在浙江又打开了一个大发展的局面。

六、第二次反“围剿”

1936 年冬，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红军三大主力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西安事变”的发生，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反共内战的条件。

可是，国民党蒋介石为了消灭我南方红军游击队及游击根据地，加紧了在“西安事变”以前已经策划的对我南方游击区的“围剿”。他任命第四路“剿匪”总指挥刘建绪接替上台还不到两个月的张发奎担任闽赣浙皖四省边区主任，又派国民党 cc 系骨干分子朱家骅接替黄绍竑任浙江省主席，还调浙江省保安处副处长蒋志英到温州地区主持“剿共”。

敌人的这次“围剿”，又以浙南游击区作为其闽赣浙皖四省边区的主要进攻目标。1936 年 12 月 15 日，刘建绪由杭州赴江山“四省边区总指挥部”接事，随即调集主力部队六个师、两个独立旅及地方保安团共 43 个团，开始筹划对我进攻。由于这时我游击区的范围已大为扩大，刘建绪已不可能采取罗卓英包围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方针，他采取了拉网式的由北而南、由西而东、由外围到中心的逼进包围的方针，企图先将我军向东南压迫，然后，在浙南包围聚歼。他以第六十三师等部由浙赣路一线压我向南；以新五师、第五十二师及赣、闽保安团布置于江（山）浦（城）公路及松溪、庆元、政和之线，由西迫我东移；第五十六师由闽北伸向庆元等地；独立第九旅控制飞云江；泰顺有两个保安团；温、瑞、平为第十九师，福鼎有第八十师一个团。在浙闽边界，构筑了稠密的碉堡工事，专门组织了一个“浙闽边清剿指挥部”，任命第十九师师长李觉和永嘉保安司令许蟠云为正、副指挥官，企图切断我向福建方面机动的道路，将我逼迫到沿海地带的一隅再加以歼灭。此外，他们又强迫群众组织“联甲”及“剿共义勇队”、壮丁队，协助军队“进剿”，还采用移民并村手段，焚烧边区零散的房屋、茅棚，居民的油盐柴米按人头逐日配给，企图以此把群众和红军隔开，实现其“竭泽而渔”，消灭红军游击队的梦想。

当时，尽管我们对抗日高潮到来的可能有所预计，但对“西安事变”和紧接着的一连串政治事件的发生，还不能迅速作出准确的判断。在新形势的激励下，我们对当面的敌人发动了勇猛的进攻，想以此加快革命形势的发展。这次主动进攻，又一次暴露了我们的力量。不久，刘建绪向我大举进攻，我们的头脑才逐渐冷静下来，认识到蒋介石企图在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之前，一举将我南方游击队全部消灭。这实际上是国共双方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军事上的最后一仗。在强敌的进攻面前，为了保存红军游击队，坚持武装斗争的旗帜，坚持战略支撑点，我们确立了自己的指导思想，这就是：必须把隐蔽精干、保存力量同机动灵活、积极作战的方针统一起来。

针对敌人“大拉网”的战术，我们采取与敌人相向对进、易地而战的打法。敌人梳过来，我们钻过去；你要我的山头，我要你的后方。为对付敌人大规模的“围剿”，作战单位逐渐分散，由开始百把人集中行动，逐渐分散到几十人、十几人，甚至几个人。但这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往往根据敌情与任务，有合有分，好在大家都已锻炼成为游击好手，可以组自为战、人自为战了。

这个时期是我们在三年游击战争中作战最为频繁的时期，也是我们运用游击战术比较成熟的时期。我们以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总结的十六字诀为指导，结合实际，经过无数次的作战实践，总结了一套经验。

我们把游击战术在浙南游击区的运用，归纳为六条原则：（1）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胜

利；⑵不在消灭敌人，而在消磨敌人；⑶支配敌人，掌握主动；⑷积极进攻，绝少防御；⑸飘忽不定，出没无常；⑹越是敌人后方，越是容易成功。

在作战、行军、宿营等等方面，也都摸索到了一套要领。例如在作战行动上，我们总结出这样的要领：⑴反敌人之道而行，并竭尽欺诈之能事，敌进我退，敌集我散，敌大我避，敌小我欺，避实就虚，声东击西；⑵不要企图太大，只要常有小胜；⑶站在敌人侧翼、后方和圈子外围，不为敌人所合击；⑷一切作战行动必须迅速、勇猛、坚决，迟疑犹豫就等于等死；⑸注意使用突然的白刃袭击，只要枪弹一响，刺刀就要杀到敌人的肚皮上去。隐蔽我们的行动和企图是我们的一条重要原则。我们总结了兜圈子、大小圈、“8”字形、“S”形、电光形、回马枪、东去西返、早出晚归等许多方式，做到飘忽不定，出没无常，使敌人无法捉摸。行军沿途的痕迹要留专人殿后负责清除，压倒的草要扶起来，脚迹要抹掉，有时则在与我们行动相反的方向弄出痕迹，迷惑敌人。

部队宿营，一般不住大村庄，大村庄道路多，不便于警戒，宿营多半选择小村庄，最好是独立砖瓦屋，不住没有后门的房屋。那时我们实行“五班制”，每到宿营地，支队部住中间，东、南、西、北各放一个班。哪个方向发现敌情，就由哪个方向的班抗击，掩护支队部和其他班转移，完成任务后，到预定地点集合。每天都要规定两个集合点，如果第一个集合点有敌情，就到第二个点去集合。为了适应分散游击的需要，指挥机关就是我带的一个班。这个班的成员有参谋、警卫员、卫生员、绘图员、司号员、炊事员、理发员等等。他们既是专业人员又是战斗人员，既执行本身的职务，又站岗、放哨、侦察、打仗，很精干。各支队也是这样。

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就要调查地形道路，天天调查。从驻地出发，前边有条岔路，右转弯是到哪里去的？左转弯是到哪里去的？把大路小路都问得清清楚楚。这样，即使在路上碰到敌人，我们也有办法跟他兜圈子。部队进入一个新地区，开始道路不熟，免不了要找向导。向导要可靠。向导既给我们带路，又是我们的宣传对象。每次找到向导，部队的领导人都要亲自谈话、查询、慰问。到宿营地后，不能立即遣返，以免走漏消息；而应在我们转移时，才能将向导辞去，并且要做好工作。

我们还要从敌人那里了解情况，经常找报纸看，作些分析判断，也偷听敌人的电话。有时为了掌握敌人某一个县的兵力部署和活动情况，我们就去袭击一个乡公所，把乡长抓来，叫他给县长打电话，说他这里很紧张，请县里赶快派部队来。县长回话说：哪里还有部队？！县里的部队都开到那里去了。这样，我们就达到了目的。

积极进攻是游击战术的一大特色。敌人进攻我们，我们是被动的，迅速转移，不同敌人决战；我们进攻敌人，是有计划的，只要情况不变，坚决打。运用最多的作战形式是袭击。

敌人的后方是我们袭击的主要目标。我们袭击的主要对象：一是蒋政权的基础或爪牙，我们常常神出鬼没地捉敌人的保、甲长，造成当地统治者的恐慌与动摇；一是捕杀敌军的哨兵和侦探，使敌官兵惊恐，哨兵不敢放哨，尖兵也不敢当。敌人的兵力过于集中，不好下手，我们就

搞他落伍掉队的，打他的“尾巴”，或者叫“截尾子”。我们有个办法：敌人行军，要在岔路口做路标，我们就事先在岔路上布置好埋伏，等敌人大部队通过，只剩下“尾巴”时，就移动路标，将敌人的“尾巴”引入我们设伏的地段，把他们通通俘虏起来。

破坏敌人的通信是我们经常的作战活动。浙江大部分县城都通公路，乡乡通电话。敌人用电话传递消息，用汽车运送部队，都很快。破坏公路桥梁，没有烈性炸药，用黑色炸药只能炸一个坑，不起作用，所以我们主要是破坏电话设施。开始时，我们把电线杆齐根锯断，过后，敌人把锯断的杆子埋起来，电话很快又架通了。后来我们再去，就扛两条凳子，站在凳子上把电杆拦腰锯成两截，使两截木杆都不能用作架线，这就不容易迅速修复了。

当敌人进攻时，为了避其锋芒，我们坚决迅速转移。有时多路敌人向我们进攻，我们还利用有利地形和两路敌人互不联系的条件，导演“鬼打鬼”。如在一个高地上向两面山脚的敌人射击，等两面的敌人都向我反击时，我便从一侧秘密转移，使两面的敌人自相冲杀。这样不但能够消耗和削弱敌人，而且可以扩大敌人内部的矛盾。

但是，由于敌人太多，遭遇战还是经常发生，惊险的场面也常出现。有一次，敌人向温州以西“围剿”，我们由庆元、景宁之间北进，在云和附近过了龙泉河，再向北，还要过松阳溪。在这一段，龙泉河由西向东，松阳溪则由西北流向东南，在丽水的大港头、碧湖之间两溪会合，形成一个三江口。龙泉河南岸有一条由龙泉到丽水的公路。我们过公路的时候，遇到敌人一辆汽车，部队看到就打，没有打到，汽车跑了，却引来了敌人。我们过龙泉河后继续北进，准备过松阳溪。当晚，天降暴雨，引起山洪暴发，小小的松阳溪，突然变得又宽又深，天黑得看不见路，找不到渡口。天亮后，敌人来了，把我们卡在两溪之间的二三十里地的“三角架”里。开始，我们故意折回向南，敌人追，我们突然掉头向北，打回马枪，敌人闪开，我们乘机跑到溪边，发现了渡口，有条船，没人管。我们马上上船准备过渡。刚上船，隐蔽在旁边房子里的敌人就钻出来了，向我们猛烈射击，我们这才发觉中了敌人的计，便跳下船，沿着溪边，边打边跑，躲过了这股敌人。可是敌人一下子调来大部队向“三角架”包围过来，那真是紧张极了，困难极了！不得已，我们钻进刺丛里躲起来。不久，敌人就围上来了，到处搜，一边搜，一边喊：“看到了，我看到你了，赶快出来！”我们知道，这是敌人虚张声势，我们下了决心，把驳壳枪子弹上了膛，敌人不到面前不打。敌人一到，我就一个拼一个！由于敌人在明处，我们在暗处，敌人怕挨我们的冷枪，也不那么大胆，加之大雨不断地下，下到天黑，敌人坚持不住了，走了。我们出来继续向北走，到了溪边。好在我们都会游泳，就组织泅渡。上了岸，到处有敌人的游动哨，每隔五里十里，总要碰到敌人。但我们终于巧妙地通过了敌人的封锁，冲出了包围圈。这一天一夜，急行军一百八十里，连打七仗。

又有一次，敌人把我们追到一条山沟里，前面又碰到一个据点拦住。怎么办？也是情急智生，大家就化装迷惑敌人。那时，我们和敌人穿一样的灰军装，就是帽子不同，我们是红五星八角帽。同志们把袖管和裤管卷起来，把帽子拿到手里当扇子扇风，一直朝敌人的据点门口冲。

敌哨兵问:“你们是哪一部分的?”我们就说是什么保安团的,从那里来,到那里去,说的没有漏洞,他就放我们进据点。我们进去后,连忙从后门出去,当敌人发觉有诈,从后面追上来时,我们已经安全地通过了敌人的据点,脱离了危险区。

还有一次,我们住在瑞安县平阳坑的半山腰,布置了警戒。不料,敌人熟悉道路,绕过了我们的哨兵爬到我们的上面,居高临下地把我们往坎下打。山下是飞云江。我们下到江边,如果过江到对面去爬山,敌人要打我们的背,只好顺江而下,下游有个旋磨渡,那儿有一个石山嘴子伸到江心,我们想由此过江,可是刚一下水,我就被一个大旋涡卷进去了,旋转力太大,来回转了三四个圈子,还是划不出来,真是危险极了,再划不出来就会被旋涡吸到水底去。幸好后面的同志赶忙递个伞柄给我攥住,才把我拉上岸。刚上岸,敌人已经从后面打过来了。我们就你推我拉地从石壁攀上悬崖,好在天黑,我们不动,敌人没有发现。等敌人从我们下面追过去了,我们才又从敌人的屁股后面打过去。

在整个三年游击战争中,我们的处境都十分艰苦,这个时期就更为严重了。虽然山高林密,我们可以隐蔽,但敌人也摸出了一些对付我们的经验,前堵后追,有时我们整日整夜都在跑路,中间还要打几仗,有时甚至几天几夜得不到休息,搞得精疲力竭。记得有一次,我们连续走了三天三夜,最后到了金华附近的秘密游击基点,在革命群众的掩护下,我一觉睡了差不多40个小时。三年中,我们在浙赣路以南,天台山以西,浙闽边以北,差不多大、小山头都走遍了,而且很少走大路,多走羊肠小路,有时根本不走路,走山埂或水沟,使敌人看不到我们的脚印,无法追踪。吃饭的问题很严重,一连几顿饭吃不上是常事。有时候,敌人的“围剿”稍微松一点,我们可以在树林里烧饭吃,但又苦于没有炊具。那时,我们每人有一只搪瓷缸子,既当锅,又当碗。到了宿营地,放半缸子米,半缸子水,用草枝一盖,烧起火来。大家围着火烤一烤衣服,有时就倒在篝火旁睡一睡。睡醒起来,饭已熟了,就开饭。但有时敌人“围剿”很紧,怕暴露目标,不能生火,只好吃生谷子。生谷子吃了不消化,大便拉不出来,没办法,只好互相用棍子扒肛门。

有了伤员更不好办。那时我们的卫生人员不多,药品也很缺乏,有了重伤员,只能安置在群众家里。自从敌人搞移民并村以后,困难更大,不能抬着伤员行军打仗,寄到群众家里,又怕敌人搜查时连累群众,藏进山洞也不安全,因为山洞是敌人搜查的重点目标。怎么办?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向死人“借房子”,把棺材打开,把里面的尸骨搬出来,垫上干草,把伤员放进去,暂时隐蔽、养伤。至于负了轻伤,只能坚持跟队。有一次,我伤了脚踝,没药敷,就用苦菜叶子贴起来走路,贴了两个月才好。总之,生活很艰苦。在那三年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里,部队大部分时间是露营,青天作帐,大地当床,很少脱过衣服睡觉,经常和衣而卧,“枕戈待旦”。

在抗击刘建绪43个团的“围剿”中,贡献最大、牺牲最大的是浙南的广大革命群众。他们中的一些优秀代表,把革命的希望、未来的理想,全部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工农红军身上。他们以崇高的品德和视死如归的气概,保卫着共产党,保卫着我们的干部和军队。据当地同志介

绍，平阳五凤乡半山村的共产党员、游击队长潘世雅和他的妻子——地下交通、共产党员王玉英，在“反清剿”斗争中不幸被捕，潘世雅遭敌人枪杀，王玉英为保护党和红军的机密，乘敌人的警卫懈怠时，毅然用剪刀剪断自己的舌头，使敌人无法从她的口中获得任何材料。燕田一位游击队员被捕后，敌人把他押到了云和七溪，吊打、熏辣椒粉、坐老虎凳，受尽了酷刑，但他始终坚强不屈，直到被敌人枪杀，没吐露党和红军的半点真情。我军从泰顺太平区根据地转移时，双溪口村党支部书记黄明星和他的妻子卢桂莲，动员群众，将几十个伤员分散隐蔽治疗，不久，他俩先后被敌人抓去，严刑拷打，逼他们交出伤员，夫妻俩守口如瓶，没露半点破绽。后来，这批伤员在群众的掩护下，全部养好了伤，安全归队。这些数不清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鞭策着我们这些幸存者，也教育着我们的后代，应该继承他们的业绩，无愧于这些平凡而伟大的无名的和有名的革命英雄。

在艰难而壮丽的革命征途中，正如大江奔流，难免泥沙俱下。在三年游击战争期间，我们的队伍里出现了少数的叛徒。他们给革命事业带来了损失，个别领导人的叛变所造成的损失是重大的，然而它没能阻挡伟大革命事业的前进。而那些叛徒们的卑鄙行径，则永远为人所不齿！

刘建绪的“围剿”，虽然动用的总兵力比罗卓英那次的“围剿”更多，但是，我们反“围剿”的有利因素也有增加：第一，由于我游击区的范围已大为扩大，刘建绪的兵力与罗卓英集中于浙西南的兵力相比，相对说来没有那样密集了；第二，经过前一时期的工作，我们的社会基础更巩固、更广泛了，各大、小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基点的互相策应，加强了我们抵抗敌人的力量；第三，全国形势的变化，曾迫使刘建绪一度放松“围剿”的进程，这对我们也是有利的。因此，尽管浙南游击区的中心地区遭受的摧残是十分严重的，但是几块游击根据地还是坚持下来了，而且保存了较多的干部。浙南这个战略支点，坚如磐石。

七、迎接抗日高潮

在国民党的封锁与“围剿”之中，我们的处境虽然极其艰苦，但北上抗日的意志仍很坚定，大家非常关心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希望及时了解党的方针和政策。

由于我们早就失去了同党中央和上级党的联系，所以我们每到一地，就千方百计搜集敌人的报纸，从字里行间了解情况，分析形势；并且通过各种社会关系、特别是通过青年知识分子，搞来上海等地的进步刊物，如邹韬奋办的《大众生活》，从中体会党的方针、政策。当我们看到党中央 1935 年 8 月 1 日发布的《八一宣言》和 1935 年底提出的《十大纲领》等重要文件的精神后，使我们对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总路线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我们马上组织学习和宣传。对内，给指战员上形势课，进行思想教育；对外，发表宣言和公开信，说明斗争形势，宣传我党关于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表明我们的立场和态度。在游击战争那样艰苦恶劣的环境里，我们没有忽略过共产党人所肩负的政治责任，对于一些重大政治事件，都力

求从我们自己所能理解的水平，表明政治态度。例如，当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消息传到我军时，已是1936年1月了。我们当即发表宣言，表示积极支持。1936年6月发生了“两广事变”，当时我正带着挺进师主力转战于浙西南和浙东一带，刘英同志带领“突击队”在浙南开展秘密工作，尽管双方没有联系，但是，都分别发表了反对军阀内战、要求团结抗日的宣言。回想起来，那时我们的思想还是比较能够顺应革命形势的发展的。

1937年春，经过多方努力，临时省委同上海党组织建立了联系，接着又经过上海党与中央取得了联系，这对于指导浙南游击区的斗争，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但遗憾的是，那时我已同临时省委失去了联系，仍然处于闭塞的状况之中。

1937年5月之后，刘建绪对浙南的“围剿”进入最严重阶段，其残暴程度达到了高峰，真是黎明前的黑暗。但是，此时民族矛盾已空前激烈，“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相继爆发。而我红军主力北上已胜利到达抗日的前进出发地，南方八省的游击根据地的革命红旗始终屹立不倒，全国人民包括海外侨胞又以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斗争紧密配合，国民党蒋介石迫于形势和全国抗日运动高涨的压力，其“北和南剿”的反动方针再也不能推行了。

1937年9月，我们正在门阵地区活动，由于消息闭塞，还不知道国共两党已经实现第二次合作。这时从金衢平原上不断传来各种消息和谣言，说什么“共产党投降了，红军被收编了”。经过仔细分析，我们觉得可能是国共合作了，便派了一支小部队出去调查。这支小部队化装成国民党军队，大摇大摆地开到龙游县溪口镇，进入镇公所，自我介绍说：“我们原在山区剿匪，现在奉命开赴抗日前线，要给县长打电话，了解情况。”镇长帮助给县长挂了电话。县长说：“现在国共合作啦，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要开拔抗日了……”他们问明了情况，收集了些报纸，便返回汇报。

我们开了个会，把部队集中起来进行动员教育，同志们听说国共合作了，要抗日了，觉得从1934年7月已接受的先遣抗日任务，很快就能得以执行，都很兴奋。我们要求大家百倍提高革命警惕，严防发生意外。稍后，又给国民党遂昌县政府写了信，要他们派代表来同我们谈判。

不久，国民党遂昌县政府派了一个代表来到门阵，请我们下山进城，我们向对方严正表示：为了共同抗日，我们愿意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停战谈判。同时告诉对方，第一，我们将开赴浙南根据地，沿途不得留难；第二，我们已经停止了打土豪，要求对方给我们补充弹药、给养；第三，合作不是投降，改编不是收编，双方是平等的合作，要保持我军的独立性，我们不进城。对方表示，愿意回去报告，并尽快答复我们。

鉴于这次谈判可能成功，为了积极迎接民族民主革命高潮，我们即令部队集中于门阵，在小溪右岸驻扎下来，进行政治形势教育，开展练兵活动。与此同时，宣遂汤工委也向群众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教育，并发动群众为部队筹办给养，缝制新衣。

过了几天，国民党答应了我们的条件，欢迎我们下山。同时了解到临时省委已同国民党浙

江当局达成了停战协议。我当即决定集中部队开赴浙南平阳，与刘英同志等会合。我们在门阵村头的白沙庙召开了军民联欢会，向群众告别，还请木偶剧团来为群众演出。群众欢天喜地，真象过节一般。

我们终于依依不舍地告别了门阵乡亲，翻山越岭，沿着崎岖的山路南下，绕过遂昌县城，经过石练、湖山、王村口、大潘坑、船寮、青田、大岩，到达飞云江南岸，和刘英同志派来的联络员相遇了。随即一同奔赴平阳北港和刘英同志等胜利会合。这时，我们才知道了闽浙临时省委同国民党谈判的一些情况。

临时省委在同上海党组织取得联系后，逐渐了解到党中央关于联蒋抗日的主张。1937 年 4 月，在刘英同志主持下，以临时省委和省军区名义向浙江国民党当局发出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文电。其时，刘建绪已奉蒋介石之命，在报纸上公开表示，要和我方谈判。双方代表在鳌江进行了三天的谈判。在谈判中国民党代表妄图以和谈为名，迫我投降。我方代表表明了合作抗日的严正立场，揭露了敌人的罪恶阴谋。对方见其阴谋不能得逞，便拿出蒋介石“停抚进剿”的手令相威胁，谈判随即破裂。在全国抗日高潮到来后，刘建绪复于 8 月间给临时省委送来亲笔信，要求和我方重开谈判。临时省委遂派代表到温州同国民党浙江当局谈判。9 月 16 日双方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

实现两党合作抗日，这是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两个革命战争时期的转变。从浙南地区来说，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还比较自觉。在同国民党的谈判中，我们坚持了原则立场，国民党在军事斗争中没有取得的东西在政治斗争中同样没有得到。

挺进师分散游击于浙南各地的游击队先后集中于平阳北港山门街。记得有范连辉、周瑞球、舒雨旺、杨立才、刘亨云、张文碧以及何畏、陈铁军等同志带领的各路部队，共四五百人。这个数字，和 1935 年初挺进师挺进浙江时的人数相当。但其成员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原七军团、十军团的老骨干不太多了，充实了许多新的血液。有浙西南、浙南和闽浙边的一批工农子弟兵，有温州、上海等城市的知识青年。我们的装备虽然不算好，可是作战经验丰富，战斗力是很强的。这支部队随即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浙闽边抗日游击总队”，下属三个支队和一个教导队。为了加强抗战力量，我们在大墩村举办了党员干部训练班，在山门街畴溪小学开办了“抗日救亡干部学校”。部队补充新兵，加强训练，就地开展群众工作。此时，省委又派了吴毓、龙跃等同志去与中央联系。

这时，新四军军部已在南昌成立，以后又迁至皖南，来电命令我们赴皖南集中。3 月间，东南分局组织部长曾山同志来到了山门街，向我们传达上级的指示，并一同研究了部队进一步整编的问题。党中央对南方各游击区的安全和巩固问题十分重视，一再强调这是“十年血战的结果”，是“今后抗战和进行革命斗争的重要战略支点”，无论如何不能放弃，一定要保存。当时，日军有在温州沿海登陆的可能，为了准备在日军登陆后在闽浙赣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并防止国民党当局再次背信弃义，发生变故，决定由刘英同志主持浙江省的工作，带领部分武装人

员和干部继续留在浙江坚持斗争，由我带领“抗日游击总队”开赴皖南参加新四军的战斗行列，还以抗日救亡干部学校的部分人员组成战地服务团，随部队行动。

一切安排就绪，刘英同志便和曾山同志一起先赴东南分局。我和刘英同志从这里分手后，就没能再见面了。我们是从 1934 年开始在一起工作的，共同经历了北上抗日先遣队和三年游击战争这两段艰难的历程。1942 年春，刘英同志在温州被捕。他在狱中，顽强斗争，坚贞不屈，于 5 月 18 日被蒋介石下令杀害了。他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革命事业。刘英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人民将永远纪念他。

3 月 18 日，我们由平阳山门出发，欢送的人群是饱含深情的。浙南游击区的革命群众，三年来哺育了我们游击队的成长，不少人以自己的生命换取了我们的新生。现在，新的革命使命在召唤着我们，大家都要为迎接新的任务而战斗了，这样的分别又是很有意义的。

在我们途经瑞安、泰顺、丽水、松阳、遂昌、龙游、衢县、常山、开化、屯溪等县境时，都曾派人去同国民党当局交涉，要求立即释放“政治犯”，使一批被国民党逮捕和迫害的同志得以出狱。在北进途中，部队受到各阶层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与慰劳。这时的政治形势已与几个月前大不相同，各地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汹涌潮湃，许多地方都成立了“抗日自卫委员会”，浙南、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群众正在以当年创建根据地那种热情和气派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当我们部队收到他们的传单和慰问信时，感到非常鼓舞。到达龙游以后，同志们要求乘火车到衢州。经过交涉，上了火车，一声汽笛长鸣，同志们的心随之飞到了抗日前线。我们行军一个月，到达歙县岩寺，加入了新四军的战斗行列，整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三营。

浙南三年游击战争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我们在失去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领导的情况下，经历了由正规军到游击队和由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两次转变，又经受了国民党的一次“进剿”和罗卓英、刘建绪两次几十个团的“围剿”，领导同志之间又产生过严重分歧。但是不管形势怎样险恶，鼓舞我们的强大精神力量始终是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革命事业的坚强信念，相信我们的革命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总是要胜利的，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信念，推动着我们从失败和挫折中接受教训，推动着我们在新的斗争中逐步走上成熟，走向新的发展。三年，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但成果也是丰硕的。第一，在敌人的心腹区域沉重地打击敌人，较长期地吸引和牵制了敌人相当数量的兵力。仅以我们进行的两次反“围剿”为例，就先后吸引、牵制了罗、刘两敌各三四十个团的兵力，历时各达八个月之久。其间对敌人力量的消耗与打击是难以用数字表达的。一方面，党中央和主力红军的长征和南方各游击区的斗争牵制了敌军的主力，这是对浙南游击区斗争的有力支持；另一方面，浙南的斗争，无疑在一定程度上策应了党中央和主力红军的战略行动，也在一定程度上配合和掩护了邻近兄弟游击区的斗争。第二，努力宣传党的路线和政策，扩大党的影响，在敌人的心腹地区发动群众，推进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并把浙南建成为中国革命在南方的一个战略支撑点。这个战略支撑点，在以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三，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培养、锻

炼和储备了一支经验丰富的战斗队伍，成为组建新四军的部分骨干力量；并把“先遣抗日”的旗帜胜利地插到了江南敌后，报偿了党和人民四年来所寄予的殷切希望。

浙南三年游击战争的胜利，是许多党的优秀干部、战士和革命群众鲜血、意志与生命的结晶。挺进师政治部主任（后兼任浙西南特委书记）黄富武同志，领导浙西南反罗卓英“围剿”，于1935年10月30日被俘，坚贞不屈，蒋介石亲自下令，1935年12月12日下午二时许，被杀害于丽水南明门外；师宣传科长王维信同志，于1935年4月底，在斋郎战斗中负重伤牺牲；师组织科长兼地方工作科长（浙西南特委第一任书记）宗孟平同志，于1935年5月在龙泉茶岙岭战斗中牺牲[①]；第一纵队前后两任纵队长朱宝芬、王屏两同志，在开辟浙东地区的斗争中牺牲；第二纵队纵队长李重才同志和政委洪家云同志在反罗卓英的“围剿”时，在浙西南战斗中牺牲；第三纵队纵队长刘汉南同志，1935年9月26日在安仁镇赤源坑战斗中牺牲；第三纵队政委兼龙浦县委书记方志富同志前面已经提到，他于1935年10月7日在龙泉茶园坑战斗中牺牲；第四纵队纵队长王裔三同志和政治委员会李凡林同志，在游击于闽北根据地时牺牲；六支队政委王春华同志，于1935年10月14日在英山附近的战斗中牺牲；还有如地方工作团团长、浙西南特委副书记杨干凡同志，工作干部朱干、杨林同志，第三任浙西南特委书记许信焜同志，以及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陈凤生、卢子敬、陈丹山等同志，都为坚持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洒下了最后一滴血。还有更多的，我不知道的无数的无名英雄。这些有名的和无名的英雄，他们的革命精神是永垂不朽的！1937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对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中庄严地指出：“……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以后，在极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的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致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主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我以为三年游击战争中英勇奋斗而牺牲的烈士们，是夺取这些胜利的最光荣的功臣！

（摘自《粟裕回忆录》，作者系红军挺进师师长、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组织部长）

① 经考证，宗孟平于1935年7月7日在浦城、遂昌边境的横源坑（属浦城县忠信乡）遭敌袭击牺牲。

历 史 的 丰 碑

——纪念红军挺进师入浙创建浙西南革命根据地80周年

中共丽水市委党史研究室

1935年初，在中央红军主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中国革命形势陷入低潮之时，红军挺进师临危受命，孤军深入国民党统治最严密的浙江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浙西南革命根据地，重燃浙江革命烈火，开展和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挺进师的斗争，不仅从战略上策应了中央红军主力长征，支援了邻近游击区的斗争，而且重新开创了浙江革命基业，打开了浙江团结抗日的新局面，还为中国革命输送了一支劲旅，实践总结了一整套游击战略战术，是中国革命史上一座不朽的历史丰碑。

一、临危受命，誓死挺进浙江

1934年5月，由于中共中央“左”倾错误的影响，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面临失败，中央红军主力将被迫退出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为此，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于6月下旬令红七军团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深入闽浙赣皖国民党统治区的深远后方，宣传推动抗日运动，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调动围攻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掩护中央实施战略转移。7月7日，先遣队从江西瑞金出发，开始千里转战。10月17日，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8.6万余人，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开始长征。

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后，历经艰难转战的先遣队，转战至赣东北苏区，奉命与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对外仍称北上抗日先遣队），继续北上行动，从战略上策应中央红军主力长征。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和兵力过小，1935年1月，先遣队在赣东北怀玉山地区遭国民党军重兵包围进攻，指战员大部分牺牲，方志敏等主要领导人被俘，仅粟裕、刘英率领的先头部队突出重围。

此时，“长征中的红军主力处于国民党军重兵围追堵击之中，其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广大白区的工作均陷入困境，国民党军继续以堡垒战分割东南各省苏区，对红军进行分进合击，闽浙赣苏区和红军游击队处于国民党军的重重包围‘进剿’之中”，中国革命面临严重危机。

1935年2月初，粟裕、刘英率部突围至闽浙赣苏区，与闽浙赣省委会合。省委随即向粟、刘

部传达了中共苏区中央分局转至的中央指示，命令以先遣队先头部队和突围部队为基础，迅速组建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境内，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苏维埃根据地，以积极的作战行动，打击、吸引和牵制敌人，保卫闽浙赣基本地区和邻近的根据地，从战略上配合中央红军主力的行动（长征）。2 月下旬，挺进师组建完毕，全师 538 人。全体指战员抱着继承先烈遗志、誓死挺进浙江的坚强决心，立即踏上挺进浙江的征途。

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家、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后院，反动势力盘根错节，兵力弱小又毫无依托的挺进师，进入浙江行动，犹如垂饵虎口，处境极为险恶。然而，挺进师义无反顾，越灵山，渡信江，冲过敌人 6 道封锁线，迅速向浙江挺进。途中因叛徒出卖遭敌袭击，仅有的一部电台被毁，与上级失去联系，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为调动、打击敌人以便进入浙西南，并求得与闽东、闽北的配合，挺进师往返转战于闽浙边，消灭地方反动势力，吸引和打击国民党地方武装，造成敌人以为挺进师欲在闽浙边立足的错觉。当闽、浙两省的国民党武装被吸引、调动至闽浙边时，挺进师即在庆元县斋郎地区精心部署，于 4 月 28 日迎头痛击数倍于己之敌，毙敌 300 余人，俘敌近 200 人，取得入浙关键一仗的胜利，打开了进入浙西南开辟根据地的通道。

二、创建根据地，掀起革命高潮

斋郎战斗后，挺进师留下宗孟平率一部活动于闽浙边龙（泉）浦（城）江（山）遂（昌）地区，主力乘胜迅速挺进浙西南腹地，在松阳县境内受到以陈凤生等为首的进步农民组织——“青帮”的欢迎。至此，挺进师有了群众依托。接着，挺进师分兵游击，开辟根据地。黄富武率一部活动于龙泉、云和、松阳、遂昌等县，开展群众工作，发动群众斗争，创建中共组织和各种革命群众组织。粟裕、刘英率其余部队广泛游击于松阳、遂昌、汤溪、龙游、金华、武义、宣平、丽水各地，迫近浙赣铁路，威胁金华、杭州等城市，吸引、打击敌人，掩护宗孟平部和黄富武部开展工作。挺进师公开提出“打土豪，开仓济贫，帮助群众战胜饥荒”的口号，每到一地，首先消灭国民党的区乡武装和地方反动势力、摧毁反动基层政权，然后发动群众，开仓济贫，打土豪分发浮财，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和组织群众投身革命。5 月 24 日，粟裕、刘英所率之部与黄富武所率之部会合于遂昌姚岭村，尾追“进剿”之敌约 8 个团的兵力立即合围而至。挺进师即借夜幕的掩护，分南北两路，由当地向导带路，跳出敌人包围圈，并诱使敌人展开了一场自相火拼。

1935 年 6 月上旬，经过一个月左右的活动，挺进师完成了根据地的开辟工作，各部会合于松阳县小吉村，召开政委会会议，总结前一阶段工作，研究和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从思想上、组织上为建立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条件。6 月 12 日，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率其“怀中利剑”——仕官教育团，进抵金华及杭（州）江（山）铁路沿线督战，挺进师以逸待劳，在宣平吴宅等地予以突然袭击，歼灭其两个连，缴获其全部装备，彻底粉碎其“进剿”。

1935 年 7 月，根据洪家云部归建挺进师前曾两次袭击遂昌县王村口奠定的工作基础，以及王村口特殊的政治、经济、地理等有利条件，挺进师师部进驻王村口，领导浙西南人民全面

建设革命根据地。7 月 25 日，针对浙江省当局深入遂昌设立“剿匪指挥部”、再次“进剿”挺进师之情，挺进师政委会在王村口蔡相庙召开会议，决定主动出击，开展八一大示威行动，把革命形势引向纵深发展。7 月 29 日，挺进师在王村口天后宫举行八一誓师大会，会后袭击了衢州、龙游、汤溪、宣平等地大小城镇 19 个，缴获长短枪 100 多支、轻机枪 2 挺，扩充红军新战士 400 余人，筹集军饷数万元，不仅再次粉碎敌人的“进剿”，而且把革命烈火烧到浙赣铁路线，威胁到金华、杭州等城市。同时，挺进师通过坑里、葛程、上田等战斗，坚决打击进入浙西南之敌。

挺进师的武装斗争，极大地推动了根据地建设。深受压迫和剥削、具有强烈反抗愿望的浙西南人民，挣脱枷锁，纷纷投身革命，踊跃参加党、政、军、群等革命组织。至 8 月中旬，挺进师部队发展到 1000 余人，扩编为 5 个纵队，浙西南中心地区普遍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地方游击队和基层党组织以及工会、商会、互救会、妇女会、儿童团等革命群众组织，各苏维埃政府组织群众迅速开展以查田、插标、分青苗为主要内容的土地革命，在全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之时掀起了浙西南革命高潮。至此，挺进师在浙江建立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在遂昌、松阳、龙泉、江山、浦城 5 县间形成，根据地中心区域方圆百余里，游击区域则达到北抵浙赣铁路，南至闽浙边界西段，西及闽赣边境，东至丽水、宣平的广大地区。

三、浴血抗击，再次掀起革命高潮

挺进师在浙西南建立革命根据地，等于把革命堡垒构筑到国民党当局的家门口；挺进师在浙西南掀起革命高潮，等于将革命烈火燃烧到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后院。这深深触痛了国民党当局的中枢神经。浙江省当局的喉舌《东南日报》惊呼：“浙江素称平安之区，自粟、刘窜浙后，匪化已波及全浙，以目下形势而论，浙江共匪不亚于四川、江西之匪”“前途实堪可虑！”面对后院起火、地方武装对付不了挺进师的境况，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抽调“中央军”主力入浙对付挺进师，先后任命卫立煌、罗卓英为闽赣浙皖边区“清剿”总指挥部的正、副总指挥，调集第十八军为主力约 7 万兵力“清剿”浙西南。

罗卓英任军长的国民党第十八军，是陈诚起家的老本，装备精良，人员充实，训练有素，战斗力强，后来成为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诸如黄维、霍揆彰、李树森、宋瑞珂、胡琏、阙汉骞、高魁元等师、团长，后来都成了国民党军中的著名人物；第十八军又是长期在江西“剿共”的老手。国民党当局“清剿”挺进师的决心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1935 年 9 月 19 日，国民党军大规模的军事“清剿”开始发动。面对 20 多倍于己的强敌进攻，挺进师创造性地采取“敌进我进”方针，中共浙西南特委领导第二、五纵队和地方游击队在根据地内坚持，挺进师主力跳出敌人包围圈，挺进敌后，吸引、调动敌人。9 月 25 日，挺进师主力突破敌人封锁线，挺进到闽浙边敌后。但罗卓英不为所动，除派出约 5 个团的兵力追堵挺进师主力外，仍以大部队死死箍住浙西南，欲彻底摧毁挺进师的革命根据地。这使根据

地内的战斗更为惨烈。

1935 年 9 月下旬，留在根据地内的挺进师第二、五纵队和地方游击队，浴血抗击，誓死保卫根据地，但终因敌我力量相差过于悬殊，王村口等中心区域失守，根据地暂时丧失，指战员大部分牺牲。幸存的红军逐步汇聚、转移到龙（泉）浦（城）江（山）遂（昌）边区坚持斗争。不久，敌人又“清剿”到该边区，挺进师第二纵队队长李重才、政委洪家云率部奋力突围，指战员伤亡严重，仅存余龙贵、宣恩金等 20 余人，转移到龙（泉）浦（城）边境青草垟一带，顽强坚持，后与返回浙西南寻找该部的粟裕所率之部会合，随粟裕到浙南休整。

与此同时，突出敌人重围的挺进师主力，面对国民党军疯狂血洗浙西南之情，迅速在浙南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挺进师以少量兵力抗击了国民党军大部队的进攻，不仅歼灭了敌人的部分有生力量，而且牵制了敌人几十个团的兵力，掩护了挺进师主力南下浙闽边开辟新的游击区，打破了国民党妄图于 11 月 20 日前将挺进师‘肃清’的计划。”

1936 年 6 月两广事变爆发，“清剿”浙西南的国民党军主力第十八军撤离浙江。挺进师立即抓住时机，再次掀起革命高潮。至 1936 年底，不仅恢复了浙西南游击区的工作，而且建立了浙南游击根据地，游击区扩大到 30 多个县。

在国民党军长达 8 个月的大规模“清剿”下，虽然浙西南革命根据地遭其血洗，烈士的“热血染得乌溪红”。但是，挺进师主力并未被“剿灭”，反而在浙南发展壮大了；挺进师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后院燃起的革命烈火并未被扑灭，反而燃烧得更旺了；挺进师修筑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后院的革命堡垒并未被摧毁，反而发展扩大了。而挺进师吸引、牵制国民党军 7 万兵力长达 8 个月，从战略上策应了中央红军主力长征，支援了邻近游击区的斗争。

四、坚决斗争，实现团结抗日

1936 年冬，国民党当局实行“北和南剿”方针，企图在抗日浪潮到来之前，加紧“围剿”南方的中国工农红军，摧毁红军的根据地。12 月，国民党当局在江山设立闽浙赣皖边区主任公署，任命刘建绪为主任，调集主力部队七个师又两个旅及四省保安团队，共计 10 万兵力，大规模“清剿”闽浙赣皖边区。挺进师及其浙西南游击区则是国民党军“清剿”的重点。对此，挺进师确立“隐蔽精干、保存力量与机动灵活、积极作战相统一”的方针，坚决斗争，并针对国民党军的大拉网战术，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游击，小部留在浙南根据地内坚持斗争，刘英率部进入永（嘉）瑞（安）平（阳）泰（顺）边活动，粟裕率部返回浙西南进行大幅度的游击活动，浙西南特委书记许信焜率部继续在闽浙边活动。1937 年 4 月，粟裕率部活动到遂（昌）宣（平）汤（溪）边区，与谢文清率领先期活动至此的部队会合，建立了以遂昌门阵村为中心的遂（昌）宣（平）汤（溪）游击根据地，并以此为依托开展反“清剿”。红军时集时散，灵活机动，使敌哀叹“未奏肤功”。

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在领导挺进师和浙西南、浙南人民坚决开展反“清剿”斗争中，积极

争取团结抗日，并向国民党地方当局倡议进行合作抗日和平谈判。1937 年 9 月 17 日，临时省委历经呼吁、倡议、两次谈判斗争和一次会谈，终于在浙南和国民党闽浙赣皖边区主任公署达成合作抗日协议。与临时省委失去联系、率部活动于遂（昌）宣（平）汤（溪）游击根据地的粟裕，敏锐地觉察到国共两党可能已进行第二次合作。粟裕迅速证实这一判断后，立即向遂昌县当局发出《国共合作抗日建议书》。9 月 18 日，遂昌县当局要求红军派全权代表到金岸谈判。粟裕识破对方欲收编红军的阴谋，针锋相对地要求对方代表到根据地谈判。10 月 14 日，遂昌县当局代表朱镇山抵达门阵村。粟裕指派谢文清、刘清扬与朱镇山在门阵村张家民宅举行谈判。朱镇山奉命要求红军下山进城，欲对红军招抚收编。红军代表义正词严，据理力争。在红军真诚抗日言行的感召下，双方达成合作抗日协议。至此，挺进师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终于以赢得合作抗日而胜利结束。这标志着浙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浙江全面抗战新局面的打开。

1937 年 10 月 19 日，粟裕率部离开门阵，绕道王村口等地赴浙南与临时省委会合。分散活动在浙江各地的挺进师各部，相继赴浙南平阳县山门集结待命。1938 年 2 月 28 日，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曾山自南昌赴浙南，传达中央关于浙江红军编入新四军赴前线抗日、成立中共浙江临时省委坚持浙江工作的指示。3 月 18 日，已编入新四军的挺进师主力，由粟裕率领奔赴皖南前线抗日；同时留下一大批干部，由刘英带领，在浙江领导、开展抗日救亡工作。至此，挺进师出色地完成了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

五、丰功伟绩，光照千秋

抗日先遣队在血与火中幸存下来的革命种子、仅 500 余人的红军挺进师，受命于危难之际，义无反顾地承担起开辟浙江革命根据地、策应红军主力长征的历史使命，孤军深入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后院开展游击战争，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照千秋的历史功绩。

当全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之时，挺进师在国民党统治最严密的浙江燃起革命烈火，等于把革命烈火烧到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后院，有效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挺进师在国民党统治最严密的腹心地区创建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犹如在国民党当局的心脏插上一把尖刀，迫使国民党当局无法安心“围剿”长征中的红军主力；挺进师迅速吸引、调动国民党“中央军”主力，直接抗击、牵制国民党军 7 万兵力长达 8 个月，减轻了红军主力长征和邻近游击区的军事压力。因此，挺进师的斗争，从战略上策应了长征，支援了邻近游击区的斗争，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

挺进师入浙时，浙江的中共组织已被破坏殆尽，中共组织领导的数十次武装暴动均已遭镇压，革命斗争几乎已经偃旗息鼓。挺进师入浙后，首次在浙江建立革命根据地，广泛宣传、发动、组织群众，普遍创建中共组织和各种革命群众组织，形成国共合作为轴心的浙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开浙江团结抗日的新局面，并在浙江留下包括刘英在内的一大批干部，浙江的革

命事业从此走上深入发展的健康轨道。同时，还通过这批老苏区的红军带来了中央苏区的革命精神，他们的领导艺术、指挥才能以及坚定的信念和坚强的意志在浙江代代相传，长远而深刻地影响着以后浙江的革命斗争。可见，挺进师及其在浙西南的斗争，不仅重新燃起了浙江革命烈火，而且重新开创了浙江革命基业，为此后的浙江人民革命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组织、干部、群众和统一战线工作基础，为中国革命在南方建立了一个战略支点。

挺进师孤军深入国民党统治腹心地区，在毫无依托的恶劣环境下，独立坚持斗争，不仅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而且实现了从正规军到游击队、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两大转变，为中国革命输送了一支驰骋抗日疆场和解放战场的革命劲旅。抗日战争中，挺进师的后续部队参加了韦岗伏击战、突破 8 路日军围攻的小丹阳战役、溧水和句容地区广泛的敌后游击战、歼灭日军吉田中队的句容赤山战役、首次缴获日军九二步兵炮的江南抗日战役、黄桥自卫反击战、全歼日军大队长以下 70 余人的南通谢家渡战役、两溧反顽自卫战、高邮战役等重大战役，为民族的独立作出了杰出贡献；解放战争中，挺进师的后续部队参加了苏中、苏南、鲁南、莱芜、孟良崮、豫东、渡江、上海等著名战役，为人民的解放作出了杰出贡献。同时，挺进师还为党和人民培养了一批高级军事人才，共和国第一大将粟裕，少将陈铁军、张文碧、刘亨云、彭德清、黄玉庭、罗桂华、熊兆仁、刘云龙、刘春山、张强生等，均出自挺进师后续部队。

挺进师在三年游击战争中，探索、实践并总结出一整套游击战的战略战术，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其一是创造性地提出和运用了“敌进我进”方针。其二是实践并总结出下列游击战术原则：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胜利；不在于消灭敌人，而在于消磨敌人；支配敌人，掌握主动；积极进攻，绝少防御；飘忽不定，出没无常；越是敌人后方，越容易成功。其三是实践并总结出下列作战、行军、宿营要领：反敌人之道而行，并竭尽欺诈之能事，敌进我退，敌集我散，敌强我避，敌弱我欺，避实就虚，声东击西；不要企图太大，只要常有小胜；站在敌人侧翼、后方和圈子外围，不为敌人所合击；一切作战行动必须迅速、勇猛、坚决，绝不迟疑犹豫；注意使用突然的白刃袭击。其四是实践并总结出兜圈子、大小圈、“8”字形、“S”形、电光形、回马枪、东去西返、早出晚归等隐蔽行动和企图之方式，以及下列隐蔽行动和企图的要求：做到飘忽不定、出没无常，使敌人无法捉摸；行军沿途留专人清除痕迹，扶起压倒的草，抹掉脚迹，有时在反方向制造痕迹迷惑敌人。

浙西南的青山绿水和革命旧（遗）址，见证着挺进师的战斗历程，记载着挺进师的历史功绩，承载着挺进师的不朽精神。挺进师的丰功伟绩是中国革命史上一座不朽的历史丰碑！

（原载 2015 年 6 月 25 日《丽水日报》，周德春执笔）

论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纪念刘英同志牺牲五十周年

王扬世

刘英同志是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政委、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书记、中共浙江临时省委书记、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他从 1935 年 3 月入浙，到 1942 年 5 月 18 日牺牲，在浙江长达 7 年时间里,领导浙江人民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和四年抗日战争，为创建浙西南、浙南游击根据地和浙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不愧是我党的优秀党员。

本文就刘英同志领导创建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问题发表几点意见。

一、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是全国革命低潮时候在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创建的，是对反动派的一个沉重打击

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是 1935 年 3 月刘英、粟裕率红军挺进师入浙开展游击战争以后创建的。这个时候正是全国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的统治，中央红军在历时一年之久的第五次反“围剿”中失败，被迫退出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留在中央苏区领导继续坚持斗争的中央分局书记项英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所部也大部损失，余部分散坚持游击战争。

刘英原是红七军团政治部主任。为宣传和推动抗日，调动牵制敌人，减轻敌人对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围剿”的压力，根据中央决定，以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赣皖前进，沿途虽给敌人一定的打击，但未能达到大量调动敌人的目的，先遣队在皖南期间，由于种种原因，造成谭家桥战斗失败，刘英也在战斗中右手负伤。尔后被敌合围于怀玉山地区，经顽强战斗，弹尽粮绝，指战员大部壮烈牺牲，方志敏不幸被捕，后在南昌英勇就义，先头部队 800 余人在刘英、粟裕率领下，突出重围，这就是随后组成的红军挺进师的基础。

根据中央分局 1935 年 1 月 15 日指示，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由粟裕任师长，刘英任政治委员，全师 538 人。主要任务是进入浙江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新的根据地，以打击、吸引和牵制敌人，保卫闽浙赣基本地区和邻近的根据地。

而当时的浙江是什么情况呢？

浙江是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是蒋介石的老家，他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上台以后，为巩固其反动统治，苦心经营，培植了陈诚、汤恩伯等一大批反动军官和特务，反动基础十分深厚，控制也非常严密。1927年6月建立的中共浙江省委，不到两年时间，先后有庄文恭、王家谟、张秋人、夏曦、卓兰芳、龙大道、李硕勋、徐英、罗学瓒等9位书记、代理书记无法立足或先后被捕或牺牲，无数共产党员倒在血泊中，全省各地蓬勃掀起的农民武装暴动惨遭镇压，大部分党组织遭破坏，使浙江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中央鉴于浙江省委屡遭破坏的状况，1929年4月决定暂时取消省委建制。从此，浙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全省统一的党组织领导。

挺进师入浙前，国民党浙江省当局又抓紧了闽浙赣边境的封锁，浙江保安副司令蒋志英坐镇龙泉县城，以浙保的两个团及龙泉的独立营，遂昌、龙泉、江山等县的保安大队严密布防于龙浦一线，阻止我军深入内地，并调进攻闽东的浙保两个团，以便加以夹击。在政治上整顿保甲制度，清查户口；利用地主豪绅造谣惑众，“红军已被消灭干净”，到处张贴方志敏、刘畴西、王如痴被捕画像，以示“剿匪”胜利，严令区乡保甲长威吓群众，帮红军带路者杀，给红军报告消息者杀，藏“匪”住“匪”者杀，知“匪”不报者以通“匪”论处，分富户财物者处以严刑。红军挺进师仅500余人，兵力不足，弹药有限，在无后方依托又失去上级联系的情况下，要在浙江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其环境之险恶、斗争之艰苦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刘英、粟裕同志以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顽强斗志，受命于危难之时，为了执行中央的战略决策，不顾个人安危，不怕艰难困苦，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毅然率部向浙西南进军。

为了打破敌人对浙闽边境的武装封锁，刘英同志从组织上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挺进师成立了以刘英为书记的政治委员会，作为行动区域内最高的党政军领导机关，各纵队也设立党的行动委员会，以便部队在任何环境中可以分散独立开展游击战争。

其次，在战略战术上开始从正规军到游击队、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转变，教育、培养、锻炼干部独立开展游击斗争的胆量和能力。

第三，加强部队和群众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运用各种方式方法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并以红军铁的纪律和自己的模范行动揭露敌人欺骗宣传，使部队取得群众的同情、拥护和帮助。

第四，注意加强与毗邻地区闽北、闽东党组织的联系，以便互相配合，互相支援。正是刘英、粟裕采取了这些措施，打破了敌人的封锁，改变了极其困难的处境，为在浙西南创建游击根据地打开了通道，给了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

二、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是刘英、粟裕在浙江创建的第一块根据地，使浙江劳苦大众看到了新的希望

在浙江命斗争的历史上，除闽浙赣省委在浙西开化县的一部分地区建立过苏区外，浙西

南游击根据地是党在浙江创建的第一块根据地。

刘英、粟裕同志为什么要在浙西南创建根据地呢？这是因为浙西南地区有许多有利的条件。第一，浙西南地处闽、浙、赣三省交界处，可与闽北、闽东、闽浙赣几块根据地互为犄角，互相支援，可以利用三省敌人之间的矛盾，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地区。第二，浙西南地区处于仙霞岭山脉的中段，南有洞宫山，西有武夷山，东有括苍山，境内山岭连绵，森林茂密，道路曲折，有一定的回旋余地，便于部队的隐蔽和机动。第三，特别是这里的群众基础比较好，早在 1927 年，遂昌、宣平等县就建立过党组织。1928 年至 1931 年间，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一些县先后组织过农军，进行过武装暴动。特别是松阳、龙泉、遂昌等地有一个“青帮”组织，有会众 5000 余人，绝大多数是贫苦农民，他们长期受国民党反动派压迫和剥削，过着“火篾当灯照，火笼当棉袄，辣椒当油炒，番薯丝当小灶”的贫困生活，有强烈的革命要求和改变生活的愿望。“青帮”主要领导人松阳安岱后村陈凤生经历坎坷，受福建浦城、崇安县农民暴动影响，向往革命。另一领导人松阳斗潭村卢子敬，曾留学日本，接触进步思想，回国后创办学校传播革命思想。他们主张“耕者有其田，住者有其屋”“打土豪，分田地，劫富济贫”。这些思想和主张得到广大贫苦农民的拥护。他们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和号召力，1930 年他们曾经以“青帮”为骨干发动松阳、龙泉、遂昌农民武装暴动，袭击玉岩警察所，攻打龙泉县城。虽然这些暴动先后被镇压了，但党和红军的影响深深埋在群众的心坎里。当刘英、粟裕率红军挺进师到达松阳安岱后时，立即受到陈凤生、卢子敬等人率领群众的热烈欢迎，给红军留下深刻印象。毛主席说：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战争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来自群众之中。浙西南的群众是红军挺进师的依靠和力量的根源。第四，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1934 年 8 月曾路经浙西南，进行过广泛的宣传教育，给这里的人民以很深的教育和影响，后来洪家云率领的一个营留在闽北，在浦城、龙泉、遂昌、江山边境开展游击活动，熟悉这里的风俗民情、敌情和地形，可以为挺进师开展游击战争和创建根据地提供方便。

刘英同志要在浙江开展游击战争，必须要有根据地作为依托，而根据地的开辟又必须有武装的支持，他们运用江西中央苏区的经验，以挺进师 500 余人的精干武装，从 1935 年 5 月至 9 月，在近五个月的时间里，东到丽水，北到杭（州）江（山）铁路以南，南至闽浙边境西段十余县广大范围内，横扫了区乡反动政权和当地保安团队、地主武装，建立了以松阳玉岩、龙泉住溪、遂昌王村口为中心的纵横百余公里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根据地内建立了中共浙西南特委和各县党组织、苏维埃政权、游击队、共青团、妇女会、儿童团、分田委员会等组织，并开展了查田、插标、分青苗的土地革命，仙霞岭的霞光，照得浙西南一片火红，这是浙西南人民空前规模的壮举，也是全国革命低潮中一个局部的高潮。根据地的建立，支持了武装斗争，使挺进师从 500 多人发展到 1500 多人，扩编成了 5 个纵队，还有 1000 多人的松遂龙游击总队。挺进师终于在浙江站稳了脚跟，初步实现了党中央交付的任务。

浙西南红色政权的建立，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打破了敌人的欺骗宣传。红军并没有被消灭，共产党并不是土匪，而是为穷苦百姓谋解放的救星，使浙江劳苦大众看到了新的希望。

三、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建立，吸引和牵制了大量敌人，为邻近根据地的恢复发展提供条件

浙西南游击根根据地是在蒋介石老家、敌人的腹心地区建立的。敌人做梦也不会想到500余人的刘畴西余部，竟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建立共产党的政权，形成武装割据的局面，他们惊恐不安，大肆叫嚣“粟刘窜浙，匪化波及全浙”“松遂龙大半赤化”“浙江共匪不亚于四川、江西”。于是黄绍竑、蒋介石调兵遣将，发动了一次“进剿”和两次大规模的“清剿”。在整个三年游击战争期间，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吸引牵制了罗卓英、刘建绪两敌各三四十个团的兵力，历时各达八个月之久，承受着巨大的牺牲，支持着闽浙赣基本地区和邻近的根据地，一定程度上策应了党中央和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

在红军挺进师入浙前，国民党闽浙皖赣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围剿”的重点是闽浙赣根据地和闽北、闽东根据地。闽浙赣根据地因怀玉山一战斗失败而陷落，红十军团除粟裕、刘英率800余人先头部队突围组成挺进师外，其余人员都被打散，后来在皖浙赣边坚持游击斗争。闽北地区，敌人调集十二师和张鎏基独立四十五旅，刘和鼎的五十六师，郜子举的河南总队，周志群的十一师及江西、浙江、福建的保安团队约10万人对其“围剿”，闽北苏区首府大安失陷，分区司令员李德胜叛变投敌，黄道、黄立贵、曾镜冰等处境非常困难，被迫上山打游击。在闽东，敌人集中了新十师、八十七师、刘珍年师、刘和鼎师一部和四十师一部，对闽东苏区和独立师分割包围，残酷“清剿”，根据地遭受严重破坏，闽东苏维埃主席马立峰、特委代书记詹如柏、特委委员魏施霖等同志先后牺牲，叶飞、范式人、阮英平等同志处境也很困难。正在困难时刻，刘英、粟裕率挺进师入浙，在短时间内就在闽浙边和浙西南开展十几个县的游击战争并且建立了根据地，这样就把大量的敌人从闽北、闽东吸引到自己的周围，敌人把“围剿”的重点转向了挺进师和浙西南地区，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也从闽北移驻浙江江山。

国民党重兵集结“清剿”浙西南，为闽北、闽东等邻近根据地的斗争赢得了恢复发展的大好时机。在闽北，由于敌人兵力空虚，许多封锁线撤销，闽北党迅速发展，由8个县委扩大到20几个县委，并建立了闽北、闽西北、闽中三个地委；武装和活动范围也大大扩大了。在闽东，叶飞等同志利用有利时机重建了闽东特委和12个县委，整顿发展了武装，建立了比较巩固的福（安）寿（宁）、宁（德）屏（南）古（田）、霞（浦）（福）鼎、（福）鼎平（阳）四块游击根据地，顺利的局面一直维护到抗战开始。

如果没有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吸引牵制着大量敌人，就不可能有邻近根据地的胜利和发展。当然，支援是相互的，没有闽北、闽东的支持，不可能有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顺利建立和

发展。没有刘英、粟裕的坚强领导，没有浙西南无数革命先烈的牺牲，也不可能有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存在。

四、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掩护了浙南游击根据地的开辟和建立，提供了支持和借鉴

浙南游击根据地是在浙西南游击根据地遭受第一次大“清剿”时开始建立的。1935 年 9 月下旬，闽浙赣边区“剿匪”指挥部副指挥罗卓英率十八军及四省边区反动军队 32 个团，7 万余人，对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清剿”。刘英、粟裕为调动敌人、粉碎“围剿”，在“围剿”即将开始时，率一、三纵队及师直属部队从根据地南下，突破敌人云（和）龙（泉）封锁线，进入闽浙边境东段。在福建寿宁郑家坑和闽东特委叶飞会合，协商成立了以刘英为书记的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但是狡猾的罗卓英并没有上钩，除派约 5 个团的部队“追剿”外，仍将几十个团的大部队箍住浙西南不放。于是刘英在闽东开辟的鼎平游击根据地基础上，向瑞（安）平（阳）泰（顺）发展，迅速地开辟建立了飞云江以南的浙南游击根据地。

留下坚持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中共浙西南特委书记、挺进师政治部主任黄富武，率挺进师二、五两个纵队和松遂龙游击总队，进行了英勇顽强的反“围剿”斗争。由于敌众我寡，兵力悬殊，根据地遭受严重摧残。反动军队所至，分割包围、移民并村、经济封锁、烧杀淫掠，无恶不作，根据敌人统计的资料，被杀被捕红军、地方党政军干部 1000 多人，特委书记宗孟平、黄富武、二纵队政委洪家云、二纵队长李重才、三纵队政委兼龙浦县委书记方志富、三纵队长刘汉南、群众领导陈凤生、卢子敬等一大批骨干先后壮烈牺牲。

由于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吸引牵制了敌人力量，使浙南游击根据地得以顺利的发展。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搞得过红，招引了敌人大规模“围剿”的教训，又给浙南游击根据地建设提供了借鉴。所以刘英同志在建设浙南根据地时，政策和策略上都有很大的改变。为不过多的过早地暴露目标，更好地发动群众，建立比较巩固的浙南根据地，刘英一再要粟裕率部队返回浙西南，坚持浙西南的斗争。由于浙西南从 1935 年 9 月至 1936 年 5 月一直承受着敌人的压力，为浙南游击根据地建设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这是浙西南对浙南的支持，或者说是对浙南作出的贡献，当然，浙南游击根据地建立，为 1936 年 6 月以后恢复浙西南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1937 年 1 月，当蒋介石为消灭南方红军和根据地，命四省“剿匪”总指挥刘建绪率第四路军 40 个团 10 万人对浙南游击根据地“围剿”时，还是没有放过对浙西南的“围剿”，他采用拉网式的由北而南、由西向东、由外围到中心的逼进包围方针，企图将挺进师向东南压迫，然后在浙南海边包围聚歼。由于坚持浙西南的部队全部分散转移隐蔽，损失较少外，但也始终牵制着大量敌人，减少了对浙南游击根据地的压力，使敌人全歼挺进师阴谋不能得逞，最后成为南方革命的一个战略支点，挺进师成为新四军的一个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在整个三年游击战争中，坚持了党的旗帜，保存了红军和游击区，打击、吸引、牵制了大量敌人，掩护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和邻近根据地的发展，为浙江革

命斗争发挥了重大作用，其历史地位是不容置疑的。刘英同志和粟裕同志，作为党和军队的主要领导人，在失去上级领导、缺乏依托的情况下，在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独立地坚持游击战争，创建浙西南、浙南游击根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建立党组织，最后又及时把国内战争转变为民族解放战争。三年游击战争留下的革命种子，为坚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浙江的解放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成绩是主要的。但是，在创建浙西南游击根据地过程中，没有根据浙江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笼统地运用中央苏区的做法，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如此规模公开的苏维埃政权，这是值得商榷的。浙西南地区虽有许多有利条件，但地区狭小，交通便利，对敌人随时可以通过铁路、公路快速集结重兵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当敌人大部队“围剿”时，又不及时分散部队，转移敌后，而是留下过多的部队保卫根据地，进行死打硬拼，致使二、五两个纵队及松遂龙游击总队 1500 余人大部散失，许多重要领导人牺牲，如果采用“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建立隐蔽的游击根据地，像后来粟裕在门阵建立的宣遂汤游击根据地，可能情况就大不一样。

当然，革命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革命的经验也是在失败和挫折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刘英同志后来在创建浙南游击根据地时，就吸收了浙西南的教训，使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都有了新的发展，这里就不多讲了。刘英同志牺牲已 50 周年，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他的业绩永远鼓舞着浙西南人民奋勇前进，刘英同志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选自《纪念刘英牺牲 50 周年研讨会论文集》，作者单位：中共丽水地委党史研究室）

论坚持三年游击战争中的刘英

刘宗鹤

“赤心献革命，决然无返顾。”这是刘英 1929 年 4 月参加红四军时立下的钢铁誓言。他参军后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执着追求共产主义理想。同年 9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毛泽东把他调到军部当文书，有幸在毛泽东、朱德的身边工作，聆听教诲。在斗争中经受考验，从普通士兵锻炼成长为连指导员、营政委、团政委、师政委、军团政治部主任，成为德才兼备的红军将领。

1935 年 1 月，中共中央指示苏区中央分局，命闽浙赣省委立即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突围部队为基础，组建红军挺进师，深入浙江，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在革命处于低潮之时，刘英和粟裕肩负重任，率师挺进浙江。以全师仅 538 人的兵力在广袤的浙西南、浙南创建游击根据地，坚持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身为挺进师政委、闽浙边临时省委书记的刘英，忠心耿耿，留下了光辉的业绩。

一、自觉而适时地进行战略与策略转变

1935 年 3 月初，刘、粟率挺进师进入闽赣边境，遭敌袭击，电台被毁，从此，与中央分局和闽浙赣省委失去了联系。当进入闽北时，又遇原闽北军分区司令员李德胜的叛变投敌，到处遭敌堵击，与闽北党的领导人黄道一时难以取得联系。在此情况下，刘英等从实际出发，成立了以刘英为书记的挺进师政治委员会（简称政委会），作为挺进师活动区域内党政军的最高领导机关。师政委会决心以自己的作战行动，为进入浙西南打开通道。4 月 28 日，刘、粟率部取得庆元斋郎战斗的胜利，挺进师名声大振，为开辟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浙西南是重要的战略要地。刘英等面对挺进师孤军深入敌人腹心地区，处于没有依托的险恶环境之中的实际情况，以及接受北上抗日先遣队未能及时实行军事战略转变而遭受挫折和失败的惨痛教训，果断地决定由正规战向游击战、正规军向游击队的战略转变。即按照井冈山时期毛泽东的领导方法，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打击敌人。并根据这支部队的前身是红七军团组成的抗日先遣队，本长于正规军的大兵团作战，为了适应战略转变，师政委会要求每个指战员都要学会打游击和做群众工作的两套本领。师政委会也同时抓群众性游击战争和建设根据地的工作。这样，武装斗争为根据地建设打开道路并提供保障，根据地建设支持武装斗争。从 5 月起，在武装斗争的保卫下，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建设工作得到迅速的

发展。至9月中旬，在松阳、遂昌、龙泉、江山、浦城五县之间建立起挺进师在浙江的第一块游击根据地。初步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任务，在浙江站住了脚跟。

1935年11月，以刘英为书记的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当年12月，在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当刘英得到这一消息后，即发出通电，呼吁“全中国的民众一致的醒来”“全国民众一致武装起来，参加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同时，根据形势的变化，适时地对一些具体的政策作了调整。

（一）把公开建立红色政权（苏维埃政府、革命委员会），改为建立“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指派一些没有暴露的地下党员和革命群众去担任乡、镇、保长，以掩护党组织、游击队的活动。对国民党的原乡、镇、保长，由镇压改为争取。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政策，团结同情分子，打击顽固分子，争取中间分子。教育他们认清形势，站到人民的立场上来。

（二）停止打土豪，改征“抗日捐”。红军挺进师的活动经费，原来是靠打土豪的途径解决的。刘英等根据局势，认为应当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与我党我军一起抗日。为此目的，必须尽可能缩小打击面，扩大团结对象，把“没收委员会”改为“征发委员会”，停止“打土豪，分田地”，改征“抗日捐”。征发委员会给交“抗日捐”的地主豪绅出具捐助抗日救国经费收据，证明他为抗日出了力，同时为他保密，消除后顾之忧。

（三）适当地调整了一些政治口号。1、以“反蒋、抗日”为口号，注意工商政策，不侵犯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对地主士绅和中等商人，中立者允许自由来去，争取团结他们共同抗日；2、把“穷人不打穷人”的口号，改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3、将“欢迎白军士兵杀死官长，拖枪过来当红军”，改为“欢迎白军兄弟枪口对外，和红军共同抗日”。

同时，还开展争取知识分子的工作，信任他们，把他们中的积极分子组成“白区工作团”，开展城市工作。

由于改变了上述政策，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国民党反动派。

在刘英为首的闽浙边临时省委的积极努力下，1937年9月16日，浙江国共双方代表在温州和平谈判达成协议。10月14日，粟裕在遂昌门阵和国民党遂昌县当局谈判，达成停战协议，率部至平阳山门与刘英等会合。在谈判过程中，我方既坚持了原则立场，又采取了灵活的策略，在浙江实现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完成了由土地革命向抗日战争的转变。

二、十分重视党的建设和政治工作

刘英担任挺进师政委时，只有29岁，但早已经是一位有着丰富工作经验的党和红军的高级领导干部。他在《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中，深有体会地写道：“部队中党的工作与政治工作是军队的生命线。”当挺进师与中央失去联系时，在极端艰难的斗争环境中，他首先想到的是党指挥枪，自觉地成立挺进师政治委员会，加强党对挺进师活动范围内各项工作的领导。正如毛泽东同志讲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

重要原因”。又如挺进师初进浙西南时，屡遭反动大刀会的骚扰和袭击。刘英等经过一番调查研究之后，以强大的政治攻势，瓦解了大刀会。在开始着手创建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时，立即成立了中共浙西南特委、龙（泉）浦（城）县委。在建设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同时，积极开展对骨干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党的组织，先后建立了直属浙西南特委领导的王村口区委、遂汤区委、玉岩区委、竹溪区委。这些区委成为同级苏维埃政府的领导核心，积极领导和发动广大群众开展“打土豪，分田地”运动。

1935 年 9 月中旬，蒋介石以嫡系部队罗卓英的第十八军为主力，集中 40 个团，7 万余兵力，对闽浙赣边区的红军进行“清剿”。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是敌人“清剿”的重点地区之一。刘英召开政委会会议，决定留第二、第五纵队坚持根据地斗争，刘、粟率主力突围到闽浙边区活动，采取“敌进我进”的战略。10 月 5 日，挺进师在福建寿宁郑家坑与叶飞领导的闽东特委、闽东独立师会合，根据斗争的需要，协商成立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和临时省军区的有关事宜。11 月 7 日，正式成立了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临时省军区，刘英任省委书记和省军区政委。1936 年成立了浙南和浙东南两个特委，并先后成立了福鼎、平阳、泰顺等 10 个县委和瑞平泰中心县委，成立了浙南人民革命委员会，加强了整个游击区的党政领导。

红军挺进师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体。它决不是单纯地打仗、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党的组织等重要任务。为此，挺进师形成了为适应战争所必需的一系列的政治工作。刘英不但自己利用一切机会做军内外的思想政治工作，如在行军途中为伤病员抬担架，安慰和鼓励伤病员，给指战员讲革命理想，领唱红军歌曲，利用和指战员谈家常机会做思想政治工作，极大地激发指战员的战斗热忱。同时还规定了每个指战员都要做群众工作。每天写 10 条标语，找 10 个民众谈话；随时随地举行群众大会、军民联欢大会，以便组织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在行动上要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刘英不但要求指战员这样做，他自己处处以身作则，在游击区形成官兵一致、军民团结的局面。尤为突出的是做青帮会徒的思想工作。当时在松（阳）遂（昌）龙（泉）边境有青帮会徒 5000 人众。挺进师初进浙西南时，刘英等了解到其会众大多数是贫苦的青壮年农民，根据党的统战政策，发布了《告青帮弟兄书》，明确提出“欢迎青帮弟兄和红军联合起来”“欢迎青帮弟兄起来，打土豪分田地……”争取和团结他们。他还热情地教育和帮助青帮首领卢子敬、陈凤生、陈丹山等，发展他们入党。在党的统战政策感召之下，松遂龙边境的青帮会众认识到红军是真正为劳动人民谋解放的队伍，纷纷参加了当地的农民游击队，成为浙西南第一支子弟兵的基本力量。后来，陈凤生担任浙西南游击队总指挥，卢子敬、陈丹山等参加了浙西南地方工作团，成了第一批当地干部，在建设浙西南游击根据地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刘英领导下进行的这方方面面的思想政治工作，是战斗胜利的保证。

三、识大体，顾大局，视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线

当时挺进师的领导人刘英、粟裕等同志，都是能独当一面的年轻领导干部，富有创造精神。他们都有一个坚强的信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一定要胜利。又由于他们有坚强的党性，即使失去同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的联系，也能自觉而及时地建立党组织，并尽心维护党的正确领导。还由于他们都能识大体，顾大局，以革命利益为重，步调一致，互相配合。例如 1936 年 2 月初，临时省委召开会议，总结与布置工作，决定进一步采取武装斗争与群众工作紧密配合的斗争方针，即以挺进师主力组成“牵制队”，四处游击，牵制敌人的兵力，以掩护“突击队”（即武装工作队）在浙南游击根据地中心区开展群众工作，并要求把公开发动群众与秘密工作结合起来。据此，临时省委与挺进师领导机关分开行动，以掩护刘英在浙南开展工作。6 月，两广事变爆发，刘英、粟裕分别在浙南、浙西南发表宣言，揭露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反对军阀内战，要求蒋介石与两广军阀双方放弃反共，枪口对外，抗御日本帝国主义。

又如 1937 年 9 月 16 日，刘英与刘建绪的代表在平阳举行国共和谈，达成协议。10 月 14 日，粟裕在遂昌门阵和国民党遂昌县当局举行谈判达成协议。至此，浙南三年游击战争结束。粟裕率部至平阳山门与刘英会合。1938 年春，为培养抗日军事政治干部，临时省委决定在平阳山门创办抗日救亡干部学校，粟裕为校长，刘英常去讲课，作报告，并为干校题词，为全省培养了一大批抗日救亡运动的骨干力量。主要领导人以革命利益为重，政治上团结，步调一致，这是浙南三年游击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

浙南三年游击战争的历史功绩是同浙南军民，特别是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及其领导人的英勇奋斗分不开的。陈毅在党的“七大”对刘英有高度的评价。他说：“刘英同志牺牲了，他是在浙江温州被捕的，直到最后一分钟，都是和国民党斗争，非常英勇，始终没有向敌人屈服。……因此刘英同志的名字，在浙江的上、中、下各层广大老百姓中间，都是呱呱叫的。”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刘英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将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典范。

（选自《纪念刘英牺牲 50 周年研讨会论文集》，作者单位：中共遂昌县委党史研究室）

论粟裕在浙南斗争中的战略思想

《粟裕传》编写组

从1935年2月到1938年4月，以粟裕为师长的挺进师，在浙江南部和浙闽边地区，坚持了可歌可泣的三年游击战争，保持了浙南革命的战略支撑点，支援了全国的革命斗争。这是挺进师指战员和当地人民浴血奋战的结果，是挺进师领导不断总结经验正确指导的结果，也是粟裕同志在同中央失去联系的困难、复杂情况下，领导浙南革命斗争，敏锐地认识并成功地处理一系列政治和战略问题的结果。

浙南斗争的史实，体现了粟裕丰富的战略思想，值得很好学习和研究，现就以下几个方面，谈一些看法和体会。

一、从全局利益出发，以局部的积极行动为全局作贡献

1935年初中央指示组成挺进师时，赋予该师的任务是："立即率部进入浙江境内，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苏维埃根据地；以积极的作战行动，打击、吸引和牵制敌人，保卫闽浙赣基本地区和邻近的根据地，并从战略上配合主力红军的行动。"当时，全国正处在革命的低潮时期。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退出江西，在长征途中遭受重大损失。其他多数革命根据地和广大白区工作也陷于失败。这是全局的形势。从地区情况来看，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巢，是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反动势力相当强大，而该地区大部分地方的党组织被破坏，我军没有红色根据地或游击区作为依托。客观形势和条件对挺进师均极为不利。不仅如此，挺进师在向浙江挺进途中，尚未到达目的地，他们赖以与上级联系的唯一工具——电台，就被敌人打掉了，从此，挺进师同党中央及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这就更增加了挺进师执行任务的困难。

面对这样的形势，师长粟裕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分析。他认为，中央指示组成挺进师进入浙江，这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决策，是中央对经过先遣队锻炼、考验的挺进师的信任。局部服从全局，挺进师只有坚决认真地执行中央指示，才能对全局有所帮助。当然，客观形势是严峻的，但是也有一些条件对我是有利的。第一，国民党军的主力正被我主力红军吸引于北上途中，相对来说，浙江敌军比较空虚。第二，浙江可以同南方的几个老苏区互相配合、互相支援。第三，浙南地处山区，地形条件对我打游击很有利，浙江的工农劳苦大众是有革命传统的。第四，挺进师对浙江并不完全生疏，北上抗日先遣队曾经经过浙江地区，那一带有先遣队留下的火种

和少量部队。第五，有先遣队失败的教训，挺进师如能自觉适应新情况，是可以在这个地区立脚生根的。有了这几个条件，再加上挺进师指战员对革命事业的坚强信念，虽然失去了上级的领导，挺进师也是能够完成中央所赋予的任务的。

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挺进师毅然进入了浙江，在浙西南、浙南、浙东南、闽浙边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三年艰苦复杂的斗争，付出的代价是昂贵的，但成果也是丰硕的。第一，在敌人的腹心地区沉重打击了敌人，较长期地吸引和牵制了敌人相当数量的兵力。特别是两次反“围剿”，敌人派的是国民党军精锐、后来号称五大主力之一的十八军。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敌人对浙南用兵之重、之精锐，为对长江以南其他各游击区所少有。浙南挺进师的斗争，无疑在一定程度上策应了党中央和主力红军的战略行动，也在一定程度上配合和掩护了邻近兄弟游击区的斗争。第二，把浙南建成了中国革命在南方的一个战略支撑点。这个战略支撑点，在以后的抗日和解放战争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培养、锻炼和储备了一支经验丰富的队伍，成为以后组建新四军的部分骨干力量。第四，扩大了党的影响，推进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

历史证明，以粟裕和刘英为首的挺进师，不负党中央的重望，在正确的战略思想指导下，从全局利益出发，勇挑重担，通过积极的斗争，圆满地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重任，为全局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适时实施战略转变，独创性地提出敌进我进的作战方针

在抗日先遣队前期，粟裕担负了实际的军事指挥责任，他从先遣队长途转战的过程中，深切体会到，在革命形势逐渐转入暂时低潮时期，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情况对我军极端不利，先遣队亟应实行由正规军向游击队、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变。由于当时“左”倾错误的领导，未能实现这个转变，这成了先遣队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次挺进师向浙江挺进，粟裕认为能否实行由正规军向游击队、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的转变，以适应当时的形势，也是挺进师在浙江能否立脚的关键之一。进入浙江后，粟裕立即着手领导了这种转变的一系列工作。挺进师原是长于野战的正规兵团，他首先把部队改变成为游击队，只打游击战，不打正规战，要求部队学会两套本领：打游击和做群众工作；逐步培养各级干部带领小分队分散打游击和做群众工作的能力，顺利实现了由正规军向游击队、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的转变。

然而实现战略转变，只是挺进师在浙江生存的第一步，面对强大的敌人，挺进师还必须有正确的作战方针。当时挺进师只有五六百人到千把人，一次最多只能消灭敌人一个营，还仅是地方保安团队的部队。而敌人以主力部队为骨干，动辄集中八九个团、十数个团乃至数十个团，对挺进师进行“清剿”和“围剿”。如此悬殊的敌我力量对比，挺进师是难以搬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斗争时集中优势兵力打敌一路以粉碎敌人进攻之作战方针的。适应新的情况，粟裕提出了敌进我进的方针。他认为“游击战很难谈得上防御，也不能大量歼灭敌人；只能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实行敌进我进的方针”。敌人进攻我们，我们是被动的，就迅速转移，不同敌人决战。但是我们也可以有计划地进攻敌人，保持积极进攻的姿态对付敌人。你要我的山头，我攻你的后方。在敌人“围剿”气焰最盛的时候，他们把游击队活动的重点放在对敌人威胁最大的浙赣线南侧，有时甚至打到武义汤恩伯的家乡，打到青田陈诚的老家，而且逼近了蒋介石老家奉化溪口，给敌人以很大威胁，大量牵制调动了敌人，掩护了游击根据地的建设，创造了游击队作战的更多战机。

在敌进我进方针指导下，挺进师大大地扩展了游击战作战的范围，创造了比较辽阔的战场，使挺进师在敌人残酷打击下，仍然顽强地屹立在浙南广大土地上。

重视前人的经验，又不拘泥于前人的经验，在新的斗争环境中，根据新情况，有所新发现，制定新方针，以指导新的斗争，这是粟裕战略思想的特点之一。在浙南斗争中，以井冈山斗争时期游击战的十六字诀为基础，又不受十六字诀的限制，根据新的形势和情况，提出“敌进我进”的作战方针，正是粟裕这种特点的鲜明反映。值得指出的是，在十年内战时期，在广泛开展游击战和运动性游击战的情况下，许多同志对游击战争作战提出过不少重要见解，但是明确提出“敌进我进”作战方针的是粟裕同志。这个方针不仅正确指导了浙南地区当时的斗争，而且对后来抗日战争中游击战的发展与运用，也有极大的启示，充分显示了粟裕高超的战略思想。

三、科学总结游击战经验，远见地提出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

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经过频繁的作战实践，粟裕同志科学地总结了游击战争、根据地建设和战略战术方面的整套经验。

在根据地建设方面，他提出并建立了有层次的、几种类型相结合的游击根据地。这几种根据地的布局是：在根据地中心的基本区周围，建立了较大块的游击根据地，在较大块的游击根据地周围，又建立了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和若干的游击基点；这些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基点，有公开的，有秘密的，在你来我往、敌人势力比较强大的地区，还有“白皮红心”式的两面政权。部队打了仗，疲劳了，一个晚上急行军便转到了游击根据地或游击基点。这里群众是我们的，封锁了消息，游击队住下来，休整三五天，侦察好敌情，计划好下一步的行动部署，再跳出去，打击敌人，开展工作。部队要作较长时间的休整或准备打击进犯的敌人，就进入到基本区。各种类型的游击区给游击队创造了活动自如的环境，使游击队如鱼得水。

在游击战战术的运用上，粟裕总结出了游击战术在浙南运用的 6 条原则：1.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胜利；2.不在消灭敌人，而在消磨敌人；3.支配敌人，掌握主动；4.积极进攻，绝少防御；5.飘忽不定，出没无常；6.越是敌人后方，越是容易成功。

在游击队的作战行动方面，粟裕总结出这样的要领：“通常采取与敌人完全相反的行动，如敌进我退（进），敌集我散，敌大我避，敌小我欺；应该极尽欺诈的能事，以迷惑敌人，如声东击西，避实击虚；不要企图太大，只要常有小胜；敌人多路进攻时，我应位于其翼侧、后方和包

围圈外面，不要被他合击了；不要暴露企图，行动秘密而飘忽，可以兜圈子，有大圈子、小圈子、S 形圈子、8 字形圈子，还可以杀回马枪，也要警惕敌人会杀我们的回马枪；不论进攻或退却，均应坚决而迅速；胆欲大而心欲细；注意使用突然的白刃袭击。”

此外，在游击队的组织、行军、宿营、侦察、警戒、通讯联络等方面，他都总结出了成功的整套经验。

粟裕把游击战争的丰富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因而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抗日战争中粟裕领导的苏中地区，建立了有纵深、有层次的根据地战略布局，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抗日游击战争，有效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就是成功地继承和发展了浙南游击战争经验。当时的苏中军民反映，跟粟司令打仗放心。他亲自率领的指挥机关和部队作战、休整、转移，运转自如，没有一次因受到敌人的突然袭击而遭到无谓的牺牲。这说明粟裕同志掌握运用游击战的一整套战略战术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浙南游击战争刚结束，他在平阳抗日救亡学校讲授游击战术时，提出了“游击战争的战略意义”，充分显示了他的远见卓识。他认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只有正规军在正面进行的正面战争是很不够的，必须同时在敌人的后方开展游击战争，才能实现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他说，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第一，“可以有效地配合正面战线的作战，争取战争的胜利，以保卫国土和民族”。第二，“可以更好地避敌之长，攻敌之短，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胜利，长期消磨敌人”。第三，“可以担负武装宣传队的任务，宣传党的抗战主张，动员与团聚广大群众为国效劳，充分发挥民众的力量”。第四，“可以光复国土，建立抗日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积蓄力量”。

这些论点的正确性和普遍性，为后来抗日游击战争的实践所证明。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抗日战争初期的 1938 年 1 月，就能把游击战争摆在战略地位上来认识、来论证，在我军高级将领中是罕见的，充分说明了粟裕战略眼光之深远。

四、高瞻远瞩，自觉实现从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转变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不停步地向中国进攻，民族矛盾日益加深。在三年游击战争中，粟裕顺应形势的发展变化，独立处置一些复杂的政策和策略问题，适时实施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转变。

大家都知道，挺进师尚未进入浙江，便与党中央和上级失去了联系，与邻近的其他游击区联系也很困难。但是他们并没有把自己封闭起来作山大王，而是通过广泛的收集情报，了解和研究国内外形势，体会党的政策，使自己的认识能比较适应当时的新形势和党的要求，并制订了相应政策和策略，以指导整个部队的斗争。

譬如，他们每到一地，就通过搜集新闻报纸、截获敌人文件、窃听敌电话等办法，从字里行间和只言片语中了解情况，分析形势。通过各种社会关系，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搞来上海等

地的进步刊物，如邹韬奋办的《大众生活》，体会党的政策，并对全国的总形势和党的路线有基本的了解。然后对内给指战员上形势课，进行思想教育，对外发表宣言和公开信，宣传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了解形势和党的总路线是重要的，但是更重要也是难能可贵的，是在没有党中央和上级具体指导的情况下，能从实际出发，把党的总路线变成适合于当地斗争形势需要的政策、策略。在这一方面，粟裕做得是成功的。他根据各阶段形势发展的不同情况，提出了适合每个阶段斗争需要的政策、策略和口号。1935 年，在建立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时，粟裕提出了“团结中间阶层，对上层分子根据其不同表现区别对待，以孤立敌人”的斗争策略。随着民族矛盾日益加深，1936 年，粟裕又针对浙江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地主兼工商业者多的特点，对政策作了若干调整，“以抗日反蒋为前提，扩大团结对象，缩小打击目标”，“改变了‘打土豪’的政策，把‘没收委员会’改为‘征发委员会’，征收‘抗日捐’”。“注意发展山区经济”，“支持竹木和山货出口，欢迎平原城镇的殷实客商进山做买卖，使商品流通，山区经济得到发展”，当时的门阵，被群众称为“小上海”。“重视团结争取知识分子的工作，向青年进行革命、抗日宣传，把进步青年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到 1937 年，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逐渐高涨，粟裕更深入地调整了对敌斗争的政策和策略。如“对国民党的乡、镇、保长由镇压改为争取；地方士绅和中等商人，中立的允许自由来去；把‘穷人不打穷人’的口号改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把‘欢迎白军士兵杀死官长拖枪当红军’改为‘欢迎白军官兵枪口对外和红军共同抗日’等等。同时还进一步开展了争取城市知识分子的工作”。

这些政策和策略提出后，得到了指战员的认真贯彻，收到了显著的效果，不仅使大家明确认识了当前的斗争目标已由阶级敌人转变为民族敌人，而且由于正确的政策和策略的贯彻，使挺进师和当地革命群众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转变非常顺当，收到水到渠成之效。

1937 年 9 月，粟裕得到国共可能合作的消息，便派人去调查，在得到证实后，便主动给国民党遂昌县政府写信，要他们派代表来谈判。10 月，遂昌县政府派代表到了当时粟裕所在地门阵，请他们下山进城。粟裕让我方代表向对方表示：“为了共同抗日，我们愿意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停战谈判。”但“合作不是投降，改编不是收编，双方是平等的合作，要保持我军的独立性，我们不进城”。特别要指出的是，这些重要的观点、立场，是粟裕在没有上级指示、又在消息闭塞的门阵提出来的，它的精神完全符合党中央提出的国共合作中我党的立场，又一次显示了粟裕的政治和战略思想水平之高。

几天后，国民党当局答应了粟裕他们提出的条件，达成了停战协议。这时刘英领导的另一部分挺进师也同国民党浙江当局达成了停战协议，时间都是在 1937 年九、十月间。

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粟裕就体会到：“一个指挥员对战略问题有了深刻的理解，有了清醒的头脑，才能运筹自如地指挥作战。”他又说：“在我以后的作战生涯中长期远离中央，所以我对于尽可能地去了解和学习战略性问题格外重视。”这就是他在三年游击战争期间所以能

够自觉地思考战略性问题，在重大的举措方面完全符合中央的总意图，并能创造性地在理论上提出重要观点，在行动上不断从实际出发不断创新的原因。

尽管本文论述的某些观点，可能是粟裕和挺进师其他领导人的共同认识，但这也不影响我们对粟裕这一段战略思想的探讨和研究，因为共同认识中包含了粟裕的思想认识，甚至有的是以他的思想为主导的。可以肯定地说，浙南三年游击战争，充分说明粟裕是一名具有战略家头脑的高级将领，这个时期也是他成长为战略家的重要阶段。

（选自《纪念粟裕逝世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论粟裕对毛泽东根据地思想的实践与发展（节录）

刘宗鹤

粟裕学习毛泽东、朱德井冈山根据地斗争的经验，灵活运用到领导浙南游击区各个游击根据地的实际斗争中。既师承了毛泽东根据地思想，又因时因地制宜，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游击根据地的主张。

一、游击根据地思想的确立与入浙后的初次实践

根据毛泽东军事思想，革命根据地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战略基地。这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各个阶段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粟裕同志于 1928 年 1 月参加了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初次接触了根据地问题。而真正确立根据地的思想，是在参加创建井冈山根据地时期。粟裕曾感受深刻地说："当我们到达井冈山时，井冈山红色根据地的建设已初具规模。我们上了井冈山后的第一个感觉是有了'家'了。按陈毅同志的说法，不再像'釜底游魂'了。这是令人喜悦而又意义深远的变化。在毛泽东、朱德同志的领导下，部队积极参加根据地建设。同湘南起义相比，工作内容有了发展。湘南起义时，部队打下了个地方，夺了政权，也参加做群众工作，但那时的工作重点是扩大红军，还是从军事上着眼的。上井冈山后武装斗争同根据地建设结合得更紧密了。"毛泽东很注意对红军进行建立根据地思想的教育。他要求所有的部队，都要做社会调查。连队要逐日汇总上报调查情况。每打到一个新区，部队的党组织，都要帮助地方建立党组织、政权机构；红军主力要帮助地方建立武装，军队党员、干部还担负就地物色、考察、培养建党、建政的骨干，更直接地参加建设根据地了。这些做法，对提高部队阶级觉悟、政策观念，以及纠正单纯军事观点，也有很大的作用。粟裕明白了毛泽东"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打击敌人"的领导方法，把武装斗争同根据地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即打仗是为了建设根据地，而建设根据地又是为了打更大的胜仗创造条件。"部队中存在的流寇思想、乡土观念、无政府主义是树立根据地思想的严重障碍。"他经历了所在的二十八团"八月失败"的教训，对建设革命根据地的意义以及根据地同武装斗争的关系，认识深刻多了。

当粟裕和刘英于 1935 年 4 月奉命率领红军挺进师入浙之后，运用毛泽东的根据地思想，首先着手开辟以遂昌王村口、松阳玉岩、龙泉住溪等地为中心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

建立革命根据地应当具备：有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有相当力量的革命武装，战胜敌人，发动群众，分配土地，利于作战的地势和回旋地域，并要具有一定的经济力量。

粟裕和刘英等分析了在浙西南创建根据地的有利因素：

1. 浙西南的地理环境有利于开展游击战争……

2. 浙西南的人民有强烈的革命要求……

3. 红军在浙西南有一定的工作基础……

粟裕和刘英本着武装斗争与根据地建设结合起来的原则，运用了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时期的领导方法“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打击敌人”。面对灾荒严重的社会现象，公开提出“打土豪，开仓济贫，帮助群众战胜夏荒”的口号。同时，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深得民心。此时，挺进师政委会坚定地执行土地革命的路线和政策，“打土豪、分田地”，广泛发动群众，从事游击根据地的建设。这是符合当地基本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建设根据地的实践获得了初期的成功。

浙西南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使国民党浙江军政当局惊恐不安。蒋介石鉴于保安团的“围剿”对付不了红军挺进师的情况，决定调主力部队来“围剿”。七八月间先后任命卫立煌和罗卓英为“闽赣浙皖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的正、副总指挥。该总指挥部制定的《第一期清剿计划》确定以各边区大部对粟、刘，并委任第十八军军长罗卓英统一指挥。敌人集中了 32 个整团，连同地主武装号称 40 个团，约 7 万人的兵力，妄图围歼红军挺进师和农民游击队，彻底摧毁浙西南游击根据地。

粟裕分析了浙西南与井冈山及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时所处的情况不同，必须采取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反“围剿”。而游击战很难谈得上防御，他提出了“敌进我进”的战略方针。挺进师政委会决定留下第二纵队和第五纵队就地坚持斗争，粟裕和刘英率主力部队迅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以积极的作战行动吸引敌人、调动敌人，并开辟和建设浙南游击根据地。成立了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和闽浙边临时省军区。

二、对建设游击根据地的创见

粟裕将军具有长于思索、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的特点，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他冷静地回顾了红军挺进师入浙之后，按照中央苏区的方法建立的第一块游击根据地——浙西南根据地的情况：以打土豪、分田地为基本政策，公开发动群众，并公开建党、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地方游击队等，搞得轰轰烈烈，一片火红，气势很大。这在创建游击根据地之初，采取这些办法，确实曾经有力地打击了地方反动势力，对发动基本群众和迅速打开局面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这里毕竟是国民党反动派的腹心地区，蒋介石、陈诚的老家浙江，是一个经济、文化、交通都比较发达，反革命势力比较强大，反动统治比较严密的广大白区。在这样的白区里公开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公开建立苏维埃政权，对敌人的威胁特别大。国民党蒋介石是绝对不会容忍

其存在和发展的。所以敌人的反扑也必然特别凶残。当敌人以强大的兵力进行“清剿”时，我方就难以经得起敌人较持久的强力打击。再则，从坚持长期斗争来看，还由于当初打击面过大，不利于团结和争取其他社会阶层的力量。我方在第一次反“清剿”斗争中，付出的代价确实太沉重了。血的教训，令人难忘。粟裕认为时局变化了，斗争环境不同，我们的战略思想也必须根据此时此地的实际情况相应的转变。他明确地提出：“为了长期坚持敌后，形成比较巩固的游击区，并为主力部队提供更多的‘落脚点’和‘跳板’，我们不仅要有相对稳定的较大块的游击根据地，而且在较大块的游击根据地周围，还必须建立一些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和若干的游击基点；这些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基点，有公开的，有秘密的；在你来我往，敌人势力比较强大的地区，还应有‘白皮红心’式的两面政权，使我们的整个游击区形成几种类型的结合。”“我们把公开的这些斗争同隐蔽的群众工作更加有机地结合起来。”使这些游击基点和小块的根据地，经过斗争的考验和不断加强工作得到巩固和发展。遂（昌）宣（平）汤（溪）游击根据地，就是按照这个指导思想和方法建立、巩固和发展起来的小块游击根据地中最好的一个典型。

粟裕于 1937 年春节前后，率部冲过敌人的封锁线，重返浙西南，与在遂宣汤边区活动的浙西南独立师政治委员谢文清所部，在遂昌县的门阵村会合。粟裕等对这一带的政治、经济、交通、自然地理等诸种条件作了一番调查研究。

……根据上述有利因素，研究决定建立以遂昌门阵为中心，100 里方圆的宣遂汤游击根据地（又叫遂宣汤游击根据地）。用武装工作队的形式，秘密地开展群众工作，从事根据地的发展和建设。1937 年夏，为了加强根据地建设的领导，建立了中共宣遂汤工作委员会。经过艰苦的工作，取得了预期的成果。这里成了浙西南第二次反“清剿”斗争的领导中心所在地，比较稳定的后方。正如粟裕同志在《回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中所说的：“这个后方，在刘建绪的‘围剿’时期，发挥了顽强的战斗力量，成为我们在浙赣线以南和浙西南地区坚持斗争的重要基地之一。”这一创举的成功，充分表现了粟裕执行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高度自觉性和革命胆识。

三、从实际出发，适时地改变根据地的主要政策

粟裕根据以往斗争的实践经验，以及当前民族矛盾日益加深的局势，认为要确保游击根据地和其他分散的游击据点的存在、巩固和发展，除了要以有力的武装行动对付敌人的"清剿"之外，主要还是依靠我党政策的威力。而党的政策，必须适应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针对浙西南山区的特点，以及宣遂汤游击根据地的现实情况，适时地转变了一些主要的政策。

（一）把公开建立红色政权，改为建立秘密的“白皮红心”式的两面政权（略）

（二）重视群众利益，发展山区经济（略）

（三）停止打土豪，改征“抗日捐”（略）

（四）对白军，由“欢迎白军士兵杀死官长，拖枪当红军”，改为“欢迎白军官兵，枪口对外，

同红军一起共同抗日”。

（五）实行争取和团结知识分子的政策（略）

由于红军挺进师、游击队的存在与发展，审时度势自觉地调整政策，积极推进了浙南游击根据地及各小块游击根据地的建设，运用了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在两次反“清剿”斗争中，尽管国民党军队调集几十倍于挺进师的兵力进行疯狂“清剿”，挺进师在斗争中开辟和发展了新的游击根据地，革命红旗始终在浙南游击区的上空飘扬。这为促成浙江国共和谈打下了重要基础……

总之，粟裕善于从本质上把握毛泽东关于革命根据地建设的思想灵魂，在斗争实践中坚持因时因地制宜的原则，用唯物辩证法指导根据地建设和指挥游击战争，为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胜利，在战略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北上抗日后，粟裕深刻理解毛泽东关于独立自主坚持游击战争的战略思想，在领导苏中抗日斗争时根据地建设思想又有了进一步发展。他认为：“苏中的抗日斗争，不仅应求得军事的胜利，而且应把苏中建成基本根据地（不是游击根据地或游击区）。军事斗争应成为根据地建设的支柱，并且为下一步夺取整个民主革命的胜利，作好必要的准备。”不但把建设根据地与军事斗争紧密结合起来，而且明确提出建设根据地要以“夺取整个民主革命的胜利”为目的。为此，他从军队派了大批干部从事根据地党政工作，以加强根据地的建设，发展壮大地方武装。军事斗争与根据地建设同时发展，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选自《纪念粟裕逝世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作者单位：中共遂昌县委党史研究室）

试论浙南三年游击战争的实践在粟裕军事生涯中的地位和作用

叶水清

粟裕将军所以能从一名士兵成长为一名声震中外的常胜将军、杰出的军事家，其成长过程应首推他在浙南三年艰苦卓绝的作战实践。在浙南三年游击战争中，他独立指挥作战，不怕艰苦，不畏强敌，屡战屡胜，造就了这位常胜将军优秀的品格和良好的素质，形成了他精心组织战斗，多谋善断，灵活用兵的独特军事艺术雏形。本文试就粟裕在浙南三年作战实践在他军事生涯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一粗浅的探讨，以此纪念粟裕将军逝世十周年。

一、浙南三年游击战的实践锤炼了粟裕不畏强敌的英雄气质和胆略

不畏强敌的英雄气质，在困境中革命的坚定性和革命胆略，是粟裕从基层指挥员成长为优秀高级指挥员的首要因素。这一因素所内涵的英雄气质、革命的坚定性和胆略，正是他在浙南三年游击战的实践中锤炼出来的，在他后来的军事生涯中进一步得到了发扬光大，促进了这位一代名将的成熟和升华。

1935 年 1 月，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怀玉山陷入敌军重围，全军主力几乎覆灭。粟裕以惊人的毅力，带领几百人从困境中突围出来，奉命组成红军挺进师，和师政委刘英率领这支突围部队挺进浙南，开始了独立指挥作战。当时之形势极其严峻。从主体上分析：一是兵力有限，这支突围部队仅有 400 余人，相当一部分还是机关工作人员和伤病员，师政委刘英和粟裕本人也是伤病员。二是武器装备极其简陋，战士中一部分原是先遣队一个迫击炮连和一个重机枪连，但已没有炮和机枪了。三是粮草给养奇缺，三九严寒，战士的穿着仅是一套单衣，更无食物干粮。四是指战员打游击的作战经验缺乏，他们习惯于野战正规化作战，不善于分散边做群众工作边打游击。从客体上分析：一是浙南处在反动统治的腹心地区，是蒋介石的“后院”，反动统治比较严密，敌方乡乡有保安队，处处有碉堡，地方反动武装势力也相当强。二是当时革命形势正处于低潮时期，不少不坚定分子对革命前途有了疑虑，有的甚至成了叛徒。挺进师入浙前，本想与闽北根据地取得联系，谁知原闽北军分区的司令员已叛变，把挺进师入浙行动出卖给了敌人，给挺进师造成严重威胁。三是同党中央和上级组织以及兄弟游击队失去联系，这支部队从江西到达福建边境时，遭到敌保安团的伏击，仅有一部电台也打掉了。面对“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困境，粟裕率领这支“疲惫”之兵挺了下来，力克强敌，打出了一

个“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浙南革命根据地，充分展示了粟裕将军的英雄本色。

粟裕将军很欣赏宋朝苏洵的名言：为将者“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他在浙南的三年真正做到了这一点，在强敌“围剿”中坚定自信，英勇沉着。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曾强调指出：“抗日将军们要有这样的坚定性，才算是勇敢而明智的将军。”[①]正如杨尚昆在回忆粟裕的文章中所说：“粟裕同志坚持浙南敌后三年游击战争中，突出地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革命坚定性和革命胆略”。浙南山区崇山峻岭、山高路陡，但山高志更高，粟裕所率部队虽然在困境中孤立作战，但他们都有一个坚定信念，党的事业是必胜的。这信念是他们在敌我兵力对比极其悬殊的情况下，挺住并发展壮大的力量源泉。入浙后，他们适时把部队分为“突击队”与“牵制队”，“牵制队”（系挺进师主力）公开进行武装斗争，吸引和牵制敌人，粟裕肩负的是“牵制队”的公开的武装斗争，他单独指挥战斗，以非凡的革命胆略，机动灵活，英勇奋战，有效地吸引和牵制了大量敌人，粉碎了敌人两次大规模的“围剿”。在浙南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日日夜夜，几百个人的挺进师，能够在百十倍于自己的敌人斗争中保存自己，并发展壮大，当然离不开挺进师许多干部和战士及浙南人民群众的贡献，然而作为一师之长的粟裕，其革命的坚定性和胆略是这支队伍得以生存和壮大的主要因素。浙南三年后，1938年4月，这支队伍被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三营，稍后，粟裕率领这支部队的骨干挺进苏南敌后，5月16日首战韦岗大捷，威震江南，这是挺进师由国内革命战争走向抗日战争的新起点。

在粟裕后来的军事生涯中，从战役指挥角度体现他不畏强敌，具有压倒一切强敌的英雄气概的战例甚多，其中应首推解放战争中的孟良崮之战。1947年初，在山东战场上，蒋介石调集了24个整编师，45万余人的兵力，企图迫我决战于鲁东，一举歼灭我华东野战军主力，并以其嫡系“王牌”第七十四师为主要突击力量，对我军实施中央突破。众所周知，整编七十四师是蒋介石“五大主力”之首的“御林军”，师长张灵甫也是一位善打恶战、硬仗的将才。在这种情况下，正如粟裕在浙南游击战争中带几百人小部队面对罗卓英和刘建绪的“围剿”一样，能不能战而胜之，不仅是对战役指挥才能的考验，而且首先是对他们勇气和胆略的考验。在这种强敌压境面前，粟裕突出表现他临大敌而愈勇的英雄本色，果断地定下了破敌中坚，把敌第七十四师从重兵集团的中央挖出来，一举歼灭的决心。三天大战，第七十四师终于歼灭了。这是军事史上罕见的战例，充分显示了粟裕将军的大智大勇，使他在浙南三年磨炼出来的英雄气质和胆略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和升华。

二、浙南三年游击战的实践为粟裕自觉执行毛泽东军事思想奠定了根基

粟裕“于1928年4月，跟随朱德、陈毅同志上井冈山，在坚持井冈山和中共苏区革命根据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09页。

地的斗争中，他在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下，通过游击战到运动战的实践，领会和掌握了我党的建军思想和指挥艺术，从基层指挥员锻炼成长为优秀的高级指挥员。以后，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每一个阶段都留下了他的光辉业绩”。

浙南革命根据地的实践，充分体现了粟裕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这一正确思想路线的实施，为粟裕将军之所以成长为一代名将奠定了思想基础，丰富了他自觉执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实践经验。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根本特点：兵民是胜利之本，只有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和依靠群众，才能进行革命战争。为了进行人民战争，必须建立革命根据地。粟裕和刘英率部一入浙，就开始了依靠群众、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实践。挺进师入浙的第一次战斗，是 1935 年 3 月下旬在浙南龙泉宝溪乡的溪头。当时这里驻守着浙保基干队一个中队。战斗是早晨打响的，不到一小时红军就从 3 个方向包围了敌人的驻地，活捉了敌兵，缴获了枪械。粟裕率部对付一个中队是易如反掌。但他们不是为打仗而打仗，一开始就把作战的出发点放在动员群众这个基点上。在击败敌一个中队后，他们在龙泉溪头马上布示告民，宣传红军与群众的血肉关系，并根据群众的建议处决了当地两个反动恶霸。对保安基干队的一些老百姓出身的俘虏宽大处理，并发给大洋作为回家的路费。挺进师入浙不到 5 个月，开辟了以龙泉住溪、遂昌王村口、松阳玉岩为中心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

在浙西南根据地，粟裕所率部队实施了井冈山时期我军的基本做法，打土豪，分田地，分青苗，使广大被压迫、被剥削的群众挺立起来，并建起农民、青年、妇女赤卫队等各种革命群众组织，形成了浙西南人民空前的革命壮举，出现了全国革命低潮中的一个高潮。实践证明，武装斗争为建设根据地打开道路并提供了保障，而根据地建设又支持了武装斗争。粟裕率部自入浙后，就要求部队战士要学会两套本领：一是打游击，二是做群众工作，把武装斗争与建立根据地有机地结合起来。在粟裕与刘英分开活动的情况下（分开达 8 个多月），粟裕更加重视了开辟根据地和游击点的工作。他们通过群众工作，把几个或十几个工作基础好的村庄连成一片，形成了一个个游击点，基点密集的，联起来便成了一个小小的革命根据地。在它的外围，还建立若干个分散的游击基点。这些小块根据地和基点，为粟裕所率部队提供了“落脚点”和“跳板”，使主力部队长期坚持在敌后有了依托。粟裕同志晚年回忆中，高度肯定了建立游击基点和小块根据地的重要作用，他说“部队打了仗，疲劳了，一个晚上的急行军便转到游击基点。群众是我们的，封锁了消息，可以安安稳稳住下来，休整三五天，侦察好敌情，计划好行动部署，再跳出去打击敌人，开展工作。”“这样，如鱼得水，我们的活动比前一阶段自如多了。”这些小块根据地和游击点，在粉碎敌人的两次“围剿”中起了重大作用，如在刘建绪“围剿”时期，宣平、遂昌、汤溪边区以门阵为中心的小块根据地，就成了粟裕率部在浙赣线以南和浙西南地区坚持斗争的重要基地之一。敌人小股不敢来，因打不过我军主力；大股又上不来，因为道路艰险，给养困难，施展不开。通过这样的实践，粟裕把毛泽

东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军事思想与当地的实际进行了有机结合，并创造性地单独探索出了一条新路子。在浙南三年，在敌后建立根据地、游击基点，依靠群众进行武装斗争的经验，在粟裕军事生涯中曾发挥了重要作用。

皖南事变后，粟裕任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后兼任政委）、苏中军区司令兼政委，领导苏中军民，发动群众，开辟了犹如铜墙铁壁的苏中抗日根据地，尽管当时日伪军倾巢出击苏中，都被我军一次次地粉碎了，充分显示了建立根据地、依靠群众的作用。黄桥决战大捷就是突出的一例。当时敌军有 30000 余人的兵力，而我军仅有 7000 余人被迫应战。打胜这一仗，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的群众就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著名的黄桥烧饼歌："烧饼要用热火烤暖，军队要靠老百姓帮"，形象地道出了毛泽东人民战争军事思想的威力。

挺进师的生存、壮大，与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坚持在苏中对敌斗争的几次大捷，突出地表现了粟裕自觉地、创造性地执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才干，这种才干的成长点应该说是三年游击战的浙南山区，成熟地施展这种才干该是坚持敌后抗日的苏中大平原。

三、浙南三年游击战的实践极大地丰富了粟裕实施灵活机动战略战术的经验

粟裕在早年跟随毛泽东、朱德坚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中，领会和掌握了我党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但独立操作、灵活运用我党的战略战术的实践应该是浙南的三年游击战争。在与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并被国民党军队封锁在崇山峻岭之中时，他通过独立自主的探索，面对强敌灵活用兵，才能生存发展。浙南这块土地，不仅磨炼了粟裕的革命斗志，而且锤炼出粟裕的高超指挥艺术，催化了他从一个基层指挥员成长为优秀高级指挥员的进程。

粟裕率部入浙的第一次较大的战斗是在庆元县的斋郎地区，敌人企图消灭挺进师于未站稳脚跟之时。当时，敌方有浙江保安一团 1200 余人，福建保安团 1000 余人，还有近千人的地主武装，从东北、正东和东南方向对挺进师实行分进合击。红军挺进师只有 400 余人。在兵力有限、弹药不多、更无后方补给的困难条件下，粟裕利用斋郎有利的地形，灵活用兵，精心组织了这次战斗，采取了先瓦解地主武装，后预设阵地，突出奇兵打败了浙保一团 1000 余人，团长李秀也被打断手，吓得闽保二团狼狈逃走。斋郎战斗与粟裕后来精心指挥战役相比，当然是一次小小的战斗，但粟裕善于组织战斗，预设阵地奇袭敌人的战术在这次战斗中已初试锋芒，这锋芒在后来的苏中战役和解放战争上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粟裕率部一入浙，就运用了井冈山时期毛泽东的用兵方法，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打击敌人。粟裕所率 400 余人，大部分是长于野战的红军正规兵团的指战员，对分散打游击、分开活动不习惯。派一个团级干部带一支小分队出动活动也很困难，要他们在外面活动半个月，然后在预定地点会合，可是过了三天，他就带着部队回来了。粟裕采取逐步锻炼提高的办法，开始不叫他们出去半个月，只出去 3 天，后来增到 5 天、7 天、半个月，终于使他的部下学会了单独活动，逐步实现了粟裕要官兵独自为战的要求，实践了分兵活动、合兵击敌的战术。

趁敌人尚在运动中，先一着跳出去，转入敌后，打击敌人，这是粟裕灵活用兵的又一特点。在浙南反击敌人第一次“围剿”中，他就采取了这个战术，黄绍竑装备精良的仕官教育团尚未开到浙南前线，就被粟裕在金华附近歼灭了一个整连，后又转入敌后小溪口再歼一连，彻底粉碎敌人的第一次“围剿”。粟裕后来指挥的不少战斗就采用了这一战术。如著名的黄桥之战，他用奇兵在敌区狭小的腹心，一举歼灭了两个半旅。

粟裕用兵又一个显著特点是主动出击，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在浙南三年中，他就用此战术粉碎了蒋介石嫡系部队两次各约 40 个团的“围剿”。后来，在兵力强我数倍的敌人面前，粟裕常采用避敌锋芒、主动出击、消耗敌人的战略战术。面对强敌浙南是这样打的，苏中也是这样打的，但更加丰富和发展了。苏中战役，深入敌之后方，攻其不备，连战连捷，其用兵之妙，战法之活，可谓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毛泽东的重要军事论著《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就是根据粟裕苏中等实践的经验写成的。粟裕在苏中高超的战略战术的实践内涵着浙南三年游击战的基本经验。因此说，粟裕在浙南的军事斗争经验，在他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浙南三年游击战培育了粟裕艰苦奋斗的硬骨头精神，促成他以艰苦奋斗打硬仗而闻名于世

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历史可以说是我军的艰苦奋斗史，纵观粟裕的戎马一生，他甘为打硬仗打恶仗，始终展示了他艰苦奋斗的硬骨头精神。粟裕的“艰苦”二字，在浙南三年的困境中得到了充分的体验和磨炼。反映孟良崮战役的著名作品《红日》的作者吴强同志，1938 年曾在粟裕的部队里生活过，有一次行军，他与粟裕边走边攀谈，问粟裕司令：“你怎么不骑马？”粟裕说：“我走惯了。”接着粟裕讲述了浙南三年打游击的生活：“那时候，不论干部还是战士，要做到三个得，”“一个打得、一个跑得、还有一个饿得”，“没这‘三个得’，坚持不了三年游击战争。”并说：“这‘三个得’字，要长期用下去”，“在江南地区同日本军队作战，打游击，对于我们是个新课题，三年游击战的经验有用，但不是完全有用，要根据新情况，用新的方法，新的战争形式，创造新经验”，“无论怎样，还是要艰苦奋斗”。

浙南三年游击战的实践，不仅磨炼了粟裕的斗志和才智，而且更重要的是锤炼了他艰苦奋斗的硬骨头精神，这种精神和作风是他在以后的军事生涯中立于不败之地的主要因素。浙南三年，以“艰苦卓绝”四字而闻名，这是在军事史上有口皆碑的。其艰苦程度，是难以想象的，许多老同志回忆，的确是到了“卓绝”的程度。“这期间，长途跋涉，粟裕同志和我们同甘共苦，无论行军、爬山、忍饥挨饿，处处做全师的表率。行军时，他跑在最前面。部队疲劳了，他前后来回奔走照应战士，还站在路边喊鼓动口号。”在反击刘建绪 43 个团“围剿”的一次战斗中，粟裕伤了脚踝，他就用苦菜叶贴起来参加急行军，一直贴了两个月。在浙南三年，粉碎敌人一次“清剿”两次“围剿”中，几乎每天不是急行军就是打仗，粟裕自己回忆：“三年中，我们在浙赣路以

南，天台山以西，浙闽边以北，差不多大小山头都走遍了。”“吃饭的问题很严重，一连几顿饭吃不上是常事。有时怕暴露目标，不能生火，只好吃生谷子。”

浙南三年敌强我弱恶战多，粟裕以身作则，不畏艰苦，奋斗拼搏。他的这种精神，在他后来的军事生涯中得到了发扬光大，并取得一次又一次的战斗胜利。

综上所述，浙南三年是粟裕戎马一生中短暂的三年，但这三年艰苦卓绝的实践，孕育了粟裕成为一位优秀将才的根本气质，是这位常胜将军军事指挥艺术的奠基时期，也是他单独作战、探索革命道路、创造性掌握和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重要时期。他在浙南三年实践中所创造的治兵、带兵的丰富经验，在他后来的军事生涯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为他从一个基层指挥员锻炼成长为优秀的高级指挥员奠定了基础。正如一个在山里炼好基本功的武林高手一样，一旦出山就有了英雄用武之地，亮出一个又一个绝技。1938 年 4 月，粟裕奉命出山，率部投入了抗日战争大洪流，挺进江南的第一仗，首战韦岗而旗开得胜。在后来的实践中，战黄桥东进抗日，抗日寇坚持苏中，战苏中“七战七捷”，跨陇海北上山东，战莱芜空前大捷，啃强敌孟良崮全歼“王牌”，战豫东逐鹿中原，战淮海决胜江北，粟裕的军事指挥艺术越来越精，连续作战，连续得胜，不愧是常胜将军，杰出的军事家。

（选自《纪念粟裕逝世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作者单位：中共龙泉市委党史研究室）

斋郎战斗始末

陈明赞　张　树

（一）

斋郎战斗，在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坚持浙西南三年游击战争的历史上，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浙西南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地区，敌人驻扎有较强的保安团，敌人以我军进入浙江之后，必将在龙泉河以南的浙闽边立脚，遂将浙西南以北的浙江保安团纷纷南调，并勾结福建的第十师、第五十六师北进，妄想南北夹击，消灭我军。庆元、景宁与福建的寿宁、政和几个县，到处都是深山老林，层峦叠嶂，交通不便，好隐蔽。但也有不利条件：面积大、人口少，发展队伍缺兵源；山地多、耕地少、群众生活困难，给养有问题；且封建迷信严重，地主反动武装和“法兵”多，白天黑夜不时给红军找麻烦。我军自怀玉山突围，损失严重，当时无论兵员、给养装备都比较困难。进入浙闽边区后，虽连续打了一连串胜仗，但在泰顺打了胜仗回来后，放松警惕，曾在寿宁上村遭到闽保马洪琛部的一次夜间袭击，受了一些损失。除了头一天在潭边街抓来的几十个俘虏和缴获的几十条已经取下枪柄的步枪及我军原有收报机、电话机、电话线丢失外，还牺牲了十几名战士，丢失白银九担（每担八百元），师政委特派员姚阿宝失踪。我军突围时被敌人冲散，二天后才聚集起来。基于以上种种原因，在行动上曾一度陷入被动，部队中有少数同志产生了畏难情绪。部分同志认为浙江是蒋介石的老窝，敌人统治力量强，不愿在浙闽边区打游击。当时形势对我不利，追敌已四面迫近，环境异常恶劣。敌人自上村得手后，气势更加嚣张。其中李秀的浙保第一团和马洪琛的闽保第二团，是战斗力比较强的两个团。又先后接近我军，如果不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就不能在浙西南站住脚跟。

1935 年 4 月下旬，挺进师甩开敌人，由寿宁进入庆元，经荷地、张村、西管岚、烂泥于 4 月 23 日（农历 3 月 21 日）下午进驻斋郎村。在首长粟裕、刘英同志的指挥下，经过数日紧张的战前准备。精心组织，以少胜多，以逸待劳。取得了斋郎战斗的大捷，鼓舞了士气，沉重打击了敌人，使浙西南敌人一度由攻势转为防御，不敢轻举妄动，政治影响和斗争局面都有极大的扩大和好转。

（二）

斋郎村位于庆元、龙泉、景宁三县交界的山岙里，海拔 1248 米。群山起伏，山高林密，附近

山岭绵亘，险峰崛起，介于浙江省最高峰黄茅尖（海拔 1929 米）、次高峰百山祖（海拔 1856 米）之间，是庆元县地势最高的地区，地形非常险要。在斋郎战斗之前三月底，粟裕、刘英率领挺进师进入浙西南后，曾经龙泉、景宁等县边境，分路进往闽东，其中司令部与刘汉南部曾经柳八际，到达斋郎村，然后转合湖往寿宁。转了一个大圈子后，4 月 23 日又进入斋郎村。这次进村后，经过深入了解，察看地形，决定在这里给敌人以沉重打击。阵地选择在离村三里的闲后山背面，既可以充分利用地形的优势，又可避免在村内迎战，使群众的财产遭受损失。斋郎村后的鲁班路口是我军指挥阵地，从前沿阵地上下来的部队可以在这个山包里休息，并便于出击敌人。岙口就是通向黄麻岭的大聋岭头，我军用一个排、轻机枪一挺防守。斋郎向黄麻岭的横路边有个小山叫猪头岩，用两个连、重机枪一挺、轻机枪两挺阻截，即可以封锁敌人的进攻，又可以用重机枪堵死敌人的退路。从大聋岭向右延伸百把米就是放牛场，即我军打击敌人的正面战场。鲁班路是由景宁境内英川一带到庆（元）龙（泉）的通道，我军后勤部队就驻在庆、龙分岔路口的后坑亭。由一个排保护，也是我军防止万一战斗失利的退路。敌人一旦进入阵地后，就会进入“进既不能，退又无路”的困境，而我军据险可守，又便于出击。这时敌人已组织了以浙保一团为主力，马洪琛的闽保二团及上千名“法兵”配合作战，以浙保一团团长李秀为指挥官。东北面浙保一团已进驻离斋郎 15 华里的三堆村；西南面闽保二团马洪琛进驻离斋郎 30 华里的梅岙下；东面王逢春的独立营进驻离斋郎 20 华里的合湖。“法兵”是从东面及东南面的合湖、石湖、后溪（属景宁，解放后划入庆元）及荷地周围结集起来的。敌人仗着数倍于我的兵力，从东北、东、东南、西南四面扑向斋郎，企图将我军一网打尽。

在我军粟裕师长、刘英政委等首长领导下，分析了敌我情势。敌人虽然众多，但多数士兵不甘为反动派卖命。像马洪琛部是福建省保安团队，他们只要将红军送出福建省境就可以交差了，只怕碰上红军损兵折将、丢官送命，是不会在浙江替反动派出大力的；“法兵”完全是一群乌合之众，大都是受蒙蔽的农民，受地霸、国民党反动派唆使强制而来的，真正死心塌地听从反动派指挥的不多，何况刀枪不入根本是骗人的鬼话；再说敌人的主力李秀团，已在景宁驮洋与我较量过，是我军的手下败将。所以说，敌人的战斗力是不强的。而我军是久经考验的红军战士，又与原留在闽东根据地养伤的红七军团的部分指战员会合，壮大了挺进师的力量，凭借险要地形，经过充分准备，以逸待劳，必定能取胜。于是我军一面加强对群众的宣传教育，一面积极进行构筑防御工事，并派小分队到附近村落捕获土豪，侦察敌情，进行紧张的战前准备工作。

（三）

当我军刚进驻斋郎时，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影响，大部分群众逃到山里躲避我军，村里只剩下一些老弱病残的群众，后经我军家庭访问，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书写“打土豪，分田地”“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工农红军是人民的子弟兵”等墙头标语，把地主家里的粮食

送到群众家里，把村子扫得干干净净，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留村的农民见红军纪律严明、和蔼可亲，才解除了戒备心理，把逃避在外的人叫了回来，有的积极帮红军做防御工事，有的还要求参军，像叶庆绪、叶木山就在斋郎战役前入伍。

我军到斋郎村后，即用簟篷搭起五个哨所，封锁消息、观察敌情，五个哨所分别驻在瓦窑凸（斋郎至庆元方向的路口）、上村凸（斋郎村口）、后坑亭岙门（斋郎至龙泉方向的路口）、猪背脊（斋郎闲下至烂泥方向）、外门凸（斋郎村对面）。

4 月 27 日，我军还派了一个小分队到木耳口，侦察敌情，当天返回（往返 60 华里）。到榲堆打了几个地主，在黄麻岭抓了地主吴祥炳（斋郎战斗后，带到龙泉南溪处决），当侦察得悉敌人即将向斋郎进犯，我军即把地主家的谷箩、箱、桌板等家具，用以构筑村沿工事，并作好战斗准备，严阵以待。

（四）

4 月 28 日，我军进入斋郎的第六天，天未亮，红军吃过早饭、备好中饭。果然，6 时许，法兵充当头阵，从烂泥扑向斋郎“双际下”，虽然红军向他们宣传我党政策，但不听劝阻，在水口我军被迫开枪扫射，“法兵”一有中弹者身亡，其余的见红军封锁了去路，即从“双际下”撤退，直插东南侧的岙头淤，向我军冲击，牛角筒“嘟嘟”叫，“冲啊”“杀啊”的叫唤，上千名穿着红黄各色的怪衣服的大刀会“神兵”，舞着大刀长矛向我军阵地猛冲，虽然我军再三地宣传我党政策，教育他们不要替反动派卖命，但这些亡命之徒吃了朱砂符，红着双眼，竟冲上来杀害我军干部一人，我军不得已从两路出击，一个支队正面拦阻，另一个支队从侧面给以打击。我军的枪弹手榴弹准确地落在敌人阵地上，自称刀枪不入的“神兵”，随着爆炸声倒了下去。后面的一看符咒失灵，赶快回头四处奔逃，不多久“法兵”就垮了下去，死伤十多人，被我军活捉了二十多人，经对他们教育后，马上放回去。打垮“法兵”后，粟裕带领参谋人员巡视阵地，简单地作了动员，我军主力进入斋郎背后山岙上部署迎战。这时，李秀率领着浙保一团，从三堆进至离斋郎 5 华里远的黄麻岭，当与我黄麻岭岙部队接火时，一个连长走在前面，即被我军一枪打死，我军且战且走，诱敌进入包围圈。大约八九点钟时，李部向我大聳岭头阵地进犯，并沿着放牛场阵地向我军发起冲锋。机枪、步枪、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战斗非常激烈。敌人反复发起十多次冲锋，都无法冲上我军前沿阵地，进退无路。战斗持续到下午五时许，太阳快要落山，敌人自己阵脚大乱攻势减弱。我军领导见反攻的有利时机已到，立即下达冲锋命令。一声令下，“冲啊！”我军犹如猛虎下山，向敌人冲去，猛烈的火力打得敌人尸横遍野，吓得敌人魂飞魄散，狼奔豕突，有的慌忙抛掉武器随山滚到小溪逃命，有的随原路逃向英川，有的乖乖举手缴械投降。我军第三纵队在刘汉南、张云龙首长指挥下，一直冲到十里外的榲堆，到天黑才收兵回斋郎。这次战斗收获很大，共打死打伤敌人一百多，俘敌一百多，有许多是躲在树丛里打扫战场时才抓来的。李秀的一个护兵也成了我军的俘虏，他说"李秀的轿子打坏了，手被打断了，他妈的，他

被打伤有护兵背走，我们只好等死"。

在战斗打得最激烈的时候，马洪琛部到离斋郎 30 华里的梅岙下，就再也不敢前进了。国民党王逢春独立营三百多人从合湖到烂泥闲后桐梓岭头，就停在那里观战。

战斗胜利结束后，我军一小部分当晚抬着十多个伤员先撤到十里外三井溪休息，其中一个到三井溪后因伤重牺牲。还有两个重伤员仍留在那里，由一个小红军护理，群众帮助搭了一个草棚养伤。过了几天，龙岩村地主吴启运带着龙泉的国民党侦探李八妹上山杀害了我三个红军，挑走三个头颅想去龙泉报功，又怕路上碰到红军自己的狗命难保，到龙岩村将红军头颅丢在路边，以后由当地群众帮助埋葬。原三个红军尸体由三井溪村人抬到山上埋入旧坟洞内（1982 年庆元县内务局在龙岩村修建烈士墓，将四位战士的遗骸集中移到龙岩烈士墓，以表怀念）。

主力部队在斋郎村歇宿，第二天还驻了一天，我军政治部对俘虏进行教育后，每人发给五块银洋，将其遣散。清扫战场，处理善后事宜。4 月 30 日，经过三井溪，到南溪外十五里处（龙泉属），打退"法兵"拦阻，到粟阳住宿。接着又在洋顺岙打退法兵，继续行军，乘胜渡过龙泉河，向北挺进，把游击战争打到浙赣铁路以南广大地区。

这次战斗，我军缴获重机枪 1 挺、轻机枪 4 挺、长短枪 150 多支、子弹万余发。供给部为了整理战利品，整整忙了一天一夜，特别是枪支处理，除挑选好的枪交由部队更换和挑走外，还有 80 多支长枪和 2 挺不大好的轻机枪均卸下机柄，用棺材装好埋在斋郎村外的乌沿坑山上。以后这批枪支被后坑头自然村的吴驮路发现，向斋郎保长叶光顺报告，被富农叶庆含听见，赶到景宁英川向李秀报功，使这批枪仍落在李秀手里。

我军自 4 月 23 日进入斋郎村，4 月 30 日离开，头尾共 8 天。这次战斗，我军前后共牺牲 20 余名战士，其中政治部宣传科长王维信同志，因负重伤抢救无效光荣牺牲，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烈士的遗骸现已收葬于庆元县烈士墓。昔日烈士的鲜血和生命，换来了今日革命的胜利。烈士们英勇献身的革命精神，光照千秋，永垂青史。

（摘自中共丽水地委党史研究室 1995 年 10 月印行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作者单位：中共庆元县委党史研究室）

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邓唐良

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是粟裕、刘英率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在1935年3月至1938年3月间创建的浙江第一块游击根据地。其范围包括浙江的松阳、遂昌、龙泉、江山、云和、庆元、景宁、宣平、龙游、汤溪、丽水、缙云、青田和福建浦城等十几个县的各一部分地区。挺进师在浙西南活动的前期，便在遂(昌)西南、龙(泉)西北、松(阳)西南、江(山)南、云(和)西北一带形成了以王村口、住溪、玉岩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基本区域；后期则在遂(昌)江(山)浦(城)边、龙(泉)遂(昌)边、龙(泉)浦(城)边、宣(平)遂(昌)汤(溪)边一带，形成以湖岱口、周村、门阵为中心的基本区域。浙西南根据地的存在，有力地支援了闽东、闽北、浙南几块根据地的斗争，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重要战略区域之一，为浙江革命史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只知浙南根据地、而不知还有浙西南根据地。事实上，浙西南是既与浙南有联系，同时又是独立的根据地。笔者在整理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史料的过程中，深感对这块根据地有认真研究的必要，故特就几个有关问题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正于党史学界的前辈与同行们。

一、关于红军挺进师对根据地落脚点的选择问题

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怀玉山失利后，中央指示突围部队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长期活动，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游击根据地。挺进师入浙后，便选择浙西南为首先开辟根据地的目标。决定先取此地，作此选择是鉴于浙西南地处闽、浙、赣三省接合部，具有地势复杂，国民党统治相对薄弱，群众基础较好，且靠近闽东、闽北、闽浙赣几块根据地等有利因素。然而，浙西南共有10个县，到浙西南后又先从何处站住脚跟呢？据我们分析判断，挺进师将浙西南作为第一个目标是明确的，但到浙西南后把根据地落脚点放在哪里，则是以后在斗争实践中逐步确定的。

挺进师到达闽北后，曾与闽北党负责人曾昭铭等人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组成互为依靠的闽北、闽东、浙西南三角地段。1935年3月挺进师抵达浙闽边，便千方百计寻求与闽东地方党联系，以便向他们传达当时中央的各项决议及转变策略路线的指示。为此，曾往返作战于江山、龙泉、庆元、景宁、松阳、政和、寿宁、泰顺一带，在近两个月内打了十几仗，取得了溪头、小梅、沙湾、上标、潭边街、百丈口等战斗的胜利，歼灭了一批保安团队和地主武装。敌人以为红

军要在龙泉河以南的浙闽边境立脚，即将龙泉河以北的浙江保安团部队南调，并令福建新十师和第五十六师北进，妄图南北夹击，将挺进师消灭于立足未稳之际。而红军挺进师通过在浙闽边近两个月的集中与分散的活动，已深感这个地区群众基础薄弱，兵员和军粮较难补给，加上不时受到松溪、寿宁、政和、庆元、景宁一带反动帮会组织“大刀会”的骚扰，于是放弃了打通与闽东联系的初衷。

4 月 19 日，挺进师在寿宁上村遭敌夹击，战斗失利。这时部队情绪有些波动，有的同志认为浙江反动势力强大，力主到福建建瓯、建阳去活动。师部领导研究后认为：到浙江开辟根据地是中央交给的任务，主张到“两建”去活动是错误的；并认为在敌人进攻时，不宜固守一地，而应毫不犹豫地向敌人侧后方及其最关痛痒的地区转移。在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中，寻求新的落脚点。

4 月下旬，挺进师果断甩开敌之包围，从寿宁进入庆元，于 4 月 23 日到达斋郎村。28 日取得了斋郎大捷，毙、俘敌 200 多人，迫使龙泉河以南敌保安团转攻为守，龙泉河以北及杭（州）江（山）铁路以南之敌也异常恐慌。

挺进师政委会遂决定，除将部分部队仍留龙泉河以南牵制敌人外，师主力北进松阳、遂昌、龙泉、浦城、江山、云和等县开展游击活动，寻求新的落脚点。

5 月 10 日，挺进师到达松（阳）遂（昌）龙（泉）云（和）边区的安岱后、小吉、枫坪等地时，受到当地“青帮”的热烈欢迎。

挺进师领导进一步了解浙西南的情况，经过多方比较，认为松（阳）遂（昌）龙（泉）浦（城）云（和）边区一带群众基础好，又有当地“青帮”支持，加以北上抗日先遣队余部洪家云的两个连曾活动于龙（泉）浦（城）江（山）遂（昌）地区，在这一带已有一定的工作基础，这里地处闽、浙、赣三省接合部，境内山高林密、沟壑纵横、地势险要，进守自如，利于游击战争，因此决定把根据地的落脚点放在松（阳）遂（昌）龙（泉）浦（城）江（山）云（和）边界地区，并初步选定龙（泉）浦（城）江（山）遂（昌）和龙（泉）云（和）松（阳）遂（昌）东西两片地区作为建立游击根据地的基本区域。

二、关于浙西南的“青帮”问题

松（阳）遂（昌）龙（泉）边界地区的“青帮”首领是松阳安岱后村的陈凤生、陈丹山和斗潭村的卢子敬。陈凤生早年在温州经商时加入了“青帮”，曾受到 1928 年闽北崇安、浦城暴动的影响，思想进步，向往革命。卢子敬早年留学日本，受过进步思想启蒙，中途归国，回乡办学，积极传播革命思想，共同的理想使他们一拍即合，以组织“青帮”为掩护，秘密进行革命活动。龙（泉）遂（昌）松（阳）宣（平）边区有 5000 多贫苦农民先后加入“青帮”组织，于是陈、卢以“青帮”为基础组织农军。1930 年 4 月，农军袭击了松阳玉岩警察所，5 月至 8 月参加了我党领导下的松（阳）遂（昌）宣（平）三县农军联合的牛头山武装暴动，后改称为“红十三军浙西三纵队”。暴

动失败后，“青帮”首领流亡在外，几年后潜回松阳继续领导“青帮”组织。红军挺进师一到松（阳）遂（昌）龙（泉）边界的安岱后等村时，便受到“青帮”首领陈凤生等的热烈欢迎。他们主动要求接受红军领导，提出“青红不分家”的口号。红军对他们进行了教育和改编工作，吸引他们参加革命活动。

对于“青帮”在浙西南游击根据地中的作用，粟裕同志曾予以很高的评价，他说：“我们一到，他们就积极靠拢我们，主动希望得到共产党的领导。这样我们有了初步的依托，对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开辟，起了很好的作用。后来，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参加了红军游击队和根据地建设工作，一些先进分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挺进师进入浙西南地区后的第一批地方党员和干部。”我们认为，挺进师要是没有当地“青帮”组织作为依托，要在浙西南站住脚跟，其难度会是相当大的。这只要对比挺进师当初在浙闽边区遭遇也可想见。从地理位置特别是从靠近闽东、闽北、闽浙赣的几块根据地的距离来看，闽浙边区的条件无疑比松遂龙一带有利，但挺进师为什么不能在浙闽边区立足？关键就在于那里没有一个像浙西南的“青帮”这样好的群众组织可依托。

因此，我认为研究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斗争史就不能不涉及当地“青帮”的作用。这如同要研究井冈山的斗争就不能不涉及王佐、袁文才一样，王佐、袁文才开始是占山结寨的山大王，并没有多大革命理想，是经毛泽东、朱德等改造而倾向革命，最终走上革命道路的，陈凤生、卢子敬则是在挺进师进入浙西南之前就曾倾向革命，有一定觉悟程度。所以，当挺进师一到安岱后村时，他们就主动要求红军领导，这在当时是很不简单的，正因为有这么好的一个群众组织可作依托，红军挺进师才决定把落脚点放在松（阳）遂（昌）龙（泉）边区一带，此后无论在根据地的初创阶段还是建设、保卫阶段，当地“青帮”组织都作出了贡献，并付出了重大牺牲。红军挺进师第五纵队就是以当地“青帮”人员为基础组建的，这个纵队在保卫根据地的斗争中几乎全军覆没。原“青帮”首领陈凤生曾担任松遂龙游击总队总指挥，卢子敬担任副总指挥兼浙西南硝磺厂厂长，陈丹山担任浙西南军分区征募主任，他们在保卫根据地的斗争中先后壮烈牺牲。所以要研究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就不能不研究当地“青帮”及其首领陈凤生、卢子敬、陈丹山。

三、关于特区问题

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党政军机构是否健全？这个问题在我们收集整理浙西南游击根据地专题史料的过程中是有争议的。

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内有全区性的党组织——浙西南特委，有全区性的军队组织--浙西南军分区，这是大家都无异疑的。争议之点是有没有全区性的政权组织。

有的同志认为“特区”即全区性政权组织，其依据是：

1. 原红军干部王金根被俘后的供词：“红军挺进师奉命到浙西南，建立地方游击队、贫农

团、赤色农会、赤色工会及交通站等，在所谓公开的地方，则建立革命委员会，其上面尚有特区及特委的编制……”

2. 原地方干部万步青被俘后的供词：“7 月 28 日（公历 8 月 26 日），红军在大桥上开会，组织革命委员会，进行了分工……派我做龙遂浦特区第五区革命委员会主席。”“红军给我们一面大红旗上面写的是龙遂浦特区第五区革命委员会”。

3. 国民党《东南日报》1935 年 9 月 29 日有一则关于龙泉方面的战事消息：9 月 24 日夜缴获“龙浦江衢特区委员会石印一方”。同年 10 月 8 目《东南日报》称方志富为“龙浦江衢特区政治委员”。

4. 挺进师参谋长王蕴瑞 1981 年 1 月 6 日在《有关挺进师的一些回忆》的“建立特区”一节里说：“挺进师领导同志在白岩开会，讨论对敌斗争的方针，会议决定以此地区为基础建立浙西南特区。”

对特区持不同观点的理由主要是：特区的性质究竟是什么？能不能断定特区就是全区性的政权组织？既然特区存在，那么领导人又是谁？这样大的事为什么当时两位主要领导人刘英、粟裕的文章都没涉及？

我们认为，对于特区问题还是不要轻易地作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而是以留待党史资料的继续深入发掘与研究后再作定论为妥。

四、关于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特色及其价值问题

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是由一支别无根据地依托的弱小的红军部队，在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开辟和发展起来的，且其时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业已失败，国内军阀战争也已基本停止，蒋介石反动统治正进入鼎盛状况之际，这就形成了这一游击根据地不同于其他根据地的若干特色：

第一，由于浙江省无论就政治、经济及地理位置而言，都属于国民党统治的腹心要害地区，在此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势必对国民党的统治直接造成巨大威胁，这绝非蒋介石所能容忍。这就决定了浙西南游击根据地三年间的“清剿”与反“清剿”斗争之特别频繁、持久和残酷，付出的代价也特别沉重。在这三年内，由浙西南子弟组成的红军挺进师第五纵队几乎全军覆没，一大批党的优秀儿女惨遭杀害，四任浙西南特委书记相继牺牲。

第二，浙西南游击根据地较顺利地实现了两大战略转变：即实现从正规的运动战转向同环境相适应的游击战；随着民族矛盾的上升，又果断而机敏地实现由土地革命战争转向抗日战争的大转变。其间没有经过大的波折与反复。

第三，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建设紧紧抓住了武装斗争这根主线，以红军武装和地方武装相结合共同推动根据地建设，乃是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建设中的一大特色。他们深知在敌情极险恶的敌后开辟游击根据地，没有武装斗争的保护和推动，一切都只能是空想，因此紧紧

把握了武装斗争这根主线，一部分红军干部被派到地方组建起了大小游击队，游击队坚持在根据地内部打游击、搞建设，挺进师主力则深入外线打击、牵制敌人以掩护根据地的建设，就这样以正规红军与游击队相结合的办法，不断取得战斗的胜利，巩固、发展了根据地建设的成果。

第四，浙西南游击根据地自始至终抓政权建设。挺进师自站稳脚跟后，就着手政权建设。早期是公开建立红色政权，后期根据形势的变化，便搞"白皮红心"的政权。由于始终抓了政权建设，便有力地推动了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发展。

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处在白色政权四面分割包围之中，既失去与中央和上级党组织的联系，又无邻近的红色区域可依托，却能屹立于国民党统治的心腹地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成功地坚持了三年艰难曲折的斗争，这一历史实践表明：只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充分相信群众，紧紧依靠群众，则不仅在敌人统治薄弱的边远地区有可能建立革命根据地，而且即使在反动统治的腹心地区也有可能建立根据地。这就是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价值所在。

（摘自中共丽水地委党史研究室 1995 年 10 月印行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作者单位：中共丽水地委党史研究室）

对浙南三年游击战争几个问题的探讨

刘宗鹤

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是我国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紧接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失败开始的。浙南游击区，是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在革命处于低潮之时，进入浙江境内开辟和发展起来的。其中心区先是在浙西南地区、以后移到浙南地区。这场游击战争，从 1935 年初开始，直到 1937 年 10 月中旬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红军挺进师与国民党地方军政当局和平谈判达成协议才告一段落。

本文拟就有关浙南三年游击战争的几个问题作一论述。

一、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与红军出师入浙

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围剿”开始两个月后，当福建事变出现之时，毛泽东同志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的发言中，很明确地提出了：“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这种方法是必能确实援助它的。”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这是一举两得的上策。可惜此时毛泽东同志正处在无权地位，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着的党中央，对毛泽东同志的这一军事主张拒不采用。结果，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福建人民政府也垮台了。至 1934 年夏，中央苏区由原来的纵横各近千里的地域、缩小到纵横各三百多里，敌军重兵压境，不断向我中心区进攻，军事形势十分险恶。7 月，中共中央和军委决定将红七军团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6000 人）。希图以先遣队的行动，震动杭州、上海、南京等地国民党心脏地带，吸引和调动一部分“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打乱国民党原来的部署，解救中央苏区，掩护中央红军主力的战略突围。在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第五次反“围剿”败局基本已定的危急关头，才派出这支先遣队，为时已晚。此时的蒋介石是绝不会变更原来的战略部署的，丝毫没有放松对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主力的“围剿”。中央红军主力只得仓促突围（退出江西中央苏区），在开始长征的途中屡战屡败。在此情况下，党和红军的一些干部因尝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铸成大错的苦楚，从内心里怀念毛泽东同志，为毛泽东同志的军事主张不得采用而深感遗憾。

肖华同志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是指引长征路线的灯塔》一文中说：“在党和红军处于危急

关头，毛主席力挽狂澜，提出了停止去湘西，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的主张。”由被动转为主动。12 月，红军占领通道城后，立即进入贵州东部，攻克黎平。12 月 18 日，中央在黎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到会的多数同志赞同毛泽东的军事主张，否定了“左”倾领导的错误主张。此时，中共中央及军委给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命令和指示中，明确提出了“先遣队应派一个得力师，酌量的派遣工作人员与适当配备干部到浙江长期行动，号召与组织广大的人民一致进入抗日阵线，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发动广大的民众，改善民生，巩固与扩大自己的部队。一直到建立革命的根据地。”毛泽东同志素以善于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和善于运用游击战术而见称。党中央这一指示电，无疑是采纳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而发的。先遣队政治部主任刘英，在《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中写道，当时先遣队“接到中央与军委的指示之后，讨论时有两个争论：甲、大部分同志主张立即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分头出动，粟、刘到浙江行动，方志敏等回闽浙赣基本地区，乐少华、刘畴西等同志率一师留皖南行动，其余部队随方同志回基本地区。乙、少数同志主张暂不分开，统回闽浙赣基本地区，将部队整理、训练与重新配备干部后，再行分开。由于军团首长坚持后一意见，结果抛弃了第一方案，同意了第二个意见，这是不该的。”先遣队参谋长粟裕在《回顾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一文中是这样记述的：在强大敌军‘追剿’下，应适当分散兵力，形成几个目标，同敌人盘旋兜圈子，多打游击战，以吸引、迷惑和打击敌人……以改变不利态势，争取战场主动权……但是，由于军团领导权掌握在曾洪易、乐少华手中，同志们的这些正确意见得不到重视和采纳。由于曾洪易等坚持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路线，结果把长于打游击的红十军和地方武装同长于打运动战的红七军团合编，组成新的大兵团，集中在一起打运动战。合编后“正规战打不成，游击战也打不成”。1935 年 1 月，先遣队在怀玉山遭到七倍于我之敌重重包围和堵击，惨痛失败。大部分指战员在血战中英勇牺牲，只有粟裕、刘英等所率领的先行部队于 1 月 14 日突围，安全到达闽浙赣苏区基地。

1935 年 1 月 15 日至 1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结束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此时，中共中央向苏区分局发出指示电，命令以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先头部队和突围部队为基础，迅速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任命粟裕为师长、刘英为政治委员。其任务是：进入浙江长期行动，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苏维埃根据地；以积极的作战行动，打击、吸引和牵制敌人，保卫闽浙赣基本地区和邻近的根据地，并从战略上配合中央红军主力行动。中央政治局这个指示电，是在新的形势下，再现了毛泽东同志关于红军出师入浙长期行动的战略思想。

在闽浙赣省委的领导和帮助下，迅速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2 月 27 日从江西上饶之灵山附近出发，经由闽北进入浙西南，拉开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的序幕。

红军挺进师入浙之后，开辟了浙南游击区（包括浙西南、浙南、浙东三块游击根据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不断地打击和牵制敌人。国民党反动派仅在 1935 年 9 月到 1936 年 6 月和 1937 年初到 1937 年 9 月的两次大“清剿”中，就先后调集了正规军 32 个团和 43 个团的兵力，

并且持续各达 8 个月之久。这在客观上策应了中央红军主力北上抗日的战略行动和其他战场的斗争，浙南游击区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个坚强而重要的战略支撑点，并保持和培养了战斗的骨干力量，以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在以后的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都发挥过巨大的作用。

浙南三年游击战争的实践，证实了毛泽东关于红军出师入浙长期作战的战略思想的正确性。

二、浙西南游击根据地迅速建立和发展的主要因素

红军挺进师自 1935 年 4 月初进入浙西南至 9 月中旬，前后六个半月，部队从原有的 538 人发展到近千人，扩编为 5 个纵队和两个独立支队，连地方工作人员，不下两千余人，地方武装也有千余人。玉岩、住溪、王村口等地的苏维埃政府和分田委员会像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迅速地在龙泉、遂昌、松阳、江山、浦城五县之间形成了浙江第一块游击根据地——浙西南游击根据地。

挺进师入浙之后，在这短短的几个月中，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发展并建立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有如下几个重要因素：

1. 浙西南的地理环境有利于开展游击战争。

浙西南位于闽浙赣三省交界，全境群山连绵，间有山谷平地和山间盆地，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其山重峦叠嶂，其水屈曲萦回，崇山峻岭，森林茂密，便于红军隐蔽和回旋，是个开展游击战争的好地方。

再从地理位置来看，浙西南可以与闽北、闽东、闽浙赣几个游击根据地互为犄角，互相支援。而三省敌人之间的矛盾，又可以为红军所利用。

2. 浙西南的人民有强烈的革命要求。

浙西南的人民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在此之前，曾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过多次革命斗争。1928 年 7 月，中共遂昌县委领导的农民武装暴动；同年 10 月，中共宣平县委组织的农民暴动；1930 年浙南成立了红十三军，在处州地区活动频繁，宣平、遂昌、松阳等县红军会合在牛头山区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过坚决的斗争。

还由于国民党政府日益腐败，对人民群众的压迫和剥削，加上连年的天灾，广大的民众处在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

据史料记载：1934 年，浙西南地区旱灾甚为严重。如江山县大旱延续 130 天，全县稻田 398500 亩，受灾面积在 318800 亩，减产八成，直接受灾 2 万户（全县 5 万户），断炊近一半；遂昌全县稻田 157745 亩，受灾面积达 90000 余亩，直接受灾者达 95600 余人。1935 年丽水、龙泉、松阳、遂昌、江山等县又暴雨成灾，山洪暴发，河流顿形高涨，冲毁农田房舍无计，春花荡然。其中龙泉县被淹田地 14000 余亩，只有百分之五的收成，灾民 35000 余人；遂昌县被淹田

地 30000 亩，减收三成以上；庆元县被淹田地 1700 余亩，其中 700 亩只有三成收成；丽水县水灾面积 20 余平方公里，减产百分之五十，灾民 5500 余人。整个浙西南地区的农村经济濒临破产。龙游南乡有纸糟工人三千余众，生活极度困难，他们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极为不满，对革命有强烈的要求。犹如通地火柴，一触星星之火即发燎原之势。

3. 红军在浙西南有一定的工作基础。

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浙西南地区的遂昌、宣平等县都建立过中共县委，并建立过农民革命军、红军。1932 年后，赣东北红十军曾配合闽北红军一度占领浦城。1934 年，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曾留下营政委洪家云率领的第五十五团第二营第四、五两个连（后编为闽北军分区第三团，故又称“红三团”），在庆元、龙泉、江山、崇安、浦城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同年 9 月，红军在竹口战斗中歼敌 300 人，活捉国民党庆元县长张致远。接着又在江山县清湖把没收土豪劣绅的粮食等分给广大贫苦民众，镇压了坚持反动立场的国民党官员和恶霸。同年年底和 1935 年 1 月初，洪家云率部袭取王村口、柘岱口等地，并在这些地方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发动群众，开仓济贫，帮助劳苦民众解决饥荒问题。在广大民众的心目中，共产党、红军就是大救星。良好的群众基础，民心所向，这也是挺进师进入浙西南之后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正如粟裕同志在《回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一文中所说的：“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我们对浙西南地区的具体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从实际出发，我们选择了龙（泉）浦（域）江（山）遂（昌）和龙（泉）云（和）松（阳）遂（昌）东西两片地区作为建立第一块游击根据地的基本区域。因为洪家云同志率领的两个连归建之前，在龙浦江遂地区活动过，这个地区有一些工作基础；和我们有联系的‘青帮’组织在这一带也有较大的势力，便于我们开展工作。”

4. 有当地的“青帮”组织作为依托。

当时松（阳）遂（昌）龙（泉）三县边境的“青帮”组织，有会徒五千之众，大多数是出身贫苦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其首领是松阳县玉岩区斗潭村的卢子敬和安岱后村的陈凤生。卢子敬出身于地主家庭，1911 年曾东渡日本，在东京早稻田大学攻读，接触了进步思想。辛亥革命后，于 1913 年初归国，热衷于乡梓教育。“五四”运动后，受进步思潮影响，在北伐战争的革命高潮中，和陈凤生、陈丹山等人在故乡宣传“耕者有其田”，鼓动开展“二五减租”。后来，卢、陈受闽北农民暴动的影响，假借“青帮”组织为社会掩护，组织农军开展斗争。1930 年曾率农军与遂昌、宣平农军会合于牛头山，举行武装暴动，后遭镇压失败。1935 年 5 月上旬，红军挺进师进入到龙（泉）遂（昌）松（阳）三县边界地区，受到当地“青帮”的热烈欢迎。“青帮”群众希望得到共产党的领导。这样红军挺进师就有了初步的依托，对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开辟，起了很好的作用。“后来，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参加了红军游击队和根据地的建设工作，一些先进分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挺进师进入浙西南地区后的第一批地方党员、干部。”

5. 红军挺进师本着把武装斗争与根据地建设相结合的原则，运用了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

时期“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打击敌人”的领导方法。

面对灾荒严重的社会现实，公开提出了“打土豪，开仓济贫，帮助群众战胜饥荒”的口号。同时，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此时，挺进师政委会坚定地执行土地革命的路线和政策，“打土豪、分田地”，广泛发动群众，从事游击根据地的建设。这是符合当地基本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因而获得了初期的成功。

三、第一次反“清剿”斗争失利的原因

浙西南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使国民党浙江军政当局恐慌不安。他们的喉舌《东南日报》大声疾呼：“浙江素称平安之区，自粟、刘窜浙，匪化已波及全浙。以目下形势而论，浙江共匪不亚于四川、江西之匪……前途实堪可虑。”蒋介石鉴于保安团对付不了红军挺进师，决定调主力部队来“围剿”，七八月间先后任命卫立煌和罗卓英为“闽赣浙皖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的正、副总指挥。该总指挥部制定的《第一期清剿计划》确定“以各边区大部对粟、刘”，并委任第十八军军长罗卓英统一指挥。敌人集中了 32 个整团，约七万人的兵力，连同地主武装号称 40 个团，妄图围歼红军游击队，彻底摧毁浙西南游击根据地。

挺进师政委会决定采取“敌进我进”的战略方针，留下第二纵队和第五纵队就地坚持，其余主力部队迅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以积极的作战行动吸引敌人、调动敌人，并开辟和建立新的游击根据地。

9 月 19 日，罗卓英指挥所部开始血洗浙西南，先后延续 8 个多月，直到 1936 年 6 月“两广事变”爆发才结束。

以黄富武同志为首的浙西南特委和军分区领导浙西南广大革命群众和挺进师第二、第五纵队，在敌我对比众寡悬殊的极端残酷形势下浴血奋战。至 1935 年 10 月底，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中心地区丧失了。个中缘由，是多方面的。

从外因来看，有 4 个原因：

1. 敌我力量对比过于悬殊。

从数量来看，国民党军以 40 个团兵力对付浙西南，此时，红军挺进师实际兵力不足一个团。敌我之间真正的实力为 40 比 1，实力差超常。

以军事素质而言，敌军十八军所属 4 个师加 1 个特务团，人员充实，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补充完备，战斗力强，李树森、黄维、霍揆彰、胡琏、阙汉骞、高魁元、宋瑞珂等师、团长都有一定的军事才干（后来都是国民党军的著名人物）。他们与红军作战都有相当的经验。而红军挺进师的装备很差，枪支弹药不足，新扩充的 400 余名新战士手中拿的还是长矛、大刀、鸟枪、柴刀、斧头等。这些新战士和上千名的地方游击队员，没有来得及进行军事训练，就上了战场。

2. 敌军采取依凭碉堡、步步为营的进攻战术不被红军所调动。

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时，卫立煌曾任第五路军总指挥、东路军总指挥、驻闽预备队总指

挥，兼任闽第十绥靖区司令官；罗卓英曾任第三路军副总指挥兼十八军军长。他们通过“围剿”的实践，对红军的战略战术比较了解。卫、罗担任“闽赣浙皖四省边区清剿总指挥部”正副总指挥之后，根据以往与红军作战的经验，周密部署“清剿”计划，采取了依凭碉堡、步步为营的进攻战术。国民党的“清剿”部队在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外围构筑了环形碉堡封锁线，同时又构筑了一条纵碉堡封锁线，将我根据地切成东西两片。另外还在根据地南边构筑了第二道防线，以堵截红军往闽东、闽北方向的退路。然后命令各部逐步向我根据地心腹地区和红军挺进师主力位置推进。红军游击队只得辗转于敌人的碉堡与重兵之间奋战，处于被动地位，仗难以打好，结果弄得疲惫不堪，在拼杀中消耗了自己的有生力量。当红军挺进师主力部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以积极作战的行动，吸引和调动敌人时，罗卓英查明情况，仍将十几个团的兵力死死箍住纵横 100 公里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中心区。挺进师主力未能达到调动敌人之目的。

3. 严密的保甲制度，使红军的行动增加了许多困难。

国民党军此次大“清剿”始终贯彻了蒋介石在“围剿”中央苏区时惯用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战略方针。

保甲制度，就是用强制手段把城乡分散的民众组织起来，加强对民众的控制，并进行各种训练，旨在使保甲组织适应国民党“清剿”的需要。如遂昌县 5 个区 50 个乡镇，编为 277 个保 2777 个甲。以保甲为单位举办“联保连坐切结”。利用保甲制度编训壮丁 2650 名，建筑碉堡 20 座，架设电话 310 里，县城及区乡间设有 11 路侦探网和递步哨。全县编有 50 个壮丁队，重要乡镇壮丁队已受训的壮丁，由县配发快枪。其他各县情况也是如此。事实表明，敌人在第一次“清剿”中，经保甲制度控制，民众被迫承担了一部分建碉、运输、侦察、搜索等事务。国民党还通过保长组织严格控制食盐、食油、粮食等物品，防止老百姓接济红军游击队。可见保甲制度的推行，使红军游击队的行动和生活增加了许多困难。

4. 国民党地方武装组织的强化，对红军游击队形成了直接的威胁。

国民党吸取了历次“围剿”的教训，认为只靠正规军的“清剿”不能达到消灭红军、根据地的目的。不把民众组织起来，就无法改变“兵来匪去，兵去匪来”的局面。争取、组织和发动民众参加反共活动和战争是“七分政治”的要害所在。在龙浦江遂松等县建立了县保卫总团、“协剿”委员会，各乡村建立“剿共义勇队”。由于这些人都是本地人，人熟地熟，国民党在“清剿”“搜剿”过程中，有这些人的配合，分外疯狂。各地方“剿共义勇队”成为国民党正规军外的另一支凶恶的敌人。红军挺进师政治部主任兼浙西南特委书记黄富武就是在遂昌县淤头乡外方岭村被当地“剿共义勇队”围捕的。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说：“两军相争，一胜一败，所以胜败，皆决于内因。胜者或因其强，或因其指挥无误，败者或因其弱，或因其指挥失宜，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从内因看，存在以下几个不足之处：

1. 照搬中央苏区的基本政策，脱离了当时浙江的实际情况。

红军挺进师入浙之后，与党中央、闽浙赣省委失去联系，不了解遵义会议的精神，仍旧照中央苏区的那老一套方法建立浙西南游击根据地。以“打土豪，分田地”为基本政策，公开发动群众，公开建立各级苏维埃政府，组织贫农团和地方武装——赤卫队、游击队等。在创建根据地的初期，采取这些办法曾经有力地打击地方反动势力，对发动基本群众和迅速打开局面是有作用的。但是由于受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没有着眼于“号召与组织广大的人民一致进入抗日阵线”，打击面过大，不利于团结更多的人。再者，浙江毕竟是蒋介石、陈诚的老家，国民党的心腹地区，从浙江总体来说，是一个反动势力比较强大的白区，斗争的方法和基本政策应当相应改变才行。可是，红军挺进师在此阶段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既没有因地制宜转变基本政策，又没有根据白区的情况采取武工队和秘密工作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斗争。所以开始一度搞得轰轰烈烈，发展很快，实际上是很不牢固的，经受不起强敌的进攻，也是必然的。

2. “八一”大示威是失策的行动。

红军挺进师为反“进剿”的胜利和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建设的迅速开展所鼓舞，在 7 月底、8 月初发起了“八一大示威”，声势很猛，袭击了 19 个城镇，对敌人震动很大。但是，这是一次得不偿失的行动。一是较多地消耗了自己的力量，二是暴露了目标，起了引火烧身的作用，一度造成被动，从斗争的全局来看，这是失策的。

3. 敌情不明，仓促应战。

8 月，卫立煌、罗卓英已制定了第一期“清剿”计划，那是绝密的，无法知道。可是，9 月初，国民党的第十八军开到龙游、金华一线，所属各师团开向遂昌、龙泉、松阳、云和、丽水等地，敌军这些大的行动，如果红军挺进师的侦察工作得力一点的话，其情报是可以及时掌握的。令人不解的是竟于 9 月中旬上田战斗后，才从被俘的敌兵交待中得知，这次是“中央军”为主力的大规模“清剿”。当红军挺进师政委会召开紧急会议、进行反“清剿”的部署时，罗卓英已下令提前行动了。红军挺进师来不及作必要的思想动员、组织群众和物资准备。由于敌情不明，不能“知己知彼”，导致反“清剿”一开始就陷入被动、仓促应战的局面。

4. 挺进师政委会决定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其主力部队突围之后辗转到浙南另辟根据地是对的，但留下第二纵队、第五纵队坚守游击根据地，未必适宜。

第五纵队是一支浙西南子弟兵，绝大多数是刚刚参军的当地老百姓，第二纵队的军事素质相对好一些。留下这两个纵队对付国民党的几十个团的正规军，明知是难以坚守，不可能取胜的，这两个纵队指战员凭着对党对革命的忠诚，浴血奋战，第五纵队绝大多数阵亡，少数被俘，第二纵队最后仅留几十个指战员，坚守于龙浦江遂边区。在部署反“清剿”时，没有首先考虑如何尽可能保存红军力量，待机破敌，留下五分之二的兵力和强敌拼杀，在兵力部署上有失宜之嫌。关于这一点，粟裕同志说：“后来的实践表明，我们将两个纵队的兵力留在浙西南是留得多了。如果我们当时对敌情有足够估计的话，主力部队还可以少留一些；留下的部队应该化

整为零，采取武工队和秘密工作相结合的活动方式坚持斗争。”

5. 第五纵队和地方游击队缺乏军事斗争的实践。

挺进师主力突围南下之后，第二、第五纵队和地方游击队担负起留守根据地的艰巨任务，第二纵队是经过战争考验有一定军事斗争实践经验的队伍；第五纵队是浙西南子弟兵，他们和地方游击队一样，大都是刚刚组织起来的农民，他们凭着革命热情，放下锄头，拿起武器参加保卫根据地的战斗。但由于游击队的领导人缺乏军事知识，不懂武装斗争的艺术，当遭到敌军围攻时，只是硬拼，第五纵队最后剩下极少数人，绝大多数游击队在与敌人正面战斗时，被打垮或打散了。

6. 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中心区离铁路线太近。

这样一个为广大白色政权包围的小小的公开红色政权，当敌人以强大兵力进行“清剿”时，目标非常突出，难以经得起敌人反复持久的打击。从局部来看，由于上述主客观原因，国民党军对浙南的第一次大“清剿”占领了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中心地区，我方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从全局来看，红军挺进师未被消灭，第二纵队的余部仍在遂（昌）江（山）边和遂（昌）龙（泉）浦（城）边区坚持斗争；挺进师主力撤出浙西南中心区南渡龙泉河后，新开辟了浙南游击根据地；同时还牵制了国民党正规军 40 个团兵力，相应地支援了主力红军的长征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正如粟裕同志讲的：“从总体上看，罗卓英三四十个团的‘围剿’并没有打败我们，我们获得了新的胜利。”

（摘自中共丽水地委党史研究室 1995 年 10 月印行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作者单位：中共遂昌县委党史研究室）

浙西南革命根据地丧失的原因初探（节录）

王人勤

一、蒋介石统治集团的反共政策，决定了红色政权存在的艰难性

大革命失败后，我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斗争蓬勃发展，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在全国各游击区纷纷建立的时候，蒋介石政府既恼怒又惊慌，深深惊叹，共产党“凭借险要，设置伪府”“实为国家和民族腹心大患唉！”

从 1927 年“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后的一系列政策看，人们不难看出他竭尽全力，实行篡权的野心，他不允许国共两种对立的政党存在和政权鼎立，势必要荡平我中央革命根据地，欲置我全国各地红军于死地。因而，蒋介石发动了四次对中央根据地的军事“围剿”，每次的“围剿”均被我红军一举粉碎，1933 年 9 月，蒋介石丧心病狂地调集百万军队，对我中央根据地疯狂地发动了第五次军事“围剿”。在此期间，国民党中央连续召开四届四中全会和四届五中全会，其中心议题都是“讨论‘围剿’红军，反对共产党”的问题。当我中央根据地主力红军开始战略转移后的 1934 年 12 月，蒋介石为了摧毁全国所有的红色根据地，在五中全会《开幕词》中得意地吹嘘“共产党数年来，在瑞金等处建立伪都，自以为根深蒂固，也已经犁庭扫穴”，号召他们的中央委员和全体党员“要精诚团结，发扬吾国人意识，彻底铲除共产党”“在万难中维持政局的安定”，明令全国各地军队现在急务是“剿灭残匪”“永绝祸萌”，对前方疆场将士，竭尽全力鼓气和嘉奖，命令将士“于最短时间消灭残匪”。蒋介石多次召开高层会议，绞尽脑汁，研究策划，对付共产党。在舆论上，发表连篇累牍的“剿共”文章，从中央头领到地方官员，从国军官兵到地方警宪，层层渗透和强化了灭共思想，这是蒋介石集团铲共思想恶性膨胀的结果，有了这种思想，势必要迫不及待地在行动中表现出来。

二、敌我力量过于悬殊，是根据地暂时丧失的主要原因

在蒋介石全面“围剿”红军，大力吹嘘已“廓清匪巢”取得“特殊之伟绩”时，殊不知 1935 年 5 月，红军挺进师又在浙西南崛起。该部队的革命活动和浙西南根据地的建立，犹如在南京政府门前和蒋介石老窝附近架起枪口相对的威胁甚大的革命堡垒，这是蒋介石所绝不容忍的。为扑灭浙西南的革命烈火，国民党军委会先后任命赵观涛、卫立煌等人为“闽赣浙皖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的总指挥，其总部由上饶迁驻南平、浦城、江山，步步逼近浙西南根据地，并委

派罗卓英为副总指挥，率所属 4 个正规师、浙保 4 个团、新三师 2 个旅 5 个团、郜子举“剿共”军第二纵队 4 个团、驻闽刘和鼎部第五十六师 6 个团，对浙西南根据地构成两道军事封锁线，并把包围圈剖成东西两半，敌正规军连同地主武装号称 40 个团，7 万余众，死死箍住浙西南，妄图彻底摧垮我根据地。

从红军与国民党军两军的数量上比较，敌人的兵力是 7 万余人，处于优势，我红军部队加地方武装游击队总共才 1600 余人，敌我比例是 40∶1，悬殊过大。

从国共两军的武器装备、人员配备上比较，第十八军是蒋介石嫡系部队，美式装备，仅 1933 年“美国在短期内接连两次贷款给蒋介石，合计九千万美元，其中有一半用于提供不少于 850 架侦察机、战斗机和轰炸机……”国军兵力充足，战斗力较强，其师团长黄维、霍揆彰、宋瑞珂、李树森等都是国民党军中的著名人物，整个军后来被称为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郜子举部、刘和鼎部对“剿共”都有丰富的“经验”。而我红军却是装备简陋，缺少枪械，很大一部分红军战士是从浙西南农民游击队中来的，他们虽怀有强烈革命政治热情，但伍龄不长，阅历不深，只是采用了边游击边提高的方法，来取代提高人员素质的必要训练，无力搞运动战和大规模歼灭敌人。在这情况下,要守住根据地是极其困难的。

三、挺进师二、五纵队和根据地群众孤军作战

浙西南、闽东和闽北三块游击区，从地理位置上看，呈三角形且连成一片，境内峰峦连绵，森林茂密，便于隐蔽和机动，是游击战争的理想地区。闽东、闽北党组织和武装斗争早于浙西南。早在 1926 年 7 月, 闽北地区就成立了中共建瓯支部。在我党的领导下，曾掀起了多次的农民暴动，对浙西南人民产生了极大影响。从“亲缘”关系上看，闽北根据地紧倚闽西和赣南中央革命根据地，1933 年 4 月，闽赣根据地又与建（宁）黎（川）泰（宁）根据地合并为闽赣省，成为中央苏区的组成部分，革命基础和力量相对比较强大，闽东根据地形成于 1934 年 2 月，其党组织和武装都发展较快。早在 1931 年，“闽东党组织就发展、延伸到浙南和闽浙边地区”。浙西南、闽东和闽北三区域互为犄角，可谓是唇齿相依，萍水相连，关系甚为密切。

当国民党部署血洗我浙西南革命根据地时，挺进师政委会吸取了井冈山红军反“围剿”斗争的经验，结合浙西南地区斗争的实际，分析了形势。决定留下二、五纵队就地坚持斗争，其主力部队迅速跳出敌包围圈，以积极的作战行动，调动和牵制敌人。根据地人民需要红军和党组织留下，领导 1 万多平方公里内的六七十万人民群众进行保卫根据地的斗争。问题是大敌当前，敌众我寡，力量相当悬殊，斗争极端残酷复杂。在自身力量远不能制敌的万分火急的特殊情况下，我各红色游击区（浙西南、闽东、闽北）被敌分割包围，无法取得联系，坚守浙西南反“围剿”的二、五纵队犹如棋盘上一颗被重围的棋子，成为众矢之的。在这种局面中，要想挣脱困境是极其困难的。

四、正面硬拼，造成我军力量严重消耗

1935 年 9 月，挺进师政委会上田会议以后，坚守在根据地的浙西南特委，曾领导红军二、五纵队及根据地群众与敌人绝对优势兵力作了较长时期艰苦的英勇斗争，这是可敬可颂的。问题是强敌当前，应足够地考虑到自己的力量。挺进师是一支长于打游击的武装，基本不具备运动战的条件，不能采取运动战的方式来防御和歼灭敌人。坚守根据地的部队应是有组织有部署地化整为零，或者采取武工队与秘密工作相结合的活动方式坚持斗争，把战士“融”于群众之中，尽量避免正面战斗，更不能采用硬拼的方法来消灭敌人，即使是一个局部的战斗，一旦指挥失误，就会消耗自己的力量。如 1935 年 10 月 19 日，我红军十人在松阳枫坪、遂松边境林山头与敌正面战斗后，寡不敌众，对峙一阵后，撤出战斗，招来了敌人的穷追，其精力消耗不可估量。又如，9 月 2 日的松阳麻士尖（海拔 1225 米）战斗，从早晨开始，一直与省防军第三团高奎元部拼到下午 4 点钟，我红军损失惨重，只得撤出战场。这种硬拼硬打的方法，对保存自己的力量是不利的。

正当我红军、地方武装游击队日以继夜顽强扼守玉岩、王村口、住溪，同敌军以营为单位编成的“搜索队”英勇作战，用生命和鲜血保卫根据地时，特委书记黄富武同志 10 月 30 日不幸被捕，这就使整个浙西南根据地军民反“围剿”斗争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黄富武同志对革命事业充满无限信心，从参加革命那天起就立下誓言“我黄某参加革命决无二心，如有违背，甘受梭标穿心”。第五纵队的战士对黄的评价是很高的，愿意跟他一起打天下，他能把广大战士团结在浙西南党（特委）的周围，具有无穷的吸引力和凝聚力，黄富武同志对革命工作极端负责任，敌人诉说黄富武是“伪中央候补执委”，是“祸浙首魁，劫杀最惨，刻罪于粟裕之上”的一人。他的被捕，是我党和浙西南革命根据地人民的一个重大损失。他的被捕，使根据地人民反“围剿”斗争的信心受到了直接的影响，给广大红军战士和武装游击队战士在心理上造成严重的压力，使方圆百余公里地域的红军、游击队和群众处于“群龙无首”状态。这样的局面出现，要保住根据地是非常困难的。

（摘自中共丽水地委党史研究室 1995 年 10 月印行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作者单位：中共松阳县委党史研究室）

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创建的历史意义与受挫的经验教训（节录）

李华忠

一、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创建的历史意义

1. 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是党在浙江创建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

红军挺进师入浙以前的浙江革命斗争史，曾出现过许多次革命高潮，但都未曾建立过完整的革命根据地。刘英、粟裕在受命率部入浙之时，就充分意识到要在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坚持游击战争，完成中央赋予的任务，必须建立战略基地。为此，部队一入浙，即在闽浙边境往返活动，寻找可建根据地的合适位置。最后选定浙西南地区，其理由有三：一是该地位于闽浙赣三省交界处，可以利用敌人统治的间隙；二是境内崇山峻岭，适宜开展游击战与创建根据地；三是有较好的群众基础。挺进师在斋郎大战后，即在政和县境召开师政委会会议，决定进入浙西南，把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结合起来，创建以仙霞岭为中心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会议还就开辟浙西南根据地作了具体部署。不久，浙江党领导的第一块根据地在浙西南大地上建立。它给处在困境中的浙江革命人民带来光明与希望，标志着浙江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2. 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建立，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当局的反动统治。

在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建设中，挺进师采用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并举的方针，一方面以武装打击国民党当局的反动势力，消灭地方保安团队与反动地主武装，镇压地主恶霸；另一方面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各级党政组织和革命群众组织，巩固根据地。

挺进师一进入浙西南就兵分三路。第一纵队及师政治部全体工作人员，在黄富武、刘达云、王蕴瑞的领导下，在龙泉、遂昌、松阳间开创游击根据地；第二纵队挺进到浦城、江山、衢州等县间游击，以打通与闽北、闽东的联系；刘英、粟裕则率领第三纵队到杭江铁路沿线地区开展游击战，以威胁汤溪、龙游、金华、武义、丽水等县城，吸引国民党主力北调，掩护根据地建设。挺进师每到一地，首先将国民党的区、乡武装消灭，对区、乡保长则按实际情况采取镇压与争取相结合的方针，对罪恶多、民愤大的，召开群众大会公审，坚决镇压，并将其财产分配给贫苦群众。先后镇压了松阳古市、龙游溪口等地罪大恶极的乡镇长、国民党公安分局

长和土豪劣绅。在游击区中心基本上摧毁了国民党统治的基层政权，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和革命群众组织。在广大的游击区域，则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势力，使乡镇保长不敢公开与民作对。

浙西南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使国民党当局十分震惊，《东南日报》惊呼："松遂龙各县大半赤化。"5 月中旬，国民党浙江当局急忙调集八九个团的兵力分四路向浙西南地区发动"进剿"，妄图将挺进师消灭于立足未稳之际。挺进师即将主力分南北两路，趁敌人尚在运动中，先一着跳出去，转入敌后，运用游击战打击敌人，以便把敌人调出中心区，掩护根据地建设。当挺进师日夜兼程向外线出击时，国民党军还在步步为营围攻大龙山，结果自相交火，伤死 100 余人。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见部下"围剿"不力，亲率仕官教育团督剿，被挺进师先后歼灭两个中队，黄绍竑被迫收兵返杭，"进剿"遂告失败。

在武装斗争的推动下，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建设一片火红，对此国民党浙江省当局束手无策，自叹："自粟、刘窜浙后，匪化已波及全浙。以目下形势来说，浙江共匪不亚于四川、江西之匪……前途实堪可虑。""四分之三的浙江工农阶级被其诱惑，滋扰达 10 余县，其进展程度，比江西还要厉害。"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建立，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当局的反动统治，严重地威胁着国民党南京政府后院的安危，蒋介石不得不调主力入浙"清剿"。

3. 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建立，吸引和牵制了大量的国民党军队，策应和支援了主力红军的战略行动和邻近游击区的斗争。

挺进师创建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行动，触痛了国民党的中枢神经，蒋介石坐卧不安，自叹后院失火，事态严重，急忙任命卫立煌和第十八军军长罗卓英为"闽赣浙皖边区清剿总指挥部"正副总指挥，并调集国民党军主力军第十八军，郜子举第二纵队和第三师主力，第五十六师和浙保一至四团共 32 个整团约七八万兵力"清剿"浙西南。"闽赣浙皖清剿总指挥部"也从浦城移驻江山。"清剿"从 1935 年 8 月开始，一直延至 1936 年 6 月。因"两广事变"爆发，蒋介石才把对付挺进师的罗卓英部第十八军调防湖南，准备与两广军阀交战。浙西南所吸引和牵制的国民党兵力之多，时间之长，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当属罕见，它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策应了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而且有力地支援了闽东、闽北、皖浙赣等邻近游击区的斗争，减轻了邻近游击区的军事压力，使他们赢得了恢复和发展的机会。据有关资料表明，国民党调重兵"清剿"浙西南后，闽北地区敌兵力基本空虚，闽北党组织乘机迅猛发展，其所属县委由 8 个发展到 20 个，并建立了闽北、闽西北、闽中 3 个地委。叶飞领导的闽东党和红军，也趁机重组闽东特委和闽东独立师，并建立了 4 块比较巩固的游击根据地，顺利局面一直维持到抗战开始。

4. 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建立，为挺进师在浙江长期坚持游击战争初步奠定了基础。

挺进师是由擅长于正规战的红军部队组建的，成员大都是来自湘、赣、闽等省的外乡子弟，要在人地生疏、语言不通、环境恶劣中开展和坚持游击战争，不建立可靠和巩固的根据地

是不可想象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建立，使挺进师有了休养生息的基地；有了比较扎实的群众基础；有了源源不断的兵源和给养的补充。此后，挺进师很快从原先三个纵队发展到五个纵队近千人，连同地方工作人员不下 2000 人，地方游击队也发展到千余人。后来尽管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暂时遭到破坏，但由于打下了扎实的群众基础，培养了大批革命骨干，当敌人“清剿”结束后，又很快地得到恢复和发展。同时，为浙南游击根据地的开辟提供了经验教训和创造了有利条件，使浙南游击根据地得以顺利创建和持久地坚持。挺进师之所以能够在浙江胜利地坚持三年游击战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得益于浙西南游击根据地顺利地开辟和在此基础上创建的浙南游击根据地，及浙东、宣遂汤等小块游击根据地。

二、浙西南游击根据地丧失的主要原因和经验教训

浙西南游击根据地丧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但根本的原因是敌我力量过分悬殊。当时挺进师只千把人，连同游击队也只近两千人，而“清剿”浙西南的国民党军则有七八万，敌我对比为 40:1。这显然不可能也不应该再“誓死保卫浙西南”。所以，挺进师于敌人开始“清剿”前在龙泉上田召开师政委会会议，决定留下少数部队坚持原地斗争，主力迅速跳出敌人包围圈，这一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如果将挺进师全部留在浙西南与国民党军死打硬拼，这样不仅会把挺进师拼个精光，浙西南根据地也照样丧失，而且失去了恢复与再发展的基本力量和机会。从某种意义上讲，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是挺进师主动的、暂时的战略放弃。暂时的放弃是为了长久的坚持，是一种为保存基本力量，谋求新的发展，争取更长坚持的战略策略。斗争史实也完全证明，由于挺进师主力跳出敌人包围圈，使其基本力量得以有效保存，很快就开辟了浙南游击根据地，在不长的时间里也恢复了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挺进师力量也得到新的发展与壮大，并胜利地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

但是，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受挫，也有许多值得总结和汲取的经验教训，主要有：

1. “八一”大示威，有力地打击了敌人，但也过早地暴露和消耗了挺进师的实力，使国民党军有针对性地部署“清剿”。

1935 年“八一”前夕，挺进师受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发展和第一次反“进剿”胜利的鼓舞，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八一”大示威（即缴枪扩军行动），各纵队分别袭击了仙居、龙泉、遂昌、汤溪、龙游，直指金华，逼近杭江铁路，这次行动，共计缴获长短枪 100 多支，轻机枪 2 挺，扩充红军新战士 400 余人，破坏了龙泉、浦城、松阳、遂昌、龙游、云和、汤溪等县的一些公路及电话线，散发标语、传单数万份，筹集银圆数万块。“八一”大示威，有力地打击了敌人，扩大了红军影响，鼓舞了浙西南广大革命群众的斗志，但也过早地将挺进师的实力暴露在敌人面前，使敌人有针对性地调集重兵部署“清剿”。在“闽赣浙皖边区清剿总指挥部”的第一期清剿计划中，明确地“以各边区大部对粟、刘”，决心以主力来对付浙西南，并在挺进师活动周围筑起层层封锁线，企图将挺进师围困其中，彻底“肃清”。

2. 在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建设中，地方干部过多过早地公开暴露身份，使干部和骨干遭受重大损失。

在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建设中，挺进师沿用了中央苏区的做法，但“在执行上犯了某些不可忽视的错误。如将秘密工作转为公开，秘密的赤色农会公开的打土豪，对保甲长某些地区认为都是反革命……”在根据地内公开地发展党员，公开地建立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公开地打土豪分田地等，没有注意到浙江环境的复杂性，没有将公开斗争与秘密工作结合起来。在遂昌的王村口，龙泉的白岩、住溪，松阳的玉岩、竹溪等地公开地成立了中共区委会和区苏维埃政府。在小吉、枫坪、斗潭、高亭、安岱后等地，还成立了乡苏维埃政府。有的地方还公开查田、量地、插标，准备分配土地和青苗。这样，地方党员、干部面目公开，敌人来了既不便随主力部队转移，也无法转入地下坚持斗争，故损失惨重。如松遂龙游击总指挥部的正副总指挥陈凤生、卢子敬，玉岩、竹溪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叶义和潘昌利等，都因面目暴露而被敌人捕杀。在敌人“清剿”期间，根据地被捕杀和活埋的基层干部和革命群众不计其数。后来挺进师吸取这一教训，在创建浙南和恢复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斗争中作了纠正，使游击战争在该地区得以长久的坚持和发展。

3. 对敌人“清剿”的残酷性、严重性估计不足，留在浙西南的兵力太多，留下来的部队和地方游击队未能及时改变战略策略，损失惨重。

1935 年 6 月，挺进师利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一举粉碎了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亲自带领“怀中利剑”仕官教育团到浙西南坐镇指挥的“进剿”，指战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对于敌人发动新的“清剿”，挺进师领导虽有觉察，但错误地估计还是浙江保安团。到了 9 月 20 日，从龙泉上田战斗俘获的俘虏口中，才知道是国民党主力军“清剿”浙西南的情况。21 日召开师政委会作出反“清剿”斗争的部署，这个部署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对形势的严重性、残酷性估计不足，希图通过挺进师主力南下的积极作战行动来调动敌人，以五分之二的兵力留在浙西南抗击敌人，里外配合，最后达到粉碎敌人“清剿”、保卫浙西南的目的。谁知罗卓英是一只狡猾的老狐狸。当他查明挺进师主力突围进入浙闽边境后，知道以数万大军追击分散的游击队，无疑是拳头打跳蚤，不能奏效。因此，他除派一个师约五个团的兵力追堵外，仍将几十个团的大部队死死地箍往浙西南中心区，企图彻底摧毁浙西南游击根据地。

留在浙西南根据地的军民，在敌我力量对比众寡悬殊的极端严峻形势下，仍浴血奋战，以血肉之躯誓死保卫红色根据地的英勇壮举，可歌可泣。但在斗争中未能及时改变战术，死守硬拼，伤亡惨重，教训深刻。如麻士尖战斗，挺进师第五纵队与地方游击队 300 多人，与浙江保安团 2 个营在松阳麻士尖从早晨一直正面对峙到下午 4 时，仅歼敌 4 人，而挺进师和游击队则伤亡 30 多人。以浙西南根据地革命干部、共产党和青年积极分子为主体组建的挺进师第五纵队，在这次反“清剿”中大部壮烈牺牲。挺进师政治部主任、浙西南特委书记黄富武不幸被捕遇害。挺进师第二纵队最后也只剩下五六十人，突围到遂昌的湖岱口和江山的周村一带。如果挺

进师对当时形势的严重性、残酷性有一个足够的估计，留下来的部队再少一点，留下来的部队及时采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损失可能会减少到最低限度。粟裕在《回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一文中也写道："后来实践证明，我们将两个纵队的兵力留在浙西南是留得多了，如果我们当时对敌情有足够估计的话，主力部队还可以少留一些，留下的部队应该化整为零，采取武工队和秘密工作相结合的活动方式坚持斗争。"

（选自《纪念浙西南、浙南游击根据地创建60周年研讨会论文集》，作者单位：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

刘英、粟裕坚持浙南三年游击战争的历史功绩

金　冶

浙南游击根据地，是南方八省十五块革命游击根据地之一，是刘英、粟裕同志领导挺进师及浙南广大人民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创建的。他们战胜了非同一般的种种困难，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1937 年 12 月 1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的《对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庄严指出：“……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以后，在极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的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致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主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这是党中央对南方各省游击区，也包括浙南游击根据地三年艰苦斗争的高度评价。现就刘英、粟裕坚持浙南三年游击战争的历史功绩介绍如下：

第一，粉碎国民党军两次数万、十万兵力的“围剿”，保持与发展了游击根据地

当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江西怀玉山失败、突围部队到达闽浙赣根据地后，中央指示：突围部队迅速组成挺进师，进入浙江，开辟根据地。任命粟裕为师长，刘英为政委。粟刘立即率领 500 多人的挺进师，进入浙西南龙泉河南北的庆元、龙泉、遂昌、松阳、江山一带活动，创建了以遂昌王村口为中心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浙江是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蒋介石的老巢，反动势力强大，自古有云：“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红军进到浙江，他们当然会坐卧不宁。1935 年 8 月敌人即开始对挺进师进行疯狂的“围剿”，国民党委任第十八军军长罗卓英统一指挥 40 个团的兵力，妄图围歼挺进师，彻底摧毁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敌以数万兵力，追捕分散活动的不足 2000 人的游击队，无异“以拳头打跳蚤”，挺进师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以一部兵力与敌周旋，主力跳出敌之包围圈，实行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使敌疲于奔命，一无所成。敌人“围剿”先后延续 8 个月，直到 1936 年 6 月“两广事变”爆发才结束，挺进师不仅未被消灭，而且又顺利转移到浙南，开辟了浙南游击根据地。

第二次反“围剿”，是 1936 年 12 月 15 日，国民党第四路“剿匪”总指挥刘建绪，指挥主力部队 6 个师，两个独立旅与地方保安团共 43 个团的兵力，“围剿”浙南红军。刘建绪接受罗卓英第一次“围剿”的经验教训，采取拉网式的逼进包围方针，妄图一举歼灭温（州）瑞（安）平（阳）等地红军挺进师。挺进师采取“隐蔽骨干、保存力量与机动灵活、积极作战相结合的方

针”，充分发挥政治与熟悉地形的优势，采取分散作战形式，分散到几十人、十几人、甚至几个人，由于部队已经练成游击好手，可以组自为战、各自为战，粉碎了敌人“围剿”的企图。此次反“围剿”以井冈山时期的游击战16字诀为指导，结合浙南斗争的实际情况，不仅总结与创造了一套游击战的重要经验，而且保持了浙南游击根据地，又越过飞云江转移并开辟了永（嘉）瑞（安）台（州）地区。

第二，创造与发展了游击战的战略战术

在浙西南、浙南几次反“清剿”、反“围剿”中，都是以游击战的战法粉碎敌人计划，获得丰富游击战的经验。

斗争实践在游击战术运用上归纳为六条原则：（1）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胜利；（2）不在消灭敌人，而在消磨敌人；（3）支配敌人，掌握主动；（4）积极进攻，绝少防御；（5）飘忽不定，出没无常；（6）越是敌人后方，越是容易成功。

在作战、行军、宿营等方面，也都摸到了一整套要领，例如作战上：（1）反敌人之道而行，并竭尽欺诈之能事，敌进我退，敌集我散，敌大我避，敌小我欺，避实就虚，声东击西；（2）不要企图太大，只要常有小胜；（3）站在敌人翼侧、后方和圈子外围，不为敌人所合击；（4）一切作战行动必须迅速、勇猛、坚决，迟疑犹豫就等于等死；（5）注意使用突然的白刃袭击，只要枪弹一响，刺刀就要杀到敌人的肚皮上去。隐蔽我军的行动和企图，是挺进师的一条重要原则，在行动上飘忽不定，出没无常，使敌人无法捉摸。又如行军方面：行军沿途的痕迹，要留专人殿后负责清除，压倒的草要扶起来，迷惑敌人。又如宿营方面：宿营一般不住大村庄，多选择小村庄。宿营实行五班制，支队部住中间，东、南、西、北各放一个班，哪个方向发现敌情，就由哪个方向的班抗击，掩护支队部和其他班转移完成任务后，到预定地点集合，每天都要规定两个集合点……

积极进攻是游击战术的一大特色。敌人进攻，挺进师是被动的，就要迅速转移，不同敌人决战；挺进师进攻敌人，是有计划的，只要情况不变，坚决打，运用最多的作战形式是袭击，由于挺进师不断对敌采取袭击，使敌特别是蒋政权的基础或爪牙，终日不得安宁，时时处于恐慌与动摇状态。

浙南游击战的丰富的具体的经验，粟裕曾于1938年初在抗日救亡干部学校作了系统的报告，这是浙南三年游击战争实际经验的总结。

第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

红军挺进师是一支英勇善战的武装战斗队，同时也是党的宣传队和组织领导者。在宣传群众方面，红军挺进师政委会政治部提出：每个红军指战员每日要写10条标语，要找10个民众谈话，并以班、排为单位随时随地举行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宣传革命形势，揭

露和批判反动派的欺压迫害老百姓的反革命罪行。在行动上要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当地群众的风俗习惯，与群众打成一片，取得群众的同情、了解和信任，使群众拥护和支持红军挺进师，把国民党的情况及时报告红军挺进师，而红军挺进师的情况对国民党则要绝对保密。

1937 年秋冬，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机关和红军挺进师部队在平阳县凤林村集中整训期间，刘英、粟裕等领导同志再忙也要抽出时间去联系群众，一般都是晚饭后到农民家中去访贫问苦、调查研究、宣传群众。例如刘英政委在访问凤林村长郑志西时，得知他一贯同情支持共产党革命工作，适逢郑志西老人 70 大寿，便亲自写一副对联送给老人："四世同堂，极尽天伦之乐；年届古稀，爱国犹不落后。"省委书记给村民写对联，政治影响很大。在国民党军队向游击区进攻的恶劣环境中，老人冒着生命危险将对联保存下来。

为了更好地宣传群众，红军挺进师在凤林村驻营期间，在村口搭起了一个临时戏台，晚上为群众演出话剧，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宣传党的政策，当地群众称之为"红军戏"或"文明戏"。凤林村小学师生也经常配合演出节目，夜晚，村里村外，山上山下，群众从四面八方来到凤林村观看红军演戏。村里没有电灯，演出是用煤汽灯照明的，为了方便群众来看戏，红军还在村的路口也挂上了煤汽灯。凤林山村一片沸腾。有的年过花甲的农村小足妇女，走路一步一歪，不怕艰难，也赶来看红军戏，她们说，活到这把年纪，从未看过这样的文明戏。

组织群众。红军挺进师是一支善于做组织工作的队伍。根据党的政治路线，在不同时期提出不同口号与工作方法，将分散的群众组织起来，如在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在农村组织农民赤卫队对地主阶级进行减租减息的斗争。抗战初期，便提出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适应形势需要，利用公开合法的组织形式，组织"农民抗日自卫队""青年抗日救亡团""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战时救亡政治工作队"等等。这些组织当时全省各地都有，但在浙南地区尤其在平阳县极为广泛。

武装群众。首先是思想上武装起来，通过教育，群众政治觉悟提高了，懂得地主阶级如何剥削农民，懂得反动政府如何压迫老百姓，懂得不愿做亡国奴就必须团结起来，齐心协力抗日救国，才是出路。因此，群众要求学习军事知识，在当地党组织领导下，农民抗日自卫队组织起来了，其形式以乡、村为单位，乡有大队，村(保)有中队，自然村设小队，推选出大队长、中队长和小队长，训练以中队集体行动，过着半军事化生活，早晨起来集体操练，从步法、队形到刺杀等，没有枪就用梭标，没有梭标就用木棒。通过训练，人心齐了，社会风气正了，不赌钱，吵架少了，受到当地父老热情称赞。

1938 年是浙南地下党大发展时期，广大群众通过各团体组织训练，觉悟大大提高了，涌现出一大批先进积极分子，他们被各级党组织吸收入党，增强了党的战斗力。还有许多人参加了挺进师队伍，1938 年春由粟裕率领离开平阳到安徽加入了新四军。

第四，在斗争中培养了一批重要骨干力量，锻炼了一支经验丰富的战斗队伍

刘英、粟裕都很重视培训干部。刘英认为：“有了党的正确主张和正确的策略路线，还需要坚强的有胆识有远见能说能干能负责的干部作指导。”“如果没有这样的干部，要独当一面的坚持斗争，克服困难，战胜困难，迎接新任务是不可能的。”“红军挺进师和地方干部大多出身贫寒，很早参加革命队伍，有较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但在艰苦的战争年代，他们没有受正规教育的机会，文化理论水平普遍较低，很不适应抗日战争新形势。”为了迎接抗日战争新时期的到来，闽浙边临时省委和省军区从 1937 年 10 月份开始，先后在凤林、玉青岩、大屯等地举办了三期军政干部训练班，培训了一批军政干部。刘英、粟裕等亲自为干训班讲课。

粟裕于 1938 年 3 月 18 日率领浙南红军 500 余人，北上皖南岩寺，编入新四军建制，以后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成为华中战场一支劲旅。

留在浙南继续坚持斗争的同志，在刘英等领导下，不断发展壮大。刘英牺牲后，龙跃、郑海啸等同志继承刘英遗志，一直坚持到 1949 年 5 月，为解放整个浙南、为解放全国作出了贡献。

（选自《纪念浙西南、浙南游击根据地创建 60 周年研讨会论文集》，作者系中国新四军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略论红军挺进师对浙江革命的影响

诸葛蓉

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在浙南和浙闽边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于1938年3月主力奉命离浙赴皖编入新四军。挺进师的革命活动深刻地影响着浙江以后的革命斗争，使浙江的革命形成了一些与其它地方不同的特点。探讨红军挺进师与浙江革命的关系，不但对于正确地评价红军挺进师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是必需的，而且对于总结浙江革命的特点和规律也是有益的。

一、重燃了浙江革命烈火

浙江是个建党比较早的省份。1922年开始有了党组织，以后逐步发展壮大，遍及全省各地。但是，后来在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和党内错误路线影响下，党组织遭到重大破坏。当1935年3月红军挺进师进入浙西南地区的时候，浙江地方党组织的情形，据刘英给党中央的报告中是这样记述的："浙江党的组织除浙东极少数的零星组织外，其他各地均没有党的组织……"各地党史部门调查结果也表明：当时的浙江，仅在少数地方有少量的党组织和党员在坚持隐蔽活动。

从调查结果来看，红军挺进师到浙江来开展游击战争，上海中央局曾经将这消息告诉了东阳中心县委。同年8月26日，东阳中心县委召集各地党的负责人开会，传达了上级关于红军挺进师即将到达浙东的消息；为了配合红军行动，会议具体研究和部署了各方面有关工作，准备攻打东阳县城，建立苏维埃政权。中心县委的政治交通奉命去浙西南，迎接红军部队，为红军进入浙东做向导。红军挺进师政治委员会在松阳小吉会议上，对挺进浙东作了决定和部署："一纵队则随浙东之交通到达永康、缙云、青田、处州、仙居、东阳及永嘉北部一带行动，配合浙东游击队，并取得行动上、工作上的绝对的一致，在可能条件下则与浙东的党召开联席会议，讨论整个工作的布置……"

本来，东阳中心县委是红军挺进师在浙江可以找到并可望得到配合和帮助的地方党组织，这对于外省来的红军来说，弥足珍贵，而且，中心县委下边还有东阳、汤溪、永康、缙云4个县的工作委员会，这对红军挺进师浙东各地开展广泛的斗争将会有很多帮助。但是，在红军挺进师一纵队达到东阳之前，东阳中心县委及其下边的4个县工委于9、10月间全部被敌人破坏了，各地党的负责人和骨干大多遇害。红军挺进师是10月23日从新昌进入东阳的。红军事先并不知道这个情况，在浙东到处寻找当地党组织，没有找到。直到年底，才在永康、缙云交界

山区找到少数坚持斗争的党员和一、二支很小规模的游击队。

除浙东外，浙南地区还有少数的零散的党组织和党员在坚持斗争；浙西南地区，也有一些由思想进步人士领导的农民武装。但整个浙江原有的革命力量已十分微弱，是红军挺进师来到浙江重燃了革命烈火。

根据浙江实际情况，红军挺进师建立了师政治委员会。它是红军挺进师活动区域内党政军的最高领导机关。红军挺进师在浙江和浙闽边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战争，从浙西南打到浙南、浙东南以及闽东部分地区，挺进到浙东和浙中的金衢平原、浙赣铁路沿线，冲击了国民党的腹心地区，活动范围达处州、温州、台州、金华、衢州、绍兴 6 个行政地区和庆元、龙泉、景宁、松阳、遂昌、云和、丽水、青田、瑞安、平阳、永康、泰顺、永嘉、仙居、黄岩、天台、新昌、东阳、宣平、缙云、武义、汤溪、金华、龙游、江山等二三十个县市以及闽东数县，发动群众，打击国民党和封建地主反动势力，开展分地主浮财救济贫民的斗争，宣传革命，扩大了党和苏维埃的政治影响，保存和发展壮大了红军有生力量，建立了浙西南、浙南、浙东南几块游击根据地，在根据地内开展了分配土地的斗争，建立了根据地内的党、政、军、群各种组织，建立了闽浙边临时省委和下属的浙西南、浙南、浙东南、浙东 4 个特委，宣（平）遂（昌）汤（溪）工委和白区工作团，以及数十个县；吸收和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本地干部，党员总数达 3000 多人，红军和游击队近 2000 人，地方干部 500 多人，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红军挺进师三年奋战，为浙江重创了革命基业，为中国革命在南方建立了一个战略支撑点。

二、为以后的浙江革命留下了一批领导者、中坚力量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红军挺进师主力奉命北上抗日。根据中央东南分局的指示，师长粟裕率部赴皖南集中，师政委刘英留下继续担任省委书记，同时还留下了 3 个短枪班和一批干部坚持浙江斗争。红军挺进师虽然走了，但是红军浴血三年建立的闽浙边临时省委（1938 年 5 月建立浙江临时省委）和各地的特委、县委、区委、支部各级组织还在。这批留下来的同志是这些党组织和武装斗争的领导者和中坚力量。据不完全统计，他们中有：省委书记刘英，先后任常委的谢文清、龙跃，委员中有林辉山、张麒麟、郑丹甫、陈昌会、刘清扬，还有统战部副部长吴毓；留下在浙江坚持斗争的干部仍然是以挺进师老红军和抗战初期红军挺进师培养的干部为主。此时地区级党组织有浙南特委、处属特委、闽浙边临委（负责遂昌、龙游、宣平、江山、浦城一带）、金衢特委、台属特委（设总特派员）、绍属特委、宁属特委。这些特委的主要负责人中，除宁属、绍属特委外，浙南特委书记龙跃、处属特委书记傅振军、闽浙边临委负责人宣恩金、台属特委总特派员刘清扬都是原挺进师的老红军。抗战初期，闽浙边临时省委在平阳山门开办“抗日救亡干部学校”，粟裕兼任校长。200 余名学员中，一部分后来跟随粟裕到皖南，大多数由省委分派到浙江各地工作，经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严峻考验，成为浙江党和革命武装的骨干。

三、为以后的浙江革命留下了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红军挺进师留下的精神财富除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时时激励后人迸发出无穷力量外，还包括丰富的白区斗争经验教训、领导艺术和策略思想。这笔精神财富蕴藏在留在浙江工作的同志们脑子里，他们通过总结、消化、吸收、借鉴，形成了自己的新东西，即使处于不断变化的新形势下，也能有效地指导工作，并通过他们传授给新同志，继承和发扬下去，使革命事业之舟避过一个个暗礁，驶向胜利的彼岸。

毛泽东说过："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这说明了党的领导者是否能制定和掌握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对于革命的成败得失关系十分重大。刘英、粟裕等红军挺进师的领导人都很重视"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他们及时总结经验与教训，适时调整斗争策略，这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有许多精辟的论述。他们在得不到党中央和上级明确指示的情况下，从国民党报纸和进步组织的刊物上分析判断国内外形势，预测着时局的变化，及时地调整了斗争策略，七七事变后，他们敦促浙江国民党当局和平谈判，放弃对抗，一致抗日，终于建立了浙江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重大的战略转变，保存了浙江革命的有生力量。1940 年前后，在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形势逆转的情况下，又坚决地贯彻执行了中央的"隐蔽精干"政策，及时地将一批面目"红"了的同志撤退到新四军去，留下的加强隐蔽，防止急躁和暴露，实现社会化、职业化。这些策略都是很高明的，体现了领导人具有的很高的领导艺术。试想，能够从重兵包围中突围出来挺进浙江，能够在几十倍于己的重兵"围剿"下胜利地坚持下去，能够与各方面来浙江工作的党员干部一起，很快打开浙江抗日工作局面，如果领导者没有共产党人独特的胆略气魄和领导艺术，那是不可能的。以后，虽然粟裕离开了浙江，刘英牺牲了，但是他们的那种胆略、气魄、领导艺术、经验由留下坚持浙江斗争的老红军们继承了下来。

自 1935 年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后，浙江的革命就再也没有歇业，而是逐步火红起来。这除了全国革命形势影响、我们的党更加成熟了、广大人民群众拥护支持等许多原因之外，不能不说与红军挺进师重新开创的基业有关，不能不说与红军挺进师留下了一批干部坚持斗争有关。

四、为以后的浙江革命奠定了广泛坚实的群众基础

红军挺进师一到浙江就十分重视做群众的思想宣传发动工作。师政委会号召与教育全体党员和每个指战员成为"党与苏维埃的宣传者和组织者"。红军每到一地，就写标语、找民众谈话、召开群众大会，并利用分发地主浮财机会进行宣传，多方面多形式地做争取群众工作。关于宣传工作情况，近年收集整理的《浙江革命（进步）文化历史文献选编》中有十分翔实的记载。至今在若干山村还可以看到当年红军留下的标语。红军纪律严明，即使饥寒交迫也不拿群

众财物；红军对地主老财、恶霸势力打击狠，对穷苦百姓关怀疼爱，这些都深深地感动了广大群众。人民群众认识到红军是穷苦人的队伍，共产党是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跟着共产党，革命定能成功，穷苦人定能翻身得到解放这么一个真理，所以，在当年红军转战过的许多地方，由于群众对当年红军活动记忆犹新，党的群众工作能比较顺利、比较快地开展起来，亦成为以后革命的主要地区。比如缙云县的南部山区，许多老同志在回忆如何从一个普通农民走上革命道路成长为革命者时，都说当年的启蒙教育就是红军挺进师的革命宣传。这样的事例，在红军活动过的广阔范围里普遍存在。可以这么说，红军挺进师的政治影响，为以后的浙江革命奠定了广泛坚实的群众基础。

五、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1935 年至 1937 年，浙江革命大局是红军挺进师在独撑着的。它对浙江革命在组织基础、领导决策和群众基础诸方面都产生着深刻和长远的影响。正像粟裕同志指出的：浙西南、浙南这个战略支撑点是在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建立起来的，“在以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要研究浙江革命，离不开对红军挺进师的全面系统研究。

红军挺进师是浙江革命的“播种机”。它播下的革命种子在浙江大地上生了根，开了花，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选自《纪念浙西南、浙南游击根据地创建 60 周年研讨会论文集》，作者单位：中共丽水地委党史研究室）

论红军挺进师在浙江革命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黄梅英

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在刘英、粟裕的率领下，于1935年3月挺进浙江，不到半年，创建了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尔后，挺进师主力又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转战浙闽边区，汇合闽东和浙南地下党的力量，在瓯江下游的广大地区，创建了浙南游击根据地，粉碎了国民党军的两次大规模“围剿”，打击、吸引和牵制了大量的敌人，使浙南（包括浙西南）成为南方8省15个革命战略支点之一。

红军挺进师在浙江开展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为浙江的革命斗争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浙江的革命斗争史上树起了一座红色的丰碑。红军挺进师在浙南创建的游击根据地，是我党在浙江境内的第一块最完整的革命根据地，红军挺进师的存在、发展，浙南游击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为浙江的国共和谈创建了条件；闽浙边临时省委的斗争，为抗战初期建立一个全省统一的中共浙江省委奠定了基础。本文试就红军挺进师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作一探讨。

一、在全国革命低潮时节组建了红军挺进师，且活动于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在此以后的4个月时间内，整个东北三省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民族矛盾急剧上升。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置民族危机于不顾，仍继续顽固地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1933年10月竟调集了100万军队，向中央苏区和各个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

党中央为宣传和推动抗日，调动和牵制敌人，减轻国民党军队对中央根据地的压力，1934年7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红七军团改称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皖赣进军。7月7日晚，抗日先遣队在寻淮洲、乐少华、粟裕、刘英等的领导下，从江西瑞金出发，经福建北上，转战于闽浙皖赣地区，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组成红十军团（对外仍称北上抗日先遣队），并成立了以方志敏为主席的军政委员会。经过短暂的整编，11月下旬，红十军团兵分两路向浙皖边和皖南行动，由于这支部队兵力过小，不但未能牵动“围剿”中央根据地的敌人，反而因孤军深入敌后，陷于同十倍于己的敌人艰苦奋战的境地。1935年1月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怀玉山遭国民党优势兵力包围，指战员大部壮烈牺牲，方志敏不幸被捕。刘英和粟裕根据方志敏的指示，率先头部队奋勇突围，历尽艰辛，回到闽浙赣苏区。这时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而失败，中央苏区已丧失，党中央和主力红军被迫于1934年

10 月实行战略转移，留下红二十师和 10 多个独立团共 1.6 万余人和部分党政工作人员，在中央分局书记项英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等领导下，坚持在中央根据地斗争。全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在这革命的危急关头，刘英和粟裕又根据中共中央 1 月 15 日的指示电，以原抗日先遣队的先头部队包括领导机关人员、后勤人员、伤病员和一个迫击炮连、一个重机枪连共 400 余人为基础，再加上地方武装，共 500 余人，组成红军挺进师，下辖三个支队和一个直属队。挺进师在师长粟裕、政治委员刘英的率领下，于 3 月 23 日进入浙江，担负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的任务。

其时，浙江的党组织几经国民党反动派的摧残，已被破坏殆尽。浙江是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是江浙财阀的老窝，是蒋介石及一些国民党右派核心人物的家乡。自蒋介石 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上台后，为巩固其反动统治，苦心经营，培植了一大批反动军官和特务，其反革命组织盘根错节，反动势力异常强大，控制十分严密。1927 年 6 月中共浙江省委建立后，7 月省委组织部秘书处即遭敌破坏，领导人被捕。省委书记张秋人仅担任 3 天书记职务即被捕牺牲。在省委存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先后就有 10 人担任过省委书记或代理书记，有 8 人为革命牺牲，其中 5 人牺牲在浙江。省委委员以上（在任期间）的领导人，先后有 15 人为革命牺牲。仅在 1927 年冬一次组织的大破坏中，被捕的党员就达 300 名以上。尽管白色恐怖严重，但许多共产党员还是前赴后继，顽强地坚持着斗争。尤其是 1929 年 4 月后，中共中央暂时取消了浙江省委的建制，在全省建立 6 个（后建立 9 个）中心县（市）委，但由于国民党的血腥镇压以及党内“左”倾路线尤其是 1931 年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中央的统治，组织也屡遭破坏。杭州、湖州、温州、台州、兰溪、建德等 6 个中心县（市）委于 1931 年间先后遭敌破坏，宁波市委 1932 年 4 月遭到破坏，领导人被捕叛变，宁波地区的党组织被破坏殆尽；永康中心县委 1933 年 1 月遭破坏，领导人被捕；挺进师入浙后唯一存在的是隶属中共上海中央局领导的东阳中心县委，但也因 1935 年 8 月东阳县工委的被破坏，有人叛变，县委书记和委员 7 人中有 6 人被捕牺牲。至此，浙江的党组织活动中止，浙江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综上所述，红军挺进师是在北上抗日先遣队遭受严重挫折，孤军深入敌后，没有红色根据地作为依托，连白区党的组织也几乎破坏殆尽，且兵力和弹药都不足，又失去了与上级的联系，在这样的险恶环境中，在半年时间里奇迹般地创建了浙西南游击根据地。

二、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是我党在浙江开辟的第一块最完整正规的游击根据地

刘英和粟裕面对强敌，无所畏惧。他们认真总结吸取先遣队受挫和失败的惨痛教训，为了打破敌人对浙闽边境的武装封锁，果断地采取了以下的措施。首先，加强对挺进师的领导，并对部队进行整训，成立以刘英为书记的政治委员会，统一领导活动区域内的党政军工作。同时将挺进师编为 4 个纵队和 1 个特务连、1 个侦察排，每个纵队设立行动委员会，作为单独行动时的集体领导，从组织上适应游击战的需要；其次，在战略战术上改变以往长于正规战的大兵

团作战，由正规战向游击战、正规军向游击队的战略转变。培养和锻炼每个指战员会打游击和做群众工作的本领；第三，把武装斗争和开辟根据地的工作结合起来，选择了闽浙赣三省交界敌人力量相对薄弱，且又有崇山峻岭、便于游击战和群众基础较好曾受红十三军斗争影响的浙西南作为战略基地。这样，红军挺进师把茂盛的森林和连绵的山岭作为依托，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很快就打开了工作的局面。不到半年，即创建了以松阳玉岩、龙泉住溪、遂昌王村口为中心纵横百余公里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活动区域则发展到北抵浙赣路，南到浙闽边界西段，西及赣、闽边境，东到丽水、宣平的广大地区。红军挺进师在开展武装斗争的同时，也抓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在根据地内建立了中共浙西南特委、浙西南军分区和地方工作团，在松阳县的竹溪、玉岩，龙泉县住溪，遂昌县王村口建立了苏维埃政府，下辖 19 个乡和 109 个村苏维埃政府。群众团体如共青团、妇女会、儿童团、分田委员会等组织普遍建立起来，在浙西南特委的统一领导下，发动群众，开展打土豪、开仓济贫、查田插标、分青苗的土地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支持了武装斗争，使红军挺进师发展到 1500 多人，扩编为 5 个纵队和 2 个独立队，还有 1000 余人的松（阳）遂（昌）龙（泉）游击总队。红军挺进师终于在浙江站稳了脚跟，创建了浙西南游击根据地。

红军挺进师创建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是浙江境内我党创建的第一块最完整正规的革命根据地。浙江革命斗争史上曾出现过数次革命的高潮。在省委领导期间，在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的鼓舞下，曾先后发动和领导了 60 余次农民武装暴动，遍及 50 余县。如 1928 年 5 月，省委和宁海县委组织发动的亭旁农民暴动，成立了红军指挥部，占领了宁海重镇亭旁，宣布成立亭旁革命委员会（即苏维埃政府），但仅一二天时间，即遭国民党的残酷镇压而失败。此后，在浙南地区，在中央和浙南特委的领导下，在农民武装暴动的基础上，于 1930 年 5 月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这是当时中央军委编入正式序列的全国 14 支红军之一，全盛时期拥有 6000 余人，足迹遍及于浙江南部温州、台州、丽水、金华地区的 20 余县，经历大小一百余次的战斗，曾攻克丽水、平阳、缙云县城，红了浙江半边天。但像这样一支具有相当规模的红军部队，仅半年时间，转尔失败。其原因除敌我力量的悬殊外，主要是红十三军把攻打城市作为主要军事目标，不重视建立农村根据地，正如红十三军军长胡公冕在 1946 年回忆的那样：“浙南红军游击队初建时，没有站住脚跟，就立即去执行袭击处州的计划，后来就在永嘉楠溪五鹅一带游击，没有建立根据地，……把游击范围扩大到十几县，……也没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永嘉楠溪五鹅一带只是革命的策源地和活动中心）……又提出攻打瑞安、平阳等城市。……提出要在温州举行暴动……没有重视农村根据地的建设工作……，没有去做细致艰苦的建立政权工作……没有深入群众进行土地革命。”由此可见当时的红十三军没有建立起正规的革命根据地。

在此前后，方志敏、邵式平等领导的赣东北革命斗争逐步向浙西推进，1932 年 4 月 16 日，红十军第二次（第一次为 1931 年 3 月）攻克开化县华埠镇，4 月下旬在开化县白沙关（现属德兴县）成立一区苏维埃政府，下辖 3 个乡、16 个村苏维埃政府，同时还成立了区委和游击队，成立了土改工作队，在游击队和赤色警卫师的配合下，依靠贫农团等组织，开展打土豪分田地

的群众运动。这是浙江最早建立苏维埃的地方，但它仅局限于德兴交界的毗邻地区，后成为皖浙赣游击根据地的一部分。

纵观浙江革命斗争的历史，可以说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无论是从存在的时间、地域的范围及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的程度，都称得上是浙江第一块最完整正规的游击根据地。从此后浙江的革命斗争此起彼伏、从未间断，并出现了新的革命高潮，为浙江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红军挺进师的存在和发展为浙江的国共和谈创造了条件

红军挺进师在浙西南形成武装割据的局面，国民党当局惊恐不安，他们大声疾呼："浙江素称平安之区，自粟、刘窜浙后，匪化已波及全浙，以目前形势来论，浙江共匪不亚于四川、江西之匪。若当局未能迅速肃清，前途实堪可虑。"于是，蒋介石调国民党主力部队第十八军入浙，与地方保安团合力，对红军挺进师实行大规模"清剿"。从 1935 年至 1936 年 5 月在"闽浙赣边区剿匪总指挥部"卫立煌、罗卓英正副总指挥指挥下，以国民党第十八军为主力，汇合四省边区地方武装共 7 万余兵力，向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大举进攻。刘英、粟裕率挺进师主力由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南下，冲破敌人的封锁线，转战到闽浙边区，10 月与叶飞领导的闽东特委会合。鉴于对敌斗争的需要，经双方协商成立了以刘英为书记的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同时还成立了闽浙边临时省军区，粟裕为司令员。在闽浙边临时省委和临时省军区的统一领导下，挺进师以闽浙边的福鼎、鼎平县为依托，逐步向北发展，1936 年 9 月，又与活动于平阳北港一带的叶廷鹏领导的浙南地下党和红军游击队会师。这三股力量的汇合，使浙南的革命斗争出现了大发展的有利形势。加上在此之前又爆发了"两广事变"，国民党主力罗卓英部第十八军从浙江调往湖南，境内敌情趋缓，这对于挺进师的发展和游击根据地的发展、巩固十分有利，刘英和粟裕抓住有利时机发展革命力量，在恢复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同时，还开辟了浙南游击根据地，红军挺进师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由初到浙南的 300 余人扩大到 1500 多人，连同地方武装和肃奸队共约 2700 余人，游击根据地范围由（福）鼎、平（阳）、泰（顺）山区发展到平阳北港和飞云江中游的南北两岸的广大地区，包括瑞安、平阳、泰顺、福鼎以及青田、景宁、丽水、庆元、永嘉、缙云、永康、义乌、仙居、天台、黄岩等县的部分地区，纵横 200 余公里。闽浙边临时省委及其所属组织已有很大的发展，党员 3000 余人，地方工作干部有 500 多人，参加各种组织的群众达 10 万余人。

西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妄图在国共和谈之前消灭南方游击区的红军，又调集第四路军和各地方保安团共 10 万余兵力，对浙南游击根据地"围剿"。但刘英和粟裕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出其不意地主动袭击和伏击敌人，将红军挺进师的游击区范围扩大到浙江南半部 30 余县，红军一度还打到蒋介石的老家奉化附近，使敌人忙于奔命，又一次粉碎了敌人的"围剿"。

与此同时，刘英和粟裕率领挺进师在开辟新区和反"围剿"的斗争中，自觉地实现了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战略思想转变。当时，红军挺进师失去了与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的

联系，仅通过收集国民党出版的报纸和国统区的各种进步报刊、书籍，从中分析了解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党中央的政策。尤其是1936年6月“两广事变”爆发后，刘英和粟裕预见到全国抗日高潮即将到来，从而自觉调整了党在游击区的一些重大政策，如把“穷人不打穷人”的口号改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改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挺进师”；“苏维埃政府”改称为“人民革命委员会”；对国民党的乡、保长由原来的镇压改为以争取为主，等等。1936年9月，闽浙边临时省委恢复了和党中央的联系，从上海带回来一批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件，从而确定了浙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即使是大军压境，处于极其艰苦恶劣的环境中，刘英仍坚信党中央提出的“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方针，在坚持武装斗争的同时，始终不放弃非军事手段，从1937年3月开始，闽浙边临时省委先后与国民党闽浙赣皖边区主任公署进行了三次和平谈判。1937年3月，闽浙边临时省委收到了中央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电文后，即主动地向国民党闽浙皖赣四省边区主任和闽浙两省当局发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和谈倡议，5月派代表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和平谈判。此时蒋介石正阴谋集中力量消灭南方游击队，所以国民党代表企图通过谈判“收编”或威迫红军投降，谈判遂破裂。此后，红军挺进师和闽浙边临时省委在紧张的反“围剿”斗争中，继续呼吁国民党当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先后发出了《为团结御侮、共赴国难以及和平谈判破裂告各界人士书》《呼吁各界人士要求当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宣言》。七七卢沟桥事件以后，闽浙边临时省委再次发出通电和宣言。在闽浙边临时省委的一再敦促和推动下，于1937年8月24日在温州重开第二次和谈，达成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议，浙江国共两党重新携手合作。

9月16日，刘英再次在平阳与刘建绪派来的代表谈判，在8月24日谈判的基础上最后达成7条协议。刘英亲自参加谈判后，分散在各地的红军才陆续集中于平阳山门整训，并将红军挺进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后开赴皖南，成为新四军的一个组成部分。

红军挺进师在开辟新区和反“围剿”的斗争中得到发展和壮大，浙南游击根据地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扩大，为浙江的国共和谈创造了条件。在历次的和谈中，闽浙边临时省委又坚持“党的独立与批判的自由，和红军武装的保持独立性这两个原则，为退让最低限度”，挫败了国民党妄图用和谈来收编或吃掉红军的阴谋，保存了红军挺进师的有生力量，从而使浙江出现了抗战初期轰轰烈烈的抗日局面。

四、闽浙边临时省委坚持在浙江的斗争，为抗战初期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共浙江省委奠定了基础

浙江省自1929年4月暂时取消省委建制后，在此后长达9年的时间内中央曾几次试图恢复和建立中共浙江省委，1933年1月，又派中央委员来杭州成立中共浙江省临时工作委员

会，但因领导人被捕叛变，组织即遭彻底破坏。1935 年 3 月，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作战，在开展武装斗争的同时，着手党组织的建设工作，1935 年 5 月，成立了中共浙西南特委。同年 11 月，成立了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刘英任书记。此后，闽浙边临时省委在浙江的东南部地区又先后建立了浙东特委、浙南特委、浙东南特委、闽东特委和省委白区工作团，县一级党组织有龙浦、龙遂、江浦、缙云、瑞（安）青（田）泰（顺）、丽（水）青（田）云（和）、青（田）景（宁）庆（元）13 个县委和瑞（安）平（阳）泰（顺）、（福）鼎平（阳）2 个中心县委，有党员 3000 余人，浙江的浙南地区党的组织有了很大的发展。

1937 年 7 月全面抗战爆发后，闽浙边临时省委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达成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议。当时临时省委在浙南地区广泛发动群众，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加强对红军部队的整训、扩建，同时又根据新的形势，调整了工作部署。当时临时省委面临最紧迫的任务，是如何发动和领导全浙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在浙江的其它地区包括沦陷区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以适应抗战的需要。临时省委派出干部到黄岩建立了海门工委，又恢复了浙西南特委，并以抗日救亡工作团的名义，到龙泉、遂昌及福建的浦城等县开展工作。又在平阳山门举办了抗日救亡干部学校，为全省各地培养了 200 多名抗日骨干。1938 年 3 月，挺进师主力赴皖南编入新四军，又留刘英、龙跃、林辉山、谢文清、吴毓、郑丹甫、郑海啸、叶延鹏等一批干部坚持在浙江工作。其时浙江已陆续从各地派来一批党员，在驻南京的中共中央代表及南京、上海、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及各地的新四军办事处，派来浙江工作的，主要是一批从国民党狱中出来的中共党员，如朱镜我、顾玉良、张麒麟、杨思一、邢子陶等，他们到浙江后，即恢复和发展了一批党员，并于 1937 年 11 月在杭州成立了中共浙江省临时工作委员会（后改称为省工委），临工委、省工委又先后在宁波、台州、金华等地区建立一批党的组织。还有一批从沦陷区的上海、江苏、杭州、嘉兴等地内迁到金华的各单位党组织与中共党员、抗日骨干，也在浙江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和重建党组织的工作。

为了加强对浙江党组织的统一领导，1938 年 5 月成立了中共浙江临时省委，由刘英、汪光焕、顾玉良、谢文清、赖大超（以上为常委）、龙跃、林辉山、张麒麟、陈昌会（以上为委员）9 人组成，刘英为书记。同年 9 月经中共中央批准，转为中共浙江省委，刘英为书记。省委建立后，刘英将来自几个部分和各个方面的领导骨干团结在省委周围，形成一个领导核心。在省委的统一领导下，在全省 6 个地区建立了浙南、处属、台属、宁绍、金衢和浙西 6 个特委，加强对全省党的工作的统一领导，使浙江出现了轰轰烈烈的抗日局面。红军挺进师和闽浙边临时省委为浙江的抗战作出了重大贡献，为以后我党创建浙东、浙西抗日根据地和坚持浙南革命战略支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选自《纪念浙西南、浙南游击根据地创建 60 周年研讨会论文集》，作者单位：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

从挺进师入浙的成功
看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的教训（节录）

毛飞云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了，红军挺进师胜利了，这里边有些什么经验教训可以总结呢？

（一）

挺进师的任务是：进入浙江境内，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苏维埃根据地；以积极的作战行动，打击、吸引和牵制敌人，保卫闽浙赣基本地区和邻近的根据地；从战略上配合主力红军的行动。经过挺进师指战员的不断努力与顽强战斗，挺进师在浙南坚持的三年游击战争，胜利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在敌人心腹地区沉重地打击敌人，牵制了敌人三四十个团的兵力达 8 个多月，策应了党中央和主力红军的战略行动，掩护了兄弟游击队的斗争；宣传了党的路线和政策，扩大了党的影响，推动了抗日运动的高涨。

抗日先遣队的任务，与挺进师基本相同，只是因为保卫中央苏区和掩护中央主力红军的战略行动，先遣队活动的范围更大些，任务也更重些。它由中央直接领导，后期转归中央军区指挥，因而它的方针、政策、行动方向和任务，均按“作战任务的训令”“政治训令”和当时的电令执行，缺乏游击战争应有的灵活性。虽然抗日先遣队是一支素质好、作风优良的部队，敢打硬仗，能攻善守，并擅长袭击和担任别动队任务；虽然其先后两阶段艰苦奋斗 6 个多月，征程五六千里，连克 5 座县城，与敌人团以上兵力的战斗有十几次，歼敌三四千，缴枪千余，一度震动了福州、杭州、芜湖和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的战略转移，对宣传我党抗日主张、推动抗日运动的发展，在广大地区扩大党和红军的影响，都起了积极作用。但是，抗日先遣队因种种原因，战斗失利，从这意义上说，它没有完成党中央赋予的任务，不能说主观不努力，而是缺乏客观基础。“以吸引蒋敌将其兵力从中央苏区调回一部到其后方去”“促使敌人进行战略与作战部署上的变更”，这种过高的要求，是不能达到的。面对孤立无援的抗日先遣队，国民党根本无须调动“围剿”中央苏区的任何部队，先遣队自己却因遭受不停的追击和堵截，地方团队和土顽的骚扰，而疲于奔命，直至最后失败。

（二）

挺进师能在浙江生根，并开花结果，最主要的原因是迅速地实行由正规军向游击队、正规

战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变，将受敌制约转变为牵敌在广大地区周旋，由被动挨打局面变为主动进攻态势，掌握了主动权。抗日先遣队却未能根据局势的变化，适时地进行这个战略转变，在强敌追击和堵截下，处处被动挨打，最后终于失败。

挺进师的干部战士绝大部分为原七军团成员，是野战军。由善于打运动战的正规兵团直接转为打游击战的游击队，难度甚大，许多问题须从头学起，最大的困难是不少干部不愿意分开活动。但由于师领导粟裕、刘英能审时度势，决心果敢，措施有力，因此很快地实现了这个战略转变。抗日先遣队的军事行动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中央红军尚未长征，按军委的意图，以运动战牵制敌人，到第二阶段，中央红军已开始长征但仍然要求它执行原来的战略方针，必然违反战争规律，带来不良的后果。十军团未出发时，本来也只规定十九师单独出击，事隔半个月，要求二十师也出苏区，两个师集中行动，并规定“集结兵力，坚决的争取运动战中消灭敌人”，把擅长于游击战的部队也编在一起打正规战。这种违反战争规律的整编和作战要求，造成正规战打不成，游击战也打不成。谭家桥战斗未能取胜，这是一个重要因素。

抗日先遣队第二阶段行动，是在闽浙赣苏区的“环境极为严重，周围均有封锁线并在加深加防”的情况下进行的。红军虽然分路冲出封锁线，行动却比前阶段更加困难，自谭家桥战斗后，追敌渐渐集中和迫近，不停地追击和堵截。敌人可以走大路抄捷径，用车船运送，轮换追击和休息，并在要点设防堵截。无后方依托的红军只能钻空隙爬高山走僻径，日日奔走，还要应付战斗。失散与伤亡数与日俱增，皖南行动 40 天，减员三分之一以上。古语说：兵贵神速。如此疲惫和拖沓的红军，即使不被围住，也会被拖垮。由此也充分证明：在这种时间，这种地域，这样的作战指导思想是完全不妥当的。

在第一阶段，军团领导还没有预见到要实行由正规军向游击队的转变，也不敢设想把一个大军团改变为游击队。第二阶段初期，闽浙赣省委根据情况，提出把基本区改变为游击区域，除十九师挺进衢州、江山地区外，二十师亦离开基本区，省委必要时亦移闽北。但中央军区没有同意，相反要十军团全部集中行动，所限地域又是背靠长江、近邻国民党统治中心的苏浙皖边。当时国民党正在该区寻我军决战。弱小孤立的红军，只得一路避战。随着十军团处境的日趋险恶，中央军区同意分兵向浙闽广大地区活动，但军团领导非但没认识到将正规兵团向游击队实行战略转变，甚至对分兵的顾虑也很大，于是决定集中暂回基本区休整。这就导致了怀玉山的失败。

毛泽东同志指出：“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抗日先遣队的失败，主要原因还是没有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实行由正规战向游击战、正规军向游击队的军事战略转变。

（三）

挺进师的主要经验是结合毛泽东领导下的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加强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区的建设。因为，单纯的流动游击策略，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甚至难以在国民党

统治深厚的地区生存。抗日先遣队未能充分利用原有的游击根据地游击区作为依托，长期在敌占区内流动，盲目地打硬仗、拼消耗，有生力量消耗殆尽。

浙西南和浙南，山高林密，地瘠民贫，交通不便，紧靠闽东和闽北游击区，有原红十三军的革命影响，还有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青帮组织。挺进师运用毛泽东的游击战术，充分利用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分兵发动群众，集中打击敌人，辗转在浙赣铁路江山至义乌以南的广大乡村，先后建立了浙西南、宣（平）遂（昌）汤（溪）、浙东和浙南游击根据地，并建立了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胜利地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特别是浙南游击根据地，从山区扩展至海滨和平原，发展成为“南方革命的一个战略支点”。

中央原计划要抗日先遣队到浙西皖南地域建立新的苏维埃，开展游击战争，并建立省委，这本来是有基础的。浙西山高林密，并与皖赣山脉连接，皖南有良好的群众基础，赣北有狭长的皖赣苏区，闽浙赣省委并派干部和部队去开辟。由于敌在浙赣边境的白沙关向西沿着婺河构筑碉堡封锁线，派重兵扼守，致使未能与闽浙赣基本区联成一片，所以设想在基本区外围新建苏维埃根据地。但是，浙西缺乏我党的工作基础，反动势力浓厚，省保安团力量较强，保甲制度严密，交通和通讯捷便，敌能及时掌握我军动态和及时调动部队。红军挺进浙西，不能立足，且有被围歼的危险，只好突围。红军的最后目的地是皖南，到达皖边时，比原计划迟一个多月，皖南几县暴动早已失败，有些干部群众分散在山里坚持斗争，抗日先遣队虽曾派分队去帮助工作，中途遇敌折回。到皖赣苏区后处境较好，准备依托苏区打破敌人“围剿”计划，但储田桥南侧和鸦桥战斗未打好，加上敌派重兵“围剿”，只得转移。

当时中央苏区虽然处于异常严重的时刻，闽东的革命却形势很好，建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和 9 个县苏维埃政权，成立了两个独立团和几个独立营，赤卫队遍及苏区各乡村，游击战争开展到南至连江北接浙南边境。抗日先遣队在该区只是穿肠而过。在闽北苏区，抗日先遣队也未作停留。当时红军五十八团黄立贵部在建瓯建阳一带，先遣队若能依托闽北苏区向东北发展，既可与五十八团南北呼应，又能破坏闽北苏区敌人的后方。浙江南部敌人的兵力甚弱，当时若能依托闽东、闽北苏区，在浙江南部及闽东、闽北广大地区周旋，奠定基础，尔后向浙西、皖南跳进，对支援老苏区发展新苏区，将取得良好的效果。但是抗日先遣队没有抓住这个良好的机遇和利用好这个有利条件。

由于革命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毛泽东同志指出：“处在敌后的游击战争，没有根据地是不能支持的。”“在交通和技术进步的今日而企图用流寇主义获得胜利，更是毫无根据的幻想。”抗日先遣队途经闽浙皖赣广大地区，预定地域不能立足，可利用和发展的地域没有去经营，结果被敌人逼得天天奔跑，这也是一个教训。

（四）

挺进师能够取得胜利，是因为广大指战员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良

好的战斗作风，还有广大劳苦大众的支持。更主要的是，有刘英、粟裕等正确的领导，果敢而明智的指挥，把握战略转变的才智，和广大将士忠于革命事业的雄心壮志。当时电台遗失，失去党中央和上级的领导，挺进师只好独立自主地进行游击战争，但这却使领导者能灵活指挥，忽东忽西，避实就虚，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在庆元斋郎，挺进师利用地形和进攻之敌参差不齐的有利条件，精心组织，击败数倍于己之敌，迫敌一度退守，获得开辟浙西南根据地的良机。当浙西南根据地遇敌“围剿”时，挺进师又果断地留部分人坚持基本地区，主力跳到敌后方广大地区周旋，乘机开辟新的根据地，使敌顾此失彼。师领导还能通过现象看本质，充分利用和改造有革命思想的松（阳）遂（昌）龙（泉）接合部的青帮组织，建立苏维埃，而对于受反动派利用的大刀会则采取分化瓦解政策。在浙南，挺进师利用红十三军的影响和余部，开辟浙南根据地，使红军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壮大。为适应斗争需要，挺进师主要领导时合时分，刘英坚持开辟浙南根据地为主，粟裕带部队辗转浙西南、浙东广大地区，牵制敌人，指挥各地的斗争，点面结合，有效地坚持了卓绝的游击战争。以后，随着日寇加紧侵略，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师领导又能顺应形势发展，实行向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取得圆满的结果。

抗日先遣队与中央保持经常的电报联络，行动按中央电令执行，具体的战斗行动等由军团首长组织实施……十军团开始时的形势也很好。

抗日先遣队由于“左”倾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严重地影响了对部队的领导和作战指挥。第一阶段，作为中央代表的曾洪易，在敌人飞机袭击下，惊慌失措，一心想回到生活较稳定的苏区当省委书记，所以许多可能做的工作都被拒绝了，更谈不上向中央提出合理的建议。部队到德兴重溪召开的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只按照主观主义、冒险主义的战略意图来衡量七军团的北上行动，扣上“染上了机会主义”“执行了退却逃跑路线”等帽子，除了应该批判曾洪易外，把责任推卸给军事领导和指责部队，是不恰当的。第二阶段，领导干部的配备也受宗派主义的影响。被国民党称为“枭匪”“悍匪”的军团长寻淮洲，降为师长；作战指挥优柔寡断、缺乏在白区机动作战经验的刘畴西却任命为军团长。在当时的中心任务是如何取得战争的胜利的情况下，作为抗日先遣队最高领导机构的军政委员会，军团参谋长和师长都被排挤于门外。这种干部政策，是导致抗日先遣队失败的组织上的原因。

红十军团怀玉山的失败，客观上有许多因素，主要的还是军团领导迭次失误造成的。红军接近化婺德苏区时，计划昼夜兼程进入苏区，由于行军延误时间，结果被敌人早半小时占领徐家村，拦住去路，红军只好折回，延误三天时间。追敌赶到，又受两次拦击，被打成三段。先遣队部队突围时，主力相隔很近，军团长坚持就地宿营，错过了当夜突围的良机。敌在碉堡内开枪，军团领导担心先头部队的路线不安全，改道向树坞突围，遇一排敌军拦阻，即可决定改换突围方向。这种儿戏般的指挥，接连改换突围方向，在封锁线上徘徊，给敌有充裕时间调兵遣将，形成更加紧密的包围封锁。红军被困在高山深壑之中，挨饿受冻。遇敌进攻，则开枪无弹，搏斗乏力，只有束手就擒。许多人被枪杀、饿毙、冻死在树林中。军团和师领导方志敏、刘畴西、王如

痴、周群、胡天桃等，均被敌搜捕，并惨遭杀害。

抗日先遣队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一支劲旅，它在开辟闽浙赣苏区、鏖战中央苏区、北上抗日上，战果辉煌，最后在怀玉山被围失败。它的功勋，永不磨灭。它的失败，是“左”倾冒险主义领导的结果。方志敏等一批革命烈士，永垂不朽。红军挺进师在吸取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实事求是，根据客观实际适时调整战略战术，发扬红军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终于取得了胜利。

（选自《纪念浙西南、浙南游击根据地创建60周年研讨会论文集》，作者单位：浙江省新四军研究会）

浅析红军挺进师与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成败的原因（节录）

孙　瑛

（一）

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是中央主力红军在进行长征前的一个大动作，格外引人注目。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吸引和调动敌人，减轻中央根据地的压力，因此，它所受到敌人的围追堵截是可以想象的。而此时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更使国民党气势汹汹，妄图趁机一举消灭红军。同时，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主要进攻方向浙西、皖南，反动统治势力强，群众基础差，部队得不到必要的休整，导致伤亡不断增加，战斗力不断削弱。

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挺进浙南时，虽然浙南也是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反动势力强大，没有现成的红色根据地或游击区域作为依托，但仍有一些有利条件：红军主力已经开始北上长征，国民党的主力正被我主力红军吸引于北上途中，那里是主要战场，相对地说，浙江的敌人就比较空虚；坚持南方斗争的几个老苏区、老游击区的斗争也牵制了敌人的兵力，给挺进师在浙南的斗争以有力的支援；浙江是个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省份，1930 年浙西南曾受红十三军革命暴动的影响，1934 年北上抗日先遣队也曾在此撒播革命火种，因此群众基础相对来说要好一些；大部分地区山岭连绵，森林茂密，便于我军隐蔽和机动。

（二）

指导思想的错误是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来，派出这样一个军团，深入敌人后方独立执行任务，敌情那样复杂多变，环境那样困难险恶，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除了规定它的战略行动方向和基本任务外，理当给予较大的机动权。然而当时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却严格控制抗日先遣队的一切行动，实行绝对集中的指挥，使军团处于极其被动的境地。古语说，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意思也指在具体行军作战中，要由将领根据实际情况决定行动方案，而不能光听不知情形的上级的盲目调动。同时，思想工作做得不够，对当时出现的轻敌观念没有及时进行教育说服，导致谭家桥战役失败。而失败后，又没有抓紧时间分析原因，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在部队中进行充分的动员工作，致使先遣队自谭家桥战斗后，士气一天天低落。加上主要负责者同样也没有作战决心，并滋生逃跑主义思想，致使先遣队在

怀玉山遭惨败。

挺进师则在刘英、粟裕的领导下，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及时转变战略方向，将挺进师从一支经过几次反“围剿”斗争，已锻炼成为善于野战的红军正规兵团分散成为游击队。为了培养和锻炼干部，规定单独行动的天数，让各干部带领队伍先出去三五天，再会合，再出去十天半月，再会合。这样很快使挺进师适应了游击生活，干部的单独行动能力不断增加，办法逐步增多，信心也慢慢地增强了，甚至一个班长也能够带一支部队单独活动。

（三）

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的前三个多月时间，王明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曾洪易任中央代表兼随军全权代表。他先是提出“红色碉堡反对白色碉堡”“不失苏区一寸土地”，实行持久围攻堡垒的战略方针，使先遣队处处陷于被动，实力消耗很大。如强攻福州，经三昼夜不克，只得主动退出。由于曾洪易不要游击战，不要运动战，实行攻坚打硬的错误指挥，经常受到敌人几倍几十倍兵力合击我军，兵员、军需得不到补充，因此在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 3 个月后，到达重溪地区，6000 余人只剩下 2000 余人。在 1934 年重新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后，虽然也取得了一些胜利，如攻克芳村，击溃分水县拦阻敌军，攻占旌德，兵锋直逼芜湖附近；但仍然是采取强攻硬拼方法，未能很好地保存实力，保护自己。

而挺进师在接到中央指示，挺进浙西南后，即自觉地把正规军变成游击队，不打正规战而打游击战。同时，采用多种战术打击敌人：一是诱敌出洞。浙西南驻有较强的保安团队，挺进师为了进入该战略地区，就先在外围活动，将保安团队吸引出来，再给以逐个痛击。庆元斋郎大捷就是这种战术的杰作，迫使敌保安队在以后一段时间内转攻为守，打开了进入浙西南开辟游击根据地的通道。二是伏击战。1935 年 6 月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亲率装备精良的士官教育团来为“进剿”助威，被挺进师伏击部队打得落花流水，折断了黄绍竑的这支“怀中之剑”。三是突击队和牵制队的互相配合。突击队，即武装工作队，主要进行根据地建设；牵制队是游击队主力部队，任务是牵制、吸引、打击敌人，保卫基本地区，开辟新的游击区。四是创造性地运用“敌进我进”的战术，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敌进我进”的办法，就是在敌人进行“大拉网”式的“围剿”时，我军与敌人相向对进，易地而战，“敌人梳过来，我们钻过去；你要我的山头，我要你的后方”。这种战术在浙南三年游击战争中被挺进师发挥得淋漓尽致，几乎贯穿始终。如 1935 年 9 月，国民党集中 32 个整编团共约六七万的兵力，连同地主武装号称 40 个团，由第十八军军长罗卓英统一指挥，对浙西南进行“围剿”。挺进师当时只有 2000 余人，上田会议后，确定采取敌进我进的反“围剿”方针，留下第二、第五纵队就地坚持，保卫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其余主力部队跳出敌人包围圈，以积极的作战行动吸引、牵制敌人，最终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

（四）

北上抗日先遣队由于只注意猛攻猛打，而不注意后方建设，常陷于兵困马乏的困境之中。如在闽浙赣攻克了小梅、八都、廿八都、清湖、横沿、马金等城镇后，部队不能休整，伤亡不断增加，粮草也日益窘乏。为摆脱被动局面，部队不得不转入皖赣边，靠友军帮助解决一些困难。10月份，又不得不重返赣东北休整。12月份，在谭家桥战役失败后，也由于无法得到休整，部队疲惫不堪，又被迫决定回赣东北休整。

挺进师进入浙江后，首先瞄准浙西南这块重要的战略地区，准备先将这里建成根据地，对各阶层采取不同的政策，以争取尽可能多的革命力量。第一，公开提出“打土豪，开仓济贫，帮助群众战胜夏荒”，深入发动群众开展斗争。对区、乡保长和土豪劣绅，按实际情况区别对待，民愤大、罪恶多的召开群众大会公审，没收财产，分给贫苦群众。第二，对“青帮”组织则进行团结。“青帮”组织的主要领导人松阳县安岱后村的陈风生和斗潭村的卢子敬其实是当地很有威望的群众领袖，其成员也是当地贫苦的青壮年农民。挺进师一到浙西南，就首先对他们进行领导和教育，他们中大多数人参加了红军游击队和根据地建设工作，一些先进分子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挺进师进入浙西南地区后的第一批地方党员和干部。这对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开辟起了很好的作用。第三，注重群众工作。特别是第二个发展时期，在各地苏维埃政权建立后，普遍开展插标分青苗和分田运动，分到田的贫苦农民心花怒放，对共产党和红军感激不尽。第四，建立“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一种是争取原来的保、甲长为我们做事；另一种是把我们的秘密党员派进去当保、甲长。这样，政权就在不知不觉中被我们所掌握。第五，建立后方基地。1935年8月中旬，粟裕率挺进师师部进驻遂昌王村口后，为保障供给，决定在相距15公里处的后塘建立挺进师后方基地，设有军需物资供应站、军械修理所和伤病员疗养所。此外，还在松阳的玉岩、枫坪间建立了浙西南军分区硝磺厂，专制弹药；在浦城毛洋下长坑设缝纫厂，专为红军战士制作过冬棉衣。这样，红军挺进师就有了牢固的后方基地，可以及时为部队进行“回油”和休整，部队能够放心地去前线作战，而不必担心供给等问题了。

综上所述，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是由于受“左”倾路线影响，领导阶层指导思想的错误，从而引起了政治、军事上一系列错误决定，经6个多月的浴血苦战，仍遭到失败。而挺进师却由于刘英、粟裕在实事求是精神的指导下，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使挺进师从起初的500余人两度发展到2000多人，活动范围也逐渐扩大，最后，浙江南半部和闽东北边沿都成为他们的游击区。挺进师开赴皖南编入新四军后，继续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贡献力量，并将在浙南总结出来的战斗经验不断发扬光大。

（选自《纪念浙西南、浙南游击根据地创建60周年研讨会论文集》，作者单位：中共缙云县委党史办公室）

论红军挺进师入浙的历史背景和意义（节录）

江涌贵

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是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突围部队为基础组建的一支部队……

一、辗转千里皖浙赣，红军将士历艰险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是一支英勇善战、军事政治素质良好的部队。1934 年 7 月，党中央派出抗日先遣队，从江西瑞金出发，经过闽江流域，一直到杭江铁路及安徽的南部，威胁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吸引和调动部分“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即将实行的战略转移。显而易见，对一支只有几千人且武器弹药严重不足的抗日先遣队来说，要担负起这个重任是不现实的。谭家桥战斗后的 20 余天中，抗日先遣队虽经过大小十余战，但总是小战获胜，大战掩护退却，一路避战，并陷于十分被动的境地。这段时间，抗日先遣队一直辗转迂回于皖浙赣三省边区的歙县、绩溪、太平、休宁、祁门、婺源、淳安、开化等地，时南时北，忽东忽西，大体上围绕着黄山旋转。由于连续长途翻山越岭，气候严寒，伤病员不断增加，部队行走越来越困难。然而，为了消灭敌人，完成任务，红军指战员们发扬特别能战斗的革命精神，英勇顽强，不怕流血牺牲。抗日先遣队的言行，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二、“茶山会议”定决策，挥师南下进苏区

谭家桥战斗后，抗日先遣队在皖南处境日趋困难，部队向何处去？如何摆脱困境？已成为当时急需解决的重要战略问题。1935 年 1 月 8 日，抗日先遣队从开化县龙门下进入淳安县的樟村。9 日，部队在淳安、歙县、休宁两省三县交界的崇山峻岭中兜了一天的圈。当晚，在淳安县的茶山、半山、汰厦（今属淳安县中洲镇）一带宿营，并在茶山村召开了军团领导会议，即“茶山会议”。会议由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同志主持，刘畴西、乐少华、聂洪钧、刘英、粟裕等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就抗日先遣队的去向问题进行了认真而热烈的讨论。与会同志持有两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部分同志提出分兵问题，主张分头出击，变正规军为游击队，变正规战为游击战，以摆脱困境；并提出了粟、刘到浙行动，乐少华、刘畴西等同志率一师留皖南行动，其余部队随方志敏同志回闽浙赣基本地区的具体方案。第二种意见，少数同志不同意分兵，主张全军回赣东北苏区。由于军团主要领导对分兵顾虑很大，且因队伍确是疲乏不堪，

急需休整，于是抛弃了第一方案，同意了第二种意见，决定全军暂回赣东北苏区。这一决定，与不久后的怀玉山失败是有密切关系的。从 1 月 10 日开始，全军便径直南下，直趋赣东北。

三、红军失利怀玉山，粟裕率部突重围

1935 年 1 月 15 日，抗日先遣队以十九师为前卫，二十一师为后卫，劈柴开路，连翻几座大山，经德兴的朱樟坞西进。午时，前部才到达港首。因连日在荒山僻野行军，红军指战员饥饿疲惫，处境艰难，至下午 1 时，二十、二十一师仍未到达。而国民党四十九师已赶至港首附近，对抗日先遣队实施战略阻击。十九师只好退到港首南侧山地抵抗，边掩护边走。当时，红军粮弹奇缺，伤亡不断增加，在雨雪交加中顽强行军。许多指战员几天来粒米未进，以草根树皮充饥。此时，方志敏、粟裕等带领由军团机关人员、伤病员和缺乏弹药的迫击炮、重机枪分队等组成的先头部队先走。下午 3 点半，敌军占领港首和南侧山地，控制长棚溪沟，截断红军西进道路，把红军先头部队和主力切成两段。16 日晚上，国民党集结 14 个团的兵力，完成对怀玉山抗日先遣队的重重包围。当晚，粟裕率领先头部队 800 余人在陇首附近冲过封锁线，安全到达闽浙赣基本地区的大小坪、黄石田。这部分人员就是后来重新组建红军挺进师的基本力量。红军挺进师与抗日先遣队，无论在领导成员、战士的组成上，还是思想、作风的表现上，都有个继承和发展的“血缘”关系。

红军挺进师是在抗日先遣队已遭到惨败之后建立的。此时，南方各游击根据地面临着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包围，形势十分严峻。南方各地如何坚持开展游击斗争，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红军挺进师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支部队。中央派出这支劲旅入浙，有利于巩固和发展南方各根据地。所以，抗日先遣队失败后，突围出来的这部分人员组建一支正规的部队，以重振军威，正是形势的需要、历史的必然。

原抗日先遣队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分别为挺进师的师长和政委。当时，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面临着繁重的斗争任务，且环境恶劣。粟裕、刘英率领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境内，就担负着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苏维埃根据地，以积极的作战行动，打击、吸引和牵制敌人，掩护闽浙赣革命基本地区和邻近根据地，并从战略上配合主力红军北上抗日行动的重要任务。

红军挺进师入浙后，把开展游击战争与发展、建立、壮大地方党的组织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他们紧紧依靠地方党组织的力量，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辗转于闽北、浙西南、浙南、浙东等地，创建了浙西南、浙南游击根据地。它在全国整个战场和浙江省地方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1. *积极地开展游击战争，牵制了国民党军队的相当力量，有效地支援了中央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巢，又是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带，离国民党总统府南京很近，所以历来部署的兵力雄厚，防范甚严。红军挺进师在浙西南、浙南、浙东南和闽北的广阔领域坚持了长达三年的游击战争，武装斗争风起云涌，部分地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所以，

从战略上讲，红军挺进师在浙西南一带的武装斗争，起到了支援中央主力红军顺利北上，完成战略大转移的作用。

2. 浙西南、浙南游击根据地的建立，扩大了红军的影响，武装、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在浙南大地播下了革命火种。红军挺进师抵浙西南后，放手发动群众，建立地方党的组织和武装力量，于 1935 年 11 月建立了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此后，又开辟发展了包括浙西南在内的涉及浙南、浙东南、闽东的 30 多个县的浙南游击根据地，在全省燃起熊熊的革命烈火。这对教育、鼓舞浙江人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红军挺进师在危难中重振军威，显示了无坚不摧的人民力量。红军挺进师入浙后，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各部队能在长期失去上级领导的情况下，独立坚持与敌斗争，能在实践中检讨自己，掌握方向，执行政策的转变，尤其与群众生死与共、同甘共苦，从而领导群众，发展了各地党的组织，保存了党的基本力量。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挺进师奉命改编为新四军，开赴抗日战场，成为新四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抗日战场上的一支劲旅。这一事实又说明了红军挺进师的入浙，不但当时在全国各游击战场上占有一定位置，而且壮大了人民的武装力量。

4. 红军挺进师入浙后，在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中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光照千秋，激励后人。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是我国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浙南游击区是在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军阀之间的战争已经基本停止，在革命低潮时进入国民党统治腹心地区开辟和发展起来的，这就形成了浙南游击战争独具的特色。红军挺进师在浙西南、浙南开展的革命斗争，创建的地方党组织和武装组织，在浙江大地播下了革命火种，教育和鼓舞了广大人民，为后来的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红军挺进师入浙后，在艰难困苦的恶劣环境里，艰苦奋斗，出生入死，与敌人浴血奋战，与人民同甘共苦、生死与共，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选自《纪念浙西南、浙南游击根据地创建 60 周年研讨会论文集》，作者单位：中共淳安县委党史研究室）

论红军挺进师取得浙南三年游击战争胜利的主要因素

刘宗鹤

1935年1月，粟裕、刘英奉命率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余部500余人组成的红军挺进师，进入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浙江。在中央苏区已经丧失，并与中央、苏区中央局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粟、刘领导挺进师实行了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战略转变，创建了浙西南和浙南游击根据地，挫败了国民党军两次大规模的“清剿”，牵制了国民党军40多个团的兵力，策应和支援了红军主力北上的战略行动，配合和掩护了邻近游击根据地的斗争；浙南游击根据地成为中国革命在南方的战略支点之一，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本文试就红军挺进师取得浙南三年游击战争胜利的主要因素作些探讨。

一、注重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战胜顽敌的力量源泉

挺进师十分注重党的建设，加强党组织的领导作用。挺进师入浙后，就建立了师政治委员会，由刘英、粟裕、黄富武、宗孟平、洪家云等9人组成，刘英为书记，以加强对挺进师活动区域内党、政、军的领导。4月28日，斋郎大捷，迫使龙泉河以南之敌转攻为守。5月上旬，师政委会鉴于挺进师在龙泉河北南闽浙边的积极活动，已达到打击与调动敌人之目的，决定北渡龙泉河，分兵以发动群众，开辟以仙霞岭及其以东地区为中心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为了加强地方工作的领导，成立了中共浙西南特委，师政委会随军代表兼行动委员会书记宗孟平为特委书记，率第二纵队赴龙（泉）浦（城）江（山）遂（昌）地区开展工作同时建立了中共龙（泉）浦（城）县委。由黄富武、王永瑞、刘达云组成政委会分会，师政治部主任黄富武为分会书记，率第一纵队及师政治部全体人员到龙（泉）云（和）松（阳）遂（昌）地区发动群众，建立党组织和各种群众组织。其余各部由刘英、粟裕率领至浙赣铁路（中段）以南一带辗转游击，造成声势，以掩护第一、第二纵队执行任务。7月初，特委书记宗孟平牺牲，挺进师在松阳小吉召开政委会会议，决定由黄富武接任特委书记[①]。特委下辖龙浦县委和松阳竹溪区委、玉岩区委、遂昌王村口区委、遂（昌）汤（溪）区委。1935年12月黄富武牺牲，特委遭破坏，这些党的组织在打土豪、分田地，建

① 有误，挺进师政委会于6月上旬在松阳县小吉村召开会议，决定建立中共浙西南特委，宗孟平任书记。

设根据地和反“清剿”斗争中起到了核心领导的作用。

是年9月，蒋介石以嫡系部队第十八军及地方部队共40个团的兵力血洗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挺进师主力撤出根据地中心区后，周旋于浙闽边区。10月5日，刘、粟率部与闽东特委叶飞在福建寿宁县郑家坑胜利会师，鉴于对敌斗争的需要，双方商定建立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并于11月7日在浙江泰顺县白柯湾正式成立，刘英为书记，同时还成立了闽浙边临时省军区（粟裕为司令员）。1936年3月，临时省委决定：福鼎与瑞（安）平（阳）泰（顺）地区合并，成立中共浙南特委（郑宗毓为书记），统一领导浙南游击根据地的斗争。6月，重建中共浙西南特委，相继建立中共龙（泉）遂（昌）县委、江（山）浦（城）县委和遂（昌）宣（平）汤（溪）工委。8月建立浙东南特委，辖瑞（安）青（田）泰（顺）县委、丽（水）青（田）云（和）县委、青（田）景（宁）庆（元）泰（顺）县委和梅（岐）南（田）中心区委。如上所述，党的组织几乎遍布浙南游击根据地，这就加强了整个游击根据地党、政、军的领导，红军挺进师成为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部队。刘英于1940年写的《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一文中，深有体会地说：“部队中党的工作与政治工作是军队的生命线。”

红军挺进师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体，既要担负歼灭敌人的任务，又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等重要任务。刘英、粟裕等领导同志以身作则，每到一地就找群众谈心，了解民间疾苦，了解群众要求，在做社会调查的同时，做好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适时地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共产党、红军的政策，使广大群众真正认识到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工人农民自己的军队。由于十分重视部队和根据地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大大增强了党和红军的凝聚力，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也由于十分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及时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形势教育，使得挺进师和地方党组织的党员和积极分子树立起一个坚强的信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一定要胜利的，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成了红军挺进师取得三年游击战争胜利的力量源泉。

二、从实际出发，采取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是取得三年游击战争胜利的关键

1938年1月，粟裕在总结浙南和浙闽边三年游击战争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抗日战争的新形势，讲授游击战术时深有体会地说：“在那样残酷艰苦的环境中，我们胜利地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所以能够生存、坚持下来，因为具备如下条件：首先是敌人的压迫剥削所引起的群众的反抗；敌人力量的薄弱，对于广大农村尤其是各省边界地区难以控制。其次是我们群众力量的强大和党的领导的坚强。再就是加强了党对游击队的领导，建立了代表（政治委员）制，实行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挺进师入浙之后，粟裕、刘英根据形势的重大变化和敌我力量的对比，吸取北上抗日先遣队斗争失败的教训，在战争实践中探索和采取了新的斗争策略和斗争方法，及时地实行了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由正规军向游击队的军事战略转变。正如粟裕在《战争回忆录》中所说的“北渡龙泉河进入浙西南地区后，我们的任务是要把武装斗争与根据地建设

结合起来。我们运用了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方法，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打击敌人，要求每个干部、战士都学会两套本领：打游击，做群众工作。”逐步培养各级干部带领小分队根据实际情况掌握战机打游击和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能力，顺利地实现了战略转变。

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建立，使蒋介石坐卧不安，鉴于保安团队对付不了挺进师，1935 年 8 月开始策划第一次大规模的“围剿”。“闽浙赣皖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制定的《第一期清剿计划》，要“以各边区大部对粟刘”，并委任第十八军军长罗卓英统一指挥。罗卓英以 40 余个团的兵力来对付红军挺进师和浙西南游击根据地。面对如此大规模的“围剿”，刘英、粟裕善于把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普遍真理同指挥作战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依据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和战争的内在规律去寻找克敌制胜的作战方针。当时的情况是敌人以几十倍于我的兵力进行“围剿”，敌我力量对比非常悬殊。而我们只是一支游击队，我们一次最多只能消灭敌人一个营，还是保安团的部队。不能搬用中央苏区反“围剿”的作战方针。我们必须以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来粉碎敌人的“围剿”。游击战很难谈得上防御，也不能大量歼灭敌人；只能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实行敌进我进的方针。挺进师政委会决定留下第二、第五纵队就地坚持斗争，其余主力部队迅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你要我的山头，我要你的后方，以积极的作战行动对付敌人，给敌人以很大的威胁。红军挺进师在敌进我进方针指导下，在浙闽边和浙南创造了比较辽阔的战场，开辟了新的根据地，力量又壮大起来了。正如粟裕所说的：“从 1935 年 9 月至 1936 年 6 月，是我浙南游击区经受严峻考验的重要时期。我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暂时丧失了，但我们在浙南地区又开辟了大块的游击根据地；游击战则在浙西南、浙闽边、浙东、浙南更广泛的区域展开了。从总体上看，罗卓英三四十个团的‘围剿’并没有打败我们，我们获得了新的胜利。”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实行“北和南剿”的反动方针。1936 年 12 月，从湖南调第四路军进驻闽浙赣皖边区，任命刘建绪为“四省边区主任公署”主任。刘就职后，将浙南划为第三“清剿”区，在云和设指挥部，以 43 个团 10 余万的兵力，从 1937 年 1 月开始，向浙南游击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清剿”，企图一举将红军挺进师消灭在浙南。面对这一严重的形势，临时省委确定隐蔽精干、保存力量与机动灵活、积极作战的方针，沉着应战，从容对付。当敌人开始“大拉网”式“清剿”时，挺进师采取与敌相向对进、易地而战的打法，你拉过来，我钻过去。同时，分散作战单位，以组为战，以人为战。使敌人无法找到挺进师决战。而我军在分散游击中不断歼敌，保存自己，并建立了宣遂汤游击根据地。

总而言之，在浙南三年游击战争中，挺进师领导以井冈山斗争时期游击战的十六字诀为基础，根据新的斗争环境、新的情况，有新的创见，制定了敌进我进的方针，实行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这是取得三年游击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

三、紧紧依靠群众，是坚持三年游击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

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红军

挺进师的干部和战士本身来自工农和革命知识分子，是共产党领导的一支为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而战斗的人民子弟兵。他们和人民群众有着深厚的感情。挺进师的领导一向很重视党群关系和军民关系，很重视群众工作和群众纪律。

挺进师入浙之初，人民群众并不了解挺进师的性质。因此，师政委会很重视宣传群众，动员群众，扩大共产党和红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从而组织群众。为此，规定了全体指战员都要参加群众工作。如每人每天写 5 条标语，找 10 个群众谈话，相机的召集群众大会，以及进行革命的各种组织活动等。挺进师献给浙南人民的第一份见面礼，就是军纪严明，这是有口皆碑的。部队每到一地方，都很尊重那里的老百姓。红军指战员们为老百姓挑水、劈柴、干活、问寒问暖，和当地老百姓打成一片，人民群众也把红军当成自己人。当时，浙西南山区的人民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之下，经受着残酷的压迫和剥削，生活极其困难，加上 1934 年大旱灾，1935 年春天又大水灾，农村经济濒临破产，到处是挣扎在生死线上的灾民、饥民。挺进师面对现实，为帮助群众度过饥荒，公开提出“打土豪、开仓济贫”、“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处处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使广大的群众从反动统治的压迫下站起来，投身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这样，红军挺进师所到之处，都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目中，共产党和红军就是大救星。当红军摧毁了国民党的区、乡、镇政权，建立起区、乡、村苏维埃政府时，群众纷纷参加农民协会、妇女会、赤卫队等各种革命群众组织。人民群众对红军挺进师予以极大的信任，真诚地寄希望于红军挺进师，军民之间结下了骨肉深情。在国民党军两次大规模“围剿”的最艰难的时期，红军、游击队指战员几乎天天要打仗，有时一天打几仗，部队处境十分困难。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冒着危险千方百计给红军当向导、送情报、护理伤病员，把自家仅有的一点口粮、食盐设法送给红军游击队。当红军挺进师在作战中减员的时候，是根据地的人民把自己最优秀的儿女交给红军挺进师。也正由于红军挺进师深深地扎根于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之中，人民群众和挺进师指战员情同骨肉，全力支持红军挺进师的斗争，甚至家破人亡也在所不惜。浙南人民与红军肩并肩英勇不屈的斗争，终于粉碎了罗卓英、刘建绪指挥的两次大规模“围剿”，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开辟和发展了游击根据地。

四、实行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是坚持三年游击战争胜利的又一重要因素

一支红军部队或一个游击根据地，所实行的政策和策略是否能适应当时环境，是否符合人民群众的意愿，这是关系到民心所向、事业成败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红军挺进师的领导刘英、粟裕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善于把中央苏区的经验，创造性地运用到浙南三年游击战争中来。因时因地制宜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以适应各个时期的形势。这也是挺进师胜利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一个重要的关键性因素。

红军挺进师入浙之后，首先开辟和创建了浙西南游击根据地。他们坚定地执行了土地革命的政策，发动广大群众起来“打土豪，分田地”，着手解决广大农民多少年来迫切要求的土地

问题，这很符合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因而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为此，他们纷纷起来参加斗争，踊跃参加根据地的建设。挺进师经过四五个月的努力，之所以能在龙（泉）浦（城）江（山）遂（昌）松（阳）五县间方圆百余公里，迅速建立起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土地革命的政策起了重要作用。

随着华北危机的加深，民族矛盾逐渐成为主要矛盾。挺进师又适时地转变和调整了政策。将“打土豪，分田地”改为征收抗日捐，把“没收委员会”改为“征发委员会”，注意工商业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国民党反动派，在浙江掀起抗日救亡运动，从政策、策略上自觉地从国内革命战争到民族解放战争转变。这又是一个很成功的战略转变。

挺进师在浙南三年的游击战争中，正确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显示党的政策威力的，要数团结“青帮”，共同对敌，最具典型性。

松遂龙地区的“青帮”，不同于“大刀会”。“青帮”这个名称只不过是一种社会掩护的需要。该组织的大多数成员是青年农民，其首领卢子敬，松阳斗潭村人。早年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结识了许多革命志士。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积极参加松阳教育界“爱国会”。接触了《新青年》等进步报刊，思想起了很大变化。当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后，卢子敬与松阳进步青年陈凤生、陈丹山等人，组织了“五卅惨案后援会”，进行宣传和募捐活动。1926 年 7 月在北伐战争胜利影响下，他们又在松阳玉岩、枫坪一带组织农民协会，鼓动减租减息，宣传“耕者有其田”主张，深受农民拥护。1929 年，卢子敬受闽北农民暴动的启发，与陈凤生、陈丹山秘密商议，组织农民武装暴动，决定借“青帮”名义为掩护，组织农民斗争。他们的口号与闽北农民运动一样是：“打土豪，分田地”，号召力很大，在松遂龙边境发展 5000 会众，秘密建立农军。1930 年曾两次攻打玉岩公安分局和玉岩警察所，参加武义、遂昌红军游击队在牛头山区举行的起义，准备攻打遂昌县城事败。卢子敬与二陈又率部至永康一带参加红十三军，也失败。事后改名换姓避往永嘉、福建。1933 年返乡，继续领导“青帮”秘密活动。1934 年 11 月，与洪家云领导的红军取得联系。1935 年 5 月 10 日，挺进师进入松阳县境安岱后，卢子敬于次日组织迎接红军的到来。当他与刘英、粟裕等见面时，提出了“青红不分家”的口号。这口号在松遂龙三县的“青帮”成员中很快流传开来，起到了动员人民群众拥护红军的宣传教育作用。卢子敬与二陈坚决要求参加共产党、红军。挺进师吸收他们参加了红军，不久参加了共产党。结果一大批有觉悟的群众争当红军，挺进师发展到 1200 余人，其中第五纵队大部是浙西南人民的子弟兵。

再如利用保甲制度，对国民党的乡镇长、保甲长、联保主任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实行“白皮红心”两面政权的政策等，都产生了很好的效果。这些对红军挺进师胜利坚持三年游击战争，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选自《纪念浙西南、浙南游击根据地创建 60 周年研讨会论文集》，作者单位：中共遂昌县委党史研究室）

浅析红军挺进师能在浙南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原因

李金南

粟裕、刘英领导红军挺进师，在斗争受到挫折、革命处于低潮时节，孤军深入到敌人的腹心地区，在没有依托和生疏的环境中，发动群众，打击敌人，奇迹般地开创了一块新的红色游击根据地，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

那么，红军挺进师在浙南能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原因是什么呢？

一、坚决执行了正确的军事指导方针

浙南地处国民党的腹心地区，在这里开展游击战争，对敌人的威胁特别大。但这个地区的经济、文化、交通都比较发达，反革命势力比较强大，反动统治十分严密，这就决定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中敌我之间“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特别频繁、残酷和持久。在敌我兵力对比极其悬殊的情况下，只有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才能战胜敌人，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把游击战争坚持到底。挺进师采取了武装斗争与群众工作相结合的方法，创建了根据地，后来把这种方法作为一种策略指导，将部队分为“突击队”与“牵制队”，由“牵制队”（系挺进师主力）公开游击，吸引和牵制敌人，掩护“突击队”开展秘密的群众工作，从事根据地的建设。他们不断地在广大的游击区域内建立起大块、小块的游击根据地，作为发展与坚持游击战争的依托，并且在这些根据地的外围，建立起若干的游击基点，作为红军游击队进出的桥梁和跳板。他们把井冈山的作战经验同浙南的斗争实际结合起来，不断改进游击队的组织形式和游击战术，创造性地提出了“不在消灭敌人，而在消磨敌人”等游击战的战术原则，使自己掌握主动，立于不败之地。他们重视在实际斗争中培养优良的战斗作风，锻炼了一大批干部，使干部们都有较强的分散活动和各自为战的能力。

挺进师把“隐蔽精干，保存力量”的方针同“机动灵活，积极作战”的方针统一起来了。挺进师英勇作战，吸引和牵制了大量的敌人。仅以 1935 年和 1937 年敌人发动的两次“围剿”为例，浙南游击根据地就吸引和牵制了以国民党嫡系主力为骨干的三四十个团兵力各达 8 个月之久。在三年的游击战争中，挺进师曾两度由 500 多人发展到 2000 余人，并最终成为一个新的革命战略支撑点。

二、依靠人民群众，维护群众的利益

挺进师初到浙江时，人生地不熟，人民群众也不了解挺进师。部队有时住不上房子，也买不到粮食，但即使这样，挺进师仍然秋毫无犯，甚至对不明真相的群众的武装挑衅也未予还击。挺进师以这样的忍耐和严明的纪律，在群众中大力开展宣传工作，终于使群众消除了误会，而且群众还把挺进师的模范行动事迹，传遍每个角落。直至今日，许多感人的故事还流传着。如 1935 年 8 月初，挺进师一支部队进入宣平城，夜宿城外桃林中，桃子熟了，芳香诱人，指战员们虽饥渴交加，但没有一个人去摘食桃子充饥，这事被宣平人民传为美谈。群众了解了挺进师，就不仅请他们到家里去住，而且还帮助他们烧茶送水、送饭、探敌情、抬伤兵、送信、带路、捕捉敌探、破坏敌人交通等等，有些群众甚至以自己的生命来保卫挺进师指战员，群众真正成为挺进师同生死共患难的兄弟了。

三、灵活运用党的政策策略，转变工作方式方法

挺进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制定了适应当时斗争环境的政策、策略。开始时，他们坚定地执行土地革命的政策，“打土豪，分田地”，发动群众起来斗争，从事游击根据地的建设，这是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因而得到人民群众的真诚拥护。以后，随着民族矛盾的上升，适时地转变和调整了政策。如将“没收委员会”改为“征发委员会”，把“打土豪，分田地”改为征收抗日捐，注意工商业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在以农村为基地坚持发展游击战争的同时，成立“白区工作团”，充分发挥当地知识青年的作用，把工作推向城区。

（选自《纪念浙西南、浙南游击根据地创建 60 周年研讨会论文集》，作者单位：中共缙云县委党史办公室）

红军挺进师在浙南实行两个战略转变初探

张志坚

在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期间，红军挺进师实行了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变，实行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这是红军挺进师在失去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的领导，在环境十分险恶、形势极端严重的情况下，从全国革命形势和浙南实际情况出发，自觉地独立地解决了两个战略转变，从而取得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的胜利，创建了浙南(含浙西南)游击根据地，为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作出了贡献。

一、实行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的军事战略转变

中国革命战争的一个重大课题，是如何根据形势的变化实行战略转变。粟裕、刘英根据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遭受惨痛失败的教训，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及时实行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变，挺进师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并且提出了有独创见解的实行这个转变的方法。粟裕指出："为了较顺利地实现这一转变，必须打一两个好仗。"通过打一两个好仗的方法实现向游击战的转变，带有在新的地区开辟游击战局面的特点。1935 年，挺进师进入浙南地区后，于 4 月下旬在浙南斋郎地区打了一个"好仗"，粉碎了由浙江和福建派出的两路敌人的"分进合击"。粟裕把斋郎战斗誉为挺进浙闽边后的 "关键性一仗"。这一仗迫使敌人在一段时间内转为退守，使一些地方反动势力纷纷离开浙南，挺进师获得了开辟浙西南根据地的有利时机。

军事战略的转变，首先要在组织形式上实行转变。挺进师是以正规的红十军团为基础组建的队伍，他们继承了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勋业，任务繁重，名声很大，但不善于打游击。因此，要在浙南立足生根，坚持斗争，战胜敌人，必须在组织形式上来个转变，把正规军变为游击队。为顺利实现这一转变，挺进师采取了如下措施：第一，从政治思想教育入手。针对不少干部战士对打游击缺乏信心，反复教育大家要适应发展和变化着的革命形势，只有把正规军转变为游击队，才能更快学会打游击，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部队到达崇安县岚谷一带时专门进行整训，召开政治讨论会，使大家树立起由正规军转变为游击队的思想。第二，组织干部战士到实际斗争中去锻炼，逐渐学会分散活动的方法，积累做群众工作的经验，并在实际工作中了解群众疾苦，熟悉当地风俗习惯，学习浙南方言，提高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信心和本领。在具体做法上，采用循序渐进的办法，派小部队先只出去活动三天，三天后会合再出去，再增加到五天。时间长了，办法多起来了，信心慢慢增强了，以后出去活动的时间逐渐增加到七天、十天、

半个月，这样，就学会了单独活动。后来，一个排长、一个班长也能带一支小部队分散活动和各自为战了。

其次是从正规作战向游击战争的转变。军事战略转变的核心是作战方法和战术的转变。在孤军深入敌后，不适时实行作战方法和战术的转变，不但不能坚持开展战争，而且直接关系到能否生存的问题。粟裕、刘英针对敌强我弱、山岭连绵、地形险要和群众基础比较好的特点，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时期总结的十六字诀，创造了一整套游击战术。粟裕同志把它归纳为六条原则、五个要领。六条原则是：(1)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胜利；(2)不在消灭敌人，而在消磨敌人；(3)支配敌人，掌握主动；(4)积极进攻，绝小防御；(5)飘忽不定，出没无常；(6)越是敌人后方，越是容易成功。五个要领是：(1)反敌人之道而行，并竭尽欺诈之能事，敌进我退，敌集我散，敌大我避，敌小我欺，避实就虚，声东击西；(2)不要企图太大，只要常有小胜；(3)站在敌人翼侧、后方和圈子外围，不为敌人所合击；(4)一切作战行动必须迅速、勇猛、坚决，迟疑犹豫就等于等死；(5)注意使用突然的白刃袭击，只要枪弹一响，刺刀就要杀到敌人的肚皮上去。这些作战原则与经验是经过无数次战斗实践检验的，特别是国民党军对挺进师进行三次大的作战行动，其中一次“进剿”，两次“围剿”，规模一次比一次大，粟裕、刘英针对敌人疯狂进攻，采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打击敌人，并且各有特点。

反“进剿"的特点是：转入敌后，运用游击战调动和打击敌人，使中心区的工作继续开展。由于浙西南地区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国民党当局十分震惊，《东南日报》惊呼：“松遂龙各县大半赤化。”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赶忙开会，决定“进剿”。1935 年 5 月，集中浙江 4 个保安团、11 个保安队，连同从南京调来的 1 个税警团，合计八九个团的兵力，分四路向浙西南地区发动“进剿”，妄图将挺进师消灭于立足未稳之际。为了对付国民党的“进剿”，加速创建游击根据地，挺进师将主力分为南北两路，趁敌人尚在运动中，先一着跳出去，转入敌后，运用游击战打击敌人，把敌人调出中心区，使中心区的工作能继续坚持和开展。敌人的“进剿”遂告失败。在武装斗争的保护下，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得到迅速发展，许多地方的各种革命群众组织普通建立，有的成立了区委员会和区苏维埃政府。各地还建立了游击队，发展了群众武装。到 8 月底，挺进师已发展到近千人，扩编为 5 个纵队和 2 个独立支队，连地方干部一起有 2000 人，地方武装有千余人。

第一次反“围剿”的特点是：跳出包围圈，以积极的作战行动吸引敌人、调动敌人，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1935 年 8 月间，国民党军委会调罗卓英任军长的第十八军入浙“围剿”。9 月，国民党“清剿”总指挥部集中了 32 个整团、六七万人的兵力，连同地方武装，号称 40 个团，妄图围歼挺进师，彻底摧毁我浙西南游击根据地。面对敌人大规模的“围剿”，挺进师实行“敌进我进”的方针，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除留下一部就地坚持斗争外，主力部队迅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以积极的作战行动吸引和调动敌人。但是，敌人除派 5 个团的兵力追堵我军跳出包围圈的部队外，将几十个团的大部队，死死地箍住浙西南中心区。针对敌人不受调动的情况，挺进

师采取坚持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的做法，命一纵队向浙东发展，主力开辟浙南游击根据地，以积极行动，支援浙西南的斗争。这次反“围剿”，浙西南游击根据地虽然暂时丧失，但挺进师在浙南地区又开辟了大块的游击根据地，游击战则在浙西南、浙闽边、浙东、浙南更广泛的区域内展开了。

第二次反“围剿”的特点是：相向对进，易地再战，击破敌人“大拉网”战术。1936 年 12 月，蒋介石从湖南调第四路军进驻浙赣皖边区，在江山建立“闽浙赣皖边区主任公署”，任命刘建绪为主任。刘到任后，立即制订了“闽浙赣皖边区绥靖计划”，将浙南划归为第三清剿区，调集 6 个师、2 个独立旅及地方保安团共 43 个团、10 余万兵力，从 1937 年 1 月开始，向浙南游击区进行第二次大“围剿”。但这时我游击区范围已经扩大。从“两广事变”爆发到“西安事变”的解决，是浙南游击战争的第二个发展时期，到 1936 年底，挺进师再次由几百人发展到 1500 多人，地方游击队和群众武装达数千人，活动范围扩大到 30 多个县境。因此，刘建绪已不可能采取罗卓英包围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做法，他采取拉网式的由北而南、由西而东、由外围到中心的逼进包围方针，企图将我军向东南紧逼，赶到飞云江以南、沙埕港以北之间的浙南沿海地区包围聚歼。挺进师针对敌人“大拉网”的战术，采取与敌人相向对进、易地而战的打法。敌人梳过来，我军钻过去；你要我的山头，我要你的后方。为对付敌人大规模的“围剿”，作战单位逐渐分散。当敌人进攻时，为了避其锋芒，坚决迅速转移。由于运用了灵活多变的游击战术，又一次挫败了敌人的大规模“围剿”。

再次是从指挥正规作战向领导游击战争的转变。客观情况变了，领导方法和活动方式也必须跟着转变，以适应游击战争的需要。他们主要采取三种方式：一是实行统一领导，分散活动。为了有利于对敌斗争，加强挺进师活动区党、政、军工作的统一领导，1935 年 3 月挺进师领导在闽北崇安岚谷开会，决定成立政治委员会，由刘英、粟裕等 9 人组成，刘英为书记。5 月又组建了师政委会分会，每个纵队还建立了行动委员会，作为单独行动时的领导集体。1935 年 10 月，粟裕、刘英率领挺进师主力南下，在福建寿宁县境与闽东特委主要负责人叶飞率领的闽东独立师会师，双方领导人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刘英为书记，粟裕为组织部长，叶飞为宣传部长兼少共(团)临时省委书记。与此同时，成立了闽浙边临时省军区，粟裕任司令员，刘英任政委。1936 年 2 月，临时省委在泰顺峰文召开会议，决定挺进师政委会书记改由粟裕兼任。这样，就加强了边区党政军的统一领导；同时，也加强了挺进师以及各部队在分散活动中的领导与指挥，更好地适应由正规战向游击战转变的需要。二是军队工作地方化，地方工作军事化。早在 1935 年 6 月，粟裕、刘英就从挺进师中抽调一批有地方工作经验的同志，组成地方工作团，在松（阳）遂（昌）龙（泉）之间开展群众工作。在第二次反“围剿”时，为了避开敌人的大部队合围，挺进师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转移到敌人的侧翼和后方，开展游击战争。当时集中在浙南游击根据地的部队有七八百人，大部分以中队为单位向西向北突围，留部分部队配合地方干部坚持隐蔽斗争。他们在浙南特委的领导下，组成武装工

作团，和群众一起，机动灵活地跟国民党军周旋。为了适应游击战争的需要，浙南游击区的党政机关也改变了原来的组织形式和领导方式，实行地方工作军事化。以县为单位，组成武装工作团，由县委书记和县游击队长分任正副团长；区组成武装工作队或武装工作组，由区委书记和区游击队长分任正副队长或组长。这就形成了既是工作队、又是战斗队的坚强集体。各县区武装工作团队，根据情况的变化，有时集中，有时分散，巧妙地跟敌人进行斗争。三是把公开的武装斗争同隐蔽的群众工作有机结合起来。1936 年 6 月，由刘英率领临时省委机关和特务队坚持在浙南地区秘密发动群众，进行游击根据地建设；粟裕率领挺进师主力在浙西南、浙东地区开展公开的武装斗争，牵制、吸引、打击国民党地方保安团队，以掩护基本地区开辟新的游击区。1937 年 2 月，面对国民党军大举进攻的严重形势，为了保存红军游击队，坚持武装斗争，坚持战略支撑点，挺进师确定了“隐蔽精干，保存力量同机动灵活，积极作战”相统一的方针。隐蔽精干，保存力量，是为了更好地打击敌人。在敌人大规模“搜山”“清乡”时，一时难以脱险，游击队就索性住进地主和保甲长家里，向其陈明利害，获得掩护。积极进攻是游击战的一大特点。各游击队利用各种有利时机，向敌人发起进攻，以改变不利态势。由于挺进师机动灵活，积极作战，才吸引和牵制了大量的敌人。仅以两次反“围剿”为例，浙南游击区就吸引和牵制了国民党嫡系主力为骨干的三四十个团的兵力各达 8 个多月之久。

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是国内正规战争和游击战争之间的转变，能否适时实行这个转变，对浙南三年游击战争的胜败关系极大。英勇的挺进师，在粟裕、刘英的指挥下，实行了从正规战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变，为后来的抗日游击战争提供了宝贵经验。

二、实行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

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转变，这是两个革命战争时期的转变。刘英、粟裕领导挺进师实行这个转变是比较自觉的。特别是在失去了同党中央和上级党的联系的情况下，他们的思想仍能与党中央保持一致，顺应革命形势的发展，这是十分可贵的。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他们对如下几个问题的处理比较自觉：

首先，非常关心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每到一地，他们都设法搜集敌人的报纸，从中了解情况，分析形势，并从中体会党的方针、政策。当他们看到党中央发布的《八一宣言》和《十大纲领》等重要文件后，对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总路线有了基本了解，便马上给指战员上形势课，进行思想教育；同时对外发表宣言和公开信，宣传我党关于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表明我们的立场和态度。1936 年 6 月发生“两广事变”，当时粟裕带着挺进师主力转战于浙西南和浙东一带，刘英带领“突击队”在浙南开展秘密工作，尽管双方没有联系，但都分别发表了反对内战、要求团结抗日的宣言。

其次，调整对敌斗争的政策和口号。在民族矛盾日益加深的形势下，刘英、粟裕从实际情况出发，发出抗日救国“快邮代电”呼吁“全国民众一致醒来”“组织抗日救国会”“组织抗日义

勇军”“为挽救民族危亡而战”；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闽浙两省各界人民书》，号召各界人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粮食出粮食，有武器出武器，有智慧出智慧，团结起来组成抗日阵线。调整了对敌斗争的政策和口号。如对国民党的乡、镇、保长由镇压改为争取；对地方士绅和中等商人，中立的允许自由来去；对上层分子根据其不同表现区别对待，以孤立敌人；把“穷人不打穷人”的口号改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把“欢迎白军士兵杀死官长拖枪当红军”改为“欢迎白军官兵枪口对外和红军共同抗日”，把“肃反队”改为“肃奸队”等。针对浙江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地主兼工商业者多的特点，对政策也作了若干调整，以抗日、反蒋为前提，扩大团结对象，缩小打击目标，把“没收委员会”改为“征发委员会”，用征收抗日捐办法筹粮筹款，从而为浙江省国共合作抗日奠定了政治和思想基础。

第三，力求谈判，坚持原则。“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六项条件。但是，蒋介石却采用了两面政策，实行“北和南剿”的方针，对南方红军游击队继续“围剿”。闽浙赣皖四省边区主任刘建绪调集 43 个团、10 万余兵力，对浙南游击区进行“围剿”。但是，此时民族矛盾已空前激烈，“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相继爆发。国民党蒋介石迫于形势和全国抗日运动高涨的压力，其“北和南剿”的反动方针也难以推行了。尽管浙南游击区的中心地区遭受了严重的摧残，但几块游击根据地仍然坚持下来了。刘英、粟裕领导挺进师坚持武装斗争的同时，又力求谈判，在谈判中坚持原则，解决与国民党之间的矛盾。

1937 年春，经过多方努力，临时省委同上海党组织建立了联系，接着又经过上海党与中央取得了联系，这对于指导浙南游击区的斗争和实行第二个战略转变，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4 月，在刘英的主持下，以临时省委和省军区名义向浙江国民党当局发出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文电。其时，刘建绪已奉蒋介石之命，在报纸上公开表示，要和我方谈判。双方代表在鳌江进行了三天的谈判。在谈判中，国民党代表妄图以和谈为名，迫我投降。我方代表表明了合作抗日的严正立场，揭露了敌人的罪恶阴谋。对方见其阴谋不能得逞，便拿出蒋介石“停抚进剿”的手令相威胁，谈判随即破裂。稍后，战斗在浙西南地区的粟裕给国民党遂昌县政府写信，要他们派代表来同我们谈判。在全国抗日高潮到来后，刘建绪复于 8 月间给临时省委送来亲笔信，要求和我方重开谈判。临时省委遂派代表到温州同国民党浙江当局谈判。9 月 16 日双方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

实现两党合作抗日，这是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两个革命战争时期的转变。在同国民党的谈判中，我方坚持了原则立场，国民党在军事斗争中没有得到的东西在政治斗争中同样没有得到。

第四，以实际行动迎接抗日高潮。1937 年 10 月，挺进师分散游击于浙南各地的游击队先后集中于平阳北港山门街。这支四五百人的部队随即正式改编为 “国民革命军浙闽边抗日游击总队”，粟裕任队长，刘英任政委，下属三个支队和一个教导队。为了加强抗日力量，挺进师在大墩村举办了三期党员干部训练班，刘英、粟裕亲自给干训班讲课。并在山门街畴

溪小学开办了“抗日救亡干部学校”，粟裕兼任校长，刘英、粟裕亲自讲课。同时，部队补充新兵，加强军训。

当时，日寇有在温州沿海登陆的可能，为了准备在日寇登陆后在闽浙赣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并防止国民党当局再次背信弃义，发生变故，经研究决定由刘英主持浙江省的工作，带领部分武装人员和干部继续留在浙江坚持斗争；由粟裕带领“抗日游击总队”开赴皖南。粟裕率部于 1938 年 4 月到达歙县岩寺，加入了新四军的战斗行列，整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三营。

由于粟裕、刘英领导挺进师比较自觉地实行了两个战略转变，方能在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中，进行了数百次大小战斗，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一次疯狂“进剿”和两次大规模“围剿”，牵制了国民党军队的大量兵力，策应了主力红军北上的战略行动，配合了邻近游击区的斗争，奇迹般地开创了浙南游击根据地。

（选自《纪念浙西南、浙南游击根据地创建 60 周年研讨会论文集》，作者单位：浙江省新四军研究会）

红军挺进师是怎样完成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战略转变的（节录）

陈史英

一、实行公开的武装斗争与隐蔽的群众工作相结合的方针，完成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战略转变

面对敌人死死箍住浙西南根据地不放的严重情况，挺进师的指挥员们，凭着革命者的大智大勇，发挥他们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积累起来的经验，及时总结了浙西南的斗争教训，冲破王明“左”倾路线的束缚，当机立断，利用敌人外围兵力薄弱的机会，挥师南下去开辟新的根据地。在与闽东特委联合成立闽浙边临时省委后，挺进师除令第一纵队继续向浙东发展外，把重点放在建设浙南根据地上。挺进师在接受浙西南经验教训基础上，重新调整了策略与政策，其总的方针是公开的武装斗争与隐蔽的群众工作相结合。建设根据地时不再搬用浙西南公开建党建政、公开成立群众组织的做法，把部队分别组成突击队与牵制队，突击队率领便衣队和短枪队，由刘英同志负责，秘密进行根据地工作；牵制队是主力，由粟裕同志率领，在广大范围内进行公开的武装斗争，吸引、牵制并打击敌人，以掩护和保卫基本地区，并开发新的游击区。做到公开与秘密的互相支持，互相掩护，既可以分散发动群众，也可集中打击敌人。到第一次反“围剿”结束，一块范围比浙西南根据地更大的浙南游击根据地，在瑞安、平阳、泰顺之间建立起来。“两广事变”发生，罗卓英“围剿”部队撤走后，挺进师利用敌情比较缓和的大好时机，打通浙南根据地内各县、区之间的联系，使根据地连成一片，纵横 250 公里，先后成立了浙南特委、浙东南特委、十个县委和一个中心县委，成为挺进师在浙江开展游击战争的总后方。值得注意的是，浙南游击根据地，是在敌人重兵压境，重点“清剿”粟、刘时，在敌人后方秘密建立起来的。浙南游击根据地的建成，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由于这里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地理位置好以及交通不发达等因素，都比浙西南更便于坚持。挺进师在浙南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并取得最后胜利，足以说明了建立根据地所采取的方法的正确，同时也标志着挺进师在战略上完成了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战略转变。

二、不同类型的游击根据地同时并存

创建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时，同时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自从挺进师在战略上转变为游击战

后，总结了浙西南与浙南方面的经验教训，意识到为了长期坚持敌后，形成比较巩固的游击区，并为主力部队提供更多的落脚点和跳板，不仅要有较大块的游击根据地，而且在较大块根据地周围，还必须建立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和若干游击基点。在敌我争夺的边缘地带，还可以建立起“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小块游击根据地，一般在形式上是秘密的，以门阵游击根据地为例，它位于宣平、遂昌、汤溪三县边区，离金华与浙赣铁路甚近，公路水上交通便利，为山区竹木土特产集散地，商旅往来频繁，人称“小上海”。1935 年挺进师在这一带发展了党组织，成立了遂汤区委，由于采取特殊隐蔽方式，罗卓英“围剿”时，竟被置于包围圈外，没有受到摧残,后来在恢复浙西南地区时，在这里成立了宣遂汤工委。由于执行了新的政策，经济上有一定的发展，得到群众的拥护。那一带的保甲长大多是替红军办事的，区长、乡长一般都保持中立。因为群众基础好，地形险要，敌人进山骚扰遭我几次打击，即不敢轻易进犯，因此这块小小的游击根据地便成了浙赣铁路以南和浙西南地区坚持斗争的重要基地之一，同时金华实际上成为我军的军需供给基地。门阵游击根据地的出现和所表现出来的生命力，为在敌人统治的心腹地区，在孤军作战情况下，创建游击根据地提供了经验。这正是挺进师在战略上完成从正规战到游击战转变的标志之一。

由于有浙南游击根据地，同时又有许多活动基点，可互作依托，就能如鱼得水，施展自如。遇到敌情紧张或打仗疲倦了，一个晚上急行军转到游击基点或根据地，在群众掩护下，封锁消息作短期休整。然后侦察敌情，计划好行动部署，再跳出去打击敌人。必要时还可到浙南根据地作休整。据粟裕同志自己回忆，有一次他带部队与敌人周旋了三天三夜，最后到了金华附近的一游击基点一觉睡了 40 多个小时。真可谓“狡兔”之有三窟，打起游击来更加游刃有余了。

三、适时调整政策，发挥政策的威力

如果游击战仅仅作为配合正规战的辅助手段，为某个战役服务时，那它是暂时性，也是单纯军事性的，不需要专门去研究政策问题，但是挺进师当时是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游击战处于全局性和长期性的战略地位，因此能不能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制订适当的政策，发挥政策的强大威力，就成了挺进师是否全面完成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战略转变的重要内容之一。

创建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时，是以打土豪、分田地为基本政策，其进行的方法步骤是照搬老苏区的做法，到了建设浙南根据地时，挺进师的领导者们，从浙西南的经验教训出发，意识到在执行基本政策的基础上，还必须根据浙江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地主兼工商业者多的特点，及全国形势发展，从群众的长远利益出发，达到便于团结多数、孤立少数、各个打击敌人的目的，对过去实行的政策作了适当的调整，对其它秘密的游击根据地不进行土改，在筹款方面，过去是专靠打土豪解决，后来改用征收抗日捐款的名义向财主们派捐，并把没收委员会也改为征发委员会，派款也根据被派对象的实际承受能力，留给生活出路，这样除个别顽固

分子需要采取强制手段外，一般都愿意派捐，这样也便于对他们的监督。对地方绅士和中等商人，进步的欢迎，中立的允其自由来往，继续营业不受侵犯，这样使群众手中的土特产得以照常出售，必需的日常生活用品得到供应，便于满足部队的军需供给，因而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和支持。

挺进师还有一个伟大的创举，就是对国民党的乡、保长由以前镇压为主改为争取为主，有的还派秘密党员或基本群众去充任国民党的乡保长，建立起“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在第二次反“围剿”中，敌人强迫群众组织联甲队、反共义勇队等反动组织，挺进师将计就计，让党员和群众参加进去，在其中起核心作用，明里替敌人站岗放哨，暗里替红军监视敌人，秘密传递情报和掩护红军行动，使红军可以在敌人眼皮底下，神出鬼没地进行活动，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国的侵略，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为了争取各界人士对红军抗日主张的同情，挺进师和闽浙边临时省委，以他们敏锐的政治眼光，在对敌斗争政策和口号上作了进一步调整，把“穷人不打穷人”改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把“欢迎白军士兵杀死长官拖枪当红军”改为“欢迎白军官兵枪口对外和红军共同抗日”，同时把工农红军番号称人民红军，将“肃反队”改为“肃奸队”（奸指汉奸），“赤卫队”改为“抗日义勇队”等等。此外还派出白区工作团到温州城内领导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并开展与上层分子的统战工作，把党和红军政治影响扩大到更大的范围。

由于挺进师及时总结了创建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经验教训，全方位完成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转变，从斗争策略上作了新的调整，在结束第一次反“围剿”斗争后，又迎来了第二个发展时期，游击区发展到 30 多个县，并开展了白区工作，挺进师本身再次从几百人扩展到一千五六百人。

与此同时，蒋介石在全国人民响应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下，竟制订了极其恶毒的反动计划，妄想在实现全民抗日之前，一举消灭南方各省的游击区。于是调刘建绪率四路军由湘入浙，担任“闽赣浙皖边区绥靖主任公署”主任，调集 43 个团共 10 余万人以浙南为重点进行第二次“围剿”。于是刘建绪向浙南游击区发起大举进攻。这时的挺进师不论在游击战的战略或战术上都在向更高层次发展，他们运筹自如，根据实际情况，制订“隐蔽精干、保存力量同机动灵活、积极作战方针统一起来”的总方针，除留少数部队配合县、区干部在基本区坚持外，其余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全部转到敌人后方或侧翼，化整为零分散打游击，针对敌人大拉网的战术，采取与敌人相向对进的打法。省委、特委等领导机关还利用敌人重视基本区和山区的弱点，进到敌人不甚注意的平原地区，甚至到敌人统治中心的县城附近坚持隐蔽工作。经过 8 个月与敌人斗智斗勇，终于迫使刘建绪接受我方条件，通过谈判达成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协议，在胜利声中结束了挺进师在浙南的三年游击战争，迎来了抗日高潮，完成了从国内革命战争到民族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

回顾红军挺进师在浙南三年游击战争的历程，可以清晰看出挺进师的指挥员们，凭着他们过去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工作时所受到的教育，在还不知道已确立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时，面临当时的困境，自觉运用“普遍真理与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武器，冲破王明错误路线的束缚，实事求是地总结以前的经验教训，全面完成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战略转变，并结合实际情况，不断创新发展，丰富了游击战争的经验，发展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

（选自《纪念浙西南、浙南游击根据地创建60周年研讨会论文集》，作者单位：丽水地区新四军研究会）

红军挺进师战略转变因果析

陈治赵　刘建国

红军挺进师开赴浙江后，在粟裕、刘英的正确领导下，果断地实行了由正规军向游击队、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变，从而提前实现了毛泽东提出的“国内正规战争和抗日游击战争之间的转变”[①]，既保存了革命力量，又发展了革命根据地，奠定了浙江革命胜利发展的基础。本文仅就红军挺进师果断实行由正规军向游击队、由正规战向游击战转变的原因，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结果作些探讨，求教于革命前辈和史学界同行。

（一）

红军挺进师是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江西怀玉山严重失利之后，根据中共中央的命令，以突围部队为基础，于1935年1月组建的。红军挺进师组建后不久，就积极主动地实行了由正规军向游击队、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变，并深入浙南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战争。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了这一重要的战略转变呢？根据当时具体的斗争形势和环境，我们认为促成红军挺进师战略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在于：

第一，是红军挺进师认真执行了上级党组织正确指示的结果。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国共产党在贵州遵义召开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就在遵义会议召开的同时，中共中央在1月15日致电苏区中央分局，责成中共闽浙赣省委迅速以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先头部队和突围部队为基础，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到浙江长期行动[②]。当时中央分局给红军挺进师的主要任务是“经过闽北到达浙江，长期行动，发动广泛的游击战争，扩大党与苏维埃的政治影响，发动群众斗争，直到分配土地创立苏维埃新的根据地，以及建立党的组织，配合友军行动，调动和吸引住大批的敌人，保卫闽浙赣基本地区及邻近游击区域，并打通闽东闽北的关系，取得工作上、行动上有力的配合，响应主力部队的行动，彻底粉碎敌人‘清剿’计划与五次‘围剿’”[③]。中央的指示，给

① 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0页。
② 刘英：《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浙南——南方革命一个战略支点》，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01页。
③ 刘英：《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浙南——南方革命一个战略支点》，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01页。

红军挺进师指明了正确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方向，成为红军挺进师实行战略转变的可靠依据。

第二，是红军挺进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在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作出的正确选择。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对中国革命战争作了精辟的分析，认为中国革命战争有四个主要特点："第一个特点，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而又经过了 1924 年至 1927 年的革命。""这个特点，不但基本上规定了我们政治上的战略和战术，而且也基本规定了我们军事上的战略和战术。""第二个特点是敌人的强大。""这个特点，使红军的作战不能不和一般战争以及苏联内战、北伐战争都有许多的不同。""第三个特点是红军的弱小。"这个特点，规定了"红军没有真正巩固的根据地""根据地是流动不定的"。"第四个特点是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这个特点，使红军"有很大的政治上的威力""有强大的战斗力"[①]。简而言之，中国革命战争的这些特点决定了我们应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正确领导下，从中国革命的实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红军进行游击战争的一系列战略战术，如"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及"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打击敌人""诱敌深入，各个歼灭"等等。在这些正确灵活的战略战术指导下，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迅速发展和壮大，并打退了拥有绝对优势兵力的国民党军队的四次大规模反革命"围剿"，使红军和根据地立于不败之地。但到了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时，"左"倾教条主义者完全否定了红军正确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他们无视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特点，在反"围剿"斗争初期，实行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面对 50 万国民党大军的疯狂进攻，命令区区几万红军盲目地全线出击，企图御敌于根据地之外，结果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进攻失利后，"左"倾教条主义者又转入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命令红军处处设防，节节抵御，实行消极的阵地战、堡垒战，使红军处处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组建后，由于继续受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未能根据客观形势的重大变化，及时调整和改变部队的战略战术，而是不顾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一味去攻打敌人力量强大的中心城镇，同敌人死打硬拼，而且还把长于打游击的红十军和地方武装与长于打运动战的红七军团合编，组成新的大兵团，集中在一起打运动战，结果使先遣队无法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而是常常被动挨打，以致最终在怀玉山严重失利。

上述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对于较早就参加革命，曾长期追随毛泽东、朱德打游击，并一贯倡导和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的红军挺进师领导者粟裕、刘英等人来说，是有切身体会的。粟裕在总结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的原因时，曾深刻地指出：当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未能及时实行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由正规军向游击队的军事战略转变，这是使抗日先

①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88—190 页。

遣队遭受挫折和失败的主要原因。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红军挺进师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终于实事求是地转变了战略，把正了革命航向。

第三，红军挺进师主要领导者粟裕、刘英等人自身具有优良素质，这是促成红军挺进师成功实现战略转变任务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粟裕在 1927 年中国革命进入低潮的艰难岁月里，毅然投身革命队伍，参加了叶挺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教导队。他先后参加过南昌起义、湘南起义，1928 年 4 月随朱德、陈毅上了井冈山，投身于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接着又参加了中央红军五次反“围剿”战斗。他在部队里先后担任过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师政委、军参谋长、红七军团参谋长等职，逐渐从一个普通的战士锻炼成长为一个优秀的红军高级指挥员。刘英是 1929 年投身革命，加入朱德、毛泽东率领的红四军的。他在革命队伍里出生入死，经历了无数次战斗的洗礼，由一名普通战士提升为班长、连指导员、营指导员、团政委、师政委和红七军团政治部主任。由于粟裕、刘英长期追随在毛泽东、朱德身边从事游击战争，并在红军中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职务，因而他们具有丰富的游击战争经验和高超的指挥才能，较好地领会和掌握了红军一整套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为他们以后领导红军挺进师迅速实行由正规军向游击队、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红军挺进师领导者的优良素质还表现在他们具有较高的文化理论水平。粟裕在 1924 至 1927 年曾在常德湖南第二男子师范学校学习，打下了较扎实的文化基础，后因积极参加学生运动，遭反动当局通缉而毅然投笔从戎。刘英虽因家境贫寒，高小毕业后就被迫中断学业，但他爱书如命，仍发奋读书自学，并以“深夜书为友，逢春花必吐”自勉。粟裕、刘英等红军挺进师领导人，在革命队伍里，在艰难困苦的战斗岁月里，也总是充分利用战斗的空隙，如饥似渴地吸收各种文化知识和红军正确的军事思想，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理论水平。由于有较高的文化理论水平，所以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就容易认清真假马克思主义，能够较透彻地领会和掌握红军灵活多变的游击战争战略战术，也能及时地转换脑筋，迅速转变红军挺进师的战略战术，以适应客观形势的变化发展。

第四，当时对敌斗争的客观环境也促进了红军挺进师的战略转变。

浙江是蒋介石的家乡，又是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国民党在该地区的反动势力特别强大。蒋介石上台以后，在浙江培植了一大批特务、党棍、高级官僚和军官，从上到下建立了各级国民党党部和庞大的特务机构，普遍建立了反动的保甲制度，严密控制浙江人民的活动。此外，浙江还有名目繁多的受国民党利用和支持的封建帮派组织，专门从事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加上浙江及其周围驻有大量的国民党军队和地方保安队。因此，浙江革命斗争的环境是异常凶险的。当时仅有 500 余人的红军挺进师要在反动势力占有绝对优势的浙江扎下根来，必须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及时实行由正规军到游击队、由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战略转变。

同时，浙江，尤其是浙南，也有许多有利于挺进师开展游击战争的条件，包括红军挺进师

的主要活动区域浙南，丘陵、山地面积约占 80%，到处山岭连绵，森林茂密，道路崎岖曲折，利于红军部队隐蔽、转移和分散打游击。

浙南人民受尽了国民党政府和地方豪绅横征暴敛之苦，有强烈的改变现状的革命愿望。他们热情支持和参加红军挺进师的革命活动，为红军挺进师胜利地开展游击战争提供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浙南地区党的组织基础好，许多地方党组织一直在秘密活动，党在群众中有较高威望和巨大号召力。

浙南地区在 1930 年就组建过当时被中央军委编入正式序列的全国十四支红军之一的红十三军。红十三军在浙南坚持斗争达四年之久，革命烈火燃遍了浙南大地，使浙南人民经历了一次极好的革命洗礼，大大提高了浙南人民的革命觉悟，并积累了革命斗争的经验。

综上所述，浙江的客观环境不仅使红军挺进师的战略转变成为必须，而且也有可能。

（二）

红军挺进师的战略转变，对红军挺进师自身和整个浙江革命形势的发展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其突出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首先，它扭转了红军挺进师以往被动挨打的局面，使革命武装得到了保存和锻炼，并取得了丰富的游击战争经验。在实行战略转变的过程中及战略转变任务实现后，红军挺进师以毛泽东、朱德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井冈山总结的十六字诀为指导，结合浙江革命斗争的实际情况，制订了一系列灵活机动战略战术，使红军挺进师迅速摆脱了以往被动挨打的局面，取得了一系列战斗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军队的反革命“围剿”。同时，红军挺进师也保存和锻炼了自己，队伍日益壮大起来。国民党派往浙江“剿共”的将领罗卓英在 1935 年初到龙泉视察时，不得不感叹道：“当时刘英、粟裕等仅有数百人，现在统计数达 3000 以上，……其进展程度，比江西还要厉害。”[①] 红军挺进师不但在数量上有了很大的发展，而且由于战士们能较深刻地领会和掌握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因而战斗力大大增强，成为国民党的“心腹之患”。

其次，它开创了浙南革命根据地，为我党领导中国南方革命建立了一个重要的战略支点。红军挺进师在胜利地进行游击战争的基础上，深入浙南各地，恢复和建立了各级党组织，充分动员和组织广大劳苦群众起来革命和斗争，从而先后开辟了浙西南和浙南两块游击根据地（总称“浙南革命根据地”）。浙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使游击战争有了可靠的依托，进而又推动了游击战争深入发展，为我党在浙南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发动抗日救亡运动，争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如粟裕所说的，浙南革命根据地“这个战略支撑点，在

① 《浙南——南方革命一个战略支点》，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10、511、335 页。

以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①。

再次，它有力地推动了浙江革命形势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配合和支援了中央主力部队和邻近革命根据地的活动。由于红军挺进师战略转变任务的实现和游击战争的胜利发展，加上浙南革命根据地的开辟，浙江的革命烈火熊熊燃烧起来。为了扑灭浙江的革命烈火，蒋介石先后调集了大量精锐部队入浙“围剿”红军挺进师。“仅以我们进行的两次反‘围剿’为例，就先后吸引、牵制了罗（卓英）、刘（建绪）两敌各三四十个团的兵力，历时各达 8 个多月之久。”②由于红军挺进师采用了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因而国民党军队只是“随匪来去，跟纵追赶，兵士疲于奔命”③，始终未能达到其“清剿”目的。红军挺进师的英勇斗争，不但消灭和牵制了大量的敌人，而且“无疑在一定程度上策应了党中央和主力红军的战略行动，也在一定程度上配合和掩护了邻近兄弟游击区的斗争”④。这里的“邻近兄弟游击区”，主要是指闽北和闽东这两个革命根据地。

此外，红军挺进师的战略转变也为浙江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战略转变的过程中，红军挺进师的指战员们，一方面进行游击战争，反击国民党的“围剿”，一方面又积极向广大人民群众讲解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大力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努力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不断激化，红军挺进师和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及时调整了政策，并于 1937 年 9 月和国民党浙江当局达成和谈协议，使浙江正式进入国共合作抗日的新阶段，有力地推动了浙江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总之，红军挺进师在粟裕、刘英等正确领导下，以实事求是为准绳，以党的指示为方向，根据不断发展的客观实际情况，及时实行了由正规军向游击队、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变，变被动为主动，有力地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较好地完成了上级党组织交给红军挺进师光荣而又艰巨的历史任务，同时也为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尤其是当今的改革开放宏伟大业提供了具有启迪意义的宝贵经验。

（选自《纪念浙西南、浙南游击根据地创建 60 周年研讨会论文集》，作者单位：温州师范学院）

① 粟裕：《回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浙南——南方革命一个战略支点》，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23 页。
② 粟裕：《回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浙南——南方革命一个战略支点》，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35 页。
③《浙南——南方革命一个战略支点》，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10、511、335 页
④《浙南——南方革命一个战略支点》，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10、511、335 页

红军挺进师“敌进我进”军事方针的形成和意义（节录）

周德春

一、从姚岭突围得到启示

1935 年初，挺进师奉命挺进浙江，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苏维埃根据地，牵制和打击敌人，从战略上配合中央主力红军的行动。斋郎战斗胜利后，挺进师进入浙西南，开始创建游击根据地。5 月 23 日，挺进师进抵遂昌之姚岭，一边打土豪，开仓济贫，宣传发动群众，一边休整部队，准备下一步行动。此时，尾随追剿而来的敌人迅速增加，除当地的保安团队和地主武装外，还有浙保 4 个团和 11 个保安大队及南京税警团，合计约 9 个团的兵力。敌人企图以优势兵力，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将挺进师围歼于立足未稳之时。24 日，遂昌县长兼县保卫总团长蒋孝安曾向省政府主席兼省保安司令黄绍竑报告：“残匪 400 余，敬晚在县属姚岭，已经包围”“歼灭度在不远”。

在强敌的包围进攻下，挺进师分析了当时的实际情况：敌人已包围我军，敌强我弱，敌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但主力齐集猛进，后方就相对薄弱，我军应避免与敌正面交锋以保存力量，于是决定抓住敌人后方相对空虚之弱点，跳出敌人包围圈，直插敌后，威胁和袭击敌人后方，调动和打击敌人，以敌进我也进的方法粉碎敌人的进攻。

24 日夜，挺进师兵分二路，由当地交通向导带路，神不知鬼不觉地跳出敌人包围圈，直插敌后，并设计诱使包围挺进师之敌互相展开了一场火拼。当敌人清醒过来，结束火拼以后，却又很快接到了汤溪县城临危的频频告急。敌人的包围进攻被粉碎了。这给了挺进师深刻启示。

二、创立“敌进我进”作战方针

同年 9 月，挺进师建立了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国民党当局调集了以第十八军为主力，32 个整团约 7 万人的兵力，连同地主武装号称 40 个团，对挺进师及其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对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形成包围；自北至南构筑一条纵碉堡线，将整个包围圈剖为东西两半，然后命令各部逐步向游击根据地中心地区和挺进师主力位置推进。

挺进师逐渐查明敌人的“围剿”部署后，回顾了中央主力红军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斗争的经验，分析了浙江斗争的实际情况，从姚岭突围中得到了启示，决定留下第二、五纵队

就地坚持斗争，其余主力迅速跳出敌人包围圈。9月下旬，挺进师突破敌人的云（和）龙（泉）封锁线，跳出敌人包围圈，挺进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狡猾的敌人得知挺进师主力已跳出包围圈后，深知以数万大军追剿分散活动的游击队，无异于拳头打跳蚤。因此不为我所调动，除派出5个团的兵力追堵挺进师主力外，仍集中兵力摧残浙西南游击根据地。

面对敌人不受调动，挺进师迅速觉察到，敌人咬定了我之根据地。挺进师随即决定，你要我的根据地，我就要你的后方。“立即着手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除令北渡瓯江的第一纵队加紧向浙东地区（即括苍山南北地区）发展外，重点放在开辟浙南地区游击根据地”。至此，挺进师正式创立了“敌进我进”的军事方针。

实践证明：挺进师在兵力1:40的劣势下与敌相抗，进行了长达8个月的反“围剿”斗争，虽然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暂时丧失了，但挺进师“在浙南地区开辟了大块的游击根据地，游击战则在浙西南、浙闽边、浙东、浙南更广泛的区域展开了”，极大地牵制和打击了敌人。

西安事变后，国民党推行“南剿北抚”反动政策，加紧“围剿”南方游击区，再次调集40余团正规军，对挺进师及其游击区进行第二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此次国民党军采取大拉网式的由北而南、由西而东、由外围到中心的逼进包围方针，企图先将我军向东南压迫，然后在浙南包围聚歼。并专门组织了一个“浙闽边清剿指挥部”，以期切断挺进师向福建方向机动的道路，将我军逼迫到沿海地带的一隅加以歼灭。

此时，挺进师总结了前次反“围剿”斗争的经验，分析了敌人“围剿”的方针和部署，确立了把隐蔽精干、保存力量与灵活机动、积极作战统一起来的指导思想，采取“敌进我进”军事方针，抓住敌人“大拉网”战术之弱点，发挥我军一个个都已锻炼成为游击好手的优势，分散和缩小作战单位，与敌人相向对进，易地而战，抚其背、击其侧、截其尾。敌人梳过来，我军钻过去，敌人梳过去，我军钻过来，你要我的山头，我要你的后方，与敌人开展捉迷藏似的灵活机动的游击战。

在此次反“围剿”斗争中，挺进师获得了更大的成功。不仅几块游击根据地均坚持了下来，而且保存了较多的干部；不仅浙南这个战略支点屹立着，而且恢复了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开辟了遂（昌）宣（平）汤（溪）游击根据地，最终迎来了抗日高潮，实现了挺进师北上抗日的夙愿。

三、“敌进我进”军事方针的作用和意义

如上所述，在浙南三年游击战争中，挺进师的“敌进我进”军事方针发挥了一次比一次更强的威力。如果挺进师不是根据浙江的斗争实际，创立和运用这一新的军事方针，要坚持和赢得三年游击战争，是难以想象的。对此，粟裕将军说：“回顾中央苏区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第一、二、三次反‘围剿’和在周恩来、朱德同志领导下的第四次反‘围剿’，都是以运动战歼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特别是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一路敌人被歼灭了，一次‘围剿’也就基本上被粉碎了。就是在井冈山时期，自朱、毛两军会合形成红军主力后，也是游击战与

运动战相结合。而现在我们只是一支游击队，我们一次最多只能消灭敌人一个营，它还是保安团。我们必须以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来粉碎敌人的‘围剿’。游击战很难谈得上防御，也不能大量歼灭敌人，只能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实行敌进我进的方针。”粟裕将军的这段话，充分说明了“敌进我进”方针在挺进师开展和坚持三年游击战争中的重要作用。

挺进师“敌进我进”方针的创立和运用，是建立在对游击战略战术和浙江斗争实际有着深刻认识的基础上的。“敌进我进”与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总结游击战十六字诀中的“敌进我退”相比较，前者不仅师承了后者，而且是对后者的创新和发展。“敌进我退”是以自己的后方为依托，充分利用后方根据地的人力、物力、地理等各种有利因素，在运动中寻找和创造战机，或诱敌深入，歼敌一部，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粉碎敌人的进攻，保存和发展自己。“敌进我进”是在自己无后方依托的情况下，转而进入敌人后方，利用敌人后方的各种有利因素，牵制和打击敌人，粉碎敌人的进攻，保存和发展自己。“敌进我退”是在自己的后方做文章，“敌进我进”是在敌人的后方做文章。粟裕将军说，不仅要“敌进我退”，而且还要“敌进我进”，“大踏步后退，实际上也是大踏步前进，是进到另一个方向去歼灭敌人”。可见，粟裕等挺进师领导人深刻领会了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深刻认识了进与退的辩证关系。

（选自《纪念浙西南、浙南游击根据地创建60周年研讨会论文集》，作者单位：中共遂昌县委党史研究室）

红军挺进师在浙西南的统战工作初探

杨　薇

1935年三四月间，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在师长粟裕、政委刘英的率领下，由闽北进入浙西南，揭开了浙西南三年游击战争的序幕。

此后，在短短的6个多月时间里，红军挺进师从原来的500余人发展到近千人，扩编为5个纵队和2个独立支队，地方武装也有千余人。王村口、玉岩、住溪等地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和分田委员会，并且迅速地在遂昌、龙泉、松阳、江山、浦城五县之间形成了浙江第一块游击根据地——浙西南游击根据地。

本文就挺进师在浙西南三年游击战争中所做的统战工作作一些探讨。

一、充分发挥政策威力，彻底瓦解“大刀会”

挺进师在浙西南的革命斗争，引起国民党地方当局极大震惊，他们大肆进行反动宣传，说什么“红军都是红头发，红眼睛，见人就杀”，“共产党的政策就是共产共妻，一切都要共掉！”想趁红军还未站稳脚跟之际将其消灭。因此，红军刚进入浙西南境内的庆元、龙泉等地时，老百姓看见红军就躲，红军很难开展活动。特别是国民党利用当地农民的迷信心理诱使农民加入“大刀会”组织，以此来操纵这些人的命运，为他们所用。红军入浙后，“大刀会”会徒就成了他们对付红军的一种工具。

浙西南和闽北交界的区域，大都有“大刀会”组织，分总坛、分坛两级，总坛最高称法师。国民党乡、保长和土豪劣绅为笼络人心，扩张势力，串通一气，招募村中游手好闲、会点拳击的流氓地痞做头领，以学武艺为名，诱骗农民，说什么“大刀会徒，学会法术，刀枪不怕，可以保身。入大刀会，外不受欺，内可保家”，“会徒一经入会，必须恪守会规：患难相扶，忠心不昧；生不退坛，死为会鬼……”尔后歃血为盟。从此，会徒们的身上就好像附着鬼神的魔影，一言一行都受到“大刀会”首领的牵制。

1935年4月下旬，当红军挺进师二支队100多人到达庆元、景宁交界的地方时，一阵阵牛角号声传来，上百个衣衫褴褛的大刀会徒，头裹黄巾，手执长刀、宝剑，哇哇地吼叫着冲向红军。眼看一场战斗不可避免，支队政委洪家云果断地命令部队撤退。由于洪家云此前在龙浦江遂地区活动过，对这一带的情况有所了解，他知道大刀会会徒大多都是贫苦百姓，因此决不能伤害这些人。可大刀会会徒却认为红军怕他们，不论白天晚上都来骚扰红军。红军首长经过研

究，决定从瓦解“大刀会”着手，打开做群众工作的局面。

挺进师二支队又迂回到庆元和景宁交界的东坑地带，这里的大刀会势力强盛，一看见红军来了，马上冲击，红军忙用大刀会最怕的毛竹叉抵挡，几个回合后，各自爬上一个山头对峙着。支队首长意识到，这正是用事实醒悟群众的良机，马上组织几个口齿伶俐的战士，把手握成喇叭形，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红军的性质，并摆出种种事实来说明刀枪不入是纯属骗人的鬼话。并当场打死大刀会头领，以事实教育大刀会徒。

从这以后，红军昼夜行动，大刀会再也没有来骚扰过。有些会徒还被红军的所作所为感动，并经红军的反复宣传开导，思想逐渐进步，主动要求参加红军。

挺进师初进浙西南，充分发挥我党政策的威力，政治军事攻势双管齐下，彻底瓦解了“大刀会”这股力量，这一重要的统战手段，不但打开了做群众思想工作的局面，还为创建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二、团结改造当地“青帮”

挺进师师长粟裕率部进入浙西南后，就选择了龙（泉）浦（城）江（山）遂（昌）和龙（泉）云（和）松（阳）遂（昌）东西两片地区作为建立第一块游击根据地的基本区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那里有一个号称 5000 会众的“青帮”组织。

1935 年 5 月 7 日，挺进师主力从龙泉安仁镇附近北渡龙泉河，10 日抵达松阳之小吉、安岱后、枫坪等地，受到当地青帮的热烈欢迎。活动于松、遂、龙三县边境的青帮，是于 1929 年 12 月发起成立的，主要领导人是松阳县安岱后村的陈凤生、陈丹山和斗潭村的卢子敬。陈凤生早年在外地经商时加入青帮，受到过 1928 年崇安、浦城暴动的影响，向往革命。1930 年，他回乡后，领导过攻打国民党枫坪警察所的武装斗争。卢子敬早年留学日本，受孙中山先生思想的影响，向往革命，归国回乡办学校，积极学习与传播革命知识。他们实际上是当地很有威望的群众领袖。他们主张“耕者有其田，住者有其屋”“打土豪、分田地”“劫富济贫”。挺进师到达松遂龙一带后，他们认为红军的土地革命纲领和一系列政策与青帮的政治主张有共同之处，遂产生欲接近红军的愿望。而红军初到白区，需要有一个联系群众的桥梁，以便深入发动群众，于是，粟、刘等对青帮采取了联合、改造的政策。5 月中旬，师领导便分别邀见了陈凤生、卢子敬等人，并从经济上援助困难户，使他们深受感动，表示“青红一句话，永世不分家”。尔后，他们向粟裕等汇报当地情况，并迫切要求参加红军，粟裕等表示欢迎。随后，挺进师发布了《告青帮弟兄书》，明确提出：“欢迎青帮弟兄和红军联合起来”“欢迎青帮弟兄起来打土豪分田地”等，消除了青帮广大会众对红军的疑惧心理，青帮上下很快取得共识。因此，陈、卢和青帮的一批骨干成为挺进师进入浙西南后的第一批地方干部和中共党员。挺进师有了这一具有可靠群众基础的初步依托，就在这块土地上轰轰烈烈地开展起革命活动。

挺进师团结、改造依靠当地的青帮组织这一举动，还促进了松遂龙地区其他阶层的一些

人士纷纷参加游击队，松（阳）遂（昌）龙（泉）游击大队应运而生，陈凤生任大队长，后又扩大为总队。挺进师领导及时从游击队员中精选大量政治素质好、作战勇猛的青年充实到红军队伍里，浙西南革命斗争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国民党当局惊呼："浙西南十余县土地遂笼罩于赤焰绛雾之中。"红军挺进师第五纵队就是以当地青帮人员为基础组建的，这个纵队在保卫根据地的斗争中浴血奋战，付出了巨大牺牲。原青帮首领陈凤生、卢子敬、陈丹山等都在保卫根据地的斗争中先后壮烈牺牲。

三、建立"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

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建立起来后，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对付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挺进师领导适时改变斗争策略，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建立了"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一是争取原来的保甲长为我们做事；二是把我们的秘密党员、积极分子派到敌人内部担任保甲长；三是对少数作恶多端、为虎作伥、民愤极大的保甲长给以惩办，促使大批保甲长保持中立。由于实行了这些政策，促使他们对国民党当局采取敷衍搪塞态度，为红军的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都作出了贡献。

国民党松阳县永南乡乡长王文龙，在 1935 年 5 月红军进入松阳之后，即向往革命，并秘密参加了中共组织。他利用乡长的合法身份，表面上为国民党办事，实际上却积极发动组织群众，从事革命活动，亲自为红军传递消息，购买运送电池、回力鞋等日常生活用品，还多次在白云庵组织召开党的秘密会议，为红军在松阳的活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不幸的是在国民党第一次"围剿""清乡"时被捕，壮烈牺牲。

1936 年"两广事变"以后，恢复浙西南特委。浙西南特委书记许信焜对根据地工作作了调整。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宣恩金、张麒麟、曾友昔、曹景垣等特委委员在浦城毛洋为中心的隘上桥、浦城坑、流坑、张处及龙泉的杨梅源头、刘坑、西坑、碧龙等大小山村中恢复建立 18 个党支部，成立了共青团和妇女会等群众组织，还争取了碧龙的张发金、西坑的范国珍、坑尾的廖如庆、宅门的陈吉昌等一批保长，通过他们建立起了"白皮红心"两面政权，使根据地工作迅速扩至江山及浦城海溪一带。特委乃于 9 月决定成立江浦县委，江浦县委还建立了东家山"白皮红心"政权。从龙泉碧龙、浦城毛洋、江山周村至遂昌湖岱口间的方圆百余里游击根据地全面恢复。

四、团结畲族人民

挺进师入浙后，主要活动于庆元、龙泉、遂昌、景宁、松阳等县，许多畲族山村成为游击据点。1935 年 6 月，挺进师到达遂昌县石练乡，书写标语，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发动畲民参加红军，在畲乡发展党员。7 月，浙西南特委书记黄富武到松阳县石仓乡这个畲民聚居的村庄，开展革命活动，建立了石仓游击队。许多畲族地下党员积极为红军站岗放

哨，传递情报，伏击敌人。甚至有些畲族女党员替红军治病养伤，如景宁县郑坑乡毛寨村的钟金钗，就多次采集草药医治红军伤病员。庆元县三济乡东司湾村周朝顺有一身好武艺，由于对国民党统治不满，1936 年至 1937 年间，他和一些进步青年与在这一带坚持游击战争的闽北独立师第三纵队经常来往，为红军做衣服，买油印机、电池等物资；同时，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懂得了穷苦人民要翻身就要组织起来闹革命的道理。在红三纵队离开庆元后，庆北组织起了一支 20 多人的游击队，活动于庆元、松溪和浦城等县边境。

挺进师把革命烈火燃遍了畲族乡村，在各地建立了有畲族代表参加的红色政权，许多畲民还担任了区乡政府的领导职务。为了保卫红色政权，畲民们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曲革命的赞歌。正如当年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领导人之一叶飞同志所指出的：“在最艰苦最困难的斗争中，少数民族的作用是很大的。他们具有两个特点：第一，最保守秘密；第二，最团结。不管敌人怎样摧残，他们都忠实于党。”

红军挺进师自 1935 年 4 月初进入浙西南地区，前后在此活动了三年多，浙西南游击根据地从建立到破坏，从破坏到恢复，使一批又一批人在战争中得到锻炼，从而很好地完成了中央赋予他们的使命，这其中不能不说统战工作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各个历史时期，在所处的具体环境下，采取何种对我们有利的统战方法，这永远是值得我们去探讨和研究的问题。

（选自《纪念浙西南、浙南游击根据地创建 60 周年研讨会论文集》，作者单位：中共遂昌县委党史研究室）

浅谈挺进师在浙江的统战工作

郑子雄

一、坚决执行党的统战政策

以粟裕为师长、刘英为政委的红军挺进师于1935年春进入浙江。是年冬，成立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刘英为书记。当时全国革命形势处在低潮，游击战争的环境相当艰苦，红军挺进师把统一战线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做。

挺进师初进浙江，群众由于受国民党的恶意宣传影响，对红军不了解，有些害怕，不敢接近。红军游击队要生存、要发展、要抗日，就必须依靠群众。当时的环境条件，群众工作既无书、又无报，全靠一张嘴作宣传。宣传群众工作是非常艰苦的，在山区，人烟稀少，一家一户较分散，不便开群众会，只能个别或三两个人在一起谈谈。但红军挺进师指战员和地方工作人员都积极主动做群众工作，他们走到哪里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就做到哪里。他们向群众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号召群众团结起来抗日救国。

统一战线的根本问题，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中的自身团结统一和同盟军的问题。为了对敌斗争，首先要团结壮大自己的力量。在刘英政委、粟裕师长的正确领导下，挺进师到浙江时，团结了浙南地下党组织，巩固并开辟了游击根据地，得到当地党组织和革命群众的热情支持和拥护。在敌人的心腹地区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牵制了敌人的大量兵力，如蒋介石指派罗卓英、刘建绪任闽浙赣皖四省“剿共”总指挥时，敌军曾达40多个团、10万兵力。红军挺进师真正做到了党中央要求的：在浙南建立中国革命在南方的一个战略支撑点。

二、抓住主要矛盾，改变斗争策略

党的统一战线在各个不同的革命阶段，其具体目的、任务、对象、组织形成等情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在浙南三年游击战争中，有段时间和党中央失去联系，未能及时得到上级指示，挺进师的领导根据国民党报刊上的点滴信息得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越来越大，民族矛盾将上升为主要矛盾。大敌当前，国难临头，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抗日救国。

1936年，根据刘英书记的提议，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决定，放弃一些土地革命时期的政策、口号和做法，如在政治上将“没收委员会”改为征收抗日捐的“征发委员会”；将“肃反队”改为“肃奸队”；将“赤卫队”改为“抗日义勇队”；对国民党乡、镇、保长由“镇压”改为“争取”；对白

军由“欢迎白军士兵杀死官长拖枪当红军”，改为“欢迎白军官兵枪口对外，同红军一起共同抗日……”

红军挺进师严格执行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政策。具体体现在对罪大恶极的反共顽固分子狠狠打击，以平民愤，鼓励民众树立对敌斗争胜利信心；对一些持中立态度的乡、镇、保长（包括区、县政要人员），设法接近，教育争取，要他们不把红军的消息告诉国民党，不要做损害共产党和群众的事，这样做收效很大；在红军挺进师经常活动的地区，通过地下党组织，选派具备条件的共产党员参加竞选担任乡（镇）保长职务等。这项工作后来在浙南全面推广了，许多乡（镇）保长是由共产党员担任的，这就是我们讲的“两面政权”组织形式。它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我党统战工作的一个创举。

西安事变的发生，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建议。但是，蒋介石为了消灭我南方红军游击队，加紧了对我南方游击区的“围剿”，搞什么“北和南剿”的反动政策。1936 年 12 月 15 日，“剿匪”总指挥刘建绪由杭州赴江山，随即召集主力部队 4 个师 2 个独立旅及地方保安团队共 43 个团兵力，对我红军挺进师大举进攻。浙南各县国民党重兵压境，连许多山村也驻有国民党正规军队，他们强令壮丁清乡搜山、站岗放哨，搞什么移民并村、计口受盐等等。这次进攻持续到 1937 年 8 月谈判达成协议时止，8 个月的大“围剿”，其主要进攻目标在浙南游击区。在那最艰难的 8 个月中，红军挺进师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向全社会大力宣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重要性，揭露蒋介石“北和南剿”的反动阴谋，动员各界爱国同胞团结起来，推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

三、高层统战，威力无限

1937 年冬，上海、太原相继失陷之后，日军大举向南京、杭州进攻。蒋介石任命桂系的黄绍竑为第三战区副司令兼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同共产党有过接触，当他奉调浙江之前，周恩来曾多次找他谈话，希望他到浙江前线后，在军事上要加强保卫东南、政治上要加强统一战线。他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浙江是蒋介石老家，全省党军警特系统的实权都掌握在 CC 系方青儒、许绍棣和军统宣铁吾等人手里。黄绍竑初到浙江当省政府主席，没有什么实力和军权，只是个光杆司令。这样的政治现实，也促使他非去发动群众、刷新政治、掌握实权不可，否则就无法在浙江站住脚跟。黄绍竑从广西带来的骨干中，有些比较进步，以后他又录用了一些浙江进步人士。所以，黄到浙江主持政局的头几年，政治上比较开明，抗日也比较坚决、积极，推动了抗日救亡工作。

1938 年 3 月，刘英去南昌向东南分局汇报工作，途经金华时，专门会晤了黄绍竑，对方同意在温州、丽水、平阳设立新四军通讯处、办事处等机构，刘英还把吴毓介绍给黄绍竑，作为我党与国民党之间的联络员。当粟裕率挺进师赴皖南，经过大港头时，专程去碧湖

会晤黄绍竑。随后，黄绍竑前往大港头检阅和慰劳部队，并发表了团结抗日、预祝成功的讲话。

挺进师在浙江的统战工作，使抗战初期的浙江呈现出国共合作的新局面。

（选自《纪念浙西南、浙南游击根据地创建60周年研讨会论文集》，作者单位：浙江省新四军研究会浙南分会）

评红军挺进师与“青帮”的大联合

刘关洲

挺进师在浙西南的革命斗争是与“青帮”组织的支持分不开的。1935 年 5 月，挺进师一到松阳，“青帮”就在枫坪乡斗潭村召开欢迎红军大会，松（阳）遂（昌）龙（泉）三县边境“青帮”组织首领之一卢子敬在欢迎词中旗帜鲜明地提出：“青红一句话，永世不分家。”表示“青帮”会众真心实意拥护红军，跟着红军闹革命；同时，也把这句话作为规范“青帮”上下几千会众的行为准则。不久，挺进师也发出《告“青帮”弟兄书》，提出“欢迎‘青帮’弟兄和红军联合起来”的口号。浙西南历史上一次有着重大意义的青（帮）红（军）大联合正式形成了。

从此，“青帮”在挺进师的领导下，舍生忘死，前赴后继，成为建设和保卫根据地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一）

当挺进师几经周折终于进入浙江腹地开辟根据地时，偏又遇上国民党浙、闽保安团的前堵后追和地主武装大刀会的不断骚扰。500 多名指战员，3 个多月来在无根据地可依托的恶劣环境中流动作战，此时多么需要有一个可靠的依托，一块生存发展的落脚之地。经过反复比较，挺进师终于在松、遂、龙边“青帮”组织频繁活动的地区找到了理想之地。

1935 年 5 月 7 日，粟裕、刘英首长率主力部队摆脱了敌人的追截骚扰，出奇不意转向北渡龙泉河，神不知鬼不觉地直抵松阳之箬寮山麓。10 日到达安岱后，次日又到枫坪斗潭，与“青帮”首领陈凤生、卢子敬等人初次相遇。红军对于这支影响波及浙西南的“青帮”队伍的所作所为早有所闻，而“青帮”对于红军部队也不陌生，1934 年下半年就与红军洪家云部有了联系。这次挺进师北上与“青帮”会师，是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创建过程中关键性的行动。

这里的“青帮”，不过是借封建色彩的帮会之名、行农民运动武装斗争之实的贫苦农民自己的队伍。这样的组织，遍布于松阳、遂昌、龙泉一带，人众势广，全盛期会众有 5000 多人。他们是在几位颇有威望和才干、具有一定民主革命思想觉悟的首领卢子敬、陈凤生、陈丹山等领头下，于 1929 年 12 月发起组织的。七八年来，他们利用帮会组织，奋起同反动地主武装乃至统治者当局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1930 年 3 月又以“青帮”为基础组成农军举行农民暴动。反动当局惊恐不安，视若“洪水猛兽”，加以扑灭，但大部分农军战士和领导骨干仍保存下来，并继续以“青帮”组织为掩护坚持斗争。这个组织虽然长期处于分散状态，而且缺乏强有力的政

治领导和组织领导，但他们毕竟不同于浙闽边庆元、景宁、泰顺、政和一带的大刀会，也非一群啸聚山林的绿林好汉。他们非但不敌视红军，而且主动找红军，真心实意欢迎、拥护、帮助红军。红军挺进师对该组织有正确评价："你们（指"青帮"）是民众的先进者、觉悟者，是反对国民党、反对苛捐杂税、反对豪绅地主的领导者。"

（二）

"青红不分家"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红军得"青帮"之助无异于雪中得炭，而"青帮"有红军领导犹如久旱逢甘霖。一个赖以为依托，一个倚之为靠山，军民团结，势不可当。以青红大联合为开端，根据地的开辟、建设呈现出一番新景象。

扩充红军工作。仅松阳一地就向红军输送兵员和游击队员 800 多人（其中大部分为"青帮"成员），安岱后一个村光参加红军的就有 38 人，参加各种革命组织的有 200 多人，占当时全村人口 90%以上，挺进师"缴枪、扩红"工作畅通无阻。新成立的独立第十五支队以松阳籍队员最多，以至有"松阳支队"之称。7 月间将十五支队扩编为第五纵队，又从松阳地方游击队中挑选了一批精干队员加入。在短短的 2 个月中，红军兵员猛增一倍，战斗力大大加强。浙西南地方工作团，不少成员是原"青帮"骨干，红军通过他们去做发动群众的工作，团结了更多的民众参加革命。

建立革命组织工作。自从迎来了红军，广大"青帮"弟兄欢呼雀跃，斗志昂扬，松阳全县建立了 20 个区、乡、村党组织，62 个区、乡、村苏维埃政权，65 个区、乡、村游击队及松（阳）遂（昌）龙（泉）游击总队，9 个共青团组织和 82 个分田委员会。这些组织都有"青帮"成员加入，一些原"青帮"骨干此时还分别担任各组织的领导职务。如首领陈凤生、卢子敬、陈丹山、叶义、潘昌利等在游击总队、浙西南军分区、各区委、区苏维埃政府中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在后来的敌人大举"进剿"和团团包围中，他们同红军一起，为保卫根据地，为保卫苏维埃政权，英勇作战，义无反顾。许多人被捕就义，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虽然他们的党龄、军龄、队龄、团龄及任职时间都不长，只能按月计算，但他们所表现的革命坚定性和彻底革命精神却至今感动着人们。

曾在松遂龙一带广为流传的这句"青红不分家"，确实有着非凡的号召力、凝聚力。丰富的内涵在浙西南根据地如火如荼的斗争实践中化为具体行动。

（三）

邓小平同志在《根据地建设与群众运动》一文中讲到：必须懂得，只有武装，没有党、政权和群众力量，武装斗争便不能支持而会走向失败，历史上有些区域由于单纯军事观点而失败的例子，证明了这点。挺进师奉命组成并孤军深入白区开辟游击根据地的战略行动，始终处于困难重重、四面受敌的白色恐怖包围中，但由于挺进师领导注重加强根据地党的建设和政权

工作，重视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和正确的工作方针，取得了比预想中要好得多的结果。不但有效地保存发展了自己，打击和牵制了敌人，而且迅速开拓了革命新局面。具体体现在把当地贫苦农民、破产手工业者大众普遍参加的这个“青帮”组织团结联合起来汇入了开辟、建设根据地的斗争洪流中去，实现了“‘青帮’红军大联合”。浙西南地区因为来了挺进师，又有了“青帮”这股革命力量的加入，又有了更多的群众参加，于是就掀起了革命斗争的洪波巨浪，使得反动当局惊恐万状。

不管后来的保卫根据地、保卫苏区之战有多么激烈、悲壮，也不管血染山川的代价是如此巨大，我们今天所要追述的是，在这块根据地的创建史中，我们又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佐证：根据地的建设离不开群众，根据地建设只有同群众运动相结合，得到群众广泛的强有力的支持，才会顺利、才能形成。同样，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不能脱离群众。没有群众的支持，办任何事都不会成功。在革命低潮中，浙西南游击根据地能够建立起来，并在短短的几个月中产生巨大变化，使整个浙西南“赤焰绛雾”，这不能不说与红军正确执行了党的群众路线有密切关系。

松（阳）遂（昌）龙（泉）三县边境的“青帮”组织是革命的同盟军，是红军挺进师最忠实的支持者，是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群众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根据地各项建设的积极参与者。

（选自《纪念浙西南、浙南游击根据地创建60周年研讨会论文集》，作者单位：中共松阳县委党史研究室）

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苏维埃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

徐承宾

（一）

以仙霞岭为中心的浙西南，处于闽、浙、赣三省交界之地。这里山峦叠嶂，森林茂密，交通闭塞，远离城市，反动统治鞭长莫及。这一带地域宽阔，土地贫瘠，山多田少，生产落后，山民仅依靠耕作少数田地和上山刀耕火种播玉米糊口，在地主阶级的高额地租、山租的盘剥下，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困苦生活，因此山区人民蕴藏着强烈的革命愿望，期盼着革命的引路人。

1935 年挺进师进入浙西南，开辟以龙泉、遂昌、松阳为中心区域的游击根据地，得到了当地原“青帮”组织及广大群众的热情欢迎。他们把历次斗争的宿愿和对土地久远的期盼，寄托在这支有党的领导、训练有素的红军挺进师身上。

（二）

1935 年 3 月，挺进师入浙后，在龙、庆、景、泰等地辗转游击。斋郎战斗后，挺进师甩掉了尾随的敌人，进入预定的浙西南中心地区，拔除了地方反动武装，击败了“浙保”进剿。一个以龙泉住溪、遂昌王村口、松阳玉岩为支点的纵横百余公里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初步形成。

在红军开辟游击根据地过程中，浙西南山区群众挣脱了反动统治和封建势力的束缚，积极投入打土豪、开仓分粮的行动中，在经济上，他们得到了斗争果实，分享了胜利的喜悦。随着革命的发展、深入，他们开始意识到要有自己的政权机构，才能巩固、保卫既得的利益。因此，建立苏维埃政权和进行土地革命，很自然成了群众的迫切要求。

面对群众的强烈要求，挺进师领导把进行苏维埃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作为工作重点，以充分发动群众，壮大革命力量。

6 月中旬，挺进师各纵队先后集中在松阳小吉一带，师政委会成员在小吉举行了会议。会议总结了一个月来的行动，部署了今后的任务，调配了干部；着重研究分析了当前所处的环境和敌人的企图，一致认为根据地必须开展苏维埃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以满足群众的土地要

求，进一步发动群众，壮大力量保卫根据地。为此，会上作出的几项决定中，最主要的是部署一、三、四纵队广泛出击，开展纪念“八一”武装示威，打击反动势力，以掩护根据地中心区域，进行红色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二纵队的六支队和直属十五支队（后编为五纵队）则留在根据地，保卫龙、遂、松地区分田地斗争的开展。

（三）

小吉会议后，龙泉、遂昌、松阳等县的游击根据地，在党的领导和红军的武装保卫下，苏维埃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工作迅速展开。

7 月初，挺进师地方工作团成员杨林等同志来到高坛，召开筹备会议，成立了竹溪区苏维埃政府，潘昌利任主席，下辖黄南“乡苏”（乡苏维埃政府）、五部“乡苏”。7 月 22 日，松阳玉岩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区委书记陈凤生兼任主席，下辖高亭、小吉、斗潭、枫坪、安岱后等 5 个“乡苏”，还成立了 26 个“村苏”（村苏维埃政府）或分田委员会。8 月初，遂昌王村口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区委书记洪家云兼任主席，下辖王村口、山枣坪、后塘、山前、对山、关塘、独口、凉岭下、葛程等 9 个“乡苏”，52 个“村苏”。8 月 20 日，龙泉住溪村召开了有龙浦边乡村农民代表 200 多人参加的大会，宣告住溪苏维埃政府成立，龙浦县委书记方志富兼任主席，下辖上田、大横坑、宝溪、竹洋、独源等 5 个“乡苏”，35 个“村苏”或分田委员会。各地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同时，还建立了农民游击队，以保卫政权组织开展工作。

综观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体现了党的领导。在建立的苏维埃政府中，一般都由党委书记或委员担任主席，保证了党的领导地位。第二，具有广泛性。苏维埃政府有各方的代表人物，普遍设有妇女委员。第三，组织设置齐备。政府中不但设有主席、副主席，还设有财政、军事、分田、没收、妇女等委员。以上这些特点，不但在县、乡级苏维埃政府中具备，在“村苏”中也同样具备，因此，保证各级苏维埃政府工作能够顺利开展。

苏维埃政权建立后，接着就开始分田地工作。挺进师这支队伍原系赣东北红十军，他们在赣东北经历过土地革命，有分田地的经验，因此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分田地工作是参照赣东北土地革命经验来进行的。

分田地的工作程序，首先是进行人口、田地情况调查，并登记造册（龙泉革命陈列馆尚有保存），然后进行分配。分田地的政策和方法是：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贫农；地主、富农分差田，红军家属分好田；贫农以原耕地为基础，依照抽肥补瘦、抽多补少的原则，由分田委员会集体评议调整。分配方案拟定之后，把写有户主姓名的竹签，插在田块里，以示确认。这种办法的特点是民主且简便易行，因此很快在根据地普遍推广实行。由于八九月份稻田还在青苗期，俗称“分青苗”。把分田地工作连成一句话，就是“查田、插标、分青苗”。

（四）

红色政权的建立，土地革命的开展，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极大的恐惧和仇恨。《东南日报》惊呼："浙江素称平安之区，自粟、刘窜浙，赤化已波及全浙……前途实堪可虑。"蒋介石慌忙调集罗卓英等部40多个团的兵力，对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实行疯狂"围剿"。挺进师根据敌众我寡的不利形势，决定主力跳出包围圈，留下第二、五纵队坚持根据地的斗争。

9月下旬，正当根据地内分田地工作如火如荼开展的时候，国民党反动军队磨刀霍霍，向龙、遂、松根据地扑来。面对敌我力量悬殊的形势，留守的第二纵队六支队和第五纵队战士，在浙西南特委的统一部署下，分头发动群众，扩充农民游击队，准备迎战敌人。

根据地军民在遂昌王村口馒头岭防线、龙泉住溪猪母岭防线、松阳玉岩防线与敌进行了浴血奋战，阻击了敌人进攻，但由于敌众我寡，红军先后撤离驻地，根据地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浙西南游击根据地苏维埃政权虽然短暂地存在了三个月，农民分到的田地还没有得到收获，但是红色政权和土地革命业绩已经深入人心。革命虽然受到挫折，但烈士的鲜血不会白流，它的光辉实践和革命精神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激励着后人奋发前进。

（选自《纪念浙西南、浙南游击根据地创建60周年研讨会论文集》，作者单位：中共龙泉市委党史研究室）

浅谈红军挺进师的革命文化活动及其历史作用

邱锡龄

粟裕、刘英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在坚持浙南三年游击战争中，十分重视运用革命文化教育人民、团结人民和瓦解敌人，有力地配合了武装斗争的开展。本文就这方面的情况及其历史作用，作粗浅的探讨。

一、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革命文化活动

开展革命文化活动，是红军挺进师在进行游击战争中所必不可缺的政治工作的组成部分。归纳起来革命文化活动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口头宣传。红军挺进师进入浙西南的初期，群众因受国民党反动宣传的影响和地主豪绅的造谣欺骗，听说红军来了，就逃的逃，躲的躲，很少有人敢和红军接近。红军有时竟连向导也找不到，筹措粮食就更困难。为此，挺进师成立了地方工作团，并规定每个干部和战士都要学会能打仗又能做群众工作的两套本领。无文化的干部战士每人每天要找 10 个群众谈心交朋友，并利用民间尊重同姓氏的习惯心理进行工作。各纵队遵照这一规定，每到一地首先就是开展宣传工作。他们通过群众大会、公审大会、座谈会和利用群众带路、向贫苦群众分发粮食物资等机会，大力宣传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和组织纪律。有时，师领导人也亲自登台讲演，号召群众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同时，强调执行部队纪律，处处以自己的模范行为扩大红军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

二是书写墙头标语。当年师政治部规定有文化的干部、战士每人每天要书写几条墙头标语，宣传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如“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红军是为工农谋利益求解放的部队”“打倒土豪劣绅”“工农要有衣穿，有饭吃，只有实行土地革命”“工农兄弟团结起来抗租、抗粮、抗捐、抗税”“收复被日本帝国主义掠夺去的土地”“红军是抗日反帝的唯一武装力量”“白军兄弟是工农出身，不要替国民党来屠杀红军”“欢迎白军士兵暴动过来当红军”等等。

三是张贴和散发布告、传单。红军挺进师政治部在刚入闽浙边境时印制了五万份标语、传单，其中有《告民众书》《红军挺进师政治部布告》等，宣传红军是为工农大众谋利益、谋解放，是工农自己的军队，坚决消灭压迫、剥削群众的国民党和地主豪绅；有镇压某些恶霸地主后揭露其罪恶的布告；有警告敌人不要继续与人民为敌，只要能与红军合作，红军是欢迎的，如《红

军挺进师告保长书》《告白军士兵书》等；另外，还有团结地方上有威望的头面人物，争取他们为创建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出力的，如《红军挺进师告“青帮”弟兄书》。

四是演唱革命歌曲。每当部队休息或进村宿营时，会唱歌的同志就教大家演唱革命歌曲，并详细讲解歌词内容。红军战士、游击队员与苏维埃政府成员以及妇女会员、儿童团员等一个个勤奋好学，经过互教互学，每人都能唱出好多革命歌曲。在浙西南各县的广大农村中至今还留传有《红军歌》《游击队歌》《红军纪律歌》《送郎参加红军歌》等。这些歌曲内容丰富，歌词通俗，听起来有一定的吸引力和鼓动性。另外，浙南和浙西南各县的山区，聚居着相当数量的畲族同胞，这些远离城镇的畲族山村，是挺进师活动的重要地区。贫苦的畲族同胞爱唱山歌，他们经过红军的教育，深深地认识到共产党和红军是自己的救命恩人。为了表达对红军的深情厚意，他们编唱了许多革命畲歌。如松阳县畲民编唱的《歌唱游击战士蓝大嫂》和平阳县牛角湾村畲民编唱的《十把白扇》《白军妄想再兴兵》等都是热情赞扬红军克敌制胜、除暴安良的畲歌。

二、文化活动的巨大历史作用

挺进师开展的各项文化活动，对创建、发展和巩固浙西南、浙南游击根据地确实起到过巨大的历史作用。

首先，起到了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的作用，它使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深深地铭刻进浙西南人民的心灵深处。那么多的标语、布告、传单是强有力的号召，是震天动地的呐喊，是感人肺腑的鼓动，也是愤怒的控诉。当年浙西南地区连年发生水、旱灾害，农业歉收，疫病流行，加上反动政府和地主豪绅的残酷压迫剥削，农民生活濒临绝境。当他们耳闻目睹了这些标语、布告时，正如严冬季节听到了第一声春雷。它给农民带来美好的希望和反抗的决心，它促使贫苦群众在红军领导下，积极地向土豪劣绅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例如遂昌县王村口地区，1935 年 5 月至 9 月，就成立了乡、村两级苏维埃政府 19 个，农民游击队 29 个，有队员 310 余人。同时发展党员，建立了党组织，开展了插标分青苗的土地改革运动。

其次，起到了打击敌人反动气焰的作用。对那些为富不仁、横行乡里的土豪劣绅来说，这些标语、布告、传单正如射向他们心脏的无声子弹和利箭，吓得他们心惊肉跳，惶惶不可终日。国民党遂昌县长蒋孝安不得不在 1935 年 7 月 21 日向各乡镇保长发出训令，要他们迅速刷毁各处的红军标语和布告。同时，革命文化活动，也起到了分化瓦解敌人的作用。挺进师的《告保长书》《告白军士兵书》和“白军士兵是工农出身，不要替国民党来屠杀红军”“欢迎白军士兵暴动过来当红军”等传单标语，都具有感情上的煽动作用，使国民党的乡保长和士兵对红军的态度逐渐地从盲目仇视转向从感情政治上的接近，从而达到厌战、怠战，甚至直接弃暗投明。1935 年 10 月挺进师二纵队从王村口冲出敌十八军十四师七十九团的封锁线，转移到遂昌，江山边境的湖岱口乡后，处境十分险恶，他们不仅要对付从遂昌、江山、衢州三路追击的敌人，

而且要克服严冬季节缺衣少食的困难。由于红军有效的宣传工作，使湖岱口乡的乡长刘铭训和他所属的各保保长都转变了立场。当敌人来到这一带“清剿”时，他们把红军隐藏在附近的山上。

第三，起到了团结地方人士的作用。1935 年 5 月，挺进师来到遂（昌）松（阳）龙（泉）三县边境，了解到这一带有“青帮”组织，参加者大多是贫苦农民和手工业工人。他们在卢子敬、陈凤生、陈丹山等领导下，1930 年成立过“农军”，曾多次在松、遂、龙边境举起义旗，拉出队伍，同反动政府和土豪劣绅进行过斗争。暴动被省防军镇压后，卢子敬、陈凤生等利用“青帮”组织为社会掩护，进行秘密活动，发展 5000 余人的“青帮”组织。挺进师领导人认为这个“青帮”是反对反动政府和土豪劣绅的一支可以团结的力量。因此发出《告“青帮”弟兄书》，明确提出“欢迎‘青帮’兄弟与红军联合起来打土豪、分田地”。《红军挺进师告“青帮”弟兄书》在“青帮”组织中传开后，很快就消除了他们对红军的疑惧思想。卢子敬还成为挺进师地方工作团成员和松、遂、龙三县边境游击总队负责人。在他率领下，“青帮”弟兄积极地为红军带路、送信、筹粮，为创建游击根据地贡献了力量。

第四，红军挺进师开展的歌咏活动，起了鼓舞士气、激励斗志的作用。他们演唱的歌曲，有的是贫苦群众向黑暗社会的悲愤控诉，有的是被压迫者要求自由解放的呼声，有的是人们从心灵深处迸发出来对党和红军的感激之情，有的是唤醒人民团结反抗的战斗号角。那首“宿民房，借门板，睡了要装上；借物要归还，损坏要赔偿；作风要正派，洗澡避女人……”的《红军纪律歌》，更是战士们的行动准则和誓言。总之，积极向上的音乐，确能感染人的思想感情，使人精神振奋，勇气倍增。1937 年 7 月，当粟裕在遂昌门阵村白砗岗山上驻扎时，环境非常恶劣，生活十分艰苦。为了鼓舞战士们的斗志，他通过小商贩陈永清从金华买来一打口琴。并亲自教唱，很快就在白砗岗山上组织起一支小型口琴演奏队。为了鼓舞战士们的士气，挺进师的鼓动队还经常编写一些通俗易懂的顺口溜。1935 年 7 月，当挺进师二纵队向遂昌王村口镇进发时，鼓动队就编过这样一首顺口溜为战士们鼓劲：“同志们，快快走，前面就是王村口，翻过馒头岭，偌大个村子就到手。南面通龙泉，北面通衢州。开辟根据地，英雄显身手。”

革命歌曲的广泛演唱，为开展军民联欢活动创造了条件。当年红军虽然处于敌人不断“清剿”的恶劣环境中，但为了加强军民团结，在驻扎休整时还是抓住时机，举行军民联欢活动。1935 年夏秋，挺进师在龙泉县的住溪、松阳县的竹溪、遂昌县的王村口等地建立党的区委和苏维埃政府后，都曾举行过军民联欢会，除了演唱革命歌曲，还演出了《催租逼债》《拉夫抽丁》等文艺节目，吸引了大量观众，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第五，调整适应局势变化的政策口号，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红军挺进师从 1935 年 3 月进入浙西南地区以后，因遭敌袭击，电台被毁，与中央分局和闽浙赣省委失去了联系。他们在蒋家王朝的腹心地区孤军作战，处境十分困难，直到 1936 年 8 月才与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并带回中共中央 1935 年 12 月 25 日发出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

议》和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1936年5月5日发出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这些重要文件，对指导挺进师的行动部署，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粟裕、刘英等立即将文件翻印，发给所属组织进行传达学习，并根据党中央的决议和通电精神，调整了对敌斗争的政策。如把工农红军挺进师改为人民红军挺进师，苏维埃政府改为革命委员会，赤卫队改为抗日义勇队，红军经费由原来的打土豪和向富户罚款改为向地主富户筹募抗日捐，对国民党的乡保长由以镇压为主改为争取为主。“穷人不打穷人”的口号改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白军士兵杀死官长，拖枪过来当红军”改为“白军士兵枪口对外，同红军一起共同抗日”等等。同时，先后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闽浙两省各界人士书》《致国民党官兵的一封信》《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致国民党闽赣皖浙边区绥靖主任公署和闽浙两省的快邮代电》《呼吁各界人士要求闽浙两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宣言》等。

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和闽浙边临时省军区，又再次发出通电和宣言，表示希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遂（昌）宣（平）汤（溪）边区活动的粟裕也向国民党遂昌县长发出《国共合作抗日倡议书》。所有这些宣言、通电、书函的发表，对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实现，起到了巨大的作用。1937年9月，刘英为书记的闽浙边临时省委与闽浙赣皖四省边区绥靖公署经多次谈判终于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议；同时，粟裕在遂昌门阵也取得了谈判的成功，并率部开赴平阳北港与刘英会合。改部队番号为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粟裕任队长，刘英任政委。至此，胜利地结束了红军挺进师坚持浙西南、浙南的三年游击战争。

（选自《纪念浙西南、浙南游击根据地创建60周年研讨会论文集》，作者单位：中共遂昌县委党史研究室）

浅谈红军挺进师在浙南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历史启迪

史济渭

红军挺进师是北上抗日先遣队在皖南失利后，遵照中央的指示组建、并奉命深入浙江坚持游击斗争的。在国民党的腹心地区，面对数倍、数十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的残酷“清剿”，挺进师游刃有余，坚持了长达 3 年的游击战争。它给了我们许多启迪。

一、正确地选定战略转移的方向，实行高度的机动作战，是关系部队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

1935 年2 月 27 日，红军挺进师从赣东北的弋阳出发，冲破敌人 7 道碉堡封锁线，到达闽北根据地崇安休整了半个月。3 月，从崇安出发，经浦城进入浙西南，活动于庆元、龙泉、云和、景宁一带，与围追堵截的国民党部队周旋于闽浙边山区。4 月底的斋郎一仗，给尾随不放的浙保一团李秀部和闽保二团马洪琛部以迎头痛击，迫使敌人由攻势转为守势。挺进师迅速挺进浙西南地区，活动范围扩大到数十个县。7 月下旬，国民党设立以宣铁吾为总指挥的“浙南剿匪指挥部”。接着又调集罗卓英所部第十八军等 8 个师的兵力，从江西到丽（水）云（和）遂(昌）松（阳）龙（泉）一带分头推进“围剿”，扬言 4 个月消灭挺进师，结果“围剿”了 9 个月，也未能得逞。挺进师广大指战员发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驰骋于浙西南连绵广阔的山区，边战斗，边宣传发动群众，在浙西南大地上播撒革命的火种。

红军挺进师为了保存自己，壮大革命力量，必须实行机动作战，力求摆脱敌人，变被动为主动，这是关系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挺进师在 3 年游击战争期间，较好地处理了战略转移问题，在把握走与打的关系上，既反对消极避战的逃跑主义，又避免同强敌进行决战，机动灵活，适时地突进到围追堵截之敌的侧后，威胁敌人后方重地，调动敌人，根据敌人的弱点，抓住有利战机，集中兵力，迅速消灭敌人之一部，以打破敌人围歼的企图。由于正确地运用战略战术，积小胜为大胜，挺进师度过了困难时期，最终赢得了胜利。

二、发扬英勇顽强和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

红军挺进师在浙西南、浙南地区坚持 3 年斗争所面临困难和危险是很大的：敌人疯狂地追击堵截；长时期连续行军作战，沿途大多是崇山峻岭、崎岖小道，广大指战员极度疲劳；闽浙

边山区群众生活艰难，后勤补给极端困难。但是挺进师并没有被困难所吓倒，在闽浙边临时省委和省军区的领导下，依靠政治思想工作的巨大威力，坚定了广大指战员对革命事业的信念，高度发扬了英勇顽强和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1935 年 4 月，挺进师主力转战景宁、云和一带，奔袭旺水，进驻沙湾，激战驮洋，转战在葛家地、梅坞、下洋地区，一边向群众开展宣传，打土豪、除劣绅、开仓济贫；一边与紧追围堵的敌人开展战斗，翻山越岭，跋山涉水，充分显示钢铁英雄汉的坚毅性格。4 月下旬，挺进师辗转到了庆元县境斋郎，面对来势汹汹、数量和装备占压倒优势的敌人，部队在粟裕、刘英首长指挥下，发扬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先后粉碎敌人五次疯狂进攻，毙敌 50 多人，俘敌 60 多人，重创李秀部 1 个营，缴获机枪 2 挺、步枪 100 余支。斋郎战斗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广大群众和指战员对敌斗争的信心和决心，为创建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三、密切联系群众，遵守群众纪律，处处维护群众利益，是构筑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的重要基础。

红军挺进师既是一支战斗队又是一支工作队。他们每到一处就向群众开展宣传教育。在景宁沙湾村，指战员不顾路途疲劳，深入农户积极宣传工农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为穷人打天下的革命军队；宣传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道理；宣传抗日救国主张。以没收地主、土豪的粮食和白银，镇压鱼肉穷人的恶霸的实际行动，赢得了群众的爱戴。在三年游击战争时期，不论在浙西南，还是在浙南，挺进师广大指战员与人民同艰苦、共患难，广大群众也以崇高的品德和视死如归的气概，保卫党、保卫人民的子弟兵，涌现出了一大批革命的好母亲、好红嫂。正如粟裕同志在《回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一文中所记述的：在“清剿”斗争中，苍南五凤乡半山的游击队长潘世雅惨遭杀害，妻子地下交通员王玉英不幸被捕，她为了保护党和红军机密，乘敌人警卫懈怠时，毅然用剪刀剪断自己的舌头使敌人无法获取任何材料。挺进师在群众这一钢铁长城的配合和掩护下，挫败了敌人一次次的“清剿”。

四、加强党的领导，是挺进师取得三年游击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

挺进师从赣东北出发，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在闽北崇安成立了挺进师政治委员会，作为挺进师行动区域内最高的党政军领导机关。由刘英、粟裕、黄富武、宗孟平、王蕴瑞等 9 位同志组成，刘英为书记。1935 年 5 月上旬，政委会在福建政和召开会议，分析了斋郎战斗后出现的新形势，制定了今后的行动方针和任务，决定所属各纵队分散活动，发动群众建立和发展党组织与各种革命团体，开拓浙西南游击根据地，这次会议的召开，进一步统一了认识，坚定了信念，为创建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奠定了思想基础。

1935 年 10 月底，由于敌人的疯狂“清剿”，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全部被敌占领，坚持斗争的部队和游击队损失约 500 人。之后，挺进师主力在寿宁县境内同以叶飞为书记的中共闽东特

委会合，大家一致认为，敌人组建了一个“闽赣浙皖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统一指挥四省边区的反革命力量来对付我们，而我各红色游击区却互不联系，各自为战，这是很不利的；如果我浙南与闽东、闽北三个地区能取得密切联系，即使一时尚难统一行动，但只要能在战略上互相协调、互相策应，定可更有力打击敌人。基于这种认识，很快成立了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在此前后，浙西南、浙南地区的特委、县委组织也纷纷建立，为挺进师开辟浙南游击根据地提供了组织保证。

红军挺进师在党的领导下，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多次大规模“清剿”，胜利地坚持了长达 3 年的游击战争，终于实现了红军北上抗日的夙愿。

（选自《纪念浙西南、浙南游击根据地创建 60 周年研讨会论文集》，作者单位：中共宁波市委党史研究室）

从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探讨粟裕的领导指挥艺术

吴玉谦

在浙南三年游击战争中，作为主要军事领导人，粟裕同志大部分时间率领部队开辟、建设和保卫游击根据地，在同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他独立自主机智果断地指挥部队，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充分显示出了其杰出的军事才能。

认真学习浙南三年游击战争的历史，仔细进行分析探讨，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出粟裕同志的领导指挥艺术。

一、掌握主动，调动敌人

在浙南三年游击战争中，粟裕同志领导指挥艺术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广用谋略，掌握主动，调动敌人。

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是粟裕同志军事生涯中独立行使指挥权的开始，也是形成粟裕领导指挥艺术特色的重要时期之一。从 1927 年南昌起义到 1935 年的浙南游击战争，粟裕同志已亲历了八年残酷军事斗争，从班长、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到军团参谋长，经过大大小小战斗无数次，对毛泽东军事思想领会比较深刻，特别从第五次反“围剿”和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中认识到：我军掌握了主动，在战场上就如鱼得水；失去了主动，就要被动挨打。因此，这次率领部队挺进浙江，他把运用谋略，掌握主动，放在第一位考虑。

党中央要求挺进师进入浙江境内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苏维埃根据地，但首先进入浙江什么地方，并没有明确指示。经过认真分析研究，粟裕同志确定以山岭连绵、森林茂密、道路曲折、便于隐蔽和机动的浙西南仙霞岭作为第一个游击区。但是浙西南国民党统治严密，反动武装势力比较强大。如果 500 人左右的挺进师直接进入仙霞岭，就要立即遭到反动武装的疯狂“围剿”，不要说开辟游击区难以实现，就是部队自身也很难生存。粟裕同志采取调虎离山的办法，把敌人调动出来。

在进入浙西南之前，他带领部队首先在浙闽边境出出进进，往返作战，一度打到江山，又在武夷山、洞宫山兜了几个圈子，后来又辗转游击于龙泉河以南，先后打了大小几十仗，歼灭了一批保安团和地方武装。敌人以为挺进师必将在龙泉河以南的闽浙边境立足，遂令大部队进行夹击，企图消灭我军。

1935 年 4 月下旬挺进师正活动于庆元县的斋郎地区，浙江保安第一团团长李秀率部 1200 余人，福建保安第二团团长马洪琛率部 100 余人，在近千人的地主武装配合下，从东北、正东和东南三个方向对挺进师实行分进合击。

粟裕同志见敌人已被调动出来，就指挥部队迎头痛击。先用军事加政治攻势，打败前头地主武装，然后引诱浙保第一团李秀部进入预设阵地前沿。挺进师集中火力，突然给以打击，杀伤 300 余人，俘虏 200 人，李秀率残部仓皇逃窜。闽保第二团马洪琛感到孤立无援，也带着部队狼狈遁去，战斗胜利结束。

从此，浙西南敌人武装力量已经空虚，趁此机会，挺进师迅速进入仙霞岭地区，开辟和建立了游击根据地，几个月工夫就搞得红红火火。

我国古代兵法，很强调用兵的主动，把掌管主动权当作一项重要原则。《兵经百篇》讲：“进止战守由于我，斯有胜道。由我则我制敌，由敌则敌制我。”粟裕同志在浙南游击战争中调动敌人的生动事例，再一次证明了运用谋略、争取主动的重要性。

二、依据实际情况，适时调整政策，发挥政策威力

1935 年挺进师进入浙西南仙霞岭地区开辟游击根据地时，是沿用中央苏区时“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在革命处于低潮时，这样做，打击面过宽，树敌过多，很不利于革命队伍的发展。

1936 年挺进师转入浙南时，根据民族矛盾日益加深、且浙江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地主兼工商业者多的特点，粟裕同志适时对政策作了若干调整。其主要内容是：以抗日反蒋为前提，扩大团结对象，缩小打击目标。改变了打土豪的政策，把“没收委员会”，改为“征发委员会”，征收“抗日捐”。对于地主，根据他家负担能力大小，确定他需要捐多少米、多少钱、多少衣物。对国民党的乡、镇、保长，由镇压改为争取。对地方士绅和中等商人，中立的允许自由买卖。

挺进师注重群众经济利益，注意发展山区经济，允许平原城镇客商进山做买卖，使商品流通，山区经济得到发展。根据地中心点门阵地区因商业繁荣，被群众称为“小上海”。平原上的客商带来大量布匹、医药等货物，交换山区的特产，挺进师因此也有了“补给基地”。

由于政策好，那一带的不少保、甲长替红军游击队办事，区长、乡长往往保持中立，明明知道游击队一些情况，也不向国民党当局报告。这样就有了一个小小的但又比较稳固的后方。到 1936 年底，挺进师再次由几百人发展到 1500 多人，地方游击队和群众武装达数千人，活动的范围达 30 几个县。

粟裕同志适时调整政策，使挺进师在敌腹心地区的斗争增强了生命力，所以敌人始终无法将这股革命的火焰扑灭。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粟裕同志这样做，是在和党中央及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当

时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还没有完全肃清，他能独立自主地调整政策，更是难能可贵。

三、不拘一格，用活战术

挺进师是北上抗日先遣队突围的余部，人员少，武器差，但却能同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于己的敌人周旋，除了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粟裕同志大智大勇，活用战术，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在浙南三年游击战争中，粟裕同志活用战术的事例数不胜数。从 1936 年底到 1937 年春夏国民党闽赣浙皖四省边区主任刘建绪调集主力部队 6 个师、2 个独立旅及地方保安团共 43 个团，向游击队进攻。情况万分危急。在强敌进攻面前，粟裕同志坚定沉着，为了保存红军游击队，坚持武装斗争的旗帜，坚持战略支撑点，他确立了机动灵活的作战方针。

这个时期，是三年游击战争中作战最为频繁的时期，也是粟裕同志运用游击战术的成熟时期。他以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时总结的十六字诀为指导，结合实际总结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经验。在作战行动上，归纳掌握 5 条要领：⑴反敌人之道而行，并竭尽欺诈之能事，敌进我退，敌集我散，敌大我避，敌小我欺，避实就虚，声东击西。⑵不要企图太大，只要常有小胜。⑶站在敌人翼侧、后方和圈子外，不为敌人所合击。⑷一切作战行动必须迅速、勇猛、坚决。⑸注意使用突然的白刃袭击。只要枪弹一响，刺刀就要杀到敌人的肚皮上去。

战术活则部队活。粟裕同志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弄得敌人晕头转向，尽管敌人多我红军游击队几十倍，“却无法将我军消灭；而我军则抓住战机，一次又一次打击敌人，使三年游击战争终于坚持到最后胜利”。

四、在战争实践中培养和锻炼指战员

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是一场特殊的战争，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分散，红军游击队有时百把人，有时几十人，十几人甚至三五个人一起行动。针对这个特点，粟裕同志精心培养各级干部和广大战士，使他们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实践中增长才干。

挺进师的干部战士，大都是从红七军团北上抗日先遣队中来的，长于正规兵团作战，现在要分散打游击，就有些手足无措，不少干部习惯大部队一起行动，不愿分开活动。

进入浙南打游击初期，粟裕同志用很大精力培养干部战士如何学会打游击。他不但言传身教，更注意把同志们三个一伙五个一群地分别派出去单独活动。开始，几天碰一次面，逐渐十天半月会合一次，在实践中锻炼同志们单独活动的能力。起初，大家不知道如何发动群众，搞不到吃的，也休息不好，人弄得很疲劳很消瘦。经过一次次锻炼，懂得了如何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中活动自如了。

实践出真知，广大指战员从游击战争学习游击战争，使游击战争越打越精。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所以能坚持下来，是和粟裕同志在实践中培养大量骨干分子分不开的，有了这些精于游

击战争的骨干做支撑，不论敌人怎样残酷围攻、清剿，革命的火种始终不灭。

在实践中培养和锻炼指战员，是粟裕同志的一贯思想，即使在后来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至建国后，在粟裕同志领导下的同志都有这样的体会，粟裕同志总是谆谆教导大家，在干中学，在学中精。

革命的实践，把粟裕这位南昌起义时的班长，锻炼成为方面军领导、总参谋长这样一代名将。粟裕又在实践中带领出千千万万优秀指挥员，使其成为我党我军的宝贵财富。

（选自《纪念浙西南、浙南游击根据地创建60周年研讨会论文集》，作者系原陆军第32集团军军长）

粟裕在浙西南游击战争中战略特点的研究

王人勤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红军挺进师创建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包括松阳、龙泉、遂昌、云和、江山、浦城等10多个县方圆几百公里的地域。浙南、浙西南根据地是南方15块游击根据地之一，也是南方革命的重要战略支撑点。领导挺进师会同当地群众开辟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和驾驭这块根据地建设的主要领导人是粟裕和刘英。现笔者就粟裕在浙西南游击战争的战略特点作一探析。

一、利用空间、地域优势，调虎离山

粟裕作为挺进师的师长，有着强烈的责任心。他反复分析和斟酌研究了苏区中央分局给挺进师指示的深刻含意，做到胸有成竹，指挥不误。中央分局的指示归纳起来有三层含义：一是进入浙江，创建苏维埃根据地；二是打击、牵制敌人，保卫邻近根据地；三是配合主力红军长征。从当时的情况分析，选择落脚点即根据地的位置问题显得非常重要。浙北是杭嘉湖大平原，接近国民党统治中枢，这是蒋介石的“家门口”，经济、文化、交通都比较发达，又毗邻繁华都市大上海，反动基础相当坚固，不利于游击隐蔽和发动群众；浙中地区虽有起伏连绵的丘陵，但地势平坦，其间点缀着诸多的河谷平原，而且国民党统治力量相对强大；浙南一带虽山高林密便于游击，但地处沿海，敌布防严密；唯有浙西南一带地理条件复杂，境内群山延绵、沟壑纵横、林木葱郁、交通闭塞，利于游击机动。因此选定以仙霞岭为中心地区开辟根据地。可是，当时国民党在浙西南布有较多的兵力，如省保安团、地方保安中队、独立营、地主武装等等，后来又调来了南京税警团。他们妄图凭借精良武器装备据险扼要，以堵截和攻袭手段，拒红军于省门之外。

挺进师从江西到达浙闽两省边境后在绵延数百公里的山区开展活动，粟裕始终把“利用空间、地域的优势来换取敌人的有生力量”作为重要战略来运筹。在当时，首要的是把敌人从中心区域调出来，使仙霞岭及其以东地区暂时成为一块空白。根据这个战略上的宏观筹划，粟裕就运用背靠根据地（闽北、闽东），面向敌占区，利用两省敌人某些矛盾的弱点，用“侦察、吸引、骚扰、袭击”的办法，在浙闽边境往返作战，迂回兜圈，使敌无法捉摸。通过外围活动，造成强大的声势，给敌人以错觉。红军挺进师一度打到江山，在武夷山、洞宫山广阔地域兜圈子，又辗转游击于龙泉河以南的庆元、景宁、松溪、政和、寿宁、泰顺一带，先后打了大小战斗数十次，

歼灭了一批敌人有生力量保安团及其地主武装，给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以极大震慑。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心急如焚，惊惶中“饬陈氏（式正）加厚兵力”，并懊丧地说：“地方不无损失，实由边境公路未筑，交通梗塞，长途话未装设，军事指挥不便……”宣铁吾也失望地说：“防线太长，兵力过单，一听到步哨走火，县府、党部主持人远逃，人民自然更惊骇了……”敌人的沮丧，却提高了红军军威。

这支精干的红军队伍，在广阔的地域内经一个月的活动，给敌人造成一种假象和错觉。敌人以为红军挺进师要在龙泉河以南的闽浙边境立脚，故而驻扎在龙泉河以北的、处于攻势的浙江保安团队纷纷南调，却中了粟裕事先拟定的“把那些保安团队吸引出来，才好进入该地区（浙西南）”的圈套。这就是粟裕充分利用空间、地域优势，“调虎离山”的战略特点。

二、游击战争与寻找群众依托同步

粟裕从“八一”南昌起义后，跟随朱德、陈毅转战潮汕，深深感受到没有固定的地域给战争带来的艰难和被动。1928 年 4 月，朱德在宁冈砻市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从此粟裕置身井冈山，深深地感到有个“家”对武装斗争的重要性，这是夺取胜利的基本条件。这时，粟裕确立了根据地思想。到了浙西南游击战争时，他这种思想有了新的飞跃。“战争要有群众依托”的道理在粟裕脑子里深深植下了根。他认为，有了群众这个坚强的后盾，就可以安安稳稳地住下来休整和部署工作。他说：“游击队要能自如活动，根本的一条是要依靠群众。”

粟裕对落脚点和群众依托问题作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终于发现了三个独特优势：一是松（阳）遂（昌）龙（泉）一带人民有过 1928 年崇浦农民暴动和 1930 年红十三军活动的影响；二是 1934 年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再次为该地区播下革命种子；三是有一支“青帮”组织倾向进步，向往革命。粟裕认为“青帮”是一支具有革命意识的队伍，因为他们绝大部分是贫苦农民、破产手工业者，有朴素的阶级感情。他们的头领陈凤生、卢子敬、陈丹山、叶义等是当地非常有威望的群众领袖，有号召力和凝聚力。粟裕认定这是一支可为游击战争利用的不可多得的力量。为此，他作了如下的工作：一是狠狠抓住思想政治工作这一环，反复细致地宣传土地革命的政策和红军部队的性质，双方沟通思想，建立了互不戒心、不存疑虑的关系；二是慰劳了 1930 年被国民党烧毁房屋的众多的“青帮”户，如斗潭村的徐丰元、傅朝丰、徐大富和大横坑村的若干“青帮”人员，都受到了粟裕、刘英物质补助，这一行动表明了红军领导对贫苦百姓抚慰和同情之心，致使广大“青帮”兄弟更信赖红军及粟裕其人，从而产生抚恤的良好效应，增强了吸引力、向心力；三是吸收为数较多的当地骨干参加浙西南地方工作团，工作团的成员数量最后发展到近百名，他们分布地域广、力量大，在工作中扩大了红军的政治影响。由于粟裕正确运用了游击战争与找群众依托同步进行的战略，挺进师到浙西南后较为顺利地打开了局面，粟裕也说，“有了这个依托，对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开

辟起了很好的作用。”

三、建立中心基点与波浪式游击推进结合

中心基点即是游击根据地中最稳固最中心的一片地域，波浪式推进则是有高潮有低谷，猛缓相间地游击、扩展地盘，中心基点为波浪式游击扩展提供了后方，波浪式推进扩展地盘也巩固了中心基点，两者缺一不可。建立中心基点有利于党领导的武装得以生存、发展，有利于坚定人民信心，鼓舞斗志；同时也可动摇敌人的政治基础，瓦解敌人营垒。没有这种稳固的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会失掉依托。

粟裕在井冈山根据地进行革命斗争时，对毛泽东的战争理论和伟大实践，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以后，粟裕对毛泽东建立稳固坚实的中心区域的理论的理解逐步在战争中得到深化。斋郎大捷后，粟裕率红军进入松阳、龙泉、遂昌。在斗争中形成了安岱后（包括小吉等地）这个中心支撑点，这里成了师政委会、浙西南特委、军分区、地方工作团、农民武装游击总队的活动中心；粟裕、刘英还委派高信全、方志富在龙泉住溪形成了一个中心基点；不久又在王村口形成中心基点。安岱后、住溪、王村口形成三点一面，构成一个平面三角形的态势，然后以三个中心基点辐射到各地。

粟裕、刘英为了把中心基点建设得更牢固，做了大量工作。其一是召开了龙泉高塘、松阳小吉、遂昌王村口数次师政委会会议，进行党、部队领导干部的调整，成立了新的军事领导机构，重新编制了部队，从政治上、思想上、军事上、组织上全面安排了根据地的建设工作。其二是按照毛泽东“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一齐军事化”的理论，深层次多角度全方位地发动群众，搞人民战争，这无疑是符合当时浙西南游击战争的客观要求的。通过艰苦奋战，在松（阳）遂（昌）龙（泉）一片地域发展和建立了党的组织、苏维埃政权和武装游击队，这标志着中心基点较为巩固了。对这一点连国民党政府也供认不讳，《浙瓯日报》报导：“松阳以南的白岸、枫坪、小吉、安岱后，龙泉北乡的西岱，向为赤匪中心司令部区……”又载：“遂南、龙北为伪浙西南独立师之巢穴……”故而，他们惊呼：“松遂龙各县大半赤化……”

中心区域形成后，仍需作不懈苦斗以求根据地的进一步扩大。粟裕进一步运用“建立中心基点与波浪式推进”相结合的战略。当时外围敌人势力比较强大，南面盘踞福建的国民党新十师、五十六师、五十二师几闽保二团等部队，虎视眈眈；北面的浙保、南京税警团、省防军向南推移，企图采取两方联合、南北夹攻的手法，消灭或拖垮红军。粟裕根据浙西南实际情况，部署红军部队四面出击，加大力度，采取波浪推进的方法，部队在敌人薄弱的地方游击活动一阵子就拉回来，使敌扑空，消耗其精力，疲劳其官兵，损伤其元气。然后，将部队推进到该地区再次进行活动。这种战略有如下的好处：使敌人对红军的行动难以捉摸；使被推进地区人民群众对红军形成认识，深化感情；也可以掩护群众的革命活动。例如，1935 年 6 月红军北路部队日夜

兼程指向汤溪县城，在敌人拼命加快城防的时候，红军又迅速折向中心区域，在小块中心区域再次发动群众，斗争土豪劣绅，留下部分人员就地开展游击活动，主力部队则重新奔汤溪的上阳，进袭南坑。粟裕用同样的战略在金华、龙游、衢州游击，把革命烈火引到浙赣铁路沿线，进一步巩固了中心区域，扩大了游击面。

由于挺进师在游击战争中实行了正确的战略策略，在短短的半年时间就建立起纵横百余公里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

（选自《纪念浙西南、浙南游击根据地创建60周年研讨会论文集》，作者单位：中共松阳县委党史研究室）

浙南三年游击战争和粟裕的领导指挥艺术

《粟裕传》编写组

浙南三年游击战争，从1935年初开始，到1937年9月中旬挺进师与国民党浙江当局签署和平协议告一段落。战争的时代背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已经失败，军阀之间的战争基本停止；革命处于低潮。战争的地区：国民党统治的腹心。交战双方：一是红军一支主力部队，但人数不过几百，武器落后；一是国民党的精锐正规军和部分地方保安部队，多时达十数万，装备一流。以上三点，构成浙南游击战争与其他根据地战争不同的特点。

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期间，作为挺进师师长的粟裕，绝大部分时间是率领部队开展游击战争，开辟、建设和保卫游击根据地，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又是独立领导和指挥作战，创造性地处理一系列军事和政治问题，在浙南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话剧。本文从浙南三年游击战争的复杂性及其伟大胜利出发，着重论述粟裕驾驭这场战争的领导和指挥艺术的特点。

一、着眼全局——粟裕运筹戎机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及社会历史、地理环境等诸多条件限制，共产党领导和建立的根据地，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被分割成或大或小的一块块，有的彼此之间联系密切，有的囿于一隅，上下左右均被阻隔，孤军转战。作为独立领导和支撑一个区域革命武装斗争的指挥员，考察他的领导和指挥艺术，首要的是看他对政治方向和革命全局的把握水平，特别是在风云变幻的关头，能否始终清醒地认准方向，坚定地服从大局，并且自觉地把自己领导的这个局部融到大局中去，在大局下行动。粟裕在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时期高水平的领导和指挥艺术，正在于他在任何艰难复杂的情况下都牢牢记住革命的大局和党的根本利益，并从这个政治高度运筹、决策和行动，做到了把握总体方向和完成具体任务的统一，即全局与局部的统一。

1935年初中央决定组成挺进师进入浙江时，革命面临着极其严峻的形势。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后，中央红军退出江西，长征途中遭受重大损失，其他多数革命根据地和广大白区工作也陷于瘫痪。中央千方百计采取各种措施，力图扭转局势，使革命向好的方向转变，指示组成挺进师就是在这样的大局下走出的一着棋。当时中央决定以北上抗日先遣队突围残部组成挺进师，赋予的任务是：“立即率部进入浙江境内，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苏维埃根据地；以积极的作战行动，打击、吸引和牵制敌人，保卫闽浙赣基本地区和邻近的根据地，并从战略上配合主力红军的行动。”

师长粟裕、政委刘英及挺进师大部分官兵，刚刚经历了抗日先遣队进军福建、浙江、安徽的失败，深知孤军挺进的艰险。此次所要开赴的浙江省又是蒋介石的老巢，反动势力强大，境内没有一块红色根据地或者游击区可以依托，稍有不慎就很可能重蹈抗日先遣队的覆辙。从局部看是一着险棋，但在全局上却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

抗日先遣队怀玉山失败后，粟裕按照毛泽东军事思想，冷静分析了失败原因，得出许多深刻的教训。实际上，粟裕担任抗日先遣队参谋长时候，就对先遣队挺进敌后作战有许多正确的意见和建议，只是由于先遣队主要领导的“左”倾错误，没有被重视被采纳。粟裕受命组建挺进师时，即对将要展开的这场斗争深思熟虑，现在他所处的地位，决定了他能按照自己的正确意图去实践，因而对完成中央赋予的任务充满信心。粟裕在《回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一文中，详细记述了当时的考虑和认识：“先遣队北上时未能在浙江省立脚生根，主要是由于当时没有分散打游击的认识和决心，如果我们接受这个教训，自觉地把正规军变成游击队，不打正规战而打游击战，来一个决定性的转变，我们相信是可以在浙江立脚生根，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的。”

1935 年 2 月 27 日，粟裕、刘英率挺进师从江西省上饶县的灵山出发。黑夜横渡信江，通过敌人六道封锁线，连续日夜行军 20 多天，经赣东、闽北，进入浙西南，一路上险情重重。到达福建边境时，部队携带的一部电台被敌人打坏，挺进师从此失去了同中央的一切联系。部队进入闽北，由于叛徒出卖，敌人早有准备，到处设伏围捕。面对想象不到的困难，粟裕和刘英没有动摇贯彻中央指示的决心，毅然进入浙江，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积极做好局部的工作，全力以赴在战略上策应和支持全局。主要表现在：

（一）挺进师在浙江立住了脚，把浙南建成了中国革命在南方的一个战略支撑点。这个战略支撑点不仅在十年内战时期的 1935 年至 1937 年有力支持了全局的斗争，而且在以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挺进师在敌人腹心地区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像一把尖刀插入敌人心脏，较长期地吸引和牵制了敌人相对数量的兵力，特别是两次反“围剿”斗争，各吸引国民党精锐和地方部队 40 个团，时间分别长达 9 个月和 8 个月。挺进师在浙南的斗争，无疑在战略上策应了党中央和主力红军的转移，也在一定程度上配合和掩护了邻近兄弟游击区的斗争。

（三）扩大了党的影响，保存、锻炼和造就了一批军政双全的干部，成为以后组建新四军的重要的骨干来源。

粟裕在大局下运行的高超领导和指挥艺术，不仅表现在坚定地按照中央下达的任务开展斗争，更表现在他对时局的洞察力，审时度势，高屋建瓴，自觉勇敢地领导红军游击队顺应抗日形势发展，实现从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

关于粟裕这一时期这一方面材料的详细介绍，许多文章已有充分阐述，本文仅就粟裕领导和指挥艺术角度探索，着重强调两点：（1）在“与世隔绝”的境地里了解全局形势的主动性。

粟裕和挺进师是在同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开展游击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的，但他们没有把自己封闭起来做“山大王”，始终把所处的这个局部同全局联系在一起，积极主动地想办法了解全国形势，体会中央政策，以此来决定自己的行动。这在粟裕的整个领导和决策工作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明令部队，每到一地，都要千方百计搜集敌人的报纸，从字里行间细细分析；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找来上海等地的进步刊物认真研究；采取一些特殊手段，侦察获得情报。尽管挺进师被包围在一个狭小的山区，粟裕依然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2)对复杂变化形势判断的正确性。1937 年七八月间，国内形势错综复杂，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交织在一起，民族矛盾正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党中央对时局的方针政策有许多根本性的调整和变化。没有中央的直接指示，凭藉从各种渠道得到一些信息，粟裕对大局判断如此之准确，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坚持的原则和采取的做法，与党中央的立场完全符合，这确是粟裕领导和指挥艺术高明之所在。

粟裕在以后的军事生涯中，所担负的责任越来越重，权力越来越大，无论是独立领导苏中根据地抗日，还是统领雄师经略华东、中原，把局部融入全局，在大局下行动，始终是他帷幄运筹和决策的最高准则。

二、创新出奇——粟裕决胜用兵的重要特色

粟裕于 1928 年 4 月跟随朱德、陈毅同志上井冈山，参加了坚持井冈山和创建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他在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下，通过斗争实践，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从基层指挥员锻炼成长为优秀的高级指挥员。粟裕在浙江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的领导和指挥艺术，集中表现在他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解决浙南斗争的复杂问题，即根据新情况，制定新方针，解决新矛盾，夺取新胜利。

(一)独创性地提出“敌进我进”的作战方针，灵活机动地在敌人腹心打击敌人。

粟裕领导挺进师顺利实现由正规军向游击队、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的转变，这是挺进师能够在浙江生存的第一步，面对强大的敌人，还必须确定正确的作战方针。毛泽东、朱德对井冈山时期的游击战提出了著名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16 字诀作战方针，粟裕亲身参加了按照 16 字诀作战并取得一个个胜利的战斗实践。然而，对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的作战方针，粟裕没有拘泥于这 16 个字，而是以 16 字诀为基础，又不受 16 字诀的限制，根据新的形势和情况，创造性地提出“敌进我进”的作战方针。粟裕认为，“游击战很难谈得上防御，也不能大量歼灭敌人；只能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实行敌进我进的方针。”[①] 粟裕进一步解释指出，敌人进攻我们，我们是被动的，就迅速转移，不同敌人决战。但是我们也可以有计划地进攻敌人，保持积极进攻的姿态对付敌人。你要我的山头，我攻你的后方。根据这一军事方

①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59 页。

针，当敌人重兵压境“围剿”挺进师时，粟裕则领导挺进师把游击的活动重点转到对敌人威胁最大的浙赣线南侧，有时甚至打到武义汤恩伯的家乡，打到青田陈诚的老家，乃至逼近奉化溪口蒋介石的祖坟，给敌人以很大威胁，有效地牵制和调动了大批敌人，并且大大扩展了游击战的作战范围，创造了比较辽阔的战场，挺进师不断地发展壮大。

（二）提出并建立有层次的、几种类型相结合的游击根据地，有力地支持游击队的武装斗争。

按照粟裕的战略思想，浙南的游击根据地建设，呈水波状一圈一圈向外扩展。它的主要层次是：根据地中心是基本区；基本区周围，建立较大块的游击根据地；较大块游击根据地周围，建立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和若干个游击基点。所谓游击基点，乃是几个或十几个有工作基础的村庄连成一片；比较密集的基点联系在一起，便是一片小块游击根据地。游击基点和小块的游击根据地，有公开的，有秘密的，在敌人势力强大地区还有“白皮红心”式的“两面”政权。部队打罢仗，需要作短期休整，一个晚上急行军转到了游击根据地或游击基点住下来。群众封锁了消息，敌人被蒙在鼓里，找不到红军游击队去处，实际就在他身边。红军游击队边休整边侦察敌情，筹划好下一步行动方向和目标，再跳出去神不知鬼不觉地打击敌人。部队要作较长时间休整或准备打击“围剿”游击区的敌人，就返回到内圈基本区再研究和部署。有了这样的游击根据地支撑，游击队创造了活动自如的环境，如鱼得水，不仅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条件下站住了脚跟，而且不断发展壮大。

（三）独创浙南游击战术6条原则，丰富毛泽东游击战思想。

这6条原则是：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胜利；不在消灭敌人，而在消磨敌人；支配敌人，掌握主动；积极进攻，绝少防御；飘忽不定，出没无常；越是敌人后方，越是容易成功。在游击战的作战行动方面，粟裕总结出了这样的要领：“通常采取与敌人完全相反的行动，如敌进我退（进），敌集我散，敌大我避，敌小我欺；应该极尽欺诈之能事，以迷惑敌人，如声东击西，避实击虚；不要企图太大，只要常有小胜；敌人多路进攻时，我应位于其翼侧、后方和包围圈外面，不要被它合击；不要暴露企图，行动秘密而飘忽，可以兜圈子，有大圈子、小圈子、S形圈子，还可以杀回马枪，也要警惕敌人会杀我们的回马枪；不论进攻或退却，均应坚决而迅速；胆欲大而心欲细；注意使用突然的白刃袭击。”[①]他对游击队的组织、行军、宿营、侦察、警戒、通讯联络等，也都分别总结出了成功的经验，而且上升到了理论高度，后来还在平阳抗日救亡学校专门讲授游击战术，并把游击战摆到战略地位上来认识。

（四）创造性地运用和制定党的政策、策略，团结人民，壮大红军，打击敌人。

粟裕领导和指挥挺进师在浙南打游击，面临着两个极其复杂的情况：一是浙江是国民党统治的腹心，阶级成份复杂；二是时局正在处于国内战争向民族战争转变阶段，敌我友的思想和对共产党的态度也在不断变化，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错综复杂。粟裕依据党的总路线和全国

① 粟裕、孙克骥：《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

及浙南的形势，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挺进师在浙南活动的政策和策略。

⑴具体分析浙南帮会组织的政治倾向，分别采取不同的政策。提到“青帮”，在革命者的心中往往把它曾帮助蒋介石在上海屠杀共产党联系在一起。而浙南龙泉、遂昌、松阳三县边界地区的“青帮”组织领导人陈凤生和卢子敬，早年都受进步思想影响，向往革命，实际上是当地很有威望的群众领袖。挺进师一到那里，就受到他们的热烈欢迎。许多贫苦青、壮年农民会众积极靠拢红军，主动表示希望得到共产党的领导。粟裕没有从原有的概念出发，而对他们采取了团结、教育的政策，既有利于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开辟，又壮大了红军游击队的力量，陈、卢及一批先进分子还先后加入了共产党。当地的另一帮会大刀会组织，实际上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武装。挺进师则对他们采取坚决打击的政策，并揭露其大搞封建迷信的骗人把戏，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觉悟。

⑵根据各阶段形势发展不同情况，不断调整和提出适合各个阶段斗争需要的政策。1935年挺进师刚进入浙西南建立根据地时，粟裕提出了“团结中间阶层，对上层分子根据其不同表现区别对待，以孤立敌人”的政策和斗争策略。随着民族矛盾日益加深，1936年以后，对政策作了重要调整，明确提出“以抗日反蒋为前提，扩大团结对象，缩小打击目标”，改变了“打土豪”的政策，还把“没收委员会”改为“征发委员会”，实行征收“抗日捐”的办法，同时“重视团结争取知识分子的工作，向青年进行革命、抗日宣传，把进步青年团结在自己的周围。”1937年，随着抗日救亡运动迅速高涨，粟裕更深入地调整了对敌斗争的政策和策略，“对国民党的乡、镇、保长由镇压改为争取”，把“穷人不打穷人”的口号，改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把“欢迎白军士兵杀死官长拖枪当红军”，改为“欢迎白军官兵枪口对外和红军共同抗日”[①]。粟裕提出的这些新的政策和策略，都得到挺进师指战员的认真贯彻执行，推动了形势向前发展。

⑶重视群众经济利益，制定山区经济发展政策。在军事斗争形势极其险恶的情况下，粟裕勇于提出和制定有利于根据地经济发展的政策，是难能可贵的。游击队活动的地区大都是林木茂密的山区。粟裕提出的政策是“支持竹木和山货出口，欢迎平原城镇的殷实客商进山做买卖”，“地方士绅和中等商人，中立的允许自由来去”[②]。这些政策有利于山区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因而人民群众更加拥护游击队。同时也争取了一批资本家和工商业者，通过他们，解决了游击队一部分军需品的来路困难。

三、唯物辩证——粟裕领导和指挥艺术的精髓

粟裕认为：“两军对阵，不仅是兵力、火器、士气的较量，也是双方指挥艺术的较量。”[③]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是粟裕远离中央第一次独立负责一个区域的军事斗争，也是他第一次独立

①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99页。
②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74页。
③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75页。

运用从毛泽东、朱德同志那里学到的军事思想去指导作战。无论是浙南三年游击战争的丰富实践，还是以后粟裕根据这段亲身经历写成的战争回忆录，无不充满光辉的唯物辩证思想：局部与全局、斗争与团结、分散与集中、进攻与退却、继承与创新、战略与战法、眼前与发展，等等，粟裕都恰到好处地适度把握妥善处理，每一对矛盾的丰富内涵，都是一篇有实践有理论的好文章。粟裕在回忆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斗争历史时曾说："我跟随毛泽东、朱德同志学习打仗所得到的最深刻体会，是战争有它自己的规律，克敌制胜的办法必须依据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和战争内在规律去寻找。我学到的这条道理，使我终身受益。"① 根据粟裕自己的"最深刻体会"，探讨粟裕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期间自觉地把唯物辩证法思想用于作战指导的领导和指挥艺术，最重要的应该把握两个起统帅全局作用的观点：一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确定军事的政治的斗争策略、政策和具体战术战法；二是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正确认识和驾驭客观规律。这两条有机结合，便是主观与客观、知和行的统一，以此指导战争，无往而不胜。这是粟裕在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期间也是他戎马一生领导和指挥艺术的精髓所在。

接到组建挺进师的指示，粟裕和刘英等领导人立即对即将进入的浙江省的军事、政治和社会情况，作了全面分析，既看到不利条件，也看到有利条件；既看到新的斗争和井冈山、中央苏区红军游击战相同的一般规律，也看到不同的特殊规律；同时还对浙江的地理、地形情况作认真研究。这一切的调查研究工作，使挺进师出发之前就比较好地了解浙江，从浙江的实际情况出发，再吸取过去的经验，确定了在浙江立脚生根的方针：迅速实现军事战略转变，即自觉地把正规军变成游击队，把打正规战变成打游击战。

一切从实际出发，不仅表现在工作开展前准备阶段对方针原则的确定，更重要的是贯穿于工作开展以后的全过程中。挺进师进入浙江后，粟裕一直用很大精力在研究不断变化着的全国大局和当前的新形势、新环境、新敌人，相应地提出和确定新的政策、策略、军事方针、战术战法。即使组织一场具体的战斗，仗什么时候打、选择在哪里打、怎样打，他都要实地调查，透彻了解客观实际后再做决定。部队挺进闽浙边开辟以仙霞岭为中心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时的军事行动，就是粟裕从实际出发用兵的范例。

浙西南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地区，敌人在那里驻有较强的保安团，挺进师与之相比较，力量悬殊。这段时间，挺进师的主要任务是作战，对手是保安团。粟裕率部先在闽浙边进进出出兜圈子，以吸引保安团离开老窝，然后各个击破，先后打了大小几十仗，歼灭一批保安团和地主武装。1935 年 4 月下旬，部队进入庆元县斋郎地区，又利用这里的有利地形和敌人的骄纵轻进，精心组织了一次有规模的战斗。粟裕根据新情况，改变战法，集中火力，突然出击，使敌浙江保安第一团 1200 余人，伤亡了 300 多名，被俘了 2OO 余名，团长李秀也被打断了手。挺进师进入浙西南选定好建立第一块游击根据地的基本区域以后，实际情况变化了，粟裕及时把

①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99 页。

挺进师的主要任务改为武装斗争与根据地建设相结合，要求每个干部战士都学会两套本领：不仅会打游击，还会做群众工作。

在三年游击战争时期，蒋介石发动了两次“围剿”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挺进师针锋相对开展了两次反“围剿”作战。敌人两次“围剿”的作战意图不同，出动的兵力不同、战法不同，挺进师游击队的反“围剿”行动也相应有许多不同。1935 年 8 月开始的大规模“围剿”，敌人出动主力部队 32 个整团约六七万人，连同地主武装共约 40 个团的兵力，对浙西南游击根据地采取大包围的作战方针。针对这个情况，粟裕适时提出并实行“敌进我进”的方针，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以积极的作战行动吸引敌人、调动敌人、打击敌人、消灭敌人，获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1936 年底开始的第二次“围剿”，敌人调集主力部队 6 个师、2 个独立旅及地方保安团共 43 个团，对浙西南游击根据地采取“拉网式”作战方针，由西而东、由外围向中心逼进包围；又采用移民并村手段，焚烧边区零星房屋、茅棚，对居民油盐柴米实行按人头逐日配给，以图把群众与红军隔开，实现其先将游击队压迫到东南，然后在浙南包围聚歼的目的。粟裕经过冷静思考，认识到面临的这一仗，实际上是国共双方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军事上的最后一仗，蒋介石是想在国共第二次合作之前一举全部消灭共产党的南方游击队。从这个新的情况出发，粟裕采取了新的反“围剿”作战方针，把隐蔽精干、保存力量同机动灵活、积极作战统一起来。敌人的“大网”拉过来，游击队则与敌人相向对进，钻过“网”去，易地而战，积极进攻，你要我的山头，我要你的后方。作战单位不断分小，由几百人的集中行动，逐渐分散到几十人、十几人甚至几个人的机动活动，根据敌情有时分有时合。这是浙南三年游击战争中挺进师作战最为频繁的时期，游击战的许多新战法和原则，也是粟裕在这个时期归纳产生出来的。敌人第二次“围剿”用的兵力虽然比第一次“围剿”还要多，结果也是不能得逞。挺进师和几块游击根据地坚持下来了，较多的一批精干保存下来了，浙南这个战略据点依然坚如磐石。

从认识论上讲，认识客观和主动地做好工作有一个先后过程。实际上，这两个阶段是有机地渗透、揉合在一起的，没有绝然的界限。从客观实际出发先要认识客观，认识的过程便包含着主观能动作用的发挥；发挥主观能动性驾驭客观规律做工作，同样包含着对客观实际(客观规律)的再认识和不断深化。二者有机结合得越好越自觉，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就越完美。粟裕指出，“对付敌人不单斗力，更要斗智。”① 这“智”，便是对唯物辩证法的掌握和灵活运用。粟裕还在《战争回忆录》中写道：“打仗是最讲辩证法的，因为双方都是活生生的人在行动，敌人同我们一样也会动脑筋会走路，他打着打着变了招，我们就得跟着变招，即使他不变招，我们也常要根据战场上变化了的形势来变化打法。”说得多么深刻、多么形象。粟裕在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时期高超的领导和指挥艺术，正是他高超的对唯物辩证法的得心应手的运用。

（选自《纪念浙西南、浙南游击根据地创建 60 周年研讨会论文集》）

① 粟裕、孙克骥：《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58 页。

红军挺进师与浙江抗日救亡运动

周德春

1935 年 1 月，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遭到国民党军重兵包围进攻，指战员大部牺牲，北上抗日之举受挫。1935 年 2 月，以先遣队突围部队为基础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不改初衷，仍以抗日救国为己任，高举抗日救国大旗，挺进浙江开展游击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谱写了一曲胜利的凯歌。它的特殊的历史功绩，不仅在于完成了进入浙江，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苏维埃根据地，以积极的作战行动，打击、吸引和牵制敌人，从战略上配合主力红军行动的艰巨任务，赢得了三年游击斗争的胜利，更在于它唤起了民族的觉醒和奋起，创立了浙江国共合作为轴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掀起了浙江抗日救亡高潮，实现了北上抗日的夙愿。

一、宣传抗日救国，唤起民族觉醒，奠定浙江抗日救亡群众基础

抗日战争，是全中华民族的战争，是人民战争。民众是胜利之本。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之主要原因，就是全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奋起。浙江人民的觉醒和奋起，浙江抗日救亡运动的掀起，不仅由于抗战的全面爆发和抗日浪潮的到来，更重要的是挺进师在浙江三年游击斗争的结果。

三年游击斗争之前，处于国民党统治腹心地区、禁锢在反动统治枷锁之下的浙江人民，承受着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虽然有着强烈的革命要求和反抗愿望（特别是经过党领导的红十三军武装斗争、各地农民武装暴动等革命斗争洗礼之后，更是渴望党来领导、组织、发动他们反抗反动的统治，砸碎身上的枷锁），但是，由于反动派的严密统治和残酷镇压，他们又慑于反动统治的淫威，缺乏奋起反抗和团结斗争的革命勇气，始终被禁锢在反动统治的枷锁之下，无法实现其革命要求和反抗愿望。

挺进师入浙后，消灭反动武装，摧毁反动统治，打击反动势力，镇压土豪劣绅，开仓济贫，帮助群众战胜灾荒，发动群众斗争。同时利用各种机会，向人民群众宣传党和红军，宣传革命道理，宣传抗日救国，深入开展群众工作。挺进师或利用向导带路的机会，进行宣传，或要求全体干部、战士分散活动，到群众中进行宣传发动，或通过镇压土豪劣绅，召开群众大会，进行宣传发动，或以书写诸如“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红军是抗日的武装力量”“红军是为工农谋利益的”“打倒贪官污吏”“工农群众一致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反对国民党军阀把抗日的士兵调来进攻红军”“反对国民党出卖中国”“废除卖国条约”“白军士兵是工农出身，不要替国军来屠杀红军”“欢迎白军士兵过来当红军”等标语，进行革命和抗日宣传。挺进师

沉重地打击敌人和深入地宣传发动群众，迅速“使广大被剥削和压迫的人民群众从反动统治的千年压榨下挺立起来，砸碎身上的枷锁，投入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挺进师为人民谋利益的实际行动，使之与人民群众建立了鱼水关系，结下了血肉之情；挺进师高举的党的抗日救国大旗，唤起了民族的觉醒和奋起。

三年游击斗争之后，浙江（特别是浙南、浙西南）人民了解了红军，了解了共产党。他们视红军为亲骨肉，视共产党为救星，积极投身革命。不仅有知识、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影响的各界人士具有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和团结抗日思想，乐意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愿意进行抗日救亡工作，就是那些祖祖辈辈不知国事为何物，只知“背负青天，脸朝黄土”一辈子做牛做马的的贫苦农民也懂得了“没有国，哪有家？”“千万不能做亡国奴！”

挺进师在浙江的三年游击斗争，使广大人民群众从慑于反动统治的淫威，不敢接近红军，转变到视红军为亲骨肉，不惜舍身相救，投身革命；使广大人民群众从反动统治的枷锁禁锢之下，奋起抗争，组织贫民团、游击队、妇女会、农民协会，团结斗争。进而形成“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赶走东洋鬼子，誓死不当亡国奴”那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壮举。这是挺进师三年游击斗争的结果，是浙江抗日救亡运动得以蓬勃掀起的根本所在。

二、发展壮大党组织，建立抗日救亡领导核心，培养抗日救亡骨干，奠定浙江抗日救亡组织基础

中国人民进行全面持久抗战并夺取最后胜利的领导核心是中国共产党，这是历史事实。浙江抗日救亡运动的这个领导核心——浙江党组织，主要就是通过挺进师三年游击斗争建立、发展、壮大起来的。

三年游击斗争之前，浙江各地的党组织甚少，党还十分弱小，许多地区没有党的组织，甚至还没有过党的活动。有些地区虽有党的组织，或者虽有过党的组织，并且曾经一度比较壮大，发动和领导过武装暴动等革命斗争，但在反动派的严密统治和残酷镇压下，革命斗争多已处于低潮，党的组织多已遭受严重摧残。挺进师在浙江开展三年游击斗争中，先后创建了中共浙西南特委、龙（泉）浦（城）县委、浙东特委、闽浙边临时省委、浙南特委、龙（泉）遂（昌）县委、浙东南特委、遂（昌）宣（平）汤（溪）工委，及下属众多的基层党组织。仅至 1936 年底，挺进师就已从原来的四五百人，发展到近 2000 人，并拥有数千人的地方游击队和群众武装，党员达 3000 余名，地方工作干部达 500 余名。三年游击斗争，不仅使浙西南、浙南等根据地内普遍创建、发展、壮大了党组织，而且使根据地之外其他各地的党组织都有了相当的发展壮大。

这些历经斗争考验的党组织，具有很强的战斗力和生命力。正是这些党组织，率领浙江人民，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领导和推动浙江抗日救亡运动，成为了浙江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核心。

挺进师在三年游击斗争中，不仅发展壮大了浙江各地的党组织，建立了抗日救亡领导核

心，而且通过严峻的斗争实践锻炼了浙江抗日救亡组织基础。三年游击斗争结束后，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又分别于1937年10月和次年1月，在平阳县境举办军政干部训练班和开办抗日救亡干部学校，为抗日救亡运动培养训练了数百名领导骨干。不但如此，而且如刘英、龙跃、林辉山、张麒麟、谢文清、吴毓、郑丹甫、郑海啸、叶廷鹏、曾友昔等一批党的领导骨干仍留在浙江领导和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此外，挺进师还在即将开赴皖南前线编入新四军时，在浙南、浙西南游击根据地设立新四军驻温州通讯处、新四军驻浙闽边后方留守处、新四军驻浙江（丽水）办事处等抗日救亡机构，建立抗日救亡工作团、战时青年服务团、青年救亡团等抗日救亡工作团体。

这些党的领导干部和抗日救亡工作骨干、积极分子，这些抗日救亡机构和团体，积极宣传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和统一战线工作，深入乡村培养抗日救亡工作干部，推行实施二五减租等抗日救亡政策，开办民众教育夜校，宣传组织发动民众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成为了浙江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坚力量。

三、以斗争求团结，创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浙江抗日救亡工作基础

以斗争求团结，通过斗争实现团结，是挺进师三年游击斗争赢得胜利和实现北上抗日夙愿的成功经验。浙江的国共合作抗日和平谈判，以及和平谈判的达成协议、国共合作为轴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创立、浙江抗日救亡高潮的掀起、挺进师北上抗日夙愿的实现，正是通过挺进师三年游击斗争赢来的。

挺进师入浙开展游击斗争，受到了国民党地方武装一次大举的军事“进剿”和国民党军两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非要置挺进师和浙西南、浙南革命人民于死地不可。挺进师及其创建的各地党组织，领导革命人民，与之针锋相对，坚决斗争。军事上创造性地提出“敌进我进”方针，运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略战术，粉碎国民党军的军事进攻。政治上高举党的抗日救国旗帜，通过瓦解“大刀会”、吸收改造“青帮”、团结争取社会各界开明人士和国民党基层政权职员、改变斗争方式、调整根据地建设政策等广泛的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分化、瓦解、孤立反动势力，敦促国民党当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终于迫使国民党当局正视人民的抗日力量，接受了人民的正义要求。

1936年1月6日，正在浙南领导开展第一次反“围剿”斗争的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获悉北平一二九运动的消息后，立即发出抗日救国的快邮代电，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壮举，提出“团结起来，下我们最大的决心，准备着我们沸腾的热血与头颅，和日本倭奴决一死战”，呼吁“全国民众一致醒来”，“为挽救民族危亡而战”“为脱离亡国奴命运而战”。国民党当局对此置若罔闻，仍然继续对浙西南游击根据地进行血洗。挺进师率领革命人民，浴血奋战，坚决斗争。至同年6月上旬两广事变爆发，取得了坚持八个月之久的第一次反“围剿”斗争胜利。此时，挺进师领导人刘英、粟裕又分别在浙南和浙西南发表宣言，揭露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要求国民党放弃反共，枪口对外，团结抗日。同时调整政策和策略，扩大统一战线的社会

基础，重视群众利益，发展山区经济，把挺进师没收委员会改为征收抗日捐的征发委员会，对国民党各级官吏由镇压改为争取，把“欢迎白军士兵杀死长官，拖枪当红军”等口号改为“欢迎白军官兵枪口对外，同红军一起共同抗日”等。国民党当局仍然置之不理，并于同年底对挺进师和游击根据地开始了第二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和闽浙边临时省军区在领导和开展第二次反“围剿”斗争中，于 1937 年 3 月 25 日，再次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致国民党闽浙皖赣四省主任公署和闽浙两省当局》的快邮代电，呼吁国民党当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派代表与我谈判。5 月 7 日，国民党闽浙皖赣四省主任公署代表开始与我谈判。但国民党方面毫无和谈诚意，竭力反对我方以中共中央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为谈判的基本条件，提出极其苛刻的谈判条件。5 月 18 日，国民党方面宣布，如果我方不同意其条件，即“停抚进剿”“绝灭根诛”，并出示蒋介石“停抚进剿”手令，致使和谈破裂。和谈破裂后，国民党军立即向挺进师展开大规模军事进攻。挺进师和根据地军民，又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反“围剿”斗争。7 月 8 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再次发出通电和宣言，敦促国民党当局，在“国难已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应无条件的首先停止内战”，一致抗日。8 月 24 日，国民党闽浙皖赣四省主任公署迫于形势，不得不认真对待闽浙边临时省委的和谈主张，与我重开谈判。经双方激烈的谈判斗争，初步达成合作抗日协议。

但是，国民党方面未将此情通令各县，致使红军集结发生困难。9 月，与临时省委失去联系，由粟裕率领活动在遂昌门阵一带的挺进师一部，仍不知和谈达成协议之情。粟裕等领导人凭着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从金（华）衢（州）平原传来的“共产党投降了，红军被收编了”等传闻中，敏锐地觉察到有可能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当调查证实了国共合作之情后，粟裕等立即向国民党遂昌县当局发出《国共合作抗日建议书》。9 月 18 日，遂昌县当局复函粟裕等，要红军派全权代表赴金岸谈判，欲收编红军。粟裕等人识破对方阴谋，与之针锋相对，要对方派代表赴门阵谈判。10 月 14 日，遂昌县当局代表与红军代表在门阵举行国共合作抗日和平谈判。和谈中，遂昌县当局仍欲对红军进行招抚收编。红军代表严正表示，为了共同抗日，挽救国家、民族危亡，我们既往不咎，愿意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和平谈判；但合作不是投降，改编不是收编，双方是平等的合作，要保持我军的独立性。在红军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和真诚抗日的言行感召下，终于达成合作抗日协议。至此，三年游击斗争胜利结束，以国共合作为轴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形成。

此后，挺进师开始了诸如培训抗日救亡干部、设立抗日救亡机构、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进一步开展统战工作、向国民党地方当局交涉释放政治犯、与国民党地方当局（如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遂昌县长林树艺、陆希澄等）洽谈抗日救亡工作、激发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热情等一系列抗日救亡活动。次年 3 月，编入新四军，开赴皖南前线抗日，终于实现了为之进行三年艰苦卓绝斗争的北上抗日夙愿，为浙江的抗日救亡奠定了工作基础。

（选自《浙江省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论文集》，作者单位：中共遂昌县委党史研究室）

浙江“井冈山”的斗争

——纪念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成立70周年

中共丽水市委党史研究室

由毛泽东创建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的第一块根据地，她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正确道路，星星之火，燎原全国。

1935年3月，粟裕、刘英率领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开辟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是浙江的第一块根据地。在许多方面与井冈山颇为相似：第一，从革命形势上看，都是创建于全国革命的低潮时期。第二，从环境条件上看，除地形条件相类似外，井冈山地区有袁文才、王佐领导的地方农民武装，他们愿意同工农革命军相结合；而浙西南有陈凤生、陈丹山、卢子敬领导的进步农民武装组织支持红军。第三，从创建模式上看，浙西南根据地是由毛泽东培养出的干部，运用毛泽东的井冈山斗争经验、“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创建起来的，其斗争形式，基本类似。因此，丽水人民把浙西南游击根据地亲切地喻为“浙江的井冈山”。

一、组成挺进师，插入“敌心脏”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严峻形势下，进行了中央主力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为了策应中央主力红军的长征，在长征前3个月，党中央派出红七军团6000余人组成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以吸引和调动“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这支部队到达皖赣地区后，遭国民党重兵“围剿”，于1935年1月下旬在江西怀玉山地区失利，先头部队500余人在粟裕、刘英率领下突围抵达闽浙赣苏区。根据中央指示，突围部队迅速组建挺进师，以粟裕为师长，刘英为政治委员，立即率部进入浙江境内，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苏维埃根据地，以积极的作战行动，打击、吸引和牵制敌人，保卫闽浙赣基本地区和邻近的根据地，并从战略上配合主力红军的行动。

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家，还是陈诚、汤恩伯等一大批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老家，蒋介石统治集团中的主要成员，不少是浙江人。而且浙江是国民党财阀赖以生存的基础，四大家族中浙江便占了蒋、陈两家。因此，浙江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早在1933年就被毛泽东称之为“敌之根本重地”，如果把南京比作国民党统治“首脑地区”的话，浙江便是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蒋

介石集团对浙江的控制十分严密，红军在浙江境内建立起新的根据地，那就等于在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心脏地区”扎上了一把尖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2 月，挺进师正式成立，全师共 538 人，步枪 445 支，轻重机枪 12 挺。人数虽少，但干部战士配备极为精干。3 月 23 日，挺进师进入浙西南的龙泉。25 日，部队在龙泉宝溪乡歼灭驻防的“浙江保安基干队”一个中队，取得入浙首战胜利，拉开了在国民党统治“心脏地区”开辟根据地的战斗序幕。

挺进师进入浙江，使得国民党大为震惊。4 月下旬，当敌获悉红军正在庆元县斋郎地区活动时，即调浙江保安团李秀部、福建保安团马洪琛部、大刀会及地主武装 3000 余人，妄图围歼挺进师。斋郎地处百山祖山区，海拔高达 1248 米，山高林密，地势险要。4 月 28 日上午，战斗打响，挺进师居高临下打得敌人落荒逃窜。此役共毙伤敌 300 余人，俘敌约 200 人，缴获重机枪 1 挺，轻机枪 4 挺，长短枪 150 多支，子弹万余发。

斋郎战斗，是关系到挺进师今后能否在浙江立足的关键性一战。它迫使龙泉河以南之保安团队转攻为守，龙泉河以北则因兵力南调而空虚，一些地主豪绅纷纷逃离浙西南，这样挺进师就获得了开辟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有利时机。

二、建立苏维埃，分田又分地

斋郎战斗后，挺进师到达松阳县的安岱后一带，受到以陈凤生、陈丹山、卢子敬为首的当地农民武装组织“青帮”的热烈欢迎。“青帮”成员，绝大多数是贫苦农民，他们深受地主豪绅的剥削和欺凌，有着朴素而又强烈的革命愿望，其中相当多的人曾参加过 1928 年至 1930 年的革命暴动。挺进师一到，他们就积极靠拢，主动表示希望得到共产党的领导，“青红一句话，永世不分家”（“青”指“青帮”，“红”指红军）。有了“青帮”的支持，挺进师在浙西南有了群众基础，立稳了脚跟。

刘英、粟裕都曾跟随毛泽东参加革命斗争，他们深受毛泽东的教诲，对毛泽东军事思想有着深刻的理解。6 月上旬，在松阳县小吉村召开的挺进师政委会上，刘英、粟裕决定按照井冈山革命斗争经验、“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在浙西南创建游击根据地。

毛泽东的井冈山革命斗争经验，其核心内容是：在党的领导下，把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政权和土地革命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为此，挺进师政委会决定首先加强根据地内党的建设，成立中共浙西南特委。并派出得力干部开展基层党建工作，经过努力，根据地内除建立中共龙（泉）浦（城）县委外，还先后建立了 4 个区委和 30 多个党支部，发展党员 324 人。在党的思想建设上，加强对党员、干部、战士和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坚定毛主席井冈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革命信念，要求党员、干部、战士学会两套本领：做群众工作和打游击。并在部队的管理上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军队纪律，不拿工农群众的一针一线。

在党的领导下，根据地内很快像井冈山时期一样成立了革命政权，建立了竹溪、玉岩、住

溪、王村口等 4 个苏维埃政府和黄南等 19 个乡苏维埃政府，157 个村苏维埃政府以及分田委员会。并像井冈山时期一样普遍开展了插标、分青苗和分田地运动，到处都是“分田分地真忙”、穷人翻身解放扬眉吐气的新景象。随着革命政权的建立和土地革命的开展，浙西南广大贫苦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得到翻身，使人民群众充分认识到“红军是人民的军队，共产党是人民的大救星”。大批青壮年纷纷加入红军或地方游击队，革命队伍迅速壮大。

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也取得节节胜利。武装斗争的战略方针，逐步实行了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转变。在遵循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朱德制定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游击战略方针的基础上，还提出了“敌进我进”的新战术。不但打败了国民党浙江当局的多次“清剿”，还主动出击，在 7 月底、8 月初发起了“八一示威”行动，共袭击了 19 个大小城镇，缴获长短枪 200 余支，轻机枪 2 挺，破坏了一些敌军重要的交通、通讯线路，给了国民党当局以有力的打击。以松阳县安岱后、龙泉县住溪、遂昌县王村口为中心方圆 200 余里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全面形成，挺进师、游击队和地方干部队伍壮大到 3000 余人，成了浙江国民党统治“心脏地区”的“井冈山”，映得浙西南大地一片红。

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建立，在党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和意义。红军主力长征后，全国革命陷入了低潮，各地的革命力量大多处于隐蔽、保存力量状态，国民党甚至声称“红军被消灭了”。而此时，挺进师却在蒋介石的老家建立根据地，给了广大人民群众一个鼓舞，对蒋介石统治集团是一个打击，国民党惊呼：“浙江素称平安之区，自粟、刘窜浙，匪化已波及全省，以目前形势而论，浙江共匪不亚于四川、江西。”粟裕说：“这是全国革命低潮中的一个局部高潮。”中央军委编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一书评价说：“这派喜人的革命形势，犹如在浙西南夜空中升起一颗启明星。”

三、血战罗卓英，保卫浙西南

“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建立，等于在蒋介石的后院修起了革命的堡垒，枪口相对，这必然是他无法容忍的。”为此，蒋介石不得不在 1935 年 8 月，调集中央军五大主力部队之一的第十八军约 7 万多兵力对付挺进师。

第十八军是陈诚、罗卓英赖以发迹的蒋介石嫡系王牌军，其师、团长都是清一色的黄埔校友。这支部队装备了从德、法等国进口的武器，是国民党最精锐的、战斗力最强的军队之一。

9 月中旬，罗卓英部队采取“步步为营”、缩小包围圈等手段，开始向革命根据地发起全面进攻。凡有 5 户以上的村子，都派兵力驻守，不足 5 户的村子，则强迫居民搬迁，房屋茅棚付之一炬。

9 月 21 日[①]，挺进师在龙泉上田召开政委会，决定：为了保存挺进师的有生力量，由粟裕、

① 时间有误，应为 9 月上旬。

刘英率主力跳出包围圈，实行“敌进我进”的方针，敌进犯我根据地，我则进击敌人后方的空虚地方。黄富武率部分武装留在浙西南，保卫根据地。

留守浙西南的红军和地方游击队，面对极端残酷的形势，毅然以铁的纪律执行了政委会的决定。以死相拼，致使敌人每占领一块地区都得付出惨重的代价，在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悲壮的一页。

9月28日[①]，敌进攻龙泉住溪，根据地军民顽强抗击。10月6日，在茶园坑战斗中，中共龙浦县委书记方志富壮烈牺牲。当敌人进攻王村口时，红军和游击队运用“滚乱石”“吊木排”等原始战法砸得敌人死伤一大片。10月30日，挺进师政治部主任、浙西南特委书记黄富武被捕，后被杀害于丽水大水门。10月31日陈凤生被捕，敌人将他押至驻龙泉的国民党军第十一师师部，残暴地用铁钉将他钉在墙上，逼他投降，但陈凤生坚贞不屈，最后曝尸龙泉街头。卢子敬、陈丹山也先后被杀害。

由于寡不敌众，至1935年冬，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基本丧失。根据地内的战士、干部、群众先后被捕千余人，牺牲失踪上千人。其中，仅被国民党第十八军抓捕有据可查的就有820人，被杀害370人。粟裕说：“敌人的烧杀惨无人道，对我们的同志不仅是枪毙和砍头，甚至把烈士遗体当众‘开膛’，割下心肝下酒。被捕杀和活埋的基层干部不计其数。”烈士的鲜血染红了山山水水。

四、再战刘建绪，挫败敌阴谋

1935年10月5日，刘、粟率挺进师主力突围抵达福建省寿宁县，与闽东红军叶飞部会师，成立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和临时省军区。临时省委由刘英任书记，粟裕任组织部长，叶飞任宣传部长。临时省军区由粟裕任司令员，刘英任政治委员。

由于当时罗卓英兵力仍然被英勇的浙西南军民牵制住，所以浙南地区的反动势力就显得相对空虚，于是临时省委决定开辟浙南根据地。为了掩护浙南的开辟，1936年2月，临时省委决定，将挺进师主力组成浙西南独立师，由粟裕率领返回浙西南活动。1936年6月1日，“两广事变”爆发。蒋介石因准备与“两广”军作战，从浙西南调走了罗卓英的第十八军。临时省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重建浙西南特委，由许信焜任书记。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浙西南根据地得到恢复，并发展了一些新地区。至同年10月，挺进师活动范围扩大到温州、台州、处州、金华、衢州等地区的30多个县境。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停止了对陕甘宁中央红军的军事进攻，并许诺联共抗日。但鉴于浙江他的老家战略位置的重要性，采取“北和南剿”的方针，从湖南调集重兵10余万人，由他的得力干将刘建绪指挥，对闽浙赣皖四省红军进行“清剿”。中共闽浙

① 应为9月20日。

边临时省委决定采取“机动灵活、寻机作战相结合”的方针，将部队“化整为零”，分散行动。刘英在飞云江两岸活动；粟裕率挺进师主力在浙西南活动。

1937 年 2 月，刘建绪对浙西南开始“清剿”。浙西南特委书记许信焜和副书记杨干凡先后牺牲。粟裕率部一路转战，以其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摆脱敌人，于 4 月抵达遂昌门阵，与红军谢文清部会合。门阵位于三县交界处，北倚大岭，南控金衢平原，经济繁荣，有“小上海”之称。同时地形险要，有利于队伍的隐蔽。红军以门阵为依托，建立新的根据地开展斗争，并调整斗争策略，注重团结“中间力量”，建立一批乡、保“白皮红心”两面政权。在经济上采取新的政策，将过去打土豪、“抓兔子”筹款的办法，改为根据部队需要和地主负担能力征收抗日捐，不过份暴露自己。这样部队既可主动出击，又可隐蔽休整，成功地坚持到国共全面合作抗日的实现。

实行隐蔽的日子，也是挺进师最艰苦的日子。部队不断地在敌人的“网眼”中穿梭，绝大部分时间都是风餐露宿，常常是缺粮断炊，只能以野菜、草根、树叶充饥，非战斗减员时有发生。但不论如何艰苦，除个别分子外，广大指战员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矢志不移，因为他们坚信共产主义一定会胜利。

在敌人撒下的“天罗地网”中，浙西南红军得以生存，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拼死相助。老区群众以舍己为人的崇高品德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保护着共产党，保护着红军，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庆元县三堆群众吴思澄身上被割 18 刀，龙泉县叶张宝被割掉耳朵、鼻子，至死不肯出卖红军。景宁县黄竹山村刘章富一家 7 口，父母兄长 3 人被杀，年幼的 4 个兄弟仍然不肯出卖红军。

在浙西南人民的冒死支援下，浙西南红军经过 8 个多月的艰苦奋战，终于挫败了蒋介石“北和南剿”的反动阴谋，迎来了国共合作抗日的新时期。

五、汇入新洪流，红旗永飘扬

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侵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中华民族全面抗战从此开始。不久，国共双方开始谈判合作抗日。在这种背景下，9 月 16 日，刘英在温州与刘建绪军方代表进行了和谈，10 月 14 日，粟裕在门阵与国民党遂昌县当局谈判成功。18 日，粟裕率部告别浙西南父老乡亲，到平阳和刘英会合。

1938 年 2 月底，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组织部长曾山到浙江，传达东南分局指示，宣布浙江红军编为新四军，由粟裕率领开赴皖南抗日前线。3 月 18 日，粟裕率首批浙江红军 400 余人出发，经云和、丽水、遂昌开赴皖南，以后“成为在抗日战争中最好的队伍之一”。

鉴于浙江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曾山强调：浙江“不能放弃，是十年血战的成果，一定要保存”。决定刘英留浙主持工作。刘英以后担任了中共浙江省委书记。

红军挺进师的斗争，是中央红军长征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从不同方向进行长征的一支中央红军，最终的落脚点是在浙江——蒋介石的老家、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他们以坚

强的革命意志和顽强的斗争精神，在这里坚持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斗争。在敌人的心腹区域沉重地打击了敌人，较长时期地吸引和牵制了敌人相当数量的兵力。无疑在一定程度上策应了党中央和主力红军的战略行动，也在一定程度上配合和掩护了邻近兄弟游击区的斗争。并把浙西南建成为中国革命在南方的一个战略支撑点。这个战略支撑点在以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她为浙西南重建了革命基业，播下了革命种子。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建立的党组织和革命有生力量不仅保存下来，而且在以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从小到大，不断发展壮大，直至今天，再也没有中断。

第二，为以后的浙西南革命留下了领导者和中坚力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浙西南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仍然是挺进师老红军。他们坚持浙西南革命斗争 14 年，使浙西南红旗永飘扬。

第三，红军挺进师留下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激励着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挺进师留下的丰富的白区斗争经验教训、领导艺术和策略思想，通过老红军传授给新同志，继承和发扬下去，使我们的同志即使处于不断变化的新形势下，也能有效地指导工作。

第四，红军挺进师在浙西南留下了广泛深刻的政治影响，为以后浙西南革命的发展奠定了广泛坚实的群众基础。

因此，在以后的抗日战争中，浙西南一度成为东南抗日前哨——浙江的抗战政治、文化中心，中共浙江省委机关驻地；在解放战争时期，浙西南游击根据地与浙南、浙东一样，成为浙江三大游击根据地之一，并比原来老区范围更加扩大了。解放后，丽水成为了浙江省唯一的所有县（市、区）都是革命老根据地县的地级市。

在创建和坚持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斗争中，许许多多党的优秀干部、红军战士和数不清的革命群众，抱着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抱着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为了我们今天美好的社会主义生活，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们的一生虽然短暂，却是那样的光辉灿烂。他们的精神将万古长青！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将永远激励着丽水老区人民奋发图强、奋勇前进。

（原载《丽水党史》2005 年第 2 期，诸葛蓉执笔）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浙西南的斗争及其意义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

诸葛蓉

前　言

这是主力红军长征前三个多月，由中共中央、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从中央苏区派出的一支担任先遣任务的中央红军部队。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减轻国民党军队对中央根据地的压力，掩护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实施战略转移，为了北上抗日，红军先遣队肩负着党和人民赋予的重大历史使命，深入闽浙赣皖诸省国民党统治区，历时6个月，行程5000公里，浴血奋战，顽强斗争，牵制了十几万国民党军队，策应了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和尔后的战略大转移，为中国革命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红军先遣队的斗争，是主力红军长征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今天，我们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没有忘记参加长征的革命先辈。同样，我们也不能忘却这支由于担任掩护主力红军长征，而没有参加长征的部队，这支由于孤军奋战、敌我力量过于悬殊，最终遭到失败、结局悲壮的英勇部队。

限于篇幅，本文仅取红军先遣队整个历史中的有关转战浙西南的一段，从中反映红军的英勇气概和严明纪律，以表达丽水人民对先遣队红军革命先辈们的深深怀念之情。

一、组建先遣队，由赣入闽浙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后，继续入侵热河和长城口，进犯察哈尔、冀东，威胁平津。面对日本侵占了中国大好河山，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停止内战，抗日救亡。但是，蒋介石却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一面对日军的侵犯退让妥协，一面加紧镇压工农武装革命。1933年10月，100万国民党军队向各个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其中，50万兵力重点进攻中央根据地。由于中共临时中央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不断遭到严重的失利。1934年4月广昌失守之后，中央红军在根据地内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已极少可能。

面对民族矛盾、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和中央根据地危急的局面，为了宣传和推动抗日，调动

和牵制围攻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队，减轻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压力，并准备实施战略转移，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中革军委）决定抽调主力红军一部--红军第七军团，组建抗日先遣队北上。6 月下旬，红七军团军团部和所属的第十九师奉命改编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对内保留军团建制。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政治部主任刘英、参谋长粟裕。曾洪易作为中央代表随军行动，并与军团长、军团政委三人组成红七军团军委，决定和处理重大军事政治问题。以原十九师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 3 个团为基础，扩编为一、二、三师，原团长胡天桃、王裔三、王永瑞分别担任三个师的师长。全军 6000 人，长短枪 3000 支。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分别发出给红七军团的作战训令和政治训令，指明抗日先遣队的主要任务，是深入国民党统治区的深远后方，宣传推动抗日运动的发展，开展游击战争，在敌人最受威胁的地方，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调动围攻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队，并具体部署了红军行动计划。

7 月 7 日，红七军团集结在中央根据地首府——江西省瑞金县，在红场上接受党中央、中革军委领导人的检阅后，开始了北上行动。

红军从瑞金出发，经古城进入福建省境内，先后打下童坊、连城、大田等地，经樟湖坂，抢渡闽江，突入闽中，又攻克古田的黄田，再打水口、福州、降虎，进入闽东。连打连江、罗源、宁德、扶摇、赤溪等地。一路行军、宣传，一路打仗。8 月 2O 日，红军先遣队在闽东红军独立团的配合下，一举攻克福安县穆阳镇，缴获甚多，国民党守敌仓惶向县城逃跑。21 日，红军先遣队向闽浙边境前进。26 日夜，红军先遣队从寿宁县托溪出发，途经硖头村，进入浙江境内庆元县龙溪乡荡口村。先头部队抵达岙里村水口时，首先遭遇阻挡的是当地的地主反动武装大刀会。

二、由赣闽入浙，占领庆元

大刀会是清朝末年农民秘密团体白莲教的一个支派。大刀会内分总坛、分坛两个级别。总坛最高职位为法师。大刀会宣传的是一套愚昧无知的封建迷信思想，声称参加大刀会，学会法术，刀枪不怕，外不受欺，内可保家。入会要举行仪式，喝鸡血酒，歃血为盟，立下誓言要将心身托付给玉皇大帝，往后一言一行愿受大刀会戒律管束。大刀会在举行武装行动之前，都要各食朱砂药丸子：法师在黄纸上画符，装神弄鬼胡念咒语之后，将纸烧成灰，将灰倒入酒水中，掺入草药粉和朱砂，捏成丸子让会徒吞下，声称“此为法丹，吞下去天神附身，刀枪不入”。吞了朱砂丸子的会徒，药力发作，神志不清，冲杀时，见不同服饰的人，就乱砍乱杀，无所顾忌，凶残至极。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闽浙边境山区的寿宁、政和、松溪、庆元、景宁等县，已有大刀会组织。地方上的国民党反动乡保长和土豪劣绅，为了维护自身统治地位和加强对贫苦老百姓的剥削压迫，不惜出资收买反动法师，招募地痞流氓做头领，以学艺为名，诱骗农民入会。大刀会逐步沦为地主的反动武装。

红军先遣队向闽浙边境挺进的消息传到浙江境内庆元县，引起反动势力的恐慌。

8 月 27 日拂晓，岙里村一带大刀会 30 多名会徒身着怪服，手舞大刀，口中念念有词，成群结队扑向红军，红军大声劝说大刀会会徒不要替反动派卖命，宣传共产党、红军是为穷苦人谋利益的，希望大家团结起来，抗击日本侵略。但是大刀会会徒不听劝阻，高举黄旗，挥舞大刀，迎面直扑而来。在这危急时候，红军被迫开枪自卫还击。冲在最前边的会徒被击倒在地，其余会徒才知道，吃了朱砂丸并非刀枪不入，钢枪子弹还是能够打死人的，于是纷纷逃回去。红军见大刀会逃走了，也不追赶，往举溪进发。

举溪村是国民党庆元县荷地区署所在地。区长得到红军已抵达寿宁、庆元边境的消息，即向国民党庆元县县长张致远报告：“红军约有千人，枪半数。”区长留下 2 个班的兵力和数十名大刀会会徒在举溪拦阻红军，自己带上一个班的自卫队往落岭逃去。

红军抵达举溪村口时，正是吃早饭时候。留守的敌人见红军到来，便开枪阻挡。先头部队红军从步蟾桥头下水，以溪坎为掩体，涉水而上 1 公里冲进村内。后续部队派出一个小分队沿山边包抄敌人。守敌逃回碉堡不敢出来。这是一个六角形高三层的大碉堡，可驻扎一个连的兵力。红军进村后，从群众中了解到碉堡内只有 2 个班的守敌，于是写了一封信，让敌军士兵家属用竹竿挑进碉堡内，宣传共产党、红军的宗旨和政策，说明红军北上抗日的目的。守敌复信红军，表示不再阻挠。于是红军将碉堡警戒起来，并不攻打。当天，红军在举溪宿营。

红军在村里书写、张贴标语：“欢迎大刀会弟兄们与红军共同北上抗日！”“打倒土豪劣绅！”署名“北上抗日先遣队”。红军没收土豪劣绅家里的粮食、衣物，分给贫苦农民。

红军打听去庆元县城的路线。先头部队请村里的裁缝师傅吴日大做向导，去岭头方向侦察敌情。不料在小溆头村村口，遭到大刀会的偷袭，向导吴日大身亡，2 名红军负伤。红军击溃大刀会，毙大刀会会徒 2 名。

在此同时，国民党丽水保安处派第一、第二两个军士队前往庆元增援。军士队第一队到小溆头，召集大刀会会徒 2OO 余人，于当天夜里在离小溆头村 500 米的水口设防：大刀会埋伏在路边偷袭，军士队埋伏在山脚下截击，阻挡红军前进。

28 日凌晨，红军先遣队离开举溪向县城进发。行至小溆头水口，遭事先埋伏的敌军开枪阻挡。红军以猛烈的火力压倒敌军，不到 1 个小时就击溃敌军，活捉敌军士队第一队 30 余人，击毙敌连长 1 名、士兵数名。小溆头战斗胜利，迫使龟缩在举溪的守敌，丢弃碉堡往蔡地方向逃遁。红军清理了战场后，经杨家庄、官局到温岙背，又突然遭到当地大刀会的拦阻。红军击溃大刀会，击毙 3 名挡道的大刀会会徒后，继续赶路。行至濛淤村时，已是午后。红军后勤炊事兵在这里与国民党丽水保安分处军士队第二队、庆元县保安一中队相遇。原来，县长张致远接到荷地区长电话后，即派县保安团一中队前往举溪增援军士队。县保安一中队和丽水保安分处军士队第二队得到红军已冲破军士队第一队的布防，向庆元县城进发后，抄小路从石记岱尾追而来。趁敌人误认为这支红军后勤队伍是国民党部队之机，红军炊事兵向敌军展开突然袭

击，击溃敌军，击毙敌保安队军官 1 名，俘虏敌兵数名。敌军军帽、刀枪丢弃一地。红军牺牲 2 人，负伤多人。

红军继续往县城进发，一路小战不断。驻守离县城 2.5 公里的周墩的县保安团独立分队见红军人多势众，丢弃碉堡从镜山峦山路往龙泉方向逃去。红军连克周墩、后田街头碉堡，直逼庆元县城。企图守住县城等待援军的县长张致远见此情形，带上几名侍卫弃城而逃。红军先遣队第一师占领城外南面主要高地，第二师从后田街顺流直下东门城外，派其他部队沿城墙外线布守。城内已无敌军防守。下午 4 时，红军先遣队入城，司令部设在县政府内，一、二师分驻城内和后田，三师驻守周墩村，担任后卫。

29 日，红军在城内休整。红军分头到群众中宣传革命，宣传抗日，书写、张贴标语。根据群众要求，镇压 3 名反动军警，分掉几家巨富的粮食、衣物。

30 日拂晓，红军先遣队沿松源河直下，经庆元、松溪边境的新窑、黄坛，再上行。上午 10 时许，先头部队抵达竹口。红军先遣队前卫师驻竹口，其余部队和军团部分别驻后边的黄坛、新窑一线。

三、竹口大捷

竹口地处庆元、龙泉交通必经之道上。东依大山，西傍溪流，再往西，是浙闽边界山脉。从竹口村去龙泉，要过村边木桥，往北越过田野，从瓦窑山西边山坡穿过后坑桥，然后沿溪流东岸继续北上。瓦窑山距竹口一公里，山高仅 60 米，北坡比南坡陡，东临溪流，是控制山口的一处重要地方。红军先遣队前卫师到竹口后，在瓦窑山上部署了一个连，担任警戒任务，在培兰亭安排了 2 名步哨。

在此同时，经蒋介石批准从浦城抽调驰援到庆元的浙江保安第三团(欠一营)、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抽调的集中在丽水训练的保卫团 2 个基干队，先后到达龙泉、庆元交界重镇小梅。浙保第一纵队第二支队司令杜志成听信张致远的报告，认为红军仅千人，在庆元城附近，于是率保安第三团，由县保卫团带路，往南向庆元进发。下午 4 时，敌军接近竹口山口时，发觉红军已守住瓦窑山隘口。红军与国民党军一场激烈的遭遇战就此展开。敌军一个连从小溪东岸进攻红军，一个连占领山角林尖。杜志成率其余部队通过后坑桥，在桥西南高地部署一个机枪连，指挥所和迫击炮分设前后岗，主力则绕道至瓦窑山西侧的官山一线，在迫击炮和轻重机枪的掩护下，从西边向瓦窑山侧后攻击。

军团部接到前卫师指挥部报告，即令第三师一个营负责断后，在黄坛堵截敌援兵，军团部率部赶往竹口。军团司令指挥部设在村对面山上，寻淮洲、粟裕等军团首长亲临阵地指挥。

红军突遭攻击，不了解敌军实力与意图。前卫师指挥所撤到村后东侧的东山寨，向瓦窑山阵地增派 2 个连，在枫树堂布置下部分兵力，在村西侧对面山山头设兵担任警戒。浙保三团曾在江西玉山一带参加过“围剿”闽浙赣苏区，与红军有过作战经历。团长何世澄以为红军占据

瓦窑山，但没有碉堡，不可能坚守，于是亲至官山督阵，一个连被打垮，又调一个连，曾一度推进到东山亭，但伤亡惨重，倾其全力争夺瓦窑山。红军坚守阵地，顽强抵抗，连续打退敌人十几次冲锋。红二师占领东山亭前高地，军团指挥所从对面山移到东山亭指挥。

战斗在激烈进行中。一个红军加强师赶到瓦窑山支援，在对面山和366高地分别部署部分兵力以侧击进攻之敌。天黑前，红军组织反击：东路前卫师的一个连，跨过小山涧，从山角林尖东面山沟向北穿插，前去占领后坑桥东侧的山地。西路是加强师主力，避开官山的正面，从下济桥至洋源一线向前后岗侧后突击，两次猛冲，占领制高点。在红军猛烈反击下，前后岗上的敌指挥所仓惶后撤，迫击炮连和后坑桥西南高地上的机枪连弃炮弃枪，兵士四处奔逃。红军控制住后坑桥隘口和官山之敌，对瓦窑山之敌形成三面包围态势。但因东侧山地仍被敌居高临下控制，天已黑，保安队大部得以乘黑夜逃脱。杜志成率残部于天亮时逃到小梅，急电报告。省保安处为防红军再夺龙泉，令杜部退至龙泉城，固守待援。

31日早晨，红军打扫战场后继续北上，至小梅休整。从俘虏供词中得知国民党庆元县长仍在竹口一带，于是红军小分队奉命返回竹口打扫战场、搜寻残敌。9月1日上午，红军在后坑村活捉张致远。竹口战斗，红军击溃敌军，歼敌300余人，俘虏200余人，缴获迫击炮2门，轻重机关枪11挺，长短枪200余支，弹药若干。浙保三团团长何世澄自杀身亡，庆元县保卫团副团长丁南被击毙。红军牺牲20余人，竹口战斗以红军胜利结束。

四、转战龙泉西南，分粮物济贫，宣传革命

8月31日早上，红军先遣队离开竹口，经后坑桥继续北上，到达曹岭、龙泉小梅休整。

曹岭、小梅地处庆元西北、龙泉西南部，一水之隔，货物装卸码头地，商贸繁华。受国民党反动宣传影响，老百姓不明真相，听说红军到来，许多人逃往山上躲藏起来。红军在街中心“行宫”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共产党、红军的政治主张，宣传抗日救亡，演出“农民斗争求解放”的文明戏。红军将从土豪劣绅家里没收来的粮食和布匹分发给贫苦农民。红军的行动，打消了当地老百姓的疑虑，躲到山上的人陆续回家，商店照常营业，农民照常生产。红军经过调查了解，对殷商富户发出捐助抗日经费的通知，对欺压农民的土豪劣绅和克扣工人工资的老板实行惩治。9月1日和2日，红军先遣队相继离开小梅，经查田溪口往北，跨过工兵搭建的浮桥，从野窖进入八都。

八都是龙泉西南重镇，商业繁华，也是丽水通往福建浦城的咽喉之地。土豪富商、国民党区公所人员和盐务兵得知红军过境，仓惶逃避。9月2日上午9时许，红军先头部队到达八都镇黄岭头，占领棺山儿敌军碉堡，砍断敌通讯电话杆进入八都镇。八都镇的老百姓也因受反动宣传影响，许多人逃往山中躲藏。红军将店铺贴上封条，张贴公告，防止坏人趁机偷窃。红军纪律严明，镇内秩序井然，躲避到山上的人们陆续回家，商店又照常开张。红军买米买菜购物使用的是中央苏维埃政府的纸币，货主店家可将红军给的纸币（群众称“红军票”）到随军银行

去兑换银元、铜板。随军银行设在一户黄姓家中。红军沿街张贴宣传北上抗日的标语，张贴保护工商业利益的布告。根据群众的要求，红军没收土豪劣绅的财物，开仓济贫，镇压平日欺压群众的土豪劣绅。

9 月 3 日早晨，红军先遣队离开八都，沿丽浦公路到上行，走山路经过木岱口、塘上抵达宝溪乡的溪头村。红军指挥部设在天主教堂里，电讯总机、随军银行分驻群众家中，红军分别宿营在庙宇、碗厂。红军访贫问苦，宣传革命，告诫群众：红军走后，国民党反动军队会来抓人、抢东西，要及早提防。第二天凌晨，红军打扫干净住地，归还向老百姓借用的铺板用具，告别群众，从溪头、坑口出发，经岔门过福建省浦城县的东坑桥，进入闽北苏区。国民党军四十九师慑于红军的声威，不敢贸然追赶，每天都与红军保持一定距离，只是尾随红军之后。

五、红军先遣队在浙西南斗争的意义

红军先遣队虽然转战浙西南只有 10 天时间，而且只在庆元、龙泉两县局部地区，但是意义却是多方面的，也是长远的。

一是红军先遣队向浙西南人民宣传了共产党、红军的政治主张。红军先遣队出发时携带着中央苏区赶印的“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等文告 160 万份。红军先遣队一路散发、张贴。除此之外，每到一地，还书写标语、召开群众大会进行宣传。红军所到之处，群众从害怕、疑虑到接近、欢迎。红军的严明纪律更是给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民群众从红军的言行中，认识到共产党和红军是人民群众自己的队伍，是为穷苦人民谋利益的。共产党和红军的威望和影响，不断地传播到浙西南各地。

二是红军先遣队在浙西南的斗争调动和牵制了国民党兵力，打击了地方反动势力。红军先遣队占领庆元县城，对地方国民党反动统治是个重大打击。国民党龙泉县长何浩然急雇民船 7 只，将贵重私物并眷属悉数转移到船上，弃城逃跑。红军竹口之战击溃浙江保安第三团等部队，歼敌甚多。红军所过之处，土豪劣绅及其地方反动武装闻风而逃。蒋介石电令调遣的湖北集训的原十九路军所属四十九师伍诚仁部，被红军一路牵制住。国民党省保安处长俞济时急调浙保一团李秀部从泰顺赶往庆元救援，令省保安第四分处司令陈式正赴龙泉指挥截击红军。9 月 1 日，国民党 3 架飞机从泰顺方向飞临庆元县城上空，而后往竹口方向飞去。在后坑桥一带盘旋，而后一架飞往小梅方向，2 架飞往浦城方向。敌人对红军先遣队的围追堵截没有奏效，反被红军调动和牵制。

三是红军先遣队为浙西南留下了革命的种子。9 月 9 日，红军先遣队到达闽北古楼。一师五十五团二营营政委洪家云奉命率部 150 余人护送伤员和物资去崇安坑口，完成任务返回时，大部队已走，路途上又逢河流涨大水，无法赶上大部队，因此被留在闽北，编入闽北独立师第三团（简称红三团）。红三团在崇安、浦城、江山、龙泉、遂昌一带打游击，开辟游击根据地，一直坚持到 1935 年 3 月，由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余部组成的红军挺进师回到闽浙边，

准备进入浙江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红三团才编回到红军挺进师。红军先遣队虽然于1934年9月离开了，但他们的部队还坚持在龙泉、遂昌边境地区打游击，到了1935年3月以后，先遣队的余部在刘英、粟裕率领下，更是以浙西南为重点，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继续着先遣队的未竟事业。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浙西南的斗争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原载《丽水党史》2006年第3期，作者单位：中共丽水市委党史研究室）

关于红军挺进师若干史实的考证

周德春

1935年至1937年，粟裕、刘英率领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在浙江开展的游击战争，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军史、中共党史乃至中国革命史上有着重要历史地位。关于挺进师的斗争史实，由于史料缺乏等原因，中共党史学界一直存在部分说法不准确。为此，特作如下考证。

一、关于中共浙西南特委的建立时间

中共浙西南特委是挺进师进入浙江最早建立的特委级中共组织，她的建立，对挺进师开展和坚持斗争乃至对游击根据地的建立，都起着重要作用。关于浙西南特委的建立时间，中共党史界普遍认为是1935年5月或6月。如《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组织史资料》《中共浙江党史》《中国共产党浙江省丽水地区组织史资料》[①]等，均如此记载。笔者认为，这不准确。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是浙西南特委第一任书记宗孟平的牺牲时间。

关于宗孟平的牺牲情况，粟裕在《回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中说："挺进师组织科长兼地方工作科长、浙西南特委第一任书记宗孟平，于1935年5月在龙泉茶岙岭战斗中牺牲。"宣恩金在《浙西南革命斗争回忆》中说："二纵队于龙泉茶岙岭与敌人血战一夜，打垮敌人一个营。宗孟平在这次战斗中光荣牺牲。"张子斌在1981年11月写的《难忘的战斗岁月》中说："1935年6月，我军退到草鞋岭（也叫茶岙岭，属龙泉宝溪乡）与敌人血战一夜，打垮敌军一个营后，分为两路，一路100人左右，另一路50人左右，我跟随宗孟平带领的50人这一路。部队转移到浦城五家垟，后又转到遂昌砀下附近一户人家住宿，第二天早晨地主武装从砀下打来，宗孟平中弹牺牲了。"

根据以上同志的回忆，结合《东南日报》《浙瓯日报》关于国民党武装与红军在浦城、遂昌、龙泉边界发生战斗的报道，就得出宗孟平在1935年5月或6月牺牲于龙泉茶岙岭战斗的结论欠妥。以上同志对于宗孟平牺牲的时间、地点说法不一，张子斌随宗孟平部活动，所回忆情况比较具体、可信，但事隔几十年，其回忆的时间也未必准确。至于《东南日报》《浙瓯日报》的

① 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浙江省档案馆：《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组织史资料》，人民日报出版社1994年版，第161页；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浙江党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286页；中共丽水地委组织部、中共丽水地委党史研究室、丽水地区档案馆：《中国共产党浙江省丽水地区组织史资料》，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20页。

报道，虽有较具体的时间，但只说国民党武装与红军在浦城、遂昌边界地区发生战斗，未必是宗孟平牺牲的那次战斗（宗孟平牺牲前后的一个多月中，挺进师部队分作多路并不止一次活动在浦城、遂昌、龙泉边界地区）。事实上，宗孟平是1935年7月7日牺牲于浦（城）遂（昌）边的横源坑（属浦城忠信乡）。依据如下：

1935年参加砀下“剿共义勇队”的周春石、周观竹和埋葬宗孟平遗体的连樟和以及砀下村的其他老人于1985年4月22日回忆说：“1935年古历（农历）六月初六日，从浦城方向来了四五十个红军到横源坑借宿，到横源坑时已近黄昏时分。当时横源坑只有一户人住，姓邹名兰恢（又名邹才雅），是砀下村地主周世瑞（又名周正芳，解放后已镇压）的山佃……连夜……向剿共义勇队队长周世瑞报告，周世瑞立即召集……义勇队……县基干队……连夜出发，到横源岗时天刚放亮……从横源岗山上……看见邹兰恢家里点着松明火，就架起台枪瞄准邹兰恢的房子开枪（台枪由福建砀垟村的谢海仁背着放的）。当时那个人（宗孟平）被打成重伤，但尚未断气……红军立即向山顶撤退……红军撤退以后，义勇队到了横源坑邹兰恢家里，发现宗孟平受了重伤（头、眼、脚被打伤），躺在屋外路上，尚未断气。周世瑞叫砀下村的地保周育育和浦城的地保谢万生通知连樟和、邹兰恢，令他们把宗孟平抬到山脚溪滩边埋葬。他们就用三步梯把宗孟平抬出来。从横源坑到溪边约有两（华）里路，抬到阴潭口时因潭水较深，两边又是石壁，不好走，就把宗孟平丢入河里去漂，漂到阴潭口时看见宗孟平还是活的，邹兰恢就用锄头向宗孟平的头脑接连打了几下，宗孟平才死了……埋葬在阴潭口的溪滩上……在邹兰恢家里还发现红军的一箱机枪子弹、一个包袱和一枝白郎林手枪……包袱内还有一块刻写（蜡纸）用的钢板，当时他们认为是金板，谢世堂（砀下村的地主）一直保管下来，土改时农会把这块钢板没收来了。这次我们认为这是当年红军用过的东西，有保存的价值，把它带来了……”①

关于此事件的日期，也有人说是1935年农历6月24日。经核实，6月24日是洪家云率部为宗孟平报仇攻打砀下村的时间，宗孟平率部到达横源坑是6月6日而不是6月24日。他们回忆说：6月24日是毛阳天师庙做庙会的日子，那天因红军攻打砀下，大家逃的逃，躲的躲，庙会也没有做成；砀下村徐光田的父母回忆说：其长子是1934年古历6月24日出生的，1935年的6月24日刚好为孩子做周岁，因红军来打砀下，客人没有吃酒席都逃回去了；坑西村81岁的黄雄忠回忆说：因为那次红军是第一次到砀下，第一次来了红军就失利，横源坑就死了一个红军，曾经传说一时，大家都知道了，所以记得牢。

另外，笔者从遂昌县人民法院的档案中，查阅到了1950年审讯周世瑞的口供笔录和周世瑞的交代材料。其口供笔录和数次交代，所供袭击横源坑红军的情况与上述周春石等人的回忆一致。

上述当事人、知情者所说情况具体、明确，与张子斌回忆相符，所说刻蜡纸用的钢板之情

① 中共遂昌县委党史办公室：《关于宗孟平同志牺牲地点、时间的调查记录》，存遂昌县委党史办公室档案第A8卷。

与宗孟平的身份、工作相吻合。由此可见，宗孟平在茶岙岭战斗后，与洪家云等分开行动，率部于1935年7月6日（农历6月6日）晚活动至浦（城）遂（昌）边的横源坑（属浦城忠信乡），在横源坑借宿至次日晨，遭到砀下“剿共义勇队”袭击，负重伤后被害牺牲于7月7日。由此，笔者认为，“小吉会议（6月初召开）决定建立中共浙西南特委，是刘英回忆有误，小吉会议时宗孟平已经牺牲，小吉会议决定的应该是黄富武接任浙西南特委书记”的说法也不准确。关于浙西南特委的建立，刘英在《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中写道：

“……挺进师在浙行动第二阶段的情形及其所得经验与教训（1935年5月10日起至9月2日止）

（一）当时所处的环境及我们的布置

……

A、为了迅速的打通闽东闽北之联系和迅速的恢复二纵队活动地区之工作，派二纵队……为了加强该纵队的领导，派宗孟平同志为政委会随军代表兼行动委员会书记。

……

（三）当时我们的决定与部署的布置如下：

1. 以第一支队为南路军，由黄富武、刘达云、王永瑞诸同志率领由原地（遥岭）出发往十三坞向西北行动，转到龙泉、遂昌、江山、衢州一带行动。主要任务详（见）政委会决议。

……

3. ……一个月行动计划完成后，各部汇合于龙泉北部之小吉，召集了政治委员会，会议的主要内容，结束一个月的行动，和计划今后的工作；另方面，因部队扩大了，重新编制部队和配备干部，兹将详情分陈于下：

A、四支队扩充为四纵队……为了加强四纵队的领导起见，政委会派黄富武同志为随军代表兼政委会书记。

B、二纵队仍在江山、常山、衢州、浦城、龙泉、遂昌之线行动，仍以宗孟平同志为随军代表兼行动委员会书记。

C、一纵队则……并以许信焜、王永瑞、范连辉、王屏、刘达云五人组织行动委员会，以刘为书记，许副之，若条件成熟，一纵队则在该地长期行动，但须保持与政委会及军分区之密切联系。

D、为了领导便利和迅速布置各地区工作，政治委员会及军分区留云和、龙泉以北，处州、宣平、松阳、遂昌、衢州以南行动。

E、为了加强地方居民工作及党的工作与统一指挥起见，决即成立浙西南特委，以宗孟平、欧阳道、杨干凡、方志富、李金良、连明永、李宗州、王平、陈庚棠等组织之。并以孟平同志为书记……”

刘英在1940年写于皖南的这篇《回忆》，虽为事后回忆，但事隔不久，比其他同志的回忆

都早；从《回忆》长达 7 万多字以及文中“主要任务详（见）政委会决议”等字样看，刘英在写作该文时，带有文献资料；从内容看，刘英的回忆条理清晰：先是“为了迅速的打通闽东闽北之联系和迅速的恢复二纵队活动地区之工作，派二纵队回江、龙、浦、衢、常”活动，“为了加强该纵队的领导，派宗孟平同志为政委会随军代表兼行动委员会书记”，然后至 6 月初“各部汇合于龙泉北部之小吉，召集了政治委员会，会议……决即成立浙西南特委”；从小吉会议的内容看，刘英不仅对其他所有内容均回忆无误，而且对浙西南特委组成人员的人数、名单都回忆得如此详尽，怎么可能偏偏就“决即成立浙西南特委”“并以孟平同志为书记”回忆错了？

据此，笔者认为，刘英的回忆无误，中共浙西南特委是挺进师政委会于 1935 年 6 月初在小吉会议上决定成立的。

二、关于上田战斗的史实

上田战斗是指红军挺进师为保卫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在龙泉县境内的上田与国民党军进行的一次战斗。关于此次战斗的史实，党史界有过如下说法：1935 年 9 月中下旬，以第十八军为主力的国民党军大举进攻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挺进师袭击了进驻在龙泉县上东乡上田村的国民党第十八军第十一师的一个独立营（该营营长为王风清）[①]。笔者认为，这一说法与史实不符，此次战斗的时间是 1935 年 8 月 8 日前后，与红军作战的国民党军是浙江保安独立第一营。依据如下：

上田苏维埃政府分田委员应寿林于 1987 年 3 月回忆说：“……（上田）打仗的时间是（19）35 年古（农）历 7 月 10 日夜里至 11 日天光早（早晨），这个日子我记得很牢……到王村口去请红军的是大书村人毛发祥和周国有……红军连夜从官（关）塘开来，到大书时天还未亮。上田战斗结束红军缴来许多枪……红军在山冈上休息……为住在坝头村机枪连带路来打红军的是东书村的地主李林善……”[②]

关塘乡游击队队长毛马兴于 1987 年 3 月回忆说：“……（上田战斗）前一天，红军领导人黄富武带了二百多红军来到关塘，他叫我带他到上田去看察地形，回来后要我组织担架队……我们关塘村组织了 23 副担架，动员了 46 个青壮年去抬担架，绑扎担架的常熟布是从地主李锡田、毛小克家里拿来的……”[③]

垵口乡西岱村的红军游击队员周先松于 1987 年 3 月回忆说：“……我和另两个红军在毛发祥、周国有两人带领下，偷袭了敌人的观察哨……红军摧毁了恩坛岗、荒园岗、岙田岗三个碉堡。接着，红军冲进上田村独立营的营部……敌营长王逢春在混乱中逃出上田村，向库武村

① 中共丽水地委党史研究室：《浙西南游击根据地》，1995 年 10 月内部印行，第 421—425 页；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浙江党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91 页。

② 中共遂昌县委党史办公室：《1987 年 3 月 9 日至 11 日调访笔录》，存遂昌县史志办公室档案。

③ 中共遂昌县委党史办公室：《1987 年 3 月 9 日至 11 日调访笔录》，存遂昌县史志办公室档案。

方向逃命去了。此时，天也大亮了……红军……胜利后，在大书村前面的山冈上休息，有的还高兴得唱歌。驻扎在坝头村象山寺该独立营的机枪连……从左侧以机枪向红军猛扫过来……”①

东书村81岁的邱仁林于1987年3月回忆说：“……（国民党军）营部设在上田村，营长叫王逢春，机枪连驻扎在坝头村象山寺和谢氏宗祠里，连长姓田。另一个连住在东书村的赵公庙和天后宫，还有一个连住在库武村和万坑村。独立营到上田村以后，把东书村跟随红军打过土豪的邱开兴、邱开松、邱樟东和坝头村的谢马根四人拉到东坞岭杀了，时间是农历七月初。到上田打仗的红军是从关塘来的……带队的人叫黄富武……时间是（19）35年立秋边。”②

上田村71岁的毛有植于1987年3月回忆说：“到上田来的国民党（军）独立营营长叫（王）逢春，此人年轻非常野蛮……到处杀（害）跟随红军打过土豪的人。红军和独立营打仗的时间是（19）35年立秋边，当时田里的早稻还未黄（成熟）。到王村口去叫红军的是大书村人，名叫毛发祥和周国有。他们看到独立营在上田一带到处杀人放火，实在忍不住了，才……”③

大书村81岁的毛火德于1987年3月回忆说：“红军在上田是打胜的……受伤的红军被抬到上洋岙和坳头、九突村养伤。”④

笔者认为，以上当事人和亲历、亲见者的回忆具体、确切，真实可信。

又据国民党第十八军1935年11月30日上报的《浙南剿匪经过概要》之《闽赣浙皖边区清剿总指挥部所属各部队团以上主官姓名驻地一览表》载，第十八军第十一师师长黄维，师部驻龙泉，下辖3个团，第六十一团（团长梅春华）驻安仁镇，第六十三团（团长曾伯熹）驻云和，第六十六团（团长胡琏）驻住溪镇，并无独立营。

另外，笔者查阅有关文献档案证实，王逢春为营长的独立营是浙江保安独立第一营。依据有二，一是该营致遂昌县政府函⑤：“浙江保安独立第一营部公函总字第732号”，此函的落款署名为“营长王逢春”，时间为“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并盖有“浙江保安独立第一营印”。二是浙江保安第一团致遂昌县政府函11：“浙江省保安第一团团本部公函字第65号”，此函开头即称“案据前保安独立第一营营长王逢春报告……”内容与前述独立营之函的内容相符，落款署名为“团长张咸宜”，时间为“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三月十四日”，并盖有“浙江保安第一团关钤”。

从以上回忆和文献资料可见，上田战斗的史实是：1935年7月浙江省当局“进剿”红军挺进师，调浙江保安独立第一营进驻龙泉县的上田。8月8日（立秋）左右，黄富武率部攻打上田之敌，获胜后在大书村前面山冈上休息，遭驻扎在坝头村该独立营的机枪连绕道而至的侧翼

① 中共遂昌县委党史办公室：《1987年3月9日至11日调访笔录》，存遂昌县史志办公室档案。
② 中共遂昌县委党史办公室：《1987年3月9日至11日调访笔录》，存遂昌县史志办公室档案。
③ 中共遂昌县委党史办公室：《1987年3月9日至11日调访笔录》，存遂昌县史志办公室档案。
④ 中共遂昌县委党史办公室：《1987年3月9日至11日调访笔录》，存遂昌县史志办公室档案。
⑤ 原件存遂昌县档案馆第414-1-162卷。

进攻，红军立即组织反击，双方互有伤亡，各自撤出战斗。此次战斗的时间是1935年8月8日前后，并非国民党军发动大举“围剿”时的1935年9月中下旬；与红军作战的国民党军是浙江保安独立第一营，营长为王逢春（方言谐音成王风清），并非国民党第十八军第十一师所属部队。

三、关于门阵国共合作抗日和谈的时间等

在遂昌门阵举行的国共合作抗日和谈，是红军挺进师浙南三年游击战争中的重要事件。和谈的举行与达成协议，标志着红军挺进师浙南三年游击战争的结束。关于门阵国共合作抗日和谈举行的时间，诸如《粟裕传》、《中共浙江党史》（第一卷）等许多重要史籍的记载均存在出入，误将1937年9月19日作为了谈判时间[①]，并由此引起了其他一些错误。

关于门阵谈判以及粟裕率部开赴浙南的史实，可从下列众多文献中得出结论：

“中国人民抗日红军闽浙军区各级将校勋鉴：

顷奉惠书敬悉……贵军如诚意请缨杀敌，请即刻派全权代表携带原信为证来金岸，与本政府所派代表接洽一切……”

此函[②]落款署名为“遂昌县县长林树艺、遂昌县党部常务委员周彦”，时间为“九月十八日”。

“汤溪县政府公函警字第234号

案据本县银塔乡乡长胡寿祺本月廿六日报告……本县拟用剿抚兼施办法……

此致

遂昌县政府”

此函[③]落款署名为“县长王重辉”，时间为“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九月三十日”，并盖有汤溪县政府印章。

遂昌县政府复汤溪县政府函[④]：

“……贵府警字第二三四号公函……一面派员前往招抚……互以电话通知，以期迅捷为荷。

此致

汤溪县政府

县长林○○

十、九（印）”

朱镇山致林树艺报告[⑤]：

“报告十月十六日

① 《粟裕传》编写组：《粟裕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版，第170页；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浙江党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327页。

② 原件存遂昌县档案馆第1–6–663卷。

③ 原件存遂昌县档案馆第1–6–663卷。

④ 原件存遂昌县档案馆第1–6–663卷。

⑤ 原件存遂昌县档案馆第1–6–663卷。

于县政府

窃职奉钧座命令前往汤遂边境招抚残匪，即遵令于本月十三日晨七时出发，下午五时三十分到达瓜蓝住宿，并派人向汤溪银坑等处投函。该股匪接函后星夜全部开抵门阵。职于十四日晨闻悉情况，即继续向门阵前进，途遇便衣匪探二名，经说明来意，安全通过步哨线。是日上午八时，职抵门阵……未能达到招抚之使命……并商定用上红下白二尺正方形之识别旗帜……定于本月十五日下午即向集中地点推进……谨将招抚经过情形理合具报。仰祈

鉴核。谨呈

县长林

警佐朱镇山（印）呈

附呈上函一件”

粟裕（化名苏群）致遂昌县长林树艺函[①]：

“林树艺县长勋鉴：

复示敬悉，并承朱科长跋涉莅临敝队指点一切，不胜感祷之至！

……

至于整编事宜，因组织关系，碍难从命……

专此奉复，并致以

抗战胜利之礼！

苏群

刘清扬（印）

十月十四日”

湖山警署关于粟裕部赴浙南途经湖山的报告[②]：

“报告二十六年十月廿二日于湖山分驻所

事由：奉钧长电谕，以已受招抚之红军首领苏群刘清扬率队由北乡开赴前线……特此报告。谨呈

遂昌县政府县长林

附呈红军布告一张

湖山警察分驻所巡官杨忠信（印）”

遂昌县长林树艺致第九区保安司令的快邮代电[③]：

“浙江省第九区保安司令余副司令张钧鉴：……前经本府饬派干佐朱镇山持函前往招抚经过情形，业于本月十八日报请鉴核在案……该股赤匪于本月二十日由本县苏村至北界，二

① 此函即朱镇山报告中所说“附呈上函一件”。原件存遂昌县档案馆第1-6-663卷。

② 原件存遂昌县档案馆第1-6-663卷。

③ 原件存遂昌档案馆第1-6-663卷。

十一日转白水应村，二十二日抵湖山镇，沿途纪律甚佳……不日即途经本县王村口及龙泉潘竹岭住溪等处，转向目的地集中。除电请浦城龙泉二县县政府查照外，理合将本案经过情形电请鉴核

遂昌县县长林〇〇叩

十月二十三（印）”

以上文献，记载、落款极为明确，并盖有印章或签名，准确无误。由此可见，门阵谈判的有关史实是：

1937 年 9 月，与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失去联系、由粟裕率领的挺进师一部，正活动于遂（昌）宣（平）汤（溪）边区，既不知道国共两党已经实现第二次合作，也不知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与国民党闽浙赣皖边区主任公署谈判达成协议。而从金华、衢州等地却传来“共产党投降了，红军被收编了”之类的传闻。对此，粟裕敏锐地觉察到，很有可能国共两党已实现第二次合作，即派刘亨云负责调查证实。当国共合作之情得到证实后，粟裕致函国民党遂昌县当局，提出合作抗日建议。9 月 18 日，国民党遂昌县当局复函红军，要红军派全权代表到离县城 5 公里的金岸谈判，并与汤溪县当局谋划收编红军。粟裕高度警惕，坚持要遂昌县当局代表到门阵谈判。10 月 14 日 8 时，国民党遂昌县当局代表朱镇山抵达门阵，粟裕指派谢文清、刘清扬与朱镇山在门阵村一农户家中举行了谈判。10 月 20 日，粟裕率部已离开门阵到达苏村、北界，22 日抵达湖山镇，然后经王村口赴浙南。

四、关于挺进师主力从浙南出发北上抗日时部队的番号

这个问题关系到挺进师主力从浙南出发前是否已编入新四军建制，是否已成为新四军之一部。这是挺进师也是新四军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

此前，党史界普遍认为，原红军挺进师主力从浙南出发到达皖南前，部队的番号还是“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如《中共浙江党史》（第一卷）[①]、《粟裕传》[②]等均如此记载。粟裕在《回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中也称：“由我带领‘（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开赴皖南参加新四军的战斗行列”[③]。

实际上，原挺进师主力从浙南出发前已编入新四军建制，部队的番号是：陆军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七团队。此史实依据不仅有龙跃在《坚持浙南十四年》中回忆到：“浙江红军部队编为新四军第七团队……部队到达皖南后，根据军部决定，又由第七团队改为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三营”，而且有粟裕出具给遂昌县政府的收条这一文献依据，并还有其他当事人、亲历者的回忆为佐证。

---

①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浙江党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40 页。

② 《粟裕传》编写组：《粟裕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77、184 页。

③ 浙江省军区：《浙南三年》，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9 页。

粟裕率部开赴皖南时，于1938年3月25日途经遂昌，在遂昌停留至28日才离开。粟裕率部之所以特别在遂昌停留数日，主要是为了在挺进师的重要活动地区遂昌开展团结抗日宣传。其中最重要的是敦促遂昌县当局释放“政治犯”。粟裕不仅指派随军服务团团长陈雨笠在各界人士座谈会上敦促遂昌县当局释放“政治犯”，而且亲自致函遂昌县政府，亲往监狱探望、慰勉在狱的“政治犯”，向遂昌县当局出具“查胡德荣、吴湖、吴阿干系敝部战斗员，万步青、雷有德、黄老三、黄子文等共党份子，敝部已调查清楚”的证明。3月27日，当粟裕将被释放的“政治犯”中的5名带回部队时，又特别向遂昌县政府出具了收条[①]。原文如下：

“兹收到：

遂昌县政府政治犯吴湖、雷有德、黄老三、黄子文、吴阿干伍名，带回本部服务，参加救亡工作，特给收据。

陆军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七团队（印）

团队长粟裕（印）

三月廿七日”

此收条不仅有“陆军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七团队”和“团队长粟裕”的落款，而且有“陆军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七团队”的印章和粟裕本人的印章。此文献真实地记录了原挺进师主力从浙南出发前已编入新四军建制，已成为新四军之一部，部队的番号是“陆军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七团队”。

另外，时任国民党遂昌县党部特派员、负责接待粟裕部的程一戎，在《国共两次合作在遂昌亲历记》[②]中记述道：“三月下旬，新四军……路过遂昌县城，北上抗日……关于欢迎经过和开会情况，拙作……及1980年7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北京师范大学张毕来教授所写的《新四军过遂昌那一天》等文，都有详细记载……通过这次对新四军的热烈欢迎欢送活动……”在《遂昌人民热烈欢送红军北上抗日》[③]中，程一戎又记述道：“……我用县党部的名义向各机关团体学校发了一份油印的通知，说明新四军定于明日中午到达遂昌……召开了一个‘军民联欢大会’。新四军全体指战员在大堂正中席地而坐……首先由我说明欢迎新四军开赴前线抗日救国的重大意义……接着就请粟裕同志讲话……第二天上午由新四军的政工同志主持，在……开了一次座谈会……”时任随军服务团团长的陈雨笠在回忆中也写道：“……我当时也参加随军服务团工作。三月中旬奉军部命令（当时红军已改变为新四军）浙江的红军由粟裕将军率领……赴前线抗日……”[④]时任遂昌县政府民政科长的黄继武在回忆中也写道：“……陆希澄接到新四军来遂昌的信息，作为国民党县长感到这事不大好处理……叫我代理他的工作

① 原件存浙江省档案馆第G001 3-1/26-1卷。

② 程一戎：《国共两次合作在遂昌亲历记》，1985年4月，载《遂昌文史资料》第1辑。

③ 程一戎：《遂昌人民热烈欢送红军北上抗日》，1980年8月27日，载《遂昌革命斗争史资料》1982年第3期。

④ 陈雨笠：《忆红军告别遂昌之盛况》，1960年7月15日，载《遂昌革命斗争史资料》1982年第3期。

……经商议，程一戎等去郊区迎接，我在县政府里……贴满了欢迎新四军的标语……”[①]。

程一戎、陈雨笠、黄继武均为当事人，张毕来与黄继武一样是从沦陷区到遂昌从事抗日救亡工作的知识青年，是亲历者，他们均一致地回忆到粟裕所率之部是新四军。可见，他们的回忆是准确可信的。

又据龙跃在《坚持浙南十四年》中说：“曾山同志……主要传达了三条，大意是：(1)浙江红军部队编为新四军第七团队，集中地点……”[②] 可见，原红军挺进师（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七团队的时间，是 1938 年 3 月上旬曾山到达浙南传达中央指示之时。

据此，笔者认为，红军挺进师集中于浙南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后，于 1938 年 3 月上旬编入新四军建制，部队的番号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七团队，后来又由第七团队改为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三营。

（原载《中共党史资料》2007 年第 4 期，作者单位：遂昌县史志办公室）

① 黄继武：《终生难忘的峥嵘岁月——忆 1938 年在遂昌的斗争生活》，载《遂昌革命斗争史资料》1983 年第 8 期。

② 龙跃：《坚持浙南十四年》，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4 页。

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策略转变

——从一件策略转变的“佐证”说起

徐承宾

党在领导我国的革命斗争中，曾经作过多次斗争策略的调整，挽救了处于险境的革命事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浙西南的革命斗争过程中，党组织也适时地调整斗争策略，使浙西南革命事业摆脱艰难险境，获得了蓬勃发展的生机。这里有件在龙浦边老区征集到的革命遗物，它是当年党斗争策略调整的佐证。因年代久远，字迹模糊，现用简化字翻抄如下：

查戴春和系浦城北乡麻山村，家有三人吃饭，祖业四十担，平生以此为业，成份地主，但素来并无压诈工农。此次吾们到其家舍劝其悔过，并令其捐款助人民革命之经费。该戴春和当已觉悟改过自新，并自愿捐款大洋壹佰元正，以助革命战争经费，双方签约为凭。

望各友军各革命负责同志，倘若今后到彼地经过，务须加以保护，但其兄弟、叔伯、亲友不在此例，并请验明此证。

右给地主戴春和收执保管

经手人张潮

中国人民红军政治部主任许振威

公历一九三七年三月八日

这件收条，很清楚地写明捐款人的家庭情况、捐款数额，并请过往友军须加保护等字句。落款已改用“人民红军”称谓，经手人张潮即张麒麟化名，许振威即挺进师二纵队许政委（谐音）。签署的时间虽在 1937 年 3 月，但我们推断，调整的斗争策略应在 1936 年下半年已经执行。当时的时代背景是这样的：

自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继续对中央苏区进行围剿。1935 年 10 月，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了陕北，不久，北平爆发一二•九运动，全国人民的抗日运动不断高涨。根据形势发展，党中央政治局于 1935 年 12 月 25 日召开了瓦窑堡会议，作出《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并决定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措施。

面对抗日高潮即将到来的形势，在浙南的闽浙边临时省委预见到党中央的政策将会有重大的转变，开始对干部、党员进行革命形势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教育，使广大指战员

对即将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解放战争的战略转变，作思想准备，并在具体政策和策略上作了一系列调整。1936 年 7 月，以叶廷鹏为书记的浙南临时革命委员会，通过派到上海的交通员杨进与中央驻上海办事处取得联系，上海办事处交给他瓦窑堡会议的文件，并交代杨进设法找到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刘英、粟裕率领的红军部队和闽浙边临时省委。杨进回到浙南，即把党中央文件交给闽浙边临时省委。处于与党中央隔断联系的临时省委，得到中央文件，自然倍感珍贵，立即组织学习，统一认识，迅速及时地调整斗争策略，贯彻执行党中央转变斗争策略的决定，改变番号，将过去打土豪改变为向富户征收“抗日捐”；将以前的严惩对象乡镇、保、甲长列为争取教育对象；允许商人自由贸易，其营业不受侵犯；执行争取中间人士等一系列统一战线方针政策。浙西南特委执行了调整策略的这些措施，于是就有了上面那张收条。

从当年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革命斗争史料可以看到，临时省委于 1936 年 6 月重建了以许信焜为书记（兼任挺进师二纵政委）的浙西南特委，特委回到浙西南，在龙泉老区西坑召开了会议，传达了党的关于调整斗争策略的指示。活动在龙泉碧龙、浦城刘坑一带的挺进师二纵队（部分）干部战士，通过学习，开阔了视野。他们从 1935 年以来的革命斗争历程中，审视到一些不够策略的地方：在国民党大军压境之时，仍然留下大量的部队与之正面对抗，没有从过去反“围剿”的运动战中摆脱出来，致使大批部队和像黄富武一样的一批团以上干部牺牲，损失殆尽，一大批基层革命骨干和分到斗争果实的群众惨遭杀害，党的基层组织基本遭受破坏。以龙浦县委下属党组织为例，1935 年 5 月建立的 16 个农村支部中，有 15 位党支部书记壮烈牺牲，大批村苏维埃主席（分田委员）惨遭杀害。

浙西南的广大干部在学习上级指示和总结经验中获得启示，因此，他们在贯彻上级调整斗争策略的方针政策时，更为积极、自觉。

首先，以武装斗争和秘密的群众工作相结合的方法，恢复和发展党组织

特委、挺进师二纵队为了避免群众利益遭受损失，将部队隐蔽驻扎在深山老林的草棚中，下属的龙浦、龙遂、江浦县委以红军为后盾，改变了过去大张旗鼓的方式，采用秘密的群众工作方法，积极恢复和发展党组织。龙浦县委在书记张麒麟（9 月前为宣恩金）、委员曹景垣的领导下，以浦城的里林坡头张处（张绍昌家）为隐蔽驻地，建立大北、小北两区委。曹景垣、傅家立等同志经常以做桐油买卖为名，开展秘密工作。在龙泉的水塔、大岙村，在浦城的里林、马迹、东坑桥、青草洋、叶坞、瑶里等村共建立了 8 个党支部和浦城的流村、褚林、榆双 3 个党小组，并在纳岱、杨梅滩、浦城坑等地发展了党员。由曾友昔任书记、卢立三为委员的龙遂县委，以龙泉的碧龙（杨贵炎家）为隐蔽驻地。下设王村口（浦北）区委和住龙区委。活动在浦城的毛洋、隘上桥、坑尾和龙泉的碧龙、周调、大坝、西坑、井惠、黄皮一带。经过秘密发动工作，龙泉的碧龙、神砼坑、大坝、周调、西坑、井惠、茶园建立了 9 个党支部，共有 50 多名党员。浦城境内毛洋、留爱、坑尾、寨门、下长坑、毛洋头等地先后成立了 7 个党支部，有 40 多名党员。1936 年 9 月建立

江浦县委，调宣恩金为书记，以浦城山岱岩和江山洪岩顶为驻地，活动在遂昌的湖岱口，浦城的山岱岩、海溪，江山的洪岩顶、周村一带。宣恩金化名廖东海，与肖国标以收购茶叶、桐籽等山货为掩护，开展党的秘密活动，先后在山岱岩、十八店及江山的洪岩顶、周村、龙井坑等地发展党员，建立了党支部和党小组。随着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为充分发动群众，龙浦、龙遂县委还在下属基层村庄建立了共青团和妇女会组织。在共青团支部和村妇女会组织的领导下，村里青年为红军搭山棚、送粮食，妇女利用夜晚替红军缝衣做鞋蔚然成风。由于共青团员、妇女会员的带头支援，红军在毛洋至碧龙的山上设置的后勤基地，发挥了作用，作战中的伤员、收缴的物资在这一带的山棚里得到安置；伤员得到山下医生的救治；衣服得到山下妇女缝制，龙泉碧龙、浦城毛洋一带成为龙遂县委、红军挺进师二纵队稳固的活动基地。

其次，利用原有保甲机构，建立白皮红心政权

浙西南特委下属的龙浦、龙遂县委根据特委转变策略的指示，在秘密建立党组织的同时，对国民党保甲长进行宣传教育，采用“打击顽固，争取中间，发展进步”的策略，利用原有保甲机构，建立“白皮红心”政权。党组织发现白岩保长杨裕林思想反动，对革命危害极大，就决定给予打击。红军摸清他的行踪，趁杨裕林经过猴古岭时，将他就地处决。县委趁机教育了这一带的保甲长，并与保甲长签订条约，一不准欺压百姓，二要及时通报敌情。对遵守条约的保长，红军则教育群众支持他的工作，保障他的生命财产安全。有的村还推荐党员去担任保长之职。经过教育、争取，浦城白岩的杨正良、宅门的陈吉昌、坑尾的廖如庆、龙泉碧龙的张景华、西坑的范国珍等保长都在地下党组织的控制之下，这些村的政权组织，实际上成了“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这些保长为革命也做了一定的有益工作。有一次井惠村的熊守程（共青团员）被敌人抓去，保长范国珍就出面说明情况，将熊守程保释出来。碧龙村一个红军干部被敌抓去，保长张景华立刻出面向敌军官证明这人不是红军，是一个外来的裁缝师傅。就这样保释了这位红军干部，避免了一次损失。

再次，调整斗争方式方法，让群众得到实惠

根据上级调整斗争策略的指示，浙西南特委停止了过去“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方式，代之以限制封建地租、高利贷剥削，开展抗租、抗税秘密斗争；调整过去打土豪筹款的方法，代之以向富户借款、给收条的方法。这些斗争策略的调整，极大地争取了中间力量，团结了大多数，更有利于打击极少数顽固分子。由于有红军武装作为群众的坚强后盾，地主不敢为非作歹，人民得到实惠。在经济上，允许边区商人自由买卖，发展边境贸易，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龙浦边游击根据地又出现蓬勃的生机。

由于党和红军调整了斗争策略，群众得到了实惠，人民保护红军、支援红军成为自觉行动。碧龙群众在横坑中山坑尾、大桃源长岗尾、大桃源下等地搭了山篷给红军居住；在自己的

苞萝篷收养红军战士，让曾友昔、卢立三、刘继海等红军领导隐蔽养伤并为红军保存枪支；为红军运送粮食；为红军采购日用品、药材，先后在浦城和仙阳等地为红军买了电池 200 多对、电筒 12 支、雨伞 30 多把、棉被 5 床、米 800 多斤。党员群众还经常为红军送信，探听情报，配合红军战斗。1936 年冬，碧龙农民游击队配合红军，利用放木排作掩护，袭击王村口，取得胜利。

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斗争，取得人民的拥护和支持，革命事业得到恢复和发展，是由于浙西南特委调整了斗争策略的结果。特委和挺进师二纵队战士，在许信焜等同志领导下，艰苦坚持，直到全面抗战爆发。1937 年 10 月，根据闽浙边临时省委的通知，由张麒麟、曾友昔、宣恩金等率领的二纵队战士走出大山，结束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迎来全面抗战的新时期。

（原载《丽水党史》2007 年第 4 期，作者系中共龙泉市委党史研究室退休干部）

浙西南游击区的建立和历史作用

诸葛蓉

浙西南游击区是由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先头突围部队为主组建的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奉党中央指示于1935年3月开始创建的。它既是中央红军到浙江开辟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又是1935年革命低潮时期全国为数很少的一块新建立的革命根据地。它的创建，鼓舞了人民，打击了敌人，配合了闽东、闽北等闽浙赣相邻老苏区的斗争，从战略上配合了红军主力长征。浙西南游击区的斗争，也为这个地区成为中国革命在南方的一个支点，在以后的斗争中继续发挥作用，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党的活动基本地区、解放战争时期的游击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和深厚的思想基础、群众基础。

一、浙西南游击区的基本情况

1935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浙皖赣交界的怀玉山地区斗争失败。先头部队突出重围回到赣东北苏区。中央分局根据中央政治局1935年1月15日的指示电，责成闽浙赣省委立即以先头部队为基础组建成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到浙西南、浙江长期行动，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师长粟裕、政委刘英。部队于2月27日出发，3月上旬抵达闽北，与闽北红军会合。为加强挺进师活动区域党、政、军工作的领导，决定成立以刘英为书记的政治委员会。

浙西南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地区，驻有较强的闽浙两省国民党保安团队。浙江、福建两省保安团队对红军围追堵截，紧咬不放。为扫清外围，进入浙西南，三四月间，红军在浙闽边境六七个县进进出出，往返作战。3月25日，红军在浙西南的龙泉县宝溪乡溪头村歼灭驻防的浙江保安基干队一个中队，取得入浙首战胜利。4月28日，红军挺进师在浙西南的庆元县斋郎地区，击溃浙江、福建两省保安团队和地主武装大刀会共3000余人的进攻，杀伤俘500余人，迫使敌保安团队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转为退守。斋郎这一关键性一仗，打开了红军进入浙西南开辟根据地的通道。

5月上旬，红军进入浙西南腹心地区松阳、龙泉、遂昌三县边界地区，受到曾参加过1930年武装暴动、有强烈而朴素革命要求的贫苦农民组成的“青帮”组织的热烈欢迎。红军挺进师有了初步依托，立即开始了浙西南游击区的开辟创建工作。通过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打击敌人，将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立相结合办法，在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建立了中共浙西南特委和

浙西南军分区。各地普遍建立了共产党地方组织和区、乡、村苏维埃政权，建立了松(阳)遂(昌)龙(泉)红军游击总指挥部和各村红军游击队、贫农团、共青团、妇女会、儿童团等各种革命群众组织。广大贫苦农民组织起来，建立了分田委员会，开展了查田量地造册、插标分青苗和分田分地的土地革命。革命根据地里出现了“分田分地真忙”的热烈场景。

同年 9 月开始，根据地遭受国民党 7 万重兵的“围剿”血洗。存在四五个月的浙西南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域逐步到 12 月丧失。但浙西南的革命红旗始终未倒。自此后，中心区域和游击区域一直成为红军挺进师坚持革命武装斗争的游击根据地，红军挺进师第二纵队和游击队活动中心转移到龙泉、江山、浦城、遂昌边境，在江山周村到遂昌湖岱口方圆百里的游击区里。粟裕四次率部返回浙西南，转战各地，恢复老区，扩展新区，建立两面政权，最后坚持在以遂昌门阵为中心的宣平、遂昌、汤溪三县交界游击区，以老区为基础不断扩展游击根据地，直至门阵和谈，浙西南红军游击队成为新四军的组成部分。浙西南特委四任特委书记宗孟平、黄富武、许信焜、张麒麟前仆后继坚持领导这个老地区斗争到抗战爆发。

二、浙西南游击区的地位和作用

浙西南游击区的开辟，是中央分局、中央军区根据斗争形势的变化，向党中央提出的。中央分局、中央军区的决策在得到党中央批准同意后，责成闽浙赣省委组建红军挺进师去开辟的。这块游击区位于浙闽赣三省交界，浙江的西南部。其中心区域为今浙江省丽水市的松阳、龙泉、遂昌全部，衢州市属的江山县一部，福建省属浦城县的一部，5 个县，纵横 200 余里。其游击区域西至赣、闽边境，南到浙闽边界西段，北抵浙赣路中段，东到桔苍山西、东两翼，包括云和、庆元、景宁、丽水、青田、缙云、松溪、政和、寿宁、泰顺、衢县、龙游、汤溪、宣平、武义、永康、磐安、仙居、天台等县的全部或局部，范围涉及 20 多个县。这块游击区里的红军和游击队，在以后失去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领导的情况下，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经历了由正规军到游击队和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两次转变，又经受了浙江、福建两省国民党九、十个保安团队的围追堵截和“进剿”，闽赣浙皖边区清剿总指挥部副总指挥罗卓英统一指挥的、以国民党十八军为主体共 32 个整团约六七万人的兵力，连同地主武装号称 40 个团的第一次“围剿”，闽赣浙皖四省边区主任刘建绪调集重兵的第二次“围剿”，与敌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斗争，胜利地坚持到全国抗日战争的爆发，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有了浙西南游击区，红军在浙江站住了脚，然后才有条件派出部队去浙东、浙闽边区创建浙东、浙南新的游击区。浙西南游击区成为中国革命在南方的一个战略支撑点，在以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浙西南根据地是中央红军在浙江开辟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为以后的浙江革命创下了基础。

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时，浙江早期的党组织和革命力量已经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是中

央红军首先在浙西南重新点燃革命烈火，然后再分兵去开辟浙东、浙南。有了浙西南，才有以后的浙东、浙南。从此浙江党组织从小到大，不断发展，再也没有歇止，直到今天。它在浙江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二）浙西南革命根据地是全国革命低潮时期中国南方为数很少的一块新建立的革命根据地。

浙西南革命根据地是1935年春夏创建的，而此时正是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党中央和中国红军主力正在长征途中，处于爬雪山过草地艰难危急之中。留在长江以南坚持斗争的各游击区共有十几块，除浙西南是新开辟的之外，其他都是老苏区。这些老苏区里的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正处于最艰苦、最困难隐蔽斗争时期。如果将此时的浙西南放在全国革命形势图上看，低潮的全国形势中，在浙西南却出现了“分田分地真忙”和“父送子、妻送郎参加红军”的热烈革命场面。这对于低潮中的党、红军和革命人民群众，是个极大的鼓舞，对于骄横的敌人是个沉重的打击。国民党《东南日报》惊呼：“浙江素称平安之区，自粟、刘窜浙后，匪化已波及全省，以目下形势来论，浙江共匪不亚于四川、江西之匪，若当局未能迅速肃清，前途实堪可虑。”闽赣浙皖边区“清剿”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十八军军长罗卓英在1935年9月24日丽水会议上说：“当时刘英粟裕等敌有数百人，现在统计数达三千以上，据调查所得，四分之三是浙江工农阶级被其诱惑，滋扰二十余县，其进展速度，比江西还要厉害……”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及其斗争，在全国党史上应有其一定的地位。

（三）浙西南的斗争，牵制了国民党相当数量的兵力，对于闽浙赣皖四省边区斗争的开展有重要意义，在战略上策应了中央主力红军的长征。

首先是浙西南的斗争得到闽北老苏区的策应、闽东老苏区的呼应和合作。他们帮助了浙西南。同时，浙西南也帮助了闽东闽北。浙西南与闽北、浙西南与闽东，都召开过党的联席会议，共同商讨研究如何互相配合共同斗争问题。在干部、人员和武器装备等方面都有交流。红军挺进师第四纵队奉师政委会决定，就是一直在闽浙边活动，负责与闽北党组织和红军联系的。正如刘英所说：“浙西南斗争极为重要……尤其是挺进师到达浙江以来，不仅牵制了进攻闽北、闽东之敌，而且对于闽浙赣皖四省边区斗争的开展也有极重要的意义。”

1935年七八月间，蒋介石鉴于地方保安团对付不了红军挺进师，决定调动主力部队“围剿”浙西南。国民党军委会先后任命卫立煌、罗卓英为闽赣浙皖边区“清剿”总指挥部正副总指挥。这个总指挥部原先设在江西上饶，着重对付抗日先遣队，以后移驻福建南平，重点对付闽赣边境，7月下旬移驻浦城，9月中旬移驻浙江江山。该总指挥部制定的“第一期清剿计划”确定“以各边区大部对粟、刘”，并委第十八军军长罗卓英统一指挥。敌人集中了32个整团共约六七万人的兵力，连同地主武装号称40个团，妄图围歼在浙西南的红军挺进师和地方游击队，彻底摧毁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国民党十八军是陈诚起家的老本，以后被称为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其师、团长中如黄维、霍揆彰、李树森、宋瑞珂、胡琏、阙汉骞、高魁元等，后来都是国

民党军中的著名人物，由此可见蒋介石对此次“围剿”之用心。1936 年 12 月，国民党又集中了 43 个团 10 万人的兵力由闽赣浙皖四省边区主任刘建绪主持“剿共”。这次“围剿”，浙西南又是敌人进攻的重要目标。因此说，浙西南的斗争，牵制了国民党相当数量的兵力，一定程度上牵制进攻闽北、闽东红军的敌人，在战略上策应了中央主力红军的长征。

（四）浙西南游击区的斗争，影响了以后的游击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使浙西南成为中国革命在南方的一个战略支点。

1935 年 9 月，以国民党十八军为主体的国民党重兵 7 万血洗浙西南，大部分红军挺进师指战员和浙西南子弟兵牺牲在这片红土地上，革命根据地大部丧失。但是，斗争并没有停止，红旗仍然竖立。幸存下来的红军挺进师指战员一部分继续坚持在龙泉、浦城、江山、遂昌边境老地区打游击，一部分坚持在遂昌、宣平、汤溪边境老地区打游击。这时的浙西南革命根据地成为新的意义上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师长粟裕率部四次重返浙西南，最后就在遂宣汤游击根据地坚持斗争。红军在浙西南经过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坚持到抗日战争爆发。

国共和谈后，粟裕率红军挺进师主力编入新四军北上抗日。刘英留在浙江。此时刘英任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书记。同时跟随刘英留在浙江坚持斗争的还有五六十位红军挺进师干部。他们分别担任浙西南、浙南、浙东各个特委的负责人和骨干。1942 年 2 月，刘英不幸被捕，5 月牺牲，从此浙江没有省委。但是，跟随刘英同志留下来的老红军继续担任浙西南、浙南、浙东特委的主要负责人和骨干，一直坚持斗争到浙江解放。这批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开创者，不管是以后仍留在浙西南的，还是到浙南、浙东去的，他们都成为浙江革命的中坚，都是各个地区的领导人。浙西南的斗争，不仅为以后浙江革命留下干部，而且通过这批老红军，将他们的领导艺术、指挥才能，尤其是对革命必胜的信念和坚强的革命意志、革命精神，传承给以后培养成长起来的地方干部，红军挺进师为人民群众谋利益而英勇斗争的光辉事迹、严明的组织纪律，这一切都长远地深刻地影响着以后浙江的革命。解放战争时期，浙西南、浙南、浙东共同成为浙江游击根据地。浙西南自 1935 年开辟为根据地，红旗一直不倒到解放，成为中国革命在南方的一个战略支点。

（原载《中共党史资料》2009 年第 4 期，作者单位：中共丽水市委党史研究室）

浅析抗日先遣队和红军挺进师对长征的战略策应

周德春

1934 年 6 月，在中央红军主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长征）前夕，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命令红七军团组成抗日先遣队，北上闽浙皖赣国民党统治腹心地区行动；次年 1 月，命令以先遣队突围部队为基础组建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长期行动。中央因何组建先遣队，为何命令先遣队北上，战略意图何在，结果如何？中央因何组建挺进师，因何指定挺进师入浙？与红军主力长征有何关系？仅 500 余人的挺进师，孤军深入国民党统治最严密的浙江，犹如垂饵虎口，能否策应长征，何以策应长征？本文谨对此作一探析，并期待于方家指正。

一、红军主力战略转移与组建先遣队北上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当局，不顾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进一步提出“攘外必先安内”，坚持对日妥协投降、对内加紧扩大内战，并从 1933 年下半年开始，调集百万大军向中共领导的各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挥，造成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斗节节失利，至 1933 年底，中央苏区从纵横近千里缩小到 300 里。

1934 年 4 月广昌失守后，中央红军在根据地内粉碎国民党军“围剿”已无可能，第五次反“围剿”面临失败。5 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准备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实施战略转移，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组织两支部队分别北上和西进[①]。6 月下旬，中革军委命令在福建连城的红七军团返回瑞金，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福建、浙江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域，开展反日运动，深入敌后，吸引国民党军从中央苏区调回一部到其后方，在浙江及皖南地域创立新的苏区及苏维埃根据地[②]。

中央因何组建抗日先遣队，为何令其北上闽浙皖赣，战略意图何在？其答案如先遣队参谋长粟裕所说：“中央为掩护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命令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向蒋介石腹心地区闽浙皖赣进军，执行牵制任务”，“中央派出这支部队的更加直接的目的，是企图以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84 页。

② 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等：《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1 页。

这一行动威胁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吸引和调动一部分‘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即将实行的战略转移”[①]。另外，叶剑英、朱德也证实了这个答案：1979 年底，粟裕问叶剑英，先遣队是不是在王明“左”倾错误指导下派出的，叶回答说：“五次反‘围剿’初期，毛主席主张过把红军主力挺进到苏浙皖赣地区，以打破蒋介石的‘围剿’，当时毛主席不在位，中央没有采纳。后来派出先遣队，主力红军已经要作战略转移，那时毛主席处于无权地位”[②]；1973 年 12 月，朱德在回答军事科学院的提问时指出：当时的战略意图“是准备退却，派先遣队去做个引子，不是北上，而是南下（指中央红军主力从中央苏区西南部转移）”[③]。这就是说，先遣队的组建和北上，与红军主力战略转移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目的是为了实施红军主力战略转移；中央欲通过先遣队宣传和推动抗日运动，调动和牵制国民党军，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掩护和策应红军主力战略转移。因此掩护、配合、策应红军主力战略转移是先遣队的首要任务。

红七军团是中央苏区主力红军中一支年轻的军团，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7 月初改编完毕，全军约 6000 人，长短枪 3000 余支。

7 月 7 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开始执行北上任务（与此同时，红六军团奉命于 7 月下旬退出湘赣根据地西进，为主力战略转移探路），先经长汀、连城、永安攻下大田县城进入闽中地区，再经红九军团掩护配合攻下樟坂湖，渡过闽江进入白区。此时，先遣队原计划由古田、庆元、遂昌直接北上浙西，然后向皖南发展。但忽然接中革军委电令，要求先遣队由谷口东进，占领水口，威胁并相机袭取福州[④]。中央这一指示，显然是要求先遣队的策应行动迅速奏效。先遣队随即奉命于 8 月 1 日夺取水口，迅速进攻福州。这虽然对策应主力转移有所收效，使国民党军闽东的八十七师调往福州、湖北的四十九师驰援福建、“围剿”中央苏区的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急忙飞抵福州，但未能有效吸引和调动“围剿”中央苏区之敌，反而暴露了先遣队“只是一支不怎么大的牵制力量”，“敌人就一直疯狂地追击和堵截”[⑤]，给先遣队以后的行动造成了极大困难。

先遣队自出动后，就马不停蹄，一路征战，得不到休整。9 月初，进入闽北苏区后，即欲利用苏区的有利条件作短暂休整，并依托苏区给敌以有力打击，摆脱敌人前堵后追，特别是敌四十九师紧紧咬住先遣队不放的被动局面，但随即受到中革军委的批评：“拟于闽北边区休息，这恰合敌人的企图，因敌人企图阻止你们北进。”[⑥]中革军委的批评，说明中央已急于先遣队迅速北上，已亟待先遣队策应行动奏效。

---

①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06、111 页。
②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34 页。
③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34 页。
④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13 页。
⑤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15 页。
⑥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17 页。

先遣队到达闽北苏区时，已超过中央要求先遣队到达皖南的限期，接中革军委电令批评后，即欲迅速北上，向皖南急进。但中革军委随后又电令先遣队在浙江执行两项“中心任务”：对进攻赣东北及闽北苏区敌人的后方进行彻底破坏；在闽浙赣边境广泛开展游击战，创建新苏区，破坏敌人后方交通[①]。于是，先遣队“一面对付敌人日益加紧的围追堵截，一面深入敌后进行破袭活动”，“给了敌人一定的威胁和打击”，“但是，限于当时的群众条件和装备、技术等条件，要按照中革军委要求在广大地段上破坏铁路、公路是办不到的”[②]。9月17日，中革军委又电令先遣队，在执行破坏杭（州）江（山）铁路及附近公路的任务前，禁止继续北上；次日，再次电令先遣队“应即向遂安前进，以袭击方法占领该城，并确保于我军手中”，以遂安为中心，在靠近安徽边境的淳安、寿昌、衢县、开化地区发展游击战争，建立苏区，然后再向浙皖边发展[③]。

中革军委令先遣队在浙江执行两项“中心任务”，急于先遣队就近发展游击战争，以遂安为中心建立苏区，更加说明了中央亟待先遣队的策应行动立竿见影。然而，中革军委这样的要求完全脱离了先遣队的实际，“不论政治条件和自然条件，以遂安为中心建立根据地显然是不适宜的”。“要求通过这支仅有几千人的部队的作战行动，促敌人进行战略与作战部署上的变更”，是不可能的；对先遣队“未能实现这些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目的，就指责部队没有完成任务”[④]，是错误的。

由此可见，先遣队的组建和北上，是中央为实施红军主力转移作出的战略部署，目的是策应红军主力战略转移；实施红军主力转移亟待先遣队策应，策应红军主力转移成了先遣队的首要任务；由于先遣队的兵力过小和“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挥，先遣队的策应行动未能收到立竿见影之效，“未能实现这些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目的”，但是，先遣队“孤军转战敌人后方，是起到了它的积极作用的”[⑤]。

二、先遣队策应行动失败与组建挺进师入浙

1934年10月17日，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8.6万余人，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开始长征[⑥]。10月下旬，先遣队进入赣东北，与坚持在赣东北苏区的红十军会合。随后，接中央军委11月4日电令：红七军团（先遣队）与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对外仍称抗日先遣队），“七军团编为十九师”，“一星期内完成”，“仍出动于浙皖赣边新苏区，担任打击‘追剿’的敌人与发展新苏区的任务”；红十军编为二十师，“仍留老苏区，执行打击‘围剿’

①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18、119页。
②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19页。
③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20页。
④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23页。
⑤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23页。
⑥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485页。

敌人与保卫苏区的任务”[①]。这就是说，中央决定增强先遣队的兵力，以期策应红军主力长征和发展新苏区、保卫老苏区，并要求“一星期内完成”，以期迅速行动。

11 月 18 日，先遣队之十九师从怀玉山和德兴东北突破敌封锁线，向浙皖赣边进发。十九师的突然出动，出乎敌人意料。浙江保安纵队副指挥蒋志英率两个团尾追，遭十九师痛击，蒋志英负伤败退常山。接着，十九师经上方镇，渡新安江，向分水县前进，并逼近昌化、于潜、临安，震动了杭州。随后又转向皖南行动，攻克旌德县城，并由泾县、宣城北上，威胁芜湖[②]。此时，先遣队接中央军区 11 月 18 日电令：“十军团决全部立即从玉常间挺出铁道以北，首先活动于开遂衢常间，并一部积极破坏铁道，威胁衢州，调动围攻闽浙赣敌人，集中主力，坚决的争取运动战消灭敌人，以创造皖浙边苏区”，十军团的出动，“完全是为了调动敌人，保卫闽浙赣苏区及创造新苏区”，“行动须迅速，不宜再迟延”[③]。中央“为了调动敌人，保卫闽浙赣苏区及创造新苏区”，以期策应长征，“组成红十军团，并把长于打游击的红十军和地方武装集中起来，进行大兵团活动，企图打大仗，这是战略指导上的又一个重大失误，为后来红十军团的挫折和失败埋下了祸根”[④]。正如朱德于 1973 年 12 月评价这次合编时所说：“编成一个军团，不编不垮，一编正规战打不成，游击战也打不成。”[⑤]

由于先遣队的兵力依然过小和“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挥，先遣队不仅未能牵动“围剿”中央根据地的敌人，反而以孤军深入敌后，陷入同十倍于己的敌人艰苦奋战的境地[⑥]。1935 年 1 月，先遣队在赣东北怀玉山地区遭国民党军重兵包围进攻，指战员大部牺牲，仅粟裕、刘英率领的先头部队得以突围。

此时，“长征中的红军主力处于国民党军重兵围追堵击之中，其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广大白区的工作均陷入困境，国民党军继续以堡垒战分割东南各省苏区，对红军进行分进合击，闽浙赣苏区和红军游击队处于国民党军的重重包围‘进剿’之中。”[⑦] 中国革命面临严重危机。

1 月底 2 月初，当粟裕、刘英率部突围至闽浙赣苏区，与闽浙赣省委会合时，接到中央分局转至的中央 1 月 15 日电令：以先遣队突围部队为基础，迅速组建挺进师，进入浙江境内，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苏维埃根据地，以积极的作战行动，打击、吸引和牵制敌人，保卫闽浙赣基本地区和邻近的根据地，从战略上配合主力红军的行动[⑧]。2 月下旬，挺进师迅速组建完毕，立即踏上挺进浙江的征途。

---

① 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等：《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39 页。

②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25 页。

③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26 页；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等：《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754、755 页。

④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26 页。

⑤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37、138 页。

⑥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86 页。

⑦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丛书之《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浙南游击区》，解放军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 页。

⑧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44 页。

中央发出电令的1月15日，正是先遣队面临失败的最为艰难时刻：仅一小部先头部队得以突围，主力深陷敌人重围，生死难卜。这说明，虽然中央不知先遣队主力能否突出重围，其策应行动是否就此失败，但是中央已经看到，先遣队继续有效策应长征已无可能。因而，中央决定另出奇兵，组建挺进师入浙，把策应长征的任务交给挺进师。中央如此急切地组建挺进师入浙，恰恰说明策应长征的任务十分紧迫。

以先遣队幸存的一小部为基础组建的挺进师，组建完毕时仅538人，兵力比先遣队还要小得多。中央电令组建挺进师时，虽不知挺进师能组建到多大兵力，但挺进师兵力远小于先遣队是可以肯定的。然而，中央却把先遣队尚且未能完成的任务交给了挺进师。中央以挺进师弱小的兵力执行如此艰巨的任务，虽是在中国革命面临严重危机时的不得已之举，但却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后来先遣队失败的事实和挺进师入浙行动的事实，完全证明其正确。

对于挺进师的行动地域，中央选择了敌人的腹心地区——浙江。浙江是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后院，蒋介石的老巢。在国民党当局倾全力"围剿"红军主力之时，唯有进入其"素称平安之区"的浙江，进入敌人的心脏，才能击中要害，触痛国民党当局的中枢神经；对于兵力弱小的挺进师来说，唯有进入敌人的心脏，才能四两拨千斤，达到策应红军主力长征的目的。挺进师入浙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游击根据地，不仅是在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燃起新的革命烈火，在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后院构筑新的革命堡垒，而且是从敌人心中开花，把尖刀插到敌人的心脏，可以真正从战略上策应长征。挺进师的入浙，与前文所说红军主力挺进苏浙皖赣的毛泽东之主张，可谓异曲同工。

从先遣队的首要任务和先遣队失败来看，长征需要挺进师入浙战略策应；从中央亟待先遣队策应行动奏效和先遣队面临失败立即组建挺进师入浙来看，长征迫切需要挺进师入浙战略策应；从中央增强先遣队兵力、指定挺进师入浙来看，长征务求挺进师入浙实现战略策应。可见，挺进师的组建和入浙，与红军主力长征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是与先遣队北上一脉相承的，是战略上策应长征的需要。

三、挺进师入浙与战略策应长征

浙江是国民党统治最严密的腹心地区，反动势力盘根错节，兵力弱小又毫无依托的挺进师，进入浙江行动，犹如垂饵虎口，能否策应长征，何以策应长征？

挺进师从政治、经济、地理、群众基础等方面认真调查、分析，选择了各方面都相对有利于其立足的浙西南，作为创建游击根据地的第一个目标。为进入浙西南，挺进师首先在浙闽边境往返作战，消灭地方反动势力，吸引和打击国民党地方武装，造成敌人以为挺进师欲在浙闽边立足的错觉。当浙、闽两省的国民党武装被吸引、调动至浙闽边时，挺进师即在庆元县斋郎地区精心部署，击败数倍于己之敌，取得斋郎大捷，从而打开了进入浙西南的通道[①]。

①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48、149页。

挺进师不失时机地进入浙西南以后，立即在龙泉、松阳、遂昌、云和、景宁、丽水、汤溪、宣平、龙游等县境，“集中以打击敌人，分散以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和群众工作。在战略战术上，坚决实行灵活机动的游击战，避免与敌硬打硬拼，使尾追堵截之敌疲于奔命。6 月 12 日，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亲率其“怀中利剑”仕官教育团，进抵金华及杭（州）江（山）铁路沿线督战，挺进师则预为布置，以逸待劳，先后在宣平吴宅等地予以突然袭击，歼灭其两个连，缴获其全部装备，彻底粉碎其“进剿”①。7 月下旬，浙江省当局又深入遂昌设立“浙南剿匪指挥部”，进一步抽调兵力“进剿”挺进师。为此，挺进师主动出击，开展八一示威行动，分兵袭击衢州、龙游、汤溪、宣平等地大小城镇 19 个，缴获长短枪 200 多支、轻机枪 2 挺，扩充红军 400 余人②，不仅再次粉碎敌人的“进剿”，而且把革命烈火烧到浙赣铁路线，威胁到金华、杭州等城市。

挺进师公开提出“打土豪，开仓济贫，帮助群众战胜饥荒”的口号，每到一地，首先消灭国民党的区乡武装和地方反动势力，摧毁反动基层政权，然后发动群众，开仓济贫，打土豪分发浮财，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和组织群众投身革命。挺进师的行动，使深受压迫、已具强烈反抗愿望的浙西南人民挣脱了枷锁，纷纷投身革命。红军所到之处，都有大批群众簇拥着，复仇的呐喊声、胜利的欢呼声山鸣谷应，日夜不绝③，农民群众踊跃参加党、政、军、群等革命组织。7 月下旬，挺进师师部进驻王村口，领导浙西南人民大力开展游击根据地建设，至 8 月中旬，浙西南地区普遍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地方游击队和基层党组织以及工会、商会、互救会、妇女会、儿童团等各种革命组织，各苏维埃政府迅速开展查田、插标、分青苗的土地革命，到处是分田分地的繁忙热烈场面④。至此，挺进师入浙开辟的第一块游击根据地，迅速在江山、浦城、龙泉、遂昌、松阳 5 县间形成，纵横百余公里；游击区域发展到北抵浙赣铁路，南至闽浙边界西段，西及闽赣边境，东至丽水、宣平的广大地区；挺进师部队也从 500 余人发展到近千人，扩编为 5 个纵队⑤。挺进师不仅在浙江燃起了革命烈火，而且在浙西南创建了游击根据地。

挺进师的行动，深深触痛了国民党当局的中枢神经，浙江省当局的喉舌《东南日报》等惊呼：“浙江素称平安之区，自粟、刘窜浙后，匪化已波及全浙，以目下形势而论，浙江共匪不亚于四川、江西之匪”，“前途实堪可虑！”⑥1935 年 8 月，面对后院起火、革命堡垒构筑到家门口、地方武装对付不了挺进师的境况，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抽调“中央军”主力入浙对付挺进师，先后任命卫立煌、罗卓英为闽赣浙皖边区“清剿”总指挥部的正、副总指挥，调集第十八军为主力的七万大军“进剿”浙西南⑦。罗卓英任军长的国民党第十八军，下辖四个师，是陈诚起家的老本，

①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55 页；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浙江党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88 页。

②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浙江党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90 页。

③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53 页。

④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55、156 页。

⑤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56 页。

⑥ 刘英：《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中共中央宣传部党史资料室 1954 年 8 月翻印，第 107 页。

⑦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浙江党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91 页。

装备精良，人员充实，训练有素，战斗力强，后来成为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诸如黄维、霍揆彰、李树森、宋瑞珂、胡琏、阙汉骞、高魁元等师、团长，后来都是国民党军中的著名人物[①]；第十八军又是长期在江西“剿共”的老手。国民党当局“进剿”挺进师的良苦用心，由此可见一斑。仅500余人的挺进师，入浙数月就迅速吸引、调动如此大量的国民党军主力，不能不说挺进师创造了奇迹。

9月中旬，面对数十倍的强敌进攻，挺进师实行敌进我进的方针，留下第二、第五纵队在根据地内坚持，其余主力迅速跳出敌人包围圈挺进敌后，以积极的作战行动吸引、调动敌人，并开辟和建立新的游击根据地[②]。9月25日，挺进师主力突破敌人封锁线，进入浙闽边境活动。但国民党军主力不为所动，除派出一个师约五个团的兵力追堵挺进师主力外，仍将几十个团的大部队死死围住浙西南，欲彻底摧毁挺进师的游击根据地[③]。

国民党军的“进剿”，自9月19日发动进攻，至1936年6月“两广事变”爆发才结束，前后延续8个多月[④]。在长达8个月的反“进剿”斗争中，“挺进师以少量兵力抗击了国民党军大部队的进攻，不仅歼灭了敌人的部分有生力量，而且牵制了敌人几十个团的兵力，掩护了挺进师主力南下浙闽边开辟新的游击区，打破了国民党妄图于11月20日前将挺进师‘肃清’的计划。”[⑤]

由此可见，挺进师在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后院燃起了革命烈火，把革命烈火烧到了蒋介石的家门口，深深触痛了国民党当局的中枢神经，迫使国民党当局无法专心“围剿”长征中的红军主力；挺进师在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创建了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犹如在国民党当局的后背插上了一把尖刀，迫使国民党当局无法安心“围剿”长征中的红军主力；挺进师迅速吸引、调动了国民党“中央军”主力，直接抗击、牵制国民党七万大军长达8个月，迫使国民党当局无法倾其全力“围剿”长征中的红军主力，减轻了红军主力长征的军事压力。因此，挺进师的入浙，从战略上策应了红军主力长征，实现了中央的战略目标，为长征这一中国革命由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历史转折的实现，作出了杰出贡献。

（原载《福建党史月刊》2010年12月，作者单位：遂昌县史志办公室）

①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57页。
②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59页。
③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59、160页。
④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60页。
⑤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丛书之《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浙南游击区》，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11页。

南方游击区应当增加“浙西南”

诸葛蓉

浙西南游击区，是由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先头突围部队为主组建的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奉党中央指示于 1935 年 3 月开始创建的。这块游击区位于浙闽赣三省交界，浙江的西南部。其中心区域为今浙江省丽水市的松阳、龙泉、遂昌全部，衢州市属的江山县一部，福建省属浦城县的一部，5 个县，纵横 200 余里。其游击区域西至赣、闽边境，南到浙闽边界西段，北抵浙赣路中段，东到桔苍山西、东两翼，包括今丽水市属的其他各县，即云和、庆元、景宁、丽水（莲都）、青田、缙云，福建省属的松溪、政和、寿宁，浙江省温州市属的泰顺，衢州市属的衢县、龙游，金华市属的汤溪、宣平、武义、永康、磐安，台州市属的仙居、天台等县的全部或局部，范围涉及 20 多个县。这块游击区里的红军和游击队，在以后失去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领导的情况下，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经历了由正规军到游击队和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两次转变，又经受了浙江、福建两省国民党九、十个保安团队的围追堵截和“进剿”，“闽浙赣皖边区‘清剿’总指挥部”副总指挥罗卓英统一指挥的、以国民党十八军为主体共 32 个整团约六七万人的兵力，连同地主武装号称 40 个团的第一次“围剿”，闽浙赣皖边区主任刘建绪调集重兵的第二次“围剿”，与敌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斗争，胜利地坚持到全国抗日战争的爆发，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有了浙西南游击区，红军在浙江站住了脚，然后才有条件派出部队到浙东、浙闽边区创建浙东、浙南新的游击区。浙西南游击区成为中国革命在南方的一个战略支撑点，在以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浙西南一直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游击区存在的。

但是，中共党史对南方游击区的序列表述是这样的：“从 1934 年下半年到 1937 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红军主力相继战略转移后，留在长江南北的一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在党的领导下，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在江西、福建、广东、浙江、湖南、湖北、安徽、河南等八个省的赣粤边、闽赣边、湘赣边、湘鄂赣边、湘南、皖浙赣边、闽西、闽东、闽粤边、闽北、鄂豫皖边、浙南、闽中、鄂豫边和琼海崖等十几个地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①]这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中共党史所确认的南方红军开展三年游击战争所在的八省十几个地区中，并没有“浙西南游击区”，而只有浙南游击区。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2 年 9 月版，第 512 页。

这是一个长期不被人们所注意和重视的问题。

为此，本文着重论述浙西南游击区的创建，包括它的基本情况、特点、性质、地位、作用，分析阐述浙西南、浙南两块游击区的区别，从而提出为了准确地完整地反映南方游击区历史，避免人们在“浙西南”和“浙南”之间产生两种或多种不同理解的歧义，应该在南方游击区的序列表述中，增加一个“浙西南游击区”的新论点新观点。

一、浙西南游击区的基本情况

1935 年 1 月，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浙皖赣交界的怀玉山地区斗争失败。先头部队突出重围回到赣东北苏区。中央分局根据中央政治局 1935 年 1 月 15 日的指示电，责成闽浙赣省委立即以先头部队为基础组建成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到浙西南、浙江长期行动，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师长粟裕、政委刘英。部队于 2 月 27 日出发，3 月上旬抵达闽北，与闽北红军会合。为加强挺进师活动区域党、政、军工作的领导，决定成立以刘英为书记的政治委员会。

浙西南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地区，驻有较强闽浙两省国民党保安团队。浙江、福建两省保安团队对红军围追堵截，紧咬不放。为扫清外围，进入浙西南，三四月间，红军在浙闽边境六七个县进进出出，往返作战。3 月 25 日，红军在浙西南的龙泉县宝溪乡溪头村歼灭驻防的浙江保安基干队一个中队，取得入浙首战胜利。4 月 28 日，红军挺进师在浙西南的庆元县斋郎地区，击溃浙江、福建两省保安团队和地主武装大刀会共 3000 余人的进攻，杀伤俘 500 余人，迫使敌保安团队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转为退守。斋郎这一关键性一仗，打开了红军进入浙西南开辟根据地的通道。

5 月上旬，红军进入浙西南腹心地区松阳、龙泉、遂昌三县边界地区，受到曾参加过 1930 年武装暴动、有强烈而朴素革命要求的贫苦农民组成的“青帮”组织的热烈欢迎。红军挺进师有了初步依托，立即开始了浙西南游击区的开辟创建工作。通过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打击敌人，将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立相结合办法，在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建立了中共浙西南特委和浙西南军分区。各地普遍建立了共产党地方组织和区、乡、村苏维埃政权，建立了松（阳）遂（昌）龙（泉）红军游击总指挥部和各村红军游击队、贫农团、共青团、妇女会、儿童团等各种革命群众组织。广大贫苦农民组织起来，建立了分田委员会，开展了查田量地造册、插标分青苗和分田分地的土地革命。革命根据地里出现了“分田分地真忙”的热烈场景。

同年 9 月开始，根据地遭受国民党 7 万重兵的“围剿”血洗。存在四五个月的浙西南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域逐步到 12 月丧失。但浙西南的革命红旗始终未倒。自此后，中心区域和游击区域一直成为红军挺进师坚持革命武装斗争的游击根据地，红军挺进师第二纵队和游击队活动中心转移到龙泉、江山、浦城、遂昌边境，在江山周村到遂昌湖岱口方圆百里的游击区里。粟裕四次率部返回浙西南，转战各地，恢复老区，扩展新区，建立两面政权，最后坚持在以遂昌门阵为中心的宣平、遂昌、汤溪三县交界游击区，以老区为基础不断扩展游击根据地，直至门阵

和谈，浙西南红军游击队成为新四军的组成部分。浙西南特委四任特委书记宗孟平、黄富武、许信焜、张麒麟前仆后继坚持领导这个老地区斗争到抗战爆发。

二、浙西南游击区的特点和性质

（一）特点之一，到浙西南创立新的革命根据地，是中共中央分局、中央军区早已有之的决策，经请示党中央批准同意的

1934 年 10 月上旬，中共中央在实施战略转移前，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共中央分局，项英任书记。不久，又成立由项英兼任司令员的中央军区，统一指挥江西、福建、闽赣、赣南及闽浙赣 5 个军区及各直属的地方独立部队，继续坚持中央苏区及其临近苏区的斗争。

11 月 4 日，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电令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红七军团）和坚持在赣东北苏区的红十军，合编为红军第十军团，下辖十九、二十两个师，对外仍称北上抗日先遣队，令中共闽浙赣省委和红十军团今后受留守中央苏区的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直接领导。十军团的任务：十九师仍出动于浙皖赣边新苏区，二十师仍留在老苏区①。

1935 年 1 月，红军先遣队在浙皖赣三省交界的怀玉山地区遭到失败。先头部队突围回到赣东北苏区，奉命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挺进到浙西南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突围部队是奉谁的命令组建成挺进师的？关于这个问题，曾任红十军团政委员会委员、军团政治部主任、挺进师政委、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刘英在 1940 年给党中央的报告中是这样叙述的："中央分局根据中央政治局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的指示电，责成闽浙赣省委立即组织挺进师到达浙江长期行动"②。挺进师师长粟裕是这样回忆的："一九三五年一月底二月初，我们率领抗日先遣队的怀玉山突围部队到达闽浙赣根据地不久，中共闽浙赣省委向我们传达苏区中央分局转来的中央指示，要我们以先遣队的突围部队为基础，迅速组成挺进师，由我任师长，刘英同志任政治委员，立即率部进入浙江境内，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苏维埃根据地……"③"中央政治局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的指示电"，现在尚未发现。但从一系列现已发现的史料中可以看出，派遣先遣队到浙西南是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根据形势变化所作出的决策，最后经请示党中央批准同意的。中央军委报告拟改变党中央要求先遣队去皖南发展的决策，改变为向闽浙边发展，据现有史料，最早电文时间是 1934 年 11 月 5 日和 7 日④。其后，12 月 14 日先遣队在皖南谭家桥地区作战失利。约在 1935 年 1 月 5 日至 8 日之间，中央军区第二次命令"军团拟折转闽浙边活动"⑤。关于第二次令问题，在以后项英给朱德、周恩来的电文中曾报告

① 闽浙皖赣四省党史部门：《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39 页。

② 刘英：《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1940 年夏），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刘英纪念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65 页。

③《粟裕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13 页。

④ 闽浙皖赣四省党史部门：《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1、143 页。

⑤ 闽浙皖赣四省党史部门：《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13 页。

过此事:“谭家桥之役因战术错误未解决战斗,……敌已在四周逼近,故改令主力转移浙西南行动……”①

1月9日,先遣队在遂安县茶山村驻营。军团领导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中央军区关于部队转向浙西南活动的电令和分兵问题。会议经过争论,最后决定全军回赣东北苏区暂行休整,再实施中央军区向浙西南行动的命令②。次日,部队南下赣东北,结束了历时50天的皖南行动。

时任先遣队行动区域内党政军最高领导机关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的方志敏,生前在狱中写下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回忆说:“中央因我军在皖南行动的困难,来电要求我们改向浙西南行动,我们就在1935年1月10日离开了皖南。”③刘英说:“谭家桥战斗后,……当晚商讨中央及军委的命令和指示。当时中央及军委给先遣队的命令和指示是:……B、先遣队应派一个得力师,酌量的派遣工作人员与适当的配备干部到达浙江长期行动……一直到创立革命的根据地,同时应与中央军委及政委会保持密切的联络。”④

总以为到苏区就有办法可想,所以茶山会议作出了进入赣东北暂行休整,再去浙西南的决定。不料,先遣队进入了敌人包围圈。国民党当局为消灭红军先遣队,调集数万兵力进行围追堵截。从1月10日起,先遣队在七天内四次受到阻击。16日,敌军14个团在赣皖浙边界怀玉山地区完成了对红军先遣队的合围。29日,方志敏被捕,抗日先遣队在怀玉山遭到失败。

乐少华、刘英、粟裕率领先遣队先头部队于16日突破重围,抵达赣东北苏区,找到中共闽浙赣省委。“待乐少华、刘英、涂振农、粟裕等同志进至闽浙赣基本地区时……接着得中央东南分局⑤指示电,要闽浙赣省委组织挺进师到达浙江长期行动。”⑥乐少华在1936年8月20日写下的《十军团出动经过报告》中说:“我们带进苏区的计1000人,有的自动归了家,尚剩700余当时就组织了一个团,补充了一些子弹、枪支。中区电令要我们以独立师名义向闽浙出动,后来项英要我留下……”⑦

依据上述史料,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到浙西南,是中央分局、中央军区根据斗争形势的变化,向党中央提出,要求改变先遣队往皖南开辟根据地的决定,改为向浙西南挺进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的;中央分局、中央军区的决策在得到党中央的批准同意后,责成闽浙赣省委组建红军挺进师到浙西南的。

奉党中央指示去开辟浙西南游击区,是浙西南游击区的一个特点。

---

① 闽浙皖赣四省党史部门:《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页。

② 闽浙皖赣四省党史部门:《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66页。

③ 闽浙皖赣四省党史部门:《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82页。

④ 刘英:《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1940年夏),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刘英纪念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256页。

⑤ 应为中央分局。

⑥ 刘英:《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1940年夏),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刘英纪念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264页。

⑦ 闽浙皖赣四省党史部门:《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08页。

（二）特点之二：浙西南游击区的创建，在形势背景、地理环境、创建者、依靠条件等方面有其特色

1. 从创建时所处的形势看，浙西南游击区创建于红军主力长征，正在爬雪山过草地的中国革命形势低潮时期。

2. 从所处的地理环境上看，浙西南处于浙闽两省交界，洞宫山脉中段，群山连绵地区。

3. 从创建者方面看，与中央苏区一样，都是中央红军。

毛泽东建立井冈山根据地，探寻出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中国革命胜利之路，而红军挺进师主要领导人刘英、粟裕正是毛泽东、朱德亲自培养成长的红军将领。挺进师指战员都是跟随毛泽东、朱德、方志敏长期征战的中央苏区红军。

红军挺进师是浙西南根据地的创建者，是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先头部队为基础组建的。部队主要组成为先遣队的一个迫击炮连，一个机关枪连，二十一师的第五连，先遣队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保卫局的机关工作人员，先遣队北上时留在闽浙赣边境的二个连，共 500 余人，编为三个支队、一个师直属队。虽然全师只等于一个小团的人数，支队实际上相当于连，但这是一支久经锻炼考验的短小精悍的中央红军。先遣队的两大源头，来自于由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逐步扩编的红七军团第十九师，方志敏在赣东北重建的新红十军，大多数指战员参加过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和中央苏区第一、二、三、四、五次反“围剿”战争。干部多而强，原军团级干部当师级干部，原团营连级干部当连排班级干部，一般战士也都有多年革命历史，政治觉悟高、作战经验丰富。从师首长到战士，年轻力壮。武器装备好，战斗力强。

4. 从依靠条件看，红军团结争取了当地农民武装，是建立井冈山根据地的条件之一。毛泽东确定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是因为：党在这个地区的群众基础较好，大革命时期各县曾建立过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并有袁文才、王佐领导的地方农民武装在这里坚持斗争，他们愿意同工农革命军相结合……[①]而在浙西南，以陈凤生、卢子敬、陈丹山为首领的名为“青帮”的地方农民武装，约三四千人，1930 年呼应过红十三军斗争、举行过武装暴动。他们听说刘英、粟裕率领的江西红军往松阳方向行进了，就主动集队到路上去迎接，主动要求与红军挺进师结合，积极支持和参加革命，同样地是建立浙西南根据地的条件之一。“青红一句话，永远不分家”，这是地方农民首领在率众迎接红军时表态说的话。这三位农民首领和一批骨干最后都是在保卫根据地斗争中奋勇作战、英勇牺牲的。这种因为党、红军和人民群众建立起的血肉联系而共同开创根据地的生动事例，具有典型意义。

（三）特点之三：创建浙西南根据地的工作步骤、方式、方法，完全是采取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一套做法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20 页。

1. 通过武装斗争和缴枪扩红，壮大革命武装力量，开辟、创建、保卫根据地。

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开辟红色根据地，首先必须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要开展武装斗争，以革命的武力消灭地方反动势力，才能让长期被压迫被剥削的劳苦大众伸直腰杆、组织起来。因此，5 月初，红军进入浙西南，立即着手于根据地的开辟创建工作，具体做法首先就是“把武装斗争与根据地建设结合起来。我们运用了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方法，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打击敌人……”[①]由师政治部主任黄富武率领师政治部干部和第一纵队负责开辟松阳玉岩、枫坪、安岱后等地为根据地基本区域；第二纵队由师地方工作部部长宗孟平率领去龙泉、江山、浦城、遂昌四县边境地区，利用原先遣队留下约两个连的工作基础，开辟为根据地基本区域；刘英、粟裕率领第三纵队和独立支队、由师机关组成的政治连北进，出击龙游、汤溪、宣平、丽水一线，吸引牵制敌人，击溃以浙江省保安团队为主体的八九个团的“进剿”，掩护第一、第二纵队的开辟根据地工作。

经过一个月的紧张艰苦斗争，6 月上旬，红军挺进师各纵队集中在松阳县小吉。师政委会会议总结一个月来的行动，为扩大武装斗争，深入发动群众开辟根据地，决定成立浙西南军分区，王蕴瑞任司令员，黄富武兼任政委；成立松（阳）遂（昌）龙（泉）地方红军游击大队，陈凤生任大队长。会议还决定开展缴枪扩红运动，迎接“八一”建军节。会后，红军仍然采用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打击敌人的方法，在六、七、八月份的“八一”大示威行动中，各纵队袭击大小城镇 19 个，红军游击活动区域扩延到浙赣铁路义乌至江山段以南广大地区。红军缴枪 200 余支，轻机枪 2 挺，筹现款数万元。红军和游击队人数不断增加。在松阳大横坑村，全村 39 户 40 余名青壮年中，12 人参加红军，26 人参加地方游击队。在安岱后村 75 户农民中，38 人参加红军，40 多人参加地方游击队。7 月初，以第十五支队为基础，吸收原地方游击大队部分游击队员，组成红军挺进师第五纵队。挺进师兵力扩增到近千人，其中新吸收 400 余人。同时，成立松（阳）遂（昌）龙（泉）游击总队，由陈凤生、卢子敬分别担任正、副总指挥，成立遂（昌）松（阳）龙（泉）边游击总队，李金成任总队长。地方游击队人数达千余人，编为百余支游击队，散布于松阳、龙泉、遂昌、浦城、江山、云和六县广大地区。地方游击队归军分区管辖。军分区在松阳安岱后村经常召集各地游击队长、队员开会，部署工作。各地游击队为红军站岗放哨、收集情报、传递信息，配合地方干部开展打土豪、分田地斗争，配合红军开展武装开辟、保卫根据地的斗争。参加第五纵队的红军新战士和游击队员集中在松阳玉岩、枫坪一带进行军事训练和忆苦、诉苦、激发阶级感情的政治教育，党和红军的宗旨教育。红军分别在松阳县的丁坑关山源建立军工生产基地军分区硝磺厂，专门炼制硝磺（土火药），自制土枪、土炮、弹药和梭标大刀；在大茶子树坪、枫坪老鼠梯分别设立军械贮藏点；在安岱后村仰天湖设立红军伤病员医疗所；师供给部在遂昌县王村口镇后塘村建立师后方基地，设立红军军需物资供应站、枪械修理所、红军伤

① 《粟裕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18 页。

病员医疗所；在浦城毛洋下长坑建立缝纫厂，专为红军制作过冬棉衣。

2. 建立了地方党组织，发展壮大了党的队伍。

根据地建设首先是党的建设。红军挺进师在进入浙西南之前，在闽北作短暂休整时，成立了以刘英为书记的师政治委员会（简称政委会），目的就为加强挺进师活动区域党政军工作的领导。红军进入浙西南与地方进步团体“青帮”会合以后，首先就团结教育“青帮”人员。陈凤生、卢子敬、陈丹山等这些地方农民首领成为红军挺进师进入浙西南后的第一批地方党员和地方游击队、地方工作干部。他们积极参加由红军为主体组成的地方工作团，利用人熟地情熟的有利条件，进村入户，发动群众，物色对象，及时地将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吸收入党。地方党员不断扩大，地方党组织逐步建立和发展。

在 6 月上旬召开的小吉师政委会会议上，成立了浙西南地区第一个全区性的中共组织——中共浙西南特委。宗孟平任书记（7 月初牺牲，黄富武继任），杨干凡任副书记。特委以下有 1 个县委、6 个区委、数个乡村党支部，党员人数为数百人。特委下辖中共龙（泉）浦（城）县委。县委下辖中共大北区委，以龙泉县碧龙，遂昌县王村口、龙洋、石练，福建省浦城县的毛洋等地为活动区域；中共小北区委，以龙泉县的高山、青井、草鞋岭、水塔、岱头、安坑和浦城县的东坑桥、庆元山等地为活动区域。直属特委领导的地方组织有松阳县的中共竹溪区委、中共玉岩区委，遂昌县的王村口区委、中共遂（昌）汤（溪）区委。

中共竹溪区委下属有：燕田乡、黄庄乡、山徐乡、横樟乡、五部乡和黄南村、小后畲村、燕田村、五部村、洋坑埠头村、洋坑源村、蛤湖村共 12 个乡村党支部。同时成立共青团竹溪区委。中共玉岩区委下属有：小青乡、高亭乡、斗潭乡、枫坪乡、山岗岭乡、安岱后乡、玉岩乡、坑岭乡和安岱后村、苏马坪村、高矻背村、曹竹村、台坑村、乌弄村、银岭湾村、大苏坑村、流地村共 17 个乡村党支部。中共遂（昌）汤（溪）区委下属有 5 个党支部 20 余名党员。中共王村口区委在王村口、后塘、葛程等村分批培养吸收农民积极分子入党。入党手续严格：入党人必须自我表态，介绍人作鉴定介绍，对党宣誓。入党誓言是：永不叛党，遵守纪律，对党忠诚，服从分配，严守秘密。龙（泉）浦（城）县委下属有水塔、温埲、鹤溪、岱头、山溪、安坑、良溪、仓坞、罗墩、际上、石坑、大岙、石华坑、内高山、外高山、草鞋岭、青井等 16 个村党支部，160 余名党员。凡建立了党支部和有共产党员的农村，逐渐都成为根据地的中心区域。

3. 建立了农村苏维埃政权，贫苦农民翻身当家作主人。

黄富武曾在赣东北、闽北参与过根据地的开辟工作，任中华苏维埃政府候补执行委员，对开辟革命根据地、建立地方党组织和地方苏维埃政府、开展土地革命，工作熟悉，有经验。红军到浙西南以后，刘英、粟裕率部队转战外围，吸引敌人，掩护黄富武、宗孟平率部边战斗边开展地方工作，因此浙西南根据地很快创建起来。7 月初，红军干部杨林在松阳县潘乌乡（现安民乡）高矻背村主持召开有 200 多名群众参加的大会，宣布竹溪区苏维埃政府成立。这是浙西南根据地里建立的第一个红色政权。下辖黄南、燕田、山徐、横樟、黄庄 5 个乡苏维埃政府和燕

田、叶明山等几十个村苏维埃政府。7 月，成立遂昌县葛程乡苏维埃政府。7 月 22 日，黄富武在松阳县外南坑村主持召开党员会议，在成立中共玉岩区委的同时，宣布成立玉岩苏维埃政府，下辖高亭乡、小吉乡、枫坪乡、斗潭乡、安岱后乡共 5 个乡苏维埃政府和安岱后、丁坑、斗潭等 32 个村苏维埃政府。8 月 20 日，中共龙浦县委书记方志富在龙泉县住溪村主持会议，宣布成立住溪苏维埃政府，下辖上田、竹垟、宝溪、独源、六横坑共 5 个乡苏维埃政府和 35 个村苏维埃政府或分田委员会。8 月 26 日，红军挺进师第二纵队政委洪家云在遂昌县王村口镇宏济桥上主持群众大会，宣布成立王村口苏维埃政府，下辖葛程、王村口、山枣坪、凉岭下、后塘、山前、对正、关塘、独口 9 个乡镇苏维埃政府。各级苏维埃政府成员一般设主席、组织委员、宣传委员、财政委员、土地委员（群众称分田委员）、军事委员。在各级苏维埃政府办公场所墙上，都悬挂着三面旗帜：一面旗绣有镰刀、斧头，代表苏维埃；一面旗绣有犁子和斧头，表示农会；一面旗绣有菜刀和斧头，代表农民游击队。翻身了的贫苦农民担任了各级苏维埃政府的主席、副主席和各委员职务。人民当家作主，标志着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

4. 在建立地方党、政、军组织的同时，建立工、农、青、妇、儿童团等革命群众组织，广泛发动群众投身根据地创建工作。

6 月上旬小吉会议结束后，黄富武在松阳安岱后村陈氏宗祠主持有 300 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刘英、粟裕分别讲话作政治动员。会后，各地开展革命群众组织建立工作。在安岱后，除吸收积极分子入党、入团、入游击队外，其他村民按性别、年龄、职业进行分工归口，分别参加到农会、妇女会、儿童团组织中去。各地骨干经培训，被分派到邻近各村去发动群众参加各种革命团体组织。在王村口镇，还成立了王村口工会、王村口商会。在部分村庄成立了互救会。妇女会组织妇女为红军、游击队搭草棚、烧饭、洗衣服、做军鞋；为伤病员清洗包扎伤口、上山采集草药、熬药递茶水；下田劳作，让丈夫安心上前线打仗。

5. 开展土地革命，分田插标分青苗。

土地革命是工农武装割据的中心任务。从根本上为贫苦农民谋利益，是党和红军的宗旨。挺进师进入浙西南站住脚跟以后，就在松阳安岱后一带开始进行土地革命的试点工作。在 6 月上旬小吉会议师政委会作出在浙西南地区全面推开土地革命的决定。6 月底，挺进师领导人刘英、粟裕、黄富武和地方工作团负责人在松阳安岱后召开第二次群众大会，松阳西南二区 100 余村庄的群众代表，遂昌、龙泉、云和三县与松阳相交界众多村庄的群众代表共 400 余人参加。会议在宣布成立安岱后乡苏维埃政府的同时，成立安岱后村分田委员。会议介绍了安岱后村筹备丈量土地、建立土地清册、分田分青苗工作情况。以分田插标分青苗为主要内容的土地革命，在成立苏维埃政府的各个乡村陆续展开。农村地方干部队伍人数达千人。

浙西南根据地开展的土地革命，按照中央苏区土地革命模式进行。其主要政策和分配土地基本方法为：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地主和在国民党党政军部门中任职人员的家属酌情分配土地；逃亡反动地主、劣绅不分配土地；富农户按抽肥补瘦办法分配土地；

中贫农户则按照以原耕为基础，多抽少补；雇农则按人口分配土地；家庭成员中有人参加红军的，照顾分上等田；脱产参加地方游击队的户，也适当分配好田。

分配土地的实施办法是：首先成立村分田委员会。在区、乡、村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推选既熟悉地方情况又大公无私的人专职负责分田委员会的工作，组织土地核查，查清本村田亩总数，逐块登记造册，然后按照本村人口总数，得出平均每人可分配的土地亩分，最后按土地质量好差，进行抽补。即超出平均亩数的部分则抽出，不足平均亩数的部分则予以补足。田地分到户后，即行造册，颁发土地证，并将分得户主的姓名、田亩数、地名写在竹签上，插在田头，以示界定。群众称之为插标。同时还考虑时值农作物禾苗期，禾苗正青，青苗连带分配。群众称之为分青苗。对于有的田块稻谷成熟了，就将稻谷割了先分给农民。山林分配，也依此办法。

工作步骤：坚持思想教育走在前，以会代训宣讲土地革命的目的、意义、政策、方法和注意的问题。将100多名工作团人员分到各村，对各村分田委员会成员进行培训；以安岱后、斗潭、小吉等七八个村为试点，取得经验再推广开。浙西南地区农村普遍在8月份开展土地革命运动，计约300多个村成立分田委员会，先后进行土地丈量、核对亩分、分户登记造册、农田地块插上竹签、各户认领土地等具体工作。松阳西南部山区百余村庄分配土地没有出现大的纠纷和争执。在少数进度快的村庄，农民于8月底9月份领到了政府颁发的标明“户主姓名、田亩数量、地名”的红色《土地证》。

浙西南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的成果各地不一。在松阳县西南部125个村庄中，土地革命之前，地主、富农占有全部耕地的90%，能维持温饱的自耕农仅占20%。实行土地革命后，松阳西南部125个村庄除20个左右平原村外，其他100多个村庄开展了土地革命，其中85个村实际完成土地分配到户。农民占有耕地面积的90%以上，而地主、富农所有土地仅占10%以下。龙泉县岩樟乡柳山头村没收了两户地主的田地，庙宇、祠堂和清明田亩作公用。芭蕉村农民黄某一家五口人，分得双莲丘、乌砝根水田五亩多。黄陂村分田登记簿现幸存可为证。千百年来，贫苦农民梦寐以求的希望有一块属于自己土地的愿望，只有在共产党手里才真正实现了，人民成了土地的主人。人们都称“共产党、红军真正是穷苦人的大救星”。中国共产党领导浙西南农民进行土地革命，不是口头上说说，也不仅是墙上标语写写，而是实实在在地进行，这使浙西南农民看到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真正区别，从而极大地激发了他们参加创建根据地的积极性和保卫根据地、保卫胜利成果的自觉性。浙西南广大穷苦人民群众真正被发动起来、组织起来，投入到创建根据地、保卫胜利果实的伟大斗争中去了。

正如粟裕将军所说：“我们在浙西南，基本上是按照过去中央苏区的做法，以打土豪、分田地为基本政策，并公开发动群众，公开建党、建政。”[①] 浙西南的斗争，正是沿着毛泽东创建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走的：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移到农村，在农村地区开

① 《粟裕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129页。

展游击战争，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基于以上史实依据，笔者认为浙西南游击区在1935年5月至9月中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实行了工农武装割据，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三者结合起来，应当划定为革命根据地的性质，属中央苏区范畴。1935年9月下旬遭受国民党第一次“围剿”以后至抗日战争爆发，浙西南游击区为游击根据地性质。

三、浙西南游击区的地位和作用

（一）1935年创建的浙西南革命根据地是中央红军在浙江开辟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为以后的浙江革命创下了基础

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时，浙江早期的党组织和革命力量已经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是中央红军首先在浙西南重新点燃革命烈火，然后再分兵去开辟浙东、浙南。有了浙西南，才有以后的浙东、浙南。从此浙江党从小到大，不断发展，再也没有歇止，直到今天。它在浙江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二）1935年创建的浙西南革命根据地是全国革命低潮时期中国南方为数很少的一块新建立的革命根据地

浙西南革命根据地是1935年春夏建立的，而此时正是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党中央和中国红军主力正在长征途中，处于爬雪山过草地艰难危急之中。留在长江以南坚持斗争的各游击区共有十几块，除浙西南是新开辟的之外，其他都是老苏区。这些老苏区里的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正处于最艰苦、最困难隐蔽斗争时期。如果将此时的浙西南放在全国革命形势图上看，低潮的全国形势中，在浙西南却出现了“分田分地真忙”和“父送子、妻送郎参加红军”的热烈革命场面。这对于低潮中的党、红军和革命人民群众，是个极大的鼓舞，对于骄横的敌人是个沉重的打击。国民党《东南日报》惊呼：“浙江素称平安之区，自粟、刘窜浙后，匪化已波及全浙，以目下形势而论，浙江共匪不亚于四川、江西之匪，若当局未能迅速肃清，前途实堪可虑。”[①]闽赣浙皖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十八军军长罗卓英在1935年9月24日丽水会议上说：“当时刘英粟裕等敌有数百人，现在统计数达三千以上，据调查所得，四分之三是浙江工农阶级被其诱惑，滋扰二十余县，其进展速度，比江西还要厉害……”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及其斗争，在全国党史上应有其一定的地位。

（三）浙西南的斗争，牵制了国民党相当数量的兵力，对于闽浙赣皖四省边区斗争的开展有极重要的意义，在战略上策应了中央主力红军长征

首先是浙西南的斗争得到闽北老苏区的策应、闽东老苏区的呼应和合作。他们帮助了浙西南。同时，浙西南也帮助了闽东闽北。浙西南与闽北、浙西南与闽东，都召开过党的联席会

① 刘英：《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1940年夏），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刘英纪念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282页。

议，共同商讨研究如何互相配合共同斗争问题。在干部、人员和武器装备等方面都有交流。红军挺进师第四纵队奉师政委会决定，就是一直在闽浙边活动，负责与闽北党和红军联系的。正如刘英所说："浙西南斗争极为重要……尤其是挺进师到达浙江以来，不仅牵制了进攻闽北、闽东之敌，而且对于闽浙赣皖四省边区斗争的开展也有极重要的意义。"①

1935年七八月间，蒋介石鉴于地方保安团对付不了红军挺进师，决定调动主力部队"围剿"浙西南。国民党军委会先后任命卫立煌、罗卓英为"闽赣浙皖边区'剿匪'总指挥部"正副总指挥。这个总指挥部原先设在江西上饶，着重对付抗日先遣队，以后移驻福建南平，重点对付闽赣边境，7月下旬移驻浦城，9月中旬移驻浙江江山。该总指挥部制定的"第一期清剿计划"确定"以各边区大部对粟、刘"，并委第十八军军长罗卓英统一指挥。敌人集中了32个整团共约六七万人的兵力，连同地主武装号称40个团，妄图围歼在浙西南的红军挺进师和地方游击队，彻底摧毁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国民党十八军是陈诚起家的老本，以后被称为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其师、团长中如黄维、霍揆彰、李树森、宋瑞珂、胡琏、阙汉骞、高魁元等，后来都是国民党军中的著名人物，由此可见蒋介石对此次"围剿"之用心。1936年12月，国民党又集中43个团10万人的兵力，由闽赣浙皖四省边区主任刘建绪主持"剿共"。这次"围剿"，浙西南又是敌人进攻的重要目标。因此说，浙西南的斗争，牵制了国民党相当数量的兵力，一定程度上牵制进攻闽北、闽东红军的敌人，在战略上策应了中央主力红军的长征。

（四）浙西南游击区的斗争，长远地深刻地影响了以后的游击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使浙西南成为中国革命在南方的一个战略支点

1935年9月，以国民党十八军为主体的国民党重兵7万血洗浙西南，大部分红军挺进师指战员和浙西南子弟兵牺牲在这片红土地上，革命根据地大部丧失。但是，斗争并没有停止，红旗仍然竖立。幸存下来的红军挺进师指战员一部分继续坚持在龙泉、浦城、江山、遂昌边境老地区打游击，一部分坚持在遂昌、宣平、汤溪边境老地区打游击。这时的浙西南革命根据地成为新的意义上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师长粟裕率部四次重返浙西南，最后就在遂宣汤游击根据地坚持斗争。红军在浙西南经过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坚持到抗日战争爆发。

国共和谈后，粟裕率红军挺进师主力编入新四军北上抗日。刘英留在浙江。此时刘英任中共闽浙边省委书记。同时跟随刘英留在浙江坚持斗争的还有五六十位红军挺进师干部。他们分别担任浙西南、浙南、浙东各个特委的负责人和骨干。1942年2月，刘英不幸被捕，5月牺牲，从此浙江没有省委。但是，跟随刘英同志留下来的老红军继续担任浙西南、浙南、浙东特委的主要负责人和骨干，一直坚持斗争到浙江解放。这批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开创者，不管是以后仍留在浙西南的，还是到浙南、浙东去的，他们都成为浙江革命的中坚，都是各个地区的领导人。浙西南的斗争，不仅为以后浙江革命留下干部，而且通过这批老红军，将他们的领导艺

① 刘英：《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1940年夏），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刘英纪念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291页。

术、指挥才能，尤其是对革命必胜的信念和坚强的革命意志、革命精神，传承给以后培养成长起来的地方干部，红军挺进师为人民群众谋利益而英勇斗争的光辉事迹、严明的组织纪律，这一切都长远地深刻地影响着以后浙江的革命。解放战争时期，浙西南、浙南、浙东共同成为浙江游击根据地。浙西南自 1935 年开辟为根据地，红旗一直不倒到解放，成为中国革命在南方的一个战略支点。

四、浙西南与浙南两个游击区的区别

如果说，中共党史在表述南方游击区时，不是不承认浙西南游击区，而是将其划归到浙南游击区去了。“浙南游击区，包括浙西南、浙南（含浙东南）、浙东几块游击根据地，其中心先是在浙西南地区，以后移到浙南地区；而游击区域则遍及浙赣铁路义乌至江山段和天台山以南的浙江省南中部和闽东北边沿。”①那么，这个表述，从站在红军挺进师角度，介绍中心区、游击区斗争范围，无疑是全面准确的。但是，从战略区域角度来分析，将浙西南、浙南两个不同时间出现、各自独立的游击区合而为一，却难以准确表述上述历史。“临时省委成立以后，面对敌人不受调动、集中力量摧残我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反革命策略，我们立即着手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除令北渡瓯江的第一纵队加紧向浙东地区（即括苍山南北地区）发展外，重点放在开辟浙南地区的游击根据地。”②也就是说，浙西南在前，浙南在后。有了浙西南，才有以后的浙南。《中共浙江党史》（第一卷）就是这样表述的：“1936 年春夏之交，以泰顺、平阳、瑞安、福鼎等县边界为中心的浙南游击根据地形成。”③从目前各地党史史册关于浙南根据地的表述上看，“浙南”的范围也并不是前边所指范围。《中共浙江党史》（第一卷）表述：“浙南地区主要是指瓯江下游以南的广大地区……”④“浙南地区，主要是瓯江下游以南的广大地区，东濒东海，南接闽东，山岭连绵，地形险要。它比浙西南地区有两个更为有利的条件……”⑤由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浙江省档案馆合著的《浙南——南方革命的一个战略支点》，更是从书名到内容，所指的“浙南”就是瓯江下游以南地区：“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期间，由红军挺进师汇合当地革命力量创建的浙南游击根据地，是我们党在南方革命的战略支点之一。其地域大致包括现在的温州全市和丽水、台州的部分地区以及毗邻的福建省的福鼎县。”⑥从上述各地党史史册所记载的内容可以看到，不仅仅对“浙南”区域定位于“瓯江下游以南地区”已经很明确，而且对浙南与浙西南也是分成两块根据地记述的。中共浙江省委党史

① 《粟裕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12 页。
② 《粟裕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27、128 页。
③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浙江党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96 页。
④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浙江党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95 页。
⑤ 《粟裕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28 页。
⑥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浙江省档案馆、中共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浙南——南方革命的一个战略支点》，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 页。

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共浙江党史》(第一卷),其第九章"红军在浙江的游击战争"中,第一节是"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创建",第二节是"浙南游击根据地的开辟",两者是分开记述的。类似的还有2007年7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浙江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编著的《红军挺进师与浙南游击区》一书,题目是"浙南游击区",正文却是将浙西南、浙南分述。这种区域名称的使用在逻辑上是不严密的,容易使读者产生歧义。如果八省十几个地区中的"浙南",本意是指整个浙江南部,那么各地史册在实际记载上,就只记瓯江下游以南(温州)的小浙南了。这是中共党史史书的记载所未曾料及的。其实,在社会习惯称谓上,浙江有浙北、浙东、浙南、浙西南、浙西、浙中之分。浙西南与浙南分别指的是丽水和温州两个地区。民间老百姓对此是分得很明白的。也正因为这样,解放以后就有多位红军挺进师的老战士提出疑问:"不是首先去浙西南吗?怎么就只写浙南,没了浙西南呢?我们在浙西南牺牲了那么多同志!""请不要忘了浙西南,那是一块很老的根据地!"当年健在的几位老红军,也包括以后曾任过地下党浙南特委书记的老红军,联名写了信要给红军挺进师建立纪念碑,讨论建碑地点不是建在浙南而是要将碑建在浙西南(丽水)。这些情况都说明,"浙南游击区"的称谓,已经在党史界和人们中间产生两种或多种不同理解。这种歧义,不利于准确地完整地表述和反映历史的真实面目。

五、结论

综上所述,浙西南游击区是1935年全国革命低潮时期在中国南方新建立的为数很少的一块革命根据地,是1935年全国为数很少的一块开展了土地革命的革命根据地,是中央红军在浙江开辟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中共浙西南特委(后称中共处属特委)自1935年6月建立,一直领导着这个地区的斗争到解放。浙西南游击区是一块独立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游击区。

而浙南游击区情况不同。浙南游击根据地基本形成时间为1936年夏,区域范围以温州的泰顺、平阳、瑞安和福建的福鼎等县边界为中心,中共浙南特委成立于1936年3月,比中共浙西南特委成立迟10个月。与浙西南特委一样,中共浙南特委自成立到解放,也是一直独立地领导浙南地区。因此,这两块自成立之初到解放完成历史使命,一直是各成体系的根据地,长期以来却被视为一体的称谓,应以史实为依据,予以区分。在南方游击区的序列表述中,增加一个"浙西南游击区",保持"浙南游击区"。这样区分,既有利于完整准确地反映历史的真实面目,又可以避免人们对"浙南"有两种或多种不同的理解而产生歧义。

其实,关于浙西南是一块独立的游击区问题,在当年的斗争历史事实中,是很清晰、明白无误的,并不存在歧义的问题。

1940年夏,刘英在给党中央的报告中,就已经很明确地将浙西南与闽东、闽北并列为相邻的各自独立又互相配合的三块游击区:1935年3月,浙西南方面就已经"与闽北的党开了

一个联席会议，……商讨……，形成有依靠的闽东、闽北、浙西南三角形的发展形势”[①]。原闽东根据地领导人叶飞在他晚年回忆中清楚地说：“粟裕、刘英同志率领挺进师百余人，在福建省寿宁县的郑家坑和闽东特委会师。……随即闽东特委和以刘英为首的浙西南政委会举行联席会议，会上我们主动提出接受他们的领导，刘英同志采纳了这个建议，双方共同成立了闽浙军区……”“在成立闽浙临时省委的时候，刘英同志也曾主张设法同闽北地区取得联系，建立闽浙赣临时省委，来领导闽北、闽东、浙西南三个地区的斗争。”[②] 粟裕将军生前回忆说得同样明白：“一九三六年二月间，我正转战于浙闽边境，碰到了闽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就写了一封信，托他带给黄道同志，希望黄道同志牵头，召集会议，商讨三个游击区今后的协同配合问题。”[③]

浙西南、闽东两块游击区领导人的叙述都明白地说清：浙西南与闽东、闽北是三个相邻的，互相联系、互相配合的兄弟关系的游击区。浙西南是一个独立的游击区。现在同为“三角形”的闽东、闽北已经“榜上有名”，增补浙西南同样“榜上有名”，也是应该的。

从刘英1940年在给党中央报告中可以看出，浙西南是他提得最多的地区，而且这个浙西南的工作，几乎就是挺进师战斗区域的主要工作，并且得到中共中央东南局的充分肯定：“在坚持浙闽独当一面边三年斗争中，挺进师和浙西南的党，表明着自己的先进和能够随机应变以及的艰苦奋斗精神。它不但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战争，发动了数十县的民众，扩大了党与苏维埃的政治影响，保存了自己的有生力量，在某些地区分配了土地，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而且创立了成为今天抗战的主要支点之一。这正是东南局总结挺进师及浙西南党三年斗争总结中所指出的：挺进师和浙西南的党基本上坚决地执行了中央的政治路线，而且在战斗中、工作中取得了不少的胜利和成绩。”[④]

由此看来，在南方游击区中增加“浙西南”，这是尊重历史、存真求实之必需，是给在这片红土地上流尽最后一滴血的成百上千革命先烈的一个告慰，更是我们党史工作者的一份责任。

（原载《军事历史》2011年第1期，作者单位：中共丽水市委党史研究室）

① 刘英：《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1940年夏），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刘英纪念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269页。

② 《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59、62页。

③ 《粟裕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132页。

④ 刘英：《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1940年夏），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刘英纪念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304、305页。

战在艰苦而危险的环境中（节录）

——论中共浙西南特委的建立与发展

毛明库

一、中共浙西南特委的建立为浙江省第一块革命根据地——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创建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

（一）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创建（略）

（二）中共浙西南特委的建立（略）

（三）中共浙西南特委所处环境的特殊性

在浙江革命斗争的历史上，除闽浙赣省委在浙西开化县的一部分地区建立过苏区外，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是我党在浙江创建的第一块根据地。浙江是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是蒋介石的老家，反动基础十分深厚，蒋介石对此控制非常严密。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创建于1935年全国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且又是在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其所要克服困难之艰巨、面对形势之复杂、所处环境之危险都是可想而知的。挺进师政委会尽管是处于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但自始至终保持和加强了党的领导。特别是中共浙西南特委的建立对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创建和巩固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在浙西南开展游击战争有以下有利条件：第一，浙西南地处闽、浙、赣三省交界处，与闽北、闽东、闽浙赣几块根据地互为犄角，互相支援，是一个战略要地；第二，浙西南地区处于仙霞岭山脉中段，南有洞宫山，西有武夷山，东有栝苍山，境内山岭连绵，森林茂密，道路曲折，便于部队隐蔽和回旋；第三，有较好的群众基础。一是早在1927年，遂昌等县就建立过党组织；二是松阳、龙泉、遂昌等地建有“青帮”组织，有会众5000余人，该组织有着改变贫困生活的愿望和革命要求，并组织过农民暴动；三是1934年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路经浙西南，给这里的人民以很深的教育和影响。

面对环境的特殊性，中共浙西南特委在挺进师政委会的领导下，卓有成效地领导浙西南人民开展革命斗争，为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创建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

二、中共浙西南特委领导浙西南人民进行了英勇无畏、前仆后继、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并取得重大成效

浙西南特委的发展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1935 年 5 月—1936 年 5 月）

1935 年 5 月，挺进师政委会为了开展浙西南地区党的工作，决定建立中共浙西南特委[①]，特委书记宗孟平，委员杨干凡、欧阳道、洪家云、方志富。1935 年 6 月特委书记宗孟平牺牲，挺进师政治部主任黄富武接任特委书记，杨干凡任副书记，增补王蕴瑞为特委委员。浙西南特委自成立之后，便迅速开展了发展党组织和领导创建浙西南根据地工作。从 1935 年 5 月至 9 月，短短 5 个月时间，就建立了县委 1 个（中共龙浦县委），区委 5 个（龙浦县委下属的大北区委、小北区委和松阳竹溪区委、玉岩区委、遂昌王村口区委），基层组织 30 多个，发展党员 400 多名。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为创建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提供了组织保证，发挥了巨大作用。如浙西南特委委员、龙浦县委书记方志富亲自兼任住溪苏维埃政府主席，浙西南特委委员洪家云兼任王村口苏维埃政府主席，许多党支部书记也兼任了村苏维埃政府主席（或分田委员会主任），党组织在根据地土地革命中起到“主心骨”作用；在松阳，发展了有着较大影响力的“青帮”组织首领陈凤生、卢子敬等人入党，为创建游击根据地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935 年正是全国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面对强大的国民党蒋介石反动势力，红军挺进师和浙西南特委为建立浙西南游击根据地与强大的敌人进行了英勇的奋战。1935 年 5 月，在浙西南革命烈火正开始燃烧的时候，就引起了敌人的恐慌，国民党调集了“浙保”4 个团、11 支保安大队和南京税警团等八九个团的兵力，由蒋志英、陈式正指挥前来“进剿”。浙西南特委书记宗孟平率挺进师二纵队在龙浦、龙遂边境与敌人英勇战斗。在挺进师统一部署下，或分头出击，或集中围歼，“进剿”的敌人屡次受挫，至 6 月底敌“进剿”宣告失败。不幸的是浙西南特委书记宗孟平在战斗中牺牲。

反“进剿”的胜利，鼓舞了红军挺进师、浙西南特委和浙西南的革命群众，红军挺进师组织了“八一”武装示威活动，在浙西南特委领导下，“打土豪、分田地”运动轰轰烈烈开展，松阳竹溪、玉岩，龙泉住溪，遂昌王村口以及各乡、村苏维埃政权纷纷建立。农民破天荒第一次打碎了封建枷锁，从地主的手中夺得了土地，挺起腰杆翻身作了主人。

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红色政权的建立，引起了国民党极大的恐惧和仇恨。《东南日报》惊呼：“浙江素称平安之区，自粟、刘窜浙后，‘匪化’已波及全浙……前途实堪可虑。”蒋介石慌忙从江西调回罗卓英的十八军四个师，郜子举两个纵队四个团，加上福建五十六师两个旅、浦城第三师两个旅及“浙保”共约 40 个团 7 万兵力，对浙西南游击根据地进行“围剿”。红军挺进师、浙西南特委领导根据地军民为保卫胜利果实，与敌人浴血奋战，英勇搏斗。但终因敌强我弱，力量过于悬殊，到 10 月，浙西南根据地失守，特委书记黄富武被捕，12 月在丽水殉难。特委委员方志富、欧阳道、洪家云相继牺牲，特委和下属组织均遭破坏，一批基层党组织、苏维埃政权领导人惨遭杀害。浙西南特委副书记杨干凡等与浙西南的党员和革命群众在艰难困苦的条件

① 据考证，中共浙西南特委建立时间应为 1935 年 6 月。

下坚持斗争。

（二）第二阶段（1936 年 6 月—1937 年 11 月）

1936 年 6 月，发生了广东陈济棠、广西李宗仁、白崇禧联合反蒋事件（即“两广事件”）。蒋介石为了对付陈、李，慌忙将浙西南的十八军调往湖南。于是浙西南地区的敌情暂趋缓和。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根据这一新的形势，决定恢复浙西南根据地，重建浙西南特委，特委书记许信焜，副书记杨干凡，委员张文碧、张友昆。许信焜率部队和特委人员来到龙浦边地区，驻扎在龙泉住龙乡西坑的天星寺等地，并在西坑召开特委会议，恢复了中共龙浦县委，同时建立了中共龙（泉）遂（昌）县委和江（山）浦（城）县委。

特委根据省委的指示精神，总结了上年斗争经验教训，制定了新的策略，决定把公开的武装斗争和隐蔽的群众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工农红军改为人民红军，把打土豪筹款，改为向土豪借款，争取国民党保甲长，建立“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积极发展共青团、妇女会等群众团体。由于作了政策和策略上的转变，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又出现了蓬勃的革命生机。

1937 年 1 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却撕毁诺言，采取“北和南剿”的方针，对浙西南等游击根据地进行疯狂“围剿”。以刘建绪为总指挥，以五十二师、十九师和浙保 6 个团、南京税警团、保安大队等 10 余万兵力由西北到东南，向浙西南、浙南游击根据地进行“围剿”。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军民在浙西南特委的领导下进行了顽强的反“围剿”斗争。国民党利用地方保甲长、地主、土豪武装组织“剿共义勇队”“壮丁队”，实行移民并村，配给粮、盐等手段，割断红军与群众的联系。在政治上，到处大造舆论，散布“朱、毛红军已投降”等反动谣言。还颁布了所谓“通红军者，为红军送粮、送消息者，知红军不报者，捉杀不赦”等十条法规和“捉到红军首领赏 500 大洋，捉到一名红军赏 50 大洋”的奖赏条例。妄图将游击根据地一口吞下，反动气焰嚣张，手段凶狠。

浙西南特委在闽浙边临时省委的领导下，面对大军压境的严酷形势，一面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一面把隐蔽精干、保存力量和灵活机动、积极作战的方针统一起来，采取集中打击敌人、分散隐蔽活动的灵活战术，进行反“围剿”斗争。但是，由于敌人的力量异常强大，至 1937 年五六月，浙西南特委副书记杨干凡、特委书记许信焜先后牺牲，特委第二次遭破坏。面对敌人的进攻，浙西南特委下属的龙浦、龙遂县委和挺进师二纵队始终在闽浙边区坚持斗争，直至抗战全面爆发。

（三）第三阶段（1937 年 12 月—1938 年 5 月）

根据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与国民党浙江地方当局达成的协议，1937 年 10 月中旬，分散在浙西南的红军游击队先后汇集平阳北港。龙浦县委书记张麒麟和龙遂县委书记曾友昔率领的浙西南红军游击队及龙浦、龙遂县委干部 60 余人于 10 月底开赴平阳参加集中整编。

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共东南分局的指示：“浙江地理位置重要，原来的浙南根据地不能放弃，要留下一些人在浙江继续坚持斗争。”东南分局领导曾山一再强调浙南根据地是“十年血

战”的结果，是“今后抗战和进行革命斗争的重要战略支点”，“无论如何不能放弃，一定要保存。”为了保持和发展南方革命战略支点，闽浙边临时省委决定恢复浙西南特委，由张麒麟、傅振军、刘清扬、周建生、曹景垣、曾友昔等 6 人组成，张麒麟任书记。1937 年 12 月，张麒麟率领特委机关 20 多人，回到浙西南根据地。

特委领导回到浙西南后，就迅速在龙、遂、浦边区开展工作。一是恢复党的组织和发展党员，恢复建立了龙泉、遂昌、江浦县委；二是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三是进行合法斗争，推行“二五减租”，改善人民生活；四是组织“农救会”和“妇救会”等。

1938 年 5 月，根据浙江临时省委决定，将中共浙西南特委改为中共处属特委。中共浙西南特委作为一个党的地方组织至此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而中共处属特委又以更加旺盛的生命力领导着浙西南人民为着党的伟大事业阔步前进。

三、中共浙西南特委在领导浙西南人民进行革命斗争中所体现出的高贵品质和崇高精神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

浙西南特委领导浙西南人民进行革命斗争，面对强敌，英勇无畏，前仆后继；面对艰难险阻，迎难而上，从不畏惧。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为了大局利益甘愿牺牲自己，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体现出了高贵的品质和崇高的精神。

第一，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信念

共产党人有坚定的革命信念，这个信念就是为了党的事业，不惜“抛头颅，洒热血”。1935 年 5 月，浙西南特委第一任书记宗孟平上任不久即遭到敌人的“围剿”，6 月初就不幸遇袭牺牲。对于这个责任重大而身处危险环境中的职务，黄富武毫不犹豫地接任了第二任书记，但 10 月又被敌人逮捕，12 月在丽水被杀害。从 1935 年 6 月起就担任浙西南特委副书记的杨干凡于 1937 年 5 月在龙泉凤阳山战斗中为掩护部队突围而壮烈牺牲。1936 年 6 月，许信焜在浙西南根据地丧失后最困难时候，受命接任第三任特委书记，担当恢复浙西南特委的重任。1937 年 6 月，他在带伤率部队重返浙西南恢复老区的过程中，牺牲于龙泉锦溪。还有特委领导方志富、洪家云、欧阳道以及县委、区委、基层组织的许多干部党员都为浙西南革命斗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第二，不畏艰难险阻的英雄气概

浙西南特委从建立到 1938 年改为处属特委的三年时间经历了“两落两起”，两次因遭受敌人“围剿”被破坏，又两次进行了恢复重建。在这三年中，浙西南特委经历了无数次的艰难险阻，但浙西南特委及下属的党组织面对艰难，面对危险，从不畏惧，表现出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1935 年，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正在长征途中，全国革命处于低潮，为在处于国民党统治腹心地区的浙江建立革命根据地，策应中央红军北上，浙西南特委果断地开展了“打土豪、

分田地”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这不能不说需要有非凡的胆量。当挺进师主力部队撤离浙西南后，浙西南特委和挺进师二纵队面对的是比自己力量强大几十倍的敌人，但他们从不畏惧，英勇奋战，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以许信焜为书记的浙西南特委，为完成重建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任务，历经千辛万苦，克服千难万险，终于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以牺牲生命的代价，为整个浙西南的革命斗争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当挺进师接受整编即将开赴抗日前线的时候，为挺进师作出过重要贡献的挺进师老红军张麒麟等人，却心甘情愿按照组织安排回到条件异常艰苦的浙西南工作，直至把生命献给了浙西南的革命事业。

第三，甘愿牺牲自己的全局观念

浙西南特委在领导浙西南人民进行革命斗争过程中，以全局利益为重，甘愿作自我牺牲。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开展游击战争，这是中共中央根据全国战局的总体考虑作出的部署。目的在于在国民党蒋介石的后院燃起大火，牵制敌人兵力。挺进师不折不扣地贯彻了中央的意图，并起到了很大的效果。特别是浙西南特委领导下的浙西南根据地作出了更大的牺牲。当 1935 年 9 月底挺进师主力撤出浙西南后，浙西南特委和挺进师二纵队、五纵队面对强敌，奋勇抗击，誓死抵抗，以巨大的牺牲牵制了敌人强大兵力，支援了整个浙南地区游击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1937 年初，浙西南特委书记许信焜等率领的少量武装部队在浙西南活动，得知了敌人开始“围剿”的消息，为了减轻敌人对浙南省委驻地的压力，根据省委部署，便一直在浙西南地区与敌人周旋，最后，特委书记许信焜和副书记杨干凡都英勇牺牲在浙西南。1937 年 12 月，根据上级决不能放弃浙西南斗争成果的要求，第四任特委书记张麒麟毅然回到条件异常艰苦的浙西南。

第四，与人民群众的血肉之情

浙西南根据地的革命斗争，最难能可贵的是党和人民群众建立起来的深厚感情。浙西南根据地的革命群众或参加革命当红军，或支持红军消灭敌人。广大群众主动组织起来为战场上的游击队送饭送茶水，救护伤病员；他们拿出家里仅有的一点口粮给战士们吃，甚至将未成熟的谷子、玉米炒干磨成粉给伤病员吃，自己吃糠咽野菜。为了革命事业，许多党员、群众被抄家，被烧掉房屋，有的家破人亡，有的受尽折磨，落下终身残疾，有的惨遭杀害。但他们还是宁死也要保护共产党、红军、游击队。1935 年 1O 月，龙泉县住龙乡郑惠村有一位交通员叶张宝（非党员）因拒绝给敌人带路去抓红军伤病员，被割掉耳朵、鼻子，后又被杀害。但村里其他人并没有被敌人淫威吓倒，他们继续做叶张宝未做完的事，继续精心照料红军伤病员，直到 18 位伤员同志伤愈归队。

中共浙西南特委在领导浙西南人民进行革命斗争中，以高超的领导艺术和非凡的胆略与气魄，为浙西南地区的革命斗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们所体现出的高贵品质和崇高精神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他们的英雄业绩永远值得我们仰慕，他们的高贵品质和崇高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原载《丽水党史》2011 年第 2 期，作者单位：中共龙泉市委党史研究室）

红军挺进师的历史功绩

周德春

1935年春，在红军主力被迫进行长征、中国革命面临严重危机之时，红军挺进师临危受命，进入浙江开展游击战争。仅500余人的挺进师，孤军深入国民党统治最严密的浙江，作出了怎样的历史贡献，有着怎样的历史功绩？本文谨对此作一探析，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

一、挺进师从战略上策应了长征，支援了邻近游击区的斗争

1934年6月下旬，在第五次反“围剿”面临失败、红军主力被迫将要退出中央苏区之时，中央令红七军团改编为抗日先遣队，北上行动。其目的是“威胁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吸引和调动一部分‘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即将实行的战略转移”。10月17日，在先遣队北上行动的掩护下，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8.6万余人，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途，开始长征。11月4日，中央电令先遣队与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对外仍称抗日先遣队），执行开辟新苏区、策应红军主力战略转移的任务。1935年1月，由于兵力过小和“左”倾错误影响，先遣队行动失败，在江西怀玉山地区遭国民党军重兵包围进攻，指战员大部牺牲，仅粟裕、刘英率领的先头部队突出重围。

1月底，突围部队转移至闽浙赣苏区后，临危受命：组建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苏维埃根据地，以积极的作战行动，打击、吸引和牵制敌人，保卫闽浙赣基本地区和邻近的根据地，从战略上配合主力红军的行动。可见，挺进师的组建和入浙，与先遣队北上一脉相承，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战略策应长征。

2月下旬，仅538人的挺进师，踏上了挺进浙江的征途。5月初，经过艰难转战进入浙西南腹地的挺进师，立即在龙泉、松阳、遂昌、云和、景宁、丽水、汤溪、宣平、龙游等县境，广泛开展游击战和群众工作。至8月中旬，迅速在江山、浦城、龙泉、遂昌、松阳5县间建立起方圆百余里的游击根据地，掀起了浙西南革命高潮。游击区域则发展到北抵浙赣铁路，南至闽浙边界西段，西及闽赣边境，东至丽水、宣平的广大地区。

挺进师的行动，深深触痛了国民党当局的中枢神经，《东南日报》等惊呼：“浙江素称平安之区，自粟、刘窜浙后，‘匪化’已波及全浙，以目下形势而论，浙江共匪不亚于四川、江西之匪……前途实堪可虑！”为此，国民党当局先后任命卫立煌、罗卓英为闽赣浙皖边区“清剿”总指

挥部的正、副总指挥，调集以第十八军为主力的七万大军“清剿”浙西南。罗卓英任军长的第十八军，下辖四个师，是陈诚起家的老本，装备精良，人员充实，训练有素，战斗力强，后来成为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诸如黄维、霍揆彰、李树森、宋瑞珂、胡琏、阙汉骞、高魁元等师、团长，后来都是国民党军中的著名人物；第十八军又是长期在江西“剿共”的老手。可见，挺进师的行动，迅速吸引和调动了国民党军主力。

9 月 19 日，国民党军开始对挺进师及其浙西南游击根据地进行了长达 8 个多月的血洗。此间，“挺进师以少量兵力抗击了国民党军大部队的进攻，不仅歼灭了敌人的部分有生力量，而且牵制了敌人几十个团的兵力，掩护了挺进师主力南下浙闽边开辟新的游击区，打破了国民党妄图于 11 月 20 日前将挺进师‘肃清’的计划。”

这就是说，挺进师在浙西南燃起革命烈火，建立根据地，等于把革命烈火烧到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后院，在国民党当局的背后插上一把尖刀，迫使国民党当局无法安心“围剿”长征中的红军主力；挺进师迅速吸引、调动国民党军主力，直接抗击、牵制国民党 7 万大军长达 8 个月，减轻了红军主力长征的军事压力。同时，挺进师有力地支援了闽东、闽北、皖浙赣等邻近游击区的斗争，减轻了这些游击区的军事压力，使这些游击区赢得了恢复和发展的机会。诸如闽北党组织新建立了闽北、闽西北、闽中 3 个地委，所属县委从 8 个发展到 20 个，闽东党组织重组了闽东特委和闽东独立师，建立了 4 块比较巩固的游击根据地等等，与挺进师的斗争直接相关。

因此，挺进师从战略上策应了红军主力长征，支援了邻近游击区的斗争，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

二、挺进师重新开创了浙江革命基业，为中国革命在南方建立了一个重要战略支点

浙江是蒋介石以及国民党右派核心人物的家乡，江浙财阀的老巢，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后院，反动势力盘根错节。浙江自 1922 年建立中共组织，至 1927 年 6 月建立中共浙江省委。在两年不到的时间里，省委屡遭破坏，先后有 8 位书记和 15 位委员以上领导人牺牲，其中张秋人书记上任 3 天即被捕牺牲。挺进师入浙前，党在浙江曾先后发动和领导了浙东暴动等 60 余次武装斗争，遍及 50 多个县，但均告失败。甚至红十三军大规模的武装斗争也遭镇压。至挺进师入浙时，浙江的中共组织几乎已被破坏殆尽，革命斗争完全转入了低潮。

挺进师就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迅速创建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掀起浙西南革命高潮。国民党军大规模“清剿”浙西南时，挺进师主力迅速挺进敌后，开辟闽浙边、浙东游击根据地。1936 年 6 月以后，挺进师再次掀起新的革命高潮，不仅建立了浙南游击根据地这一大后方，恢复了一度丧失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而且在浙东、闽浙边、遂（昌）宣（平）汤（溪）边区以及青（田）瑞（安）边区的五云山等地建立了小块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基点，活动范围扩大到 30 多个县。1936 年底，面对国民党军再次更大规模的“清剿”，挺进师将士英勇奋战，不仅打破了敌人的“清剿”

计划，而且发展了根据地，壮大了革命力量，直至实现浙江的国共合作抗日新局面。可见，挺进师重新开创了浙江革命基业。

经过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挺进师在浙江建立了浙西南特委、浙南特委等大批党组织，这些党组织成了浙江革命事业的领导核心，为其后的浙江革命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培养、造就并留下了诸如浙江省委书记刘英，常委谢文清、龙跃，委员林辉山、张麒麟、郑丹甫、陈昌会、刘清扬，统战部副部长吴毓，浙南特委书记龙跃，处属特委书记傅振军，浙西南特委书记张麒麟，台属特委总特派员刘清扬等大批领导骨干，为其后的浙江革命奠定了坚实的干部基础；挺进师深入的群众工作，严明的纪律，时时处处为群众谋利益的行动，广泛地觉醒、教育了群众，为其后的浙江革命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挺进师瓦解“大刀会”，联合、改造“青帮”，团结争取开明的社会人士和国民党基层政权人员，建立“白皮红心”两面政权等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为其后的浙江革命奠定了广泛的统一战线基础；挺进师积极争取团结抗日，并根据形势发展自觉调整政策，倡议并实现浙江的国共合作抗日，为浙江奠定了团结抗日的工作基础。此外，挺进师指战员的胆略气魄、革命信念、英勇气概、顽强意志，以及从血与火中得出的经验教训、领导艺术、策略思想，都深刻地影响着后来浙江革命的领导者和中坚力量，并经他们继承和发扬，对后来的浙江革命产生重要作用。正如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曾山前往浙南传达中央指示时所指出，浙江是“今后抗战和革命斗争的重要战略支点”。后来浙江的革命斗争事实也充分证明，挺进师开创的浙江革命基业，是中国革命在南方的一个战略支点。

因此，挺进师重新开创了浙江革命基业，为中国革命在南方建立了一个战略支点。

三、挺进师为中国革命造就和输送了一支劲旅

1938 年 3 月，粟裕、陈铁军、张文碧等率挺进师改编的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七团队开赴皖南前线抗日，从此驰骋于抗日战场。4 月 18 日，部队到达皖南后，与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合编，改番号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三营。粟裕任第二支队副司令员，陈铁军任军部侦察科科长，张文碧任第四团军法处处长，余龙贵先后任第三营副营长、营长。

原挺进师主力所在的第三营从皖南出发东进，突破宣芜铁路封锁线，进抵京芜铁路以东、京杭铁路以西苏皖边的江（宁）当（阳）溧（水）高（淳）地区，开展游击战，成为华中抗日战场上的一支劲旅。从 1940 年开始，三营逐渐发展为新四军的两支英雄部队：5 月，在江南茅山，以三营为基础，组建了新四军新二支队的两个主力团——新三团、新四团。新四团保留了三营建制，军史上称其为老三营。10 月，老三营渡江北上，驰援黄桥，杀入顽军第三十三师纵深，为取得黄桥自卫反击战胜利立下战功。后与兄弟部队合并组建了新四军著名的三旅七团，在陶勇指挥下驰骋江北，屡建奇功。谢家渡一战，七团名震大江南北，被军部授予老虎团称号。新三团和新四团则随新二支队机关留守江南，后成为王必成麾下劲旅。此后 8 年间，三旅七团先后改

编为新四军苏浙军区三纵队七支队，华中野战军八纵队六十四团、一师三旅七团和华东野战军四纵队十二师三十四团，1949 年整编为第三野战军二十三军某团；新二支队则先后改编为新四军第十六旅、苏浙军区第一纵队，华中野战军第六纵队第十六旅和华东野战军第十六师，1949 年整编为第三野战军二十四军某师。两部先后参加了天目山反顽及高邮、苏中、鲁南、莱芜、孟良崮、豫东、淮海、渡江、上海等著名战役，战功卓著。

此外，挺进师还培养和造就了一批高级军事人才。共和国第一大将粟裕，少将陈铁军、张文碧、刘亨云等，均直接出自挺进师。就粟裕而言，在浙江开展和坚持的三年游击战争，是其军事生涯中最重要的阶段。挺进师尚未进入浙江，便与党中央和上级失去了联系，由此，粟裕承担起了独立指挥军事斗争的艰巨任务，开始了独当一面的军事生涯。挺进师的三年游击战争，不论战略上还是战术上，对于粟裕军事思想的形成和成熟，对于粟裕军事指挥才能的磨练，都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粟裕在抗日战场和解放战场的突出表现，正是得益于三年游击战争的锤炼。

因此，挺进师为中国革命造就和输送了一支劲旅。

四、挺进师创造性地探索与总结了游击战略战术和根据地建设经验

1935 年 9 月，面对罗卓英指挥的以第十八军为主力的国民党七万大军的大规模进攻，经过发展后仍只有近千人的挺进师，处境异常艰难和危险，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斗争时集中优势兵力歼敌一路以打破敌人进攻的作战方针已不适用。对此，挺进师创造性地提出和实施了“敌进我进”方针，不仅在敌人残酷的打击下仍然顽强地屹立在浙江大地，而且开辟了新的游击根据地。

1937 年初，面对刘建绪指挥十万大军更大规模的进攻，挺进师则提出和实施了“化整为零”的方针，分散部队，与国民党军相向对进、易地而战，不仅打破了强敌的大规模进攻，而且发展了根据地，壮大了革命力量，胜利迎来了抗日浪潮。

在游击战的战术运用上，挺进师探索和总结出了如下原则：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胜利；不在于消灭敌人，而在于消磨敌人；支配敌人，掌握主动；积极进攻，绝少防御；飘忽不定，出没无常；越是敌人后方，越容易成功。在作战行军宿营方面，挺进师探索和总结出了如下要领：反敌人之道而行，并竭尽欺诈之能事，敌进我退（进），敌集我散，敌强我避，敌弱我欺，避实就虚，声东击西；不要企图太大，只要常有小胜；站在敌人侧翼、后方和圈子外围，不为敌人所合击；一切作战行动必须迅速、勇猛、坚决，绝不迟疑犹豫；注意使用突然的白刃袭击。在隐蔽行动和企图的方式上，挺进师探索和总结出了如下方式：兜圈子、大小圈、“8”字形、“S”形、电光形、回马枪、东去西返、早出晚归。在隐蔽行动和企图的要求上，挺进师探索和总结出了如下要求：做到飘忽不定、出没无常，使敌人无法捉摸；行军沿途留专人清除痕迹，扶起压倒的草，抹掉脚迹，有时在反方向制造痕迹迷惑敌人。

在开辟和建设根据地方面，挺进师有着独到的探索和总结。挺进师入浙之初，按照中央苏区的方法，以打土豪、分田地为基本政策，公开发动群众，建立党组织、苏维埃政权和地方游击队，开展土地革命，迅速创建了浙西南游击根据地。这对于挺进师迅速打开局面和策应长征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在敌强我弱之时，这样的斗争是难以长期坚持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暂时丧失，挺进师和浙西南人民付出的沉重代价，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对此，挺进师在之后的斗争中，改变了原来的方法，“把公开的武装斗争同隐蔽的群众工作更加有机地结合起来”，并明确提出，“为了长期坚持敌后，形成比较巩固的游击区”，“不仅要有相对稳定的较大块的游击根据地，而且在较大块的游击根据地周围，还必须建立一些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和若干的游击基点；这些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基点，有公开的，有秘密的；在你来我往、敌人势力比较强大的地区，还应有‘白皮红心’式的两面政权，使整个游击区形成几种类型的结合”。这样一来，“部队打了仗，疲劳了，一个晚上急行军便转到了游击根据地或游击基点”，“休整三五天，侦察好敌情，计划好下一步的行动部署，再跳出去，打击敌人”，“部队要作较长时间的休整或准备打击进犯的敌人，就进入到基本区。各种类型的游击区给游击队创造了活动自如的环境，使游击队如鱼得水。”在刘建绪指挥的国民党军第二次大规模“清剿”中，挺进师之所以行动自如，出色地开展了反“清剿”斗争，正是得益于此。

因此，挺进师创造性地探索与总结了游击战略战术和根据地建设经验，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

总之，挺进师从战略上策应了红军主力长征，支援了邻近游击区的斗争；重新开创了浙江革命基业，为中国革命在南方建立了一个战略支点；造就和输送了一支革命劲旅；探索与总结了游击战略战术和根据地建设经验。挺进师的历史功绩，无不证明党的伟大、光荣、正确；挺进师的历史经验，对社会主义建设不无借鉴作用。

（原载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足迹》2011年第3期，作者单位：遂昌县史志办公室）

浙西南革命根据地若干问题探析（节录）

周德春

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建立于全国革命形势转入低潮之时，是南方游击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历史功绩。本文就其名符其实性、历史功绩、特点和独立性作一探析。

一、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概况（略）

二、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名符其实性

关于什么是革命根据地，彭德怀在《论革命根据地与武装斗争》一文中作过如下论述："在某些地区有了革命的武装、革命的政权、革命的群众组织、革命的政党——共产党（而且前面的三种组织都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这四种组织在一定地区能够公开的合法的存在，各自执行自己的职权（如政权执行自己的法令、纪律、各种制度），这样的地区，就叫做革命根据地。"① 邓小平在《根据地建设与群众运动》一文中也指出："一个革命根据地……其本身必须具备着革命的武装、政权、群众组织和党等四种力量……这四种革命力量是缺一不可的，缺了一种都不能形成革命根据地。这四种力量又是互相配合的，任何一部分不得力都会影响到其他部分，互相配合不好也会使根据地受到损害。"②

根据彭德怀、邓小平上述关于革命根据地的论述，可以肯定，挺进师最迟于 1935 年 8 月已在浙西南建立革命根据地，此时的浙西南地区，完全具备上述革命根据地的条件。

首先，浙西南地区有了革命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组织。1935 年 3 月，挺进师进抵闽北崇安县境时，为适应游击斗争，加强党政军各方面的统一领导，成立了以刘英为书记的挺进师政治委员会（简称政委会）。这是领导挺进师行动区域内各方面工作的最高党组织。6 月上旬，挺进师政委会在松阳小吉会议上，决定建立以宗孟平为书记的中共浙西南特委。这是第一个统一领导浙西南地区党的工作的中共组织。之后，通过培养和发展积极分子入党，在龙泉、浦城边境建立了隶属中共浙西南特委的龙（泉）浦（城）县委及其下属的大北、小北 2 个区委；在松阳县境建立了直属中共浙西南特委的竹溪、玉岩 2 个区委；在遂昌县境建立了直属中共浙西南特委的王村口、遂（昌）汤（溪）2 个区委；并在浙西南各地建立了 50 多个中共支部，拥有

①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46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64 页。

党员数百名[①]。

其次，浙西南地区有了革命的政权——苏维埃政府。挺进师在深入宣传和组织群众中，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发动群众选举公道正派、积极勇敢、乐于为群众办事的贫苦农民担任地方干部，建立工农自己当家作主的革命政权——苏维埃政府。1935 年 7 月初，挺进师地方工作团干部杨林等人，在松阳县高坛背主持召开会议，建立了竹溪区苏维埃政府。7 月 22 日，挺进师政治部主任、中共浙西南特委书记黄富武和挺进师地方工作团干部朱干等人，在松阳县外南坑主持召开群众大会，建立了玉岩苏维埃政府。8 月 20 日，挺进师干部、中共龙（泉）浦（城）县委书记方志富，在龙泉县住溪廖家祠堂主持召开群众大会，建立了住溪苏维埃政府。8 月 26 日，挺进师第二纵队政委、中共浙西南特委委员洪家云，在遂昌县王村口宏济桥主持召开群众大会，建立了王村口苏维埃政府。同时，各地普遍建立了乡、村苏维埃政府。其中，竹溪区苏维埃政府下辖黄南乡和燕田等 20 多个村苏维埃政府，玉岩苏维埃政府下辖高亭、小吉、枫坪、斗潭、安岱后 5 个乡苏维埃政府和 54 个村苏维埃政府及 80 多个村分田委员会，住溪苏维埃政府下辖上田、竹垟、宝溪、独源、大横坑 5个乡苏维埃政府和 35 个村苏维埃政府及分田委员会，王村口苏维埃政府下辖王村口、山枣坪、葛程、后塘、山前、对正、关塘、独口、凉岭下 9 个乡苏维埃政府[②]。

再次，浙西南地区有了革命的武装——红军挺进师和地方游击队。挺进师各部通过广泛的游击战，特别是八一大示威行动，分兵袭击 19 个城镇，缴获长短枪 100 多支、轻机枪 2 挺，扩充红军新战士 400 余人，筹集军饷数万块银元，使革命武装得到迅速发展、壮大，挺进师第四支队扩编为第四纵队[③]，新组建了第十五独立支队（后扩建为第五纵队），建立了浙西南军分区、松（阳）遂（昌）龙（泉）游击总队和 150 余支地方游击队[④]。

第四，浙西南地区有了革命的群众组织。1935 年 6 月，挺进师建立了 100 余人的地方工作团，着重开展群众工作。之后，浙西南各地建立了农民协会、妇女会、共青团、儿童团等各种革命群众组织。在王村口等地还建立了工会、商会、互救会等群众组织。

另外，浙西南的中共组织、红色政权、革命武装和革命群众组织，自 1935 年 6 月初开始逐步建立，至同年 9 月下旬在国民党军的血洗下逐步遭破坏。在中共组织的领导下，这 4 种组织各自执行着自己的职权，并互相配合，有效地开展了各项工作。挺进师政委会、浙西南特委及其所属的各级中共组织，按照各自领导的区域，分级负责，领导着根据地的各项建设、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

---

① 中共丽水地委组织部、丽水地委党史研究室、丽水地区档案馆：《中国共产党浙江省丽水地区组织史资料》，新华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0—25 页。

② 中共丽水地委组织部、丽水地委党史研究室、丽水地区档案馆：《中国共产党浙江省丽水地区组织史资料》，新华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0—33 页。

③ 刘英：《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1940 年夏），中共丽水地委党史研究室：《浙西南游击根据地》，1995 年 10 月刊行，第 66—67 页。

④ 中共丽水地委组织部、丽水地委党史研究室、丽水地区档案馆：《中国共产党浙江省丽水地区组织史资料》，新华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8—39 页。

在中共浙西南特委及其所属中共组织的领导下，浙西南各地的苏维埃政府按照管辖范围，宣传、发动、组织群众，开展根据地建设，开展以查田、插标、分青苗为主要内容的土地革命，协助挺进师部队和地方游击队进行武装斗争。各苏维埃政府开展土地革命所实行的政策和采取的方法与中央苏区类同，各村苏维埃政府首先核查土地、登记造册，然后插标、分配土地（俗称分青苗）。进度快的村庄，农民于是年八九月间领到了标明户主姓名、田亩数量和地名等内容的红色土地证，收获了所分配土地的庄稼。

在挺进师政委会和浙西南特委的领导下，挺进师部队和各地方游击队一面开展武装斗争，实行武装割据，保障根据地建设，一面开展军事建设，进行军事训练，建立交通网络和硝磺厂、枪械修理所、军械库、红军医院、军需物资供应站、缝纫厂等后方基地。“松（阳）遂（昌）之间的安岱后、大潘坑、大横坑、苏马坪，龙（泉）遂（昌）之间的玉岩、枫坪、小吉、上田、东畲，遂（昌）西南的王村口、独口，龙（泉）西的碧龙、住溪，福建浦城的毛洋，甚至丽水的雅溪、曳岭、丽云，龙（泉）南的季山头、黄桶……几乎是一片红火。这些基本地区，建立了红色游击队，发展了群众武装……（挺进师）师部和领导中心放在王村口，还建立了后方基地。王村口的后山上（后塘村）就有军需物资供应站、军械修理所和伤病员休养所”，“武装斗争为建设根据地打开了道路并提供了保障，根据地建设支持了武装斗争”①。

在各级中共组织和苏维埃政府的分别领导下，浙西南各地的农民协会、妇女会、共青团、儿童团等各种革命群众组织，向各自的工作对象开展工作，有效地发动、组织了各界群众，加快了根据地建设和土地革命。粟裕对此的回忆是：“这些基本地区……各种革命群众组织普遍建立……在党的浙西南特委统一领导下，各项工作不断深入开展。”②

总之，1935 年 6 月至 9 月的浙西南地区，有着革命的武装、革命的政权、革命的群众组织、革命的政党，公开、合法地存在着，前三者在中共组织的领导下，各自执行自己的职权，并互相配合，发动、组织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因此，挺进师最迟于 1935 年 8 月已在浙西南建立了根据地，而且是名符其实的革命根据地。

三、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功绩

第一，浙西南革命根据地是在全国革命形势转入低潮时新建立的，对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红军挺进师入浙时，“长征中的红军主力处于国民党军重兵围追堵击之中，其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广大白区的工作均陷入困境，国民党军继续以堡垒战分割东南各省苏区，对红军进行分进合击，闽浙赣苏区和红军游击队处于国民党军的重重包围‘进剿’之中”③，全国革命形势完全转入了低潮。浙西南革命根据地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创建的。当中国

①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55—156 页。
②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55 页。
③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丛书之《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浙南游击区》，解放军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 页。

革命最为艰难、全国革命形势转入低潮时，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并在国民党统治最严密的腹心地区浙江燃起革命烈火，这对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极大地鼓舞和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

第二，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及其斗争，从战略上策应了长征，支援了邻近游击区的斗争。浙江是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后院，不仅是陈诚、汤恩伯等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老家，而且是蒋介石的老家，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等于在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后院构筑了革命堡垒，犹如在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床前卧着一条猛虎，极大地威胁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后院的安全；“素称平安之区”的浙江，是国民党统治最严密的腹心地区，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等于在国民党统治集团的背后插上一把尖刀，从国民党统治最严密的腹心开了花，极大地威胁了国民党统治地位；江浙财阀是国民党统治的重要经济基础，也是维系国民党当局“剿共”军费的最大来源，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极大地威胁了国民党统治的经济基础和国民党当局“剿共”军费的来源。正因为如此，国民党当局在闽浙两省地方武装对付不了挺进师的情况下，迅速抽调中央军主力入浙，调集以第十八军为主力约七万兵力“清剿”浙西南。罗卓英任军长的第十八军，下辖四个师，是陈诚起家的老本，装备精良，人员充实，训练有素，战斗力强，后来成为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诸如黄维、霍揆彰、李树森、宋瑞珂、胡琏、阙汉骞、高魁元等师、团长，后来都是国民党军中的著名人物；第十八军又是长期在江西“剿共”的老手，由此可见浙西南革命根据地所吸引敌人的兵力之强。国民党军的“清剿”，自 1935 年 9 月 19 日发动，直至 1936 年 6 月两广事变爆发才结束，由此可见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牵制敌人的时间之长。这直接迫使了国民党当局无法安心地全力“围剿”长征中的红军主力，减轻了红军主力长征的军事压力，从战略上策应了长征。

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不仅牵制敌人、掩护挺进师主力南下开辟了浙南游击根据地，而且减轻了闽东、闽北、皖浙赣等邻近游击区的军事压力，使这些游击区赢得了恢复和发展的机会，有力地支援了这些游击区的斗争。期间，闽北党组织新建立了闽北、闽西北、闽中 3 个地委，所属县委从 8 个发展到 20 个；闽东党组织重组了闽东特委和闽东独立师，建立了 4 块比较巩固的游击根据地。

正如刘英向中央报告所说：“浙西南斗争极为重要……尤其是挺进师到达浙江行动以来，不仅牵制了进攻闽北闽东之敌，而且对于闽浙赣皖四省边区斗争的发展，也有极重要的意义。”[①] 也如粟裕所说：“在敌人的心腹区域沉重地打击敌人，较长期地吸引和牵制了敌人相当数量兵力……对敌人力量的消耗与打击是难以用数字表达的”，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策应了党中央和主力红军的战略行动，也在一定程度上配合和掩护了邻近兄弟游击区的斗争”[②]。

第三，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及其斗争，重新燃起浙江革命烈火，重新开创了浙江革命

① 刘英：《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1940 年夏），中共丽水地委党史研究室：《浙西南游击根据地》，1995 年刊行，第 75 页。
②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00 页。

基业，为中国革命在南方建立了一个战略支点。浙江是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后院，反动势力盘根错节，此前，浙江的中共组织已迭遭破坏，党在浙江发动和领导的革命斗争已屡遭挫折。至挺进师入浙时，浙江的中共组织几乎已被破坏殆尽，党在浙江发动和领导的浙东暴动等遍及50多个县的60余次武装斗争均已被镇压，甚至红十三军大规模的武装斗争也已遭镇压。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建立后，浙江的革命烈火自此重新燃起，浙江的革命斗争从此深入发展。

通过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建立了大批中共组织，培养造就了大批干部，广泛宣传发动了群众，深入开展了统战工作，为以后的浙江革命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干部基础、群众基础、统一战线基础和团结抗日的工作基础。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军民的胆略气魄、革命信念、英勇气概、顽强意志，以及从血与火中得出的经验教训、领导艺术、策略思想，深刻地影响着后来浙江革命的领导者和中坚力量，对后来的浙江革命产生着重要作用。因此，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及其斗争，重新开创了浙江革命基业；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已然成为了中国革命在南方的一个战略支点。正如1938年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曾山向浙江红军传达中央指示时所强调，已有的根据地是“今后抗战和进行革命斗争的重要战略支点”，“无论如何不能放弃，一定要保存”①。

第四，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及其斗争，使革命军民探索并总结了根据地建设经验。建立浙西南革命根据地时，是按照中央苏区的方法，以打土豪、分田地为基本政策，公开发动群众，建立党组织、苏维埃政权和地方游击队，开展土地革命，公开建立根据地。之后，面对国民党军大规模的进攻和血洗，革命军民认识到了这样的斗争在敌强我弱之时是难以长期坚持的。因此，在以后的斗争中，挺进师“把公开的武装斗争同隐蔽的群众工作更加有机地结合起来”，“不仅要有相对稳定的较大块的游击根据地，而且在较大块的游击根据地周围，还必须建立一些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和若干的游击基点；这些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基点，有公开的，有秘密的；在你来我往、敌人势力比较强大的地区，还应有‘白皮红心’式的两面政权，使整个游击区形成几种类型的结合”②，这为红军挺进师及其游击队创造了活动自如的环境，使之“如鱼得水”，“活动比前一阶段自如多了”③。在国民党军于1936年底发动的更大规模“清剿”下，红军挺进师及其根据地的斗争能长期坚持并取得胜利，正是得益于此。

此外，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及其斗争，还锤炼了革命军民，为中国革命造就和输送了一支劲旅。三年游击战争结束后，编入新四军的浙江红军，驰骋于抗日战场和解放战场，成为了一支革命劲旅；留在浙江的大批干部，成为了之后浙江抗战和革命斗争的领导骨干和中坚力量。

因此，浙西南革命根据地有着重要的历史功绩，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正如1937年12月

①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浙江党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339页。
②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71—172页。
③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77页。

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对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所指出:“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以后,在极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的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致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主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可宝贵的胜利。”[①]浙西南革命根据地正是这“南方各游击区”其中之一。

四、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特点

第一,浙西南革命根据地是创建在国民党统治腹心、深深触痛了国民党当局中枢神经的根据地。如前文所述,正是因为浙江特殊的战略地位,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极大地威胁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后院的安全,极大地威胁了国民党统治地位,极大地威胁了国民党统治的经济基础和国民党当局“剿共”军费的来源,因而深深触痛了国民党当局的中枢神经。以第十八军为主力的国民党7万大军,被迅速吸引、长期牵制在浙西南的斗争史实,足以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浙西南革命根据地不只是红军坚持斗争的游击区,而且是燃起了革命烈火、开展了土地革命的根据地。如粟裕所说:在浙西南形成了“空前规模的革命壮举”、“全国革命低潮中的一个局部的高潮”,“胜利的欢呼声,山鸣谷应,日夜不绝”,“群众开始了紧张的查田运动,量地插标”,“分配青苗和土地”[②]。王村口、住龙、玉岩乃至整个浙西南,完全被热火朝天的土地革命所席卷,到处是“分田分地真忙”的热烈场面。正因为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燃起了熊熊革命烈火,才使《东南日报》等发出“匪化已波及全浙”“前途实堪可虑”的惊呼,才使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抽调其中央军主力,集七万之众的兵力“清剿”浙西南。在全国革命形势完全转入低潮之时,如浙西南革命根据地这般燃起熊熊革命烈火,是极为罕见和难能可贵的。

第三,浙西南革命根据地是中央红军和浙西南人民共同创建、快速形成的根据地。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可追溯至1934年8月。是时,先遣队北上曾转战于浙西南的庆元、龙泉县境,并占领过庆元县城、竹口镇和龙泉小梅镇、八都镇,一路打土豪、开仓济贫,召开群众大会,张贴标语,向群众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先遣队继续北上时,又留下了后来归建入挺进师、由第五十五团第二营政委洪家云率领的两个连,长期在闽浙赣边境的崇安、浦城、江山、龙泉、遂昌、玉山、广丰等县境活动,期间曾两度袭取了后来成为挺进师师部驻地、浙西南革命根据地领导中心所在地的王村口。但是,建立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却是1935年5月之后。此前,挺进师艰难挺进浙江,艰苦转战于闽浙边,直到4月28日取得斋郎战斗胜利,才“打开了进入浙西南开辟游击根据地的通道”,才进入浙西南。从5月挺进师进入浙西南至8月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形成,只有短短4个月。所以说,浙西南革命根据地是快速形成的。浙西南革命根据地

①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202页。
②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53—156页。

之所以能够快速形成，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军民共建。1935 年 5 月上旬，挺进师刚进入浙西南时，一直在寻求共产党和红军的当地农民领袖、“青帮”（进步群众组织）首领陈凤生、卢子敬、陈丹山，立即带领群众迎接红军，在松阳斗潭村永福寺召开欢迎红军大会，并提出与红军“青红一句话，永远不分家”。这使挺进师有了初步依托。挺进师建立的百余人的地方工作团中，有着众多的当地农民积极分子。这些积极分子人地熟悉，刚好弥补了红军人地生疏、语言难通的弱点。有了这些地方干部的配合，群众很快被发动起来，根据地的建设顺利、快速地开展了起来，“农民群众踊跃参加党、政、军、群等革命组织”，“投入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因此，浙西南革命根据地是红军挺进师和浙西南人民共同创建、迅速形成的。

第四，浙西南革命根据地是中央苏区的传承和延续。跟随毛泽东、朱德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中央苏区斗争的刘英、粟裕，在领导创建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学习运用了井冈山斗争和中央苏区斗争的经验，使浙西南革命根据地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有着相似、相承的关系。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打击敌人，武装斗争与根据地建设相结合，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政权、开展土地革命三者相结合，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都是相似、相承的；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公开发动群众建立党、政、军、群革命组织，公开开展土地革命，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也是相似、相承的；甚至分配土地的政策也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基本相同；中央苏区实行了工农武装割据，浙西南同样实行了工农武装割据。正如粟裕所说：“在浙西南，基本上是按照过去中央苏区的做法，以打土豪、分田地为基本政策，并公开发展群众组织，公开建党、建政。”[①]因此，浙西南革命根据地是按中央苏区模式建立的，可说是中央苏区的传承和延续。

五、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独立性

众所周知，正是因为挺进师在浙西南建立革命根据地，掀起浙西南革命高潮，浙江保安团队等国民党地方武装对付不了挺进师，所以国民党当局调集以第十八军为主力约 7 万兵力，于 1935 年 9 月 19 日开始血洗浙西南。由此，挺进师主力跳出敌人包围圈，挺进敌后，调动、吸引和牵制敌人；挺进师第二、第五纵队和地方游击队坚持在根据地内，浴血保卫根据地。虽然根据地中心区域一度丧失，但是保卫根据地的斗争牵制了敌人，掩护了挺进师主力南下开辟浙南游击区。1936 年 6 月，国民党第十八军撤离浙西南，粟裕随即率部返回浙西南，恢复浙西南的工作。此后，“浙西南游击根据地逐渐得到恢复”[②]，其斗争一直延续到 1937 年 10 月门阵国共合作抗日和谈。

这就是说，挺进师在开辟浙南游击区之前已经建立浙西南革命根据地，浙南游击区是在浙西南革命根据地斗争的掩护下开辟的，浙西南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息，一直延续至浙南游击

①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65 页。

②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浙江党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96 页。

区的斗争结束之后。

然而，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这一历史，一直没有得到党史、军史学术界的普遍认可。《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就南方游击区的斗争记述道："从 1934 年下半年到 1937 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红军主力相继战略转移后留在长江南北的一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在……八个省的赣粤边、闽赣边、湘赣边、湘鄂赣边、湘南、皖浙赣边、闽西、闽东、闽粤边、闽北、鄂豫皖边、浙南、闽中、鄂豫边和琼海崖等十几个地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黄道领导的闽北地区，叶飞领导的闽东地区……粟裕、刘英领导的浙南地区……都紧紧依靠群众，开展了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游击斗争。"[①]其中并未提及浙西南。而按照习惯和《中共浙江党史》第一卷："浙南地区主要是指瓯江下游以南的广大地区。"[②]如此一来，瓯江上游的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其历史无疑被忽视而失去了。

如果说浙西南包括在"粟裕、刘英领导的浙南地区"中，把浙西南革命根据地作为浙南游击区的一部分，从记述挺进师斗争历史的角度来说，挺进师斗争的"中心先是在浙西南地区，以后移到浙南地区；而游击区域则遍及浙赣铁路义乌至江山段和天台山以南的浙江省南中部和闽东北边沿"[③]，无疑是准确的。但是，从斗争区域的角度来看，将浙西南、浙南两个存在于不同时间段、各自独立的斗争区域合而为一，并把斗争历史更长的浙西南革命根据地视为浙南游击区的一部分，这是不妥当的，既不能准确表述两地区的斗争历史，更不能体现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地位。

形成上述认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方面是由于浙西南的党史研究工作相对滞后，对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历史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另一方面与粟裕的谦虚、低调有一定关系。由于浙西南、浙南这两个地区的范围都不大，开展和坚持这两个地区斗争的都是挺进师，编入新四军时浙西南、浙南的红军部队人数不多，因而谦虚、低调的粟裕不会把浙西南、浙南视为两个斗争地区。浙西南后期的斗争主要是粟裕在领导，刘英主要在浙南领导斗争，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驻地也在浙南，并且刘英早在 1942 年已经牺牲，因而谦虚、低调的粟裕自然以浙南而不以浙西南为主来表述两地区的斗争，从而在其战争回忆录中称"浙南三年游击战争"。对于浙西南革命根据地这段历史，刘英已经牺牲，粟裕自然是最有发言权者，无论党史还是军史，学术界自然以粟裕的说法为准绳，但谁也没有考虑到粟裕谦虚、低调的因素；再加上浙西南的党史研究工作滞后，长期没有系统、深入研究和还原这段历史，以至于这段历史一直没有得到学术界普遍认识。

然而，有两点值得留意和思考：其一是虽然《粟裕战争回忆录》关于挺进师三年游击战的第六章标题为"浙南三年游击战争"，但是该章的第一节则是"挺进浙西南"，第二节则明确称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12—514 页。
②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浙江党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95 页。
③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43 页。

“创建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反而没有任何一节以“浙南游击根据地”或“浙南游击区”为标题[①]。其二是刘英于1940年向中央报告先遣队和挺进师的斗争情况时，则是称“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按时间分阶段叙述挺进师在浙西南和浙南的斗争情况，始终没有把浙西南作为浙南的一部分而称浙南三年斗争。

虽然浙西南和浙南两地区的斗争有着互相联系、互相配合，并且开展两地区斗争的都是挺进师的部队，但是两地区的斗争是分别开展和坚持的，开始的时间不同，开展浙南的斗争之前，浙西南已经成为革命根据地；结束的时间也不同，浙南的斗争于1937年8月底结束，浙西南的斗争则延续至1937年10月中旬；而且两地是分别独立地与国民党地方当局举行合作抗日和谈而结束斗争的。因此，作为斗争地区来说，浙西南是一块独立的斗争地区，浙西南与浙南正如闽东与闽北、浙南与闽东一样，虽然有着互相联系、互相配合，但却是各自独立的斗争地区。

其实，刘英、粟裕、叶飞等领导人是明确地将浙西南与闽东、闽北并列为各自独立且需互相配合的三个斗争地区的。1940年夏，刘英向中央报告说：“关于闽北闽东浙西南的斗争……我们的意见应成立闽浙赣边临时省委，包括闽北闽东浙西南”，“浙西南之斗争，经过了三四年之久，而且工作地区曾经发展到纵横将近五百里之宽。”[②] 粟裕也说：1935年“10月5日，我们在寿宁县境与闽东特委主要负责人叶飞同志等胜利会师……一致认为……如果我浙江与闽东、闽北三个地区能取得密切联系……定可更有力地打击敌人”[③]。粟裕这里所说的浙江，就是指浙西南，因为此时挺进师在浙南的斗争尚未开展。叶飞也说：“在成立闽浙临时省委的时候，刘英同志也曾主张设法同闽北地区取得联系，建立闽浙赣临时省委，来领导闽北、闽东、浙西南三个地区的斗争。”[④]

由此可见，浙西南是一个独立的斗争地区，是全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时新建立的一块完整的革命根据地，是一块与闽东、闽北并列的独立的革命根据地，是南方游击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浙西南革命根据地视为浙南游击区的一部分，不能准确表述浙西南和浙南两地的斗争历史，不能体现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地位，是不符合史实、不妥当的。

总之，浙西南革命根据地是全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时新建立的名符其实的革命根据地，有着重要历史功绩，具有自身特点，是与浙南、闽东及闽北并列的独立的革命根据地，是南方游击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原载于《丽水党史》2011年第4期，作者单位：遂昌县史志办公室）

①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43—202页。

② 刘英：《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1940年夏，引自1995年中共丽水地委党史研究室刊行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第74—99页。

③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62页。

④ 《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62页。

先遣队精神永放光芒（节录）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转战浙江(庆元)80周年

何建林

一、高举北上抗日旗帜，坚守理想、信念

……1934年7月7日，红七军团6000余人在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和政治部主任刘英及随军中央党代表曾洪易率领下，执行中央给七军团的任务："长期的到福建、浙江去行动，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域，一直到在福建、浙江、江西、安徽诸地界建立新的苏维埃的根据地；开展福建、浙江的反日运动；消灭敌人后方的单个部队；深入到敌人后方去，经过闽江流域，一直到杭(州)江(山)铁路及安徽的南部，以吸引蒋敌将其兵力从中央苏区调回一部到其后方去。"红七军团从红都瑞金出发，经古城，随后进入福建连城。与此同时，中革军委命令罗炳辉等率红九军团，从江西石城进入福建，掩护红七军团北上，渡过闽江后返回根据地。

8月1日晚，七军团夺取福建省德化县水口镇。翌日，召开"八一"纪念大会，军团领导向全体指战员传达中央关于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决定，正式打出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旗帜。为掩护主力红军长征，吸引国民党军注意力，以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先遣队高举北上抗日旗帜，甘当急先锋，坚决听从中央指令，敢于攻坚克难，执行北上抗日任务。

二、顾大局，舍小我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高举抗日旗帜，坚决执行中央决定，顾大局，舍小我，一路前行。遇到阻扰予以坚决还击，扫除前进道上的一切障碍。并不失时机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粟裕回忆说："为着全局的需要，当时派出一支部队到敌人深远的后方去活动，争取在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时对敌人起一定的牵制作用，这从战略指导上说，是可以的。"

1934年8月26日，先遣队由福建寿宁县硖头进入浙江庆元县境。经龙溪乡荡口、后洋坑，在岙里村遭反动地主武装大刀会拦阻，先遣队击溃大刀会，向国民党荷地区署驻地举溪村前进。27日凌晨攻占荷地区署，并将县保卫团的小分队围困在碉堡内，又分设了警戒。红军在该村书写了大量宣传抗日标语，用行动告诉群众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红军离开后，群众在菜

地里发现红军用纸包着的“这是两个南瓜钱”的纸币），是穷苦人民的队伍。“红军虽然是6000多人的队伍，在举溪村听不到吵闹声，而且有的百姓跑出去时将房间门上了锁，红军宁可住屋檐底下，也不愿骚扰百姓”等佳话至今还在群众中流传。

8月28日中午，先遣队运输部队在濛淤桥头被后面的国民党保安两个连队赶上。保安队问红军是哪个部队的，红军随口答是国民党某部的。保安队误认是自己的部队，正欲超前追赶。运输兵为避免前面红军吃亏，乘机突然发起攻击，击毙敌军头领，前面的红军闻枪声回援，两头夹击，保安队溃逃。

一路上，先遣队发扬顾大局、舍小我，先人后己、不怕牺牲的精神，坚定理想信念，认定目标毫不动摇。红军纪律严明，对群众秋毫无犯。路经周墩村头时，宁可绕道绝不踩坏庄稼；杀错了老农的猪，还了猪肉、补偿了钱，还向该村群众道歉；离开竹口时，及时归还借用百姓的物品，及时付给帮红军带路的农民及挑夫的工钱。红军用不扰民、不伤民、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实际行动，深刻影响着沿途群众。

三、宁可玉碎，不辱使命

1934年7月31日，红七军团已攻克福建古田县的黄田，正欲按计划向东北方向挺进，突然接到中革军委电令，令其东进袭取水口，威胁并相机袭取福州。福州南濒闽江，城墙高大，修筑有坚固的防御工事，易守难攻。但红七军团为了完成使命，明知此举困难重重，依然连夜改变行军部署，8月1日晚，夺取水口。7日，红七军团在敌情不明、又没有地下党配合的情况下，发动福州战斗。双方展开激战，敌军凭借坚固的工事和重机枪的掩护，居高临下，红军发起几次强攻，均不能奏效，凌晨撤出战斗。9日凌晨，在中革军委的指令下，红军调整部署，再次组织攻打福州，拼命与敌决战，终因敌军太强大又援军赶到，在遭受重大伤亡下被迫撤出战斗。

8月28日下午，红军占领庆元县城。30日凌晨，先遣队离开庆元，在竹口遭遇浙江保安三团、丽水警察大队、庆元保卫团3个团队的阻拦，经过激战，击退敌军组织的一次次进攻。夜幕下，终于击溃3个团队的联合进攻，击毙庆元县保卫团副团长丁某、敌营长1名及以下300余人，浙江保安二支队司令杜志成落荒而逃，浙保三团团长何世澄趁乱逃至龙泉天妃宫自杀。此战，共缴获迫击炮2门、轻重机枪10余挺、长短枪400多支，银元若干担（当时为了安全对外保密）。有20余名红军指战员在战斗中牺牲，红军的顽强战斗意志和勇往直前的精神流传至今。

9月18日，先遣队继续北上至遂安县（现淳安县）白马，接中革军委电令：“主力应迅速占领遂安，并保持之于我手中，以后则于安徽边境、淳安、寿昌、衢县、开化的范围内发展游击战争和苏维埃运动。”

蒋介石得知，非常恼怒，电令各县县长：“督率团队，固守待援，万一守御力尽，则与城共亡”，否则，“失陷城镇，糜烂地方，则军法俱在，决不姑宽”。在浙江不但国民党保甲制度严密、

地主武装等反动势力较强，而且交通便捷，有较强的保安团，又从各方面调动的围击部队临近，形成对先遣队围追堵截之势。先遣队面对党的薄弱地区，又没有群众基础，处境极其被动。而为了不辱使命，宁可玉碎，红军还是选择了深入敌后进行破袭活动。11 月初，先遣队经淳安，夜袭分水（现属桐庐县），该地距杭城只有 80 余公里，国民党急忙调集 5 个正规师的兵力前来堵截，先遣队遂放弃进军杭州，折向皖南。

11 月上旬，先遣队在安徽省歙县汤口镇与红十军（方志敏部）会师，后奉命合编成红十军团，方志敏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刘畴西任军团长，乐少华任军团政委，刘英任军团政治部主任，粟裕任军团参谋长，而对外仍称先遣队。原红七军改编为十九师，寻淮洲任师长，聂洪钧任师政委；原红十军改编为 2 个师，刘畴西兼任二十师师长，乐少华兼任师政委；胡天桃任二十一师师长。

四、主力情断怀玉山，突围保留火种

由于“左”倾错误的严重干扰，先遣队的命运被人为控制。他们的无知与专横给红军带来了惨痛的教训。

1934 年 12 月 14 日，红十军团进入浙赣皖交界处的怀玉山地区，此时外围已逐步被国民党军形成包围之势。1935 年 1 月 16 日，因敌情紧急，方志敏与粟裕等商定，部队应立即行动，先头部队先走，同时通知主力迅速跟上，当日夜必须全部通过陇首地段封锁线，进入闽浙赣苏区。当日夜间，粟裕率先头部队终于冲破敌封锁线，成功突围。而由于主力部队没有及时跟进，17 日，方志敏返回找到主力部队，立即组织突围，但为时已晚，敌人已加强了封锁线。1 月下旬，闽浙赣省委告诉先头部队，红十军团主力已被围困在怀玉山上，方志敏、刘畴西等大部分同志被捕了。

粟裕、刘英等率领先头部队，转移到闽浙赣苏区的德兴县境。按中央指示，后辗转至闽北根据地，并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成为南方战场很有影响力的红色火种。

粟裕回忆说：“怀玉山虽失败了，而红军指战员在遭围攻，或被分割、或被冲散的情况下，却仍然坚持各自为战，表现了革命战士无比坚定、无限忠诚和誓死与敌血战到底的大无畏精神。”

五、精神永恒，虽死犹生

1935 年 1 月 27 日，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同志在怀玉山的陇首封锁线上被捕。他在狱中写道：“地主们！资本家们！国民党的军阀们！不错，我是你们的敌人！你们一个可怕的敌人！你们出赏洋 8 万元来捉我，出 3 万元来捉我们的刘畴西同志，出 2 万元来捉王如痴同志，现在都被你们捉住了。呵！你们张开满口獠牙的血口哈哈的笑了！你们开庆祝会来庆祝你们的胜利了！你们满心欢喜以为又可安心去吞食工农群众的血肉了。且慢，吃人的东西！莫要欢乐过度！我们虽死，继续我们斗争的，还有千千万万的人呀！你们只能杀死我们几个，决

不能消灭中国革命啦！相反的，中国革命工农的铁掌，终有一天会将你们完全打得粉碎！”

“……晚间，他们要求我写点文字，我就写了几百字的略述。略述中着重说明：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我相信革命必能得最后的胜利，我愿为革命牺牲一切等，以免他们问东问西的讨厌。”

谁也忘不了老一辈共产党人方志敏留给后人的两篇传世之作：《可爱的中国》和《清贫》。一篇《可爱的中国》告诉世人：共产党人为什么要革命，为什么不怕流血牺牲，展示共产党人与祖国、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而《清贫》向人们表明：共产党人参加革命不是为了当官发财，也不是为个人谋利益；共产党人即使当了官甚至当了大官，为了百姓利益，也不计个人得失、甘愿过清贫生活。展示了共产党人的宽广胸怀和高尚品德。这正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红军先遣队的勇士们、先烈们，你们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勇往直前，虽死犹生。

粟裕在《回顾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一文中写道：“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斗争历史，首先是一部惊天动地的无产阶级革命战争的英雄史；同时也……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历史教训。这些血的教训有力地证明：违背了毛泽东思想，革命事业就要遭受挫折。”

1935 年 2 月初，根据中央电令，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关英在江西德兴县广财山戏台前向粟裕等突围先头部队传达省委会议精神，同时宣布以先遣队先头部队为基础，组建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2 月 27 日，召开了挺进师成立大会，省委书记关英传达了中央分局指示电。粟裕任师长，刘英任政委，黄富武任政治部主任，王永瑞任参谋长。并将先遣队竹口战斗派出押送战利品至闽北而赶不上部队的洪家云所率的一个营（已编入闽北红军第三团）重新划归挺进师。全师共 538 人，445 条长枪，轻、重机枪 12 挺，短枪若干支。

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虽只有 500 余人，但 500 将士勇闯重重难关，挺进浙江，并在浙江生根发芽壮大。1935 年 3 月底至 4 月初，红军挺进师政委会会议在庆元县安南乡半岭村召开，会议统一了挺进师指战员对前无接应、后无根据地依托，孤军深入浙江开辟根据地困难的认识；给每个纵队提供了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的保障；解决了挺进师深入敌后如何开展游击战争的系列问题。4 月 28 日，“关键性一仗”——斋郎战斗的胜利，红军挺进师打开了从不断被动挨打、撤退、转移到主动权紧紧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局面，并建立浙江第一块革命根据地——浙西南革命根据地。从此，红军挺进师擎起浙江革命的一片天，直到全国解放。正如粟裕夫人楚青 2005 年为斋郎村红军纪念亭题写的对联：“孤军深入庆元地，壮志开辟浙江天。”

（原载《丽水党史》2014 年第 3 期，作者单位：庆元县史志办公室）

试论红军挺进师和浙南游击根据地的重要历史地位

李　蓉

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和浙南游击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历史上光荣的一页。这段光荣历史，过去宣传不多，了解甚少。在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成立和浙南游击根据地创建80周年之际，回顾这段历史，更让我们感到红军挺进师和浙南游击根据地的历史，是英勇奋斗的历史，是值得传承革命精神的历史。这段历史，承载着红军指战员和当地人民群众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体现着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作风，在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上是不可或缺的一页。红军挺进师和浙南游击根据地的革命斗争历史将永载史册。我们要充分发挥党史的历史教科书作用、资政育人作用、传承红色基因的作用，努力推动革命老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

一、临危受命组建红军挺进师

1934年7月，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接连失利的严峻形势下，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减轻国民党军对中央根据地的压力，并准备实施战略转移，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组织两支部队北上和西进。同月，寻淮洲、乐少华、粟裕等领导的红七军团改称北上抗日先遣队，经福建北上到闽浙皖赣边区，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组成红十军团，并成立以方志敏为主席的军政委员会。11月下旬，红十军团分两路向浙皖边和皖南行动。由于兵力过小，这支部队未能牵动“围剿”中央根据地的敌人，反而以孤军深入敌后，陷入同十倍于己的敌人艰苦奋战的境地。1935年1月，红十军团在江西怀玉山遭到严重损失，北上行动失败。

其先头部队在粟裕等率领下，突围转移至闽浙赣边，奉命组建成500余人的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粟裕任师长，刘英任政治委员，任务是“经过闽北到浙江，长期行动，发动广泛的游击战争，扩大党与苏维埃的政治影响，发动群众斗争，直到分配土地，创立苏维埃新的根据地，以及建立党的组织，配合友军行动，调动和牵制大批敌人，保卫闽浙赣基本地区及邻近游击区域，并打通闽东、闽北的联系，取得工作上、行动上的有力配合，响应主力部队行动，彻底粉碎敌人的‘清剿’计划与第五次‘围剿’”①。

① 刘英：《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刘英纪念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265—266页。

承担到浙江长期开展广泛游击战争任务的红军挺进师，兵力单薄，要完成上述任务，无疑会十分艰巨。更何况，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家，国民党反动派决不会容许共产党在浙江活动。但是，红军挺进师指战员们以顽强的革命意志、克服一切困难的决心，在闽北短时休整以后向浙江挺进。

1935 年 2 月 5 日和 13 日，中共中央先后两次电示中央苏区分局：为适应游击战争的环境，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应”。部队要以“小游击队的形式有计划地分散行动，环境有利则集合起来，不利又分散下去，短小精干是目前的原则”。“占领山地，灵活机动，伏击袭击，出奇制胜是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游击队应紧密的联系群众，为群众切身利益斗争”①。中共中央还向中央苏区分局通报了遵义会议的情况。中央苏区分局遵照中央的指示，留项英、陈毅、贺昌三人率红二十四师一部在原中央根据地穿插游击，指导各地工作；同时派负责干部到各游击区领导斗争。

红军挺进师虽然没有收到中央的上述指示，但在开展实际工作的原则却完全符合中央的要求。红军挺进师分为几个纵队，开展游击战争，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同时紧密联系群众，为群众切身利益斗争，争取人民群众的支持，开展了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游击斗争，使革命的火种得以保存，使红军、游击队和游击区得以保存、巩固、发展，度过了最艰苦、最困难的斗争阶段。

国民党当局采取频繁的军事“清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等手段，企图把红军、游击队困死饿死，斩尽杀绝。在极其险恶的环境里，红军和游击队的干部、战士同甘苦，共患难，在当地人民群众支持下，采用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和巧妙的斗争策略，同敌人周旋。他们还同革命队伍内部的叛徒进行了坚决斗争。

红军游击队经常出没于崇山峻岭和茅草密林之间，昼伏夜行，风餐露宿，艰苦备尝。他们没有必要的给养，战士们患病负伤也无法医治。他们没有任何通讯器材，只能在和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各自独立地进行斗争。正如项英所说：“在这整整三年中，开首还能靠无线电的通讯取得中央对于我们的指导，随后无线电的失掉，使我们脱离了党中央的领导，失掉了与各方面的联系，形成了各个区域的独立的各自为战，来坚持与敌人作最顽强的斗争。”②

二、创建浙南游击根据地坚持革命斗争意义重大

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革命根据地作为支撑。人民群众的支持是革命根据地的群众基础，也是共产党和红军的力量源泉。红军挺进师活动的浙南游击根据地，包括浙西南、浙南、浙东南等几块游击根据地。其中心区，先是在浙西南地区，后转移到浙南地区，包括 16 个县的大部或一部，总面积 2 万余平方公里，人口达百万。1935 年 3 月，红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 12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85—86 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 14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11 页。

军挺进师在闽北休整后进入浙江，逐渐开辟和发展了浙南游击根据地。

1935 年三四月间，红军挺进师到达浙闽边境，辗转游击于龙泉河以南之庆元、景宁、松溪、政和、寿宁、泰顺一带，先后作战几十次，歼灭了一批反动的保安团和地方武装。5 月，挺进师进入龙泉、遂昌、松阳三县边界地区，团结当地“青帮”组织，并把武装斗争和根据地的建设结合起来，提出“打土豪、开仓济贫、帮助群众战胜夏荒”的口号。每到一地，首先将反动的区、乡武装消灭，镇压罪恶多、民愤大的土豪劣绅，没收其财产，分发给贫苦群众，受到广大被压迫、被剥削群众的热烈拥护。

同年 9 月，红军挺进师已经发展到近千人，在江山、浦城、龙泉、遂昌、松阳五县之间建立了纵横百余公里的根据地。游击区域则发展到北抵浙赣铁路，南到浙闽边界西段，西及赣、闽边界，东到丽水、宣平的广大地区。

在红军挺进师积极创建根据地之时，国民党调集 6 个师及 4 个保安团共 40 个团近 8 万人的兵力，在罗卓英的指挥下，“清剿”挺进师及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挺进师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留第二、第五纵队就地坚持斗争，其余主力迅速跳出包围圈，开辟和建立新的游击根据地。

红军挺进师在浙西南和敌人的浴血奋战中，不少指战员和领导人英勇牺牲。中共浙西南特委书记黄富武、第二纵队长李重才、政治委员洪家云、龙（泉）浦（城）县委书记方志富，还有地方革命人士陈凤生、卢子敬、陈丹山等人牺牲。

撤出浙西南中心区的红军挺进师主力，于 1935 年 10 月 5 日在福建寿宁与中共闽东特委书记叶飞等会师。双方商定建立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并决定在浙南地区开辟游击根据地。为了加强对闽浙边区地方武装的统一领导，1935 年 11 月 7 日成立闽浙边临时省军区，它与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受闽浙边临时省委领导。此后，红军挺进师以瑞安、平阳、泰顺三县为立足点，向东南、东北发展，攻破瑞安、平阳、泰顺外围敌人的许多重要据点。

1936 年 8 月，红军挺进师与活动在平阳北港地区由老共产党员叶廷鹏领导的一支革命力量会合。11 月，浙南游击根据地的范围由浙闽边境东段向北扩展到飞云江中游的南北两岸，包括瑞安、平阳、泰顺、福鼎以及青田、景宁、丽水、寿宁、霞浦、永嘉等县的部分地区，纵横 500 余里。一度丧失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这时也重新恢复。红军挺进师发展到一千五六百人。地方游击队和群众武装达数千人。

1937 年初，国民党刘建绪调集主力部队 6 个师、两个独立旅及地方保安团共 43 个团，采用拉网式方法向浙南游击根据地发动疯狂进攻。红军挺进师采取与敌人相向对进、易地而战的打法，灵活机动地与敌人周旋。经过近 8 个月的艰苦作战，尽管浙南游击根据地的中心地区遭受严重摧残，但几块游击根据地仍然坚持下来。

1937 年春，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同上海党组织建立了联系，接着又与中央取得了联系。1937 年 4 月，临时省委向国民党当局发出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文电。经过三次和平谈判，

刘英代表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同国民党浙江地方当局于9月16日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10月，粟裕在遂昌门阵与国民党遂昌政府进行谈判，达成停战抗日的协议。于是，分散在各地进行游击斗争的挺进师各部，陆续集中于平阳山门街，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

1938年3月，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指示刘英留在浙江，主持省委工作，粟裕带抗日游击总队开赴皖南前线。4月，抗日游击总队在安徽歙县岩寺整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三营。

三、红军挺进师和浙南游击根据地发挥的重要作用

（一）服从革命大局，保存和发展了革命的星星之火。红军挺进师临危受命，承担起到浙江发动广泛的游击战争，扩大党与苏维埃的政治影响，发动群众斗争，直到分配土地，创建浙南游击根据地，以及建立党的组织，配合友军行动，调动和牵制大批敌人，保卫闽浙赣苏区及邻近游击区域，并打通闽东、闽北的联系，取得工作上、行动上的有力配合，策应主力部队行动，彻底粉碎敌人的“清剿”和“围剿”①。红军挺进师的组建和浙南游击根据地的创立，是服从革命的大局需要，在中国革命遭受严重困难、革命处于低潮的时期，这一事实本身，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坚定信仰和信念。在实际工作中，粟裕、刘英领导的浙南地区，曾经和上级的联系中断，但他们仍然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和方针，各自为战，开展革命武装斗争，开展群众工作，完成了创建根据地、配合主力红军的任务。他们和其他地区坚持革命斗争的红军一样，共同构成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数个亮点，并在这些点上保存和发展了革命的星星之火。正如当时身陷囹圄的方志敏听说抗日先遣队还有一部分部队突围出来，继续打击敌人时说的：“心上一阵又是悲痛、又是钦敬、又是快慰的情绪冲上来，感动得几乎要流出眼泪来。”他满怀信心地指出：“留在苏区的共产党员，都是经过共产党的长期训练，都是有深刻的主义的信仰的”，“共产党是有完全领导红军的力量的！”②

（二）在国民党的心腹地区牵制和打击敌人。红军挺进师的活动地区和浙南游击根据地的创立，是在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心腹之处。国民党反动派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是以主要精力对付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而是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对红军大力“围剿”，包括对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北上抗日先遣队进行残酷镇压。从敌人“清剿”中突围出来的红军指战员，不畏艰难，高举红旗，继续斗争。他们的顽强斗争对于分散和牵制敌人的兵力，打击国民党反动统治，作用明显，意义重大。

（三）争取群众支持，包括团结“青帮”群众，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说明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红军挺进师能够创建浙南游击根据地，除了红军的政治主张正确，主要是团结群众，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红军挺进师把当时在松阳、遂昌、龙泉县边境组织农军，打土豪、分田地，劫富济贫发展“青帮”5000多人的卢子敬等人，争取到革

① 刘英：《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刘英纪念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265—266页。

② 浙江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红军挺进师和浙南游击区》，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1页。

命队伍中。卢子敬等人参加中国共产党，积极为革命工作，最后英勇牺牲。这也可以说是红军挺进师群众工作取得的成绩。在敌人重兵压境的情况下，红军挺进师能够在浙南开辟游击根据地，并且能够生存和发展，都是群众支持的结果。适应着全国抗战爆发的形势，红军挺进师一方面对国民党军队的“清剿”继续进行有力的反击；另一方面经过中共中央和各地方党的领导人在谈判桌上同国民党进行复杂的政治斗争，迫使国民党军队逐步停止进攻。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以国民党“清剿”的失败而最终告终。

（四）培养和锻炼一批革命人才，包括著名的革命军事家。红军挺进师在浙南游击根据地的英勇作战，积累了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一批革命的忠诚红军指战员成长起来，以粟裕为主要代表的军事指挥员也在复杂而艰苦的斗争中增长了才干，提高了对敌作战的能力。这对红军挺进师以后改编为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参加对日作战，对粟裕以后承担更为重要的军事指挥作战，打下了重要基础。在全国抗战爆发后，南方八省保存下来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成为大江两岸抗日前线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

（五）从全国范围看，浙南游击根据地起到了战略支点作用，是红军南方三年游击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开辟敌后战场的重要条件。粟裕、刘英领导红军挺进师创建的浙南游击根据地，和黄道领导的闽北地区，叶飞领导的闽东地区，黄会聪领导的闽粤边地区，关英、唐在刚领导的皖浙赣地区，方维夏、蔡会文（1935 年 4 月到湘南）领导的湘南地区，陈寿昌、徐彦刚、傅秋涛、严图阁领导的湘鄂赣地区，彭辉明、谭余保领导的湘赣地区，高敬亭领导的鄂豫皖边地区，王于洁、刘突军领导的闽中地区，张新江、王国华领导的鄂豫边地区，冯白驹领导的琼崖地区等一样，都发挥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战略支点作用，为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军民开辟敌后战场，保存了一支生力军，在争取抗战胜利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六）中共中央的充分肯定。1937 年 12 月 13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工作的决议，高度评价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的三年游击战争，指出：南方项英和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后，在极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地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致能够保存各游击区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主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①]。这也是对红军挺进师和浙南游击根据地人民历史贡献的高度评价。

回顾历史，我们要学习粟裕、刘英等革命前辈的先进事迹、崇高思想和人格风范，发扬和传承红军挺进师的精神，深入党史和重要党史人物的研究和宣传，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选自纪念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创建 80 周年学术研讨会，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 14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735 页。

试论红军挺进师创建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贡献

王　松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组建、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创建80周年。红军挺进师广大官兵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置个人的生死于不顾，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敢于担当，一往无前，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回顾红军挺进师在浙西南的光辉战斗历程，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有助于我们在新形势下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发扬听党指挥、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一、临危受命的英雄之师

在中国革命最危急关头诞生的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是一支听党指挥的英雄之师，一支具有血性的胜利之师。

挺进师在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组建。从中国革命的全局来看，由于敌人力量过于强大和“左”倾路线错误指导，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惨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而湘江一战，又折损过半，中国革命面临严重危机。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地位，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但是，由于客观战争环境限制，遵义会议的精神当时只是在主力红军中传达，其它根据地的红军包括转战在闽浙皖赣地区的党组织和红军领导人还不了解遵义会议的精神实质。

从闽浙皖赣地区的局部战场形势来看，红军抗日先遣队受到重大挫折。1934年7月，为减轻中央苏区反“围剿”的压力，党中央命令红七军团以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向闽浙皖赣边开进。关于中央组建抗日先遣队转战闽浙皖赣的战略意图，曾任先遣队参谋长的粟裕分析得很明白：“中央为掩护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命令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向蒋介石腹心地区闽浙皖赣进军，执行牵制任务”，“中央派出这支部队的更加直接的目的，是企图以这一行动威胁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吸引和调动一部分‘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即将实行的战略转移。”[①] 1935年1月，北上抗日先遣队惨败怀玉山，血战数天后，红

①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

军将士弹尽粮绝，大部分壮烈牺牲。方志敏、刘畴西等领导人被俘。仅500余红军官兵在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的率领下，突破敌人的封锁线。

正是在如此险恶的战争环境下，党中央把抗日先遣队未能完成的严峻任务赋予挺进师。1935年1月，中共闽浙赣省委传达了中央军区1月15日指示电，命令以抗日先遣队先头部队和突围部队为基础，迅速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境内，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苏维埃根据地，以积极的作战行动，并从战略上配合主力红军的行动。”[①] 2月初，挺进师正式组建，由粟裕任师长，刘英任政委。挺进师以先遣队幸存的一小部为基础，最初仅538人。中央以挺进师弱小的兵力执行如此艰巨的任务，虽是在中国革命面临严重危机时刻迫不得已之举，但却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这既反映出党中央对中国革命的新的战略布局的新思考，又体现了对突出重围的500余红军官兵的充分信任。

红军挺进师长期战斗在敌人腹心地区，孤军奋斗，愈战愈勇。浙江是国民党统治最严密的腹心地区，反动势力盘根错节，是蒋介石政权的根基所在，“四大家族”中的蒋、陈两家都在浙江。国民党在浙江不仅建立了自上而下的各级党部，还形成了庞大的特务组织，并普遍建立了保甲制度，反动组织十分严密。由于国民党的血腥镇压，浙江共产党的组织系统先后被破坏，到1935年5月，浙江共产党组织活动基本停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全省统一的共产党组织领导。加之部队的电台遭到破坏，挺进师同党中央和地方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不得不陷入孤军奋斗的险境。在极其艰险的环境下，红军官兵和浙西南人民群众团结一心，前赴后继，牺牲巨大，挺进师先后有1000余名指战员献出英勇的生命。

二、彪炳千秋的英雄业绩

经历了无数生与死的严峻考验，挺进师以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的大无畏精神，战胜了国民党军的多次“清剿”，牵制和消耗了国民党军的大量兵力，有力地掩护和策应了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挺进师不但保存和壮大了一支英勇善战的红军力量，积累了游击战争的经验，而且在浙江各地培养了大批革命的新生力量，由挺进师创建的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在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后院形成新的革命战略支点，这对于后来浙江省乃至华东地区的革命斗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挺进师在浙西南地区坚持革命斗争，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红军夺取长征胜利的战略行动

在政治上，挺进师的成功组建和军事胜利，迫使国民党当局重新考量国内局势，无法专心“围剿”长征中的红军主力。挺进师在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创建了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犹如在国民党当局的背后插上了一把尖刀，革命烈火烧到了蒋介石的家门口，深深触痛了国民党当局的中枢神经。浙江省当局的喉舌《东南日报》等惊呼：“浙江素称平安之区，自粟、刘窜浙

①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44页。

后，匪化已波及全浙，以目下形势而论，浙江共匪不亚于四川、江西之匪”，“前途实堪可虑！”

在军事上，挺进师直接抗击、牵制国民党 7 万大军长达 8 个月之久，迫使国民党当局无法倾其全力“围剿”长征中的红军主力，减轻了红军主力长征的军事压力。挺进师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红军的长征，也支援了其它战场红军的游击战争的发展。1935 年 8 月，面对在浙西南地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蓬勃发展，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抽调“中央军”主力入浙对付挺进师，先后任命卫立煌、罗卓英为闽赣浙皖边区“清剿”总指挥部的正、副总指挥，调集以第十八军为主力的 7 万大军“进剿”浙西南。罗卓英任军长的国民党第十八军，下辖 4 个师，是长期在江西“剿共”的老手。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战斗力较强，后来号称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国民党调 7 万余主力部队来“进剿”在浙西南地区的红军挺进师，客观上减轻了长征中的主力红军的军事压力。挺进师官兵以具有“血性”的战斗精神和一系列战斗的胜利，从战略上策应了红军主力长征，实现了中央在革命处于低潮的形势下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战略目标。仅 500 余人的挺进师，入浙数月就迅速吸引、调动如此大量的国民党军主力，谱写了人民军队历史上的英雄史诗。

在文化上，挺进师利用各种形式，广泛宣传了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有力揭露了国民党集团“围剿”红军的险恶用心。挺进师既是战斗队，也是工作队和宣传队。挺进师发动全体指战员参加群众工作。在战争间隙，每位指战员每天写 5 条标语，找 10 位群众谈话。挺进师多次召集群众大会，广泛宣传了主力红军长征的胜利捷报。挺进师在《告白军弟兄书》中说：“白军弟兄们：你们的官长欺骗你们说，红军的主力已经消灭了。事实是怎样？……川陕湘粤桂红军最近不断的胜利，你们的官长是不会让你们知道的，但……浙江、安徽……红军挺进师的活动与发展或许你们知道。老实说，这是不可战胜的民众武力，是抗日反帝的唯一……任何反革命的武装都会在红军面前遭到失败与灭亡！”[①] 挺进师通过一系列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向广大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官兵揭示一个真理：“只有苏维埃和红军，只有工农兵，才能救中国。我们要用自己的力量给一切帝国主义打击，我们要把自己的力量来挽救当前的民族危机。”

（二）挺进师开辟和发展了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奠定了中国革命新的战略支点的基础

中国革命长期处在敌强我弱的环境下，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先后经历了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到抗日救亡运动兴起两次伟大的转折。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基本上是采取点、线、面波浪式发展态势。从全局上说，党的八七会议决定，党在湘、鄂、赣、粤四省组织秋收暴动，这四个省及其武装起义地区，就是四个革命“火种点”。三大起义及各地武装起义，形成星火燎原之势。之后，红军放弃攻打中心城市的原定意图，转向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红军用鲜血和生命走出伟大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革命力量“发展线”。党领导人民军队开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这就形成一块又一块武装“割据面”。这是在第一次转折中的点、线、面的结合。可见，在第一次历史性转折中，党的人民军队的活动区

①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44 页。

域上主要在鄂、湘、赣、粤及闽西地区，先后开辟了一批革命根据地。但是，由于敌强我弱的客观战争态势，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惨败，主力红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从 1934 年 10 月起，中央红军由赣南闽西根据地出发。之后，红二方面军从湘鄂边根据地转移，红四方面军也撤离了鄂豫皖根据地。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创建起来的革命根据地大部分丧失。严峻形势呼唤着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掌握战争的主动权，迅速开拓新的局面!

从第五次反“围剿”到抗日救亡运动兴起的伟大转折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党和红军通过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伟大创举，极大地发展和壮大了人民革命的力量，极大地拓展了革命根据地的范围。万里长征，三军会师，胜利地到达陕北，中国革命出现了崭新的局面。这是又一次新的点、线、面的有机结合，而且是高层次的点、线、面的结合，它实现了中国革命的新布局。

应该看到，这个崭新的局面，是由陕北作为战略中心点和南方革命根据地和其它根据地作为战略支点所构建的。突出重围的挺进师官兵，以坚忍不拔的革命意志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不仅在敌人的腹心地带浙江扎下了根，而且发展和壮大了党和红军的力量，创建和发展了浙西南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战略新支点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其意义十分重大，影响十分深远。

虽然，从 1925 年初开始，浙西南就有革命武装在活动，但是大规模的游击战争是从红军挺进师组建以后。“1930 年前后，在浙南的永、瑞、平、清等县境内，曾有党所领导的农民起义武装红十三军在活动，但闽浙边游击战争的开展，还是在红军挺进师到达之后。”①

红军挺进师发展和壮大了革命根据地，逐步恢复和发展了地方党组织。先后发展了 4000 余名中共党员，建立了 40 多个县区级党政组织和 30 多支县区级游击队，还恢复和建立了众多的革命群众组织。到 1937 年 9 月中旬，浙江共产党组织与国民党浙江军政当局签署和平协议，促进了浙江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到 1949 年解放前夕，根据地已经发展到 20 多个县的广大农村地带，游击区的人口有 300 余万人。这样，中国革命在浙江就形成了新的战略支点，在这个战略支点的支撑下，逐渐发展和扩大了中国南方的革命根据地，这样又形成了新的更大的革命根据地，从而保证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伟大胜利。

（三）挺进师在浙西南地区坚持革命斗争，成功地探索出坚持和贯彻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新经验

挺进师在浙西南地区坚持革命斗争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孤军奋斗、愈斗愈勇。那么，远离党中央的一支孤军，为何能在敌人的腹心地区生存并且发展壮大？其奥秘在于挺进师的官兵们从革命胜利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中，认识到了一个真理，这就是必须坚持毛泽东军事思想，必须尊重战争的客观规律。

① 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 7 册，第 271 页。

从挺进师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实践中，我们不难看出，挺进师官兵坚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军事指导路线，胜利地实现了三个转变：

其一，政治上，由左倾军事指导路线，向正确的军事指导路线转变。

现在看来，粟裕将军当时并不知道遵义会议已经纠正了党内“左”的错误，但是他已经在自己的行动中自觉地坚持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作为指导，抵制了“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粟裕将军参加了南昌起义。井冈山会师之后，他在毛泽东、朱德同志的领导下，在战争实践中，不断学习和领会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红军时期，毛泽东很注意对部队进行建立根据地思想的教育。毛泽东常说，人不能老走着、老站着，也得有坐下来的时候，坐下来就靠屁股，根据地就是人的屁股。粟裕感到，毛泽东同志深入浅出的比喻，很有说服力。粟裕认为，跟随毛泽东、朱德同志学习打仗所得到的最深刻的体会，是战争有它自己的规律，克敌制胜的办法必须依据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和战争内在规律去寻找。在战争实践中，挺进师的官兵在粟裕领导下，自觉地坚持毛泽东军事思想，因而能不断取得胜利。

其二，在军事上，由正规战向游击战转变。粟裕果断地改变了过去“左”倾领导人强调打正规战的战略，领导挺进师由正规战向游击战转变。粟裕回忆：“我们运用了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方法，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打击敌人，要求每个干部、战士都学会两套本领：打游击，做群众工作。”[①] 粟裕从红军的挫折中感悟到出击方向的选择是战略问题。要对敌我形势作正确的分析，要对具体地域的自然、地理、政治、经济、军事等诸种条件作综合分析，尤其要注意选择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环节和注意利用敌人的矛盾。同时出击时机的选择也十分重要。要运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三年游击战争中，是挺进师运用游击战术比较成熟的时期。粟裕将这些游击战术归纳为 6 条原则：⑴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胜利。⑵不在消灭敌人，而在消磨敌人。⑶支配敌人，掌握主动。⑷积极进攻，绝少防御。⑸飘忽不定，出没无常。⑹越是敌人后方，越是容易成功。而这 6 条原则正是生动地体现了毛泽东关于红军游击战争战略战术思想的精神实质。

其三，在组织上，由被动依赖上级指示转变为主要依靠挺进师官兵自己的智慧和力量独立自主研究和解决重大问题。

在三年游击战争的实践中，挺进师虽然同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却依靠官兵们的智慧和力量，很好地解决了前进和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实现了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结合，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的结合，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结合，发展和壮大了浙西南革命根据地。

三、大力弘扬红军挺进师的革命精神

在三年游击战争血与火的战争实践中，挺进师的官兵们不仅创造了英雄的战争篇章，而

①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51 页。

且锻造了伟大的革命精神。浙西南三年游击战争的胜利，是党和红军官兵弘扬伟大革命精神的胜利。挺进师和浙西南人民英勇奋斗锻造了“挺进精神”。这种精神集中表现为坚定革命理想信念，坚决听从党的指挥；敢于担当，一往无前；实事求是，开拓创新；坚持群众路线，艰苦奋斗。80年光阴荏苒，“挺进精神”作为红军长征精神的一部分，生动地体现了党和红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至今仍然焕发着不朽的生命力。

（一）弘扬红军挺进师锻造的革命精神，我们必须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坚决听从党的指挥。崇高而坚定的理想信念，是立身做人的基本要求，是百折不挠、执着奋斗的精神动力，是熔铸党性的基石。当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惨败，国民党当局在军事“清剿”红军和游击队的同时，采取“剿抚兼施”的政策，用金钱和高官厚禄等手段引诱共产党和红军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变节投降，以分化瓦解共产党组织和红军队伍。少数意志不坚定的人经不起失败、艰苦、生死的考验，感到前途渺茫，对革命失去信心，或逃离部队，或叛变革命。而真正的共产党员却高举党的旗帜，坚决听从党的指挥，在逆境中奋起，坚持革命斗争。粟裕、刘英等红军挺进师官兵们长期坚持革命斗争，其根基就在于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对党和人民无比忠诚。

红军挺进师英勇奋斗不断走向胜利的历史证明，信念坚定是共产党人和革命军人的永恒品质。我们必须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认真学习领会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把理想信念建立在对科学理论的理性认同上，保持理想信念定力。我们要像红军那样，对崇高理想矢志不渝、对党和人民无比忠诚、对革命事业锲而不舍，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信念，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始终做到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

（二）弘扬红军挺进师锻造的革命精神，我们必须敢于担当，艰苦奋斗。80年前，挺进师诞生于敌军重重“围剿”之中，受命于党和人民军队生死存亡之际，兵力极少，孤立无援，却承担着策应主力红军战略转移，保存发展革命力量的千钧重担。红军挺进师的官兵们坚决听从党的指挥，敢于担当，一往无前，战胜强敌。不仅以弱小的500多红军直接抗击、牵制敌7万大军，而且还发展壮大了党和人民军队的革命力量，创建和发展了革命根据地，极大地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政治影响，为后来党的整个南方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挺进师靠着敢于担当、艰苦奋斗的精神克服了由于敌人“围剿”造成的恶劣的自然环境，战胜了各种困难。

红军挺进师英勇奋斗不断走向胜利的历史证明，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和政治优势。在当前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弘扬敢于担当、艰苦奋斗的精神，仍然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和军情的深刻变化，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保证国家长治久安、保持军队性质宗旨，面临着一系列新挑战新考验。疾风知劲草，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来说，对党和人民的忠诚要在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锤炼和检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我们要继承和发扬战争年代红军的那样一股劲，那样一种革命精神，敢于担当，真抓实干，

艰苦奋斗。敢于面对挑战，勇于克服困难，善于打开局面。

（三）弘扬红军挺进师锻造的革命精神，我们必须坚持实事求的思想路线，坚持改革创新。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红军挺进师英勇奋斗不断走向胜利的历史证明，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和军队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红军挺进师三年游击战争的胜利，其重要原因是红军官兵冲破了教条主义错误思想的束缚，坚持从游击战争的实际出发，以创造性的思维指导工作和战斗。粟裕认为：传统战法的运用，须在总的战略方针指导下，从当面的实际情况出发，着眼于特点，着眼于发展①。红军挺进师在浙西南游击战争浴血奋斗的实践，进一步铸就和磨砺了共产党人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精神。诚然，随着时代的发展，浙西南游击战争的具体经验，当今在一些方面不可避免地显现出历史局限性。但是，粟裕及红军指挥员们在军事思想和指挥艺术上所体现的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将长期放出光彩，启迪我们的智慧。红军官兵们开拓进取、出奇制胜、勇于创造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世界形势复杂多变，国内改革任务十分艰巨。为了承担好党赋予我们的各项任务，我们必须培育创新意识，弘扬创新精神，完善创新机制，更好地沿着改革开放的大道阔步前行。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选自纪念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创建80周年学术研讨会，作者单位：解放军军事经济学院政治系）

①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363页。

粟裕的军事指挥思想与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开辟

董志铭

开辟浙西南革命根据地，是党中央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为了执行这一战略任务，粟裕以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气魄，率领红军挺进师转战在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开创了游击根据地，吸引和牵制国民党相当数量的兵力，有力地配合了我们党从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转变的战略部署，为新四军的组建准备了重要的骨干力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回顾红军挺进师在浙西南的光辉战斗历程，缅怀粟裕的革命胆略和精湛的军事指挥思想，对于传承和弘扬革命先辈不怕困难、勇于牺牲、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和光荣传统，巩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打造“清正、廉洁、务实”的干部队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临危受命组建红军挺进师，采取游击性运动战的战法，打开进入浙西南开辟游击根据地的通道

组建红军挺进师尽快进入浙江省发展，是中共中央从中国革命战争全局出发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浙江作为蒋介石的老巢是国民党统治腹心地区，反动势力强大。但浙江工农大众有革命的传统，群众基础相对比较好，西部和南部的地形条件也有利于开展游击战争。革命游击战争一旦在浙江广泛发展起来，就会使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对发动全国人民迎接伟大的抗日高潮的到来，产生极大的鼓舞作用。这个命令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于 1935 年 1 月底 2 月初做出的，是由闽浙赣省委传达给粟裕的。当时只有几百人突围出来，由粟裕带着躲在赣东北德兴县境内的广财山一带休整，对外面所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直到粟裕决定带领队伍去找闽浙赣省委和省军区后，才听到了军团主力已在怀玉山失败的消息。中央指示：以先遣队突围部队为基础组建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挺进浙江境内，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新的根据地，从战略上配合主力红军的行动。粟裕任挺进师师长，刘英任政治委员[①]。

粟裕接到中央的指示后，立刻全力投入紧张的挺进师组建工作。原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突围的部队，主要是一个迫击炮连、一个重机枪连和第二十一师的第五连，再加上一些康复了的伤病员，以及政治部、供给部、保卫局的一些机关工作人员，总共 400 多人。闽浙赣省委决定

① 《粟裕年谱》，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1 页。

把闽浙赣独立师第一团的100多人编入挺进师，这样合起来就有了500多人。虽然总人数还不够多，但骨干力量都具有长期作战的经验。为了适应游击战争的需要，粟裕经与刘英商量，决定挺进师在师以下不设团、营、连，而是编成三个支队和一个师直属队，师部机关虽然设有司、政、供、卫各部，但极为精干。支队的人数相当于连，但多数由团级干部担任领导。挺进师的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分别由王蕴瑞、黄富武担任。

1935年2月底，挺进师的组建、整训全部完成。在确定挺进师的行动路线时，粟裕对浙江的地理位置和地形条件进行了认真分析和研究，提出由闽浙赣苏区南下，先到闽北根据地，与那里的党组织取得联系之后，再进入浙西南地区，创建以仙霞岭为中心的根据地。为什么选择这里立足？粟裕讲了三点理由：一是该地区在闽、浙、赣三省交界处，既可以同闽北、闽东、闽浙赣几块游击根据地互为犄角，相互支援，又可以充分利用三省敌人之间的矛盾；二是该地区经受过1930年红十三军革命暴动的影响，群众条件比较好，当时这个地区还有一个反抗国民党统治的“青帮”组织，可以发展成为初步的依托；三是这个地区虽然交通发达，但大部分地区山岭连绵，森林茂密，便于部队隐蔽机动。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挺进师刚一到福建边境，就遭到国民党保安团的突然伏击，损坏了仅有的一部电台，失去了同中共中央和上级的联系。随后，又发生了闽北军分区司令员李德胜叛变，出卖挺进师的行动计划，并带着国民党军前来闽北“清剿”的恶性事件。面对这一系列突发性事件，粟裕当机立断，决定改变与闽北苏区党组织取得联系后再进入浙江境内的原定计划，独立打开进入浙西南开辟游击根据地的通道。3月上旬，又成立了由刘英、粟裕、黄富武等9人组成的政治委员会，统一领导挺进师活动区域内的党、政、军工作。

浙西南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地区，国民党在那里驻有较强的保安团队。挺进师必须先在外围活动，把强敌吸引出来，给以各个打击，才能挺进该地区。为此，粟裕决定采取游击性运动战的战法，把部队带到龙泉河以南闽浙边境一带活动，调动国民党保安团离开浙西南地区，予以各个歼灭。这样，三四月间，粟裕率领挺进师往返于闽浙边境地区作战，组织实施了大小几十次战斗。比较重要的有溪头、小梅、沙湾、上标、潭边街、百丈口等战斗。一连串的游击性运动战果然见效。国民党反动派误判挺进师要在龙泉河以南的闽浙边境地区立脚，把部署在龙泉河以北的浙江省保安力量纷纷向南面调动，并调动福建的新十师、第五十六师北上，企图南北夹击，消灭红军挺进师。这一切粟裕都看在眼里。

4月下旬，挺进师活动于庆元县斋郎地区时，国民党反动派组织浙江保安第一团1200多人、福建保安第二团1000余人，在近千人的地主武装配合下，企图从东北、东面、东南三个方向合击挺进师。粟裕不为强敌的数量优势所动。他认为挺进师虽然仅五六百人，但战斗力强，如果能够利用斋郎地区有利的地形条件，就可以实现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目的。因此，他决心集中兵力在斋郎地区打一场歼灭战。鉴于这次战斗的重要性，粟裕对各路进攻之敌的实力做了细致侦察，制定了区别对待的作战方针：对反动武装“大刀会”采取政治攻势进行瓦解，力求

逼退远道而来的福建保安团，集中力量打击顽敌浙江保安第一团。

斋郎一仗，粟裕驱策自如，如臂使指。红军挺进师共歼灭浙江保安第一团500余人，缴获武器弹药颇丰。更重要的是，红军挺进师之威迫使敌保安团队在以后一段时间内转为退守，龙泉河北面的敌人已比较空虚，一些反动地主也纷纷离开了浙西南，挺进师获得了开辟以仙霞岭为中心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有利时机，胜利完成了进军以来的第一个作战任务——打开进入浙西南开辟游击根据地的通道[①]。

二、采取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打击敌人的用兵原则，实现从运动战到游击战的军事战略转变，创建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基本区

红军挺进师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军事作战，开展武装斗争，打击、消灭国民党军队，在浙西南地区站住脚。但要真正挺进去站稳脚跟，不被赶出来，还必须把武装斗争与根据地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从挺进浙西南第一天起，粟裕就采取毛泽东关于“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打击敌人”的用兵原则，考虑如何迅速分兵发动群众、建立各级组织、建立地方武装的问题。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粟裕对浙西南地区的具体情况有了进一步了解，选择了有群众基础的龙（泉）浦（城）江（山）遂（昌）和龙（泉）云（和）松（阳）遂（昌）东西两片地区作为建立第一块游击根据地的基本区域。5月上旬，他在松阳县安岱后村和斗潭村，会见了当地农民领袖陈凤生、卢子敬、陈丹山等人。经过一番思想交流和帮助提高，几个人主动要求接受党和红军的领导。他们作为当地的“青帮”首领联系着广大“青帮”会众，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当地的贫苦农民，有强烈的革命要求。这就使挺进师有了初步的依托。

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挺进师面临的紧迫任务就是学会打游击和做群众工作。但是，由于挺进师的部队骨干从中央苏区出来已经转战近一年时间了，反而不会分散打游击了。这就需要从头学起。为此，粟裕要求挺进师每个指战员都要学会两套本领：打游击，做群众工作[②]。这个学习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从运动战到游击战的军事战略转变的过程。这个转变过程一开始是很难的，许多指战员都不适应。粟裕决定采取逐步锻炼部队的办法，在实践中提高。例如，派干部单独带一支小分队出去行动，并规定满15天再归队，但他们不习惯单独行动，3天头上就归队了。后来，就逐步延长行动时间，小部队单独活动的时间由3天逐步增加到5天，以后再适当延长。这样，通过积累和总结，各级干部都学会了带领部队分散游击。粟裕就这样领导在干中学，挺进师部队逐步积累了开展群众工作的经验，逐步熟悉掌握了群众工作方法，并且做到了思想感情上与群众打成一片，从而使部队的游击战本领得到明显提高。

为了适应新的任务，粟裕与刘英研究决定，对挺进师所辖部队进行整编。主要是把全师编为四个纵队和两个独立支队，以分散活动为主。其中：第四纵队留在龙泉河以南的浙闽边境地

①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49页。
②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51页。

区，继续牵制国民党军；第一、第二纵队担负开辟根据地基本地区、建立游击根据地的任务；其余各部队和师部由粟裕亲自率领向北开进，通过积极的作战行动，掩护和保障第一、第二纵队开辟根据地的工作。按照这种分工，粟裕率领师部和第三纵队及两个独立支队，主要活动于浙赣铁路以南的汤溪、龙游、金华、武义、丽水一线，积极开展游击战争，使更多国民党军的兵力被吸引、牵制在外围，造成松（阳）遂（昌）龙（泉）基本区的兵力空虚，少数兵力只能固守城镇。第一、第二纵队则乘机在广大农村地区发动群众，打碎区、乡的反动政权，建立各种革命群众组织，推动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建设工作迅速发展。在松遂龙基本区普遍建立了红色政权，发展了群众武装，在浙西南特委的统一领导下，开始了紧张的查田运动，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运动。到 1935 年 9 月中旬，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已经扩大到五个县的范围，纵横百余公里。游击战的活动地域更加广泛，北到浙赣铁路，南到闽浙边界西段，西到赣闽边境，东到丽水、宣平广大地区。就这样，粟裕率领红军挺进师经过 4 个多月的艰苦斗争，已经初步完成了中共中央赋予的任务，在浙江站住了脚跟。

三、采取敌进我进的作战方针，主动向外线出击以吸引、调动敌人，在反“围剿”斗争中创建和发展浙南游击区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刚一建立，蒋介石就调集主力部队进行“围剿”。1935 年七八月间，国民党军委会先后任命卫立煌和罗卓英为“闽赣浙皖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的正、副总指挥。9 月中旬，该总指挥部制定了《第一期清剿计划》，确定这次“清剿”要“以各边区大部对粟、刘”，并委第十八军军长罗卓英统一指挥。当时，福建、江西、浙江、安徽四省边区受该总指挥部节制的部队共有 63 个正规团，罗卓英计划以其中的一大半来对付浙西南游击区[①]。然而，对国民党军即将开始的“围剿”，粟裕等红军挺进师领导人起初并没有彻查根底，以为还是浙江的保安团队组织的名堂，行动上难免有些大意，过早地暴露和消耗了一些力量。直到 9 月中旬，才逐步查明这次“围剿”的来头不小。此后，整个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立即转入了反“围剿”的准备工作。

在确定反“围剿”作战方针的问题上，又一次让粟裕颇费踌躇。尽管他经历了中央苏区的五次反“围剿”斗争，熟悉毛泽东指导反“围剿”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但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情况却有很大的不同。主要是挺进师作为一个整体已经完成了从正规军到游击队的转变，没有一支可以打运动战的红军部队，只能用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来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行动，不能直接把中央苏区的做法拿来就用。经过反复思考，他决定采取“敌进我进”的作战方针，即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因为游击战很难大量歼灭国民党军，而且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范围有限，所以红军主力必须向外线出击。在反“围剿”的具体部署上，粟裕决定留下第二纵

①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57 页。

队和第五纵队就地坚持，其余主力部队迅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以积极的作战行动吸引、调动敌人，并开辟和建立新的游击根据地[①]。可以说，从战略方针到作战部署，这都是一次大胆的创造。

9月下旬，粟裕和刘英率领挺进师主力从浙西南游击根据地中心区南下，偷渡龙泉河，突破了国民党军的封锁线，进入闽浙边境，开始了延续8个多月的反“围剿”作战。罗卓英查明情况后，并没有直接派兵尾随跟踪，只是派出一个师约5个团的兵力实施追堵，而把几十个团的主力集中用于“清剿”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看到老奸巨猾的罗卓英不受调动、继续集中力量大举摧毁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粟裕与刘英研究决定，除第一纵队北渡瓯江、加紧向浙东地区发展外，挺进师主力应该利用浙南地区地势险要、群众条件好、离交通干线远等有利条件，立即着手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以积极行动支援浙西南的反“围剿”斗争。为了在浙南地区的瑞安、平阳、泰顺三县之间立足，粟裕指挥部队由闽浙边向东北方向迅速出击，首先攻下瑞安县的珊溪镇，再以此为枢纽，向东南和东北发展，一直打到瓯江南部，直抵东海之滨。然后，他又带领主力兜了两个大圈子，攻克了瑞平泰地区外围的许多敌军据点和城镇，很快就在浙南打开了局面。这时，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决定再次分兵。由刘英率领临时省委机关和短枪队留在瑞平泰地区进行根据地建设，粟裕率领挺进师主力转战闽浙边地区，以便吸引和打击国民党军，掩护和保障刘英率部开展根据地建设。经过两个多月的转战，粟裕与刘英密切配合，使浙南瑞平泰游击根据地初具规模。

四、创造性地提出建立各种形式的游击基点的新思想，在恢复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斗争中适时调整政策和策略，迎接和准备伟大抗日高潮的到来

随着瑞平泰根据地的巩固，粟裕准备率部进入浙西南，力求恢复浙西南游击根据地。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决定，将闽浙边临时省委机关与挺进师领导机关分开行动，以原挺进师第三纵队第七支队和第五纵队第十三支队为基础组成浙西南独立师，粟裕任独立师政治委员会书记，并以省委代表兼浙西南独立师师长。1936年6月1日，“两广事变”爆发。蒋介石被迫撤走“清剿”浙西南游击区的罗卓英主力部队，紧急向湖南方向增援，从而减轻了对浙西南地区的军事压力。粟裕抓住这个有利时机，积极展开了恢复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工作。

粟裕带领由挺进师主力编成的“牵制队”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在浙闽边地区有效牵制、吸引敌人，掩护工作队开展群众工作，进行根据地建设，使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在一度丧失后，又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主要是重新组织了浙西南特委，重建了龙浦、龙遂、江浦3个县委及其下属的王村口、住龙等若干区委，浙西南游击根据地被建设得更加巩固和扎实了。

在此期间，粟裕为了迎接抗日高潮的到来，还根据当时的形势发展，适时地调整了政策和

①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59页。

策略。包括：在经济上，重视群众的经济利益，积极发展山区经济；在政治上，坚持以抗日为目标，扩大团结范围，尽量缩小打击面；在军事上，着眼于长期坚持敌后斗争，重视建立各种形式的游击基点。其中，特别难能可贵的是，通过在斗争实践中的不断总结和探索，他逐步认识到建设巩固的大块游击根据地，必须在根据地中心区外围建立一些小块的游击根据地或若干基点，使部队在开展游击战争的过程中能够获得必要的“落脚点”和“跳板”，从而更好地牵制和打击敌人。基于这种认识，他指挥部队一面打仗，一面建设游击基点。在具体指导上，主要是在一些重要地区，选择条件较好的村子开展群众工作，使之成为游击战的依托，再把几个或十几个这样的村子连成一片，就是一个游击基点。间隔几十公里，再建设这样的基点，并以这种形式逐步向外发展。这些游击基点存在的形式，主要依据敌情而定，可以是公开的，也可以是秘密的，在敌人势力较强的地区还可以是“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把这些游击基点逐步连接起来，就可以发展成为小块游击根据地。

当前，巩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党风廉政建设正在深入展开。这就特别需要我们学习粟裕在开辟浙西南革命根据地艰苦斗争中突出表现出来的革命坚定性和创造精神。希望我们的广大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在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时候，都能做到像粟裕那样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都能做到坚持一切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群众方法。

（选自《纪念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创建8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作者单位：解放军国防大学军队建设与军队政治工作教研部）

在反封锁中成立的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

钟健英

在中央红军长征、中央苏区沦陷后，国民党军队为了彻底消灭南方各革命根据地的党和红军游击队，采取分进合击、分区清剿、重点驻兵、穿心斩线等各种战术，声称“以十换一，就是胜利”，一发现红军游击队的踪迹，便集中兵力不惜代价进行消耗战。在此敌我力量过于悬殊的情况下，要应对国民党军队不惜代价的战法，红军游击队必须在足够大的活动空间里，采取灵活多变的战术避实就虚，才能在游击战争中打击敌人保存自己。战争的态势决定了反封锁是红军游击队开展反“清剿”的重要内容。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的成立，正是福建闽东独立师与浙西南挺进师在反“清剿”斗争中，不断打破封锁拓展活动空间，加强游击区间联系的重要成果。

一、国民党军队的堡垒封锁政策

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大举进攻，各根据地党和红军游击队在失去主力红军依据的情况下，迅速改变斗争策略，撤出苏区转移山区进行游击战争，致使国民党军队“集中兵力，分兵合进”的战术失去了原有的作用。在“清剿”过程中，国民党军队如派重兵进山，“则入山后，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给养困难；兵少，则山高林深，路少险多，非但无济于事，且易受‘匪’暗算；更困畛域割分，此剿彼窜，肃清极难”①。为此，国民党军队也不得不改变战术，采取广布碉堡线，实行分区封锁和“驻剿”“堵剿”“追剿”相结合的战术。并针对红军游击队活动于广大山区、交通不便、经济来源困难的特点，又兼施严密的经济封锁政策。

堡垒推进是国民党军队向革命根据地进攻的主要战术，正是“赖碉堡与城池之坚固”，国民党军队才得以步步推进。而当红军游击队改变“堡垒对堡垒”和大兵团作战的战术，采取游击战术，突出其包围后，国民党军便认为“所构之碉堡仅为点而未缀成线，致共军得钻隙而走”的主要原因②。于是，在堡垒政策的基础上，提出碉堡“在多不在大，重密不重坚”，进一步实行堡垒封锁线的政策，增加堡垒的密度，连成星罗密布的封锁线。为此，国民党福建省保安处专门设置了“封锁匪区事务股”，以负责对全省实施全面的封锁。并将全省划为“全匪区”“半匪区”和“邻匪区”，分别加以严密封锁。随后，国民党当局“仍感碉堡设置未周，不足制匪流窜而

① 《国民党陆军第七十六师在闽北军事部署和战况（节录）》（1935 年 6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综合篇》，解放军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320—1321 页。

②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二编下：江西时期），中文图书供应社 1974 年版，第 624 页。

利清剿”[①]。福建省保安处“封锁匪区事务股”将全省 64 县除闽侯、思明两县外，其余一律划为封锁区域。福建国民党当局拨出大量的款项作为封锁费用，并以“抽摊房铺捐及罚款充之”，或向“城乡殷富户摊募”。为推行全面封锁，省保安处派专人分赴各县督促执行，驻闽绥靖公署和各绥靖区司令部也派专人协同各县加紧实施。在各军事要地构筑炮楼，在“城市用坚固或石质碉堡，乡村用圩寨”。并辅以公路的推进，以达到其“公路完成一步匪区就紧缩一步”的企图。特别是为了防止红军游击队利用省与省交界的薄弱地区开展活动，国民党不仅派重兵把守，而且，几省联合构筑了跨省的严密封锁线。闽浙两省的保安处便联合在福建的福鼎、寿宁、政和、松溪、浦城、崇安，和浙江的平阳、泰顺、庆元、龙泉、江山等县，构筑横跨两省的连环碉堡，仅从宁德到泰顺便构筑碉堡 300 余座。蒋介石及国民党军事当局对碉堡封锁的推行极为重视，蒋介石曾派“委员 7 人来闽监督各县封锁工作”。随后，通过福建省党部特派员陈肇英的报告，获悉福建省特别是闽北地区封锁废弛时，大为恼怒，电令福建第二区专员公署，在南平境内分八区段征工构筑碉堡 109 个，并限定于半个月内完成。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为加强对闽东的封锁，也特派委员林知洲到闽东执行“建筑碉堡及从事封锁”任务[②]。一时间全省各地封锁线密布，明碉暗堡林立。据国民党福建省政府统计，当时全省有碉堡 3492 座，堡垒 1344 座，圩寨 163 座。仅在龙岩白土纵横不到 10 公里的地区，国民党军队就修筑了 70 多座火力可交叉的堡垒。

在此基础上，国民党军队利用严密的封锁线，频频采取分区封锁“清剿”的战术，企图利用封锁线将红军游击队分割成若干部分，并不断收缩封锁网，逐渐压缩红军游击队的活动区域。国民党军队每进占一地，“即时构筑碉堡，派兵驻守”[③]，以形成纵横交错的封锁线。在闽浙赣边，国民党军队便于甘溪—车盘—篁村—紫源—陈坊—花桥—冷水坑设下北封锁线，于岚谷—坑口—大安—曹墩—皮坑—山岗—夫人庙—司前—蛇心隘设下南封锁线，形成南北封锁。然后，“破除省界，逐次紧缩封锁”，并“按已成立纵横封锁线，区分为四个清剿区”[④]。而各部队又在各自的“清剿”区内不断增设封锁线，如国民党第三师于浦城的枫岭—安民关—下市—八都镇，新十一师在建阳的曹墩—桐木关一线，独立第四十五旅在崇安的岭阳关—曹墩一线，第五十六师则在松溪—泰顺—庆元一线，第七十六师在桐木关—火烧关—昌坪—饶桥一线，构筑碉堡封锁线。

而后，国民党将“清剿”部队分成“驻剿”“搜剿”“追剿”几部分。“驻剿”部队进驻各地重要乡镇和炮楼堡垒，组织守望队、民团等把守隘口，封锁交通要道。“搜剿”部队则分成若干小分队四处寻找红军游击队的踪迹，白天看烟火，夜间看火光，并检查山间水沟、水坑中有否残遗的菜

---

① 《国民党驻闽第二绥靖部队剿匪军事报告书》(1935 年 1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闽西游击区》，解放军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59 页。

② 《闽东红旗报》，1934 年 12 月 30 日。

③ 《国民党陆军第七十六师在闽北军事部署和战况(节录)》(1935 年 6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综合篇》，解放军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321 页。

④ 《闽赣浙皖边区“剿匪”总指挥部军事部署和战况(节录)》(1935 年 7—12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闽北游击区》，解放军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45 页。

叶、米粒、粪便，山路上的茅草有否倒伏，草上有无露水，稍有一点蛛丝马迹，便占领制高点，由下而上逐步搜山，遇到密林或用机枪扫，或强迫群众去砍树，遇到草山则放火焚烧。“追剿”部队则负责对红军游击队主力进行跟踪追击，待红军游击队进入碉堡线内，然后加以合力围歼。

二、红军游击队的反对封锁斗争

由于历史和地理上的原因，各革命根据地都是以各自的地域形成的，各根据地之间大多隔着白色区域，各地党组织的横向联系相对薄弱。进入三年游击战争后，各地党组织多在原来苏区和游击区的基础上转入游击战争，并开辟了游击根据地。同时，由于活动区域的缩小，以及国民党军队的加紧封锁，使各地党组织的联系日趋困难。尤其是针对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分散于各地的特点，国民党采取了“分而剿之”的战术，在全省各地设下了层层的封锁线、碉堡群，以及阻止各地游击队的相互配合，乃至联合形成统一的力量，致使各地红军游击队陷入几个被相互分割的小包围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各地的红军游击队只有打破地域的局限，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分割封锁包围，才能适应游击战争流动性大、活动区域广的需要。于是，福建各地游击区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相继在东西南北中开辟游击根据地后，为了加强游击区内和各游击区间联系和配合，更有效地开展反“清剿”斗争，不仅在各游击区内建立统一组织，加强统一领导，实现各级党组织和各支红军游击队的互相配合；而且，逐渐向其他游击区扩展，寻求更大范围的联系和配合。在反“清剿”斗争初期，由于敌强我弱，红军游击队尚缺乏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致使反“清剿”斗争处于被动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摆脱敌人的重围，保存实力，一些地区的红军游击队被迫从本地区突围，向其他地区寻求发展空间。随着反“清剿”局面的逐渐打开，向其他区域拓展寻求联系与配合，成为红军游击队重要的战略战术。

闽浙边是国民党军队重点“清剿”的地区之一，国民党军队在福建的福鼎、寿宁、政和、松溪、崇安，在浙江的平阳、泰顺、庆元、龙泉、江山各县，构筑了严密的连环碉堡。每隔三五里就筑一个碉堡，并派重兵进行“会剿”，以阻止闽浙两省红军游击队的联系和发展，企图分而“剿”之。

然而，中共闽东特委和独立师坚持波浪式地向外发展、开辟新区的战略方针，不断向闽浙边境发展，并力图与挺进师会合。早在 1935 年 4 月，当范式人获悉原北上抗日先遣队剩下的队伍由刘英、粟裕带领在附近边界活动时，便率领独立师二团转战到浙江境内去寻找，但没有联系上。尽管如此，叶飞、范式人仍以“向闽浙边开展工作”[①]作为重要的发展方向。1935 年 8 月，中共闽东特委在柘洋堵坪召开的特委扩大会议上，把鼎平地区作为重要的游击根据地，设立了鼎平办事处，并以此作为向闽浙边区发展游击区的依托。随后，闽东独立师第一纵队在福寿游击根据地得到迅速发展后，即向浙江的泰顺、景宁、庆元、龙泉、丽水一带扩展，建立了中

① 范式人：《回忆闽东三年游击战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卷》(2)，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753 页。

共寿泰、景宁等县委，开辟了寿景游击区。独立师第二纵队于1935年9月在周墩紫云成立了中共周墩中心县委后，便转战到太姥山脉的鼎平地区，建立了中共鼎平中心县委。随着闽东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对闽浙边游击根据地的开辟和发展，为打通闽东和浙西南两块游击区的联系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此时，新成立不久的红军挺进师，在刘英、粟裕的率领下挥师南下，于1935年3月23日到达闽北，并经闽北到达闽浙边区，决定在庆元、政和、松溪、寿宁、屏南间活动一个时期，与闽东闽北的游击队建立联系，互相配合，以粉碎闽浙两省国民党军队的“清剿”。国民党军队对于挺进师的南下十分恐慌，急忙调蒋志英为保安司令驻守浙江龙泉，并以浙江保安两个团及龙泉的独立营，龙泉、遂昌、江山的保安大队布防于龙泉、浦城、遂昌一线；同时调松、政、建、浦的部队及进攻闽东，浙江保安两个团“协同合击”。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围攻，挺进师采取“分散争取群众”“集中应付敌人”“分途出动，深入敌人后方侧冀交通要道和声东击西”的战术①，很快在浙西南地区打开了局面。国民党为了进一步对付挺进师，调集罗卓英部32个团，连同地方反动武装，号称40个团，于9月19日向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扑去。在这种情况下，刘英、粟裕率领挺进师主力南下闽东，于10月5日与转战在福寿地区的闽东师立师第二纵队在福建寿宁和浙江泰顺交界的郑家坑会师。

三、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的成立

闽东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已久，非常欢迎挺进师的到来，随即双方召开了联席会议。在会上，双方都认为：国民党已经组建了“闽赣浙皖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统一指挥四省边区的部队进行“清剿”，红军游击队也应形成统一的力量以对付敌人。为了改变红军游击队各自为战的不利局面，增强反“清剿”斗争的力量，应该把浙西南、闽东、闽北三个游击区统一起来，恢复中共闽浙赣省委，以统一领导和部署反“清剿”斗争。于是，在与闽北取得联系之前，决定先成立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由刘英、粟裕、许信焜、叶飞、阮英平、范式人等组成，由刘英任书记，粟裕任组织部长，叶飞任宣传部长兼团省委书记。鉴于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处境困难，叶飞主动提出将中共闽东特委在福鼎、平阳交界处的鼎平办事处所辖区域划归浙西南，以作为临时省委和挺进师的根据地，并把闽东独立师鼎平独立团配属给挺进师，从而扩大了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范围，增强了挺进师的战斗力量。

随后，根据建立中共闽浙赣省委的初衷，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致信中共闽北分区委，通报了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和组织情况，指出“关于闽北、闽东、浙西南的斗争，我们深深的感觉缺乏中心的主要的总的领导机关，以致领导上工作上行动上往往不能求得更有力的配合，如果长久下去，则对闽浙边的整个工作实属不利，尤其在目前这样艰苦复杂的环境中，加之各

① 刘英：《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方志敏、邵式平等：《回忆闽浙皖赣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4页。

地的党组织业已与中央分局及闽浙赣省委失去联系，若不迅速地建立总的领导机关，则对今后整个斗争实属不利”。因此，建议成立中共闽浙赣边临时省委，包括闽北、闽东、浙西南。并建议闽北应积极地与浙西南及闽东打通联系，而闽东也积极向西北发展，争取与浙西南和松、政、建、屏的游击区域打成一片，以求得行动上的一致配合[①]。随后，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派叶飞携带临时省委致中共闽北分区委的信前往闽北联系，并找到了闽北区委负责人黄道。黄道对闽北、闽东、浙西南三块游击区打通联系、相互配合的建议表示赞同。但对于马上成立中共闽浙赣省委之事，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决定暂不加入临时省委。叶飞得到黄道的确切答复返回闽东，并于 11 月 7 日在寿宁、泰顺交界处的白柯湾与刘英、粟裕再次举行联席会议，由叶飞转达了黄道的意见。鉴于闽北方面不参加临时省委，会议决定充实省委，增补黄富武、洪家云、刘达云、方志富、许旺等为临时省委委员。同时，成立了闽浙边临时省军区，粟裕为司令员，刘英为政委，挺进师和鼎平独立团编为闽浙独立第一师、闽东独立师编为闽浙独立第二师。

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的成立，对于加强闽浙边党的领导，加强闽东游击区与浙西南游击区之间的联系和配合，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粉碎敌人对闽浙边的“清剿”计划，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挺进师与闽东独立师的会合，以及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的成立，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清剿”计划，引起了闽浙两省国民党军事当局的极大恐慌，于是，急速增加闽东地区的军事力量，于 10 月 7 日调第九师补充团张金廷部到闽东。11 月，又增调第九师二十五旅的 2 个团到闽东。并在福鼎至寿宁、福安至霞浦地区布下两道封锁线。

在这种情况下，刘英曾要求闽东独立师离开闽东游击区，到浙西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新的游击根据地。中共闽东特委和闽东独立师的领导人认为：“如果闽东独立师离开了闽东老区，闽东根据地就无法坚持，有垮台的危险；而闽东独立师如果没有闽东根据地作为依托，也就无法到白区开展游击战争。”[②] 于是，挺进师和独立师再次分开行动。尽管如此，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的成立，不仅为各游击队活动提供了回旋余地，有利于游击战争灵活战术的展开，有利于各游击区互为犄角、相互配合；而且，对于游击区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种种封锁，互通斗争信息和情报，交流斗争经验，更全面地了解形势的发展变化，并制订正确的方针政策，采取相应的对策，都是十分有利的。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属下的独立师和挺进师两支部队协同作战，互相配合，很快改变了反“清剿”斗争态势，粟裕、刘英率部由闽浙边向东北方向行动，进入浙南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攻克不少重镇，一直打到瓯江南部东海之滨；叶飞则率领闽东独立师，经古田、闽清、闽侯，直逼福州，形成相互呼应之势，使国民党军队首尾难顾，从而有效地粉碎了敌人的“清剿”。

（选自纪念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创建 80 周年学术研讨会，作者单位：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

---

① 刘英：《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方志敏、邵式平等：《回忆闽浙皖赣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25 页。
② 《叶飞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51 页。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若干问题再研究

吴明刚

在中央苏区革命斗争史领域中，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是一个令人关注而研究又相对薄弱的重要课题。其中，有的因史料挖掘不够，仍有待深入探讨，有的则因研究视角不同而尚存争议，如它的组建决策、战略行动意图、失败原因、历史地位与作用等问题。在此，笔者不妨就这些问题谈一谈个人的认识和看法，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组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决策是如何作出的

组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决策是如何作出的？以往论著或是囿于史料不足，或是认识不够，对这一问题似乎是忽略了，并未作深入探讨。也就是说，在谈到北上抗日先遣队时，都是从 1934 年 7 月《中央政治书记处、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中革军委会关于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给七军团作战任务的训令》谈起。其实，这一《训令》是果不是因。而且，弄清楚组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决策问题，对于探讨其战略行动的真实意图和意义至关重要。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组建是有一个形成过程的。它是由中共中央提出且获得共产国际驻华代表赞同，尔后联合报告共产国际并得到共产国际执委会批准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

福建事变之时，正是蒋介石加紧部署第五次重兵“围剿”中央苏区之际。福建事变给中央红军粉碎第五次“围剿”提供了难得的有利条件。毛泽东、彭德怀心急如焚，极力向党中央建议，在军事战略上，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变为战略进攻，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威胁敌人的腹心地带，以迫使进攻赣南闽西地区的敌军回援，这样既可以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又可以援助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当时，临时中央负责人之一的张闻天也“主张慎重其事，在军事上主张积极配合”[①]。但临时中央最高决策者的博古、李德对这一正确军事方针不仅不采纳，反而讥笑这是脱离中央苏区根据地冒险主义。

随着福建事变的失败、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策失利，中央苏区面临前所未有的空前危机。1934 年 6 月 2 日，共产国际远东局领导人埃韦特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

① 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1943 年 12 月 16 日），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76 页。

人皮亚特尼茨基的报告中指出，中共中央开始考虑“准备将我们的主力撤到另一个战场……”[①]1934年6月4日，共产国际远东局领导人赖安“根据江西、福建地区最近的事态发展，特别是注意受到中央红军蒙受的一系列惨重的军事挫折和损失，以及因此中央根据地的缩小”，建议“在最近的将来，可能是秋天，中央苏区红军的主要有生力量将不得不放弃江西，寻找出路和在湘川方向寻找发展苏维埃运动的新的地区”[②]，这就是后来中国工农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长征决策的由来。

为了策应中央红军主力实现战略转移，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开始考虑毛泽东在福建事变期间的军事战略建议。1934年6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电示驻华代表埃韦特和中共中央，表示“完全赞成你们面前根据形势的正确评价而实行的计划”，明确指出“现在就用自己的一部分部队经福建向东北方向发起战役，以期最后这些部队成为将来闽浙赣边区和第10军的核心力量。这次战役，威胁蒋介石的主要基地和交通线，对保存中央苏区和便于其余部队向湖南方向撤离（如果我们不得不这样做的话），都具有很大意义”[③]。6月1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再次致电中共中央，“建议发动福建战役，将其作为预防和吸引开敌人，进而保存苏区或从那里撤离（如果不可避免这样做的话）的措施”[④]。

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1934年7月初，中共中央正式决定派红七军团“在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的旗帜下，经过福建而到浙皖赣边行动”，并制定下达具体行军路线和作战计划及相关的战略配合措施。

二、如何看待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战略行动意图问题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动到国民党军队深远的后方”，其战略意图：一是在政治上，“以实际的行动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救中国于危亡”[⑤]，“在全中国的民众面前证明中国共产党的苏维埃与红军是唯一的真正的民族解放战争与民族革命战争的提倡者与组织者，借此更进一步揭露一切国民党的武断宣传，提高苏维埃与红军在全中国群众间的威信，与推进群众的反日反帝运动到新的阶段”[⑥]。二是在军事上，消灭在浙皖赣闽边地区敌人，进而创立大块的巩固的苏区，“给敌人的后方以极大的威胁，不能不促使敌人进行战略与作战部署上的变更”[⑦]。

以上两点，是史学界的基本看法。其实，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战略意图还有一个，即“以期最后这些部队成为将来闽浙皖赣边区苏区的骨干力量”[⑧]。这一战略意图涉及到它后来的战

①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5），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333页。
② 中央党史研究室一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32页。
③ 中央党史研究室一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43—144页。
④ 中央党史研究室一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46页。
⑤ 《毛泽东同志谈目前时局与红军抗日先遣队》，1934年8月1日《红色中华》第221期。
⑥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5），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409—3410页。
⑦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5），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410页。
⑧ 中央党史研究室一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43页。

略行动方向和历史作用的评价问题。

从中共中央、共产国际筹划组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决策角度来看，军事战略意图是最主要的，也是当务之急；政治意图虽是核心，却是为当时的军事战略任务的实现服务的。1973 年 12 月，朱德在回答军事科学院关于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真实战略意图时说："是准备退却，派先遣队去做个引子，不是要北上，而是要南下（指中央红军主力从中央苏区西南部转移）"① 朱德这一"引子"说法，明确表明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真实意图。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有关文献，也佐证了这一说法。1934 年 8 月 15 日，中共中央"已开始准备让我们的主力部队向湖南方向突围"②。9 月 17 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执委会，决定"从 10 月初集中主要力量在江西的西南部对广东的力量实施进攻战役。最终目的是向湖南南部和湘桂两省的边境地区撤退"③。9 月 30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电中共中央，同意中央苏区红军主力"调往湖南的计划"，即战略转移——长征；为此，建议"组建独立的东方军，由第 7、第 10 军团和来自中央苏区的另一个军团组成，目的是在东部四省交界处建立和发展一个强大的根据地，给蒋介石的军队在湖南方向上的集中造成困难，还可以隐蔽我们在湖南的主要计划"④。

从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战略行动的实际效果来看，无论是政治意图还是军事意图，应该说都没有完全达到预定战略目的。这一点，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战略行动失败后不久，1935 年 2 月 13 日，也就是遵义会议后的中共中央在《关于坚持游击战争给中央分局的指示》中，就强调指出"依野战军（中央红军主力）及红十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经验，如你们大部队远出，是没有胜利保障的"⑤。至于"以期最后这些部队成为将来闽浙皖赣边区苏区的骨干力量"，这一战略意图倒是实现了。

三、关于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战略行动失败的原因问题

如何看待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战略行动的失败问题？迄今，已发表的论著，主要是依据粟裕等人的回忆录的基调来进行审视的，如上世纪 80 年代闽浙皖赣四省党史工作者共同协作完成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以及目前网上盛传的《中共北上抗日先遣队覆亡内情：中央做 5 个错误决定》等。其基本观点是：在客观上，是敌人力量的暂时强大，主观上的也是主要的原因则是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博古为首的中央组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战略决策不合时宜；在作战指导上实行绝对集中

① 粟裕：《回顾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等：《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55—266 页。

② 中央党史研究室一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4 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94 页。

③ 中央党史研究室一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4 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51 页。

④ 中央党史研究室一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4 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56 页。

⑤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5），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557—3558 页。

的指挥，以致容易脱离实际，使部队作战行动陷于被动；加上先遣队领导层意见分歧大，闹不团结，等等。

上述研究观点，应该说基本切合历史事实，也有一定道理。但是，研究的视角存在问题，即没有从为什么要组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它的战略行动真实意图是什么等角度去看问题，以致总是以结果来反推原因。

博古为首的中央对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战略指导，为什么会自始至终都是作出脱离实际甚至违背军事指挥常识的错误决定？从作战的失败结果来进行分析推导并得出结论的看法，这是历史事实，但不是真实原因。以往都是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的角度去反思和认识。应该说，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

如果从它的决策形成和战略意图的角度进行审视，是不难理解的。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实行“向湖南方向突围”——战略转移，是在“没有任何其他出路的时候”和“极其困难条件下”①进行的。保障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实现安全战略转移，是共产国际、中共中央派遣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根本原因。况且，在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长途跋涉、孤军奋战的6个月时间里，中共中央仍处于博古把持的左倾领导之际，把工作重心都放在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上，对抗日先遣队沿途作战的指导是预先制定好的，简单而明确，且不容更改，即“规定这次行动的最后到达地域为皖南”，并“要求七军团在一个半月内赶到，支援和发展那里的革命局面”。而且，在北上战略行动中，对于先遣队领导人提出的调整作战路线、希望在闽北或赣东北的苏区进行短暂休整等建议，中共中央都是再三强调北上战略行动的重要性和特别意义，即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改变北上任务”②，也“不要希望红十军及闽北分区的帮助”③，“在部队中应防止与坚决反对想缩回赣东北的情绪与企图”④等。由此可见，中共中央对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战略行动的指导，可以说是为达目的不讲条件。其主要战略意图，就是尽可能多的吸引和牵制国民党“围剿”军队，掩护中央红军主力实现从西南方向进行战略转移。因此，为了达到这一战略目的，中央军委给先遣队指战员下达的作战命令，实际上都是围绕不惜一切代价牵制敌军这一战略指导思路来部署的。

总之，在明显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深入蒋介石统治的腹心地带而又革命斗争基础较为薄弱的闽浙赣皖边地区进行作战，可以说失败是必然的，也是在当时中央领导决策者的意料之中的。但是，历史不能以成败论英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指战员顾全大局、英勇无畏，为了胜利、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是必须充分肯定的。正如粟裕所说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斗争历史，首先是一部惊天动地的无产阶级革命战争的英雄史。”⑤

---

① 中央党史研究室一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94—195页。
② 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等：《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92页。
③ 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等：《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85页。
④ 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等：《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95页。
⑤ 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等：《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60页。

四、关于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历史地位与作用问题

关于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历史地位与作用问题，应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争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牵制了约 20 万国民党军队，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的战略大转移；二是率先举起了北上抗日的旗帜，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推动了全民族抗日运动的发展；三是先遣队留存下来的红军武装，成为闽浙皖赣边几块游击区的主要有生力量。问题在于，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从已发表的有关论著来看，基本上是点到为止而已，进行深入系统阐述的成果很少。

其实，上述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三个方面的历史地位与作用问题，仍然是一个有待于深度上和广度上加以拓展研究的课题。

比如，北上抗日问题。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虽然是由中央苏区红七军团和后期的红十军组成，但是代表的是整个中国工农红军。它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在“北上抗日”的旗帜下公开进行的重大军事战略行动，是“抗日救国军的先锋部队”[①]。先遣队为什么要高举抗日的旗帜？主要原因有三：一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革命局势出现了两大变化，即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则随之变为次要的矛盾；中国革命的重心开始由南方向北方转移。“抗日救国”成为中国人民心中最主要的问题和中国革命的主旋律。为此，中国共产党就明确提出了用民族自卫战争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口号，中央苏区革命斗争带有浓厚的反蒋抗日色彩，如 1932 年毛泽东率领东路军进军漳州，1933 年中央苏维埃政府和中央红军与十九路军联共反蒋抗日并促成福建事变的爆发等，都是与抗日救亡运动紧密结合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不仅把军事战略行动同抗日宣传运动有机结合起来，而且还公开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帜，这在红军革命战争史上是第一次。

二是在“围剿”红军中，蒋介石动用各种舆论工具，大肆“指责红军和中国苏维埃，说他们搅他们的后方，所以他的军队无法与日本作战”[②]。为了揭露敌人的蛊惑宣传，中共中央决定这支策应红军主力进行战略转移的先遣队以“北上抗日”为号召，旨在以实际行动来证明中国工农红军是真正抗日的人民队伍，进而推动全民族抗日运动的发展。为此，宣传抗日成为当时赋予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主要政治任务。中央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准备工作。为了宣传我党抗日主张，中央公开发表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等文件，印制了“中国能不能抗日”“一致对外——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拥护红军北上抗日运动口号”等大量宣传品，总数达 160 万份以上。

三是针对日本人在福建东南部的侵略行径，把先遣队的军事战略行动同抗日宣传运动有机结合起来，以瓦解敌人的部队。为此，1934 年 6 月 17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在给中共

① 中央党史研究室一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31—1937）》第 17 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47 页。
② 中央党史研究室一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4 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53 页。

中央的电报中明确提出:“在福鼎地区发展广泛的游击运动可能引起同日本海军陆战队的直接冲突,在我们巧妙利用这种冲突的情况下,可以促使白军士兵群众转移到我们方面来。”①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为什么要进军闽东地区了。

又如,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如何推动了闽浙皖赣边区革命斗争的发展问题。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军事战略行动尽管失败了,但它极大地推动了闽浙皖赣边区革命斗争的开展,成为后来闽浙皖赣边区革命斗争的重要骨干力量。这一极大地推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闽东、闽北苏区党组织和红军抓住北上抗日先遣队转战闽浙边和此间闽浙边国民党兵力相对薄弱的有利契机,积极发动和组织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积极开展扩红、筹粮、筹款等工作,加强苏区的政权、经济和军事建设,使闽北、闽东苏区一度进入鼎盛发展阶段。闽北、闽东苏区这一大好发展局面的出现,是在特殊的革命斗争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后随着北上抗日先遣队革命斗争的失败,一直坚持斗争到1935年3月,成为最后陷落的中央苏区之一。闽东、闽北苏区革命斗争的历史表明,在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1928年至1937年)历程中,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不是结束点,而是一大转折点;中央苏区革命斗争有一个尾声式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一尾声式的历史发展过程其实也是中央苏区革命斗争向三年游击战争转变的过渡阶段。二是先遣队经过的闽浙皖赣四省边界地区,后来都成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重要区域,先遣队留存下来的红军指战员,成为闽浙赣皖边几块游击区的主要武装力量和领导骨干,即黄道、吴先喜、黄立贵、曾镜冰等领导的闽北游击区,叶飞、马立峰、詹如柏等领导的闽东游击区,刘英、粟裕等领导的浙南(和浙西南)游击区,关英等领导的皖浙赣边游击区等4块游击区。其中,北上抗日先遣队对浙南、浙西南和皖浙赣边革命斗争的开辟、巩固和发展,其历史作用和影响尤为突出。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浙南、浙西南和赣东北等党组织都相继汇聚于中共闽浙赣区(省)委的统一领导之下,应该说都是与这一密切的革命历史渊源关系分不开的。

迄今,涉及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散处在闽浙皖赣四省边界地方党史专题中,系统性的专题研究成果较少。这是今后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课题研究的一个重点,而要做好这一课题研究,有赖于闽浙皖赣四省有关党史部门的通力协作,有赖于党史研究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选自《纪念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创建8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作者单位:福建省革命历史纪念馆)

① 中央党史研究室一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47页。

红军挺进师求实创新精神及其现实意义

赵前吉　宁　金　卢梅春

红军挺进师挺进浙江开展革命斗争的实践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与浙江革命斗争实际结合起来，有效地克服革命进入低潮、国民党高压统治、缺少红色游击区基础、民族危机等不利因素，创造性地开辟游击根据地、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的游击战争战略战术思想、创造性地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创造性地开展群众工作、创造性地进行战略与策略的转变，这种求实创新的精神对中国军事斗争的实践、革命道路的探索和历史影响都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入浙80周年前夕，回顾总结挺进师的求实创新精神，必将会赋予我们深刻的历史启示，并为新时期浙江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一、红军挺进师求实创新精神形成的深刻历史背景

红军挺进师是在1935年1月底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后，以突围部队为基础组建，由粟裕任师长、刘英任政委的挺进师，从进入浙江境内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游击根据地开始，到1937年9月与国民党浙江军政当局签署和平协议为止[①]。在近三年的时间里，正值日寇铁蹄蹂躏我大好河山，革命遭受严重的失败，社会冲突激烈、矛盾变动急剧的时代，挺进师正面临着艰难的选择：如何走出革命低潮？如何打开浙江革命斗争的新局面？如何策应红军主力战略转移？如何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等。正是在这样的危难关头，这些紧迫的问题，都需要红军挺进师以求实创业创新的精神作出正确而又果断的抉择。

（一）扭转全国革命形势走向低潮局势的需要

1933年2月至3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失败后，经过半年多时间的准备，1933年9月又调集100万军队、200多架飞机，向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反革命“围剿”。由于王明“左”倾错误影响，1934年9月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打了一年以失败告终，红军从三十万人减到三万人左右，共产党员从三十万人减到四万人左右，中央苏区由原来的纵横千里，缩小到仅300余里，中国革命再次步入低谷[②]。为此，中央决定组建挺进师，进入浙江开展革命斗争，挺进师可谓临危受命，任重道远。

① 黄寒冰、李素平：《浅议粟裕与“烽火浙南”》，《铁流》第23期。

② 周德春：《浅析抗日先遣队和红军挺进师对长征的战略策应》，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福建党史月刊》2010年第12期。

（二）浙江特殊的地理和历史原因的必然需要

首先，浙江是江浙财阀的巢穴，是蒋介石政权的根基所在，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在此大部分地区的党组织遭破坏，缺少红色根据地或游击区支撑。其次，虽然浙江是蒋介石反动统治的重地，但地处浙江一隅的浙西南和浙南地区山岭连绵，地形复杂，森林茂密，是开展游击战争的理想之地。况且，浙江一向被称为实行反动统治的“模范区”，这里的广大劳苦群众长期受压迫剥削，反抗情绪很高，也存有未灭的革命火种红十三军志士，革命基础犹存。为此，浙江因其以上特殊的地理和历史原因，造就挺进师革命形势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

（三）红军主力亟待战略策应的需要

1934 年 4 月广昌失守后，中央红军在根据地内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同年 5 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准备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实施战略转移，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组织两支部队分别北上和西进，挺进师的入浙就是其战略布局之一。中央派遣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通过挺进师入浙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游击根据地，不仅可以在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燃起新的革命烈火，在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后院构筑新的革命堡垒，而且可以借此调动、牵制和打击一部分国民党军，缓解和减轻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压力，可以真正从战略上策应长征。

（四）国共统一战线合作抗日的需要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特别是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在这种形势下，闽浙边临时省委坚持原则，以非凡的智慧和独特的创造力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了两次抗日统一战线谈判，谈判结果关乎到红军游击根据地甚至是红军挺进师本身的生死存亡，所以充满了智慧的交锋，第二次谈判取得了成功，红军挺进师顺应革命形势的需要，被编入新四军，开始了抗日新征程。

二、红军挺进师入浙求实创新精神的丰富历史内涵

上面讲到红军挺进师求实创新精神形成的历史背景，正是这种特殊急剧变动的时代背景催生了求实创新的必然要求。挺进师不辱使命，坚持党的政策和策略的正确指引，与时俱进，创造性地采取和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形成了求实创新的精神。

（一）创造性地在浙江开辟浙西南、浙南根据地。首先，红军挺进师吸取了红十三军在浙江革命的惨痛教训，采取了正确的游击战争战略战术，于 1935 年 9 月在江山、浦城、龙泉、遂昌、松阳五县之间建立起浙江省第一块革命根据地——浙西南革命根据地，该根据地纵横百余公里，较好地完成中央交付的任务。其次，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建立以后被国民党调集重兵进行大规模“清剿”，为此，挺进师主力部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与闽东红军胜利会师，并开辟了浙南游击根据地。这两块根据地的建立和建设使浙江的革命发展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重大突破，也使其成为了中国革命在南方的“最可靠的战略支点”。

（二）创造性地运用和丰富了毛泽东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粟裕等领导的红军挺进师在浙江三年的游击战争期间，坚持一切从浙江的实际出发，提出了以“积极进攻”和“敌进我进”为代表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敌进我退”的游击战术思想。“敌进我退”是在自己的后方做文章，“敌进我进”则是在敌人的后方做文章，但他们的战略指导思想都是剑指“后方”。可见，粟裕等挺进师的指挥员们深刻地领会了毛泽东游击战争战略战术思想的精髓，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三）创造性地同国民党当局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刘英同志时任省委书记还兼任了统战部部长，与国民党黄绍竑成功谈判，谈判过程中既坚持原则立场，又采取灵活的策略，粟裕率领挺进师路过丽水时黄绍竑专程回见并赠送物品慰劳，同时在平阳、温州、丽水也分别设置新四军后方留守处、通讯处和办事处，而且大批党员进入国民党浙江政工处。谭启龙在浙东敌后第一次干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抗战初期，浙江党的统战工作，在全国除了武汉方面之外，是做的最好的，尤其是当时的政工队有了很大的作用。”可见挺进师的抗日统战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四）创造性地开展群众工作。挺进师进入浙江之初并不熟悉当地的情况，但是通过因地制宜地围绕以下四个方面创造性地开展群众工作，获得了“很多的群众”，其工作方式方法在当今仍具有很好的启示和借鉴意义。一是靠本土化宣传发动群众。首先有效地利用当地成长起来并具有群众基础的“青帮”组织发动群众。其次在当地设立了青年部、职工运动委员会和妇女运动委员会、战时青年服务团等群众组织吸纳当地干部群众，并通过这些组织开展培训、做好革命宣传工作。二是靠专业化争取群众。只有够专业才够实力，才具备吸引力和承载力，才能提高服务水平。挺进师把国民党政府的保甲制度当作专业来掌握，做到熟知、会用，采取“红心白面”政策，表面上应付敌人，实际上坚持斗争，以此争取和保护群众。同时，挺进师把部队分成“牵制队”和“突击队”，特别是“突击队”主要专业就是发动群众建设游击根据地，有效锻炼和充分发挥不同游击队员的特长，也为成立敌后武工队打下了基础。三是靠干部群众化和职业化去团结群众。比如当时要求每位干部、游击队员都要迅速掌握打游击和做群众工作两套本领，详细规定不仅要求干部要打赤脚和群众一起劳动，而且还要求每个人都要学会一种以上的干农活的手艺，如编织竹筐、播种、养殖等，不会手艺的就要帮收割、扛肥料、灌溉等和群众打成一片。四是靠最大利益化服务群众。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征收抗日捐”等革命斗争，最大限度地满足群众的利益诉求。

（五）创造性地进行战略与策略的转变。首先，挺进师吸取红十三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教训，摆脱右倾、“左”倾的影响，将革命斗争策略由运动战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变、由正规军向游击队的军事战略转变，成功地保存自己的力量，消耗和打击了敌人力量。其次，红军挺进师在远离党中央，并曾一度与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以开拓进取的精神和争创新局面的战斗意志同国民党当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

的战略转变。以上两次战略转变，使挺进师抓住了机遇，在革命斗争中实现了“弯道超车”，超越了别人,更超越了自己。

三、红军挺进师求实创新精神的历史作用

红军挺进师求实创新精神无论是在推进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还是在革命道路、军事战略战术思想的探索以及历史影响方面，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实践的意义。挺进师以求实创新的精神在浙江进行武装斗争，成功点燃了浙江革命的烈火，艰苦开辟了浙西南、浙南根据地，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在浙江的反动统治，有力地策应了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极大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同时，为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群众工作提供了新的经验。

（二）理论的价值。挺进师在浙江的革命斗争在理论上证明了毛泽东实事求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的正确性，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继承与创新了毛泽东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

（三）历史的影响。长期的斗争实践，使挺进师及其建制延续部队经受了磨炼，增长了智慧才干，涌现了粟裕、刘英、陈铁军等大批优秀干部，成为了新四军的部分骨干力量，对新四军的创建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突出贡献，也促进了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较大的影响。

四、红军挺进师求实创新精神的启示及当代价值

80 年前，在全国革命进入低潮时，挺进师以求实创新的精神进入浙江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浙西南、浙南等根据地，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革命形势发展，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80 年后的今天，挺进师求实创新的精神没有失去其应有价值，它对今后如何进一步推进浙江革命和现代化建设发展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重大现实价值。

（一）红军挺进师求实创新精神的启示

1. 必须求真务实地认识党情、国情、省情，这是革命和建设成功的重要前提。挺进师成功摆脱“左”倾、右倾主义的影响，勇敢地完成中央下达的任务，成功进入浙江并点燃了革命的烈火，创建浙西南、浙南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在南方建立了一个重要战略支撑点。现在浙江进行现代化建设，也要适合中国的党情、国情、省情，在新的起点上奋力开启建设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现代化浙江新征程。

2. 必须坚持党的政策和策略的正确指引，这是革命和建设成功的理论保证。挺进师在斗争实践中，坚持了马列主义、毛泽东的实事求是、“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使浙西南、浙南革命根据地不断地发展壮大。这一革命斗争经验启示我们，在当今的革命和建设中，必须用科学的态度对待发展的马列主义，反对盲目照搬照套，要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与本地的

具体实际相结合，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不断变化的实践。

3. 必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这是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取得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浙南虽是国民党反动统治比较严密的地区，但广大工农群众经过挺进师宣传发动、团结教育与最大利益化服务工作后，他们信任并欢迎共产党和红军，最后还把自己最优秀的儿女送进挺进师，同挺进师结下了血肉不可分的情谊。挺进师的群众工作方式方法启示我们党和政府的工作必须坚持一切工作植根群众、服务群众、为了群众、依靠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特别是在利益矛盾日益尖锐复杂的新形势下，塑造和谐的党群、干群关系，必须高度重视并积极解决关乎群众切身利益问题，满足群众利益最大化需求，才会得到群众的支持与配合。

4. 必须与时俱进不断探索，这是新时期开创新事业的时代要求。如果没有挺进师因地制宜地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游击战争战略战术思想，如果没有适时地进行二次战略转变，如果没有创造性地开展群众工作，那么，浙江革命就得在黑暗中不断地探索更长时间，中国革命在南方也会缺少了一个可靠的战略支点，红军主力也有可能遭受更大的重创。在“四个全面”建设新时期，党和国家面临着国际国内许多严峻挑战，面临着各方面的严峻危机，面临着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更要有求实创新的精神。

（二）红军挺进师求实创新精神是新时期浙江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动力

解放思想、求实创新精神是挺进师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和人民依靠这种精神克服了各种艰难险阻，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历史时期，继承和发扬挺进师求实创新的精神，就是要把这种精神转化为浙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先发优势，上升为指导浙江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和文化发展的浙江精神，为完成浙江“十二五”规划目标任务，为“干好一三五、实现四翻番”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1. 坚持创新驱动，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永葆浙江先发优势。2003 年 7 月以来，中共浙江省委提出“八八战略”，即进一步发挥八个方面的优势、推进八个方面的举措，八大优势包括体制机制、区位、块状特色产业、城乡协调发展、生态、山海资源、环境和人文八大优势。目前，世界经济、中国经济和长三角经济都开始进入调整变革的新常态，这使得创新驱动推进改革发展成为了未来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种新常态下，浙江原先的八大优势中的部分条件已经丧失竞争优势，尤其是区位、产业、环境等优势将面临严峻的挑战。未来几年，浙江经济必须适应增速放缓的新常态变化，核心是要做好经济增长动力的转型，重点学习上海自贸区的经验，其杀手锏是“好制度、好管理”，重新设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规范政府的职能和行为，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同时必须强势推进产业、要素、需求、城乡和人口五大结构改革，唯有这样才能永葆浙江的先发优势。

2. 立足“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创造性解决浙江现实中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热点难点问题。“四个全面”是党中央对新形势下治国理政提出的新的战略布局，是引领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浙江要以“四个全面”为引领，真抓实干，切实破解现实中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热点难点问题。一是在全面建设小康方面。预计 2015 年浙江的人均 GDP 可以突破 13000 美元，“十三五”浙江人均 GDP 将向 20000 美元迈进，浙江将正式迈入高收入阶段。但是浙江发展还存在着城乡、区域、领域发展不够平衡等问题，比如还存在着 26 个欠发达县的发展问题。要进一步缩小以上各方面发展上的差距，使全省广大人民都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二是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创造了第一批个体工商户、第一批私营企业、第一批股份合作企业、第一批专业市场、第一座农民城等许多可以载入改革史册的“全国第一”，成为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在新的历史阶段，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切实在行政体制、投融资体制、资源配置和生态建设体制改革及民生保障改革等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取得新突破。三是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面。要全面提高领导干部法治意识，增强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推动工作的能力。特别是要在“三改一拆”“五水共治”和“十个方面民生实事”等重点工作推进时全面落实法治要求，以点带面，形成示范带动作用，营造最优的法治环境。四是在从严治党方面。要切实解决一些地方对管党治党重视不够、抓得不严等问题。特别是要严格执行中央的八项规定，坚决反对和防止“四风”问题。同时，要积极探索基层治理法治化、不合格党员处置、社区党建、非公经济党建等领域的党建工作，助推全省党建工作迈上新台阶。

3. 在国际、国内战略中布局谋篇，提升浙江发展的战略地位。欧盟于 2009 年提出“智慧欧洲”战略，美国 2011 年提出“再工业化”战略，德国 2013 年提出“工业 4.0”战略，我国近年也相继提出了“一带一路”国际战略和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区域发展战略。面对国际国内局势的深刻变化，浙江省必须警惕被北京、上海、广东、江苏等甩开差距的严峻风险，努力使浙江走在全国发展前列，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强省，成为改革发展强势的排头兵。

4. 突出生态文明和民生改善工作，建设“两美”浙江。2014 年 7 月，浙江省委十三届五次全会作出了“建设美丽浙江、创造美好生活”的决定，创建“两美”将成为新时期浙江现代化建设的主题。张德江在 2015 年 3 月参加浙江代表团审议时为浙江治水点赞，称赞抓到了点子上、先行了一步。全省各级各单位应该乘势而上，积极贯彻中央、省委的精神，响应人民群众的呼声，在水环境治理、大气环境治理、城乡环境治理、节能减排等方面下大功夫，再发力冲好成绩。同时，必须高度关注民生，继续按照民生实事群众提、群众定的理念和办法，确定保障民生的重点工作，并加大财政投入，落实责任，切实办好，使经济发展的成果更多地惠及广大浙江人民。

（选自《纪念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创建 80 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作者单位：中共广西来宾市委党校）

新时期红军精神研究

梁晓宇

中国工农红军在土地革命战争烈火中诞生成长，在十年反“围剿”中不断发展壮大。红军指战员无私无畏，为国为民，顽强战斗，前赴后继，勇往直前，百折不挠，直到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中国共产党在九十多年波澜壮阔的历史当中，提炼和概括了一些革命精神，这些革命精神主要包括以会议形式命名的古田会议精神、遵义会议精神等，以党史人物命名的白求恩精神、张思德精神，以党史重大历史事件命名的长征精神，以在党史上影响大的纪念地命名的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但是直到目前为止，国内党史界还没有对红军精神做一个系统的概括和提炼，红军精神与各个单独罗列出的革命精神在本质上是具有一致性的，本文拟从几个方面入手，对红军精神做一个简单的概括，意在抛砖引玉，引起学界同仁对红军精神研究的重视，也期待有更多的研究成果出现。

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是红军精神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之精神支柱，是我们战胜艰难险阻、抵御错误思想干扰的强大思想武器，也是红军精神的理论渊源和理论基础。红军精神是在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道路的初步探索基础上形成的。《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在历史上没有一个阶级斗争问题，不是用暴力革命来解决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武装夺取政权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队伍是人民的队伍，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高举武装斗争的旗帜无疑是正确的。正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坚定信仰基础之上，广大红军指战员才在创建苏区革命根据地的同时形成了伟大的红军精神。以川陕苏区为例，川陕苏区党组织明确指出，为了扩大苏区，全党必须做好如下工作：“完成三十万铁的红军，立即动员五万新兵到红军中去，发展全苏区内外的游击战争网。输送最好的党团员到红军中去，同时坚决彻底执行替红军家属代耕。必须形成巩固的苏维埃根据地，深入土地革命的阶级斗争，镇压一切反革命，巩固真正能够拥护穷人利益的苏维埃政权。必须深入党的教育，开展思想上、政治上两条路线的斗争。”①

中央苏区的红军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成功粉碎了敌人的四次“围剿”，到 1933 年 11

① 四川大学：《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上），四川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24—125 页。

月，中央苏区辖有江西、福建、闽赣、粤赣 4 个省级苏维埃政权，拥有 60 个行政县，总面积约 8.4 万平方公里，总人口达 453 万，党员总数约 13 万人，红军和苏区发展到了鼎盛时期。1934 年 10 月初，国民党的部队开始推进到中央根据地的中心地带。到了 10 月下旬，中央红军主力 5 个师团和中央、中央军委与中央直属部队共计 8.6 万余人撤离中央苏区，开始了著名的长征。同时，中央决定留下红二十四师和十几个独立团共计约 1.6 万人留守中央苏区，他们在项英、陈毅的领导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从 1934 年冬至 1937 年 7 月，各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依靠人民群众，利用复杂的地形，运用游击战术，坚持了极其艰难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三年游击战争时期，1935 年 2 月，由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团的突围部队为基础组建的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全师仅 500 余人，师长粟裕，政委刘英。挺进师进入浙西南之后，粟裕和刘英立即率领部队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了浙西南游击根据地。

总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选择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正是在这样的道路和环境中成长的红军，才能担负起实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的历史重任。

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当代红军精神的主题

红军精神的意义和价值在现阶段应赋予其新的内涵，而作为和苏区之精神同时期的红军精神，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其题中之义。红军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军队，是劳苦大众的军队，是新型的人民军队。红军精神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如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的前进道路异常艰难，他们面临的恶劣环境超出了极限，但是他们却顽强地坚持了下来。他们把武装斗争与做群众工作相结合，坚定革命信念，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大“围剿”，胜利完成了从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转变。在现阶段，我们就要坚定弘扬红军那样的理想，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

新阶段，大力弘扬红军精神，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精神动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并不能一蹴而就。它有许许多多实在的“指标”，需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经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奋斗才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使红军精神获得了新的表现形式，增添了新的时代内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根本的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而红军精神所蕴涵的奋发向上、独立自主、不畏艰险之精神，对于凝聚力量、促进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红军精神体现了中华儿女爱党爱军的坚定政治信仰，具有重要的政治导向作用，弘扬红军精神，可以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供可靠保障。

三、对中华民族的无限热爱是红军精神的主旋律

中国共产党创立红军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救国救民”。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

队的根本宗旨就是为民奋斗，是人民的军队，是救中国劳苦大众的军队。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深厚情感。这种情感，表现为人们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形成的对故土家园的眷恋感、对骨肉同胞的亲切感、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归属感。这种自发、朴素、真挚的情感是民族自我认同的心理基础。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为了完成两大历史性任务，近代中国被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传统的、封建的政治文明的皇权理念、秩序受到冲击并逐步瓦解。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于 1898 年发动的“戊戌变法”以失败而告终。1905 年，孙中山创建“同盟会”，成为我国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开始了我国政党制度艰难曲折的探索和实践历程。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中国人迈出了探索近代社会政治发展的步伐。1919 年“五四”运动后，各种社会思潮和救国方案应运而生，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比较中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一经介绍就在中国很快得到了认同和接纳。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实行的屠杀政策及其所造成的严重形势，给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寻求中国革命的新发展，提出了严峻考验，武装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在初步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做出的一个历史性决策，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高举起中国革命斗争鲜明的旗帜，坚决进行武装斗争，更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完成中华民族的两大历史性任务的继续。“每一件珍贵文物、每一处革命遗址、每一个革命事件、每一种革命精神，都以不容置疑的证据诠释着中国共产党人热爱祖国、依靠群众、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思想道德境界。”① 中国工农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为劳苦大众求解放的军队，一方面他们听党指挥，另一方面他们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表现出了对祖国的无比热爱，“北上抗日”便是红军战士对祖国无比热爱的真实写照。

当前，发扬红军精神所表现出的爱国主义情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红军精神就是爱国主义在革命战争年代的集中体现，在现阶段，大力弘扬红军精神之爱国主义情操，对于激励广大人民群众为祖国繁荣富强而努力奋斗有着不可低估的凝聚力作用。

四、坚定信仰、敢为人先、听党指挥，是红军精神的主旋律

坚定的理想信念，是广大红军指战员坚持斗争、争取胜利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为了策应中央红军的统一行动，党中央派出了北上抗日先遣队，先遣队的主要任务先是支持苏区红军的反“围剿”，再是掩护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不管是什么任务，红军将士都坚决地听党指挥，服务于大局。同样，中央苏区之所以能多次击退强大于自己数倍的敌人的进攻，一个重要的因素就在于广大红军指战员在共产主义理想和坚定的革命信念的指引下，上下团结，同仇

① 李康平：《红色资源开发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道德与文明》2008 年第 4 期。

敌忾，奋力杀敌。经过长征的考验和锻炼，到达陕北的红军在数量上减少了很多，但是都是精英和骨干，他们的绝大多数成为了八路军的优秀指战员，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留在南方八省15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服从党中央的安排，面对困境决不退缩，坚持了三年的游击战争，牵制了大量的国民党军，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红军的战略大转移。在三年的实际斗争中，也造就了一批富有斗争经验的干部，保存了一批经过严峻环境考验的党的部队骨干力量，为人民军队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实现主力红军伟大长征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也在军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毛泽东高度评价说："这是我们和国民党十年血战的结果的一部分，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在南方各省的战略支点。"同时，经过三年游击战争洗礼的红军战士，提高了对武装斗争的认识，积累了作战经验，从而为创建人民军队培养训练了一批得力可靠的军事干部。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在三年游击战争中，钳制了大量国民党军，在战略上配合了主力红军的作战，为土地革命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南方八省各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后来成为华中、华南地区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骨干力量。而在南方八省的游击根据地中，国共双方都保留和提升以浙南为核心的浙江革命根据地的地位。

党的十八大报告对党员提出了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的要求，历史已经证明，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学习红军之坚定理想、敢为人先的精神，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信仰信念的认识。坚定的理想信念是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最根本的源泉，坚定理想信念在革命战争年代最具体的体现就是红军战士对革命的无限忠诚和矢志不渝，红军战士在党的领导下，哪怕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坚守着自己的理想信念，用鲜血和生命为革命事业的成功而英勇奋斗。

五、群众路线的伟大实践是从红军创建开始的，红军精神孕育了党的群众路线

关于群众概念的定义，《党的群众工作大辞典》中的解释是："群众：泛指人民大众。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也指没有加入共产党、共青团组织的人。在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中，与领导者、管理者相对称的群体和个体亦成为群众。"① 关于群众工作的概念和定义，《党的群众工作大辞典》解释为："党为实现自己的政治路线，从维护群众的利益出发，所进行的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等工作的总和。"②

中共十八大修订的党章指出："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③ 我们把党的群众路线核心内容概括为"两个一切"和"一来一去"。

我们看看中共一大纲领和中共二大到六大的党章，发现并没有关于群众路线的明确表

① 夏明、贺兵：《党的群众工作大辞典》，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② 夏明、贺兵：《党的群众工作大辞典》，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68页。
③ 《中国共产党章程》，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9页。

述，但实际上从中共二大开始，党在斗争的实践中就开始对群众工作有了要求。中共二大的党章指出：“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大的‘群众党’”，“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① 党的四大制定了《对于职工运动之决议案》，该决议明确指出：“要尽力发展我们自己的党组织，力求深入群众。”② 1925 年 10 月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决议案》中关于《组织问题已决案》中进一步强调了群众工作的重要性。“中国革命运动的将来命运，全看中国共产党会不会组织群众，引导群众。”③ 党的群众路线是在红军时期孕育的，现行党章中群众路线的核心观点在红军初创时期就体现出来了。“红军每到一处，将原有的政权摧毁以后，就发动群众建立基层政权组织——村苏维埃。通过村的群众大会，实行普选，把那些最穷苦、被群众公认能为穷人办事的人选出来担任村苏维埃的主席和委员。接着再建立苏维埃政权。”④ 可以看出，红军是在组织群众和发动群众中不断发展和壮大起来的。

毛泽东则说明了在解决具体问题过程中，提出和阐发了群众观点，他认为红军与白军不同，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红军主要任务是做群众工作，打仗与做群众工作是一与十之比的。”1929 年 12 月，毛泽东在《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会议》中明确提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路线去执行。”⑤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广大红军战士以各个苏区为根据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在武装斗争中不断地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和组织群众，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土地革命以后，广大农民群众为了保卫苏维埃政权，保卫土地利益，积极参加红军参加对敌作战。例如，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之后，公开提出了“打土豪，帮助群众战胜饥荒”的口号，他们每到一地，首先是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依靠群众的力量摧毁反动的基层政权。挺进师的实际行动，深深地感染了当地的群众，他们踊跃参加红军，投身革命。1935 年 6 月中下旬，红军挺进师在浙西南地区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还建立了工会、妇女会、商会等群众性组织。

由此可见，红军精神内在地孕育着党的群众路线的形成。在新时期，在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中，我们应该发扬红军精神，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大力宣传红军精神，使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与红军精神的传承实现有效互动。

（选自《纪念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创建 80 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作者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党校涪陵分校）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90 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46、347 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472 页。
④ 四川博物院：《西行壮歌——川陕革命根据地斗争史》，四川教育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04 页。
⑤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565 页。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组建及影响研究（节录）

张德义

中央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简称“抗日先遣队”）既是国内阶级矛盾和中日民族矛盾激烈变化的产物，又是中共急于摆脱国民党军事“围剿”困境的一种战略尝试。尽管抗日先遣队仅存在6个多月便遭到严重失败，但不容否定的是其在抗日战争史上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学界对抗日先遣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组建、在闽活动及失败因由等问题①，而对抗日先遣队与红军挺进师在浙进行革命活动的关联性研究较少②，有待进一步深入。基于此，笔者拟从中央组建抗日先遣队的必要性、抗日先遣队的革命活动、抗日先遣队失败因由及历史借鉴等方面阐述，探析抗日先遣队失败对红军挺进师在浙活动的历史借鉴，努力展现中央对抗日先遣队的战略决策及对中共在浙进行革命活动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一、中央组建抗日先遣队的必要性

学界对中央组建抗日先遣队因由虽有不少研究成果，但在看法上不尽一致。学界较有影响的两种观点是：中央组建抗日先遣队是为了实现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而派出的掩护部队③；中央组建抗日先遣队是王明“左”倾路线在中央苏区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作出的，实属分兵御敌的考虑以牵制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军事“围剿”④。笔者认为，中央组建抗日先遣队是基于革命任务亟需转变的形势，主要处于分兵御敌的考虑，却在客观上达到掩护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目的。因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和军事冒险主义影响，加之抗日先遣队深入国民党统治中心腹地而遭到数倍于红军的敌人围追堵截，最终难以逃脱失败的命运。

---

① 代表性成果有王建军等：《浅析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失败的原因》，《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张敏卿：《重释“北上抗日先遣队”组建的原因》，《中州学刊》2007年第2期；刘俊平：《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原因再探——以军事战略为视角》，《党史文苑》2013年第22期，等等。

② 相关成果仅有三篇论文：周德春：《浅析抗日先遣队和红军挺进师对长征的战略策应》，《福建党史月刊》2010年第12期；毛飞云：《从挺进师入浙的成功看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的教训》，《纪念浙西南、浙南游击根据地创建60周年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年版；孙瑛：《浅析红军挺进师与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成败的原因》，《纪念浙西南、浙南游击根据地创建60周年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年版。

③ 该观点为学界主流观点，持该观点的代表性文献有唐洪森：《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派出由来》，《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周德春：《浅析抗日先遣队和红军挺进师对长征的战略策应》，《福建党史月刊》2010年第12期；唐洪森：《论红军抗日先遣队与中央红军长征》，《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

④ 持该观点的代表性文献有王永春等：《对北上抗日先遣队作用的一点看法》，《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3期；徐旭阳：《新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2期。

（一）中日民族矛盾渐深，实现全民族抗战的需要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步伐，民族危机加剧，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抗日救亡的呼声高涨。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发表反日宣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和批评国民政府所推行的不抵抗政策；另一方面发动组织东北抗日义勇军和其他抗日反蒋行动。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华进一步渗透，中共又相继发表了有关共同抗战的文件。不难发现，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大肆侵略，促使革命形势也随之变化，中共革命重心由阶级斗争逐渐转向抗日战争，在对敌战略和策略上也进行了必要的调整。

中央组建抗日先遣队是中共所采取的战略和策略措施之一，是“抗日”思维的自然延续，也可以说是中国革命走向抗日战争兴起这一历史潮流的必然产物[①]。抗日先遣队的任务是“向闽、浙、赣、皖等省出动，宣传我党抗日主张，推动抗日运动的发展，并规定这次行动的最后到达地域为皖南”[②]。为了宣传抗日主张，中共发表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等文件。抗日先遣队在闽浙皖边区转战中也确实将宣传抗日主张作为重要任务，所到之处传播抗战思想。这为抗战时期中共在闽浙皖边区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奠定基础。

（二）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实现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需要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处于统治地位。蒋介石亲率百万兵力施行堡垒战术“围剿”中央苏区，中央在“左”倾影响下实行了消极防御的军事指导方针，最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1934 年夏，中央苏区缩小至三百余里，周围重兵压境并不断逼近中心区，军事形势十分危急。这便是中央组建抗日先遣队的背景。粟裕回忆道：“当时中央派出这支部队的更加直接的目的，是企图以这一行动威胁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吸引和调动一部分‘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即将实行的战略转移。”[③]从中央规定红七军团的任务和给抗日先遣队所下达的作战任务内容看，进攻的方向指向了以浙江为核心的区域。可见，尽管当时形势“虽已不利于出浙江”[④]，但中央决策层试想通过威胁敌人的核心区域来迫使“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回援的战略考虑。基于这样的考虑，抗日先遣队开始之初的主要任务是在闽浙皖边境地区连续转战，以吸引和牵制更多敌人，配合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形势变化及之后的中央红军战略转移。

（三）落实共产国际的指示，支持皖南革命斗争的需要

中共革命行动与共产国际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并受其领导。共产国际除派遣李德帮助革命外，还对革命行动提出了意见。1933 年 10 月间，共产国际发来指示“我们的行动不应该采取阵地战的方式，而应该在敌人的两翼采取运动战”[⑤]。1934

① 张敏卿：《重释“北上抗日先遣队”组建的原因》，《中州学刊》2007 年第 2 期。

② 中共福建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福建党史资料》（第一辑），1983 年 4 月版（内部印行），第 89 页。

③ 中共温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浙南革命斗争史资料》，1982 年 10 月（内部印行），第 3 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36 页。

⑤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9 页。

年2月，共产国际又来电强调“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的队伍在运动战中已经获得了许多伟大的胜利，但不能在强攻敌人的堡垒地带的作战中获得胜利”[①]。这就要求，红军必须改变作战方针，主要以兵团运动战的形式，穿插迂回，捕捉战机。毛泽东曾提出以向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作战的方式粉碎敌人对江西革命根据地的进攻并支持反蒋的福建革命政权，李德并无太多考虑，但当共产国际接二连三的指示和建议时，他却不能无动于衷了。

1934年，皖南、皖赣地区时逢大旱，局部区域秋收无望，农民生活异常艰苦，反封建剥削斗争日趋激烈。之前，由于皖赣两省中共地方组织工作出色，闽浙赣边苏区派出干部及武装游击队帮助该地区建立起游击根据地，使得皖南、皖赣边两块游击区相连。因此，该地区也成为中央和军委择定抗日先遣队第三步作战行动区域的立足点。7月，中共皖赣边分区委发动各县成立革命委员会，创立了涵盖彭泽等六县的新苏区，同时成立了皖赣分区苏维埃政府、军分区和独立师。皖赣独立师为配合群众暴动，连连出击祁门等地，拔除据点，打击地主武装，扩大苏区范围。皖南苏区，连同皖赣边苏区，成为日后迎接抗日先遣队的短暂落脚点，牵制了相当数量的“进剿”闽浙赣边苏区和“追剿”先遣队的敌军[②]。皖南数县暴动无疑为中国革命发展提供了机遇，而从他们暴动进行的情况看，也需要得到外部革命力量的支持。抗日先遣队的主要进攻方向浙西、皖南，反动统治势力强，群众基础差，部队得不到必要的休整，导致伤亡不断增加，战斗力不断削弱[③]。

二、抗日先遣队的革命活动（略）

三、抗日先遣队失败因由及历史鉴戒

（一）失败原因探析

1. 指导思想错误。一个深入敌人后方独立执行任务的军团，中央和中革军委除规定战略行动方向和基本任务外，理当给予较大的机动权。然而当时的中央和中革军委却严格控制抗日先遣队的一切行动，实行绝对集中的指挥，使其处于极其被动的境地。同时，思想工作做得不够，对当时出现的轻敌观念没有及时教育说服，导致谭家桥战役失败。而失败后，又没有及时分析原因，汲取经验教训，致使士气低落。

2. 军事行动目标不切实际。抗日先遣队的任务有：一是开辟新的苏区；二是迫使国民党进行战略与作战部署上的变更，以利中央红军主力活动[④]。但这两个任务均没有实现。如中央赋予红七军团的战略任务是希望他们“在浙皖边境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和苏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4页。
② 张敏卿：《重释“北上抗日先遣队”组建的原因》，《中州学刊》2007年第2期。
③ 浙江省遂昌县史志办公室：《红军挺进师与遂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303页。
④ 刘俊平：《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原因再探——以军事战略为视角》，《党史文苑》2013年第22期。

维埃运动;最高度地开展反日运动,促进敌人进行战略与作战部署上的变更”[①]。 从实际看,让一支 6000 余人的部队完成如此战略任务似不切实际。

3. 战略与战术部署失误。首先,抗日先遣队挺进皖浙赣地区的战略时机不对。其次,将红七军团和红十军合编为大军团的做法错误。两支部队作战特点有很大不同:红七军团长于打运动战、战斗力强,红十军长于打游击战、但野战经验不足。“编成一个军团,不编不跨,一编正规战打不成,游击战也打不成。经验还是要把正规军编成游击队。”[②]再次,战术指导上不灵活。抗日先遣队虽然高举抗日大旗,却不能实施灵活机动的战术,如鸦桥战役战术僵化,“先头部队只知从大路去冲村坊,不攻击敌高山上之连哨;后续部队攻该连哨又不坚决而溃退,致受敌从连哨上来截击。”[③]

4. 军团干部中的“左”倾宗派主义。如红七军团的军事指挥员,多是按照宗派主义干部政策配备起来的。组成红十军团时,领导干部的配备,仍然受着“左”倾宗派主义的影响。把军团长寻淮洲降职为师长并排斥在军政委员会之外, 这既是对寻淮洲个人实行宗派主义打击,更是无视红七军团从瑞金出动后转战数省以流血牺牲换取来的宝贵经验。新任军团长刘畴西在作战指挥上表现优柔寡断,缺乏在白区同敌人机动作战的经验[④]。

(二)红军挺进师对其历史鉴戒

第一,红军挺进师采取了灵活的战略转变。抗日先遣队的任务是保卫中央苏区和掩护中央主力红军的战略行动。这种任务在当时条件下不能完成,不能说主观不努力,而是缺乏客观基础。“以吸引蒋敌将其兵力从中央苏区调回一部到其后方去”“促使敌人进行战略与作战部署上的变更”[⑤],这种过高的要求不可能达到。更况且它由中央直接领导,均按“作战任务的训令”“政治训令”和当时的电令执行。红军挺进师的任务与抗日先遣队基本相同,但汲取了教训,迅速地实行由正规军向游击队、正规战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变,将受敌制约转变为牵敌在广大地区周旋,由被动挨打局面变为主动进攻态势,掌握了主动权。

第二,红军挺进师干部中有着良好的作风气派。抗日先遣队失败是指导思想错误和军团干部中的宗派主义。红军挺进师的广大指战员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良好的战斗作风,还有广大劳苦民众的支持。粟裕、刘英等正确的领导,果敢而明智的指挥,把握战略转变的才智,和广大将士忠于革命事业的雄心壮志。当时电台遗失,失去党中央和上级的领导,红军挺进师独立自主地进行游击战争,这使领导能灵活指挥,忽东忽西,避实就虚,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⑥]。

---

① 《粟裕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03—104 页。

② 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等:《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07 页。

③ 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等:《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31 页。

④ 陈学明等:《关于北上抗日先遣队“得”与“失”的思考》,《江西社会科学》2003 年第 11 期。

⑤ 中共中央书记处:《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659 页。

⑥ 毛飞云:《从挺进师入浙的成功看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的教训》,《纪念浙西南、浙南游击根据地创建 60 周年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档案出版社 1996 年版。

第三，红军挺进师汲取了孤军深入敌区腹地的经验教训。红军挺进师进入浙西南后，对各阶层采取不同的政策，以争取尽可能多的革命力量。(1)公开提出“打土豪，开仓济贫，帮助群众战胜夏荒”，深入发动群众开展斗争。(2)对“青帮”组织进行团结。(3)注重群众工作。(4)建立“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5)建立后方基地。红军挺进师有了牢固的后方基地、及时为部队进行“加油”和休整，部队能够放心地去前线作战，而不必担心供给等问题①。

总之，抗日先遣队虽遭失败，但仍有不可磨灭的光辉。抗日先遣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宣传了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揭露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共卖国行径。它血战东南半壁，威胁国民党南京政府之腹地，牵制了东南方敌人大量的兵力，掩护了中央红军的长征；在闽北、浙西、皖南留下了一批武装力量和一批得力的干部，在这批革命种子领导下开展的游击战争，创立的新的根据地，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②。

（选自《纪念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创建8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研究生）

① 孙瑛：《浅析红军挺进师与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成败的原因》，《纪念浙西南、浙南游击根据地创建60周年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年版。

② 《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稿》编写组：《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稿》，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8页。

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在土地革命战争史上的历史地位

刘明辉

1935年3月，粟裕、刘英率领由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先头突围部队为主组建的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开始了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的任务。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创建了浙西南革命根据地。浙西南革命根据地作为我党在浙江开辟的第一块最完整正规的农村革命根据地，而且是全国革命低潮时期中国农村为数很少的一块新建立的革命根据地，在土地革命战争史上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一、浙西南革命根据地是我党在浙江开辟的第一块最完整正规的革命根据地，为以后的浙江革命打下了基础。它扩张了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版图，成为中国革命在南方的一个战略支点

在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之前，浙江曾先后发动和领导了60余次农民武装斗争，遍及50余县，规模不可谓不宏大，声势不可谓不浩大，影响不可谓不广泛，但这些武装斗争均没有建立起一块完整正规的革命根据地。曾经在浙江斗争史上轰动一时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是当时正式编入中央军委序列的全国14支红军之一。它鼎盛时期拥有6000余人，足迹遍布浙江南部温州、台州、丽水、金华地区的20余县，经历大小一百余次的战斗，曾攻克丽水、平阳、缙云县城，轰动一时。但就是这支具有相当规模的红军部队，仅仅坚持了半年就失败了，其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不重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当然，也不能说浙江没有出现过农村革命根据地。1932年4月下旬，方志敏率领的红十军在开化县白沙关（现属德兴县）建立了一区苏维埃政府，这是浙江最早建立苏维埃的地方。但它仅局限在德兴交界的毗邻地区，后成为皖浙赣游击根据地的一部分。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填补了浙江没有完整正规革命根据地的空白，扩张了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版图。

那为什么选择在浙西南建立革命根据地呢？第一，有利的地理环境。浙西南位于闽浙赣三省交界处，境内崇山峻岭。红军挺进师可以利用敌人统治的间隙，开展游击战争和创建根据地。第二，浙西南地区具有较好的群众基础。红了浙江半边天的红十三军曾在浙西南战斗过，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扩大了我党和红军在浙西南人民中的影响力。最能说明浙西南具有较好

的群众基础的例子就是挺进师初进浙西南，就得到了当地主要由贫苦农民组成的“青帮”组织的热烈欢迎。第三，“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①]。红军挺进师虽然只有500余人。但这500余人的大部分是从中央苏区转战出来的，革命意志比较坚定，政治素质比较高，军事战斗力比较强。挺进师的师长粟裕和政治委员刘英长期跟随在毛泽东、朱德身边从事游击战争，并且在红军中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职务，因而他们具有丰富的游击战争经验和高超的指挥才能。1935年3月23日，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3月25日，挺进师在浙西南的龙泉县宝溪乡溪头村歼灭驻防的浙江保安队一个中队，取得了入浙首战胜利。4月28日，挺进师在浙西南的庆元县斋郎地区，击溃浙江、福建两省保安团队和地主武装大刀会共3000余人的进攻，杀伤俘500余人，取得了斋郎大捷。这两仗的胜利证明挺进师是一支数量不占优但战斗力不可小觑的劲旅。第四，“红色政权的长期存在并且发展……还须有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②]1935年3月，红军挺进师进入浙西南地区的时候，“浙江党的组织除浙东极少数的零星组织外，其他各地均没有党的组织”[③]。在浙西南地区，也只有一些由思想进步人士领导的农民武装。也就是说，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开辟缺乏白区党的支持。但挺进师非常注重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从而正确领导了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发展。1935年3月，挺进师建立了师政治委员会，由刘英、粟裕、黄富武、宗孟平、洪家云等9人组成，刘英为书记。师政治委员会是挺进师活动区域党政军的最高领导机关。随后又成立了中共浙西南特委，以宗孟平为特委书记。1935年7月，宗孟平牺牲后，由黄富武接任书记。中共浙西南特委下辖龙浦县委和松阳竹溪区委、玉岩区委、遂昌王村口区委、遂(昌)汤(溪)区委。1935年12月，黄富武牺牲，特委遭破坏。但在它存在的期间，还是在打土豪、分田地，建设根据地和反“清剿”斗争中起到了核心领导的作用，从党的领导方面保证了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发展。

有了以上四个方面的主客观条件，挺进师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就创建了以松阳玉岩、龙泉住溪、遂昌王村口为中心纵横百余公里的浙西南革命根据地。浙西南革命根据地是我党在浙江开辟的第一块最完整正规的革命根据地。它使红军挺进师有了休养生息的基地，有了比较扎实的群众基础，有了源源不断的兵源和给养补充，为浙南、浙东、宣遂汤等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创造了经验和条件。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点燃了浙江革命的星星之火，并最终成燎原之势。浙西南革命根据地也是在1935年全国革命低潮时期中国农村为数很少的一块新建立的革命根据地。当时，中央红军行进在生死未卜的长征路上，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的各游击区处在最艰苦的隐蔽斗争时期。但在浙江却创建了一块新的具有顽强生命力的革命根据地，它不但扩张了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版图，也给处于风雨如晦时期的中国革命以极大的鼓舞。

---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0页。
③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浙南游击区》，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133页。

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迅猛发展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极大恐慌。国民党《东南日报》惊呼:“浙江素称平安之区,自粟、刘窜浙后,匪化已波及全浙,以目下形势来论,浙江共匪不亚于四川、江西之匪,若当局未能迅速肃清,前途实堪可虑。”[①]因此,国民党当局调集32个团约七万兵力对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展开了疯狂的“清剿”。“清剿”从1935年9月持续到1936年6月,虽然期间浙西南革命根据地曾经暂时丧失,但这一地区的游击战争从未间断。这将近一年的坚持斗争“无疑在一定程度上策应了党中央和主力红军的战略行动,也在一定程度上配合和掩护了临近兄弟游击区的斗争”[②]。更重要的是,浙西南革命根据地这面红旗一直屹立不倒,成为后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中国革命在南方的一个战略支点。正如粟裕同志所说:浙西南、浙南这个战略支撑点是在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建立起来的,“在以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③]。

二、浙西南革命根据地注重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相结合,以具体生动的实践丰富和发展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基本内涵

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为中国共产党探索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这条道路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战略阵地。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在开辟的过程中,就主动把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相结合,以具体生动的实践丰富和发展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基本内涵。

红军挺进师一进入浙西南就兵分三路。第一纵队及师政治部全体工作人员,在黄富武的领导下,在龙泉、遂昌、松阳间开创革命根据地;第二纵队挺进到浦城、江山、衢州等县间游击,以打通与闽北、闽东的联系;第三纵队在粟裕、刘英的率领下挺进到杭江铁路沿线地区开展游击战,以威胁汤溪、龙游、金华、武义、丽水等县城,吸引国民党主力北调,掩护根据地建设。三路军队分工明确,互相配合。通过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打击敌人,将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相结合。在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基本上摧毁了国民党统治的基层政权,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和革命群众组织。在广大的游击区域,则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势力,配合了根据地的建设。

在武装斗争的有力配合之下,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在政权建设、经济建设、革命文化活动等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政权建设方面,各地普遍建立了共产党地方组织和区、乡、村苏维埃政权。在根据地中心区域建立了浙西南特委,下设龙浦县委和松阳竹溪区委、玉岩区委、遂昌王村口区委、遂(昌)汤(溪)区委。各地党组织的建立,保证了党对各地苏维埃政权的领导。1935年7月初,竹溪区苏维埃政府成立,潘昌利任主席,下辖黄南“乡苏”、五部“乡苏”。7月22日,松阳玉岩苏维埃

① 诸葛蓉:《浙西南游击区的建立和历史作用》,《中共党史资料》,2009年第4期,第189—192页。
② 《纪念浙西南、浙南游击根据地创建60周年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年版,第112页。
③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浙南游击区》,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168页。

政府宣告成立，陈凤生任主席，下辖高亭、小吉、斗潭、枫坪、安岱后等5个“乡苏”和26个“村苏”。8月初，遂昌王村口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洪家云任主席，下辖王村口、山枣坪、后塘、山前、对山、关塘、独口、凉岭下、葛程等9个“乡苏”和52个“村苏”。8月20日，龙泉住溪苏维埃政府成立，方志富任主席，下辖上田、大横坑、宝溪、竹垟、独源等5个“乡苏”和35个“村苏”。这些“区苏”“乡苏”“村苏”普遍由党组织负责人或委员担任主席，体现了党的领导，组织设置比较完备，人员构成比较广泛，保证了各级苏维埃工作的顺利开展。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在政权建设方面还有一个创举，那就是建立“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一是争取原来的乡镇长、保甲长、联保主任保持中立或为我们工作，二是派秘密党员和基本群众去充任国民党的乡镇长、保甲长、联保主任，三是对少数为虎作伥、作恶多端的保甲长给予惩办，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由于实行了这些政策，“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名义上为国民党做事，实际上为红军传递情报，掩护行动，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经济建设方面，一是进行土地革命，二是建立一些基本的军事工业。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建立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分田运动。各地普遍成立了分田委员会，进行“查田、插标、分青苗”运动。查田就是对根据地的人口和占有田地情况进行普查，并登记造册，然后确定分田的政策和方法。政策和方法主要包括：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贫农；地主、富农分差田，红军家属分好田；贫农以原有耕地为基础，依照抽肥补瘦、抽多补少的原则，由分田委员会集体评议调整[①]。土地分配以后，把写有户主姓名的竹签，插到田块里，以示确认。由于分田运动发生在八九月份，稻田还处在青苗期，所以俗称“分青苗”。分田运动的开展，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调动了农民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对于建设和保卫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浙西南在经济建设上的另一个举措是建立一些基本的军事工业。比如，建在后塘的军需物资供应站、军械修理所和伤病员疗养所；建在玉岩和枫坪间的浙西南军分区疗养所；建在浦城的缝纫厂。这些军事工业的建立，保证了战争物资的供应。

革命文化活动方面，红军挺进师通过口头宣传，书写墙头标语，张贴和散发布告、传单，演唱革命歌曲等形式教育人民、团结人民和瓦解敌人，有力地配合了武装斗争的开展。挺进师采取了群众大会、公审大会、座谈会、演讲等口头方式宣传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有文化的干部、战士每天还要书写几条墙头标语，如“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红军是为工农谋利益求解放的部队”“打倒土豪劣绅”“工农要有衣穿、有饭吃，只有实行土地革命”等等。这些标语通俗易懂，能反映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诉求，因而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挺进师初入浙西南时，为了争取当地群众的支持，还张贴和散发布告、传单以宣传红军的性质、任务，以威慑敌人的反动气焰。比如《红军挺进师告“青帮”弟兄书》《红军挺进师政治部布告》等。挺进师中的文艺战士还教大家演唱革命歌曲，《红军歌》《游击队歌》《红军纪律歌》《送郎参加红军歌》等至今仍

① 《纪念浙西南、浙南游击根据地创建60周年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年版，第137页。

在浙西南农村流传。这些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革命文化活动，在当时起到了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的作用，很好地宣传了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有效地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力，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有力地推动了革命根据地的各项建设。

注重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相结合是红军挺进师在开辟浙西南革命根据地上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在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践行和发展。

三、浙西南革命根据地为红军挺进师实现由正规军向游击队、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变提供了最初的实践基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游击战思想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把擅长游击战的部队集结在一起打运动战，导致运动战战斗力不够，游击战灵活性不够，最终遭到失败。粟裕、刘英在总结教训的基础上实现了红军挺进师由正规军向游击队、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变，最终成功开辟了浙西南、浙南革命根据地，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正如粟裕同志在1938年1月所总结的那样：“在那样残酷艰苦的环境中，我们胜利地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所以能够生存、坚持下来，因为具备如下条件……实行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①

实现由正规军向游击队的转变，这是一种组织形式的转变。为了实现这一组织变化，挺进师的领导进行了艰苦细致的工作。首先是对敌我双方的态势进行了分析和总结。毛泽东曾指出：“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②红军挺进师是在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严重受挫，没有后方根据地作为依托，没有白区党组织的有效配合，且只有区区500兵员，缺乏枪支弹药，又失去了与上级的联系的情况下进入浙西南的。浙江是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是江浙财阀的大本营，是蒋介石和一些国民党右派的家乡。经过国民党反动派的苦心经营，这里已是秘密警察和特务组织控制森严、反动势力异常强大的地区。在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又处于敌人核心地带，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如果还采取跟敌人拼消耗的运动战，无异于以卵击石。因此，由正规军转为游击队、由正规战转为游击战就成为挺进师求生存求发展的必须之举。挺进师在崇安县岚谷一带进行了专门整训，达成了进行战略转变的共识。其次，要想实现战略转变，必须提高挺进师指战员进行游击战的能力，也就是让挺进师指战员学会打游击，做群众工作。正如粟裕所言：“北渡龙泉河进入浙西南以后，我们的任务是要把武装斗争与根据地建设结合起来。我们运用了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方法，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打击敌人，要求每个干部、战士都要学会两套本领：打游击、做群众工作。”③在具体的方法上，采取循序渐进的办法，派小部队先独自出去活动三天，三天后会合再出去，增加到五天，以后再渐次地增加到七天、十天，半个月。时间一长，单独活

① 粟裕、孙克骥：《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3页。
③ 《纪念浙西南、浙南游击根据地创建60周年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年版，第80页。

动的能力就提高了，经验就丰富了，信心就增强了。后来，一个排长、一个班长都能带一支小部队分散活动和各自为战了。

实现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的转变，这是军事战略的转变。粟裕、刘英根据浙西南的地理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创造性地运用了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时期总结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创造了一整套游击战术。粟裕同志将这一整套游击战术总结为六条原则、五个要领。浙西南革命根据地丰富的斗争实践为这一整套游击战术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最初的实践基地。被称为是挺进师进入浙西南开辟根据地的关键性一仗的斋郎大捷，就采用了诱敌出洞的游击战术。是役，挺进师先扫清外围，再把驻防的保安团吸引出来，予以伏击，痛歼敌军。1935 年 5 月下旬，国民党浙江当局调集八九个团对浙西南进行“清剿”。挺进师即将主力分为南北两路，趁敌人尚在运动中，先一步跳出来，转入敌后，运用游击战先后歼灭敌人两个中队。此役的胜利，证明挺进师军事战略转变的初步成功。挺进师对毛泽东游击战十六字诀最大的创造性发挥是形成了“敌进我进”的军事方针。1935 年 9 月，国民党当局调集以十八军为主体的七万兵力对浙西南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挺进师原设想留第二、五纵队就地坚持斗争，其余主力迅速跳出敌人包围圈，挺进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但敌人却不为所动，除派出五个团的兵力追堵挺进师主力外，仍集中兵力摧残浙西南革命根据地。面对敌人的不受调动，挺进师决定，你要我的根据地，我就要你的后方。“立刻着手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除令北渡瓯江的第一纵队加紧向浙东地区发展外，重点放在开辟浙南地区游击根据地”①。这样就形成了“敌进我进”的军事方针。“敌进我进”是对毛泽东“敌进我退”的创造性发挥。“敌进我退”是以自己的后方为依托，充分利用后方根据地的人力、物力、地理等各种有利因素，在运动中寻找和创造战机，集中优势兵力，诱敌深入，各个击破。“敌进我进”是在自己无后方依托的情况下，转入敌人后方，利用敌人后方的各种有利因素，牵制和打击敌人，粉碎敌人的进攻，保存和发展自己。这个军事方针是符合当时敌我双方的基本态势的。国民党当局的这次“围剿”虽然造成了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暂时丧失，但这里的游击斗争从未停止过，为后来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恢复准备了条件。斋郎大捷，粉碎敌人的“进剿”，在敌人“围剿”中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创造了“敌进我进”的军事方针，并且开辟了浙南革命根据地，从而实现了挺进师军事战略的转变。在这其中，浙西南革命根据地为这种转变提供了实践基地。

浙西南革命根据地作为浙江省第一块最完整正规的革命根据地，扩张了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版图，丰富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基本内涵，丰富了毛泽东的游击战思想，为中国革命作出了贡献。

（选自《纪念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创建 80 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作者单位：湖北汽车工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① 《纪念浙西南、浙南游击根据地创建 60 周年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档案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16 页。

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宣传标语初探

占卫东　贺清峰

1935年3月23日，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500余名战士在政委刘英、师长粟裕的率领下，由福建浦城进入浙江江山，挺进浙江，开始了在浙江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红军挺进师先后开创了浙西南革命根据地、浙南革命根据地和浙东革命根据地，战斗足迹遍布浙江省30多个县域。80年的风风雨雨过去，在红军挺进师战斗过的地方，保存着一批挺进师宣传标语。在艰苦的游击战争中，红军挺进师能保存下来的第一手史料少之又少，保存至今的这些红军挺进师宣传标语就更显珍贵，它既是研究红军挺进师战斗足迹的宝贵史料，也是浙江省一道独特的红色文化景观，成为新时期继承和发扬红军挺进师不怕困难、勇于牺牲、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和光荣传统的有效载体。

一、红军挺进师禀承了红军一贯重视标语宣传的传统

红军在创建之初，就非常重视利用标语来进行宣传。1928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提出："共产党是要左手拿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①1929年12月，毛泽东在《红军宣传工作问题》一文中，更将宣传工作称为"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②。红四军在朱、毛的领导下，1929年就设立了专门负责宣传鼓动工作的部门，建立了宣传员制度，规定"军宣传鼓动部设宣传员15人，师宣传鼓动科设宣传员12名，团政治处设宣传员6名"③。陈毅在1929年《朱毛红军的历史与现状的报告》中对宣传员的工作作了生动的描写："红军现有一个宣传兵制度……两个人每人提一个石灰桶，大小毛笔各一支，凡军队经过的地方，墙壁上要统统写满红军标语……红军一到满街鲜红，等于过年。"④

1. 在宣传策略上，红军挺进师注重军事工作与宣传工作的紧密结合

刘英、粟裕及挺进师的一批红军战士都是在红军主力部队经历了多年战斗洗礼的老战士，具有极高的军事、政治素质，红军重视标语宣传的传统也自然而然地带到了红军挺进师。政委刘英和师长粟裕一文一武分工明确，又合作紧密。两人把红军挺进师分成"突击队"与"牵

①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81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6页。
③ 宗成康：《红军对敌宣传战及其启示》，《军事历史研究》2011年第1期，第139—144页。
④ 《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13页。

制队”,“突击队”由刘英率领,主要任务不是打仗,而是做群众的政治宣传工作;“牵制队”由粟裕负责,进行公开的武装斗争,主要任务是牵制、吸引、打击敌人[①]。

1935 年 7 月至 8 月间,挺进师开展了“八一大示威”军事行动,对国民党控制的城镇发动频繁袭击,缴获枪支,扩大队伍。在军事上给国民党保安团和反动地方武装以沉重打击的同时,进行了广泛的政治宣传,“印发 5 万份标语、传单散发到各地区去”[②]。军事行动与政治宣传密切配合,军事上的胜利使挺进师在浙江站住了脚,而政治上的成功使挺进师在浙江扎下了根。

2. 在标语宣传的组织上,红军挺进师既重视专门宣传员的作用,又广泛发动挺进师战士参与其中

红军挺进师设有专门负责标语宣传工作的宣传员,宣传员隶属于由政工人员组成的政治连[③]。曾担任过宣传员的红军挺进师老战士张金发回忆,当年在挺进师司令部当宣传员,其主要工作就是“贴海报”[④]。

红军挺进师在设立专门宣传员的同时,积极发动全体指战员参与标语宣传工作。红军挺进师要求所有指战员,外出行动时把标语宣传作为一项重要任务,要求“每人每天写 5 条标语”[⑤]。

如此大规模的标语宣传,可以想像当年在红军挺进师活动的地区,书写标语是怎么一个壮观的景象。红军挺进师战士进入一个村庄,就会寻找合适的地方开始书写标语,这时“大批群众自动围拢来看标语”[⑥],气氛活跃,场面热烈,富有鼓动性。武义县熟溪街道甘塔村至今还保存有 70 多条挺进师留下的宣传标语,是浙江省保留红军挺进师宣传标语最多的村庄。甘塔村一位当年 9 岁的孩子目睹了红军挺进师战士书写标语的场景,50 多年后,他这样回忆了当时的情景:红军挺进师战士“刨下锅底的烟灰作墨,扎竹壳代笔,到处书写宣传标语……写宣传标语的都是一些年轻红军。他们奋笔疾书,仅用半天时间,就在我村几幢较大的房子内外写满了宣传标语。有的写在泥墙上,有的写在板壁上,有的写在门框和屏风上”[⑦]。声势浩大的标语宣传,壮大了挺进师的声威,鼓舞了挺进师战士的士气,发动了当地的群众,沉重打击了反动势力的气焰。

3. 在宣传标语的内容上,统一筹划,并根据形势的发展及时调整

在武义县熟溪街道甘塔村、金华市婺城区沙畈乡银坑村和江山市敖村乡都保存有一条同样内容的红军挺进师宣传标语:“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同样内容的宣传标语,出现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笔迹书写,这种情况在红军挺进师标语宣传中经常出现。宣传标语内容的高

①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77—178 页。
② 刘英:《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浙东军事芜史》,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585 页。
③ 刘英:《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浙东军事芜史》,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583 页。
④ 张金发:《赤子情 报国心》,《浙江档案》2006 年第 8 期。
⑤ 刘英:《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浙东军事芜史》,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586 页。
⑥ 龙跃:《坚持浙南十四年》,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6 页。
⑦ 闻烈《红军挺进师两进甘塔村》,《武义文史资料》1989 年第 2 辑。

度统一，说明了标语内容是由红军挺进师指挥者精心设计，统一制定，再由各单位分别执行。宣传标语内容的统一筹划，确保了宣传标语的针对性及实效性。

在实际斗争中，红军挺进师根据形势的发展，及时调整标语的内容。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初期，宣传标语的主要内容为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性质、揭露国民党面目、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策反国民党士兵等方面，抓住国民党统治的弱点进行宣传，关注群众的生计问题，因而得到了群众的拥护，红军挺进师迅速在浙江立下足，扎下根。到了斗争的后期，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挺进师宣传标语的内容及时调整为以宣传抗日统一战线为主，又一次得到了各界群众的认同和支持。

综上所述，在标语宣传上，红军挺进师组织严密，策略灵活，注重实效，禀承了红军的一贯做法，表现出极高的军事、政治素质。

二、宣传标语记录下了红军挺进师在浙江的战斗历程

作为红军挺进师留下的第一手原始史料，红军挺进师宣传标语忠实地记录下了当年挺进师在浙江的战斗历程。

1. 红军挺进师入浙后第一次战略转变中的宣传标语特点

红军挺进师入浙以后，粟裕总结了抗日先遣队未能在浙江省立脚生根的原因，认为主要是由于当时没有分散打游击的认识和决心。因此，挺进师要想在浙江立脚生根，必须“自觉地把正规军变成游击队，不打正规战而打游击战，来一个决定性的转变”[①]。根据这思考，红军挺进师作了入浙后的第一次战略转变：从善于野战的红军正规主力部队变为灵活机动的游击队。这一转变使得挺进师活动区域大大扩大，宣传标语也随着挺进师的足迹，遍布浙江省的30多个县域。

红军挺进师初入浙江，语言不通，群众对红军不了解，“又被国民党广泛地无孔不入地宣传为杀人放火，奸淫掳掠，不要历史，不要文化，不要祖国，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不讲道理，共产共妻，人海战术，总之是一群青面獠牙、十恶不赦的人”[②]。起初群众对挺进师的到来非常害怕，挺进师一到，群众就纷纷躲进山里。为了让群众了解自己，挺进师书写了许多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性质、宗旨的标语。“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见于武义县甘塔村、婺城区银坑村、江山市敖村乡）、“红军是为工农谋利益的！”（见于江山市福石岭村）。类似内容的还有“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是帮助穷人谋利益的！”（见于武义县甘塔村）、“苏维埃政府是工农自己的政府！”（见于江山市洪公村）、“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见于松阳县大东坝村）。经过大力的宣传，群众开始发现，这是一支与以往旧军阀部队完全不同的新型军队，越来越多的群众不再相信国民党的宣传，开始转变了对红军挺进师的态度，不再害怕红军，进而主动地与

①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4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5页。

红军接触，为红军办事。

在对群众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性质的同时，红军挺进师还针对国民党的宣传，针锋相对地揭露国民党的反动面目："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首先要打倒出卖民族利益的国民党！""反对国民党抽丁拉夫！""打倒压迫工农的保甲制度！"（见于武义县甘塔村）、"白军是压迫农民的军队！"（见于婺城区银坑村）。挺进师还积极开展策反国民党士兵的宣传："白军士兵要想回家，只有缴枪给自己的工农红军！""欢迎白军士兵携枪来当红军！"（见于武义县甘塔村）。

在群众逐渐了解了红军挺进师性质，知道这是一支工农自己的武装之后，红军挺进师标语宣传的重点进入了动员和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阶段："土豪的谷子不要钱分发给贫苦工农！"（见于磐安县安文镇）、"工农群众想要有饭吃有衣穿，只有起来革命！"（见于云和县梅湾村）、"要有饭吃有衣穿，只有实行土地革命！"（见于武义县甘塔村）、"欢迎工农群众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见于婺城区银坑村）。

浙西南山区的农民生活本来极其困苦，挺进师进入浙江的前一年又值大旱，作物歉收，而开春后又发大水，春花被淹。到处是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灾民，以致于挺进师在行军过程中，"总有成百成千的群众跟在后面哀求：'红军先生，讨点稻子吃吃'"①。在反动统治阶级残酷剥削和敲诈勒索下，几无生路的农民，在挺进师开展土地革命的宣传下，纷纷起来打土豪，分田地，星星之火燃起冲天火焰。面对迅猛掀起的革命浪潮，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哀叹，素称平安之区的浙江，"匪化"已波及全浙，浙江之"匪"不亚于四川、江西之"匪"。

红军挺进师也形成了一个高效的斗争模式，每到一处就"发动群众，斗争土豪劣绅，书写标语，扩大宣传。然后留下二十多人就地开展游击活动"②。红军挺进师所到之处，当地的群众和挺进师融为一体，一块又一块根据地就这样创建、发展、壮大。红军挺进师在群众的支持下，深深地在浙江扎下了根，成为"南方革命的一个战略支点"。

要保卫土地革命的果实，保卫新创立的根据地，必须有一支强大的红军作后盾。为了扩大红军挺进师的力量，动员群众参加红军，又一批火热的战斗宣传标语出现："当红军最光荣！"（见于江山市福石岭村、武义县甘塔村、婺城区银坑村）、"农民组织赤色农会！"（见于武义县甘塔村）、"农民组织赤卫队！"（见于婺城区银坑村）。

在红军挺进师大力的宣传鼓动下，浙江各根据地党的组织和红军挺进师的力量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到1936年底，在进入浙江不到两年的时间内，红军挺进师从500余人发展到1500余人，还有数千人的地方游击队和群众武装，地方工作干部500余人，游击战争的范围遍及浙江的30多个县，以浙江当地3000余名中共党员为骨干，各根据地普遍建立了党、团基层组织和贫农会、工会、妇女会、少先队等各类群众组织，人数达到10万之众③。国民党浙江保安二团

① 龙跃：《坚持浙南十四年》，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页。
②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53页。
③ 中共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温州党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2004年版，第93页。

团长贺越芳在给红军挺进师的信里也不得不感叹:“你们以四五百之众，有赤化全浙之概，这种勇往直前的精神是值得我们称佩的。”①

2. 红军挺进师入浙后第二次战略转变中的宣传标语的特点

随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逐渐高涨，挺进师进行了在浙江的第二次战略转变：从国内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标语宣传也根据斗争的发展及时作了调整，“把‘穷人不打穷人’的口号改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把‘欢迎白军士兵杀死官长拖枪当红军’改为‘欢迎白军官兵枪口对外和红军共同抗日’等等”②。

在这些宣传标语中，尤为难得的是刘英同志亲手书写的一幅“我们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无论如何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可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标语。这条标语在平阳县凤卧镇凤林村得到了完好的保存。标语字体苍劲，语调铿锵有力，显示了中国人民必然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坚定决心和信心。江山市坛石镇上王村保存有“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仙居保存有“组织抗日义勇军！”等宣传抗日统一战线的标语。

1938 年 3 月间，东南分局组织部长曾山同志向红军挺进师传达上级的指示，由刘英同志主持浙江省的工作，带领部分武装人员和干部继续留在浙江坚持斗争；由粟裕带领“抗日游击总队”加入了新四军的战斗行列，整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三营。红军挺进师又开始了新的战斗。

三、结语

红军挺进师的宣传标语历经 80 年的风风雨雨保存至今，已成为研究挺进师历史的重要的史料依据，也是浙江省一道独特的红色文化景观，是新时期继承和发扬红军挺进师不怕困难、勇于牺牲、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和光荣传统的有效载体。

近年来，我们欣喜地看到，各地对挺进师宣传标语也进行了大力的保护和开发，在保护上，有的地方将宣传标语用玻璃框保护起来，有的地方每年对标语进行涂刷保养。在开发上，大部分遗址都被辟为红色旅游线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保存有红军挺进师标语的村庄的村民在谈到这些标语时，自豪感溢于言表，让人感动。但是红军挺进师宣传标语保护的总体形势并不乐观。一些珍贵的红军挺进师宣传标语随着城市的发展，而无法继续保存下去；乡村中写有红军挺进师宣传标语的老房子也面临着年久失修、墙体剥落等保护难题；一些不适当的保护措施破坏了标语的原来面貌。如何保护好这些宝贵的红色资源，使红军挺进师的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需要社会各方面共同关注和努力。

（选自纪念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创建 80 周年学术研讨会，作者单位：中共衢州市委党校、衢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① 刘英：《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浙东军事芜史》，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586 页。

②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76 页。

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及其作用（节录）

陈晓楚

一、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建立的必然性（略）

二、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略）

三、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作用

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创建于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中国革命处于最低潮时候，南方游击战争处于最艰苦、最困难斗争阶段，是中央红军在浙江开创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它燃起了浙江革命烽火，奠定了浙江革命之基。从此浙江党组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再也没有歇止。它成了中国南方革命的战略支点之一，在中国革命，特别是在浙江革命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人们称其为“浙江的井冈山”。在以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一）重新燃起了浙江革命烽火，奠定了浙江革命之基。

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时，浙江早期的党组织和革命力量已经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是中央红军首先在浙西南重新点燃革命烈火，然后再分兵去开辟浙东、浙南。有了浙西南，才有以后的浙东、浙南。从此浙江党组织从小到大，不断发展，再也没有歇止，直到今天。它在浙江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浙西南革命根据地是中央红军在浙江开创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是浙江革命星火之源。

（二）浙西南的斗争配合了闽浙赣各地老苏区的斗争。

首先是浙西南的斗争得到闽北老苏区的策应、闽东老苏区的呼应和合作，他们帮助了浙西南。同时，浙西南也帮助了闽东、闽北。浙西南与闽北、浙西南与闽东，都召开过党的联席会议，共同商讨研究如何互相配合共同斗争问题。在干部、人员和武器装备等方面都有交流。红军挺进师第四纵队奉师政委会决定一直在闽浙边活动，负责与闽北党和红军联系。正如刘英所说：“浙西南斗争极为重要……尤其是挺进师到达浙江以来，不仅牵制了进攻闽北、闽东之敌，而且对于闽浙赣皖四省边区斗争的开展也有极重要的意义。”

留在长江以南坚持斗争的各游击区共有十几块，除浙西南是新开辟的之外，其他都是老苏区。这些老苏区里的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正处于最艰苦、最困难隐蔽斗争时期。如果将此时

的浙西南放在全国革命形势图上看，低潮的全国形势中，在浙西南却出现了“分田分地真忙”和“父送子、妻送郎参加红军”的热烈革命场面。这对于低潮中的党、红军和革命人民群众，是个极大的鼓舞，对于骄横的敌人是个沉重的打击。国民党《东南日报》惊呼：“浙江素称平安之区，自粟、刘窜浙后，匪化已波及全浙，以目下形势而论，浙江共匪不亚于四川、江西之匪，若当局未能迅速肃清，前途实堪可虑。”闽赣浙皖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十八军军长罗卓英在1935年9月24日丽水会议上说：“当时刘英、粟裕等敌有数百人，现在统计数达三千以上，据调查所得，四分之三是浙江工农阶级被其诱惑，滋扰二十余县，其进展速度，比江西还要厉害……”由此可见，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及其斗争，在中共党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三）从战略上策应了中央主力红军长征。

1935年七八月间，蒋介石鉴于地方保安团对付不了红军挺进师，决定调动主力部队“围剿”浙西南。国民党军委会先后任命卫立煌、罗卓英为闽赣浙皖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正副总指挥。这个总指挥部原先设在江西上饶，着重对付抗日先遣队，以后移驻福建南平，重点对付闽赣边境，7月下旬移驻浦城，9月中旬移驻浙江江山。该总指挥部制定的“第一期清剿计划”确定“以各边区大部对粟、刘”，并委托第十八军军长罗卓英统一指挥。敌人集中了32个团共六七万人的兵力，连同地主武装号称40个团，妄图围歼在浙西南的红军挺进师和地方游击队，彻底摧毁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国民党十八军是陈诚起家的老本，以后被称为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其师、团长中如黄维、霍揆彰、李树森、宋瑞珂、胡琏、阙汉骞、高魁元等，后来都是国民党军中的著名人物，由此可见蒋介石对此次“围剿”之用心。1936年12月，国民党又集中43个团10万人的兵力，由闽赣浙皖四省边区主任刘建绪主持“剿共”。这次“围剿”，浙西南又是敌人进攻的重要目标。因此，浙西南的斗争，牵制了国民党相当数量的兵力，一定程度上牵制进攻闽北、闽东红军的敌人，在战略上策应了中央主力红军的长征。

（四）在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继续成为中国革命在南方的战略支点。

1935年9月，以国民党十八军为主体的国民党军7万重兵血洗浙西南，大部分红军挺进师指战员和浙西南子弟兵牺牲在这片红土地上，革命根据地大部丧失。但是，斗争并没有停止，红旗仍然竖立。幸存下来的红军挺进师指战员一部分继续坚持在龙泉、浦城、江山、遂昌边境老地区打游击，一部分坚持在遂昌、宣平、汤溪边境老地区打游击。这时的浙西南革命根据地成为新的意义上的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师长粟裕率部四次重返浙西南，最后就在遂昌、宣平、汤溪游击根据地坚持斗争。红军在浙西南经过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坚持到抗日战争爆发。

国共和谈后，粟裕率红军挺进师主力编入新四军北上抗日。刘英留在浙江主持党的工作。跟随刘英留在浙江坚持斗争的还有五六十位红军挺进师干部。他们分别担任浙西南、浙南、浙东各个特委的负责人和骨干。1942年2月，刘英不幸被捕，5月牺牲，从此浙江没有省委。但

是，跟随刘英留下来的老红军继续担任浙西南、浙南、浙东特委的主要负责人和骨干，一直坚持斗争到浙江解放。这批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开创者，不管是以后仍留在浙西南的，还是到浙南、浙东去的，他们都成为浙江革命的中坚力量，都是各个地区的领导人。浙西南的斗争，不仅为以后浙江革命留下干部，而且通过这批老红军，将他们的领导艺术、指挥才能，尤其是对革命必胜的信念和坚强的革命意志、革命精神，传承给后来培养成长起来的地方干部。红军挺进师为人民群众谋利益而英勇斗争的光辉事迹、严明的组织纪律，都长远地深刻地影响着后来浙江的革命。解放战争时期，浙西南、浙南、浙东共同成为浙江游击根据地。浙西南自 1935 年开辟为根据地，一直到解放红旗不倒，继续成为中国革命在南方的一个战略支点，对中国革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选自《纪念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创建 80 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作者单位：中共永嘉县委党史研究室）

浅析红军挺进师的精神特质（节录）

——以红军挺进师在江山的活动为例

杨良英

一、坚定信念是红军挺进师精神的灵魂

理想是指路明灯，没有理想，就没有坚定的方向；没有方向，就失去前进的力量。理想信念是思想和行动的“总开关”“总闸门”。 坚定的理想、执着的信念，是早期共产主义先进分子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源泉，是红军挺进师坚持斗争、夺取胜利的精神支柱，是红军挺进师精神的灵魂所在。

红军挺进师二纵队进入江山后，主要活动在廿七都山区，原为双溪口、周村、定村、大峦口四个乡辖区，方圆数百里，山高林茂，溪涧纵横，关隘险要，条件恶劣、缺衣少粮。据民国档案1935年江山县长周心万向驻赣第八绥靖区司令官赵观涛报告称：“以县属念七都逼近浦城，且以该都全境，崇山峻岭，纵横六七十里……闽浙原有之通衢在焉，山路崎岖，两人即难并行，山谷之间，两旁高山，壁立千仞，兼之林深菁密，千百人伏匿其间，不易发现，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入之概。”另据档案记载：“江邑失业人民急应救济，吾江地瘠民贫，俗尚强悍，为多盗之区，号称难治，近因时势变迁，船户、肩夫、糟工大都失业，合而计之，数不下三万余人，以一户三口计，其嗷嗷待哺者，已在十万以上，又值旱魃为变，秋收无望，饥寒难忍……”由此可见，红军挺进师面临着极其恶劣的自然、社会环境。

同时，江山国民党反动势力异常强大，红军挺进师挺进江山后，又时常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1935年9月和1937年2月，国民党正规部队、南京税警团、浙江保安团等向红军发起疯狂“围剿”，并将廿七都山区列为“围剿”的重点之一，县长周心万亲自坐镇指挥，还实行“移民并村”“通匪、窝匪、资匪者格杀无赦”等政策，企图切断红军挺进师与群众的联系。

面对如此严峻的斗争环境，要是没有异常坚定的理想信念，就难以在这种恶劣环境下坚持战斗。正是靠着这一坚定理想和信念的支撑，前进的道路被敌人封锁了，就在崇山峻岭、深山峡谷中辟路前行；部队被敌人打散了，就用坚韧的意志重新组织；与上级失去联系了，就独立自主，自强不息；子弹打光了，就想尽办法筹集。为了实现伟大的理想，无数先烈战死沙场。粟裕在回忆三年游击战争中写道：“三年游击战争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但不管形势怎样险恶，鼓舞我

们的强大精神力量始终是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革命事业的坚强信念，相信我们的革命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总是要胜利的，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信念，推动着我们从失败和挫折中接受教训，推动着我们在新的斗争中逐步走向成熟，走向新的发展。”[①]也正是由于受到这种坚定理想信念的鼓舞，许多群众成了红军的坚强后盾，甚至加入了红军队伍。

二、艰苦奋斗是红军挺进师精神的基石

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是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为了人民的利益和革命的需要，勇于吃大苦、耐大劳，敢于啃硬骨头，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敢于胜利，这是红军挺进师精神的大厦之基，也是革命取得最终胜利的有力支撑。

红军挺进师二纵队在江山的活动范围以海拔 1500 米的大龙岗为中心，其方圆几十公里均是深山老林，条件恶劣。同时，由于部队战斗频繁，子弹奇缺，给养困难，加上国民党在周村、东积设有军事据点，疯狂“围剿”游击区，严重威胁着红军的生存。对于横在挺进师面前的困难，粟裕回忆道：“在整个三年游击战争中，有时我们整日整夜都在跑路，中间还要打几仗，有时甚至几天几夜得不到休息，搞得精疲力竭……有了伤员更不好办，只好向死人‘借房子’，把棺材打开，把里面的尸骨搬出来，垫上干草，把伤员放进去，暂时隐蔽、养伤……总之，生活很艰苦。在那三年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里，部队大部分时间是露营，青天作帐，大地当床，很少脱过衣服睡觉，经常和衣而卧。”[②]

为了克服困难，挺进师想尽一切办法度过难关。为了解决粮食、弹药等问题，挺进师二纵队以及中共江浦县委充分发动党员、贫农团骨干收集、购买国民党军队“进剿”红军时丢弃的子弹、手榴弹补充弹药。另外，根据江山市档案馆发现的一张 1936 年 6 月 7 日的中国工农红军政治部布告：“地主富农兼反动保长吴某凭着封建势力剥削与压迫劳苦工农，根据苏维埃政府法令，将其全部财产没收外并令罚款大洋一百元，以作革命战争经费。”[③]可知红军对土豪采取罚款以解决困难。并通过群众教育，争取东家山保长廖积元，建立“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为红军输送物资。同时，为了躲过国民党军的“围剿”，红军挺进师二纵队采取游击战术，声东击西，化整为零，消磨敌人，掌握主动。正是有了不怕困难、艰苦奋斗的精神支撑，红军挺进师才能不断战胜困难、完成任务。

三、百折不挠是红军挺进师精神的核心

坚持伟大的事业需要始终不渝的精神。革命和建设没有现成路可走，没有现成模式可循，开辟新路就需要“敢为人先”的气魄和胆识，需要勇往直前、百折不挠的勇气和毅力。面对困

① 《粟裕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56 页。
② 《粟裕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49 页。
③ 徐青：《江山发现 1936 年红军布告》，《衢州日报》2013 年 3 月 25 日第 2 版。

难，红军从不低头，勇于抗争，表现出万众一心、坚不可摧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是红军挺进师精神的核心内容。

在江山活动的挺进师二纵队绝大多数人，是原来抗日先遣队北上时留在江山的洪家云所部，他们自 1935 年 3 月至 1937 年上半年开展长达三年的游击斗争。在敌人铜墙铁壁的堡垒中，挺进师二纵队主动出击，消灭国民党驻扎在塘源口的基干队与驻扎在周村独龙殿的“剿共”义勇军；打击塘源村一家作恶多端的土豪；奇袭白石乡公所和仙霞乡（今保安乡）公所，烧毁田量册、户口册、壮丁册；在师直属队、三纵队暨闽北红军支持配合下，攻打长台区公所，擒获自卫队长。面对敌人的“围剿”，红军克服种种困难，先后在华竹坑、徐复年、大岭岗、上塔心、洪岩顶等地展开反“围剿”战斗，击退了驻定村的国民党税警团二连和地方联甲兵、义勇队的多次进攻，保存了有生力量。并分别在塘源口、塘源村、周村、保安、长台召开群众大会，向群众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书写“红军是贫苦人民自己的队伍”“红军是为工农谋利益的”等标语，号召群众团结起来，打倒土豪劣绅，取消保甲制度，实行减租减息。并将缴获的粮食、布匹、红糖等物资分发给穷人，激发军民的斗志。虽历经曲折而不畏艰险，屡受考验而不变初衷，靠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和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在敌我对比众寡悬殊的极端残酷的形势下，红军挺进师于 1935 年 5 月至 9 月中旬，在江山、浦城、龙泉、遂昌、松阳五县之间建立浙江第一块游击根据地——浙西南游击根据地。1936 年 9 月，又成立中共江（山）浦（城）县委，并建立下属党组织和群众组织，为支援红军、创建巩固游击根据地发挥了积极作用。

为了革命事业，一些干部群众坚持斗争到最后一息。如徐复年地下党员蔡全义、蔡土生父子被捕入狱，坚不吐实，被折磨致死。其他如洪家云、李重才、肖国标、黄富武等同志，不屈不挠，洒尽最后一滴血。

四、扎根群众是红军挺进师精神的根本

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同广大人民群众紧紧地站在一起，紧紧依靠群众，与群众血肉相连、同甘共苦是红军挺进师精神的本质特征。

红军挺进师纪律严明，关心群众的疾苦，每到一处，向群众借的东西有借有还，买卖公平，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对带路、挑担的群众付给铜板作报酬，将没收土豪劣绅的不义之财分给贫苦农民，因而深得人心。1935 年三四月间，红军挺进师二纵队 50 余人在一次战斗中转移到东家山，当地农民徐顺昌和廖积基帮助红军抬一副担架，当天抬到东积，第二天抬到将军岩，第三天抬到遂昌县黄莲尾。告辞时，这位受伤的红军领导人把仅有的一条花麻毯赠给廖积基。这支红军第二次经过东家山时，又找到徐顺昌，补付了抬担架的 3 天工钱。如今，这条花麻毯保存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已成为红军在江山遵纪爱民的见证。

红军在江山活动，条件十分艰苦，他们总是扎根在群众之中，善做群众工作。1936 年秋，红军、江浦县委书记宣恩金等以收购茶叶、桐籽等山货为掩护，在徐复年、平福坑、洪岩顶、东

家山、内东坑等地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发动群众打击土豪劣绅，反对抽丁拉夫，反对苛捐杂税，取消保甲制度。开始时，有一部分民众思想有疑虑，见了红军就躲避。针对这一情况，红军总是深入群众，一家一户、逐个村庄地做群众工作，和人民群众建立密切联系。通过做群众工作，挺进师发动300多苦大仇深的农民在内东坑、徐复年、洪岩顶等10多个村建立贫农团，设立红军秘密联络点22处，有黄林兴等红军联络员32人，在大龙岗脚一带的密林中有贫农团成员秘密修筑的“红军棚”28个。县委先后在廿七都山区建立了洪岩顶、东家山、东积尾、黄排、周村、内东坑、龙井坑等7个党支部和3个党小组，发展党员63人[①]。这足以说明红军挺进师与群众的鱼水深情。

挺进师在江山活动期间，坚持群众路线，处处得到群众支援。每当敌人“围剿”的时候，人民群众就会挺身而出，保护红军的安全。1936年的一个晚上，80余名红军指战员驻扎在洪岩顶，突然从浦城方向来了500多名敌军，正一步步逼近洪岩顶，准备封山搜山，企图将红军一网打尽。周村外东坑的青年农民郑天有、郑天旺堂兄弟俩得知消息，心急如焚，便以松明作灯，连夜翻山越岭，抄小路赶到洪岩顶向红军报信。结果红军指战员安全转移了，敌人扑了个空。要是没有这些贫苦群众拼着性命支持、维护，红军就没有办法生存下去。

（选自《纪念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创建8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作者单位：江山市史志办公室）

① 中共江山市委史志办公室：《中共江山党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83页。

红军挺进师精神及其丰富内涵（节录）

吴利明

一、孤军深入、前仆后继的探索精神

先遣队在江西怀玉山失利后，方志敏、刘畴西和王如痴等领导人先后被捕牺牲，余部在粟裕、刘英的率领下组建成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继续完成先遣队未竟的革命事业，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一年半之久、前无支援后无依托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不断打击敌人，创建浙西南、浙南游击根据地，从战略上配合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

虽然当时浙江革命基础比较薄弱，社会环境十分险恶，但挺进师仍然坚决执行上级指示，孤军深入到浙江南部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浙江是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带，是蒋家王朝的发迹地，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浙江就占了蒋陈两家。蒋介石还在浙江培植了一大批党棍、官僚、特务和高级军官，对浙江这个地盘控制得很严，自上而下建立了国民党各级党部组织和庞大的特务机构，普遍建立了保甲制度。1931 年以后，浙江成了国民党军队进攻江西苏区的后方基地，反革命社会基础很深厚。挺进师虽然只有 500 余人挺进浙江，也像一把钢刀插入蒋介石集团的胸口，蒋介石怎么容得下这眼中钉、肉中刺？困难这么大，能否立足都成问题。但挺进师领导们清醒认识到，只要“认真吸取教训，实现从正规军向游击队、正规战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变，是完全可以在浙江立脚生根的”[①]。他们义无反顾，充满信心地挺进浙西南。

挺进师干部兼任了中共浙西南特委的 4 任书记，他们先后牺牲在浙西南的土地上。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共产党人为了实现革命理想，不顾牺牲个人生命，前仆后继，探索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1935 年 6 月，挺进师政委会决定成立中共浙西南特委，任命挺进师组织科长宗孟平为第一任特委书记，在开辟浙西南游击根据地过程中，牺牲于福建浦城县忠信乡横源坑，年仅 28 岁。宗孟平牺牲后，由挺进师政治部主任黄富武继任中共浙西南特委书记，在开展反“围剿”斗争中不幸被捕，在敌人威逼利诱面前坚贞不屈，后被杀害在丽水大水门外，年仅 27 岁。1936 年 6 月，挺进师主力返回浙西南并恢复了中共浙西南特委，挺进师政委会秘书许信焜出任第三任特委书记，后在龙泉锦溪乡龙殿坑不幸被流弹击中牺牲，年仅 23 岁。挺进师离开浙西南改编为新四军到达皖南后，留下来的挺进师干部张麒麟担任了中共浙西南特委第

① 浙江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红军挺进师与浙南游击区》，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6 页。

四任书记，他最后为革命牺牲在浙西南这片红土地上。

二、坚忍不拔、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纵观整个挺进师在开辟浙西南、浙南游击根据地的过程中，每一个阶段，每一项战斗任务的确定，每一场战斗胜利的取得，都无不体现出挺进师将士们不怕艰难困苦、浴血坚持、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

面对着敌人的围追堵截，挺进师全体将士以大无畏的革命意志和完成上级命令的使命感，坚忍不拔，克服困难，毅然决定向国民党的腹心地区的浙江进军，他们先后冲破了 5 道封锁线，来到浙南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他们绕过有“江浙咽喉”之称的军事重镇——江西上饶，穿越险峻的山岭，突然返回江西童山关，转胡山里，准备翻越灵山。灵山位于上饶北部，过灵山只有走乌鸦弄。乌鸦弄崎岖险峻，几乎无路可言，一边是望不到底的悬崖，另一边是直插云天的峭壁。他们在采药老人的引领下，最终翻过灵山。过了灵山，又是汹涌澎湃的信江……他们就这样突破了一道道封锁线，克服了重重困难，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开辟了浙西南游击根据地。

在敌人重兵“围剿”下，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大部丧失，挺进师主力重返浙西南，经过千难万险，重新恢复并扩大了革命根据地。突围出来的挺进师指战员，在第二纵队长李重才、政委洪家云、支队长余龙贵的率领下，重整旗鼓，打击国民党的反动政权，发动群众，使红军又有了立足之地，为恢复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积蓄了力量。他们吸取浙西南反“围剿”斗争的教训，对根据地工作策略作了调整，将革命武装力量分散到各个村庄，秘密发动群众，恢复基层党组织和游击队，镇压叛徒和反革命分子，收拢、联络失散的红军战士，又将方圆百余里的游击区连成一片，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得到恢复和扩大。

三、视死如归、勇于牺牲的奉献精神

在浙西南、浙南游击根据地，挺进师视死如归、勇于牺牲的奉献精神，既体现在红军指挥员的身上，还体现在普通的战士和群众身上。为了自己心中的理想，他们年纪轻轻就干大事，年纪轻轻就丢了性命。

在浙西南这片红色的土地上，有无数挺进师将士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在进入浙江关键一战的斋郎战斗中，能歌善舞的宣传科长王维信在江浙第二高峰的百山祖下永远闭上了眼睛，同时还有 20 多名战士牺牲。国民党军调集 40 个团 7 万兵力对浙西南游击根据地进行“清剿”，这是一场残酷无比的大清洗。挺进师政治部主任黄富武毅然留下领导坚持反“围剿”斗争，在遂昌淤头乡受伤被捕，面对敌人的劝降，大义凛然，坚贞不屈，最后在丽水大水门外被杀害。第三纵队长刘汉南为了掩护挺进师南撤，在龙泉永和桥头不远处中弹牺牲，他是挺进师失去的第一位纵队长，预示着挺进师进入最为艰难时期。挺进师第三纵队政委方志富作战勇敢，

群众工作深入，在战斗中失去一条胳膊，后来在龙泉住龙茶园坑被围，不幸中弹牺牲，年仅 25 岁。第二纵队政委洪家云，在断粮的情况下，坚持斗争，在突围中倒在血泊中，年仅 27 岁。挺进师第五纵队长刘文生、政委柯勤发、政治特派员欧阳道，浙西南军分区参谋长李树正、供给部长张昌炳，挺进师政委会秘书许信焜和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杨干凡等，大部分挺进师纵队以上领导都在浙西南这片土地上先后牺牲。粟裕“为自己的战士吃尽人间苦难而心疼，又为他们终于坚持下来而骄傲”①。

在浙西南、浙南开展的两次反“围剿”斗争中，广大游击队员和革命群众与挺进师指战员一样，为了保卫革命果实，同样也表现出了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据不完全统计，在浙西南第一次反“围剿”斗争中，红军、游击队和革命群众被捕 820 余人，牺牲 370 余人②。松阳县的卢子敬、陈凤生、陈丹山 3 名“青帮”首领，在挺进师的影响下先后加入共产党、参加红军，他们最后为浙西南的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平阳县五凤乡的游击队长潘世雅和他的地下交通员妻子王玉英不幸被捕，潘世雅临危不惧，被活活烧死，王玉英毅然用剪刀剪断自己的舌头，使敌人无法从她的口中得到任何机密。泰顺县双溪口村党支部书记黄明星和他的妻子卢桂莲，动员群众，将几十名红军伤员分散隐蔽治疗，不久他俩先后被捕，敌人严刑拷打，夫妻俩守口如瓶，没露半点破绽，后来这批红军伤员全部养好伤安全归队。

四、互帮互助、共克时艰的团结精神

作为中央红军的挺进师在浙西南、浙南游击根据地创建过程中，离不开革命群众和地方红军的互帮互助。挺进师团结了各方力量共同革命，迅速在浙西南、浙南站稳了脚跟。

挺进师与广大群众打成一片，结成深厚的军民鱼水情。挺进师于 1935 年 5 月进入松阳、遂昌、龙泉地区时，镇压了当地为非作歹、欺压百姓的反动势力，还捣毁了反动的玉岩警察局，得到了当地“青帮”首领陈凤生、卢子敬、陈丹山领导的农民武装的欢迎和支持。“青红一句话，永远不分家”，红军与“青帮”群众结下了生死之情。“青帮”群众也帮助挺进师解决了人生地疏、语言不通的困难，主动帮助部队筹粮，发动群众组建游击队，为红军送信带路，创办红军医院、救治伤员，甚至写标语、发传单，使挺进师有了初步的依托，很快打开了局面，为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基础。

挺进师还重视与友邻游击区的互帮互助，支持配合。1935 年 9 月，挺进师主力冲破敌人包围圈，与中共闽东特委和红军会师，成立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和省军区，统一领导闽东和浙江两方面的共产党组织和红军，双方互相支持、帮助、配合。闽东特委把鼎泰区划作临时省委直属区，并在挺进师驻地成立泰平区。挺进师与闽东方面商定，挺进师加上闽东一个纵队，编为闽浙独立第一师，闽东独立师改称闽浙独立第二师。两地紧密配合，相互策应，协同作战，共

① 廖信春：《星汉灿烂——北上抗日先遣队和南方红军游击区战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81 页。

② 吴利明：《挺进师》，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51 页。

同反击国民党军的“清剿”。“闽浙临时省委成立后开始一段时间里，闽东和浙南双方不但关系很好，而且很密切。挺进师还抽调了一些干部（军事干部和做肃反工作的保卫局干部）帮助闽东地区和闽东独立师工作。”

挺进师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征服了一切险恶的环境；铁一般的意志，冲破了任何的艰难。挺进师精神给我们一种深刻的启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支军队，只要有一种坚定的精神信仰，就能够成就事业，创造辉煌。

“物质不灭，宇宙不灭，唯一与苍穹比阔的是精神。”挺进师精神是浙西南人民的优良传统和宝贵财富。挺进师挺进浙西南虽然过去 80 多年了，但是不朽的挺进师精神仍然是建设“秀山丽水、养生福地”的重要精神力量。

（选自《纪念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创建 80 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作者单位：丽水市档案局）

项英为浙西南游击区的开辟和浙江革命基业的重建作出了贡献

诸葛蓉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的浙江西南部游击区（简称浙西南游击区），是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简称挺进师）开辟的，而挺进师之所以会到浙西南开辟游击区，是因为奉了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和以项英为司令员兼政委的中央军区之命。水有源，树有根，以后浙西南游击区的开辟和浙江革命基业的重建，源头、根源在于项英的决策。今天，我们在纪念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创建80周年的时候，不能忘记项英对浙西南游击区的开辟、对浙江革命基业的重建作出的贡献。

1934年6月，中共中央、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决定红七军团部和所属的第十九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简称先遣队），对内保留军团建制，向闽浙皖赣诸省国民党统治地区进军，最终到皖南，发展皖南地区革命局面。11月4日，处于长征途中的中革军委命令红七军团与闽浙赣苏区的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对外仍称先遣队，下辖的红十九师任务是出击浙皖赣边，创建新苏区；红二十师仍留在闽浙赣边界，保卫老苏区。电令还指出："军区及新组成的十军团统受中央军区项司令指挥，省委亦受中央分局领导。"[①]11月5日，红十军团军团长刘畴西、红十九师政委聂洪钧，向中革军委负责人朱德、周恩来和中央军区司令员项英致电，报告敌情严重的形势，提出"如北线敌人仍是缓步筑垒前进，则七军团向南或向东北突破，转闽、浙边地区扩大游击战争以创新苏区"[②]的建议。11月7日，项英致电朱德、周恩来，报告敌已大部完成铅山、玉山、常山、开化、婺源、祁门、屯溪间封锁线，尾随之敌也已集中在婺源、德兴、浮梁间，请示十九师今后行动，提出"如仍回到浙皖赣边，在目前我们感觉不利。同时他们（指十九师）提议，十九师拟穿过常（山）开（化）封锁线转向闽浙边发展。如此，则与军委前电指示相反，但可使敌人变更整个部署，便于活动与发展。此事关系总的方针，特此电询，请即电复"[③]。从这则电文可看出两个情况：一是"军委前电"显然是指示十九师去皖南活动；二是项英显然认为十九师的提议有理，虽与军委指示相反，但可使敌人

① 福建、浙江、安徽、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党史工委、党史征委会）：《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39页。
② 福建、浙江、安徽、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党史工委、党史征委会）：《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41页。
③ 福建、浙江、安徽、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党史工委、党史征委会）：《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43页。

变更整个部署，便于（十九师）活动与发展。因此项英要向中央请示。11 月 17 日，闽浙赣军区就十九师和红十军团拟突破封锁线、新创游击区域问题，致电请示朱德、周恩来、项英并博古，提出军区、省委和红十军撤离闽浙赣苏区、移到闽北的要求①。但是中革军委是否有电复，目前尚未发现有关电文。11 月 18 日，中央军区命令红十军团撤出闽浙赣苏区，全部出动到皖南打运动战，“坚决的争取运动战中消灭敌人，以创造皖浙边苏区”。电令宣布建立以方志敏为主席的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随军行动②。12 月 14 日，先遣队在皖南谭家桥战斗中失利，人员损失 300 余人，尤其是领导干部伤亡过多，部队士气低落。其后 20 余天，先遣队辗转迂回于皖浙赣三省边界，探寻部队发展方向，力求摆脱国民党重兵包围的被动局面。期间与敌四十九师、补充一旅、第二十一旅先后交战，“虽经过大小十余战，总是小战获胜，大战掩护退却，一路避战”③，部队陷于十分困难的境地。

在此期间，项英接连多次致电中革军委，均“无指示、无回电”④。在失去上级联系、无法请示汇报的情况下，项英根据敌情日益严重的形势，审时度势，于 1935 年 1 月上旬果断地电令先遣队放弃中央军区原先要求其“创造皖浙边苏区”的行动，“改向浙西南行动”。为了此事，1935 年 1 月 20 日，即电令后的十余天，项英再次给朱德、周恩来报告：“……敌人已四周逼近，故改令主力转移浙西南行动。”⑤方志敏在事后所著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中也回忆：“中央因我军在皖南行动的困难，来电要我们改向浙西南行动。我们就在 1935 年 1 月 10 日离开了皖南。”⑥

1 月 9 日，先遣队领导人在浙江省遂安县茶山村（现属淳安县）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如何执行中央军区电令。会议最后决定全军暂回赣东北苏区休整，再实施中央军区电令向浙西南行动。1 月 10 日，先遣队离开茶山，南下赣东北，结束了历时 50 天的皖南行动。可是，从 1 月 10 日起，在 7 天时间内，先遣队连续遭受国民党军 4 次阻击。1 月 18 日，在江西怀玉山地区陷入敌军重围。先遣队在经历英勇悲壮的怀玉山战斗后，于 1 月 29 日遭受最后失败，方志敏、刘畴西等领导人被俘，指战员大部分牺牲、被俘。

在此严峻形势下，项英坚定不移地坚持红军向浙西南开辟新苏区的决策。他以中央分局名义电令中共闽浙赣省委，以先遣队突围部队为基础，组建起 500 余人的挺进师，挺进浙江。中央分局赋予挺进师的任务是：“经过闽北到达浙江，长期行动，发动广泛的游击战争，扩大党与苏维埃的政治影响，发动群众斗争，直到分配土地，创立苏维埃新的根据地，以及建立党的组织，配合友军行动，调动和吸引起大批的敌人，保卫闽浙赣基本地区及邻近游击区域，并打通闽东、闽北的关系，取得工作上、行动上有力的配合，响应主力部队的行动，彻底粉碎敌人

① 福建、浙江、安徽、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党史工委、党史征委会）：《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44 页。
② 福建、浙江、安徽、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党史工委、党史征委会）：《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45 页。
③ 福建、浙江、安徽、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党史工委、党史征委会）：《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81 页。
④ 《江西党史资料》（二），第 114 页。
⑤ 福建、浙江、安徽、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党史工委、党史征委会）：《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46 页。
⑥ 福建、浙江、安徽、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党史工委、党史征委会）：《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82 页。

‘清剿’计划与五次‘围剿’。”[①]

1935年2月27日，红军挺进师在师长粟裕、政委刘英的率领下，继承先遣队遗志，由赣东北向浙西南进军。红军挺进师建立了以刘英为书记的师政治委员会，为挺进师活动区域里的最高党政军领导机关。全体指战员在浙西南人民群众支持下，在浙江这个蒋介石老家、国民党反动统治势力比较强的地区，开辟了以松阳、龙泉、遂昌和江山、浦城部分地区为中心区域的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在中心区域里，普遍建立了党组织、苏维埃政府和农会、工会、共青团、妇女会、儿童团等革命群众组织，建立了游击队（赤卫队），壮大了红军主力，开展了分田分地的土地革命，“也是全国革命低潮中一个局部的高潮”[②]。鉴于浙江保安部队已经难以对付红军挺进师，蒋介石派出嫡系部队、国民党军主力之一第十八军，连同其他部队共7万余人“清剿”浙西南。在此后的岁月里，红军挺进师除留下部队坚持浙西南游击区斗争外，又分兵开辟了浙东、浙南、浙东南数块游击区，游击区域包括浙赣铁路以南到闽浙边的广大地区，涉及二三十个县。蒋介石派国民党军刘建绪部第二次“清剿”浙西南、浙南，挺进师坚持反“清剿”斗争，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直至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红军挺进师刚进入浙江时，浙江地方党组织基本上已被破坏了。浙江党组织是挺进师到浙江后，又重新建立、发展起来的，直到今天，再也没有歇止。挺进师重燃了浙江革命烈火，重建了浙江革命基业。挺进师在艰难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中保存了有生力量。抗战爆发后，挺进师以民族大业为重，集结到皖南，北上抗日，成为新四军的一支劲旅。浙西南、浙南成为中国革命和中国抗日在南方的一个战略支点。项英于抗战爆发后不久担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他在听取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书记刘英的工作汇报后，代表东南分局对挺进师和浙西南党组织三年斗争作了总结，指出：挺进师和浙西南的党基本上坚决地执行了中央的政治路线，而且在战斗中工作中获得了不少的胜利和成绩[③]。

历史事实证明，在敌情日益严重、红军先遣队处于被四面包围的紧急危险之中，又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项英果断命令先遣队放弃皖南改向浙西南的决策是正确的。在先遣队失败、南方游击区革命处于最低潮的严峻形势下，项英仍然命令先遣队的突围部队继续挺进浙江，体现了项英在决策上的坚定性。如果没有项英的决策，那么先遣队仍在皖南，就不会有浙西南游击区的开辟，就不会有浙江革命基业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得到重建。因此可以作出这样的论断：浙西南游击区的开辟和浙江革命基业的重建，是挺进师忠实坚决地执行中央分局指示，在浙江人民支持下，共同努力奋斗的结果，其中包括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项英同志作出正确决策所起到的作用和贡献。

（选自纪念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创建80周年学术研讨会，作者系中共丽水市委党史研究室退休干部）

①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刘英纪念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266页。
② 《粟裕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120页。
③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刘英纪念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305页。

论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地位（节录）

潘洪峰　蓝财兴

一、对红军主力长征胜利起到策应作用，作出突出贡献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是中央最高决策层为了策应红军主力长征，在长征前派出的一支队伍。对北上抗日先遣队在策应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当中的作用，目前许多“党史书刊”和“讲义”上大都是这样评价的：“由于兵力过小，这支部队未能牵动‘围剿’中央根据地的敌人，反而以孤军深入敌后，陷入同十倍于己的敌人艰苦奋战的境地。1935 年 1 月，红十军团遭到严重损失。……红十军团余部在粟裕等领导下，转战闽浙赣边，坚持游击战争。”也就是说，这支队伍在策应中央红军主力长征中根本没起什么作用，或者说作用不大。

事实上是这样的吗？笔者经过研究，认为结果正好相反，北上抗日先遣队以及后来的红十军团和挺进师，对中央红军主力长征起到了很重要的策应作用，贡献突出。

（一）先期为长征的准备赢得了时间

1934 年 4 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7 月初蒋介石重新调整了“围剿”中央苏区的战略部署，总共纠集了 31 个师 50 万兵力，从北、南、东三个方向包围中央苏区，并曾立即下令各路军向中央苏区发动全面进攻。但是，我们仔细研究可以发现这样一个史实，从 7 月初到 8 月初这一个月的时间里，各路军并没有大规模地向中央苏区发起全面进攻，真正发动大规模进攻的是在 8 月份以后，例如：在北面，北路军第三路军大规模进攻造成我军伤亡 2300 余人的高虎脑、万年亭战役，是在 8 月 7 日和 8 月 14 日；第六路军占领我雄岭下的是在 9 月 11 日；第八纵队进犯我兴国的是在 8 月 8 日以后。在东面，东路军向长汀发动进攻的是在 8 月底。

为什么蒋介石在完成“围剿”新部署并下令发动全面进攻后，又没有立即实施？为什么全面进攻的命令被推迟了一个多月的时间？造成这种奇怪现象的原因是什么？难道是蒋介石准备得还不够充分吗？难道是蒋介石不急于想消灭红军吗？不是的，这与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出发有着必然的联系。

北上抗日先遣队在 7 月 6 日晚从中央苏区瑞金出发后，加上红九军团的掩护，队伍浩浩荡荡，一路攻打大田等城市到达闽中，突破敌人的层层包围，取得了不少胜利，这使得蒋介石大为惊疑。他弄不清这支红军部队是谁？有多少兵力？战略意图是什么？蒋介石的这种疑惑

在粟裕的《回忆北上抗日先遣队》一文中得到证实:“我们刚过闽江的时候,声势很大,敌人弄不清我们究竟有多大兵力”,“我军在闽中地区的突然出现,引起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很大震惊。”为此,蒋介石顾虑重重,不敢贸然行动:第一,如果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真的是红军主力或者说红军主力有向东边突围的意图,那么原来的战略部署已毫无意义。中央红军主力有没有向东边突围的可能呢?有的。1933 年 10 月 25 日,在参加“围剿”中央红军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和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公开宣布抗日反蒋后,“11 月,毛泽东曾向临时中央建议,以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第二,就算这支浩浩荡荡的部队不是红军主力,但它已经抄到国民党包围圈的后方,如果与中央苏区的红军来一个前后夹击,对国民党军的威胁也是很大的。如果红军的战略意图属于上述情况,蒋介石都必须改变原来的“围剿”部署。第三,如果红军的战略意图不是上述两种情况,而只是“声东击西”的一种牵制力量,那么改变原来的“围剿”部署,又将中了红军的“暗渡陈仓”计。这三种情况是蒋介石不得不考虑的。

国民党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是以“不变应万应”,既不改变原来的“围剿”部署,也不向中央苏区发动总攻,一切等弄清事情真相后再作决定。为此,蒋介石急忙派“‘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从漳州飞到福州‘视察’”,并从其它地方调来部队加强福州防卫,暂时对付这支红军队伍。“匆忙将部署在闽东宁德、福安、霞浦和泉州等地的第 87 师王敬久部集中到福州,并向闽江上游堵截我军。同时,又急调在湖北整训的第 49 师伍诚仁部由长江水路日夜兼程东进,经海运驰援福建。”蒋介石的这种顾虑在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写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得到证实:“实际上,国民党的情报工作已一败涂地。或许这是由于蒋本人不在南昌的缘故,或许是由于谨小慎微的冯•赛克特顾问担心共军埋伏而禁止军队穷追猛打。国民党军队先是筑好碉堡,然后才小心翼翼地慢步前进。”

那么,国民党是什么时候才弄清了这支红军的情况呢?粟裕说:“直到 8 月 7 日攻打福州,才暴露了我军只是一支不怎么大的牵制力量。”随后国民党向中央苏区发起了总攻。

为此,我们说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出动,虽然没有达到打乱国民党“围剿”中央苏区军事部署的目标,但为中央苏区赢得了“一个月战争中的相对和平时期”。这“一个月战争中的相对和平时期”有什么意义?它的意义重大,为中央苏区红军主力长征的准备工作营造了有利的工作环境。对于红军长征过去有一种说法:“红军长征是仓促的逃跑,毫无准备。”事实上这种说法不完全正确。历史需要沉淀,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长征问题研究进一步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红军长征是经过一定的准备的。伍修权当时担任李德的翻译,他认为:“大约在长征开始的前半年,就进行了各项准备工作。”他列举的主要准备工作有:一是苏区猛烈扩大红军;二是进行武器弹药等物资准备;三是军事上部署也作了准备。红军长征时兵力扩大到 8 万 6 千多人,《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说:“研究长征的专家胡华教授估计开始长征的部队大约有一半是新参军的。”陈云在 1935 年秋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中说:“当我与林何二医生于

八月间被派至军事工业局卫生所时，见兵工厂、被服厂等各有数千工人，日夜工作，状极忙碌。”在1936年写的《英勇的西征》中说：“在出发时期，采买了六十万石粮食。军装火药等等制造，增加了六倍至三十倍。”伍修权还进一步指出：“第七军团的行动是在红军大量征兵以补充缺员的时候用来转移国民党的视线的。”

为长征的准备工作赢得时间，同样是对红军主力长征的策应。

（二）后期牵制住了敌人的大量兵力

在先遣队阶段虽然没有实现牵制敌人兵力的目标，但在红十军团和挺进师阶段，应该说作用还是挺大的。

红十军团组成后，人数达到8000多人，声威大振。这时候，中央苏区红军主力长征已将近2个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前，原来“围剿”中央红军的国民党军队有50多万，而红军主力长征后进行“追剿”的国民党军兵力有多少呢？据胡耀邦的回忆，“大约有30多万。”也就是说还有20万的部队没有进行“追剿”，这20万部队为什么不追去？主要原因是有项英、陈毅留守部队和红十军团的存在。红十军团汤口会师后，蒋介石就令俞济时为总指挥，连夜部署10万部队进行对付红十军团，其中就有原来“围剿”中央苏区的南路军第七师。红十军团1935年1月怀玉山失败后，刘英、粟裕率先头部队800余人组成挺进师进入浙西南，1935年8月，蒋介石任命卫立煌和罗卓英为闽赣浙皖边区“剿匪”总指挥部的正副总指挥，集结7万多兵力对付挺进师，其中就有原来“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五大主力，北路军中的五纵队第十一师、十四师、六十七师、九十四师共4个师。

因此，我们说在红十军团阶段和挺进师阶段，他调动和牵制了原来“围剿”中央苏区的部队。而且这个调动和牵制非常重要，我们知道，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到1934年12月1日湘江战役后，已由原来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人。如果没有项英、陈毅留守部队和红十军团、挺进师，那么原来“围剿”中央苏区的50万部队就完全可能全部去“追剿”中央主力红军。

长征取得胜利的因素很多，其中有一种因素我们不能忽视，那就是国民党内部军阀之间的矛盾。比如，10月5日中共中央代表潘汉年、何长工与陈济棠的的代表在寻邬进行会谈，达成了秘密协议，使得中央红军主力进入陈济棠势力范围后，南路军基本上没有堵截，红军顺利通过了第二条防线。设想一下，如果不是红十军团及挺进师牵制住俞济时、罗卓英这些蒋介石的死党、精英，而让俞济时、罗卓英这些部队去“追剿”红军主力，那形势将会是怎么样？

这个假设的反问，充分证明红十军团、挺进师对策应红军主力长征的重要性。

二、对全国革命战略大局起到支点作用，作出重要贡献

（一）浙南在南方游击区中是旗帜

政治上的影响大。从政权建设上看：浙南游击区是14个游击区在正式转入游击战后，唯一建立过苏维埃政权并进行“分田运动”的游击区。1935年初，松阳、龙泉、遂昌一带建立了4

个区苏维埃政府、19 个乡苏维埃政府和 157 个村苏维埃政府，到处都是“分田分地真忙”、穷人翻身解放扬眉吐气的新景象，映得浙西南大地一片火红。国民党惊呼“松遂龙各县大半赤化”。从地理位置上看：因为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巢，所以这个地理位置就显得十分重要，挺进师在这里的活动也就显得了格外的耀眼，它的政治影响力也就格外的大。国民党报纸说“浙江素称平安之区，自粟、刘窜浙，匪化已波及全浙，以目下形势而论，浙江共匪不亚于江西……前途实堪可虑。”《中华民国大事记》在 1934 年 10 月 10 日至 1937 年 7 月 23 日这段时间中，提到浙南游击区的共有 5 次，是 14 个游击区中提到最多的地区，可见浙南游击区的影响之大。《南方三年游击战》一书评价说：“在国民党统治集团的背后插上了一把尖刀，犹如在国民党统治中枢的后院燃上一把火……致使南京统治集团深感不安。”而挺进师在浙江的活动，其重要意义还不仅仅限于此，它更大的意义在于：在中国革命陷入最低潮的时刻，“犹如在浙西南夜空中升起一颗启明星”，给了全国各地的红军战士及全国人民一个极大的鼓舞，坚定了全国人民革命必胜的信念。

根据地的规模大。从活动范围上看：“整个浙南游击区，包括浙赣路义乌—江山段和天台山以南的浙江南部之温州、台州、处州、金华、衢州等地区的 30 多个县，纵横 500 余公里。”相当于原来的中央瑞金苏区在广昌战役之前的面积大小，这在 14 个游击区中面积属于较大的游击区。从战役情况上看：各地转入游击战后，浙南游击区在 1935 年 9 月和 1936 年底，两次牵制敌人共 17 万部队，是牵制敌人部队最多的游击区之一。同时，三年中浙南游击区与国民党军队共发生大小战役数百次，也是与国民党交战次数较多的游击区之一。而且，浙南游击区歼敌成果也比较突出，庆元斋郎战斗毙敌 300 余人，俘敌近 200 人，这是 14 个游击区三年中取得的少有几次胜利之一，被军史上称为红军以少胜多的野战典范。

“两个大”充分说明，浙南游击区在南方 14 个游击区中地位突出，是旗帜。

（二）浙西南是浙南游击区的核心

从时间跨度上看，1935 年 2 月至 9 月这段时间内挺进师最主要是在浙西南地区活动，9 月后由于受到国民党军 7 万多兵力的“围剿”，挺进师主力暂时转移到温州。“1936 年初，闽浙边临时省委得知敌军有向两广行动之动向，于是决定由粟裕、许信焜、张文碧等率领挺进师全部，迅速回浙西南恢复该地区工作。挺进师主力返回后，在龙泉岙头山与坚持在原地的部队会合，并以许信焜为浙西南特委书记，重新开展浙西南根据地工作。‘两广事变’爆发后，乘浙西南敌人大部调走之机，挺进师广泛出击，游击区扩大到浙西南、浙东、浙东南三十多个县，浙西南根据地得到恢复和发展，挺进师扩大到 2000 余人，根据地党员发展到 4000 余人。”也就是说 1936 年初以后，浙西南又逐步成为了挺进师的主要活动地区。

而且挺进师的队伍壮大是在浙西南地区，主要战役发生在浙西南地区，建立苏维埃政权、进行“分田运动”的是在浙西南。

另外……1993 年……原挺进师干部龙跃给丽水地委写信说：“我曾与粟裕同志交换过意

见，都认为在丽水有建立挺进师纪念碑和红军挺进师纪念馆的必要……把馆、碑建在丽水比建在金华、温州更合适。”解放后，丽水成为了浙江省唯一的所有县（市、区）都是革命老根据地县的地级市。

可见，浙西南是浙南游击区的核心。

三、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起到丰富作用，作出积极贡献

（一）印证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正确性

粟裕、刘英刚参军时，都是跟随毛泽东、朱德作战，深得他们的师传。粟裕说：“我跟随朱德、毛泽东同志学习打仗，所得到的最深刻的体会，是战争有它自己的规律。克敌制胜的办法必须依据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和战争的内在规律去寻找。我学到的这条道理，使我终身受益。”

然而，七大以前，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曾多次受到严峻挑战。1935 年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在这以后毛泽东又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军事著作，系统地论述了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的理论和原则。1937 年的洛川会议，毛泽东领导制定了抗战的大政方针，确定了在抗日作战上实行游击战的战略思想，使党领导的抗日斗争获得了蓬勃发展。

但是，正在这时，王明又再次向毛泽东发起了挑战。1937 年 11 月底，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后，在 12 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洛川会议制定的正确路线公开持否定态度，他还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进一步在军事战略方针上提出错误路线，说在抗战中要“以运动战为主，配合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由于王明宣称他传达的是共产国际的指示，而共产国际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有很高的威望，加之当时对王明过去的“左倾”错误没有及时进行系统的清算，一时有许多人受到蒙蔽，不少人根据王明的观点进行了“自我批评”。1940 年王明还不经中央同意在延安印了第三版《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而斗争》。总之，王明回来后，完全反对毛泽东原来制定的正确路线，致使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变得十分微妙。毛泽东当时曾说：“我的命令出不了这个窑洞”，连《论持久战》在《新华日报》上都发表不了。党的七大为什么一再推迟不能召开？主要原因就是王明在作怪。对延安整风运动透过现象看本质，实际上是清算王明错误思想。

在这样关键性的时刻，刘英、粟裕给了毛泽东很大的支持。刘英在 1937 年 12 月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中央对目前政治形势的估计与分析以及对各边区党所批示，是非常正确的。”在王明 1937 年 12 月中央政治局上提出所谓的“运动战为主”，并完全否定原来洛川会议毛泽东制定的游击战正确路线后，1938 年 1 月，粟裕在山门抗日干部学校讲课，明确提出在抗日战争中要“以游击战作为我军作战的战略方针”。1939 年 3 月至 4 月间，周恩来到东南一线传达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3 月 17 日召见了刘英，刘英详细汇报了挺进师坚持浙南三年游击斗争的情况。1939 年 7 月，刘英在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闭幕词时强调："要把浙江的一切情形、经验和教训，完满地反映到全国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去……协助七大成功。"1940 年，刘英撰写了《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文章，全面总结了北上抗日先遣队和浙南三年游击斗争的经验教训。这些无疑都是对毛泽东的一个强有力支持，为毛泽东思想最终在"七大"上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作出了贡献。

这种贡献的份量，可以用毛泽东对刘英的感情来"称重"。1959 年毛泽东乘专列由庐山返京途经金华时，接见部分地、县委书记，他说："方岩山上有个胡公大帝，香火长盛不衰……他为人民办了很多好事，人民纪念他！""刘英为人民而牺牲，人民就会永远纪念他。"

（二）进一步发展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

粟裕和刘英，在浙南三年游击战争中，重视前人的经验，又不拘泥于前人的经验。他们以井冈山斗争时期游击战的十六字方针为基础，又不受十六字方针的限制，根据新的形势和情况，提出了许多新的游击战略战术。

浙南游击战刚结束，粟裕在平阳山门抗日救亡学校讲授游击战术时，把浙南三年游击战的实践经验总结上升为理论高度，提出了游击战要"通常采取与敌人完全相反的行动……如声东击西，避实击虚；不要企图太大，只要常有小胜；敌人多路进攻时，我应位于其翼侧、后方和包围圈外面，不要被他合击了"等 17 条战术原则，这对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一个极大的丰富。粟裕后来也成为了中国的战略家，人民日报 1949 年 9 月发表的《中国人民政协代表访问记——常胜将军粟裕》，里面说："粟裕将军百战百胜，是解放军最优秀的将领之一。"

（选自《纪念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创建 80 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作者单位：丽水职业技术学院、丽水市政协办公室）

浙西南革命根据地革命遗址保护利用研究（节录）

毛明库

一、红军挺进师创建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留下众多革命遗址

1935 年 3 月，由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突围部队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入浙开辟了以遂昌、龙泉、松阳等县为中心区，范围包括丽水全境的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中共浙西南特委和县乡村党组织、苏维埃政权，发动和领导浙西南人民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运动。全面抗战开始后，挺进师主力开赴抗日前线，而挺进师留下的党组织骨干人员继续领导浙西南人民开展革命斗争，直到全国解放。在浙西南革命根据地长期的革命斗争过程中，留下了众多革命遗址。新中国成立后，为纪念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创下的功绩，弘扬崇高革命斗争精神，丽水各县（市、区）相继建立了革命纪念设施。

虽经风雨沧桑，浙西南革命根据地许多革命遗址已经湮没于历史的长河中，但留存至今的革命遗址仍然数量众多、内涵丰富。据初步统计，现在丽水市各县（市、区）范围内与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相关的革命遗址共有 500 余处，其中尤以松阳、遂昌、龙泉三县（市）为最集中、最多。这些革命遗址主要分为机关旧址类、会议旧址类、战斗遗址类、红军标语类、纪念设施类等几个类型。机关旧址类是红军和党组织领导机关驻地、办公地旧址等，是红军和党组织领导机关工作、生活的场所，如丽水城区厦河村中共浙江省委机关旧址、龙泉市住龙镇住溪村龙浦县苏维埃政府旧址等。会议旧址类是红军挺进师政委会、中共浙西南特委等召开重要会议的场所旧址，如松阳县小吉村挺进师政委会会议旧址、龙泉市城北乡仓硐村红军挺进师政委会会议旧址、遂昌县门阵村国共合作抗日和平谈判旧址等。战斗遗址类是红军与国民党武装发生战斗的战场地，这类遗址多在野外，如庆元县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竹口战斗遗址、龙泉市的挺进师入浙第一仗溪头战斗遗址、庆元县的斋郎战斗遗址等。红军标语类是红军挺进师在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中留下的，这类革命遗址在龙泉、松阳、遂昌等县（市）境域内较多，如龙泉市龙南乡麻连岱村的红军标语、松阳县安民乡安岱后村的红军标语、遂昌县垵口乡小岩村的红军标语等。纪念设施类是为纪念浙西南革命斗争历史和革命烈士而兴建的，包括纪念馆、烈士陵园、纪念碑等，如丽水市的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龙泉市革命烈士陵园、遂昌县王村口的挺进师纪念馆等。

二、浙西南革命根据地革命遗址是丽水革命老区的宝贵财富

（一）不可复制、不可再生的珍贵历史文物

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留下的革命遗址是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形成的，凝聚了革命先辈在艰苦的革命斗争过程中形成的崇高革命精神与智慧力量，蕴含着丰富的革命历史文化，是革命先辈革命斗争历史的见证，是历史留存下来的不可复制、不可再生的珍贵历史遗产。这些革命遗址为研究地方党史（革命史）、编写党史书籍教材提供不可多得的实物样本，特别是遗址中的一些重要会议旧址、红军标语遗迹等，较真实、完整地展现了革命战争时期党组织和红军活动的原始面貌，尤为珍贵。

（二）革命老区群众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巩固发展过程中，根据地人民在党和红军的领导下，与敌人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斗争，为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根据地留下的这些革命遗址承载着革命先辈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坚强不屈的优秀品德和崇高精神。睹物思人，见景生情，革命老区人民对从革命战争年代留存下来的革命遗址充满着深厚的感情，这些凝结着革命先辈的优秀品德和崇高精神的一个个革命遗址影响教育着一代又一代的老区人民，是浙西南革命老区人民的精神寄托与精神动力，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不断激励着老区人民为追求美好新生活而努力奋斗。

（三）推进丽水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

浙西南革命根据地众多的革命遗址分布于丽水各县（市、区）的山山水水、角角落落，它们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党史教育、国防教育的重要载体，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立宣传教育舆论阵地、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场所。同时，这些革命遗址不但在思想道德、文化建设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在丽水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红色旅游促进经济发展等各方面，都能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

三、加强浙西南革命根据地革命遗址保护工作的措施对策

浙西南革命根据地革命遗址数量众多、分布零散，保护修复难度大。几年来，各级党委、政府加强了对革命遗址的保护工作，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革命遗址在数量增加和级别提高上都有较快进展，但相对于浙西南革命根据地众多革命遗址的保护现状来说，还很欠缺，许多革命遗址的保护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诸如一些遗址因为保护管理缺失已消失或面临消失，一些遗址因道路交通等问题而处于“失管”状态，一些遗址因各种因素受到不应有的破坏，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

（一）各司其职，协作合力，建立强有力的革命遗址保护工作网络

针对浙西南革命根据地革命遗址保护工作不容乐观的现状，各级党委、政府要引起高度

重视，各有关部门、革命老区乡镇（街道）要各司其职、相互协作、形成合力，建立强有力的革命遗址保护工作网络，形成较为完善有效的革命遗址保护机制。要做到规划先行，制定全面系统的革命遗址保护规划，对革命遗址保护工作实行全面、有效的管理。党史部门要持续深入地做好对革命遗址的调研工作，全面做好革命遗址的台账登记，将每个革命遗址的具体位置、形成时间、保存现状、利用价值等内容进行登记造册，对相关历史事实进行深入研究，形成档案材料，对每个革命遗址提出保护、修复的具体方案和建议，对在调研中新发现的革命遗址，要及时纳入保护管理范围。文物保护部门要将符合文物保护条件的革命遗址及时列入各级文保单位，做到“应保尽保”，并尽量提高保护级别，在文物保护经费上给予革命遗址重点支持。财政部门要给予革命遗址保护以资金支持，增加资金投入，确保革命遗址保护经费及时到位，有条件的地方要设立革命遗址保护专项经费。革命老区乡镇（街道）要将革命遗址保护工作列为党委、政府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对每个革命遗址落实管理责任人，及时巡查发现解决问题。农办、旅游、交通、民政等有关部门在建设项目安排上，要对革命老区乡镇（街道）给予政策倾斜，给革命遗址保护修复以有力支持。

（二）注重宣传，强化教育，切实提高公众对革命遗址的保护意识

由于浙西南革命根据地革命遗址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分布面广，做好革命遗址的保护工作难度较大。经调查发现，一些革命老区群众对革命遗址的相关知识欠缺，保护革命遗址意识不强，一些应该进行保护的革命遗址当地群众却不知情，有时存在无意或随意损毁的情况，一些革命遗址因缺乏保护措施而受到不应有的损害，一些革命遗址因未列入文物保护范围而被农户随意拆除或移作他用。切实提高公众对革命遗址的保护意识是当务之急，一是要加强舆论宣传，通过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等媒体广泛宣传保护革命遗址的重要意义，努力提高民众对革命遗址的自觉保护意识，使之深入人心，形成浓厚的社会舆论氛围；二是宣传、党史、民政、文物等有关部门和乡镇（街道）要定时组织人员进村入户开展多形式的宣传教育，使革命老区群众充分认识到保护革命遗址的重要性，自觉主动地支持和参与革命遗址的保护工作；三是对在革命遗址保护工作中涌现出来的先进人物、先进事迹进行宣传、表彰，对破坏损毁革命遗址的行为进行批评教育，对涉及违法犯罪的要依法进行坚决打击。要发挥老区促进会、红色文化研究会等群众团体的作用，发挥群众自发保护革命遗址的热情。

（三）创新思维，多管齐下，全方位多层次开展革命遗址保护工作

随着时代发展和新形势要求，对于浙西南革命根据地众多革命遗址的保护工作来说，需要解决许多新的课题，需要以新的思维方式，狠抓落实，全方位多层次地开展保护工作。一要正确处理好重点保护与全面保护的关系。在突出重点的同时，不能顾此失彼，以偏盖全，只顾重点，不及其余，一些未能列入各级文物保护范围的革命遗址也应采取保护措施，使之得到较好的保护。二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探索建立较为集中统一的管理方式、体制。针对革命遗址所有权、管理方式复杂的情况，建立协调组织机构，协调好各方面关系，形成合力，对所有革命

遗址进行筛选分类分等级，分轻重缓急进行保护修复，避免因多头管理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和损失。三要重视利用先进科技手段，破解革命遗址保护的技术难题。浙西南山区因处于特殊的地理、气候、生态环境，革命遗址保护面临许多技术难题。在革命遗址修复过程中，不能随意改变革命遗址的原貌，要精心设计，科学施工，不能造成修复性破坏。四要采用现代科技手段，加强历史资料的收集与保存。要充分采用文字记载、照片拍摄、视频录制、拓印、编写书籍画册等各种手段对革命遗址进行资料留存，如松阳县编写的《松阳革命遗址图鉴》、龙泉市编写的《红色丰碑——龙泉市革命遗址巡礼》，都取得较好的效果。

四、发挥浙西南革命根据地革命遗址作用的主要途径

（一）以重点革命遗址为依托建立宣传教育舆论阵地

革命遗址是建立宣传教育舆论阵地、弘扬革命优良传统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载体和场所。要以浙西南革命根据地众多革命遗址为依托，大力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党史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社会科学教育基地等基地建设。目前，在浙西南革命根据地革命遗址中建成的各种教育基地数量少、级别低，到目前为止，在浙西南革命根据地革命遗址中，还没有国家级的教育基地，省级教育基地也不足 10 个，市、县级的教育基地也不多。一是要大力加强各种教育基地建设，提升基地的品位。要深入挖掘各个革命遗址教育基地相关的史实和意义，整理完善相关史料，提高配套设施建设和管理服务水平。对于一些革命纪念馆，要改变陈旧落后的布展宣讲模式，配备多媒体声光电展示设备。二是要积极做好申报创建工作，大大增加各种革命遗址教育基地的数量并努力提升等级，提高革命遗址教育基地在各种教育基地中的所占比例，充分发挥革命遗址的教育功能。对遂昌县王村口红军挺进师纪念馆申报国家级国防教育基地的做法要进行学习推广。同时，也可以积极探索创建乡镇级和村级革命遗址教育基地的创建工作。

（二）在革命老区新农村建设中突出革命遗址的地位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和国民经济的稳步快速发展，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强势推进，全国各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出现如火如荼的喜人景象，地处浙西南山区的丽水革命老区亦然。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注重革命遗址作用的发挥，突出革命遗址的地位，是一项非常值得重视的工作。各级党委、政府要出台相关政策，对革命老区新农村革命遗址利用给予支持，各有关部门及革命老区乡镇（街道）要积极采取多项措施，形成合力，狠抓落实，充分利用革命遗址资源优势来助推新农村建设。要将革命遗址有机地融入革命老区新农村村庄整体规划布局之中，让革命遗址成为革命老区“美丽乡村”的有机组成部分，使新农村建设与革命遗址保护修复相互推进，取得双赢的效果。要利用革命遗址来推进新农村文化建设，将一些具备条件的革命遗址纳入村文化礼堂建设的内容、范围，在革命老区村建立革命纪念亭、烈士纪念亭、红军亭、革命纪念馆等，营造革命老区浓厚的宣传氛围，提升革命老区群众的自豪感，让革

命遗址成为革命老区群众的精神家园。同时，一些具备条件的处于村落中的革命遗址不仅要建成为革命老区思想道德教育、革命精神教育的阵地，还应成为革命老区村落里的文化活动中心、休闲区、风景区，使革命老区群众在休闲、娱乐中也能潜移默化地接受革命先辈崇高思想品德的熏陶。2013 年以来，龙泉市在发展乡村漫游过程中，将 18 处革命遗址确定为乡村漫游的重要景点，取得较好效果。

（三）充分利用革命遗址资源推进丽水红色旅游发展

发展红色旅游不仅可以推进旅游业经济的发展并带动其他产业经济发展，而且通过红色旅游这种潜移默化的精神熏陶作用，能增进人们爱党、爱国情感，促进和谐社会建设。革命遗址是发展红色旅游的主要依托，否则，红色旅游就成为“无米之炊”。近年来，丽水市各县（市、区）都有一批革命遗址得到修复，2011 年 4 月，国家发改委、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国家旅游局、文化部等部门联合发文，确定丽水市厦河省委机关旧址、龙泉市披云山苏维埃旧址、松阳县安岱后苏维埃旧址、遂昌县王村口苏维埃旧址等四处革命遗址列入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第二批名录，这为丽水市红色旅游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充分发挥革命遗址资源作用，推进丽水红色旅游发展正当其时，丽水的红色旅游发展正值“黄金时期”。为加快丽水红色旅游的发展，要充分利用好革命遗址资源，挖掘潜能，一是做好红色旅游线设计规划，将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重点革命遗址连点成线，特别是要突出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这条旅游线，将丽水市红色旅游纳入全国红色旅游线网络；二是继续提升革命遗址的品位，提炼史实资料，做精布展版面，提高讲解艺术，将更多的内容融入到革命遗址之中；三是打响丽水红色旅游品牌，密切结合丽水绿水青山的优势，将红色旅游与丽水的生态、山水、古村落、特色文化相结合，争取快速提高浙西南红色旅游线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选自《纪念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创建 80 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作者单位：中共龙泉市委党史研究室）

试论红军挺进师精神与遵义会议精神的天然联结

吴旭丽

在阅读中国革命历史的时候，我们同时带着地方史的角度去审视，无比欣喜地发现，在1935年1月的中国大地上,浙西南山区丽水和名闻全国的西南黔北重镇遵义一样，正生发、酝酿着中国革命蓬勃向上的生机，在这个狼烟四起而又群雄辈出的年代，这一缕生机无疑属于革命的曙光。这股生机就是影响全国革命的遵义会议精神，同时，也包含了浙西南、浙南革命根据地缘起的红军挺进师精神。

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的这次会议是如此重要，它在中共党史上被称为“历史的转折点”，而遵义会议扭转乾坤的力量被人们概括为“遵义会议精神”。同一时间，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主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并派出赴浙红军抗日先遣队的背景下，中共中央1935年1月15日电令，以先遣队突围部队为基础迅速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长期行动，粟裕任师长，刘英任政治委员。从此，红军挺进师孤军深入浙江，在重峦叠嶂的山区大展拳脚，在唯一一部电台丢失、失去同中央联系的情况下，发挥独立作战精神，灵活机动地制定出适应当时斗争环境的政策、策略，胜利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开辟了革命低潮时期全国为数很少的一块新革命根据地——浙西南、浙南革命根据地。红军挺进师精神由此锤炼而生。

回溯这些辉煌历史事件，我们发觉，红军挺进师精神作为中央红军派出部队在浙江地域革命奋斗的精神成果，它与作为全国革命精神序列重要组成部分的遵义会议精神存在着一些天然的联结点。

一、历史同源

红军挺进师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在生发的历史时间上有着高度一致性，处于相同的党中央及军队领导之下，如此密切的政治亲缘关系，决定了它们在历史源头上有着紧密的联结点：它们源于同一的历史契机，和同样充满生机、掌握时代脉搏的杰出共产党人的领导，它们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从历史契机来看，遵义会议是在长征途中召开的，红军挺进师是在长征出发前夕从江西瑞金派出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坚持6个月后，在江西怀玉山遭受国民党重兵包围、损失严重的突围部队基础上建立的，两者的发生源于同一个历史节点，即中国革命万分危急的关头。

共产国际错误的“左”倾路线指导下，红军频频失利，且错误指导思想一直延续，并造成惨重的损失。临近遵义会议之前，博古面对国民党调集几十万重兵分三路围追堵截，仍命令红军部队硬攻硬打，结果在渡湘江战役时，持续激战一个星期，付出惨重代价，人员折损过半。被派往闽浙赣皖宣传抗日和牵制敌人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与中央红军同出一辙，无可避免地处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之下，王明路线的忠实追随者、中央派出的随军代表曾洪易实行攻坚打硬的错误指挥，经常受到敌人几倍兵力的合击，在从瑞金出发 3 个月后，先遣队 6000 余人就只剩 2000 余人。1935 年 1 月，他们面临着同样的抉择，是继续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还是结合中国革命实践摸索适合于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

同出于中共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的优秀共产党人，他们有着坚定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怀抱救国救民的民族使命感，在这个革命重要关头发挥大智大勇，对革命形势和道路作出正确的判断与选择，使革命形势转危为安！推动遵义会议根本性扭转的共产党人后来成了共和国的伟人、奠基者，带领红军挺进师成功开创浙西南、浙南革命根据地的师长粟裕在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大将军衔，位列十位大将之首。在他们的带领下，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遵义会议精神和红军挺进师精神从思想源头上讲，都是先进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吸取各种经验教训，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阶段性成果。中国共产党人在 20 世纪初纷繁复杂的各种思想与主义中，独具慧眼地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并坚定不移地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遵义会议之前，中共在共产国际的错误领导下，曾犯下僵化理解和施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主义错误，并付出惨重代价。1935 年 1 月的遵义会议和开始组建的红军挺进师，果断吸取前期错误军事路线的教训，把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自觉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形成遵义会议精神和红军挺进师精神。今天，这两个精神同属学术界所普遍认同的“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忠贞不渝的理想信念，历尽艰险的吃苦精神，无坚不摧的乐观主义”的红军精神。

二、内涵相联

在历史同源的基础上，红军挺进师精神与遵义会议精神在内涵上也有着革命亲缘关系般的联结。遵义会议精神在学界有很多解读，其核心思想是接近的，主要都揭示了遵义会议所体现的坚定信念、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民主团结等精神品质。关于红军挺进师精神，也有众多专家学者进行解读，比如坚持理想、依靠群众、艰苦奋斗、独立自主、灵活务实等。这些精神使新生的共产党焕发着源源不绝的时代活力。

联结一：坚定信念、矢志不移的革命执着精神

不论遵义会议，还是红军挺进师，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其强大的精神支柱。

遵义会议的召开是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主力进行战略转移，在长征途

中红军迭次失利，几乎濒于绝境的处境之下。广大干部和红军指战员绝地反击，奋起拼搏，他们抢抓国民党休整的间隙，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这次关键会议。毛泽东在长期的不公对待下顶住压力，坚定正确观点，争取到留苏归来的党内高层人物张闻天、王稼祥的支持，争取到党内和军队重要人物周恩来和大多指挥员的支持，通过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遵义会议，对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在张闻天、毛泽东发言和与会者讨论基础上，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改组中央领导机构，解决了当时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红军挺进师从1935年3月至1937年10月在浙江南部开展游击战争，与闽北、闽东红军创建的根据地遥相呼应，创建浙西南、浙南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国革命在南方的一个战略支撑点，为以后坚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浙江南部解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红军挺进师所走过的道路是艰难的，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三年游击战争的胜利是党的许多优秀干部、战士和革命群众意志、鲜血和生命的结晶。红军挺进师在失去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领导的情况下，在敌我对比众寡悬殊的极端残酷的斗争环境中，前赴后继、浴血奋战，经历由正规军到游击队、由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经受国民党的两次大规模"围剿"，坚持艰苦卓绝的浙南三年游击战争，鼓舞他们的强大精神力量始终是坚定的革命信念和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

联结二：实事求是、灵活机动的革命创新精神

如果说红军挺进师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的支柱是坚定信念、矢志不移的革命执着精神，那么实事求是、灵活机动的革命创新精神就是它们的思想灵魂。遵义会议召开前夕，党内正处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错误统治之下，博古、李德是这条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会议一开始是在博古的主持下召开的，如果与会者都盲从错误路线，会议结果可想而知。所幸共产党内一大批有识之士实事求是，不盲从"左"倾路线，把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中国具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深入剖析"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错误和危害，实现了对党的错误路线的根本扭转，它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样的成功必须归功于杰出共产党人不迷信教条，而是实事求是、灵活机动地根据中国革命形势作出的正确判断。

红军挺进师的成功同样也是实事求是、灵活机动的革命创新精神的践行。红军挺进师的前身是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是在1934年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前夕派出的，承担了北上宣传抗日同时在军事上吸引、调动敌人并威胁敌人后方的艰巨任务，它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但最终不幸遭受重创。遭受重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遵循错误的"左"倾指导思想，党中央和中革军委严格控制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一切行动，实行绝对集中的指挥，不给他们灵活机动权，王明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曾洪易任中央派出的随军代表，军团长寻淮洲的权力

被架空，他提出“红色碉堡反对白色碉堡”“不失苏区一寸土地”，反对游击战、运动战，实行强攻硬拼，使先遣队处处陷于被动，实力消耗很大。

红军挺进师吸取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教训，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及时转变战略方向，自觉地把正规军变成游击队，不打正规战而打游击战。如何将挺进师从一支经过几次反“围剿”斗争，已锻炼成为善于野战的红军正规兵团分散成为游击队，这是对将领军事智慧的考验，挺进师的领导们通过规定干部单独行动数天再会合等办法，锻炼干部的单独行动能力，增强他们的游击信心，使挺进师适应游击生活，最后甚至一个班长也能够带一支部队单独活动。他们因地制宜，把游击战的精髓发挥得淋漓尽致，创造性地采用多种游击战术来打击敌人，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如“敌进我进”战术，在敌人进行大拉网式的“围剿”时，我军与敌人相向对进，易地而战，“敌人梳过来，我们钻过去；你要我的山头，我要你的后方”，这种战术在浙西南三年游击战争中几乎贯穿始终，使用这种方法曾取得以挺进师和地方群众武装2000余人反对国民党32个整编团约7万人连同地主武装号称40个团的“围剿”的胜利①。

联结三：独立自主、勇于实践的革命实干精神

可以说，独立自主、勇于实践的革命实干精神是红军挺进师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的思想精髓。中共党史上说，遵义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一个孩童长为成人，他成熟的标准就是能够独立自主了。而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走到1935年，她成熟了，成熟的标准就是遵义会议后，她能够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所碰到的难题。在这里，我们把眼光放到当时的国际共运史看一下，就更能体会独立自主的巨大意义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受其领导。遵义会议之前，中国共产党内部事务基本由共产国际包办，中共自主权被剥夺，被动接受和执行共产国际的指令，表现为一些重要决策都由共产国际越俎代庖，而幼年期的中共对共产国际指令唯命是从，压制党内正确意见，中共中央人事变动也由共产国际决定，如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迅速被抬上中央实际领导者的位置。遵义会议上，以毛泽东为首的杰出共产党人对共产国际错误领导进行努力抗争，中共开始独立自主地处理中国革命中的问题。此后，中共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制定政策和策略，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而非完全听命于共产国际。

红军挺进师是在全国革命处于低潮期处境下，孤军深入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在没有老苏区和游击区可依托，又因电台丢失与党中央及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在浙江山区独立作战，从全国形势和浙江南部山区实际情况出发，成功创建浙西南、浙南革命根据地，粉碎了近百倍于己的敌人长达8个月之久的两次“围剿”，创造了奇迹。在这个过程中，红军挺进师进行了独立自主的革命实践，摆脱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束缚，摸索出许多完全不同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属于中国革命自己的经验。比如实行公开的武装斗争与隐蔽的群

① 孙瑛：《浅析红军挺进师与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成败的原因》，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纪念浙西南、浙南游击根据地创建60周年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年12月，第69页。

众工作相结合的方针，利用外围敌人兵力薄弱的机会，挥师南下开辟新根据地，而非死扛硬拼保阵地；建设根据地时不再公开建政，把部队分为突击队和牵制队，突击队秘密进行根据地工作，公开与秘密相结合。以及在建设根据地时，对各阶层采取不同政策进行团结，以争取更多的革命力量，如对松阳的“青帮”组织进行团结，建立“白皮红心”两面政权，打土豪、开仓济贫，分青苗、田地等，建立后方军需物资供应站、军械修理所、伤病员疗养所等。

三、革命共进

不论从历史纵线看，还是从历史横线看，红军挺进师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都存在着推动革命共进的密切关系。

首先，从历史纵线看。二者都指导近期革命取得了成功，继之，革命精神被进一步继承发展，从而指导了长期革命的全盘胜利

遵义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之后，红军摆脱“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错误指导，展开机动灵活的运动战，经过一年多的艰苦转战，长驱 2.5 万里，实现了史无前例的战略大转移，胜利地完成了震惊中外的长征。从长远的革命史来看，遵义会议精神更是为中国革命树立了标杆，指引了方向。遵义会议独立自主、实事求是地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革命创新与实干精神，指引中共从之前受共产国际的绝对支配作用中摆脱出来，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成功的革命道路。

红军挺进师在浙西南、浙南山区虽然仅存在三年，但根据地的建设和挺进师精神却意义深远。红军挺进师重燃了浙江革命烈火，建立了革命基业，浙江党组织从 1935 年 3 月时仅有少数零星组织，发展为建立闽浙边临时省委和下属的浙西南、浙南、浙东南、浙东 4 个特委，培养党员总数达 3000 多名，红军和游击队近 2000 人，地方干部 500 多名；红军挺进师为浙江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留下了一批革命的领导者、中坚力量，这批留下来的同志中有浙江省委书记刘英，先后任省委常委的谢文清、龙跃等人[①]。红军挺进师“坚持理想、依靠群众、艰苦奋斗、独立自主、灵活务实”的革命精神对整个浙南地区的后期革命影响深远。

1939 年后，作为国民党腹心地区的浙江革命形势始终比较严峻，但浙江人民不惧艰险，勇敢支持革命，机动灵活地运用现有优势，继承和发扬挺进师白区斗争的策略和艺术。比如浙西南山区的青田县，在 1938 年抗日战争期间，利用国共合作的海口战时经济建设实验区平台，组织人民积极抗日，为民谋利，壮大党组织，迎来当地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和党的建设高潮。1940 年前后，在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形势下，浙江革命领导者执行中央“隐蔽精干”方针，及时地将一批面目“红”了的同志撤到新四军中，留下的加强隐蔽，防止急躁和暴露，实行社会化、职业化。

---

① 诸葛蓉：《略论红军挺进师对浙江革命的影响》，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纪念浙西南、浙南游击根据地创建 60 周年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 年 12 月，第 42 页。

其次，从历史横线来看。红军挺进师精神指导下所创建的浙西南、浙南革命根据地对遵义会议前后全国低迷的革命形势有着重要的鼓舞作用，对南方革命形势有着重大推动作用

1935年春夏创建的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和之后创建的浙南革命根据地，与同一时期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立足陕甘根据地，南北遥相呼应，相辅相成。1935年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时期，党中央和红军主力正在长征途中，处于爬雪山过草地艰难危急之中。留在长江以南坚持斗争的各游击区共有十几块，除浙西南为新开辟之外，其他都是老苏区，他们正处于最困难的隐蔽斗争时期。如果将此时的浙西南放在全国革命形势图上看，在全国低潮的革命形势中，浙西南却出现了“分田分地真忙”和“父送子、妻送郎参加红军”的热烈革命场面。这对于低潮中的党、红军和革命人民，是个极大的鼓舞。

不仅如此，浙西南、浙南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在南方建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支撑点，它在国民党腹心地区的游击战争吸引和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军队。浙西南、浙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当局的反动统治，严重威胁到国民党南京政府后院的安危，国民党浙江省当局束手无策，自叹“四分之三的浙江工农阶级被其诱惑，滋扰二十余县”。国民党不得不调主力入浙“清剿”，对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前后实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围剿”①。在粟裕、刘英的杰出指挥下，浙西南、浙南革命根据地在悬殊的实力对比情况下，以少胜多，成功突破“围剿”，策应和支援了中央主力红军的战略行动和邻近游击区的斗争，更好地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

总之，处于同一历史时间节点、相似的革命环境下，作为实施党的战略转移、北上抗日的主力部队和北上抗日先遣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地方部队，他们都有幸受到一批杰出的革命家的领导，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锤炼出相似的革命精神内涵，这就是遵义会议精神、红军挺进师精神，这两种精神最终在不同层级范围内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前进。它们具有着天然的联结点。

（选自《纪念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创建8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作者单位：中共青田县委党史研究室）

① 李华忠：《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创建的历史意义与受挫的经验教训》，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纪念浙西南、浙南游击根据地创建60周年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年版，第28页。

浅析斋郎战斗的战略战术和历史地位（节录）

何建林

一、运筹帷幄，充满信心

1935 年 4 月 23 日，红军挺进师 500 余人在粟裕、刘英率领下来到庆元县斋郎村。他们以严明的组织纪律出现在斋郎群众面前，并很快用实际行动取得群众的信任，达到了孤立极少数反动顽固分子的目的。经红军宣传发动，群众很快加入了红军防务、备战队伍。为严防消息泄露，严控非本村人员“只准进，不准出”，并及时获取敌人信息。群众有的协助红军把守进村各个通道口；有的为红军打土豪小分队外出带路，指示各村地主土豪住地，帮助红军打探敌人情况等；有的随红军到预定战场帮助挖战壕，提供茶水服务等。红军挺进师指战员根据师首长的决策精心组织、统一安排，经一周的备战，修筑好各路设伏点，专候来犯之敌。

粟裕、刘英、黄富武、王永瑞等领导通过实地察看，根据各方汇集的消息，并有针对性地备战。已知临近斋郎之敌主要有三股，分别为浙江保安第一团李秀部、闽保第二团马洪琛部和 1000 余名大刀会会徒，敌人总数达 3000 余人。并从三堆村抓来的 3 名大刀会徒口中得知敌人进攻斋郎村的确切时间和具体进攻线路。粟裕、刘英明白：红军只有 500 余人，武器装备落后，是一支前无接应、后无根据地依托而深入敌后的孤军，困难、风险时刻威胁着指战员们。为了摆脱被动挨打局面，除了紧紧依靠群众、借助有利地形外，还必须根据敌我情形，发挥集体智慧，作出科学的决策，把握战机开创新局面。

粟裕、刘英等多次召集指挥员分析敌情，召开各纵队领导会议，广泛征求斋郎战斗如何打的意见，如何把 500 余人的有限力量充分发挥好等等。粟裕、刘英等博采众长，然后组织实施。

二、敌众我寡，扬长避短

红军挺进师指战员大多是年轻人，师政委刘英，时年才 30 岁，算是长者了，粟裕、王永瑞、黄富武等均只有 20 几岁。然而，就是这样一支队伍，在粟裕、刘英等率领下，竟出人意料地准确把握着整个战斗走势。他们认真分析敌情，认为福建保安团人数虽众，有 1000 多人，但他们不愿在浙江境内卖命。只要提前设防阻止其向斋郎行动就行了。大刀会 1000 余人，人数虽多，但是临时纠集起来的乌合之众，平时缺乏训练、配合，武器是大刀等为主，只要控制他临近搏

杀，形不成杀伤力。为了控制大刀会的进攻节奏，将他们挡在水口之下，并按红军预设的路线改走岙头淤上，拖累了再打，击溃他们。红军确定主要对手是浙江保安第一团李秀部 1300 余人。粟裕、刘英等分析，一来浙保知道剿灭进入浙江（庆元）境内的红军是其职责，也是立功升官发财的好机会；二来浙保认为头阵由众多大刀会与红军拼杀，红军已失去反击力，自己人多势众，可倚强凌弱，有便宜可捡。

粟裕、刘英等面对敌众我寡，又无其他武装配合，而且还须分兵御敌才能应付眼前的局面。红军在人数上、装备上均落后于敌军，这就是斋郎战斗前的现实。师首长对斋郎战斗敌我双方情况可谓是“知己知彼”。而分兵御敌意味着战斗力下降，达不到歼敌目的，甚至连防守都困难。如何摆脱困境，掌握战争主动权，把红军有限的力量集中起来使用，最大限度发挥自己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有效打击敌人；如何避免群众伤亡，最大限度降低自己的伤亡，已是摆在指挥员面前的首要问题。如果三股敌人同时杀向斋郎村，挺进师已制定了撤退路线、群众优先、部队随后的方案，确保战斗万无一失，确保群众和指战员的安全。同时，明确告诉群众：战斗避开村庄，主战场设在牧牛场。此举得到群众的广泛支持，群众主动请求安排任务。

为了把有限的红军力量集中使用，将主力安排在牧牛场对付主要进攻之敌浙保第一团，为了将浙保第一团主力引入主战场，挺进师派出一支小分队前往景宁县境的黄麻岭“恭候”，激怒保安团追击，拖累敌人以降低其进攻能力，达到歼灭敌人之目的；把次主力安放在岙头淤对付 1000 多人的大刀会进攻，击溃大刀会后又马上把这部分力量增援仅距 200 米的牧牛场；率先安排近 10 名红军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村尾水口阵地坚守设防，并插上红旗、砍倒大树横卧极陡的路中，迫使大刀会改变进攻路线，达到挫其锋芒、被拖累之目的，以利在岙头淤将其击溃；抽调一小部红军（50 名左右）到企坑岙驻守设防，阻止闽保第二团进攻斋郎。斋郎战斗打响后，整个战斗节奏都按粟裕、刘英等事前制定的方向发展。

三、虚实并用，克敌制胜

1935 年 4 月 28 日凌晨，仅用极少红军驻守村尾水口的“阻击战”，率先打响。大刀会在水口底处抬头见红军防备森严、滚石助阵，山路陡窄，“之”字形道路两边全是悬崖峭壁，砍倒的大树挡道。他们人数虽众但无法冲上顶端、又不甘放弃，只好按红军预设的“路”爬岙头淤进攻斋郎村。他们经过 1 小时的艰难攀爬、疲惫不堪地接近岙头淤时，就听到红军劝说“不要替国民党卖命”。自以为“刀枪不入”学“法”之人，哪听得进红军之劝，冲上前挥刀一阵乱砍。红军挺进师政委会委员、宣传科长王维信和两名守在前沿阵地的红军战士被砍成重伤，血流如注的王维信下令“打”，一时枪声、手榴弹声齐响，冲在前面的几名大刀会徒随声倒下。惊恐的大刀会徒呼叫“会死人的”。红军乘胜痛击，1000 余名大刀会徒丢下同伴尸体，连滚带爬溃逃下山。王维信和 2 名红军战士因伤势过重牺牲。

接着，担任堵截任务的50余名红军进入明暗设防的企坑岙阵地“恭候”闽保第二团。大晌午，马洪琛率部离开后广往斋郎方向出发，当他们来到企坑岙，抬头见红旗飘飘，红军扼守险要，掩体坚固，山陡路险，无法逾越。果然，马团长见状下令：“原地待命！”等候浙江保安团与红军拼得差不多，伺机进攻，兴许还能捡便宜。就这样，闽保第二团被挡在路上。红军见太阳西斜，还悄悄抽调部分红军经鲁班路增援主战场牧牛场的战斗。

上午，浙保第一团果然从景宁向斋郎村扑来，当先头部队行至黄麻岭（属景宁县，距主战场5华里）附近时，遭前往诱敌的红军小分队痛击。立功心切的敌人见红军人少，发起追击。红军见敌人“上钩”，立即回撤。养尊处优的保安团哪里追得上，时间不长就气喘吁吁地慢步下来；红军见状，再次狠击敌人，敌军被激怒再次追击，战斗的节奏已被红军掌控。当疲惫不堪的浙保一团完全进入红军预设的主战场——牧牛场阵地，近400名红军指战员驻守在一线两个最佳射击制高点迎敌。红军首长一声令下：“打！”手榴弹、轻重机枪在敌群中爆响，死伤一片。敌人凭借人多势众组织多次进攻，均被借助掩体的红军一次次击退。敌人前进不了，团长李秀坐轿来到阵前督战。不料，刚下轿就被红军击中右手，卫兵见状，立即上前救回团长，抬上轿子，往景宁逃跑。

太阳西斜时，粟裕、刘英等见敌保安团进攻减弱，遂下令发起冲锋，红军跃出战壕，冲下山去。敌人见状，纷纷扔掉枪逃命。红军直追击到40华里外的英川，才停止追击。红军原路返回，捡到的枪支太多，每人将枪支捆绑后挑回斋郎村。

斋郎战斗，共毙敌300余人，俘敌200余人，伤敌无数，缴获枪支1000余支、子弹万余发。红军指战员王维信等25人在战斗中牺牲；重伤3人，转移至三井溪被安排在交通员家中养伤，后被敌发现遭杀害。

四、“关键性一仗”影响深远

粟裕回忆说：“斋郎战斗是挺进师挺进闽浙边的关键性一仗……挺进师获得了开辟以仙霞岭为中心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有利时机，胜利完成进军以来的第一个作战任务——打开进入浙西南开辟游击根据地的通道。”[①]刘英、粟裕抓住这一时机，率领挺进师进入浙西南，创建浙江第一块革命根据地——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开创了浙江革命的新局面。斋郎战斗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意义。

我们要学习和弘扬红军挺进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指挥枪，坚持群众路线、发扬民主，解决前进道路上的种种困难”[②]的优良作风……

我们要学习和弘扬红军挺进师“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面对强敌、不怕牺牲，敢于战斗、敢于胜利”的精神。斋郎战斗是红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典型例证。

---

① 中国革命博物馆等：《名将粟裕》，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41页。

② 刘英：《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庆元党史通讯》1986年第二期，第3—4页。

抗战爆发后，1938 年 3 月，挺进师主力由粟裕率领开赴抗日前线，编入新四军，驰骋抗日疆场。刘英等留在浙江，继续领导浙江人民坚持斗争，至 1938 年 5 月，中共浙江临时省委成立，全省先后建立了 5 个特委、57 个县委（含工委、特支、特派员），至此，浙江的革命形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①]。

（选自《纪念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创建 80 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作者单位：庆元县史志办公室）

①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浙江党史大事记》（1919—1949），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43 页。

松阳人民对挺进师开辟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贡献（节录）

王香花

一、浙西南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域的创建和发展（略）

二、松阳人民对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贡献

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指出，中国红色政权的存在与发展有其必然性依据，因为当时的中国具有其生存与壮大的条件。安岱后等松阳县西南部山区具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条件。

（一）优越的地理位置为红军挺进师提供立足之地

首先，松阳安岱后位于闽、浙、赣三省边界的浙西南腹地，处于松阳、遂昌、龙泉三县的交界处，距县城60余公里，国民党政府难以深入管治。其次，浙西南地处闽、浙、赣三省交界处，可与闽北、闽东、闽浙赣几块根据地互为犄角，互相支援，可以利用三省敌人之间的矛盾，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地区。再次，浙西南地区处于仙霞岭山脉的中段，境内山岭连绵，森林茂密，道路曲折，有一定的回旋余地，便于部队的隐蔽和机动。独特的地理位置为红军挺进师开展武装斗争、进行根据地建设及土地革命提供了有利环境条件。

（二）光荣的革命传统为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创建提供群众基础

早在1904年，“双龙会”会主王金宝在浙江革命党人陶成章、魏兰的引导下，参加“反清灭洋”斗争。五四运动时期，松阳进步师生发起成立“反帝救国会”，抵制日货，唤醒民众，揭开了松阳县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大革命时期，松阳学子吴玠、吴力生、孟卿等有识之士接受进步思想，加入中共组织，传播马克思主义，组织群众开展革命斗争。

1930年，松阳县旱灾严重，广大农民缺衣少食，5月，暴发了“闹平粜，反饥饿”事件，县长罗天宝耍两面手法，当面责成各乡村地主开仓平粜，暗地里调集荷枪实弹的军警，用武力平息“闹平粜”事件，使松阳人民与国民党地方当局的矛盾加剧，激发了贫苦群众寻求出路动机。这时，松阳籍中共党员孟卿受党的指派，回松阳发动了赤溪农民暴动。

同年，陈凤生、陈丹山、卢子敬领导的“青帮”和农军在红十三军斗争和闽北崇浦农民暴动

的影响下，有了明确的斗争方向，矛头直指土豪劣绅。7 月 16 日，白岩农军 300 余人聚集于山乍口村李氏宗祠，誓师暴动，并一举捣毁玉岩区公所和玉岩公安分局，缴获步枪 7 支、子弹 5000 余发、军用物资若干。为了扩大农军活动范围，陈凤生、陈丹山、卢子敬率领农军转移到古市温州寮一带，继续发动群众，扩大队伍。陈凤生、陈丹山、卢子敬率农军到宣平活动，打出红军旗帜，参加松（阳）遂（昌）宣（平）红军牛头山暴动，誓师攻打龙泉县城等活动。暴动虽然失败，但反抗国民党当局的怒火依然在群众心中燃烧。在人民群众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和希望，为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创建奠定了基础。1935 年 5 月，陈凤生、卢子敬、陈丹山等人终于找到了共产党和红军队伍，成为了红军游击队骨干，很大一部分农军战士成为红军挺进师第五纵队的战士，为开辟浙西南革命根据地作出了贡献。

（三）松阳的土地革命成为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的样板

挺进师领导人在根据地中心区域安岱后一带开展土地革命的试点，取得可借鉴的经验后向其他地区推广。1935 年 7 月，革命根据地内松阳县境各个村基本建立了分田委员会，在区、乡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宣传土地革命的重要意义、分配土地的具体要求和办法。农民游击队员背着土枪，扛着红缨枪参加土改工作。小吉等近百个村纷纷行动，物色有文化、熟悉村情又大公无私的骨干，专门负责分田委员会的工作，实施土地革命，进行查田造册、丈量田亩、分青苗分土地。

松阳县西南部率先按中央苏区的做法，开展以登记造册、分田插标、确权发证为内容的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到 8 月底，松阳县西南部有 100 多个村开展了土地分配工作，其中 85 个村实际完成土地分配到户，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在此基础上，以松阳为浙西南土地革命的样板，把优秀骨干派往龙泉、遂昌指导土地革命。

（四）为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创建发挥中流砥柱作用

由于红军挺进师第五纵队、中共浙西南特委、浙西南军分区机关常驻安岱后休整，同时，又创办了红军伤病员医疗所、军械贮藏基地、红军生活给养供应基地。因而，松阳安岱后及其周边地区成了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据点。松阳县西南部山区家家户户都有人参加红军，都有人为革命事业流血流汗或英勇牺牲。

红军挺进师为了及时了解国民党军警的动向，购置军需物资，须建立情报站和开通一条从县城到根据地中心区域的秘密交通线。浙西南特委于 6 月底在安岱后建立交通总站，南坑建立交通联络处，在沿途设立虎山坝和南山交通站，负责挺进师政委会、特委、军分区、地方工作团、伤病员医疗所、军械贮藏基地、军分区兵工厂、县内各区乡党组织、苏维埃政府之间的交通联络。从白岩、安岱后至松阳县城，形成了完备的交通线。这些交通联络站工作任务繁重而艰巨，交通情报联络员冒着生命危险，出没周旋在敌人营垒，冲破重重困难和险阻，才使根据地耳聪目明，作出正确的决策。

红军伤病员的养伤治疗任务也落到当地干部群众身上。1935 年 9 月 2 日，国民党军跟踪

尾追红军，在海拔1200多米的麻士尖遭遇，红军损失惨重，傍晚向玉岩地区撤退。麻士尖战斗后，在附近群众中出现了动人的一幕。庄后村周根旺和他的母亲傅凤秀救护了红军伤员，村里地主土豪周关火威吓傅氏，不准其救治伤病员。傅氏母子把伤员一连抬了五六个地点隐蔽护理，最后交给余叶革命组织接收。山岭口村农民游击队员刘世发、傅严林在田忠寮地方搭棚，为红军支队长叶火顺和其他伤员老聂、老李等养伤至伤愈离开。红军老林、老杨、江西佬等四名伤员被安置在余叶村瓦窑养伤，后转移到何山头村紫路儿密林中搭棚，由叶永连照顾一月余，伤愈后归队。陈丹山在安岱后村创办的红军伤病员医疗所，是规模最大的医疗所，由草药医师（农村土郎中）陈宗寿、陈宗益、王士星、陈宗芳等具体在村外搭寮护理治疗，在此养过伤的红军有刘亨云、老米、老李等近30名。

卢子敬被浙西南军分区任命为硝磺厂厂长，他安排叶长魁、叶元义、杨有荣、杨明福等人，在松阳县枫坪丁坑关山源一带取硝土、硝石，熬制硝磺炸药，制造土枪、土炮、手榴弹、手雷、梭标、大刀等，积极为红军和地方游击队提供军械武器。

在红军挺进师领导下，经地方工作团的工作，松遂龙三县边境的“青帮”会众群起响应，纷纷参加红军或游击队，组建了100余支农民游击队，其中松阳县域就有80多支。这些农民武装积极投身根据地的斗争和建设，配合红军作战、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站岗放哨盘查路人、交通联络等等。

（五）为浙西南根据地创建做出巨大贡献和牺牲。

1935年9月，以国民党十八军为主力的7万国民党军开始血洗浙西南。挺进师政委会决定，刘英、粟裕率主力向浙南闽北行动，黄富武、王蕴瑞率挺进师二、五纵队和地方游击队在根据地内坚持。不论是红军战士，还是地下交通员都怀着一颗赤诚的心，为保卫革命根据地，保卫革命成果，洒尽热血献出生命。10月初，红军在水南南山的联络站负责人王文龙，送走了部分突围的红军出乡。10月9日，王文龙（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保长）被国民党军第九十四师逮捕杀害。10月20日，卢子敬在关山岭山棚被捕，22日在玉岩英勇牺牲。叶义、陈宗儒等骨干先后被捕就义。10月30日，黄富武因在战斗中受伤，在遂昌县圩头乡外方岭村被“剿共”义勇队围捕，12月12日在丽水大水门外英勇就义。10月31日，陈凤生在安岱后村附近被捕，11月22日在龙泉城牺牲。10月至12月，红军和地方干部李陈良等219人相继被捕牺牲[①]，201名松阳籍红军战士、游击队员和革命群众被捕入狱。仅大横坑村被杀12人，被捕入狱14人；横樟村20多人被捕入狱……

粟裕在《回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一文中说：“坚持根据地斗争的第五纵队，是以浙西南根据地革命干部、共产党员和青年积极分子为主体的第一支浙西南人民子弟兵。尽管这支部队组建得晚，训练得少，但指战员的觉悟高，甘愿为保卫家乡、保卫红色政权、保卫土地革命而献

① 中共松阳县委党史研究室：《箬寮风雷》，1995年印行，第28页。

身。他们人熟地熟，给敌人的打击格外沉重……他们不愧是浙西南革命史上光荣的代表……陈凤生、卢子敬、陈丹山等同志，都为坚持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洒下了最后一滴血……这些有名的和无名的英雄，他们的革命精神是永垂不朽的！”①

（选自《纪念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创建8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作者单位：松阳县史志办公室）

① 中共丽水地委党史研究室：《浙西南游击根据地》，1995年10月印行，第126、127、152页。

从“门阵谈判”看粟裕大将的政治才华（节录）

钟春雷

一、粟裕善于判断形势，精心策划，促成浙西南地区国共两党合作谈判成功

自1935年3月，在与中革军委、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红军挺进师师长粟裕、政委刘英率领500余名将士进入浙江，经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1937年9月，与刘英分开活动、坚持在遂（昌）汤（溪）宣（平）边区的粟裕，对1937年9月的第二次国共两党达成合作协议的情况并不知情，也不了解1937年8月24日刘英派出的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谈判代表与国民党闽浙赣皖四省边区主任刘建绪代表在温州申江旅馆谈判达成的五项协议。但当粟裕听到金衢平原传来“共产党投降了”“红军被收编了”的传闻后，敏锐地觉察到有可能是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了。他随即派出小分队去调查。小分队在龙游县溪口，化装成国民党军职人员，同龙游县长通电话，取得了国共和谈的确切消息，并收集了《东南日报》等资料，立即回部汇报。为此，粟裕随即向国民党遂昌县当局发出《国共合作抗日建议书》，倡议合作抗日。

9月18日，国民党遂昌县当局复函红军，表示“对于政府过去一切措施自不能再相诘责，而政府也不愿追咎既往”，提出“贵军如有诚意请缨杀敌，请即刻派全权代表到金岸与本府所派代表接洽一切……”欲收编红军。粟裕识破对方欲收编红军的阴谋，要遂昌县当局派代表到根据地谈判。

10月12日，国民党遂昌县当局委派警佐朱镇山赴门阵与粟裕谈判。朱于次日晨出发到云峰乡加蓝，派人投函与粟裕联系，粟裕率部星夜抵门阵，14日与朱镇山会晤。粟裕针对当局还存有收编的企图，明确指出，为了共同抗日，挽救国家危亡，为中华民族争生存，红军不咎既往愿意谈判，但合作不是投降，改编不是收编，双方应是平等的。双方取得一致意见后，当日下午举行面对面谈判。粟裕隔一面板壁在内坐阵，派谢文清、刘清扬为代表，与朱镇山在张家堂屋谈判，提出如下条件：红军保持独立；双方立即停止一切敌对行动（我方已停止打土豪）；红军为迅速开赴抗日前线，迅即去平阳集中整训，沿途国民党方面不得留难；国民政府要为红军补充弹药、给养。谈判到最后，朱镇山表示愿意立即回县报告。由于被我方抗日诚意所感动，谈判没有横生枝节。朱镇山离开门阵时，双方共同高呼口号：“复兴中华民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朱镇山回县城后随即报告和平谈判情况。国民党遂昌县当局迫于形势，同意红军要求，谈判得以成功。此后，浙江省国共和平谈判达成协议的消息已见诸报端，粟裕也获得了这些消

息，他们便集中部队整训，迎接新的斗争。10 月 19 日，粟裕率部离开门阵，途经遂昌的苏村、北界、应村、梭溪、金竹、湖山、王村口，经龙泉到平阳集中[①]。

二、从“门阵谈判”全过程，结合三年浙南（包括浙西南）斗争实践，可以看出粟裕坚强的党性原则、优秀的政治品质和组织能力

在浙南（包括浙西南）三年艰难的游击战争中，粟裕和政委刘英在没有任何上级指示的前提下，完全靠机智勇敢、独立思考，作出正确形势判断，多次“分兵”，制定“敌进我进”战略，实现部队从运动战向游击战的转变。重新点燃浙江共产党组织的“星火”。三年时间里，他们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艰苦卓绝、英勇顽强的斗争，同时以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发出声明，呼吁国民党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被后人传颂的“神话”。单从“门阵谈判”整个过程，可以看到年轻粟裕坚强的党性原则、优秀的政治品质和组织能力。

能够坚持艰苦卓绝的三年浙南（包括浙西南）游击战争，最主要的就是“信念”。新中国成立后，粟裕曾经说过，在三年游击战争时，他就萌生了要写一本书的想法，书名就叫《信念》，记述这一段艰苦卓绝的斗争。他说：“浙南三年游击战争，不管形势怎样险恶，鼓舞我们的强大精神力量始终是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的坚强信念，相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总是要胜利的，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在游击战争那样艰苦恶劣的环境里，我们没有忽略过共产党人所肩负的政治责任，对于一些重大政治事件，都力求从我们自己所理解的水平，表明政治态度。”[②]当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他主动放弃与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以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为重，积极主动呼吁建立浙西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成浙西南国共双方的和谈成功、开始共同抗日，这是粟裕将军坚强党性原则的表现。

爱学习、勤思考，重调查研究，依照形势作判断、决策，是粟裕将军优秀品格的又一表现，也是他政治军事不断走向成熟的源泉。三年浙南（包括浙西南）游击战争中，他把学习到的毛泽东游击战略战术，在井冈山、瑞金中央苏区的好经验、好做法，带到浙南（包括浙西南），并剔除“左”的内容，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为此，仅有 500 余人的挺进师被不断“分兵”，在群众中发挥了骨干作用；制定“敌进我进”战略战术，使根据地区域不断扩大。无论条件多么艰苦、环境多么恶劣，阅读当地的大量报纸刊物，是粟裕重要的工作习惯，把这当作了解党中央方针政策、了解国内形势的主要渠道。“我们每到一地，就千方百计搜集敌人的报纸，从字里行间了解情况，分析形势；并且通过各种社会关系，特别是通过青年知识分子，搞来上海等地的进步刊物。”对搜集到的党中央《八一宣言》《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重要文件，“我们马上组织学习和宣传。对内，给指战员上形势课，进行思想教育；对外，发表宣言和公开信，说明斗争形势，宣传

① 唐家明：《鲜为人知的一幕——1937 年遂昌县国共谈判史实》，《浙江档案》1989 年第 8 期。

② 《粟裕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51 页。

我党关于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表明我们的立场和态度”[①]。正由于粟裕政治性强、热爱学习，顺形势大流而行，才力推浙西南国共双方的和平谈判成功。

善统战，是粟裕能够团结大多数人跟着共产党走、孤立少数国民党顽固派的重要策略。在三年浙南（包括浙西南）游击战争中，他不仅善于把群众发动起来，加入革命的队伍，共同与国民党反动派作坚决的斗争，而且善于把当地恶霸地主、反动分子与开明的中上层富豪绅士区分开来，为我所用。在门阵和平谈判过程中，他始终坚持国共合作“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这和党中央的方针策略是一致的。对内主动说服红军指战员和当地群众转思想“弯子”，以国难为重、大局为重，对过去国民党反动派杀害那么多挺进师战友和当地共产党员、革命群众“既往不咎”，与国民党合作抗日，这是真的很不容易。对外，他反对国民党当局“安抚”或收编红军，指出“合作不是投降，改编不是收编，双方应是平等的”。他坚持我党、红军的立场，与国民党当局玩弄“假合作、真收编”行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以理服人，说服国民党当局放下屠刀，表现诚意谈判合作、共同抗日。

在坚持艰苦卓绝的三年浙南（包括浙西南）游击战争中，粟裕坚持廉洁自我、官兵一致、军民一致，与下属、与当地群众饱含深情，保持密切的血肉联系，这是他能够度过三年艰苦卓绝日子、克敌制胜的法宝。当和谈结束、红军依依不舍即将离开门阵时，粟裕召集军民在门阵村头白沙庙召开军民联欢会，请来木偶剧团为群众演出，以告别根据地的父老乡亲，并庆祝团结抗日的胜利实现。乡亲们从四面八方汇聚而至，个个热泪盈眶，与子弟兵依依不舍，军民之间情如鱼水[②]。部队离开门阵，在开赴平阳中，一路纪律严明，军容整肃，沿途积极宣传抗日，群众见之，无不肃然起敬。

因此说，粟裕能够从南昌起义时的叶挺部的警卫班长做起，经历井冈山、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三年浙南（包括浙西南）游击战争，最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战场上，越战越勇，功勋卓著，绝不是偶然的，从中可以领略到这位自学成才、从士兵到开国首位大将的不寻常人生轨迹。他为中国革命、人民解放事业和新中国成立和建设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是值得永远怀念的。

三、在纪念红军挺进师入浙80周年、巩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之际，怀念粟裕将军，追思他的革命风范，学习他的革命精神，意义深远（略）

（选自《纪念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创建8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作者单位：中共丽水市委党史研究室）

① 《粟裕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151页。

② 浙江省遂昌县史志办公室：《中共遂昌党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150页。

后　记

浙西南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在国民党统治腹心地区浙江建立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是在1935年中国革命转入低潮时新建立的革命根据地。她的建立及其斗争，支援了邻近游击区的斗争，战略上策应了中央红军主力长征；重新燃起了浙江革命烈火，开创了浙江革命基业，为中国革命在南方建立了一个战略支点，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保存、发展了革命有生力量。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丽水各级党史部门对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研究作出了积极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由于研究成果散落于各种资料中，没有系统地汇编成册，不利于进一步研究和宣传，为此，特编辑出版《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研究文集》。

《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研究文集》收录有关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及其创建者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的研究性文章，包括省内外有关专家对主要领导人刘英、粟裕率部开展三年游击战争的研究文章。刘英、粟裕的回忆文章是研究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基础，特别予以收录。所收录文章按成文时间为序编排。为减少重复，部分文章以节录形式收录。

限于时间和水平，编辑中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2018年6月